

湖湘文丛谈

第一集

湖南省文史馆 组编

湖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熊志庭
封面设计：吴颖辉
ISBN 978-7-81113-485-8
9 787811 134858
全套定价：160.00元

《湖湘文史丛谈》

主　编　阳盛海

副主编　伏家芬　熊治祁

刘泱泱　陈书良

胡渐逵　李治湘

湖湘文史丛谈 · 第一集

湖南大學出版社

2008年 · 长沙

内 容 提 要

内容涉及湖南历史、人物、民族民俗、教育、科技等。近现代内容均为作者亲历亲感，生动而真实，颇具文献价值。全书具史料性、趣味性、理论性，可供阅读、收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湘文史丛谈(一、二、三)/湖南省文史馆组编．—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11

ISBN 978-7-81113-485-8

Ⅰ.湖… Ⅱ.湖… Ⅲ.文史资料—湖南省

Ⅳ.K29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4240 号

湖湘文史丛谈(一、二、三)

Huxiang Wenshi Congtan

主　　编：湖南省文史馆　组　编

责任编辑：熊志庭

封面设计：吴颖辉

出版发行：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410082

电　　话：0731-8822559(发行部)，8821233(编辑室)，8821006(出版部)

传　　真：0731-8649312(发行部)，8822264(总编室)

电子邮箱：pressxiongzt@hnu.cn

网　　址：http://press.hnu.cn

印　　装：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00×960　16 开　　印张：79.5　　字数：1 480 千

版次：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500 册

书号：ISBN 978-7-81113-485-8/K·30

定价：160.00 元

《湖湘文史丛谈》序

于来山

金风送爽，秋实飘香。在全国十省三市文史馆文史研讨书画艺术展暨湖南省文史研究馆成立 55 周年活动举行之际，省文史馆编辑的《湖湘文史丛谈》合订本出版了。我得知，这套书十年前就开始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编辑，有上百位馆员、专家、学者和重要历史人物为该书贡献了珍贵资料。当该书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感到了它的精美装潢，更可贵的是它对湖湘文化的研究以及相关史事、人物的包涵和评说，让我们更多地知晓湖湘文化生动与真实的内涵和合乎逻辑的演进过程。读了它，会给我们一个强烈的印象：这是一本我省目前在文史研究方面集理论性、史料性、趣味性于一身的历史资料书，值得阅读和珍藏。

文史研究馆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倡导和关怀下创建的，是具有统战性和荣誉性的文史研究机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其宗旨是“敬老崇文，尊贤尚德”。中心任务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所聘任的馆员，解放初期主要是社会上学有专长、德高望重，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学识渊博、贡献较大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家。1988 年，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实施，文史馆开始从由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以党外爱国人士为主体的文史专家和书画艺术家中聘任馆员。1995 年后，又陆续聘任少量在文史界、艺术界知名度较高、影响较大、熟悉统战工作的中共党员为馆员，使文史馆工作增添新的生机和活力。一大批集“德、才、望”于一身的耆士宿学们聚集在这里，继续发挥余热，奉献德艺，服务社会，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文史馆的创建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爱国统一战线政策的体现，是党和政府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政策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敬老崇文、尊贤尚德优良传统在当代的继承和发展。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是省政府直属的具有统战性和荣誉性的文史研究机构。建馆 55 年来，省政府先后聘任了共 371 名馆员。现有馆员 84 人，其中有教育家、文学家、史学家、考古学家、哲学家、书画艺术家等，不少属全国知名。几十年来，他们各展所长，辛勤耕耘。他们或研究文史，或著书立说，或吟诗赋词，或挥毫泼墨，或创作书画，或以文会友，开展海外联谊；寓文化于活

动，以活动促活力，不断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湖湘文化，推动我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社会建设，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贡献自己的力量。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省文史研究馆按照馆员各自的专长，分别成立了文史研究会、诗词研究会、书画研究会、海外联谊会，并创办了馆刊《文史拾遗》和《楚风吟草》，积极组织馆员开展文史研究、诗词写作、书画创作和海外联谊，各项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成果更加显著，与省内外各界的联系更加广泛和频繁，受到省委省政府的肯定和社会各界的赞誉，在全国各省文史研究馆中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史研究馆的中心任务。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湖湘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和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在湖南大地上滋润成长的湖湘文化，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发展至近代，形成了许多突出的优良精神特质，主要有："心忧天下"的爱国情怀；"经世致用"的学用一致学风；"重践履"、"贵实用"的务实理念："趋新"、"善变"、"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坚忍不拔"、"踔厉敢死"的奋斗精神和牺牲精神等。这些，虽然在全国其他区域文化中也有近似的表现，但是在湖南人身上，表现更为全面和浓烈。特别是湖南人在处事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少有的激情、少有的实在、少有的坚忍，在社会上有很高的认可度。在震惊中国和世界的抗震救灾、抗冰救灾中，湖南人表现怎么样？可圈可点！为什么？我认为把它解读为湖湘文化的精神绽放最为合适。

省文史研究馆自成立以来，一直围绕着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个中心任务而开展工作。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更加明确提出要以研究和弘扬湖湘文化为中心，大力开展文史研究、诗词写作、书画创作和海外联谊活动。馆刊《文史拾遗》也紧密配合这个中心，开辟重点专栏，发表湖湘文化研究以及相关的湖南史事、人物等方面的作品，至今已出刊73期，积累了丰厚的史料。以史为鉴，它也将成为近代、当代湖湘文化研究的文献基础。

值此《湖湘文史丛谈》即将付梓之际，我写下了如上一些话，以表示对省文史研究馆成立55周年由衷的祝贺，对馆员们各展所长、奉献余热、服务人民、贡献社会的辛勤劳动表示由衷的钦佩和感谢。同时藉此机会，祝愿省文史研究馆再接再厉，与时俱进，团结全体馆员，不断开拓文史研究馆工作新局面。祝愿馆员们在弘扬湖湘文化、推动我省改革发展和稳定，实现富民强省的目标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事业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也愿《湖湘文史丛谈》给各位读者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提供帮助，带来益处。

是为序。

2008年10月26日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

目　次

论近代湖湘文化

林增平

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漫长的古代，在湖南没有出现过几桩足以影响全国局势的大事；属于湖南籍的名人，寥若晨星。而跨入近代（1840年后），就迥然不同，在诸如太平天国起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重大事变中，湖南所产生的反响，着实引人瞩目；且人才辈出，为人们所称道，延续至现代，更呈现出鼎盛的局势。无怪乎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称："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①]时至今日，侨居美国的华人主编的《北美日报》(纽约)，在1986年7月1日的《社论》里还提到："湘籍历史名人、学者、政治家人数之多，近百年一直居各省之冠。"

近代湖南人才之盛，始于太平天国时期，即起自曾国藩等筹组之湘军。还在太平天国败亡的前一年（1863年），一个官员在日记中就写道："楚省风气，近日极旺，自曾涤生领师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各省共总督八缺，湖南已居其五：直隶刘长佑、两江曾国藩、云贵劳崇光、闽浙左宗棠、陕甘杨载福是也。巡抚曾国荃、刘蓉、郭松（嵩）焘皆楚人也，可谓盛矣。至提镇两司，湖南籍者，更不可胜数。曾涤生胞兄弟两人，各得五等之爵，亦二百余年中所未见。天下事不可太盛，日中则昃，月盈则蚀，五行生克，四序递迁，休旺乘除，天地阴阳，一定之理，况国家乎？况一省乎？况一家乎？一门鼎盛，何德以堪？自古至今，未有数传而不绝灭者。吾为楚人惧，吾盖为曾氏惧也！"[②]这个大段感叹，无非是觉得湖南省和曾氏一门的旺气盛况，已经达到极限，逾乎常情。1881年（光绪七年）王闿运撰《湘军志》脱稿，虽对湘军有所讪刺，但也很得意地宣称："湘军则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乃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拆闻于海。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③]据统计，湘军要员官至督抚者达二十七人（总督十四人，巡抚十三人）[④]。

诚然，太平天国起义，是正义的、进步的运动；而湘军，则属不义的、反动的政治、军事集团，理应给以谴责。然而，历史本身又是曲折的，经常产生

一个反复的演变过程，往往会出现正义的、进步的势力因自身的错误或领导集团的腐化而遇到挫败；而不义的、反动的势力则获得阶段性胜利的现象。但是，这样的胜利者决不能把历史拉着向后退却，而是必然受历史前进规律的约束，不自觉地去谋求达到失败者所曾追求的目标。如同恩格斯说的："1848 年的革命，和它以前的许多次革命一样，有着奇特的命运。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镇压下去的人，如卡尔 · 马克思常说的，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5]又称："1848 年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它的遗嘱执行者。"[6]不是吗！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提出了具有发展资本主义意义的《资政新篇》，显露了这次农民起义取得胜利后将要把中国社会导向的前途。恰恰在同时，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李鸿章就开始筹办洋务；迄太平天国覆败后，洋务新政就加速地进行起来。正是这样，湖南的有志之士就获得湘军将帅的援引，成长为各个方面的人才，从而使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期间，湖南似乎成了举足轻重的省份。

维新运动兴起后，湖南即颇有点得风气之先的气概，举凡开学会（南学会等）、兴学校（时务学堂）、办报纸（《湘报》《湘学新报》）等维新新政，都率先兴办，卓有成效。著名的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且以左翼首领见称于时，故时人将湖南称为"全国最富朝气之一省"，并非虚言。

伟大的民主革命运动辛亥革命，首倡者是孙中山及其所创立的兴中会，而继起响应者，当首推黄兴和他所组织的华兴会。1905 年夏，孙中山在日本领衔组成同盟会，据考证，参加 7 月 30 日筹备会的共 79 人，居首位的是湖南籍志士，计 20 人，次为湖北，19 人，再次为广东，16 人，以下为广西、安徽等省籍人士[7]。又据 1905～1907 年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的名册统计，湖南籍者为 157 人；次为四川，127 人；再次为广东，112 人；湖北 106 人[8]。正由于有如此众多的湖南志士加入了同盟会，因而在辛亥革命期间的重大斗争场合，几乎都有湖南志士的业绩和勋劳，并产生了遐迩通途的一代英豪，如黄兴、宋教仁、蔡锷、陈天华、刘道一、禹之谟、蒋翊武、谭人凤、姚宏业、杨毓麟、焦达峰、陈作新等。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革命的丰碑上。

湖南近代发生的对全国影响巨大的事件前后踵接，自然要产生众多的比肩鹊起的著名人物；而叱咤风云、驰骋宇内的名人一多，自然要使湖南成为海内举足轻重的省份。湘军兴起不久，清统治者很快就倚作长城。侍读学士潘祖荫在推崇左宗棠的奏折里就曾写道："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9]就湖南而论，既非形胜要害之地，也非财赋充盈之区。王闿运曾指出："湖南自郡县以来，曾未尝先天下。……至其财赋，全盛时才敌苏、松一大县。"[10]显然，所谓"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实际上是指不可一日无湘军。维新运动期间，皮锡瑞称："近日湖南风气又为各省之最，是由地气变得益盛，

亦由乡先贤之善变也。"[11]唐才常转述西方各国和日本的言论称："振支那者惟湖南，士民勃勃有生气，而可侠可仁者惟湖南。"[12]故谭嗣同在诗里颇为自信地吟咏道："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13]倾吐了湖南志士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豪气。梁启超入湘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即深有感触地写道："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其学者有畏斋、船山之遗风，其任侠尚气，与日本摩萨、长门藩士相仿佛，其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劼刚先生，为中土言西学者所自出焉。近岁以来，官与绅一气，士与民一心，百废俱举，异于他日。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14]杨度早年写过一首长篇的《湖南少年歌》，很自豪地吟咏道："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15]这一切都反映了湖南志士对振兴祖国的责任感和自信心。

近代湖南人文荟萃、人才辈出的盛况，延续至现代，更呈上升之势。别的不说，只就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人物来看，其勋名远播、功业非凡者，湖南籍的应属数一数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 52 名领导人中，湖南籍的有 10 人，占 19.2%。1995 年，给长期戎马倥偬、功勋卓著的军事领导人授勋典，在授予元帅的 10 人里，湖南籍的 3 人，授大将的 10 人里，湖南籍的 6 人，授上将的 57 人里，湖南籍的 19 人。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八个字可谓历久常新。

湖南从古代"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到近代一跃而成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者"的省份，原因何在呢？

在古代史上，湖南开发较晚，又长期被人们称作瘴疠卑湿之地，故文教远逊中原和东南地区，不能不令人产生"湖南人物，罕见史传"的浩叹。经历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度大移民，湖南居民实行了历史性的全面更新，从而导致湖南人口的新组合，形成了与清代前居民不同素质、不同性格的新居民。近代湖南赢得"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的声誉，就主要是清初起进入湖南的移民，经数代的繁衍生息致使湖南的经济和文教获得发展的结果；而氤氲绵延，潜滋暗长地导致这个结果的精神支柱，则是在清初起移入境内的新居民中逐渐形成的习俗和风尚。

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元统治者派兵四出镇压，致兵燹遍于各省；嗣起义各派势力又迭起内讧，战乱相寻，湖南也被殃及，大批民众流窜死亡。据《醴陵县志》载："历朝兵燹，元为最惨。……元明之际，土著存者仅十八户"，"聚居山上，……如是者近三十年。及闻大乱已平，始相率下山。"[16]该书又引

“同治《志》载汪辉祖淑厚《脱难录》，谓历朝鼎革，荼毒生灵，惟元明之际为惨，湘潭土著仅存数户。后之人多从豫章来。”[17]谭其骧曾依据《道光宝庆府志》《光绪邵阳县乡土志》《光绪武冈州乡土志》《光绪湘阴县图志》《光绪靖州乡土志》等五志的《氏族志》，对宋朝起迁入宝庆府和靖州、湘阴的氏族加以统计，移民由江西迁入者达324族[18]，占63.1%。魏源及其同族、曾任清两江总督魏光焘的先世就是明初由江西吉安迁到邵阳县金坛（今属隆回县）的[19]。

明朝末年，先是农民大起义，战争绵延；嗣即因清兵入关，四出杀伐，湖南各州县迭遭蹂躏；随后又历三藩之乱，长沙一带“杀男妇数十万口”，“残废瓦砾荆榛，千里如一，青磷白骨，所在皆然。”[20]

明清之间的“鼎革”究竟使湖南居民减少多少，是无法查核实数的。以巴陵（岳阳）、沅江、清泉（衡阳）、湘乡、酃县、耒阳、桂阳、桂东等八个县明末清初丁口赋额的差额作为参考，清初比明末减少47483丁，即减少64%。这当然不能认为就是湖南全省丁赋额减少的确切数据，但大体可借以估计，明清两朝的“鼎革”，湖南丧失了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

清顺治、康熙以至乾隆年间屡颁“召民开垦”的谕旨，于是，大量移民进入湖南。大庸县“清顺治初因遭大乱，以致户无遗种。及康熙时，又遭吴三桂兵蹂躏。其时土著老民，百不存一。其后迁徙新户，十常得九，稽其户籍，以江西为最多，湖北、四川次之。”[21]醴陵县因明末清初“重罹浩劫，土旷人稀，播迁来者十九为闽粤两省汀江、东江流域之人。[22]蓝山县清初从外迁入者达163族之众，以江西、广东两省为多，约各占三分之一[23]。沅陵县“郡中故族鲜明以前者，建宗祠修谱牒，今尚多未逮木本水源。”[24]邻近江西的浏阳县康熙年间所修县志载：“浏鲜土著，比闾以内，十室有九皆江西之客民也。”[25]检索《溆浦县志》《氏族志》，全县移民占到92%。前面提到，按宝庆府、靖州、湘阴等府、州、县志所载《氏族志》统计，该七州、县的人口中，移民占到98.4%。故到清代乾嘉之际，估计湖南全省移民占人口总数的九成以上，是大体可信的。

经过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度移民，湖南居民族源和血缘就基本上实现了更新，从而导致人口素质的提高。

其次，大凡离乡背井，迁往他方的移民，一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开拓意识、自立自强和勤奋创业的精神。相对来说，那些秉性庸懦，游惰懒散，无所作为的人，多数是不愿流离迁徙去追求温饱或较为富足的生活。所以，从生理素质、心理因素等方面来说，除了遭到某种限制和压迫者外，移民一般是强于土著的。

还应当提到，湖南古称“三苗之国”，从远古起即为多民族交错聚居之地，

经汉族统治者的征讨和赶逐，少数民族遂多退处湘西、湘南崇山峻岭之间。人数多者为苗族，其余为瑶、侗、土家族。汉族同各少数民族长期相处，既多彼此争斗，也曾相互联姻。少数民族历来受歧视，被目为蛮夷，故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一般都隐匿不宣。一本介绍城步苗族的书写道：“元末明初，城步苗族虽然大批调征出外，不少汉人从江西来这里屯田垦荒，但苗族同胞仍然占全县总人口的90%以上。清朝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在城步实施改土归流的政策之后，不少苗族同胞为了躲避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而填报汉族。到民国时，汉族人口便上升到全县人口的第一位。”[26]这种变化，当然就包括汉苗（即填报汉族者）通婚所繁衍的后裔在内。谭其骧考证：前述宝庆一府和靖州、湘阴等七州县中，有土著九族，其中扶、蓝、杨、姚四族，系蛮族后裔[27]。看来，在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州县，既存在以汉变瑶的情况，也不鲜以瑶（苗或土家）变汉的事例。故谭其骧称：“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窃以为蛮族血统活力之加入，实有以致之”[28]。也有人说：“汉人与苗人通婚，成了一个混血的民族，所以才有特殊的个性。”[29]近代湘西凤凰名人熊希龄，祖籍江西丰城县，母亲吴氏系苗族，这是例证之一。

综上所述，近代的湖南人，是经历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次大移民，在族源和血缘方面同清代以前湖南居民基本上没有联系的新居民。全省人口素质实现了更新，带来了移民所具有的开拓精神和进取心；又因与苗、瑶、侗、土家族等族联姻，吸收了这些少数民族强韧、犷悍和刻苦的习性，从而在湖南渐次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他省的朴实勤奋、劲直勇悍、好胜尚气、不信邪，甚至流于偏狭任性的乡俗民风。同时，随着绅权的日盛，则在一般所谓耆旧豪绅中滋长着顽固守旧的习气，招来了“湖南以守旧闻于天下”的名声。

基于上述乡俗民风，在众多有抱负、有作为的学子士人中，即滋长为质朴笃实、不尚浮靡、勇于任事、锐意进取，但也多有尚气任性的士气文风；在同耆旧豪绅的守旧习气抵牾冲撞的过程中，这种士气文风又弥坚弥笃。其延伸外铄，附丽于近代一系列事变中，即构成为近代湖湘文化。

稽查各种典籍，从清初至乾隆年间，湖南除王夫之、曾静二位学者为后人所熟知，还有康熙年间攸县陈之驱、衡阳王敔、邵阳李无咎、王元复等四个贡生以学识渊博、长于词章被称为“楚南四家”外，其他载诸经传的名人，实属罕见。只是到了嘉道年间，始有善化人贺长龄、贺熙龄、劳崇光，安化人陶澍，湘阴人李星沅，益阳人汤鹏等成进士后，先后官至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员，或跻身卿寺，参与朝政。从而使湖南人开始在政治上处于与中原和东南诸省分庭抗礼的地位。

应当指出，陶澍、贺长龄等一批人士的崛起，主要还不在于他们官高爵

显，而是他们开始致力于倡导一种“通经致用”的学风，已在全国有相当的影响，并在湖南培植起主张变革、经世致用的士习。贺长龄在江苏布政使任内，即延聘邵阳魏源编订一部篇幅达三百万字的《皇朝经世文编》，搜集清初以来官员奏疏、学者著述中有关政事、文教、刑律、赋役、河工、盐政等方面的篇章，辑为百二十卷，于道光七年（1827）第一次刊行。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遭受西方殖民主义破关入侵的危机已迫近眉睫。时任贵州巡抚的贺长龄即提出“治国有经，安内必先攘外”的主张[⑨]。魏源对于反抗英国侵略的战争尤为关注。迨战争失败，他首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命题，且力倡“变古愈尽，便民愈甚”。指斥那班“读周孔之书用以误天下”的人为“庸儒”[⑩]。他的哲理、主张和爱国主义精神，对近代中国有很大的影响。魏源的知交汤鹏，著有《浮邱子》，摒弃陈词浮语，以论述军国利病，吏治良窳，人事情伪为主旨。一时，提倡务实经世，在湖南成为风尚。

而此时，清朝的统治正加速衰微，西方殖民主义者则正频频地叩关启衅，并猖狂地从事鸦片走私。外患内忧，不能不激起有识之士的忧虑，亟起讲求经世之学。于是产生了一个倡说变革的经世派，有名者如福建林则徐、浙江龚自珍、安徽姚莹、包世臣等，而湖南陶澍、贺长龄、魏源等，在经世派里为当世所推崇。诚如一位学者指出的：“从嘉道年间崛起的地主阶级经世派，其发展脉络是明显的，这就是以湖南、安徽为中心的湘系和淮系的一批人物。”[⑪]。

值得提到，嘉道之际湖南经世派的崭露头角，同他们从王夫之的著作中获得启示有很大关系。康熙年间，王夫之次子王敔分批刊刻其父遗作十余种，流传也不广，若干种又被查禁毁版。荏苒近百年，至道光年间，始由新化学者邓显鹤等先后汇刻二十四种，共一百五十七卷，称《船山遗书》。其时，湖南经世派正处在脱颖之际，得读《船山遗书》，无疑会受到王夫之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历史进化论的观点和经世致用主张的很大启示。

继陶澍、贺长龄之后，是以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为主要代表的一批湖南士人群体。正当他们要在政治上一试身手的时候，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一举席卷东南，建都天京，举兵北伐，给清王朝以极大的威胁。这时，封建统治者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最主要的矛盾，从而导致湖南士人提倡的“经世致用”的内涵，转为共同筹划挽救封建统治秩序的对策。于是，当年由贺长龄强调的“安内必先攘外”[⑫]的主张，就变为奉行道光皇帝“攘外必先安内”[⑬]的诏谕为宗旨，全力筹组湘军，达到了镇压起义的目的。

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即再一次较广泛地搜集王夫之著作，在南京设局刊刻行世，仍称《船山遗书》，共收著述六十二种，计二百九十八卷。这里，也许要回答如下的疑问：嘉道年间崛起的经世派的主张，无疑

是一股进步思潮；而湘军将领以镇压农民起义发迹，其言行是反动的，怎么也服膺王夫之的学说，并作为嘉道年间经世派的后继者呢？这个疑团是不难消释的。因为，王夫之的学术是属于地主阶级进步思想方面的，主旨也是为封建制社会谋长治久安之策，其后学者无非随所处时代的主要矛盾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对策而已，彼此的出发点和基本立场并无二致。故经世派由鸦片战争时期倡导“安内必先攘外”到太平天国起义后转而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对策，是合乎历史逻辑的。

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又趋向紧张。主要矛盾的变化，又导致湖南士人所注重的经世学风转向将抵御外侮提到首要地位。在西北国土频遭蚕食窃分的紧急情况下，左宗棠以暮年舆榇出关的气概，率湘军西征，收复新疆。随后，在抗击法国侵略的中法战争中，湘军也曾建立抗击入侵者的勋绩，左宗棠、彭玉麟也以满腔爱国热忱筹防御侮。到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刘坤一曾率湘军出关，在辽东抵抗日军，惟战绩不佳。但及至清廷下诏停战议和，刘曾几度建言“宜战不宜和”，并坚决反对割让辽（东半岛）、台（湾）。从这方面说来，湘军既充当镇压农民起义的凶手，后来，却也无愧于民族的干城。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既有鏖战沙场的名将，也不乏如郭嵩焘、曾纪泽等折冲樽俎的贤才。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渐次在中国稀疏地出现，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开始了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历程，维新变法已是时代的要求。甲午战后，国势阽危，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发动的“公车上书”为嚆矢，将变法运动推上了议事日程。戊戌维新前几年间，湖南巡抚陈宝箴较为开明，前后任学政的江标、徐仁铸，署按察使黄遵宪等，均不同程度地倾向维新；更主要是维新派首领人物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才识卓荦，勇于任事，兼有康有为弟子梁启超、欧榘甲等相继来湘，在时务学堂传习西学。故湖南维新运动的开展，新政的推行，居全国各省前列。谭嗣同、唐才常尤以维新左派著称，终不惜为变法事业而壮烈殉身。

谭嗣同、唐才常之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分子，与他们接受了王夫之的思想影响，发扬了近代以来旺盛的湖湘士气有关[⑭]。他二人同时师事欧阳中鹄。而欧阳中鹄笃信船山之学，自号瓣姜，即寓有心香一瓣敬王夫之（号姜斋）的意思。谭嗣同不仅服膺王夫之“道随器变”的唯物论和“天地之化日新”的发展观，而且发挥了王夫之“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⑮]的思想，以“冲决网罗”的气概，放言抨击封建专制主义的纲常伦理。曾在时务学堂读书的杨树达于三十多年后讲“湖南文化史略”时称：“自船山先生以后，湖南人笃信民族主义，因欲保持自己民族，故感觉外患最敏，吸收外来文化最力，且

在全国为最先。如魏默深之志海图，郭筠仙、曾劼刚之赞西化，光绪丁酉、戊戌之办新政，皆其例也。”[⑥] 这位湘籍大学者大致是谈到他在时务学堂时的感受，其言是可信的。

维新运动失败后，民族危机急转直下，亡国惨祸，迫近眉睫；与此同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初步发展阶段，社会阶级和民间风尚相应地产生变化。有识之士，相率从传统文化的樊篱中挣脱出来，转向西方国家和日本探求新知。1899 年黄兴在湖北两湖书院求学，“课程余暇，悉购西洋革命史及卢梭《民约论》诸书，朝夕盥诵。[⑦] 出国留学的热潮开始涌起；前往日本者，如过江之鲫。1904 年中国留日学生计达 2395 人，其中湖南籍 373 人，占总数的 11.4%[⑧]。”由湖南籍学生编撰的《游学译编》，“所译以学术、教育、军事、理财、历史、地理、外论为主；其余如中外近事，各国现今之风俗习尚，才技艺能，无论书报，择其尤者由同人分译。”[⑨] 反映了他们已基本上填平了“夷夏之防”的沟壑，开始考虑全面地借鉴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来更新中国。同时，他们也把自己称作“中等社会”，意识到应当承担起主持中国革命的职责。当中国转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时代之际，湖南遂以在东京参加中国同盟会的人数最多，且有一大批中坚人物投身革命；而省境也革命潮迭起，并以率先响应武昌首义，对辛亥推翻清朝，创立民国作出了重大贡献而得到举国一致的赞赏。

饶有兴味的是，辛亥时期湖南革命运动的蜂起，也同革命党人接受王夫之的影响，宣传船山学术有联系。杨毓麟著《新湖南》，将船山学术作为培养并始终浇灌湖南人“特别独立之根性”的心苗的源泉。章士钊在《国民日日报》上发表《王船山文说申义》[⑩] 称：“船山之史学宏论精义，可以振起吾国之国魂者极多，故发愿申说以告世之不善读船山之书，深辜船山之意者。”他把船山学术视作振起“吾国之国魂”的瑰宝。无怪乎五十多年后，章士钊还意味深长地说：“果也！辛亥革命以前，船山之说大振，不数年而清室以亡。”[⑪] 这显然有些夸张。正确地说，是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说大张，有以致之。但也反映湖南革命党人笃信船山学说的程度。

概而言之，近代湖湘文化的内涵大体可简略表述于下：

因清初移民的繁衍和生息教化，到清代乾嘉年间，渐次形成了湖南劲直尚气的民风和与之相应的质朴进取的湖湘士气。恰当其时，湮没百余年的船山学说开始广泛传播，其哲理和反清、一定程度反封建的学说思想和经世致用的主张，为湖南士人辗转传习，前后师承。从而进入近代就形成了有别于他省、具有湘人在若干方面异于他省的气质的湖湘文化。此一文化的延伸外铄，遂在近代经世—维新—革命的三个历史阶段上，造成了令人瞩目的形势和成就，导致

湖南获得近代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的声誉。

注　释

①湖南之湖南人．新湖南．第 2 篇．
②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第 377 页．
③王闿运．湘军志．湖南防守篇第一．
④罗尔纲．湘军新志．第 96 页．
⑤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 年德文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80 页．
⑥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99 页．
⑦郭汉民．同盟会“非团体联合”史实考．湖北社会科学，1987 年第 6 期．
⑧冯自由．革命逸史·第 6 集．中国同盟会最初三年会员人名册．
⑨潘祖荫．奏保举人左宗棠人材可用疏．潘文勤公奏疏，第 25～26 页．
⑩王闿运．湘军志．湖南防守篇第一．
⑪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9 年第 1 期，第 105 页．
⑫论兴亚义会．唐才常集．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书局，第 178 页．
⑬论艺绝句·六篇之二．谭嗣同全集．三联书店，第 490 页．
⑭南学会叙．饮冰室合集·文集．第 2 册．第 66 页．
⑮刘晴波．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第 95 页．
⑯醴陵县志．氏族志．1948 年刊．
⑰醴陵县志．政治志·户籍．1948 年刊．
⑱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第一表．方志月刊，第 6 卷，第 9 期．
⑲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宝庆府志．卷三五．
⑳善化县志·卷一九，嘉庆十五年刊．第五一〇页．
㉑永定乡土志．户口．
㉒醴陵县志．氏族志．1948 年刊．
㉓蓝山县国志·户籍．1933 年刊．
㉔沅陵县志·卷三七．风俗志．
㉕浏阳县志·卷一四．拾遗志．
㉖城步苗族自治区概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第 21 页．
㉗湖南人由来考．方志月刊，第 6 卷，第 9 期．
㉘谭其骧．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史学年报，第 1 卷．第 4 期．
㉙李少陵．江西老表和湖南骡子．湖南文献（台北出版）．卷 3，第 1 期．
㉚贺长龄．议复黄爵滋严禁鸦片疏折．耐庵全集．
㉛魏源．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第 48、49 页．
㉜龚书铎．清嘉道年间的士习和经世派．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第 203 页．
㉝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丁未上谕“谕内阁：联维攘外必先安内，禁暴即以爱民。……”《筹办

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四五，中华书局校点本第4册，第1704页．

㉞谭嗣同殉难后，邹容曾赋诗哀悼，有“郝郝谭君故，湖湘士气衰”（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列传·邹容传略》）之句．

㉟王夫之．黄书．宰制第三．

㊱积微翁回忆录．杨树达文集之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00～101页．

㊲黄克强先生哀荣录．黄蔡二公事略编辑处．1918．

㊳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

㊴游学译编·第二册．游学译编简章．

㊵发表于国民日日报未注作者，据章士钊《疏黄帝魂》称：“此吾在《国民日日报》所撰文”．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华书局，1964年，第232页．

㊶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243页．

关于《论近代湖湘文化》一文的商榷

萧 艾

《文史拾遗》创刊号第一篇论文，即林增平教授的《论近代湖湘文化》（以下简称林文）。其所论列，鄙意以为有值得商榷之处。

林文劈头两句是这样写的：“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漫长的古代，在湖南没有出现过几桩足以影响全国局势的大事，属于湖南籍的名人，寥若晨星。”

这两句是林文立论的基本点，也是全文关键所在。然而，我们平心静气地権之历史事实，并非如此。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漫长的古代，洞庭青草之南，水清岳峙，人物贞廉，或超然玄著，或磊落英多。

距今大约一千八九百年前“纸”的发明制造者，举世皆知的蔡伦，便是湖南耒阳人。为诸葛亮亲自所选中的接班人蒋琬，便是零陵郡湘乡人。为刘表、曹操、刘备争相罗致的刘巴，也是零陵蒸阳人。还有，在赤壁之战中，首先向周瑜建策用火攻取胜的黄盖，祖籍亦隶零陵泉陵。至于弱冠受学于当时著名学者宋衷，先后被刘表、刘备、孙权所重用的潘浚，则籍隶武陵汉寿。这些，都是东汉末年三国分立前后纷纷涌现的湖湘菁英。由三国进入两晋，湖南籍的名人可更多了。仅以《晋书》所记载而言：论“忠义”则有长沙桓雄、虞悝、韩阶，浏阳易雄；数“良吏”则有汉寿潘京；言“文苑”则有耒阳罗含；语“隐逸”有汉寿伍朝、龚玄之；谈到“著作”，可与干宝、孙盛、习凿齿、司马彪并列的则有邓粲。说到文学家罗含其人，挺有意思了。他在桓温手下做事，一天，桓温宴集僚属，罗含晚来了一步，桓温对同座的人说：“你们看，这是一位怎样的人？”坐中有人说：“这是荆楚之材。”桓温颇不以为然地说：“这是江左之秀啊，岂徒为荆楚之材而已吗？”东晋时所谓江左，即指全国范围而言。可见桓温对罗含是以“国士”相待的。当然，魏晋之际，湖南籍像罗含这样的知名人物，决不止此。譬如龚玄之之父龚登，做过长沙相，以散骑常侍终；罗含之祖名彦，做过临海太守，含父名绥，做过荥阳太守，均有令誉。这，姑且置而不论，甚至连姓氏列入《唐书·儒林》传，“书名远播夷狄”，其与别人合撰之《艺文类聚》一百卷，至今犹存的望城欧阳询；湖南第一个状元，与刘蕡

同时直声震于天下，其所著《骰子彩选格》，成为后世骨牌之祖的延唐（今宁远）李郃，乃至诗与方干、郑谷齐名，在《全唐诗》中独占十卷之多的益阳齐己和尚，南宋时官居礼部尚书，写过《周易总义》的宁乡易祓及与易祓同时代、宁远又一位状元乐雷发，（他的著作《雪矶丛稿》，与易祓的《周易总义》同被收入《四库全书》。甚至有明一代、唯一以宰臣居文学领袖地位的茶陵李东阳等等，都不必在此一一标榜。现在我们只谈谈从公元 11 世纪以来成为中国儒家哲学思想主流的宋明理学。谁也不会否认，宋明理学关系中国学术文化至深且巨。不谈中国文化则已，否则不能置宋明理学于不顾。那么宋明理学有哪些重要人物呢？从胡瑗、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到朱熹、张栻、陆九渊……，至少可以一口气数得出二三十位。就在这二三十位著名理学家的言论著作中，无不公认理学的奠基者为周敦颐。周敦颐（1017—1073 年）字茂叔，学者称为濂溪先生，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在其所作《濂溪先生象赞》中写道："道丧千载，圣远言湮，不有先觉，孰开我人。"朱氏所编的《近思录》一书，是理学家们必读的课本。开卷便是"濂溪先生曰"。可以想见朱熹心目中认定周敦颐为此学的开山。周敦颐不独是宋明理学的开山，而且文学修养也非常醇厚深透。举个例说，他的《爱莲说》，宋以后读书人未曾读过的，恐怕为数不多吧。这样一位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哲人，他的祖籍为湖南道县。

再就林文所谓于 1840 年前"在湖南没有出现过几桩足以影响全国局势的大事"，略抒一二。上文既已提及宋明理学，就从理学方面的大事说起吧。南宋乾道初年，著名理学家张栻侍亲来湘，就自己的住宅辟为城南书院，进行讲学。不久，朱熹也来了。这两位同道好友，于是相互在岳麓、城南两书院轮番讲学，各地读书人闻讯争先恐后来听讲者络绎不绝。但两书院一在湘水之西，一在湘水之东，当时尚没有横跨湘江的桥梁，因此莘莘学子熙熙攘攘，争着渡江，忙个不停。一时渡口显得分外热闹，于是大家称它为"朱张渡"，成为学术文化史上的佳话，与后来朱熹和陆九渊在江西鹅湖寺争辩学术上的问题同样为后世所艳称。而岳麓书院列为全国四大书院之一，与湖湘学术文化的发展殆不可分割，未尝不肇端于此。

从两宋逆数到五代，是个军阀割据、战乱不已的动荡时期。从朱温称帝到南唐亡国，前后不过六十余年。天下分裂，十国称雄，十国中以成都蜀王王建、杭州越王钱镠、长沙楚王马殷及金陵李氏辖境内相对地比较安稳，因而经济和文化都有一定的发展。马殷采用高郁的建策，大力从事茶叶生产、贸易，遂使湖南臻于富强。虽然随着历史的变革，沧海变为桑田，芳园鞠为茂草。作为楚王国都城的长沙，如今仅仅留下"马王街""马王堆""会春园"几个地名罢了。但今之湖南仍为国内茶叶重要产区，却不能不追溯到 10 世纪初叶的漫

山遍野广植茶林。我想中国茶业史专家、茶文化探索者，是不会忘记这件大事的。

再由五代追数至隋唐之际，隋大业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从北到南，起义首领有姓名可考者无虑六十余家。势力之强大足以与窦建德、刘武周、李密、王世充相颉颃者，厥为萧铣。萧铣起兵岳阳，建国号为梁，及迁都江陵，改元鸣凤。未一年占有整个长江中游。据《通鉴》卷一百八十五所载："东自九江，西抵三峡，南尽交趾，北距汉川，铣皆有之，胜兵四十余万。"唐武德四年，萧铣为体念民瘼，归降李孝恭。"降后数日，江南救兵十余万，一时大至。"这能说不是"足以影响全国局势"的一桩大事吗？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作为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者，又焉能轻易放过历代战役熟视而无睹？本此，我们还要谈几桩出现在湖南、足以影响全国局势的大事，而且确确实实是在 1840 年鸦片战争前漫长的古代发生的。

回顾三国时期，湖南属于荆州，乃用武之地，不少英雄豪杰，驰骋于衡岳潇湘境内，转战于零陵郴桂地区。如鲁肃关羽鏖兵益阳，黄忠坚守攸县，步骘坐镇临湘，其事甚繁，不必缕述。惟《后汉书·光武帝本纪》载：建武二十三年十二月，武陵蛮反。朝廷遣武威将军刘尚征讨，大战沅水，结果政府军被消灭。第二年七月，再遣李嵩、马成率师讨伐，仍以战败告终。因此，不得不派伏波将军马援率领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孙永等，发动十二郡所招募的士卒及囚徒共组成数万人的大军出征。直到建武二十五年十月，才平息动乱。而一代名将马援也在这次战役中病殁。

如果说用兵三年，兴师四万，还算不了什么大事的话，那就请看看西汉时期武帝征服南粤的事迹吧。

西汉初年，足以威胁汉王朝安全的敌对势力，北有匈奴，南有赵佗。由于中原纷争，历时甚久，迫切需要休甲息兵。因此，从汉高祖至文、景二帝，对胡与粤分别采取亲善与绥抚政策。等到汉武帝即位，国力已臻雄厚，开始改变国策，实行武力讨伐。对北方的胡人，经过多次出兵，终于击败匈奴，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汉威直达祁连山下。与此同时，在南方所采取的措施，先是于长沙王国与南粤接壤的边防地区，即今零陵、郴州一带，强化地方政权，布置大量兵力，以巩固边陲、集结进攻力量为主，一俟时机成熟，就挥师南下。我们这样说，是有充分物证的。1973 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西汉初期"长沙国深平防区图"及"驻军图"，明确而具体地说明了新建立的汉王朝继秦始皇之后十分重视西南边疆的开发经营。因而在湘粤桂边区以九嶷山区为中心的地带，竟然设置了营浦、舂陵、泠道、南平、龁

道、桃阳、观阳、桂阳八个县治。这种行政区划的建制，一则是为了开发边境，再则含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即保证聚积在这一地带的重兵供应无虞，随时可以出击负隅岭南之敌。

正因其如此，汉武帝元鼎五年秋兴师南伐时，就牢牢控制住九嶷山区咽喉要地，然后分四路进军。据《汉书》卷95南粤传载：（一）以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即“边防图”上的桂阳县），下湟水（《史记》作汇水，湟溪关作汇浦关）。这是说，由征匈奴立过大功的宿将路博德带兵从桂阳出发，沿湟水而下，直攻湟溪关。（二）以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横浦，关名，在粤赣交界）。（三）以故归义粤侯二人（即从南粤投奔过来的两位将军）为戈船、下濑（《史、记》作下厉）将军，出零陵（指在今广西全州与兴安之间的零陵县）。或下漓水，或抵苍梧。（四）使驰义侯（也是从南粤投奔过来的将军，汉封他为驰义侯。《史记集解》说其人名遗）因想窃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结果，于元鼎六年冬，在第三、第四两路人马未到达前，南粤已经平定，分置了儋耳、珠崖、南海、苍梧、玉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其中九真、日南均在今越南境内。）。从赵佗称南粤王起，凡五世，历时九十三年，至此灭亡，全国遂告统一。

为什么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把立国近百年之久，“东西南北数千万里，甲兵百万有余”的南粤一举灭亡了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说南粤内部分裂，存心与汉王朝作对的仅丞相吕嘉一伙；又如当时正值武帝全盛时期，国力无比，强兵猛将如云等等。然而最主要的还是军事上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路博德早就屯兵桂阳待命了，从而汉兵在形势上居于绝对有利地位。我们知道：在没有飞机、铁路、汽车、兵舰前，陆地行军作战，全靠马匹，水上则依恃船舶。一般说来，北方骑马，以骑兵制胜；南方乘船，需水师克敌。在向两粤进军时，只要控制了险要，水陆并进，便稳操胜算。远在秦始皇时期，就根据自然环境的条件，考虑及此。因之命御史监禄“自零陵（指今广西全州与兴安间的原零陵县）凿渠至桂林。”这便是至今仍存在的广西兴安境内全长六十余里的灵渠。凿渠的目的在于沟通湘水与漓水，使通舟楫。西汉初年，陆贾奉命至番禺，即取道于此。这样，一旦对南粤用兵，或出桂阳，或出零陵，或下湟水，或指苍梧，不是可以乘势长趋，指挥若定吗？汉武帝征南粤之役，从其遣将以“伏波”“楼船”“戈船”“下濑”为号，则知其假水道以经师，咸会番禺，决非偶然也。而这些决策，都与前面所说西汉初年的“深平防区图”“驻军图”以及归义诸将所提供的湘粤地区的具体形势、地理条件等等不可分割。那么湖南九嶷山区在汉武帝征服南粤，实现全国统一，开辟岭南九郡的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可想而知。既如是，能说湖南在古代史上没有出现过足以影响全国

局势的大事吗？

林文在肯定了“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漫长的古代，湖南没有出现过几桩足以影响全国局势的大事，属于湖南籍的名人，寥若晨星”之后，接着便写道：

湖南从古代“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到近代一跃而成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者”的省份，原因何在呢？

在古代史上，湖南开发较晚，又长期被人们称作瘴疠卑湿之地，故文教远逊中原和东南地区，不能不令人产生“湖南人物、罕见史传”的浩叹。经历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度大移民，湖南居民实行了历史性的全面更新，从而导致湖南人口的新组合，形成了与清代前居民不同素质、不同性格的新居民。近代湖南赢得“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的声誉，就主要是清初起进入湖南的移民，经数代的繁衍生息致使湖南的经济和文教获得发展的结果。（引文重点符号是本文作者所加）

这些在湖南境内“实行了历史性的全面更新”，“与清代前居民不同素质、不同性格的新居民”，是从哪里迁徙来的呢？他引述了醴陵、湘潭、湘阴、邵阳等县的方志以及其他材料，作出结论说：这些移民，十之八九，来自江西。质言之，清代以前湖南的“土著”，由于开发较晚，非常落后，素质之低，无以复加，只有在江西移民来了之后，才大为改观。“近代湖南赢得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者，江西移民之功也。对此实有稍加剖析的必要。下面特就几个问题谈谈。

首先，“在古代史上湖南开发较晚”的问题。诚然，比起中原地区来，湖南确实开发较晚。但晚到什么时期？也和江西一样，早在春秋战国之前，就接受了夏商文化的沾溉，并突出地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特别是近四十多年来定居长沙的人，一定会知道，甚至于亲身见闻过20世纪50年代之初，长沙郊区无数次发掘过一座又一座楚墓，出土文物之多，至为惊人。在1954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基建工程出土文物展览会上，观众无不为之赞叹。以长沙左家公山的战国木椁墓而言，出土了陶鼎、陶壶、陶盘、木涌、木盾、木戟、漆耳杯、漆奁、铜镜、铜剑、毛笔、丝织品等等。其中毛笔是考古学上第一次发现，打破了自古以来“蒙恬造笔”的成说。尤其是还发现了天平与砝码，天平的杠杆还完整无缺，砝码大小共九枚，重量各差一倍。用郑振铎的话来说：“人类对于数字的计算，向来是发展得不太早的……。英国人以十二两为一磅，自称是最文明的计算法。因为‘十二’是可以用‘二’‘三’‘四’‘六’这四个数字除净的。不像‘十’，只能用‘二’‘五’两个数字除净。但我们在长沙出土的战国时代的天平上用的砝码，却是以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的。这个发

现很重要，至少在两千三四百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已经在计算法上迈进了一大步。”（见 1954 年《文物参考资料》第九期）也就是说，至少在两千三四百年前，居住在楚国的湖南“土著”，已经懂得使用这种计算法了。（从解放以来湖南境内共清理发掘了三千座以上楚墓，其中有上百座出现天平与砝码。）再以 1953 年长沙仰天湖楚墓出土的四十三支竹简为例，简上字迹还很清晰，所书写的事物，据考证有殉葬的锦衣、绣帛、羽觞、铜鉴以及簪饰之类。（见史树青《长沙仰天湖楚简研究》）这同样说明至少在两千多年前，湖南物质文明已经达到的程度。还有，也是距今大约两千年之久的长沙马王堆一号、二号、三号汉墓发掘出土的各种文物，其中有彩绘髹漆、律管、莞席、竹扇、罗绮……，简直叫人眼花缭乱。而最珍贵，也是含义最深，体现楚文化最突出的要算着色帛画以及帛书《老子》、帛书《周易》、帛书《黄帝四经》等。难道这许许多多中国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第一手材料，还不足够证明湖南步入文明社会为时较早吗？何况更有在历史上早于上述文物的“缯书”存在。1942 年出土于长沙南郊子弹库的“缯书”，是件举世罕见的无价之宝，目前还陈列在美国博物馆。实物虽很少有人得见，不过根据“缯书”上所书写的文字摹本来看，乃春秋战国之际的产物。凡此种种，早已传遍了全球。事实证明湖南的开发不是较晚，而是较早。

其次，谈谈湖南人口组合是否存在过“历史性的全面更新”的问题。每当历史上发生战乱，整个社会大动荡时期，广大人民群众或惨遭杀害，或流离失所，从而导致人口的锐减或大量流动，打破了原来的状况。这种人口异动的变化，也往往出现不同种族的融合，加强文化的交流。中国古代史上动乱之大，灾难之深，莫过于东汉末年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后，宋末元初、明末清初，国家亡于异族，生民陷入涂炭，为祸之烈，较之五胡之乱，或有甚焉。然而，从来没有听说在纵横二十余万平方公里境内“居民实行了全面更新”，从外地迁入的移民，与以往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土著”，基本上没有任何联系的事情。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岂不是社会曾经“断裂”，历史无从继续吗？我们知道：“《书》有‘漂杵’之文，《诗》载‘孑遗’之语。前人早就提出过疑问。孟轲氏有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矣。’”那么，林文引用方志所载，可信，但不可全信。必须进行分析，而且要与其他文献相互参证，然后获知真相。如今年纪上了六七十岁的人，大约都有这个经验：纵使兵荒马乱，劫难临头，人民总是杀不尽、斩不绝的。远的不说，抗战八年中，日本侵略军在我国北方沦陷区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可谓残酷极矣。可是，结果是我敌后武工队越变越强大。东汉末年，战伐不已，老百姓是怎样度过来的呢？《三国志·田畴传》透露了一点消息：“（畴）遂入徐无

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人民入山屯聚，耕种自保，不失为“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好办法。时至两晋，被迫寻找深险之地筑障而居的贫苦老百姓，几乎处处皆是。所筑城障，名之曰“坞”。西晋亡国，黄河流域变成一片血海。人民逃散四方，渡江南下的，不计其数。实在不能离开本土远走他乡的，为了活命，只好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坞堡，据险自守。因此，坞之出现，一天比一天多。仅《水经注·洛水》篇所见，就有：“柸山坞”“金门坞”“一合坞”“云中坞”“合水坞”“零星坞”“白马坞”“袁公坞”“盘谷坞”“杨志坞”，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北宋亡国之后，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区，人民为了逃避敌寇杀掠，只有仿效前人，结伙入山，据险自保。不过这时所筑的城障，不叫做“坞”，而叫做“砦”。《宋史》所载的“忠义军”蜂起敌占区，这种“忠义军”，大多数就是联络这些“砦主”组成的。

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每遇兵祸，便上山逃命，已经成为了传统的自求生存的惟一途径。也全靠有这条惟一的途径，人民才没有被斩尽杀绝。史册及方志所书大兵之后，剩下者寥寥无几，大都是指城镇而言。当强寇压境，能走的都走了，只有那些无法脱身或来不及逃走就被陷在围城中的人，十之九成了刀下之鬼。林文引了醴陵等县方志及氏族志，说明该地在当时几乎已无人烟；我们在此也不妨稍引方志或氏族志所载事实，证明大兵之后，并非无“孑遗”。

清光绪十四年（1888 年）所修纂之《湘潭县志》事纪门载：

顺治六年大兵（指清兵）至湘潭，明督师大学士定兴侯何腾蛟死之。……大兵以余‘贼’（指受何腾蛟指挥的李自成旧部）未靖，下令屠城。自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方止（足足杀了四天）。罢知县闫安邦，以李璘代之。磷募资掩胔（埋葬已经腐烂的死尸），为粥以食饥民（屠城后剩下的老百姓）。

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兵犯湖南，破湘潭，设伪官。销西禅寺铜佛以铸炮子。康熙十五年吴三桂由湘潭入衡阳，僭尊号。

《湘潭县志》对于清朝初年户籍册上丁口减少而且多年未见增多的缘由，也有所论列：“国初编册存了三千一百九十六，岂地当冲衢，易代之际，凋敝逃散至此乎？抑近代役法疏，欺上不以户盛衰课吏，吏公谩也？编审（编查户籍）十一次，滋生二百二十二丁（从顺治到雍正近百年内仅仅增加了二百余丁）。无税而犹匿丁（不征人头税尚且隐瞒丁口），奉行故事，不肯破例故也。自雍正七年通饬丁银摊入地粮，益无问丁增减者。高宗（乾隆皇帝）知其弊，通诏永停编审。”

再来看看从有关民族谱牒中勾稽出来的事实：

“唐李郃，大和元年进士第一，又登大和二年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初为

河南参军，嗣出为岭南西路副使、贺州刺史，开成二年迁通政司左司政，转吏部侍郎，咸通十四年卒。郃始祖李道辨，原籍甘肃临洮，南齐时以荡寇将军带兵征蛮入湘，尔后遂留居延唐。今宁远下灌李姓有数千户人家，皆其后裔。清末在长沙创办明德学堂的湘潭胡子靖，名元倓，他的祖先也是从北宋由福建崇安迁湘的。即理学家胡安国之后也。湘乡黄田乡章晓潭一族，乃北宋初期从福建迁入湖南。至今章姓子孙还散居在湘乡、长沙、湘潭等地。”参见《曾国藩文集·黄田章氏谱序》。

“王船山殁于康熙三十一年，他一生经历了明清之际战争年代，而他的家乡衡阳又是‘三藩之乱’首当其冲之地，但他藏傜洞，终免于难。而且他所著五十余种、三百数十余卷的遗书，完完整整地保全下来，直到他身后约一个半世纪的道光十九年，才由他的六世孙王世佺交邓显鹤雕板刊印。船山后人至今仍在衡阳聚族而居。”

像这样从各地迁入，成为湖南“土著”的氏族，不知若干。这里所提到的不过是千万分之一而已。如果明末清初湖南居民十之八九已不复存在，那么这些定居湖湘多则千年以上，少亦达六七百年或二三百年的氏族，又是怎样保全下来的呢？而且以上所举各例，无一是明末清初由江西来的移民。

再其次，谈谈江西移民和湖南“土著”的素质问题。众所周知，江西和湖南是两个土壤相连接的兄弟省。上自天文气象，下至山川地形以及物产、风俗，都十分接近。湘赣两省人民开化的程度，不致悬殊。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两省没有任何差异性及其居民之各具特质。事实上这种差异性及居民的特质，即使同一个省内也因地区不同而客观存在。比如说，江西人擅长做生意，湖南人勇于当兵，世人莫不知之。但这不等于做生意的人的素质比当兵的人优越；反转来不能说当兵的人的素质强过做生意的人。这里不存在人的素质的问题。林文说：“迁往他方的移民，一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开拓意识，自立自强和勤奋创业的精神。”这是可以理解的。社会上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出过几趟远门，增加了阅历，开拓了视野，比起那些株守田园、足不出里巷的人来，尚且高明；何况是移民，到了新的环境，接触新的事物，自然会激发其奋斗的热情。不过，还要看他的“原型”如何？以刻画“国民性”见称的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不是说阿Q进了几次城，未庄的人对他都另眼相看吗？可是事后事实证明阿Q还是阿Q，因为人的素质并非决定于某一种因素，而是多方面的、极为复杂的问题。倘如林文所说，具有开拓意识和创业精神的江西居民都迁入湖南成为新的移民，当上了“种子选手”，那么留在江西的，不都是一些“秉性庸懦、游惰懒散，无所作为的人”了吗？移民强过“土著”这种说法，必须通过对许许多多具体条件进行充分调查和详细分析，不宜过分

强调。

附带说一句，在明代后期，江西不如湖南富庶，这也是江西移民湖南的原因之一。明万历进士，官至工部郎中的长乐谢肇淛，在其所著《五杂俎》一书中说：当时官场中流行一句话：“命运低，得三西”。意思是山西、陕西、江西三省较为贫穷，做官的不愿意去那里。

又其次，林文提到汉苗通婚与湖南近代人才之盛的关系问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引用摩尔根的话说：“非血缘氏族的成员间的婚姻，产生了在肉体上及智力上更强健的人种。”这是举世所公认的。我国在周代就知道“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见《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所记）且很早以前，如秦晋诸国，与戎狄杂处，异族通婚，并不算一回希罕之事。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汉人与其他少数民族联姻，比比皆是。南方也司空见惯。社会不断发展，历史不断前进，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各个兄弟民族之间，交往频繁，彼此通婚，乃势所必然。最明显的例子是：八旗入关，爱新觉罗氏成为了全国最高统治者，最初把满汉通婚悬为厉禁，后来却不得不下诏允许满汉通婚是合法的。伟大的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正是经过长时期的曲折道路融合而成的。

有关不同血缘的族类由异趋同的过程，说明湖南人的素质和性格的形成，绝不是什么近代汉苗通婚才出现的奇迹。而汉苗通婚，在湘西南一带也和云南、贵州一样，自古有之，并非始自近代。

又其次，关于王船山学说给湘人的影响问题。林文在“明末清初”之前，又添加了“元末明初”。这样就把王船山包括在内。王船山虽属移民，但既非“明末清初”迁入，亦非“元末明初”迁入，更不是来自江西。他的祖籍是江苏高邮，在明建文帝时，他的祖先参加了“靖难军”，立了功劳，永乐初被委派衡州做官，以后子孙就定居衡州。到王船山已是第九代，算得是湖南“土著”了。我们在这里所要说的是就林文所谈到的王船山的学说对清末谭嗣同等人的影响问题。我们知道：王船山的学术成就，包括甚广，最主要的，他是一位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六经责我开生面”，他确是别开生面的划时代学者。因此，最近二三十年来，中外不少学人称其为“中国的黑格尔”。他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清初三大儒”，其实无论是哲学、史学、社会政治等方面，王船山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在黄宗羲、顾炎武之上。可是，王船山的“家学”，是从他父亲王朝聘那里接受的“春秋学”。他对湖湘后学影响甚深的也是“春秋学”。《春秋》明华夷之辨，《公羊传》今文派所谓微言大义，均为魏源、王闿运所乐道。谭嗣同诗云：“千年暗室任喧豗，汪（中）、魏（源）、龚（自珍）、王（闿运）始是才。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绝非泛泛之辞。既是如是，怎么可以用“经世致用”之学笼统地概括言之呢？

还有，林文说：“稽查各种典籍，从清初至乾隆年间，湖南除王夫之、曾静二位学者为后人所熟知……，其他载诸经传的名人，实属罕见。”这是不真实的。我们不必“稽查各种典籍”，只须稍稍留意清人著述，就不会一笔抹煞地否定“从清初到乾隆年间”湖南的名人。故举数例：（一）陈鹏年，字沧州，湘潭人。七岁能文，九岁作《蜻蜓赋》，传播三湘。康熙三十年进士及第。四十三年迁江宁知府。以为官清廉，深受百姓爱戴，口碑载道。康熙南巡，驻跸曹寅江宁织造府。偶在庭院闲步，见一小孩，因问：“你知道江南有什么好官吗？”小孩毫不踌躇地回答说：“知府陈鹏年是好官。”可是，这样的好官，却被上司妒忌、陷害。当陈鹏年被诬下狱时，南京城的老百姓莫不相聚痛哭，为之罢市。后来，康熙调陈鹏年入京任职，做到武英殿总裁官。（二）余廷灿，字雯，号存吾，长沙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官检讨。尝充三礼纂修，著有《存吾文稿》传世。廷灿是第一个撰写《王船山传》的作者。（三）谢振定，字一斋，号萝泉，湘乡人。乾隆四十五年进士，由翰林官京畿道监察御史。他在御史任内，不畏强暴，敢于与权相和珅作斗争。有一次，和珅爱妾的老弟及其家奴，仗着和珅的势力，在北京城大街坐着马车，横冲直撞，威风十足。市民无不为之侧目。适值谢御史巡视东城，竟毫不客气地把这般家伙抓起来，并当街把马车烧掉。市民围观者上千人，一齐鼓掌欢呼，称振定为“焚车御史”。谢有文才，广交游，当时学人如段玉裁、王文治、翁方纲、赵怀玉、法式善等，均与他友善。著作有《知耻斋文集》，由其同乡后学陶澍所编次。

读者至此，也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湖南在近代史上从鸦片战争之后一直到当代，人才辈出，有如风起云涌，究竟是何缘故呢？难道真的是气数使然吗？当然不是的。首先，我们得承认，所谓人才是从群众中产生的。古人早就有“何地无才，何时无才”的说法。孔子有句话很对：“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不过，人才处在群众中，如珠藏于渊，玉韫在石，不容易被发现罢了。每当历史进程到达一个转折点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大事件。这时，人才便脱颖而出。中国人曾经用一句简单而确当不移的话总结这种历史经验，叫做“时势造英雄”。同时，人才出世，登上历史舞台，发挥其能量，必然起到个人在历史上一定的作用。中国人又有一句话，叫做“英雄造时势”。

如本文前面所说，湖南人才之盛，始自东汉之末年，盖因黄巾起义失败之后，全国出现军阀割据局面。曹操先收拾了北方，然后率兵南下。这时，长江流域存在三个势力集团，互相斗争。在斗争过程中，荆州适为斗争焦点。因而湖南人介入了这场斗争，施展其才能。假使不是刘备被曹操驱赶，到了走投无

路的地步，决不会托庇于刘表治下，屯寄新野，三顾茅庐，求教于躬耕南阳的诸葛亮。诸葛亮不是为了酬答知己，也不会“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终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么高卧隆中的诸葛亮充其量不过与司马德操一样，以隐居终其身罢了。同样，耕于徐无山中的田畴，如果不是曹操北征乌丸，遣使辟他为掾，他也不会有立功封侯，闻名于后世的机遇。

鸦片战争后，满清政府腐败无能，更加暴露在国人面前。位居在我国南部滨海、得风气之先的两广，有洪秀全、杨秀清这般杰出人物，假宗教为名，组织群众，掀起义师。当轰轰烈烈的太平军离开大湟江挥师北上时，湖南适当其冲。于是不久遂有曾国藩等兴办团练之事，后来变而为“湘军”与太平军角逐江南，奋战千里。假使没有爆发金田起义这次历史上特大事件，曾国藩定将由翰林、主考、传郎，磨勘至老。最后也像他的同乡前辈唐鉴那样，致仕南归，徒然赢得一个理学家的虚名而已。至于罗泽南辈，本以诸生，“假馆四方，穷年汲汲。”当他跟随曾氏办团练，带兵打仗时，早已年过四十好几了，更不会有发迹之日。

这些，都说明“世”与“才”相需，个人与社会息息相关连。个人的命运，决定于社会的发展。问题之所在，是个人成就怎样，应该用促进社会进步和造福于人民的尺度来衡量。再者，人才是不拘一格的。凡是能够为人类社会物质文明或精神文明作出贡献的人，不论其人的荣悴及其事业的显晦，都应该属于人才之列，不要以成败利钝来评价人才。近两千年前的我国大史学家司马子长所著《史记》一书，曾经为扁鹊、仓公立传、为游侠、刺客、日者……立传，把清寡妇等都写进了《货殖列传》。我们不可把目光死死地盯住在所谓建功立业的一些政治人物身上，而不及其他。

综观林文，自始至终都是以近代湖湘所谓建功立业的政治人物为中心来进行论述的。是的，人物的兴衰与文化的发展，有着较密切的关系。可是两者之间同时也有着严格的区别。归根到底，是不同范畴的事物。比如：赵宋王朝时期，江西人物鼎盛，远非湖南所能企及，但这并不等于当时江西的文化高过湖南；同样，近代湖南人物之盛，全国无出其右，却也不等于近代湖南文化之发展，居全国之冠。什么叫文化？《辞海》对“文化”一词的解释是：“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说得更明白一点，文化不外乎指人们的生活方式，个人从社会集体中所获致的种种心理的反应以及千百年来所积累的学问、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和对道德、伦理的价值观等。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既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又随着

社会发展而嬗变，并且不断吸收异己文化。文化具有时代性和连续性，又往往用民族形式表现出来，也往往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因此，我们在探索或考察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文化状况时，必须把特定时期的区域文化放在整个历史文化的背景中进行思考。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外来文化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所谓“近代湖湘文化”，应该是指中国历史文化在湖湘这个区域内在最近一两百年中所表现出来的带有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的文化。更确切地说，近代湖湘文化是楚文化在最近两百年来的新发展，而楚文化又是中国历史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林文认为湖南人“劲直勇悍、好胜尚气、不信邪”的性格，源于江西移民及汉苗通婚的结果；我们则认为这不但是“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以及“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种楚文化精神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未尝不受到“荆襄十三家”在湖南境内进行多年反清斗争以及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种种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单就湖南人的性格而言，必须从多方面、多角度去考察和了解。由此可见，论述湖湘近代文化，谈何容易！至少得首先从楚文化中去探测其渊源，继而又得从其发展的过程中，去理清它那结构层次，然后论述它在不同领域、不同阶段反映的意识形态。尤其是“近代”二字，是大有文章可做的。试想想，它能不牵涉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吗？无论如何，是不能用论述近代湖湘人物来替代论述湖湘文化的。

湖南是炎帝文化的发祥地

李鸣高

中华文明史不是五千年而是一万年！神农炎帝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我们是炎黄子孙，并以拥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成就最辉煌的炎黄文化而自豪。

本文专就炎帝文化开展一些讨论。

炎帝为什么被称为“炎”，是研究炎帝文化无法避开的课题，必须继续探讨。

“炎”字在甲骨文时代，就是用二火表示烈焰，古今四千年来无大变，关于“炎”字的解释，有“火光上也”“盛貌”“热气也”等，说明炎帝族之所以称“炎”，很可能与他们是一个善于利用太阳与火，并崇拜太阳与火的民族有关。

炎帝应该是哪个地方的人氏呢？许多人都是根据《国语·晋语》所载：“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把炎帝说成是黄帝的弟弟，是在姜水（在陕西岐山）成长起来的，故以姜为姓。

但是其他许多典籍却不这么说。如屈原《远游》有“指炎神而直驰兮，吾将往乎南疑。”这南疑可能是指的湖南的九嶷山地区。

《列子·汤问》载：“楚之南，有炎人之国”。炎人应是炎帝族之民。楚之南，应即屈原所说的南疑。

《淮南子·时则》载：“南方之极，由北户孙之外，贯颛顼之国（应指楚地），南至委火炎风之野，赤帝与祝融所司者万二千里。”更明确指出炎帝（即赤帝）所管辖的地区是在南方，而且地域辽阔。

《盛弘之荆州记》载：“神农（即炎帝）育乎楚”。《荆州图记》载：“昔神农生于厉乡县（在湖北）”。

以上记述中，屈原《远游》、列子《汤问》的权威性并不亚于《国语》，而从地名遗迹来看，炎帝陵只有湖南一处，炎方、炎州、炎徼、炎天、炎湖（洞庭湖）都在南方，北方却不见有炎帝族留下的地名痕迹（虽然北方也有一些神

农遗迹，但多是神农足迹所到之地，而非他的故土）。可见神农炎帝是南方农业民族的首领，而那个“成于姜水”的与黄帝是兄弟关系的姜水炎帝，只是西北游牧民族的首领，二者是混淆不得的。

本文只讨论远在黄帝之前就存在于南方的农业民族的首领神农炎帝，至于与黄帝同时代的据称是黄帝同胞兄弟的姜水游牧民族的炎帝是不是神农炎帝？容后再论。

古人相传炎帝为神农氏，黄帝为轩辕氏，也就是说，炎帝是发明农耕的农业民族的领袖，黄帝是发明车骑战术的游牧民族的领袖。就文化水平来说，农业民族当然要比游牧民族先进；但就武功来说，游牧民族却大大超过农业民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便是农业民族学习游牧民族武功的典型例子。蒙古族和满族入主中原，则是游牧民族以武功征服农业民族，却为农业民族的文化所融合的典型例子。炎帝与黄帝之争也类乎此，早在黄帝时代之前，在中国大地上就已有了一个被称为“神农炎帝”的在农业上相当先进的农业民族，在缔造着中国的上古文明。当一个以“轩辕黄帝”为首领的游牧民族在西北崛起之后，他们发明了车骑战术，成为中国武力最强大的民族，于是，他们以强大的武力征服了炎帝族的蚩尤和自己的胞族姜水炎帝，完成了中原统一大业。如同蒙古族入主中原后一样，在文化上黄帝族又被炎帝族的农业文化所融合，从一个游牧民族一跃而为农业民族，并继续缔造着中国的古代文明。

如果这一大前提得以成立，则中华文明应该是神农炎帝及他之前的有巢氏、燧人氏、无怀氏、伏羲氏等古帝所缔造，而黄帝时代则是这些古帝文化的继承者和集其大成者。

在黄帝之前的所有古帝中，处于采集时代的有巢氏时代，只知架木为巢；燧人氏时代，只知钻木取火，所创造的文化都极其有限。伏羲氏时代是渔猎时代，其创造的文化大大超过了采集时代的有巢氏和燧人氏，但超不出游牧文化的范围，与农业文化相比，仍然落后许多。人类高度文明的基因，大多数都是农业文化的产物。从这个意义来说，以神农炎帝为代表的中华农业文化，在历史上的功绩是不可估量的。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神农炎帝是中华上古文明的缔造者！

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才会有清晰的思路来探索炎帝文化，而不至于被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所迷惑。由于神农炎帝是农耕文化的创造者，因此，我们只要紧紧跟踪“农耕文化”这一线索，就可以到历史的汪洋大海中去寻找炎帝文化的蛛丝马迹。

现在，已有的考古资料表明：黄皮肤黑眼睛的华夏人种先起源于长江上游的云贵古陆，然后才蔓延到整个中国及其他地域去。他们虽然同源，但由于迁

徙地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与民族。在沙漠和草原，便形成了游牧民族；在江河肥沃之地，则形成了农耕民族。其中，沿长江往东迁徙的一支，似乎得天独厚，由于长江流域的水美土沃，气候宜人，使得他们较早地进入了农耕时代。

农作物的生长需要阳光和温暖，食品需要火来烧烤蒸煮，因此，便形成了人们对阳光与火光的崇拜，人们把光焰称之为“炎”，因此，把人群中懂得阴晴冷暖和善于管火用火的人尊之为首领，也称之为“炎”。久而久之，这个民族便也以“炎”为族称，而这个民族的首领则被称为“炎帝”。上古时，人民还没有姓氏，也不懂得要使用不同的称号去区别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首领，凡被民主推选上来的首领，都一律称之为炎帝。因此，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经常有炎帝的称号出现在南方与北方，便是这个缘故。

“炎”的内涵是阳光与火光，因此，当人们发明用符号表示的时候，它便被刻画为阳光形符号或火焰形符号，并把它用于族徽。因此，我们要追寻炎帝文化的踪迹，在考古发现中，便要特别注意这些表示“炎”的刻画符号。又因崇拜太阳与火是人类的共性，我们在寻找这类符号时，还要运用系统论与控制论的方法去识别农耕系统的符号与非农耕系统的符号，识别出自本土的符号和来自外域的符号，才能比较正确地找到属于炎帝文化的族徽符号来。

到目前为止，我国找到的农耕文化遗址，最早的是洞庭湖西岸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①，距今约九千年左右，似可视为“神农炎帝”最早的文化遗址。其中出土有陶器与石器，也发现有刻画符号，但因资料不全，不知是否发现了表现神农炎帝农耕文化特征的象形符号？

但在距今七千年左右的长沙市南托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遗址②中，却发现陶器上刻画了“太阳”，“口含着禾苗的鸟”“南方干栏式房屋”“流水纹”“禾苗纹”“花瓣纹”“草绳纹”“农田纹”等象形符号，明显地表现了太阳与农作物的关系。笔者认为，这一组颇有系统的刻画符号，似可视为神农炎帝农耕文化在艺术上的表现。特别是其中有些符号，与后世的甲骨文颇为相似，使笔者感到它可能是中国文字最早的母形。

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遗址③，距今约六千九百年，也是我国最早的农耕文化遗址之一。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美术作品，其中有“太阳纹”“鸟纹”“傩面纹”“谷穗纹”及“猪纹”等，也明显地表现了神农炎帝农耕文化的特征。

江苏连云港将军岩的岩刻④也是新石器时代的作品，上面刻有“太阳纹”“日中鸟含谷穗纹”“禾苗鸟嘴纹黥面神人”等，其主题与南托及河姆渡艺术极其相似。

江浙良渚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遗址[5]，出土了大量玉器，玉器上刻有神人头像，头像均以“太阳纹”“鸟纹”“束禾纹”为装饰。

循此线索去追寻，我们可在全国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找到神农炎帝农耕文化的种种象形符号。它起源于长江中部的洞庭江汉之间，沿长江向四方发展并呈南密北疏状分布，与古籍所记炎帝在“楚之南”“南疑”“南方之极”的方位相符。最早的神农炎帝农耕文化的遗址出土于湖南，最早的表现神农炎帝农耕文化特征的象形符号出土于湖南，炎神所居的“南疑”在湖南，炎帝的陵寝也在湖南。因此，我们可以自豪地宣布：湖南是神农炎帝时代农耕文化中心，是中华农业文明的发祥地。神农炎帝时代不是距今四千七百年，而是距今九千多年，因此，我们应是有万年文明史的东方古国，而不是过去说的五千年文明古国。

湖南不仅是神农炎帝农耕文化的发祥地，而且还可能是有巢氏架木为巢的发祥地。湖南迄今为止已发现了从新石器时代到三四十万年前的大量旧石器时代遗址。与其他地区旧石器时代大多为山洞居民不同，湖南的旧石器时代的居民多住在与彭头山环境相似的低矮土岗之上，附近并无山洞。因此，除了“架木为巢”以避洪水毒蛇和猛兽之外，别无其他选择。距今七千多年的长沙南托遗址彩绘陶器上，就已出现了由“架木为巢”发展而来的“干栏式建筑”（俗称“吊脚楼”）的形象符号；而距今四千多年的怀化靖州新厂遗址，还出现了用二人合抱的大木建造的规模宏伟的干栏式木楼柱洞遗痕。可见神农炎帝时代的木楼是由有巢氏的架木为巢发展而来。因此，神农炎帝还有可能是有巢氏的子孙后代，而中国则有可能是世界上高层建筑的肇始之地。

注　释

①何介钧．洞庭湖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探索．湖南考古辑刊，1989年，总第5集．
②黄纲正．长沙最早的人类活动遗迹．长沙史志通讯，1986年第3期．
③康育义．论河姆渡原始艺术的美学特征．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
④李洪甫．江苏连云港将军崖石刻与原始农业．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李洪甫．连云港地区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⑤李文绵．良渚文化玉琮纹饰探析．东南文化，1987年第3期．

试论杜甫湖南诗歌中的自我形象

羊春秋

“斯文忧患余，圣哲垂象系”

诗人杜甫晚年，经过奔流激湍的三峡，来到土肥俗厚的三湘，面对着波涛汹涌的洞庭，想起了残年飘泊的不幸。干戈满地，民不聊生的罪恶现实，激起了诗人无限的悲愤，曾经在岳阳楼上靠着栏杆痛哭了一场，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名作《登岳阳楼》。此后诗人对祖国的安危，民生的疾苦，军阀的割据，官吏的贪婪以及个人的抱负，无不一一寓之于诗。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诗人给我们留下了整整一百篇闪耀着现实主义光辉的诗篇。从这些诗篇中，我们看到了诗人以“穷且益坚、老当益壮”的积极态度，倾吐着自己的爱憎，成为那个时代和社会的一面镜子。诗人非常自负地把这个时期的诗歌，比之于文王蒙难而作《象》，孔子莫容而系《易》，并用诗的语言概括为“斯文忧患余，圣哲垂象系”（《宿凿石浦》）十个闪闪发光的金字。从这些诗歌中的“我”所表现出来的整个精神面貌，可以肯定贯串在他全部创作中的“致君尧舜上”和“穷年忧黎元”两根红线，不但没有因为“身病戎马后”而减弱；而且在阅世愈久、闻见愈多、分析愈细、感慨愈深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强了那种刚肠疾恶、肺腑恋阙的思想感情。

诗人来到湖南时，已经是57岁了。在这里，诗人经受了“养拙江湖外，朝廷记忆疏”（《酬韦韶州见寄》）的残酷冷遇；隐忍了“后生血气豪，举动见老丑”（《水上遣怀》）的嘲弄；克制了“年年非故物，处处是穷途”（《地隅》）的不幸遭遇和“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阳楼》）的寂寞痛苦。他曾经为湖南的淳厚民风、肥沃土地、温暖气候和暂时还没有兵乱的优越条件所吸引，打算在湘潭的空灵峡或长沙的岳麓山定居下来。这种思想感情在他所写的《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诗中，诗人把橘州田土的膏腴，潭州民风的淳朴，看作《硕鼠》的作者所想像的“乐国”，陶潜所描写的“桃源”，而计划傍此烟霞，诛茅结庐，悠哉游哉地打发着他晚年的岁月。当他看

到空灵岸的惊涛雷奔，峭壁隐天，就情不自禁地表示“可使营吾居，终焉托长啸”（《次空灵岸》）；想到自己的贫病交困，孑然一身，又情不自禁地表示“湖南冬不雪，吾病得淹留”（《晚秋长沙蔡五侍御饮筵送殷六参军归澄》）。可是这种韬光晦迹的思想，只像石中之火，空中之电一样，在头脑中一闪，就被诗人忧国忧民的涕泪所浇灭了。尽管统治阶级把这位“形容吾较老，胆力尔谁过”（《湖中送敬十使君适广陵》）的爱国诗人，逼到“真成穷辙鲋，或似丧家狗”（《奉赠李八丈曛判官》）的悲惨境地，然而当他一想到“河洛化为血，公侯草间啼”的病史，“本期再树立，未及贞观时”的现实，那股“夜看酆城气，回首蛟龙池”（均见《咏怀》）的三千丈豪气，又从肺腑中喷薄而出了。这种对待现实的积极态度，是高出于他同时期的其他诗人的。

遗憾的是历来研究杜甫诗歌的，对于这些格律益细、感慨益深的篇什，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轻轻地一笔带过了。诗人在安史之乱前后所写的那些诗作，如果不跟他以前在吴越、在齐赵、在长安和以后在秦中、在蜀中、在湘中的作品联系起来，就不可能了解诗人曲折复杂的生活道路，全面认识诗人崇高伟大的形象。

“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

诗人在湖南生活了三个年头，辗转于岳州、潭州（长沙）、衡州、耒阳之间，中间碰上了臧玠的叛乱，过了段逃难生活。在这些日子里，过着“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妻孥复随我，回首共悲叹”的痛苦生活。但是诗人的涕泪，并没有洒在“南北逃世难”的不幸遭遇里，而是像屈原哀民生之多艰而掩涕、贾谊伤国是之日非而痛哭一样，洒在“故国莽丘墟”（均见《逃难》）的深沉悲愤中。正因为诗人的遭遇、诗人的品德和诗人的抱负，跟屈原、贾谊有着许多共同之处，所以诗人在湖南的诗歌里，三番五次地以屈子和贾生自况。当他想到戎马关山，飘蓬身世，北望故国，魂梦徒劳的时候，就发出了“梦魂归未得，不用楚辞招”（《归梦》）的感叹；想到在长沙兼济有志，韬光无心的时候，又唱出了“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调南夕望》）的哀歌；想到豺虎当道，谗巧害人，忠信获罪，群小比肩的时候，又向“悒郁两忠魂，萧条犹在否”（《上水遣怀》）表示殷切的慰问；想到大厦将倾，皇舆败绩，吐蕃入寇，军阀称兵的时候，更产生了“载感贾生恸”（《别张十三建封》）、“伤时哭贾生”（《久客》）的联想。总之，诗人淹留三湘，每有所感，就把自己的羁旅穷愁和屈原、贾谊忧国伤时的感情联系起来。但屈原在“国无人莫吾知兮”的时候，就决定怀沙自沉；贾谊在迁谪长沙的时候，就禁不住自嗟伤悲，至于夭折。其伤时忧国之心，自可感天地而泣鬼神。而杜甫无论在怎样的艰苦生活面前，怎

样的政治打击当中，总是挺起腰杆，迎接困难，冲击黑暗，从来没有动摇退缩过。虽然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中，他也偶然发过“穷途那免哭，身老不禁愁”（《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的叹息，但这只能看作诗人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控诉，决不是诗人在生活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偃旗息鼓的表示。

正因为诗人有着这种顽强的战斗意志和持久的乐观精神，所以虽然老了，病了，残废了，甚至就要停止呼吸了，而那种“老骥伏枥”的雄心壮志，依然从诗人的肺腑中，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你看，诗人已经是“右臂偏枯左耳聋”了，仍然用左手拿起他一向作为武器的笔杆，伏在枕上，咄咄书空，向罪恶的现实，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清明》）。诗人已经被“遭乱实飘泊”的悲惨现实，导入“济时曾琢磨”的美丽幻想中去了，但他一旦清醒过来，仍然向时代表示自己还有着“气缠霜匣满，冰置玉壶多”（《湖中送敬十使君》）的豪气和忠忱。有时，我们刚刚听到他在叹息着“垂翅徒衰老，先鞭不滞留”，很快又转为“经过辨丰剑，意气逐吴钩”（《重送刘十弟判官》）的高昂音调；有时我们听到他在那里低吟着“偷生惟一老，伐叛已三朝”（《归梦》）的哀歌，忽然又在这里高唱着“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泊岳阳城》）、“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江汉》）的进行曲来。可以说，在诗人广阔的胸襟中，对于那种“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的寂寞之感，早已日趋麻木了；对于那种“乌几重重缚，鹑衣寸寸针”（《风疾舟中伏枕书怀》）的艰苦生活，更是完全置之度外了。由于诗人有着感时伤乱的愤激之情，有着民胞物与的广阔胸襟，故能看着苦难的人生，进一步坚定了“上致君、下泽民”的儒家思想，从而能够保持着一颗乐观进取的雄心，迸发出“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泊岳阳城》）那样富有生命力的最强音来，千载下读之，犹能廉顽立懦。这是构成诗人崇高形象中最光辉、最感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

他在自己苦难的人生历程中，逐步打开了自己的视野，更加同情人民，走向人民。当他回到羌村时，虽然是兵革未息，黍地尽荒，但为他洗尘的父老，仍然不绝于门。回到成都草堂时，为他接风的群众，更是巷为之空，室为之隘。在离开同谷时，虽然和那里的群众“交情无旧深”，可还有不少的人，压抑不住自己心头的激情，而为之“握手泪再滴”。这些都说明诗人已经被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群众看成自己的一员了。这首先在于他和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甘心充当人民的歌手。他到湖南以后，已经困乏到以扁舟为家，靠举债过活了，可是，他那种“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解忧》）的民胞物与之怀，至今犹能激动着人们的心弦。正是由于诗人同情人民，也就更容易使他

感到社会的凋敝，人生的疾苦。当诗人一踏上白雪覆盖的洞庭湖畔，就敏锐地觉察到“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指穷困的渔民、猎户和手工业者）杼轴茅茨空”的阶级对立情况，并且指出这种“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岁晏行》）的惨象。接着他将在湖南所看到的两个世界，通过一系列的形象，加以对比，使我们鲜明地看到当时的湖南，在“索钱多门户”的贼官黠吏压榨之下，到处是“鬻市输官曹”的采蕨妇女，是“丈夫死百役”的苦难人民，是“渔夺成逝逃”的流亡群众。于是诗人忍不住心头的愤恨，十分沉痛地喊出“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以上引文均见《感遇》）的呼声，对那个黑暗的社会，进行无情的控诉。同时，诗人又敏锐地看到，一些豪门人家梁柱上雕刻着蛟螭，手中擎着琥珀的酒，家里人吃的是“玉食亚王者”，侍婢们穿的是“绡绮轻雾霏”（《奉送魏六大佑少府之交广》）。诗人把自己所接触到的这些病态社会现象，加以分析对比之后，肯定问题的症结在于敲骨吸髓的吏治黑暗，于是诗人一面拿起投枪似的健笔，发为沉郁顿挫的诗歌，把人民大众的疾苦更深刻地揭露出来；一面完全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以一种迫不及待的感情，提出“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次花石戍》）的呼吁来。在这十个字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位白发萧索、瘦骨嶙峋的爱国诗人，以激动的心情，颤抖的声音，在为穷苦的群众请命，在为穷苦的群众争取生存、温饱的权利。

在这样的为民请命之后，诗人又饱含着愤怒的感情，指出在当时的官僚政治下，是“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赠卢参谋》）。他十分巧妙地用一个“转”字，抨击贪官污吏利用天子的“德政”，进行营私舞弊的活动，结果使得人民受到更大的灾难。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又以寓言的形式，写下了《客从》那首十分含蓄、十分深刻的诗篇，把珠中的“隐字”，比喻穷苦群众蕴藏在心底深处那种对统治阶级的诅咒；把珠的化血，象征着统治阶级从人民那里剥削来的东西都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而以“哀今征敛无”，暗示着统治阶级长此下去，将无可用之民，亦无可征之税。显然，诗人晚年对于人民力量的认识，对于现实罪恶的揭露，较之以前任何时期，都是更为鲜明、更为深刻的。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下痛民穷”的高尚情操，进一步净化了诗人“上悯国难”的思想。如果说诗人早年那种“致君尧舜上”的远大抱负，还多少带着点自负的色彩，那么他的“老来多涕泪，情在强诗篇”（《哭韦大夫之晋》），就完全是为祖国、为苍生而真的哭了。诗人虽然到处受到压抑，受到嘲弄，受到颠沛流离之苦，以至终于走到“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逃难》）的绝境，有时难免发点“才淑随厮养，名贤隐锻炉”（《过南岳入洞庭湖》）的牢骚；有时又要发点“自惊

衰谢力，不道栋梁材”（《双枫浦》）的感慨；有时还不免发点“扁舟空老去，无补圣明朝”（《野望》）的浩叹；有时甚至还要掉点“生理飘荡拙，有心迟暮违”（《登舟将适汉阳》）的眼泪。这些牢骚、感慨、浩叹和眼泪，都是诗人自伤其遇，也是诗人痛哭其时；是诗人自抒其怀，也是诗人痛砭其世。

诗人怀着一颗“恋阙”的赤心，亲眼看到祖国由统一走向残破，由繁荣走向凋敝，多么希望在他的晚年，能够再出现一个“贞观盛世”啊！他在长安、在四川，碰上了流血很多的军事叛乱，在湖南又遭到“中夜混黎甿，脱身亦奔窜”（《舟中苦热遣怀》）的军乱。在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他亲眼看到广大的无辜群众或死于寇贼，或死于官兵，或死于战役，或死于饥馑，或死于奔窜流离，或死于寒暑。于是自己的血泪凝结成“丧乱死多门，呜呼泪如霰”（《白马》）那样伤心惨目的诗句，揭露着“十年杀气盛，六合人烟稀”（《北风》）的罪恶现实。在惊涛骇浪里生活了一辈子的人，自然深切地懂得和平生活的可贵，所以他憧憬着卖刀买黄犊、铸甲作农器的和平生活，能够在自己的晚年，亲眼看到“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蚕谷行》）的中兴气象。正因为他向往这种生活，所以只要发现那里有一点和平的征兆，他就要给予由衷的歌颂。比如他在衡山看到重修孔庙，兴办了学堂，就一面以无限惆怅的心情，回忆了“呜呼已十年，儒服弊于地”；一面又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倾吐了“我行洞庭野，欻得文翁肆”的喜悦，赞美了“衡山虽小邑，首倡恢大义”。这种热爱和平、热爱建设的思想，正是诗人热爱祖国的一个重要内容。

诗人虽然热爱和平建设，但他却反对牺牲祖国的统一，采取姑息的办法去换取暂时的安定。而是怀着“愧为湖外客，看此戎马乱”（《舟中苦热遣怀》）、“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的心情；慨叹着“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风疾舟中伏枕书怀》）的战乱未平，表示“欲挽江湖洗乾坤”。直到诗人意识到自己真正进入“报主身已老，入朝病见妨”（《入衡州》）的老境，而国家却仍然处在“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动荡时代，才把自己没有能够实现的理想，寄托在他所器重的朋友和贤吏身上，十分殷切地希望他们能够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里，贡献出才力，出人民于水火之中，致国家于磐石之安。他在送韦之晋赴任湖南时，就怀着满腔的热情，指出韦的肩头上背着“王室仍多故，苍生倚大臣”的重大责任，然后勉以设榻求贤，力图中兴；在送别张建封时，也在指出“主忧急盗贼，师老荒京都”的严重形势之后，希望他能够扶危济困，致君泽民；在送别卢侍御上都时，更希望他能够在“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的沧海横流时代，多多地向君主贡献嘉谋；在寄给裴道州和苏侍御的诗中，更加明白地指出“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这些

任贤才、进忠言、扶大厦、济苍生的巨大工作，致君泽民、移风易俗的远大抱负，正是诗人梦寐以求、毕力以赴的事业。但在统治集团的压抑、排斥与打击之下，诗人只能赍志以殁。在他停止呼吸以前不久，才从自己的社会实践中，朦胧地意识到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就要首先“据要路”，他毫不犹豫地鼓励裴道州、苏侍御这样去做。这说明诗人晚年的这种思想，有着发展的另一个方面。

总之，诗人在湖南的诗歌中，我们看到诗人的自我形象，随着思想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而显得更加高大，更加光辉。

怀素《自叙帖》气势初探

史　穆

“笔下唯看激电流，字成只畏盘龙走”。这两句诗概括了怀素草书艺术的惊人气势。上一句是形容笔在飞动，气在奔流，是写“气”；下一句则说明势已形成，盘龙欲走，是写“势”。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显然，势是从气产生的。清代梁同书《频罗庵论书》中指出：“写字要有气，气从熟中来，有气则自有势。”兹就怀素《自叙帖》的临习经过，谈谈对于气势的体会。

一、写字要有气

每当我们阅读古人书法精品，除了欣赏其精到的笔墨功夫以外，对于通体完美的气势，总不免要发出“一气呵成”的赞叹，展开怀素《自叙帖》长卷，气势如长江大河，波澜壮阔，更是“一气呵成”的典范之作。究竟气是从哪里来的呢？气是伴随着书意产生的。通过挥毫作字，气又是体现书意的一种动力。在“意在笔先”的前提下，在书意的酝酿、支配下，书家产生了激情，不管是大幅长卷，或者是小字多字，都必须蓄聚一定的气量。落笔以后，则“气体在胸中，流露于字里行间，或雄壮，或纡徐，不可阻遏。”孙过庭所谓：“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都说明作书时气不能停顿。更不能涣散。这样，才能“章法照应”，“接上递下”。达到一气呵成的“气足神完”境界。曾国藩指出：“胸中须有一段奇气，盘结于中而达之笔墨者。”刘熙载《艺概》中说：“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缺一不可以为书。”这里不单是指作书要有气，还必须是奇气、浩气。古人历来主张“学在养气”，道理就在这里。气与书家的书风、人品（含学历、社会职业、气质、秉赋、艺术素养……）有着不可分离的因素，有什么样的气，就产生什么样的作品。如大气、小气、书卷气、俗气……以及介乎雅俗之间的黑气、霸气、媚气等。一个执着追求书艺的人在养气方面，梦寐以求的就是书卷气、浩气、奇气等书法艺术的高品位。奇气、浩气多一分，俗气、媚气就少一分，这也是一个长期磨炼、艰苦积累的过程。怀素是深知此中三昧的。绿天庵外，弃笔成冢，勤奋如此，他还自认“所见甚

浅”。为了向更高境界攀登，毅然“担笈杖锡，西游上国”。在“谒见当代名公”，“远睹前人之奇迹”的过程中，做了一些整理研究工作。“遗编绝简”，不啻贝叶经文，融会贯通，终于达到了“豁然心胸，略无凝滞”的高度。心境开朗虚明，才能无所不容，无所不察；“气概通疏”，才能吞吐自如，略无凝滞。这不仅是悟境，实际上也是一个养气的过程。“有诸内必形诸外”，积之既久，其发必速。当他乘着酒兴，看到“粉壁长廊数十间”的时候，不“小豁胸中气”是不可能的。于是“奔蛇走虺”“骤雨旋风”都从笔下奔腾倾泻而出了。“粉壁素屏不问主，乱拿乱抹无规矩”，“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这样一些评论，都是当时目击者的亲切感受，把一个狂僧的形态、气势、特别是书写时的速度，描述得跃然纸上，活脱如见。当然，怀素是可以“狂来轻世界”的，数十间廊壁，只不过是“小豁胸中气”罢了。他的学养与气度，远不止此，唐僧贯休《观怀素草书歌》中指出：“我恐山为墨兮磨海水，天与笔兮书大地，乃能略展狂僧意”，都是说明怀素气度之恢廓。

综上所述，《自叙帖》的气势，可见一斑，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怀素作书的速度，尽管快到“满座失声看不及”的程度，“然细以理脉按之，仍不出于规矩法度”（高士奇语）。在激电迅雷似的笔画线条中，既可以领略“翰不虚动”“潜气内转”的深厚功力；又可看到大小疏密、倏忽万变的娴熟技巧。“气从熟中来”，速度快的主要因素也是精熟。其次，《自叙帖》更多地采用篆书笔法，圆转瘦劲，提按变化不大，线条忽粗忽细较少，即笔的横向（左右前后）运动较多，而纵向（上下）运动则大大减少，这样，也增大了运笔的速度。没有速度，体现不了气势，而没有磅礴的气势和精熟的技巧，则速度只能“任笔为体”。导致手忙脚乱，无所遵循。孙过庭所谓：“心昏拟效之方，手迷挥运之理”是也。

二、有气自有势

如上所述，熟是基础，气是动力，势是效应。在熟的基础上，气奇则势险，气壮则势雄，气盛则势张，气蓄则势长，气和则势平，气雍容则势宽绰。反之，气短则势易促，气弱则势难全，气俗则势庸沓，气阻则势板滞，气馁则势迟疑。因此，势因气而生，也因气而异。《自叙帖》满纸龙蛇，奔腾飞舞，找不到一处迟疑阻滞的笔痕，的确是“豁然心胸，略无凝滞”的上乘之作。其势怎样得来的呢？首先，我们应当知道“真放在精微”这个道理。这是一个极关重要，而又为大多数初学草书者所忽视的一个问题。《草诀百韵歌》的开头四句就是：“草圣最为难，龙蛇竞笔端。毫厘虽欲辨，体势更须完。”所谓体势，就是草书的形体和布势，或者说是一种体态和架势。要使体势完备，必先

辨别毫厘；不能辨别毫厘，体势决不可能完备。一个字如此，一点一画也是如此。孙过庭《书谱》指出：“一画之间，变起伏于峰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所谓“峰杪”、“毫芒”，就是指精微之处。刘熙载主张：“书要心思微，魄力大。微者条理于其中，大者磅礴乎字外。”如果不从基础出发，不能在点画之间，毫厘悉辨，则“差之毫厘”，必然“失之千里”，所谓“若毫厘不察，则胡越殊风者焉。”因此，不能辨毫厘，不仅不能明体势，学草书；读帖也只能“徒见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舍本逐末，必然事倍功半。下面，就《自叙帖》浅谈势的表现。

1. 势是有收有放的——在变化莫测、仪态万方的书势中，奇正、缓急、收放是显而易见的。《自叙帖》写来忽大忽小，有斜有正，突破了前人较为匀整的草书布局，势的收放，尤为明显。放是开张，收是节制。《曾国藩日记》中有：“读孙子：‘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句，悟作书之道，亦有所谓节者，无势则节不紧，无节则势不长。”这样一段话，很能说明势与节（放与收）的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蝙蝠翻飞从不撞壁，疾飞是势，不撞壁是节，翻飞得那么快，收得那样突然，目不暇给，动人心弦。《自叙帖》中35行“卷轴”二字、85行“张颠”二字、90行“来”字、105行“戴”字等，这几个字前一字都不大，至此突然一放；这几个字后一字又写得较小，突然一收。读帖至此，人们不由得随着笔画线条的倏忽变化，节律的大起大落，感到风雷激荡，震撼心魂，此就局部较为突出的收放节奏而言。再从整幅字来看，1行至104行节奏感较为纡徐匀整，至105行“戴”字（一字竟占三行之宽）掀起一个高强度的音符后，节律慢慢加快，行距也明显增大，108行“及”字、109行“目愚劣”三字又是一组较强音，但仍保持着有节的行笔，至115行“狂来轻世界”的“来”又突然一放，“来”字一竖，像一柄奇峭的利剑，向右下斜插下去，墨色将浓遂枯，撇捺剑拔弩张，下面“轻世”二字，顺着“来”字的笔势，一个劲往右下方斜去，使“来”字动势延伸到第三字，“狂”是真的“来”了。接着略用收势写完了116行，行末的“如”字，扁小地塞在“真”字下面，很显然，是在尽量地“收”，是在蓄聚更大的气势，准备来一个更长一些、更大一些的“放”。果然，从117行起就一连放了六行，以小豁他胸中的奇气。从总体布局看，105行以后的放是对104行以前的较为收敛布局的一个总反应。可以想见，从“戴”字以后，虽几处小有收敛，到了116行，怀素到底是按捺不住，而神情激越，狂态毕露了。试想：没有中段几处高音，没有最后几行连续的放，而是大小一般、或略收略放地写到底，能有这样激荡回环、惊心动魄的效果吗？没有最后“辞旨激切，理识玄奥，固非虚荡之所敢当”这言简意赅、出自肺腑的答谢，能对得起前面许多当代名公的高度评价

吗？123行以后，是一个尾声，仍然是用较高的音节，年号月日也没有收小，但字势已趋平正，意态雍容，神完气足。最后一个“日”字，突然缩成一个小圈，像我们今天用的句号一样，戛然而止，真是匪夷所思。读帖到这里，把我们带到了“曲终收拨当心划，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惟见江心秋月白”诗的境界。

2. 势始终是飞动的——《自叙帖》的笔势，无一字无一笔不飞动。全文126行，有二十多行都是一笔连写到底，如激电奔流；笔断意连处也是脉络分明，气势通畅，飞动之极。以105行最大一个“戴”字为例，其局部繁体笔画左右摇动，如丝绸迭放，圆转自如；戈钩部分则铁画银钩，刚劲无比，体势欹正相生，点画刚柔相济，布白疏密有致，临风摇曳，顾盼生姿，两侧小字，如婢女环侍，不即不离。真有“万花拥出玉人来”之感。35行“卷轴夫草”四字，刚劲挺拔的大笔触中，融入部分宛转线条，旋律跳动，如鹘起兔落。55行之“若还旧观”，笔画轻快利索，摆动前进，有时偶一反转又继续更快地滑进，真如惊蛇入草。其他如“寒猿饮水”“壮士拔山”，或轻盈、或刚猛，……在大师的笔下，从心所欲，任笔所之，无不异常飞动。

3. 势是不断发展的——歌曲不可能一开始就是最强音，剧本也是通过情节的不断展开，逐渐进入高潮。草书也往往是随着笔势的不断展开而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许瑶谓怀素草书是“志在新奇无定则，古瘦漓骊半无墨。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志在新奇”是总的指导思想，“无定则”正因为定则太多，只是在“新奇”的思想指导下，不拘一格，信手挥洒罢了。这虽然是指平时的正常情况，但笔墨“古瘦漓骊”，已经够意思的了。如果在“醉”后”又是“信手”来他个“两三行”，焉能不酣畅淋漓，狂态毕露，出现意料之外的效果呢？戴叔伦诗：“心手相师势转奇，诡形怪状翻合宜。人人欲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前两句指书艺，后两句说明群众的反应和作者的态度。“心手相师”，妙在一个“师”字，说明通过“心”与“手”微妙而敏捷地相互反应、不断改善和发展书势的一个短暂（刹那间）过程，就是“相师”。相师的结果，必然是“势转奇”了；势转奇的效果又怎样呢，那就是紧接着的下一句：“诡形怪状翻合宜”了。“奇”也好，“诡形怪状”也好，都是“师”与“转”两个字发展起来的。第三句是说群众反应很好，急切要了解此中奥妙。末句“初不知”，是狂僧的心里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一点也不装模作样，书势发展的结果，的确出乎意料，使他自己真的莫名其“妙”。又如窦冀诗云：“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中气。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这位和尚看到粉壁长廊，兴致来了，想稍试一试以“小豁”一下胸中奇气，事实是怎样呢？这是试不得的，一试就不可收拾，一试就迸发成

“满壁纵横千万字”。这是一首绝妙的描写气势突然发展的传神之作，一个为自己作品满意发展而失声绝叫的狂僧形象，宛然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此外如钱起诗：“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也是说明在特定条件下，势的不断发展。

4. 势需要救助与利导——“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在这挡不住、留不了，来如奔马，去似飞鸿的“势头”下，必须洞察先机，随时进行救助与利导。

首先谈谈如何救助？如108行“失声看不及”，五个字一笔书成，愈写愈大，形成上尖下阔，这样就给下一行造成布局上的困难。事有凑巧，109行第一个字刚好又是一个“目”字，笔画既少，又是一个窄长形的包围结构，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怀素却以其惊人的胆识，将“目”字写成很大的长圆形，第一笔末尾上挑几近字长的一半，中间二横画，笔势一俯一仰，互相照应，第一横画加个附钩，第二个横画引带下一字，这三笔速贯而来，不仅减少了字中的空旷，而且使字的中宫增加了一上一下的动势，最后一笔破框而出，使庞然大物的“目”字承上递下，意志飞扬，竟然丝毫也没有平板孤立之感。“愚劣”二字，体势仍然是大而奔放，一以承接“目”字气势；二是为了填充上一行造成的大片空白，字势既不能右靠，也不宜左欹，必须保持中线，以稳住阵脚。“劣”字的最后一撇，一反常规，不向左下方斜撇去，却像斜竖一样往下直撇，这样既避免与上行“及”字的长撇笔势与角度雷同，又将“劣”字的斜势改为直势以稳定全行气势。三字大而疏，与上行的小而密鲜明对比，更是别有情趣，使气势舒展，通体空灵。蒋仲和提出：“预想字形，书之大旨，然名家非全无失误，如落笔有不惬意，便当想下数患如何救之，救护得好，更觉别有机趣。”信然！

其次，关于“利导”问题，“利导”必须善于“因势”。书艺从无固定模式，书势更是瞬息万变，不可能完全按照书家的主观意识为转移，是来不可止、去不可遏的。不论书势将向有利或不利方面如何发展，有素养的书家，都能及时敏锐地察觉，加以利导。张怀瓘说：“作书必先识势”，康有为说：“得势便，则已操胜算”，达到“一字则功妙盈虚，连行则巧势起伏”的妙包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因势利导所得来的妙境，是文本（楷则）上规定不了的，所以孙过庭主张：“无间心手，忘怀楷则”。张怀瓘说得好：“为书之妙，不必凭文按本，专在应变。”仍以35行“卷轴夫草”四字为例，由于前34行都没有较大的起伏变化，这一行有必要开拓、狂放一些。第一个“卷”字开始体大势张，第二个“轴”字顺势外拓，笔画明显加重，“由”旁右边弧线与上行余地吻合，恰到好处。“夫”字收小，使“轴”字更显得其大，字头小三角形，刚好安置在“轴”下凹部。第四是“草”字，按常规、按余地都不宜写大，但按

全行气势，又不能不写大。书家则采用两段写法：草头稍小而斜以承接“夫”字气势；下部一横，势长而力张，平直刚健，如猛士按剑，将军横槊，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气概。这一行大小让就，天衣无缝，刚柔曲直，倾侧多姿，可为“因势利导”之极致。“因势利导”，还必须懂得控制势的发展，不让势发展过头。曾国藩所谓：“却须遏抑掩蔽，不令过露，乃为深至。”不过露就是不过头。这和现代书法理论所提倡的“控制原则”，立论是一致的。古人还主张：“含蓄”“意蕴深”“容量大”等等，一方面是为控制势头预留余地；一方面也说明书家要有意蕴深、容量大的涵养和气度，才能应变，才能左右逢源，应付裕如，古人所谓“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就是这个道理。资之深，就能囊括万殊，为我所用，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高度，这样，就不再是被动地“应变”“控制”“利导”势头，而是“心手双畅”，无所不可，如贯休所谓“有神助兮人莫及”了。

三、气势总的表现

《自叙帖》通篇气势完美，无懈可击，大自总体章法，小至点画结构，统一中有变化，共性中有个性，毫无矫揉造作地达到了“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的辩证统一。取得这样的艺术效果，因素很多。限于篇幅，仅就其布局、用笔、用墨三个方面对气势的影响略述于下：

布局方面。由于《自叙帖》是一幅长卷，要领略通篇气势，必须全卷展开(一般影印本一次只能看到八行)，从整体到局部，又从局部回到整体，进行反复研读，才能欣赏到全卷上下相承、左右映带、大小相间、疏密相生、斜正相辅等妙处。正是这些妙处的变化莫测，异彩纷呈，使全卷宛如一支激动人心的进行曲，波涛汹涌，气若长虹，全文一百二十六行，找不到一处有“休止符”的地方。前人所谓：“如循环无端，孰能穷之哉?”可以概见大师之学养和气度、胆识与体魄。

用笔方面。可用《书谱》中“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两句话来加以概括。在大师的毫端，轻重、疾徐、刚柔、俯仰、欹正、曲直、方圆、顺逆……瞬息万变。如43行“虽”字、44行“逸”字、75行“激”字，全用顺锋起笔，秀劲绝伦；33行“兼好事者同作”六字，则裹锋直下，不加顿挫，刚劲圆直，前者似用新笔，后者很像秃锋。5行“奇”字摇曳多姿，如簪花仕女；53行“纵”字刚猛跳动，龙象能驯。70行“开”字、90行“来”字之直来直去；116行“得真如”三字之纯用萦回。35行“轴”字则曲直相生；105行“戴”则刚柔共济。在一个浑然一气的统一体（共性）中，用笔的情趣、风格（个性）竟然如此不同。举兹一脔，足概其余了。此外，怀素在驰毫骤墨，

运笔如激电奔流的情况下，对局部的每一细节，也随时注意“毫端”的“变态”，决不轻易放过。如46行“真正真卿早岁”的两个“真”字，用笔的轻重、结体之大小、斜正、点画之引带全都不同。23行“气概”二字下端的横、竖和两点，通过线条的连断、俯仰、曲直的不同处理，使相同的局部结构，竟无丝毫雷同之处。49行“资质”两字下端同是“贝”字，50行“物务”两字，草书体势又极相似，书家则在两点和勾撇上，前两字上断下连，后二字上连下断，信手挥来加以区别。“纤维向背，毫发死生”，达到了“毫发无遗憾”的境界。

没有纯熟、精深的书艺，绝不可能“穷变态于毫端”；而没有“高韵深情、坚质浩气”，更难“合情调于纸上”。如情调不合，纵然在细节上玩弄一些笔墨技巧，必然喧宾夺主，甚至每个局部独立，形成杂乱无章的一锅大杂烩。《自叙帖》整体浑然天成，局部和细节却又微妙多变，“纷纷纭纭，斗乱而不乱”(解缙《春雨杂述》)，这里面主要是一个局部服从于整体的问题，一个“个性”与“共性”辩证统一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气势问题。

用墨方面。在气势的统率下，在总体总局的大前提下，用墨和用笔，如影随形。《自叙帖》长卷的满纸云烟中，时见有数处墨色较浓、圆润秀劲的笔触，气韵生动，节律铿锵，给人以优美的艺术感受。这样墨色不断循环地由浓而淡，由燥而枯，在翻腾的墨海中，形成一个接一个有节奏的波段。有时一个字中，墨色的枯润变化也很明显，如6行“精”字、15行“颜”字、35行“轴”字、105行“戴”字、119行“奥”字，墨色之变化，“带燥方润，将浓遂枯”。“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虚实并存，臻其极致。

“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自叙帖》每一局部之能各得其所、各臻其妙，都与全局之磅礴气势息息相关；《自叙帖》还告诉我们：要照顾全局和局部，必先懂得养气与识势。可以是这样说；刚柔奇正间秾纤，气势先须意法兼。多谢狂僧留至宝，最纵横处最精严。

浅谈研讨齐己学术思想的意义

曹瑾瑜

齐己，湖南人，唐末、五代著名诗人。遗作甚丰，不少是反映晚唐和五代时期社会状况的诗篇，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但是，至今国内外尚无专门研究齐己的成果面世。最近，北京、长沙以及在全国其他各地的湖南籍有关学者，云集银城益阳，对齐己的学术思想进行了一次讨论，无疑将促进对这位湖南籍著名诗僧以及对我国古典诗词、文化史、佛教史的研究。

一、生平梗介

齐己生平散见群书，《全唐诗》、《唐才子传》都有他的简介。但各书并无翔实传记，连籍属、生卒何年都不确定。现综各家之说，并结合齐己本人作品中留下的痕迹，作一梗介。

齐己俗名得生，姓胡氏，潭州益阳人，出家于大沩山同庆寺。《全唐诗》、《辞海》均取此说。宋代无异议，《宋高僧传》卷三十云"益阳人也"，《宋宣和书谱》卷十一、《山谷集》卷三十《跋僧齐己集》亦承此说。然而，元以后，众说纷纭，有谓"齐己蜀人也""襄州人""荆南僧"；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日人平岗武夫著《唐代诗人》称齐己原籍为龙兴寺，等等。后几说均欠考据。在齐己大量的诗作中涉及了他的籍属。如《秋夕寄诸侄》、《渚宫春日因怀有作》、《答孔秀才》、《江上值春雨》、《酬岳阳李主簿卷》、《次韵酬郑谷郎中》、《秋兴寄胤公》、《野步》、《江上夏日》诸作中都写过他的故乡："每到秋残夜，灯前忆故乡。园林红桔柚，窗户碧潇湘。""旧业树连湘树远，家乡云与岳云平。""把卷思高兴，潇湘阔浸门"。"故园旧寺临湘水，斑竹烟深越鸟啼"。"沧浪与湘水，归根共无涯"。由此可佐证他家乡在湖南是无疑的。《宋高僧传》卷三十云齐己："幼儿捐俗于大沩山寺。"《五代史补》云："长沙有大沩同庆寺，僧多而地广，佃户则千余家，齐己则佃户胡氏之子也。"大沩山在今湖南省宁乡县境内，唐时属潭州益阳县。齐己虽祖籍缺考，七岁为寺牧牛，当隶籍于此。又《宁乡县志·形势篇》载：在同庆寺南禅衣峰西北有齐己故居，后毁，

乡人志之。1991年重版清人平江李元度所撰《南岳志》一书，径称齐为宁乡胡氏子，由此可见，齐己乃唐时潭州益阳人。

齐己生卒何年？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辞海》，虽未完全肯定，但记齐己生卒之年为约860～937年，现在多数学者认为这是比较接近实际的。齐己辛巳岁（921）所作《渚宫莫问诗十五首》中有"形骸六十余"句，又《与崔校书静话言怀》中有"同年生在咸通里"句。咸通为唐懿宗年号，唐懿宗于宣宗大中十三年即位，次年十一月始改元咸通，该年十一月十八日即公元861年元旦，而齐己云"形骸六十余"，据此，齐己约出生于860年12月半～861年2月之间。至于日本小林太市郎在《禅月大师的生平与艺术》一书中推断齐己生于878年；曹汛在《齐己生卒年考证》一文中，定齐己生于865年，均难成立。齐己卒年，文献少征。曹汛《齐己生卒年考证》推断卒于后晋天福八年，即公元943年，与事实不符。齐己自述流年至75年止，即935年左右，为孙光宪写《白莲集序》前三年，孙作序在"天福三年戊戌三月一日"，此时齐己归寂。序中云："师平生诗稿，未遑删汰，俄惊迁化，门人西文并以所集见授，因得编就八百一十篇，题曰《白莲集》。"据此，齐己刚逝世不久，作序前应有一段对齐己诗歌结集时间，那么，齐己卒年应在937年左右，至少不会晚于此。

齐己自幼年被沩山同庆寺推挽入戒。《五代史补》云："七岁与诸童子为寺司牧牛，然天性颖悟，于风雅之道日有所得，往往以竹枝画牛背为篇什，众僧奇之，且欲壮山门，遂令出家。"中华书局影印台僧明复所撰《中国佛教人名辞典》载齐己："其初，剃染于大沩，谒德山得法。"他一生相当长的时间是在道林与东林度过的。道林寺在长沙岳麓山，为湖湘古刹。旧志称岳麓山系衡山之足，南岳七十二峰之一。齐己第一次居道林为期十年左右，约在887年至896年；第二次居道林，在908年至912年前后。《白莲集》中尚存有道林寺诗作20多篇。此时齐己诗名很大，《五代史补》载：湖南幕府中能诗者徐仲雅常谓同列曰："我辈所作皆拘于一途，非所谓通方之士，若齐己才高思远，无所不通，殆难及矣。"齐己居庐山东林寺的年限，《凌云峰永昌禅院记》可佐证："予历于二林……因询其始，乃见诸末，遂命笔砚，不俟请而记之，自光化己未岁，迄于天佑丁丑年，一十八载矣。"《白莲集》中庐山诗作几三十篇。齐己一生涉足很广，其他游方暂住之处甚多，大体上他西北曾去湖北、陕西、山西、河南；东南至广东、广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沿途名山大刹，随在瞻仰。齐己北游是由沩山出发的，在德山驻锡不久，又去药山，离开澧州后，即转湖北竟陵入陕西，在长安停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遍览终南山、中条山、华山胜迹。道林栖止十年后，便开始东南一带游历。《舟中望祝融峰》

有“十年关梦寐，此日向峥嵘”句。齐己登上了四望无际的祝融峰顶，朝拜了般若古寺，留下了《登祝融峰顶》、《题南岳般若寺》等诗篇。继往衡阳、耒阳。《次耒阳作》诗云：“绕岳复沿湘，衡拥又耒阳。不堪思北客，从此入南荒。”南荒，在唐代大多指岭俪及苍梧一带。他曾游览阳朔诸胜，越梅岭，至广东曹溪，经江西宜春，由赣江人鄱阳，在金陵遍历六代遗址，到了镇江金山寺，渡过钱塘江，转道桐庐，寻访严陵古迹，谒国清寺，留下了《怀天台华顶僧》等诗篇。惟欲游嵩岳、四川而未能如愿。他在《荆州新秋寺居写怀五首上南平王》中写道：“虚负岷峨老僧约，年年雪水下汀州。”又在《夏日寓居寄友人》中云：“北游兵阻复南还，因寄荆门病掩关。”公元921年，齐己年逾花甲，被荆南政权高季兴署为僧正，居龙兴寺，直至终老。

二、学术成就

齐己既是学者、诗人，又是释子、高僧，是晚唐、五代卓有成就的诗家，有《白莲集》、《风骚旨格》行世。《唐音癸签》载“释子以诗闻世者，多出江南。灵一导其源，护国次之，清江扬其波，法振沿之，风习渐盛”。“五代之交，已公以清赡继响，篇什并多而益善”。至今辑存在《全唐诗》中的齐己诗共计十卷八百多首、十六个残句，乃前此任何一位诗僧所未达。《全唐诗》共收唐代诗僧115人，诗作2913首，齐己作品占四分之一以上。即使在整个唐代有姓名可考的二千多诗人中，作品之多，也仅次于白居易、杜甫、李白、元稹而位居第五；同时齐己的作品“多而益善”，相当社会化，可以说是晚唐、五代之交政治、经济状况乃至社会动乱的真实反映，使作者成为整个晚唐、五代诗人中的佼佼者。

齐己所生活的年代，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继而走向崩溃的时代。他在唐朝经历了懿宗、禅禧宗、昭宗、哀帝四代；在五代十国时期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三代。这一段历史时期，战争连绵不断，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二次大动乱、大分裂时期。当时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宦官专权于内，藩镇割据于外，统治集团内部相互倾轧，残酷镇压和剥削人民，兵连祸结，民不聊生。这个时期意识形态上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佛教盛行。本来在武宗会昌元年（841）有一次大规模“毁佛”行动，佛教遭到沉重打击。到齐己生活的年代，又崇奉释氏，佛教复苏。禅僧文人化，文人禅僧化，这是唐末社会生活中的一股思潮。

齐己在学术上的成就，由于以往缺乏专门研究，历史资料有限，但仅从他留下的诗作剖析，就应充分肯定，其成就是巨大的。首先，在诗歌创作上既是大家，又是名家。大凡论诗有“大家”“名家”之分，大家以数量胜，名家以

质量胜。从数量上说，齐己可与任何大家媲美。当时限制言论和因战事流离颠沛，正如他所说的“诗里是非高”，“诗成旋不留”，“兵火焚诗稿”，可见他的诗作特别是愤世嫉俗之作有相当一部分被毁，流传下来的只一千多首，《全唐诗》收录他的诗800多首。即此而言，数量也是惊人的，他是当之无愧的大家。他又是名家，这点，早为当时诗坛公认。他的诗友唐禧宗时进士、官至都官郎中的著名诗人郑谷说：齐己诗“格清无俗字”、“清新俊逸，深得骊珠”。他们共同推敲齐己的名篇《早梅》时，郑谓“数枝非早也，不若一枝佳”。齐改之，尊郑为“一字师”，传为诗坛佳话。湖南幕府中著名诗人徐仲雅谓齐己“才高思远，无所不通”；《唐音癸签》说：“《白莲》一集，驾出《云台》（郑谷集）之上。”齐己生前就有诗集传世，著名诗僧尚颜《读齐己上人集》写道：

诗人儒者禅，此格的惟仙。
古雅如周颂，清和甚舜弦。
冰生听瀑句，香发早梅篇。
想得吟成夜，文星照楚天。

这里，尚颜径称齐己是楚天一颗璀璨的文星，评价不可谓不高。

齐己的诗题材广泛，技巧娴熟，含义深刻，特别是关心民瘼，痛斥时弊，堪称晚唐诗中的力作。历来论诗以能否反映社会现实为第一标准。齐己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有不少名篇。如《苦热行》：

离宫划开赤帝怒，喝起六龙奔日驭。
下土熬熬苦煎煮，苍生惶惶无处处。
火云峥嵘焚泬寥，东皋老农肠欲焦。
何当一雨苏我苗，为君击壤歌帝尧。

笔法简练，气势磅礴，和一切正直的人们一样，有着火样般的热情。又如《猛虎行》：

磨尔牙，错尔爪。
狐莫威，兔莫狡。饥来吞噬肋肠饱。
横行不怕日月明，皇天产尔为生狞。
前村半夜闻吼声，何人按剑灯荧荧。

既金刚怒目地揭露了上层社会统治者如猛虎一样狷獗、贪婪，横行无忌；又站在人民一边，塑造了一个威武不屈、“按剑灯荧荧”的灭虎英雄。通过两个鲜明的形象，表达了诗人的是非见解和爱憎之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现在学术界提出他这类反映社会现实的诗，与历来被尊为诗圣的杜诗“朱门酒肉

臭，路有冻死骨”等名篇，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的感遇诗如《残春》：“三月春无也，芳时此可嗟。园林欲向夕，风雨更吹花。影乱冲人蝶，声繁绕堑蛙。那堪傍杨柳，飞絮满邻家”。含蓄蕴藉，学术界认为可与东坡感遇名篇《水龙吟》媲美。又如《君子行》：

> 圣人不生，龙麟何瑞?!
> 梧桐不高，凤凰何止?!
> 吾闻古之有君子，
> 行藏以时，进退求己，
> 荣必为天下荣，耻必为天下耻。
> 苟进不如此，退不如此，
> 亦何必用虚伪之文章，取荣名而自美。

对此，人们评价极高，甚至以为宋代范仲淹提出的“先忧后乐”的观点，或多或少也受了齐己这种思想的影响。总之，齐己在诗歌创作上卓有成就，堪称楚天一颗璀璨的文星。

至于齐己学术上的成就，突出的还有两点：第一，齐己对佛教和佛学中国化、世俗化的贡献。佛教自西汉末年传人我国内地，到隋唐达到鼎盛时期。唐代末期，其他各派一蹶不振，惟齐己所属禅宗南宗派，一枝独秀。南宗派当时主张不光靠背诵佛经、坐禅，还可以吟诗游览，出现了禅僧文人化、社会化的思潮。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虽是正宗，但与佛家、道家思想互相渗透、影响，推动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齐己是唐末、五代文学与禅学、禅僧与文人互相渗透这股潮流的杰出代表。在齐己的诗中，反映这种现象的比别人充分得多。他曾写道：“事佛为儒趣尽高”，“经论功余更业诗”。他对青年僧众要求的也是三件事：吟诗、听经、游览。在《戒小师》中写道：“不肯吟诗不听经，禅宗异岳懒游行。他年白首当人问，将底言谈对后生。”毛晋在《白莲集》后跋中对他的《自题》诗“禅外求诗妙，年来鬓已秋。未曾将一字，容易谒诸侯”评价极高：“道价诗声，和盘托出，可作自传。”第二，齐己在诗歌理论、文学理论上的贡献也是功不可泯的。他写的《风骚旨格》共八部分，其中六个部分为他首创。他的诗作也有不少是论述作诗方法的。无论立意、选题、谋篇和炼句、炼字都要求有新意，特别是重视立意，强调正思，对后来诗格的影响很大。无疑是对我国古典诗词理论发展的重要贡献。

三、现实意义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中华民族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汉、唐是我国民族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唐诗更是我国诗歌史上光辉灿烂的时代篇章！齐己作为唐末、五代之交的著名诗人，我们认真研究他的学术思想，有利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齐己的诗篇，在治理国家、修养品德、成就事业方面，留下了大量可资借鉴的宝贵思想。首先，他的诗篇，政治观点鲜明，反映了当时人民历经劫难，期望政通人和的要求，具有强烈的人民性。他出身农民，父母早丧，七岁为寺司牧牛。他一生在时间上有近八十年的生涯，在空间上涉足很广，熟悉农村，了解农民，在反映当时农村实际状况方面十分形象而深刻。如《暮春久雨》《江上值春雨》《苦热》《苦热行》等，反映他：久雨了，像农民一样关心“桑麦”；天旱了，像农民一样渴望“甘霖”。

《西山叟》写道：“西山之中多狼虎，去岁伤儿复伤妇。官家不同孤老身，还在前山山下住”。《耕叟》写道：“春风吹蓑衣，暮雨滴箬笠。夫妇耕共劳，儿孙饥对泣。田园高且瘦，赋税重复急。官仓鼠雀群，只待新租人。”反映了封建制度下“苛政猛如虎”和农民的赤贫化：一边是“夫妇耕共劳，儿孙饥对泣”，一边是“官仓鼠雀群，只待新租人”。这些诗写当时的统治者和被统治的农民，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对封建社会是多么无情的揭露和鞭挞！

他对那个时代的战乱，也作了充分的描绘。如《岳阳道中》写道：“路歧经乱后，风雪少人村”，“大泽鸣寒雁，千峰啼昼猿”；《夜次湘阴》中写道：“时难多战地，野阔绝春耕。骨肉知存否？林国近郡城”；《读岘山碑》写道：“兵火烧文缺，江云触藓滋。那堪望黎庶，匝地是疮痍”，反映了诗人对统治者镇压农民起义以及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利战争的深恶痛绝，对人民因战争而辗转沟壑、流离失所的深切同情。《秋日钱塘作》：“英雄贵黎庶，封土绝精灵。勾践魂如在，应惭战血腥”；《看金陵周》：“天朝图画战争多，最是陈宫计数讹。若爱苍生似歌舞，隋皇自合耻干戈。”这是他厌弃战乱，主张平息干戈，期望和平的形象概括。《边上》：“汉地从休马，胡家自牧羊。都来销帝道，浑不用边防”。这反映了他主张各民族间消弭刀兵，和睦相处的愿望。

在政治上他向往唐尧再世，主张建立清明政治。《浮云》：“大野有贤人，大朝有圣君。何如彼浮云，掩蔽白日轮。安得东南风，吹散八表外。使之天下人，共见尧眉采”。表达了他政治上的向往。在《君子行》中为君子制定了标准：“荣必为天下荣，耻必为天下耻”。在《寄监利司空学士》中向当政者提出了为政的要求和榜样：“诗家为政别，清苦日间新。乱后无荒地，归来尽远人。宽容民赋税，憔悴吏精神。何必河阳县，空传桃李春。”在齐己看来，大乱之

后，只要为官的振奋精神，重视生产，宽容赋税，农村就能很快稳定和复苏，到处都会有桃李的春天！《秋夜听业上弹琴》："万物都寂寂，堪闻弹正声。人心尽如此，天下自和平。"写出了天下人要求社会安定，过太平日子的心情。只要天下人都"弹正声"，就有"天下自和平"的理想境界！《轻薄行》："银鞭金镫骍骝蹄，横眉吐气如虹霓。五陵春暖芳草齐，笙歌到处花成泥。日沉月上且斗鸡，醉来莫问天高低。伯阳道德何唾咦，仲尼礼乐徒卑栖。"这是他对当时侯门贵族骄奢淫逸深刻的揭露。《寓言》更是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唐朝灭亡的症结。诗云："造化安能保？山川凿欲翻。精华销地底，珠玉聚侯门。始作骄奢本，终为祸乱根。亡家与亡国，去此更何言！"他直指时弊，当政者不廉洁，贪赃枉法，珠玉聚侯门是骄奢之本，祸乱之根。对唐朝覆灭教训的形象概括，多么中肯，多么深刻！时逾千年，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齐己的政治见解鲜明而深刻，说明他虽身在佛门，而心萦家国。

其二，齐己有着伟大的抱负，高尚的理想和情操。这是齐己成功的根本，也是值得我们很好学习和弘扬的一个重要方面。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有了伟大的抱负，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齐己在《寄勉二三子》中写道："君闻国风否，千载咏关关"；《咏怀寄知己》中写道："自知清兴来无尽，谁道淳风去不还""三百正声传后世，五千真理在人间"。又如《月下作》："良夜如清昼，幽人在小庭。满空垂列宿，那个是文星。世界归谁是，心魂向自宁。保当见尧舜，重为造生灵。"

齐己立志要继承诗经国风的光荣传统，要写出流传千古的名篇来，要淳风去复还，他有"致君尧舜上"的志向，"重为造生灵"的改革思想，有"世界归谁是"的伟大抱负。同时，作为诗人，他有着高尚的情操，"曾无一字干声利"，"未曾将一字，容易谒诸侯"，就是他自甘寂寞的自我写照。又如《送惠空上人归》："尘中名利热，岛外水云闲。君子多高趣，秋风独自还"。在《送欧阳秀才赴举》中写道："直是文章好，争如德行多"、"烟窗心一寸，霜雪路千坡"。在《勉道林谦光鸿蕴二侄》中写道："莫将闲世界，拟敌好时光"。他一生追求"德行多"，不管"路千坡"，抓紧"好时光"去成就他的诗业，直至风烛残年，仍矢志不移。如《示诸侄》：

> 莫问年将朽，加餐已不多。
> 形容浑瘦削，行止强牵拖。
> 死也何忧恼，生而有咏歌。
> 侯门终谢去，归扫旧松萝。

又《遣怀》：

> 诗病相兼老病深，世医徒更费千金。
> 余生岂必虚抛掷，未死何妨乐咏吟。
> 流水不回休叹息，白云无迹莫追寻。
> 闲身自有闲消处，黄叶清风蝉一林。

齐己一生执着诗业，不肯虚度年华，老当益壮，穷且益坚，真正达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思想境界！

其三，刻苦自学，勤于和善于思考，是齐己成功的经验．也是值得我们很好学习和弘扬的又一个重要方面。齐己从一个牧童，登上晚唐、五代文星的宝座，成功之道在于自学不倦。他是一个刻苦自学成才的典范。他在《酬洞庭陈秀才》中写道："此门从自古，难学到如今"；《贻王秀才》："功到难搜处，知难始是诗。自能探虎子，何虑屈男儿。此道真清气，前贤早白髭。须教至公手，不惜付丹枝"。他把诗看成一门很深的学问，头发胡须白了，也还不倦地学习。他在《自勉》诗中写道："试算平生事，中年欠五年。知非未落后，读易尚如前。"上了年纪，还在更加发愤地读书。因此，他涉猎很广，全面继承了古代和同代诗歌的优秀成分，从诗经到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王维、贾岛、孟浩然以及同代诗家的作品，他都认真学习过，研究过，并虚心地从中吸取乳汁。他很谦逊，对前贤和同辈诗家都很敬重。如所周知，他尊同辈郑谷为"一字师"。又如他《读李白集》写道："锵金铿玉千余篇，脍吞炙嚼万口传。须知一一丈夫气，不是绮罗儿女言"。尽管他对李白评价极高，但在学习他时又不生吞活剥，而能吸其精华。有所创新和发展。如李白写了千古名篇《蜀道难》，齐己在《送人入蜀》中却反其意而用之。诗云："何必闲吟蜀道难，知君心出险峨间。寻常秋泛江陵去，容易春浮锦水还。两面壁悬神女峡，几重青出丈人山。文君酒市逢初雪，满贯新清洗旅颜。"切时、切地、切人，描述了美好的景色和欢快的憧憬。同时，他也十分重视实际生活。他曾说"江楼联雪句，野寺看春耕"（《答武陵幕中何友使》)。"诗兴难穷花草处，雅闲何阳水乡边"（《溪居》)。他的诗都是从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来的，除前所述他对旧社会愤世嫉俗的诗外，像山水诗、咏物诗等也是如此。如《登祝融峰》中写道："宇宙知何极，华夷见细流。坛西独立久，白日转神州。"又如《萤》中写道："难把寸光藏暗室，自持孤影助明时"，《新栽松》写道："百岁催人老，千年待尔高"、"他日成荫后，秋风作海涛"。都是用比兴或象征的手法，抒发诗人志欲及物、瞩目未来、积极进取的思想。

齐己不仅勤于学习和实践，而且更勤于和善于思考。他在《寄谢高先辈见寄》中写道："诗在混茫前，难搜到极玄。有时还积思，度岁未终篇。"《得李推官寄怀》写道："连日借吟经不已，一灯忘寝又重开。"他勤思到了废寝忘

食，度年如日，“一灯忘寝又重开”、“度岁未终篇”的地步。他强调“正思”，在《言诗》中写道：“毕竟将何状，根源在正思，达人皆一贯，进者自多歧。”他也强调灵感，如《吟兴自述》写道：“前习都由未尽空，生知雅学妙难穷。一千首出悲哀外，五十年销雪月中。兴去不妨归静虑，情来何止发真风。曾无一字干声利，岂愧操心负主公”。《山中善人》写道：“漫过诗名出，何曾著苦吟。忽来还有意，已过即无心”。强调思考不成熟，没有灵感时，应静思、再思，一旦有了灵感，思考成熟了，就应抓紧写作，“情来何止发真风”，而防“已过即无心”。这些都是齐己几十年创作经验的金玉之言。

四、结　语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败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据此。我试图对专家、学者们提出的一个问题作点探讨，即齐己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为什么在中国文学史上却没有他的地位，现在倒不如齐己生活的时代给予了他应有的评价?!

首先，不容讳言，过去，我们对祖国传统文化重视不够，研究、整理和借鉴不够，没有像今天一样，提到应有的高度。其实，丢掉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不仅是民族自身的悲剧，而且是人类文化的损失。尤其是十年动乱中，不管什么传统的优秀文化，统统被列为“四旧”横扫，何等荒谬！何等愚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提出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宏伟任务，得到知识界、学术界的热烈拥护。但是，祖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研究和挖掘，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因之对齐己这位伟大诗人的研究，还是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齐己出身农民，既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伟大诗人，但又是封建时代的文人，而且是一位出家的和尚。他这种身份的多重性，反映在他的思想、作品上，自然也会有多重性。我们必须尽力去历史地、辩证地分辨齐己思想及其作品的良莠。笔者认为，首先应充分肯定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如前所述，他是站在人民方面的，他的作品形象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呼声，具有民主性、革命性，这是第一位的，应大力弘扬；其次，他才是一位出家的和尚。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他对诗业的执着追求，远比他入禅礼佛多得多。但是他毕竟是一位封建时代的文人，而且一生栖身佛门，自然也存在封建主义和佛教出世思想，有谈空说无的作品。如他在《诸宫莫问诗一十五首》中写道：“道应归淡泊，身合在空闲”；在《寄郑谷郎中》写道：“诗心何以传，

所证自同禅”。尽管类似作品不多，但他的作品中确实夹杂有唯心主义、封建主义的糟粕，这是必须分辨出来，予以排除和扬弃的。第三，正确分析他晚年被荆南政权署为僧正一事。一位权威的历史学家曾据此说他：“当了僧正，还说懒谒诸侯，无非是欺人而已。”其实齐己被署为僧正一事也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1）齐己当荆南僧正并非他的本意。如前所述他曾写“北游兵阻复南还，因寄荆门病掩关”；（2）他当僧正主要目的还是在于成就诗业。宋黄庭坚《跋僧齐己诗》云：“齐己胡氏子，本益阳人……晚岁牵情于诗，遂作荆州僧正，以老故”；（3）他并不乐于当僧正。他在《辞主人绝句四首》中写道：“纵与乘轩终误主，不如还放却辽天”。我坚信随着对齐己学术思想的深入研究，历史定会给予他应有的评价的。

谈齐己诗作中的自我反省

王子羲

齐己，俗姓胡，名得生，益阳人。约生于唐懿宗咸通二年（公元 861 年），卒于后晋高祖天福二年（公元 937 年）。齐己的父亲是大沩山同庆寺（唐时大沩山属益阳县）的佃户，齐己 7 岁便给同庆寺牧牛，以其年纪小而会写诗，寺僧认为他是奇才，就劝令他落发为僧。从此以后直到 60 岁前二年，他就是在益阳沩山同庆寺、长沙岳麓山道林寺和江西庐山东林寺学禅修行，以及游方挂单之中度过的。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除了念禅外，惟有学诗、写诗。他有诗癖，遇事即咏，无日不作。经过 50 多年的锻炼，诗作清润平淡，高远冷峭，成就很高，诗名传遍天下。后梁末帝贞明四年（公元 918 年），齐己离开东林寺北上，又拟远游嵩岳，但行至途中，因为后梁、后晋两军连年作战，前进受阻，回东林不能，只得改变计划，返舟折往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到江陵不久，荆南节度使高季兴于后梁末帝龙德元年辛巳（公元 921 年），署齐己为“僧正”（荆南僧务行政长官），令信龙安（兴）寺。齐己原来曾有入蜀游峨嵋的念头，至此“乐不思蜀”了。后唐明宗天成三年（公元 928 年），高季兴逝世，儿子高从诲继位，齐己又想回匡庐东林寺去，但高从海不放，身不由己，以致滞留荆南，郁郁寡欢，直到圆寂。

作为出家修行的僧人，既已皈依佛法，遁入空门，应该远由红尘，隔绝人事。可是东晋后秦以道砉法师为僧正，管理众信事务，为僧人立官的开始。以僧人而作官，不但与出家的本旨相违背，也是佛门所不应当容许的。唐代儒、道、释三教并重，自武则天提倡佛教以后，佛教特被重视，到唐宪宗信佛着迷，元和十二年（公元 817 年）乃至派遣使者往凤翔迎接佛骨入宫禁中，韩愈上表规谏，竟被贬至 8 千里外的潮州（今广东潮州市）。当时佛教禅宗独南宗广泛在江南流传，其后遍及中原地区。武宗会昌五年（公元 845 年），曾禁断佛教，各宗皆灭，禅宗独继续盛行。在禅宗盛行、君主笃信的形势下，一些诗僧竟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贪图膻名，争相营求供奉（在皇帝左右供职者）之职，到内殿去集讲佛法，献颂寿辰。交结重臣，趋炎附势，风气之坏，莫此为

甚。如广富在唐宪宗元和、穆宗长庆（公元 806～824 年）两朝，都为内廷供奉，赐居安国寺红楼院；栖白在唐立宗（公元 847～859 年）朝赏居荐福寺，为内廷供奉，赐紫（唐制，三品以上官员的袍色。）；子兰在唐昭宗（公元 889～904 年）朝为文章供奉；可止在唐昭宗乾宁（公元 894～897 年）中赐紫；修睦在唐昭宗光化（公元 898～900 年）中为洪州（今南昌市）僧正；元寂在五代南唐李景保大（公元 948～958 年）中，授左街僧录、内供奉，赐紫等，都是显著的例子。在这种风气下，齐己被任命为僧正，也就不足为怪了。值得注意的是：齐己和广宣等稍有不同，广宣等的官职是营求而来，又是在皇帝左右供职，齐己则未必是营求所得。齐己到江陵栖止之前，在佛门中资历已深，应有名望；在社会上又有着广泛的联系，上至文武群臣、社会名流、诗坛巨子、外国高僧，下至贫居处士、落第秀才、普通百姓都有交往；加之诗名甚高，传遍大江南北，必为荆南节度使所注目，故当其到荆南不久，即被任为僧正，并且让他可以万事不管，而不像内供奉须经常在皇帝左右侍候，因而在性质上是有差别的。

齐己受任僧正，已过 60 岁了。高季兴不要他趋走侍奉，写信告诉他说：“知心不在常礼。”所以齐己最初感到非常高兴，以为得到了知遇。他在 64 岁所写组诗《渚宫莫问诗序》里说：“自己不过是一个青山石上的僧人，今王侯给以安居的地方和丰厚的俸禄，使人快乐，可以万事不管，或游览，或休息，都听自便，连云泉猿鸟都不必相亲狎了。放纵到这样地步，还有什么束缚呢？以至连郢都城门的墙仞，也已经一年多没有去瞻视过，何况其他的人家呢?”从他的这段话来看，似乎得意忘形，情不自禁了。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此以前，生活是极其清苦的，现在进入老年，享受王侯优渥的待遇，不需自己辛勤谋食，又不受约束，不拘常礼，似乎仍在山寺里一样自由自在，怎能不叫他开心！《渚宫莫问诗》可以说是他为僧正以后的自我表白和反省。因为接受僧正任命，是他生活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他一生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之分水岭。这时，他的头脑是清醒的。诗里说，自己是“百钝人”，说话少通时事，吟诗多着野题，与官坛政要很少往还，只有多才的碧云客（诗僧）与他亲近而已。他警告自己：业障须由自己了却，不能做了僧正，就把自己的道心变成众生的心。作为僧人，应该居于高树之下，遗弃世事，才是真隐；忘却计较和巧诈之心，才是大还（大归）。而道心的消长只有自己心中知道。他觉得自己心意无求，有如空中的浮云，所以满盈知戒，倚伏不疑，凉天自拥坏衲，静夜独披玄文。这些都是他的自我表白。但是在他停止持钵乞斋，受任僧正三年以后，觉得依托高季兴，似乎与王粲依附刘表相近。“侯门叨月俸，斋食剩年储”，不免有些忸怩起来。以为自己是三千簪履之外的僧人，并非上客的威仪，

同诸侯谈笑自觉惭愧，反不如“旧峰呵练若（寺院），松径接匡庐”的生活。当他晴楼独凭的时候，回忆起畅游东南后重到东林寺时已过去了6年，此前曾去曹溪礼谒六祖衣钵，其间还访问过诗匠郑谷，而终于一别白莲地，摇落在此楚江之头，人日衰残，不欲长寿，“坐觉心心默，行思步步冰”，心情似乎很沉重，这无疑是他的自我反省。在这些自我表白和反省之中，也表现出他的自为和自爱的心情来。

在此以前，他的诗作中没有出现过自我反省；从此以后，这种自我反省时时从他的诗篇中流露出来。他为僧正6年时，所写组诗《荆州新秋寺居写怀诗五首上南平王》其二云：“井梧黄落暮蝉清，久驻金台但暗惊。事佛未怜诸弟子，谈空争（怎）动上公卿？合归岛外藏幽迹，敢向人前认好名！”他认为自己作了僧正，事佛没有怜爱弟子，谈佛理不能打动上公、上卿，所以应该回归尘世之外，而时光流驶，安禅于教化之中，已经六稔，久驻黄金台上，能不教他暗自惊讶吗？其四云：“托迹幸将王粲别，归心宁与子山同？”他认为自己“托迹”幸与王粲同而有别；王粲依刘，并无官职羁绊，自来可以自去；自己则有王命在身；行动须得主人许可。他认为自己的“归心”也与庾信不同，庾信身隐异邦，思归故国；己则身羁王庭，思归林泉。所以其五云：“会待英雄后金口，却教担锡（锡杖）人云松。”这是对南平王的请求。

他任职10载，年过70岁了，仍然没有得到主人的放行，心情焦急。在《七十作》诗中自省说：“密理方通理，栖真始见真。沃洲匡阜客，几劫不迷人。”他深深地觉得自己必须“密理栖真”，才能通理见真，还必须“几（察）劫”，才不会使人入迷。又《夏日荆渚书怀》云：“中途息瓶锡，十载依公卿。不那（无奈）猿鸟性，但怀林泉声。何时遂情兴，吟绕杉松行。”至此他的“猿鸟性”按捺不住了，其冀望回归林泉的殷切心情，可以想见。他在《谢南平王赐山鸡》诗中以山鸡自喻，说：“五色文章类彩鸾，楚人买得半摧残。金笼莫恨伤冠帻，玉粒频惭剪羽翰。孤立影危丹槛里，双栖伴在白云端。上台爱育通幽细，却放溪山去不难。”他认为自己为僧正，如同山鸡养在金笼里，受到摧残，冠帻受伤，虽有月俸颁发，而羽翰被剪，不能奋飞，眼睁睁地望着白云端里的双栖伴侣，而无法亲近，但盼上台爱育，放归溪山，遂他心愿。这不但是自我反省，简直是对南平王的哭诉和哀求。正因他把僧正这个官职看作是摧残他的金笼，所以要求摆脱它的心情也越来越强烈。73岁时所写组诗《荆渚感怀寄僧达禅弟三首》其一云：“谁云有句传天下，自愧无心寄岭南。”这里明白地说出无心再寄身于秦岭之南作僧正了。其二云：“春残相忆荆江岸，一只杜鹃头上啼。”又借杜鹃的啼声，含蓄地发出“不如归去”的感叹。

74至75岁之间，他曾患过一场大病，他写《荆渚病中因思匡庐遂成三百

字寄梁先辈》诗，进行了更深刻的自我反省。认为自己任僧正，是“埋头逐小利”，而囊未盈物，庾不满储。他说：“每许亲朱履（指贵族官僚），多怜奉旆时（指地方长官），簪嫌红玳瑁，社念金芙蕖（指白莲社）。”这里道出了他的苦衷：他是南平王府的官员，不得不让自己亲近贵族官僚，不得不侍奉地方长官，这是多么可怜的事呀！而达官贵人的玳瑁簪又实在令人生厌，东晋远公所创建的白莲社却够人想念。所以寄人篱下（依刘）的生活不是吟咏的题材，乘兴而来、兴尽而返（访戴）的行动自由，岂能忘掉！他在《酬元员外见寄八韵》诗中又说，“访戴”之心情更加迫切，“依刘”的力承受不住了，所以小心戒慎，如同临渊履冰；而归隐的梦寐，频频牵动回归东林寺的心事，有似炎蒸，以致留滞成为难移的压头的山峰，实在可笑！到最后，他竟把自己任僧正，比喻为与漆同时黑，似朱在污处丹，甚至惭愧到怕别人认识他了（《行路难》）。所以他要“侯门终谢去，却扫旧松萝（《示诸侄》）。”齐己此时憎恶作官，恨不得即时离去的心情，与初受任僧正时的欢欣喜悦，恰成鲜明的对照。而他这种入官以后，始终不忘僧人的身份，时时自我反省，并坚决弃官返林泉的行为，同广宣、栖白、子兰、可止、修睦、元寂之流营求供奉，趋炎附势的行径，又是一个鲜明的对照。由此观之，齐己不但是值得我们景仰的诗人，而且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高僧。

王船山唯物主义战斗性剖析

——读王船山《张子正蒙注》

冯正刚　俞蕙安

王船山哲学、思想之所以为后人称道，为今人倾注精力研究、阐发，究其深层原因，乃源于它特有的战斗性。19世纪爱国、维新运动的先驱谭嗣同，将船山哲学、思想称颂为“昭苏天地”的“一声雷”（《论艺绝句六篇》之二），说“衡阳王子精义之学”是“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仁学·下）。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斗士章太炎也大加称赞：“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兴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船山遗书序》）这些赞美之词，是船山哲学、思想的战斗光芒给后人以启迪的最好说明。

船山唯物主义思想散见在浩瀚的著述中，最精彩、最富有特色的部分，集中体现于《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尚书引文》、《老子衍》、《庄子通》等著作中，特别是船山晚年极为推崇加之详细注释的《张子正蒙注》一书，其坚持唯物主义立场的作法和思想观点，的确在中国古典哲学史籍中也是罕见的。本文就《张子正蒙注》一书对船山唯物主义的特色作一些剖析。

一、坚持唯物主义旗帜鲜明，不含糊其词，不调和折衷

船山其时，程朱理学居于正统地位，并杂以佛教唯心主义、老庄唯心主义、陆王心学。船山面对形形色色唯心主义，不为错误观点、思潮所左右，而是奋力举起唯物主义旗帜。他无视程朱，大力推崇北宋唯物主义者张载，从经、史、子、集中，挑选其《正蒙》一书作注。认《正蒙》一书“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去昏蛰而履平康之坦道”，是“匠者之绳墨，射者之彀率”。澄清了唯心主义扰乱的是非，“邪说之淫蛊不足以乱之”。认为张载阐明的唯物主义，功不在当时人们称道的夏禹、孟子之下，“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张子之功，又岂非疏水之歧流，引万派而归墟，使斯人去昏蛰而履平康之道”。明确表示，要倾注全力，坚持张载所倡导的唯物主义路线，晚年在“墓铭”中写道：“希张横渠（即张载——笔者）之正学而力不能企。”

张载是北宋时期的人，相距王船山生活的时代有六百年之久。他的思想、著作，又一直被程朱歪曲、篡改、攻击，甚至被视为“异端”。船山一反唯心主义的作法，应该说，不仅是有眼力的，而且也是很有胆识的。与其说是推崇张载其人其书，倒不如说是穿着古人的服装，利用古人的语言，发自己的心声，阐明他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见解。

张载《正蒙》中，认为佛教“彼语寂灭者”，迷惑于“恍惚梦幻”，老庄“以有生于无”，同样“蔽于诐而陷于淫”。船山对张载观点大加发挥，并联系当时现实和历史的实际，说明一些人正是这样陷入谬误。他写道：“陷于佛者，如李翱、张九成立流，而富郑公、赵清献虽贤而不免；若陆子静及近世王伯安，则屈圣人言以附会之，说愈淫矣；陷于老者，如王弼注《易》及何晏、夏侯湛辈皆其流也；若王安石、吕惠卿及近世王畿、李贽之属，则又合佛老以溷圣道，尤其淫而元纪者也。”

特别是他面对当时唯心主义阵容的主将朱熹哲学，不妥协，不附和，无所畏惧地抗争，竭力发挥张载唯物主义思想，在本体论、运动观、认识论等一系列问题上，针锋相对地一一予以驳斥。或者认为“朱子之说反近于释氏”，而“与圣人之言异”；或者明确表示分歧，不苟同，“谓张子之言非睿所昭者，愚不敢知也”。强调对程朱为代表的唯心主义，要“伸斧钺于定论”（《读通鉴论》卷五）进行猛烈的批评，作出正确的裁决。

历史地看，船山这样旗帜鲜明地坚持唯物主义，实属难能可贵。

二、“入其垒，袭其辎”，注意抓住要害问题开展斗争

船山博览群书，潜心钻研，并以“六经责我开生面”创新理论为己任。因此，他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从不浮光掠影，总是深入到堡垒的内部；从不躲闪其词，隔靴搔痒，总是抓住要害，一袭击其主要观点、辎重部位；从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通过批判来发展和丰富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正如他在《老子衍》序言中所概括的，他的作法是“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形式不断改变，重点不断推移。从先秦的天道观的对立，到两汉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论战，到魏晋玄学的本末、有无之争，再到隋唐佛学的空寂为本与反佛学，斗争一浪接着一浪，到宋以后，斗争的重点则主要是围绕“理”“气”关系谁是第一性展开的。王船山正是抓住这个问题，继承张载的唯物主义观点，向程朱理学等唯心主义展开了尖锐的批判。

他认为“理”与“气”谁为第一性是看问题的出发点。出发点正确与否，极端重要。正确，才不会陷入“淫辞邪说”。张民《正蒙》首章《太和篇》，论

述“本体”应该是阴阳二气的统一体，王船山强调这是立论的根本。“此篇首明道之所自出，物自所自生，性之所自受，而作圣之功，下学之事，必达如此，而后不为异端所惑。”“大本不立而欲以学圣，非异端则曲学而已。”

他还针对二程、朱熹在这问题上对张载的攻击强调，张载提出本体是物质性的气，是别树一帜的贡献，“乃张子之绝学”，这种观点，能够匡正人们思想，“发前圣之蕴，以辟佛老而正人心者也”。朱熹提出的“理生气”，“理主气”，“气依旁这理行”，是“近于释氏”，与佛教唯心主义观点同出一辙，“而与圣人之言异”。船山认为只能是“气者，理之依也”（《思问录内篇》）“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读四书大全说》卷十）。究竟“本体”是物质性的“气”，还是非物质性的“理”，他认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不能马虎，它是真理和谬误、是和非的一个分水岭。“圣贤大公至正之道异于异端之邪说者以此”。正因此，对于张载“气本论”这个基本理论阵地，他总是坚持不让，《张子正蒙注》，在这个方面，注解最为详细，发挥也最多，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也最为尖锐。

船山除了从理、气谁为根本这个本体论上，开展对程朱的批判，而且还从体用、道器的关系方面，进一步拓宽深化了这种批判。

在道器关系上，船山坚持了“天下惟器”“道在器中”的唯物主义路线，批判了程朱“离器而言道”的唯心主义思想。

张载认为气是本体，是无限的；具体事物即器，是气的客形，暂时形态，是气的聚散，“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气不能不聚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朱熹从他“理”生“气”的唯心主义路线出发，离开具体事物讲道，“离器而言道”。船山坚持张载观点，认为“道”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通过具体事物表现出自己，并且认为具体是有限的，而“道”是无限的，“器有成毁，而不可象者寓于器以起用，……器敝而道未尝息也”，朱熹“离器而言道”是错误的。

如果说在《张子正蒙注》中，船山只是从本体与具体事物的角度论述道器关系的话，那么，在《思问录》中就从道是事物的规律、器是具体事物的角度，论述了道器关系。他认为规律与事物是统一不可分的，“统此一物，形而上则谓之道，形而下则谓之器，无非一阴一阳之和而成，尽器，则道在其中矣。”（《思问录》内篇）。

他认定道器是物质世界本身的问题，不能“离器而言道”，还进一步提出了“天下惟器”的论断，并就此详加发挥。“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不可谓之道之器也。无其道则无其器，人类能言之，虽然，苟有其器矣，岂患无道哉！……人或昧于其道，其器不成；不成，非无器也。无其器则无其

道，人鲜能言之，而固其诚然者也。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串伐之在，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周易外传》卷五）强调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谈规律，“道者器之道”。像朱熹“道在物外”“道在器先”，道是具体事物的根本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应该是“无其器则无其道”，因此结论只能是“天下惟器而已矣”。断定宇宙中存在的只有具体事物，没有超越具体事物的绝对。

在体用关系上，张载提出“德其体，道其用”，批评老庄有生于无是“体用殊绝”，体与用脱节。王船山发挥张载观点，认为有与无都是气的存在形态，“有无混一者”，形成了具体事物就叫做“有”，“可见谓之有”；未形成具体事物就叫做无，“不可见遂谓之无”。表现出来的运动变化是气固有的阴阳本性的表现，“其实动静有时而阴阳常在”。有与无是没有区别的，是气的两种存在状态，“有无无异也”。气是体，具体事物是用，是气运动变化的产物。

船山除了从理气、道器、体用等方面对程朱进行了批判外，还在有无、虚实、动静等多方面开展了这种批判。整个批判不仅达到了他所处时代的高度，而且始终是围绕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这个要害问题进行的。

三、朴素唯物论与朴素辩证法的结合使唯物主义在各方面得到更好的贯彻

在中国古典哲学史上，从管仲的《水地篇》开始，不乏朴素唯物主义篇章，自老子《道德经》以后，朴素辩证法的论述，也屡见不鲜，但是，将二者结合起来，船山却是首屈一指的。

张载在《正蒙》中，也为这种结合奠定了基础。他明确提出了“一物两体，气也”的朴素唯物辩证法思想，强调“动非自外”的内因论，甚至认为事物的运动变化有“渐”“著”两种形式，“变，言其著，化，言其渐”，有“顺而不妄”的客观规律。正因此，世界万物是“变化日新”的。王船山对张载这些思想，作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挥，并以此对程朱理学等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首先，船山强调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统一体。阴阳对立是气“固有之蕴”，是气的本性。不仅气这个本体是这样，而且由气产生的万物也是这样。万物虽“无定情”、“无定状”，千差万别，但都是阴阳统一，“阴阳行乎万物之中”。他对阴阳的特点及相互关系，又作了具体的探讨。认为对立双方必须存在于统一体中，“非有一则无雨也”，“一之体立，故两之用行”。没有统一体，对立双方无从发生作用，“非阴阳判离，各自孳生其类。故独阴不成，独阳不生”。这种阴阳矛盾双方既是相互对立、冲突的：“阴阳具于太虚因蕴之中，其一阴一阳，

或动或静，相与摩荡”；又是相互渗透贯通、相互依存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从气本体到人以至草木鱼鸟天下万物“无孤阳之物，亦无孤阴之物”。这种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阴阳，不断“相荡”“相摩”，互相作用，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其必然之理势”。船山以此批评周敦颐和朱熹的唯心主义。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朱熹对它的解释，都把“太极”说成一个不包含任何对立的、绝对静止的精神本体。由这样的本体产生动静，然后才有对立，有发展。船山认为这是荒谬的：“误解太极图者，谓太极本未有阴阳，因动而始生阳，静而始生阴”。不知阴阳“乃固有之蕴”，是气的本性。脱离物质讲动静、讲阴阳是错误的，“动静者即此阴阳之动静”。朱熹这样脱离物质的阴阳讲动静，和老子的“有生于无”是一样的；“本无二气，由动静而生，如老氏之说也”。

其次，船山基于对事物矛盾本性的分析，进一步提出了他的运动观，认为运动是物质的本性。其根源就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一气之中，二端既肇，摩之烫之，而变化无穷”，总之“天下万变，而要归于两端”（《老子衍》）。为什么阴阳斗争会出现不同的事物？这是由阴阳对立的双方谁处于主导地位，谁处于辅助地位决定的。譬如飘扬上升的云，是阴阳对立的统一体，只是阳居于主导地位；下降凝集在地上的水，也是阴阳对立的统一体，只是阴居于主导地位。“阳之清，引阴以偕升，阴之浊，挟阳以俱降”，“以其从容渐散轻清不聚者为阳，虽含阴气亦阳也；其聚于地中与地为体者为阴，虽合阳气亦阴也。凡阴阳之名虽不一，阴亦有阴阳，阳亦有阴阳，非判然二物，终不相杂之谓”。并且，矛盾双方地位“权无主辅”，没有固定的主辅地位，二者地位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他不仅指出“动非自外”，较深刻地分析了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而且进一步论述了运动与静止的关系。认为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例如，由静止变为行走，这行走是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动动也”；由行走变为静止，这静止也是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静亦动也”。总之，“静者静动，非不动也”（《思问录》内篇），“动静皆动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十）。那种认为“静则废动”的观点是“违性而失其神也”，违反事物本性的。在强调运动的绝对性时，并不否定静止的作用，“动有动之用，静有静之质”，静止是物质分化形成“物我之万象”的条件：“二气之动，交感而生，凝滞而成物我之万象”，事物运动变化，有“质日代，而形如一”（《思问录》外篇）的量变，发展到一定阶段，有“变而生彼”的质变。

他正是以这种运动观，批判了程朱“理主动静”，否定运动是物质的本质属性；“废然无动”，否定运动绝对性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运动观。

再有，船山在这种运动观基础上，又进一步阐述了张载“变化日新”的观点，把“荣枯代谢而弥见其新”，视为宇宙根本法则，因此，强调“推故而别致其新”（《周易外传》卷二）使他的哲学观点具有其特有的战斗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客观物质世界既是物质的，又是辩证的。只坚持唯物论，不坚持辩证法，或者只坚持辩证法，不坚持唯物论，都不可能如实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必须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生活在17世纪的王船山，当然不可能懂得这一点，但他从生活实践中，将朴素唯物主义、朴素辩证法，朴素地结合在一起，却是值得书写一笔的。正因为如此，添增了他唯物主义的战斗力，使他对唯心主义的批判，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四、力图堵塞漏洞，防止“一爪落网，全身被俘”

理论斗争中，有一条重要的思维经验教训，在基本观点上的某一失误，就会导致整个理论观点的被否定。“一着不慎，全盘皆输”，“一爪落网，全身被俘”。理论上的漏洞，总是给对方以可乘之机，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

张载在阐述“气化说”唯物论时，一方面认为“太虚即气”，“太虚”是万物之源；另一方面又从推崇“太虚”这个本体，走到了贬低具体物质存在的地步，说“运于无形之谓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并提出“凡天地法象，皆神化糟粕”的命题。按照这种万物是气化的观点，即认为在物质世界之上之外有“太虚”本体，逻辑的结论必然认为本体与物质现象是割裂开来的。这种本体既然不同于物质现象，不是物质的，就只能是某种非物质的绝对，与程朱的理为万物之源就相通了。这是张载理论的致命弱点。王船山在注释中，力图纠正张载的错误，他解释说：“日月、风雷、水火、山泽”等万物，一方面都是“气聚”之“客形”；另一方面，“或久或暂”，迟早都要复归于气。这样，就把唯物主义气本体与具体物质现象统一起来了，堵塞了通向唯心主义的漏洞。王船山并以此批评“语寂灭者”，不知物质世界的无限性，“不知不亡之良能”；批评“执有循生者”，不知具体事物的有限性，“据糟粕为常”。二者都是错误的，“其迷均矣”。王船山把张载不妥当的论述，予以抛弃，并别作一番解释发挥，在解释发挥中又对唯心主义作了一番批评，的确是煞费苦心的。

张载一方面说，“太虚即气”，气是阴阳的统一体。照理讲，“太虚”就是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阳为清，阴为浊，太虚就应该是清浊二气的对立统一。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说，“太虚为清”，不包含浊。当清堕落，才变成浊，即“反清为浊”。“浊”是指具体事物，即具体事物是“太虚”的堕落。程朱抓住这一点进行攻击。程颢就说，“或者谓清者神，则浊者非神乎？”朱熹则讲得更尖锐，“‘清虚一大’形容道体如此，道兼虚实清浊言，虚只说得一边”。程朱

的意思是说，你那个“太虚即气”的本体论不能成立，“立清虚一大恐未安”，应该是“气之上”“太虚之上”更有“理”，“理”为万物之源。王船山则针对程朱的攻击，注解说，“太虚”包含清与浊。所谓“反清为浊”的“反”，不是清的堕落，是指气的屈伸聚散，运动变化。“清”是指气未聚于“太虚”的状态，“浊”是指气“聚”于“太虚”的状态，两者都是“气”“太虚”的存在状态。“太虚”是阴阳二气或清浊二气的对立统一。经王船山的解释，本体和现象又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统一。

在《张子正蒙注》一书中，王船山十分注意纠正张载某些观点的不正确和某些表述的不确切。或者指出：“此义未安”“于理未安”；或者指出：“张子之论踳矣”；或者指出：“正蒙一书，唯此为疑，善读者存之，以待论也”。王船山堵塞张载理论的漏洞，也清楚地告诉人们，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峙，理论上的失足，总是自觉地为唯心主义效劳。所以，坚持唯物主义，千万要注意理论的彻底性。

五、对唯心主义不是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否定，而是注意吸取其某些合理因素

作为明清之际时代精神精华的船山哲学，是对前人思维成果批判继承的产物。宋明理学是这种成果的典型。先秦两汉，儒学盛行。儒学以研究、阐述封建伦理道德为中心内容，符合建立和维护封建制度的要求，但它缺乏抽象的哲理思维和哲学论证。到魏晋隋唐，老庄佛学兴起，提出一系列抽象的哲学命题，注重玄思哲理，一改先秦两汉儒学的状况，但它比较忽视封建伦理道德的阐发，不能满足封建统治的需要，无法成为封建社会理想的意识形态。思维的轨迹发展到宋明时期，既一改儒学抽象思维的状况，又克服老庄置封建伦理道德于不顾的弱点，取二者之所长，酝酿、形成一种以封建伦理道德为中心，从哲学高度立论和解决问题的宋明理学。宋明时期，不管是唯心主义哲学家，还是唯物主义哲学家都出入佛老后归儒学。他们的思想体系都具有对儒、佛、老、庄等哲学批判继承的特点，王船山哲学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不同于宋明时期其他哲学家之点，就在于他在这方面做得更为自觉和出色。

程朱以理为气和万物的本源，从认识论根源来讲，实际上是从夸大认识的一个环节陷入谬误的。主观是客观的反映，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但不同于客观方法。在客观事物中，个别与一般、现象与规律是不可分的，但是在主观抽象思维中二者却是可以分开的。人们认识从个别到一般，从众多事物的运动变化揭示出事物发展的规律，如果在抽象思维中将一般与个别、规律与现象割裂开来，使“一般”脱离个别，使“规律”脱离具体事物，然后加以

绝对化，将“一般”或“规律”看成决定事物的、独立的精神实体，这就在认识上走向谬误，陷入唯心主义了。但是，就“一般”“规律”的客观存在来讲，这种认识有其积极的一面。王船山在反对程朱以理为本的谬误时，并不否定这个概念，并不否定理的客观存在，并不否定理的实际作用，而是认定理是气之理，是事物的运动变化规律。这样“理”就成为他的以气为本体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王船山虽然坚决反对程朱宣扬绝对静止的“太极”“理”“产生阴阳动静”的形而上学观点，但对程朱等唯心主义在阐述中所提出的“物必有对”“物极必反”“静中便有动，动中自有静”以及“一动一静互为其根”的等辩证法因素，并没有忽视，而是加以唯物主义改造，使歪曲反映事物发展的某些辩证观点，建立在“太虚本动”的唯物主义基础上；王船山从矛盾、运动是物质世界固有的属性的根本观点出发，利用前人的认识成果，丰富和阐述了自己的辩证法思想。

程朱沿用佛教“能”与“所”即主观与客观的概念，并以此宣扬其唯心主义认识论。王船山对朱熹进行批驳：“朱子所云‘非以一心求一动，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亦觉与释氏‘无能、无所’，‘最初一念，即证菩提’，‘因地果生’之说无以别。”（《读四书大全说·孟子·告子上篇》）但是王船山对“能”“所”观并不全部否定，而给予具体分析。他认为程朱、佛教把作为主观认识的“能”与作为客观认识对象的“所”加以区分是正确的。他说“‘能’、‘所’之分，夫固有之，释氏分授之名，亦非诬也”。（《尚书引义·召诰无逸》）问题是如何认识二者的相互关系。他针对程朱等唯心主义颠倒“能”“所”关系，混淆“能”“所”界限的错误，对二者内涵及其关系给予唯物主义的改造，重新加以界说。他认为“‘所’不在内”，即认识对象是独立于人脑之外的客观存在，而不是存在于人脑之内的主观的东西；“‘能’不在外”，即认识来源于感官和心思活动。主观的认识只能反映客观，不能创造客观，即认识是主观的，不等于客观的实在，反映者不等于被反映者，能与所有区别，它们是客观与主观的关系。不能“消所以入能”，用主观去吞没客观事物所引起的，没有“所”，就谈不上“能”，客观对象是第一性的；但“能必副其所”，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对象，才是正确的、并且认识也不完全是消极被动的，即“境之俟用者曰‘所’，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曰‘能’”。（《尚书引人·召浩无逸》）“所”是等待人们认识和利用的客观对象，而“能”应该是“用之加乎境”，作用于客观对象，而“有功者”取得功效的主观认识。王船山从对唯心主义“能”“所”观改造中，阐发了自己的唯物主义“能”“所”观，既坚持了反映论原则，又明确反对了“悬镜照物”的消极反映论观点。

唯心主义是人类认识之树上的不结果的花。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批判，要正确地进行，不能简单地对待，因为唯心主义提出的某些问题和对唯物主义的某些诘难，有时恰恰是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忽视或薄弱而需重视和加强的环节；唯心主义虽然从总体上说是错误的，但是对具体问题的论述常常有其积极成果。只有在批判中，善于吸取其积极成果，才能克敌制胜，高超过人。王船山的唯物主义，之所以称为宋明哲学的总结，之所以具有它特有的战斗性，应该说这也是重要的原因所在。

注　释

文中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张子正蒙注》一书。

魏源诗艺浅议

伏家芬

《湖南通志》魏源传云："源体貌奇伟，为文下笔千言，雄恣精奥，似先秦诸子，嘉道以来，楚南论诗古文，以源为大宗。"然自清末以来，研究魏源诗作，学界颇有微词。辗转因袭，影响后来学者。先是，郭嵩焘为魏氏《古微堂诗集》作序，盛赞他"为学淹博贯通"，"其诗奇伟"，但又指出："其于古诗人冲夷秀旷，宏逸入神，诚有不足"。这以后，梁启超论当时清末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标举龚定庵（自珍）与魏源二人，谓为开新学术之先河，发新思想之萌蘖，而于诗，却扬龚而抑魏。降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谈到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文学，认为："真正打破清中叶以来传统文学的腐朽局面，首开近代文学风气的人是龚自珍"，而于魏源，虽也承认，"产生进步文学的潮流，龚自珍、魏源开其先路"。然而，除列举他寥寥的几篇名作外，论述他的篇幅，只有几行文字，不及龚的十分之一。自此以后，从各种大学文科教材的编写，至各种文学史著述，魏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每况愈下，例如：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介绍作者生平就说：魏源诗"因用典过多，故不免艰深晦涩，而大部分吟咏山水之作，则更缺乏内容"。邓魁英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则说："魏源有些诗存在用典冷僻，晦涩难懂的缺点"。钱仲联选《清诗三百首》，龚自珍入选八首，魏源一首也没有。晚近研读魏源诗作的逐渐增多，却又有人说：魏诗"有失粗犷"，"或失粘失对"。

其实，通观魏源的全部诗作（共约1750首），从整体而言，"古质如谣，明畅如策，栉比如赋"，"别为一格"（罗汝怀《古微堂诗集序》）。且"雄浑似杜陵，奥衍似昌黎，傲兀似山谷，奇险似东坡，集古贤之长而自成一家"（语出《湘雅摭残》第49页），可谓的评。何绍基称其"如雷电倏忽，金石争鸣，包孕明感。挥洒万有"。郭嵩焘论魏诗，也曾说："人知其以经济名世，不知其能诗。而先生之诗顾最夥。……盖先生之心，平视唐宋以来作者，负才以与之角，将以极古今文字之变，自发其嵚崎历落之气。每有所作，奇古峭厉，倏忽

变化，不可端倪。又深入佛理，清转华妙，超悟尘表。而其脉络之输委，文词之映合，一出于温纯质实，无有幽深扞格使人疑眩者。”（见《古微堂诗集序》）这种评价，也是比较全面而公允的。王湘绮则曰：“诗法既穷，无可生新，……不失古格而出新意，其魏（源）邓（辅纶）乎？两君并出邵阳，殆地灵也。”又曰：“零陵作者，三百年来，前有船山，后有魏、邓，鄙人资之。”（见《中国历代文论选·诗法一首示黄生》）湘绮平生自视极高，目无余子，而于魏源，独相推许。张维屏著《清代诗人艺谈录》，评介魏源云：“默深学问渊博，才气纵横，其性情兀傲，几若目中无人。……其诗文发扬纵肆，字向纸上皆轩昂，一代之奇才也。”张与魏同时人，交往甚深，读《艺谈录》，可见此公乃真知魏者。

由此观之，魏氏诗作，大醇小疵，瑕不掩瑜，先辈王啸苏教授有云：“魏氏才大，不屑细求。”此言得之。下面试就研究魏诗的几种意见，作一剖析。

意见之一：认为“魏诗用典过多，艰深晦塞”

诗文中运用典故，使意思含蓄婉转，包含更丰富的内容，引起读者更广泛的联想。所以自古以来，援古事以证今，取旧词以譬义，无代无之。胡适说：“以典代言，其妙处，终在不失设譬比方之原意，为文体所限，故譬喻变而为称代耳。”“用典之工者，所谓用字简而涵义多者也。”他甚至说：“引史事与今议论之事相比较，不可谓为用典也。如老杜诗云：‘未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妲。’此非用典也。”“引古人作比，此亦非用典也。杜诗云：‘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此乃以古人比今人，非用典也。”以此衡量魏氏之诗，如《寰海十章》，久已脍炙人口，传诵不衰。其四云：“谁奏中宵秘密章，不成荣虢不汪黄。已闻狐鼠神丛托，那望鲸鲵澥渤攘。功罪三朝云变幻，战和两议镬冰汤。安邦自是诸刘事，绛灌何能赞塞防。”这一组诗，自注作于道光二十年，但从内容看，当作于道光二十一年，那时，作者在两江总督裕谦的幕府中，参与了浙东抗英战役，对鸦片战争时期内外情况有较多的了解。诗中“荣”指荣夷公，典出《国语·周语》，“虢”指虢石父，典出《史记·周本纪》，都是佞巧好利的奸臣。汪指汪伯彦，黄指黄潜善，二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典出《宋史》。“鲸鲵”，语出《左传》。“澥渤”，澥通海，即渤海，语出司马相如《子虚赋》。“诸刘”喻指满洲贵族，“绛灌”喻指林则徐等人，读过《史》《汉》的人，都知道它们的出处。此诗用典，十分贴切。对当时清廷政策变化无常，以及只信任权佞，不信任林则徐等爱国大臣的作法，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寰海十章》其五云：“揖寇原期寝寇氛，力翻边案撤边军。但师卖塞牛僧儒，新换登坛马服君。化雪尽悲猿鹤骨，檄潮但草鳄鱼文。若非鲍老当场日，肯信巾贻

仲达裙。”其中牛僧孺故事，见《唐书、牛僧孺传》，说琦善对敌人采取投降政策，像牛僧孺一样。马服君故事，见《史记、廉蔺列传》，说琦善到广州，取代林则徐，像赵括取代廉颇一样，“悉更约束，易置军吏”，变更了林则徐等人的抗敌措施，结果导致敌人步步进逼。“猿鹤”，典出《抱朴子》，“鳄鱼文”出《新唐书·韩愈传》，“鲍老当场”引自杨大年《傀儡诗》（见《后山诗话》），“巾贻仲达”，引自《晋书·宣帝纪》，诸葛亮赠遗司马懿巾帼妇人之饰的故事。此诗通过用典，揭露并严厉地斥责了琦善等人腐朽无能、哄骗人民、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种种罪行，使事如系风投影，精妙明密。拿以提倡白话文著称的胡适的尺子来衡量，较之他所称引的杜诗名句，又不为用典。盖其“才力有余，多超迈警卓之语”（李慈铭《越缦堂诗话》），借古喻今，天然浑厚，如是而已，岂有他哉！

看来，读者谈诗，也有一个文化素质的问题，不谙格律，便说“镣铐”可憎，读书太少，却怪文词深奥。昔江亢虎代华侨诔陈英士文，有“未悬太白，先坏长城。世无鉏麑，乃戕赵卿”，胡适说：“四句余极喜之，所用赵宣子一典，甚工切也。”又王国维咏史诗，有“狼虎在堂室，徙戎复何补？神州遂陆沉，百年委榛莽。寄语桓元子，莫罪王夷甫。”胡适不以为“用典冷僻”，“晦涩艰深”，却评曰：“此亦可谓使事之工者矣。”以上所引胡适的观点，都来自1917年1月他所写的名篇《文学改良刍议》。要知道，当时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时期。再说，郭嵩焘生于清末，为魏源作序，尚以为魏诗“温纯质实。无有幽深扞格，使人疑眩者。”何以降至建国后20世纪，反以这种稍涉典故的文字，为“冷僻”，为“晦涩”，为“艰深”；岂非数典而忘某祖？言之痛心。抑有进者，魏源生在“避席畏闻文字狱”的清代，为文用点曲笔，指桑骂槐，借古讽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杨钧有言：“人生于世，有顺有逆，有吉有凶。若忤于时，只足致祸，不得不借物以明志，言远以喻近，非徒吟咏以骋才思也。”（《草堂之灵》第207页）魏源毕生坎坷，当年写诗的心态，大概也是如此。

意见之二：认为“魏诗吟咏山水，缺乏内容”

魏源写诗，将山水诗与感时感事诗，等量齐观，旨在借物言志，以近喻远。其《与陈起书书》云：“诗以言志，取达性情为上。……集中咏怀诗多（指陈之诗集），山水诗少；离别诗多，关系诗少。蜀山之高，沧海之阔，以至桂林阳朔奇秀甲天下，一叶扁舟，溯洄其间，何患清妙之气不勃勃腕下？又如乡俗之淳漓，年荒钱荒之得失，近来兵事之琐尾，作歌志衷，以备采风，何患律诗不与杜陵媲美？昔人‘时非天宝，位非拾遗’之诮，谓泛论朝政，出位言

高；非谓家乡切虑，民风谣俗，亦在所禁，试问国风采自何人耶?”（《魏源师友录》第 43 页）

魏源山水诗，有几个特点：一是博采前人描山画水的艺术经验，把古代山水诗选境写意与状景图貌结合起来，发挥到了极致。徐世昌认为魏氏“雕镌造化，缒险凿幽之笔，能使山无遁形，水无匿响”（《晚晴簃诗汇》卷 147）。例如他写普陀观潮、钱塘观潮、金焦观潮，便各具特色。又如《天台石梁雨后观瀑歌》，描绘雨瀑壮观、月瀑妙境和冰瀑奇姿，信笔写来，惟意所之，写尽了石梁瀑布在不同天象与季节中的变相。二是结合政务活动，考察山脉河流的历史与现状，以其研究所得，渗透到艺术构思和具体描写中，从宏观上概括出各地山川的自然地貌特征。如上述《天台观瀑歌》，起笔便写：“雁激之瀑烟苍苍，中条之瀑雷硠硠，匡庐之瀑浩浩如河江，惟有天台之瀑不奇在瀑在石梁，如人侧卧一肱张。”他的诗笔，成功地捕捉到了各地瀑布迥然不同的感受。他又善于总结、整理观察心得，如写山，他说：“恒山如行，岱山如坐，华山如立，嵩山如卧。惟有南岳独如飞，朱鸟展翅如云大”（《衡岳吟》）。又说：“海山微茫而隐约，江山屹立而秀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苍茫而磊落”。如写水，《三湘棹歌》之自序云：“水经注不言潇水，而柳宗元别指一水为潇湘，遂以蒸湘为潇湘，而三湘仅存其二矣。予生长三湘，溯洄云水，爰为棹歌三章，以正其失，且寄湖山乡国之思。”其后三题，一咏资湘，（旁注：即深湘）；二咏蒸湘；三咏沅湘。这样，便纠正了前人之失，为三湘正了名。三是继承了杜甫、陆游的传统，以山水名胜古迹为题，既穷形尽相地描写景物，又淋淳酣畅地铺叙时事，使山水诗带有史诗的性质。例如《普陀观潮行》，便借潮音洞僧之口，话沧桑之浩劫：“……僧言普陀虽岛寺，荷夷英夷两窥伺，台湾舟山割据还，归帆辄舣普陀次。炮艘倏若飓潮至，不干老僧坐禅事，荷兰夷寇当国初，敕空岛寺迁僧徒。沿海徙界三十里，更无渔艇与樵苏。海水自当广长舌，供养独有群龙趋。岛民徙尽寇影绝，十载海禁空天吴。舟山地讵台湾比，弹丸亦若普陀尔。与其瓯脱骚中原，盍弃珠崖界儋耳，清野坚壁令风雷，岛寇负隅堪饿死。……”所言当年列强“窥伺”与“割据”情事，皆实录也。又如《秦淮灯船引》描写的是秦淮河风光，指斥的却是鸦片战争时，清廷丧权辱国，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当年“炮雷江口震天来”，“圌山已失京口破”，面对燕子矶头的“猰貐”，朱雀船外的“鲸鳄”，那些清朝的达官权贵，害怕“七万里外”伸来的“红毛”。“惊得灯船如雨散”，“游船变作逃船贵”，纷纷如鸟兽散。然后是，割地赔款，屈膝求和，“百万金缯万虏欢”，“倾得蚊宫宝藏完，保障半壁东南土”；然后是，不知亡国恨，犹唱后庭花，依然歌舞升平。“但看封豕离大江，依然画鹢出横塘。玉树重开花月夜，羯鼓宁惊霓羽裳？鲸波化作桃花浪，兵气销为明月光。阿芙蓉风十里香，销金锅里黄粱场。”依然过着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作者笔酣墨饱，借秦淮河一角，痛快淋漓地反映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四是魏氏山水诗表现领域空前扩大，将外界的新事物、新思想引进篇什。如《香港岛观海市歌》，序言云：“香港岛在广东香山县南、绿水洋中，诸屿环峙，藏风宜泊，故英夷雄踞之。”《澳门花园听夷女洋琴用》可算即事抒怀，起首几句描写山水：“天风吹我大西洋，谁知西洋即在澳门之岛南海旁。怪石磊磊木千章，园与海涛隔一墙。”这两首诗将香港、澳门、大西洋，介绍给闭关锁国的大陆读者，眼界为之一开。被梁启超誉为“中土言西学者所自出”的魏氏，在他的笔下，“火轮”、“炮雷”、“洋炮”、“洋船”、“炮艘”、“阿芙蓉”、“琉球”、“日本”、“荷兰”、“英吉利”、“葡萄亚”等新词，纷纷涌入山水诗中，自然意象与人文意象交织在一起，使得诗篇绚丽多姿，虎虎有生气。此外，魏氏众多的山水诗，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容量，以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入诗，创作不少长篇巨制，以抒情议论的笔墨入诗，展示了山水的博大形象，绘出了一幅幅明山秀水的长卷。

总之，魏源山水诗，绝非缺乏内容，而是内涵十分丰富，未可等闲视之。林昌彝认为魏源是“得太白之高奇者”，推崇他的山水诗，“多得山之幽，山之骨，而非山之皮相。”（《海天琴思续录》卷三）王湘绮云：“古今华山诗，推魏默深，余诗较从容（指四岳诗），亦稍胜，本朝湘中两诗雄（指魏氏与邓辅轮）皆出邵阳，亦一奇云”（见《王湘绮年谱》卷五），他对魏氏的山水诗持肯定态度。郭嵩焘云：“默深先生……游山诗，山水草木之奇丽，云烟之变幻，滃然喷起于纸上，奇情诡趣，奔赴交会。”（见《古微堂诗集序》）对魏源山水诗的评价，也是很高的。

意见之三：认为“魏诗不注意粘谐”

平仄规律是近代格律诗中最重要的一条。明人陆时雍说：“凡情无奇而自佳，景不丽而自妙者，韵使之也。”这里所讲的“韵”，包括了韵脚在内的平仄。协了平仄，就自然和谐而有韵味，但是，唐代诗人，为了追求律诗的音调铿锵，气势雄壮，又有意识地打破自己建立的平仄规律，打破这种习惯与和谐，写入一些不尽合律的拗句，杜诗七律如《即事》《九日》《愁》《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所思》《滟滪》《白帝城最高楼》，五律如《月夜》《春宿左省》《送远》，皆拗律。其中有的被后人称为“超绝”，如《愁》通首拗句，失粘失对，自注曰“强戏为吴体”。有的被后人称为“冥心刻骨，奇险至十二三分者”，如《白帝城最高楼》。说明这些都是杜甫惨淡经营的作品，拗体确实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此外，如王维、孟浩然，五律均有拗体。这

些拗体诗——或者说参了拗句的诗，尽管失谐失粘，（有的救拗，有的不救），却另有一种奇峭挺拔、矫然绝俗的独特风格，这一特点，对宋人特别是对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派诗人，产生了巨大影响，被继承下来，形成一种别具魅力的诗风，自成流派。

魏氏亦运用拗体。魏氏诗如《岳麓介景台夜作》："郢和岂无侣，锺弦良费寻。领妙不须众，洌泉虚自斟。微风动孤籁，淡月生遥岑。咫尺无能共，徒劳猿鸟音。"第三句失粘。又《江行杂诗》之五："行尽东南万里川，全家无恙五湖船。范蠡罗裳天上坐，淮南鸡犬镜间仙。空中云水舟为界，水底鱼龙夜有天。来自潇湘清绝处，可曾楚树让吴烟。"第三句失粘。七律拗句如："大江东去风月白，春色南来天地青"（《大江阻风》）。"当时聚米画沙客，重向寒涛吊朔风"（《秋兴后》）。"左泉右泉照石影，出谷入谷聆泉声。远石缥青近石碧，大泉钟声小泉琴……。"（《自天日至径山寺》）七律宛如古风。这些诗，诚如宋人蔡居厚评老杜之戏为吴体所言："虽若为戏，然不害其格力。"戛戛独造，转增其奇古峭厉。莫砺锋说："律诗的平仄和对仗格律，实质上是一种以对称为原则的结构美，它的长处是和谐工整，它的可能产生的缺点是圆熟、滑易。为了避免这些缺点，能够采取的补救办法，就是局部地打破格律的束缚，在基本对称的结构中有意识地搀入一些不对称的因素，杜甫在律诗中引入拗句，正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被开拓的诗世界》第110页）魏源继承了老杜的这一传统。

这种打破常规的做法，是符合魏源的傲兀性格与文学上的叛逆精神的，他在《定庵文录序》中论文章之道，曾说："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龚自珍全集》附录）他在《默觚》里还说过："君子学古之道，犹食笋而去其箨也。"（《默觚》下·治篇五）。写诗而引入拗句，有意使声律失对失粘，正是贯彻他这种文学主张的举措。《听松庐诗话》云："魏默深、龚定庵皆奇才，然使之得位持权，其刚愎自用，亦宋代王安石也。"（张维屏著《清代诗人艺谈录》）看来，魏源是有主见、有个性的，这才被比之"拗相公"，发而为诗，诗中自然有拗。何绍基称魏源为"老默"，知交甚深，评价其诗曰："懒阅遗山乐府词，试斟老友默深诗。江山幽异非人测，何苦穷将拗笔追"（《何绍基诗文集·订默深诗》）。拗相公写诗，其笔焉得不拗？其句焉得不拗？

近读台湾姚琮《味笋斋诗话》云："杜诗拗句不到廿首，不难熟读，而得其用。近来台湾诗人，喜作七律而欠此体，是少变化也。黄山谷喜作此体。同光间，有江韬叔者，专作此体成名，以杜诗法多门，学其一法，即可传也。"其实，大陆何尝不是喜作七律而少拗体，倘若自己不能作，而又厚诬前贤以不

协律，岂不大谬？

意见之四：认为"与龚相较，魏诗无特色"

近人陈声聪云："魏源与龚自珍齐名，喜谈时政，诗奥衍，气势磅礴，亦近代一大家"（《兼于阁诗话》）。以我看来，龚诗固佳，魏诗亦有特色。上文所述各节已略见端倪，然尚未尽其语言之特色，下面就魏诗的语言特色谈三点：

第一、重言叠唱

重言叠唱是民歌特有的语言艺术，肇始于诗经的风雅。章叠如《螽斯》；句叠如《江有汜》；字叠如"要要草虫"，"维叶生姜""桃之夭夭"等。移之近体诗，七律如白居易《书天竺寺》："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专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声下界闻。遥想吾师行乐处，香飘桂子落纷纷。"五律如杜甫《江亭》"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七绝如王荆公《南浦》"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刘驾《春夜》"近来欲睡泽难睡，夜夜夜深闻子规。"古风如元镇《田家词》"牛叱叱，田确确，旱块敲牛蹄趵趵。种得官仓珠颗谷。六十年来兵簇簇，月月食粮车辘辘"。这些诗都富有民歌情调，活字活句，有极强的语言表现力。魏源继承和发扬了它，使自己的篇章增色不少。魏诗重言叠唱有：

（1）叠字

"落落开开花作市，青青紫紫草如城"（偶感）。"门前潮汐家家海，檐际榕棉寺寺云"（楚粤归舟）。"雨雨风风春十里，花花草草节清明"（扬州病起）。"蒹叶苍苍霜结露，伊人渺渺恨还用"（秋试下第）。"蓬蓬勃勃势，整整斜斜影，鳞鳞畾畾形，无一得自逞"（天台纪游）。"崖高高，水深深，天苍苍，地阴阴，万松万石风前吟"（游山后吟）。"一峰峰上峰"（西天目）"地地矗立天天埋"（桂林阳朔山水歌）。"船船灯火船船笛，步步楼台步步花"（扬州画舫曲）。

（2）顶针

"夜风吹天天忽冥"（大雪行），"一步一境境一色"（桂林阳湖山水歌），"山影化云云化无"（西湖夜月吟），"城头接江江水立"（钱塘江行书事），"古心感帝帝梦通"（椒山琴和陈太初修撰），"苍颉哭天天不晓"（观物吟）。

（3）重沓

"关西出将倍关东"（秦中杂感），"边才不与克才妨"（秦中杂感），"画船直并画楼高"（金陵怀古），"欲师夷技收夷用"（寰海），"大漏卮兼小漏卮"（秋兴），"力翻边案撤边军"（寰海），"君昔并城我剑城"（送李春湖），"三面团山一面墉"（秋兴后），"溯流帆重顺流轻"（楚粤归舟纪游）。

（4）回环

“晴多望雨雨祈晴”（登高邮），“湖外青山山外湖”（扬州画舫曲），“忽奏风雷驱寇贼，又张寇贼剧风雷”（秋兴后），“秋花不及春花艳，春花不及秋花健”（读书吟示儿耆），“君生妾死君休问，妾死君生君不知”（京口琴娘曲）。

（5）对举

“山外有山山夹水、峰头飞水水吞峰”（桂林阳朔），“杨柳覆烟烟覆艇，楼台依水水依山”（扬州画舫曲），“人归归燕后，帆落落花前”（春尽）。以上三联又是顶针格。“平世务耕非务战，只今防汉胜防江”（江行）。“至今汉月犹秦月，更觉潼关胜谷关”（秦中）。“堡塞千峰千战垒，犊刀万谷万屯田”（秦中杂感）。“五行水气销金气，四列南条变北条”（秋兴）。“荒年谷贸丰年玉，下赋田征上赋钱”（秋兴）。“降虎降龙衣钵在，功人小狗指挥疑”（秋兴后）。“去年争坝如争命，此日调佚如调军”（将去兴化）。“浪攻浪款何如守，筹款筹兵贵用才”（寰海后）。“鹤尽羽书风尽檄，儿谈海国婢谈兵”（寰海后）。“但见无船无树影，不知是水是风声”（楚粤归舟）。“左泉右泉照石影，出谷人谷聆泉声”（自天日至径山寺）。“峰奇石奇松更奇，云飞水飞和山亦飞”（黄山绝顶题文殊院）。“不文不武亦文武，谁仙谁侠英回雄”（题汤雨生双笠图）。“三峰三面接，一岳一石成”（华岳）。“一转一天地，百棹百惊喜”（桂林阳朔山水）。

（6）串句

“青州渡海为营州，冀州之外幽并州”（观往吟）。“六合塔畔舍舟行，……不闻江声闻涧声；人谷九溪十涧更，……不闻人声闻鸟声。参天云树元阴晴，……不闻鸟声闻樵声；再转风幡出塔层，……不闻樵声闻梵声”（理安寺偶题）。“南市罢、农市陈、农市散、军市屯、渔樵耕馌春树帘，画本掩映千百皴”（香港岛观海市歌）。“大山宫小山，大水收小水，大营垒包小营垒，巴峡连营七百里”（桂林阳朔山水歌）。

（7）钩连

“君不见，花时少，实时多，花实时少叶时多，由来草木重干柯。秋花不及春花艳，春花不及秋花健。何况再实之木花不繁，唐开之花春必倦”（读书吟示儿耆）——以“花”字为骨，一线钩连。

（8）层递

“影中之影梦中梦”（香港岛观海市歌），“形复生形影生影”（黄山西海门观落日歌），“神物不神物于物”（题画龙），“神乎鬼乎仙乎才”（新罗山人醉笔墨兰歌）。

魏源运用重言叠唱的艺术手法，表情达意，缀玉连珠，音韵流转，显示了他高度的文学才华与语言表现能力。昔金圣叹评崔颢《黄鹤楼》诗云：“此诗正以浩浩大笔连写三‘黄鹤’字为奇”。魏氏能妙用重言叠唱，正是大手笔也。

第二、虚字斡旋

昔《四溟诗话》评杜诗云：“子美和裴迪早梅相忆之作，两联用二十二虚字，句法老健，意味深长，非巨笔不能到。”杜甫晚年的今体诗，其七律采用虚字斡旋，起开合呼应作用，使篇章出现一气盘旋清新疏淡的韵味。如《又呈吴郎》《江村》《南邻》《舍弟观自蓝田迎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等都有这个特点。一方面“晚节渐于诗律细”，用心越来越精密；另方面，“老去诗篇浑漫与”，诗艺越来越纯熟，虚字斡旋便是体现这两者的结果。

魏源七律如《秦中杂感》之三：“六国南肴控北函，几曾河华扼孱颜。至今汉月犹秦月，更觉潼关胜谷关。间道尚闻商县人，催军屡见禁坑还。书生读史谈形势，果否披图胜陟山”。其中，“几曾”“至今”“更觉”“尚闻”“屡见”“果否”等掺入行间，便觉流转自如，笔墨飞动。其他如《西师》之一，用“见说”“譬从”“奚异”“早辞”“何至”。《西师》之二，用“久已”“一自”“频闻”“远到”“翻教”“谁识”；《寰海后》之二，用“不教”“翻遣”“但令”“得不”“休”“几见”；《寰海后》之八，用“但解”“还闻”“莫言”“谁御”“若非”“犹诧”；《秋兴后》之十二，用“忽奏”“又张”“即今”“曾附”“能”“敢”“不”“此是”等虚字。皆悠扬委曲，畅达有味，各臻其妙。李西涯曰：“诗用实字易，用易虚字难”。魏氏盖以文入诗，以史入诗，驾驭语言，极使转纵横之能事，故能化难为易耳。

第三、俗字俚语入诗

杜诗中如“家家养乌龟，顿顿食黄鱼”，“客睡何曾觉，秋天不肯明”，这类俗字俚语入诗颇多，大致都出于他晚期之今体诗。宋人孙奕评论说：“子美善以方言里谚点化入诗中，词人墨客口不绝谈”。王琪说：“诗家不妨用俗语，尤见功夫。……此点瓦砾为黄金手也”。

魏氏诗中，有新乐府，自言效白香山体，如《江南吟》十章，《都中吟》十三章皆是。其近体诗如“定哀笔削惟关口，官礼经纶笑得皮”（秋兴），“荡荡平平地，青青白白天”（西行杂诗），“不是碑渊海，真成鬼邓林”（碑洞），“大明湖水照，华不注山同”（趵突泉），“小星灯尚明，前溪冻未结。不知前山中，已是一夜雪”（初雪），“少闻鸡声眠，老听鸡声起。千古万代人，消磨数声里”（晓窗），“利舵名帆日夜牵，水行争似陆行便。虽然生死由天定，毕竟多翻浪里船”（叹救生船）。以口头语，道眼前景，变俗为雅，沁人心脾。林昌彝所谓；“扫尽人间脂粉气，粗头乱服也风流”是也。大抵未经人道过、用过

之语，称心而出，运笔抒写，便能生新，此魏氏超越同辈人之处，诚点石成金手也。

综前所述，魏源诗作，过去为其政治思想论著所掩，未能仔细研究，以发扬其固有之光辉。盖学界舆论误导以致之，当前亟宜纠偏，以正视听。近读最近出版的钱仲联编著的《近代诗抄》（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对魏源诗作有较高的评价，入选诗数也越出龚自珍，确实是一种可喜的现象。

最后，我可以数语概括魏源之诗艺，作为本文的结论：善于使事，典雅雍容；模山范水，寄托遥深；拗笔生新，峭厉奇雄；清转华妙，超悟绝尘（郭嵩焘语意，篇幅所限，未作阐述）；重言叠唱，金石争鸣；以虚带实，使转纵横；变俗为雅，雅俗同欣；方龚（自珍）比邓（辅纶），卓卓代雄！

湖南维新运动的历史地位

刘泱泱

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救亡图强的爱国运动，一次资产阶级民主性的政治改革运动，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在这次维新运动中，湖南是“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①]；其激进的思想解放，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湖南维新运动又是近代湖南由守旧到革新的重大转折，成为湖南近代化的开端。

一、“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湖南是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这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论断，完全符合历史实际。

首先，湖南是当时全国各省中主要省政官员支持维新变法的惟一省份。1895年9月，陈宝箴受命为湖南巡抚。他深感“国势不振极矣，非扫除敝政，兴起人才，与天下更始，无以图存”，决心以湖南为基地，“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根基”[②]。在此前一年秋，江标出任湖南学政。他“以变士风开辟新治为己任”[③]。1897年6月，黄遵宪受委为湖南盐法长宝道，兼署湖南按察使。他见闻广博，思想开放，支持并参与新政不遗余力，将地方自治思想贯彻于湖南新政的方方面面。1897年8月，徐仁铸接任湖南学政（江标任满，仍暂留湘）。他“继江建霞（江标字）学使的轨辙，又迈进了一大步”[④]，大力提倡新学，支持新政，举荐人才。这样，以巡抚陈宝箴为首，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徐仁铸等紧密配合，使湖南省政领导体制面目一新，充满活力。这对湖南维新运动的兴起并迅速推向高潮，是至为重要的。

第二，甲午战争失败后，湖南强烈要求救亡、变法的士风民气高昂到了极点。甲午战争失败，对湖南的震撼极为强烈。因为湖南是湘军的故乡，湖南人因湘军的兴盛曾生发出前所未有的荣誉感和自负感，虚骄之气，不可一世。而今，甲午之战，淮军摧枯拉朽，湘军竟也遭致惨败。这使全国上下大失所望，更使自负的湖南人震惊莫名。在虚骄之气遭到打击的同时，湖南人士并油然产

生出一种沉重的负罪感。所幸而又可贵的是，湖南人并没有因失败而气馁，因负罪而沮丧，而是像沉睡的巨人被当头棒喝警醒一样，带着失败和耻辱的刺激，更加强化了拯救国家、民族的责任心和自信心。他们表示："救中国从湖南始。"并且坚信："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5]很快，在原来"以守旧闭化名天下"的湖南境内，形成了"人思自奋，家议维新"的生机勃勃的局面，"且风气之开，几为各行省冠"[6]。这种带有广泛群众性的强烈要求救亡、变法的士风民气，成为湖南维新运动迅速兴起并取得卓越成绩的社会基础。

第三，维新运动期间，湖南"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7]。"时湖南官吏，多开明之士"[8]。在他们的倡导和支持下，特别是在强烈要求救亡、变法的士风民气的激荡和哺育下，湖南涌现出一大批头角峥嵘的维新志士，如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欧阳中鹄、蒋德钧、杨毓麟、樊锥、易鼐、毕永年、沈荩等。其人数之多，影响之广，居全国之冠。不仅如此，湖南风气的开化，大批维新志士的涌现，还对全国各地亟图施展作为的志士仁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纷纷来到湖南，从而出现了"志士渐集于湘楚"[9]的可喜局面。省政官员层，陈宝箴是江西人，黄遵宪是广东人，江标、徐仁铸是江苏人，他们属清政府委派。各地慕风和应邀来湖南的维新志士则有：陈三立，江西人，陈宝箴子，留湘赞画新政；梁启超，广东人，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韩文举、欧榘甲、叶觉迈，均广东人，同任时务学堂分教习；李维格，江苏人，时务学堂西文总教习；等等。湖南人才群起，各省志士又荟萃湖南，共同凭借湖南这个生机盎然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有声有色的维新话剧。

第四，湖南维新运动成绩斐然，影响卓著。1895年，谭嗣同、唐才常、欧阳中鹄于浏阳设立算学社，一年后改建为算学馆。同年，湖南和丰火柴公司创办。1896年，湖南矿务总局成立，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宁乡清溪煤矿开办，又于省城设立阜南官钱局。1897年，校经学会成立；《湘学报》（旬刊）创刊；湘鄂间电线架成，开设电报局；时务学堂创办；平江黄金洞金矿、益阳板溪锑矿、新化铝矿山锑矿、湖南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等次第开办。1898年，创建湖南新军，改省城求贤书院为武备学堂；创设保卫局和迁善所；设立课吏馆；南学会成立，定期开讲；《湘报》（日报）创办；省会不缠足会、延年会、公法学会、学战会、法律学会、积益学会、公理学会以及一些府县的任学会（衡州）、舆算学会（郴州）、明达学会（常德）、群萌学会（浏阳）、致用学会（龙阳）、三江学会（会同）纷纷成立；议筑铁路；湘鄂善后轮船局开业；化学制造公司创办。不难看出，湖南维新运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起步早。1895年《马关条约》后，就不仅在理论宣传上，而且从实际措施上开始发端。二是

兴起快。至1897年冬时务学堂成立，1898年春南学会开讲。已迅速形成高潮。而全国及其他省份，运动高潮则是1898年6月后"百日维新"期间才出现的。三是内容全面，成绩显著。包括经济、政治、宣传组织、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短短两三年间，各项改革有声有色，举国瞩目。此外，还有一个特点是：湖南维新运动高潮期间，新旧斗争十分激烈，维新派内部也发生分化，以致在全国"百日维新"高潮期间，湖南反而呈现退潮。其激烈的新旧斗争，对稍后全国戊戌政变的发生也有一定影响。梁启超就曾说："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戊戌党祸之构成，此实一重要原因也。"[10]

二、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

毛泽东曾指出：在近代前期，为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实现救亡图强，"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11]。这里，进化论、天赋人权论都是戊戌维新志士所引进或着力宣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方案虽为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所首倡，亦萌芽于维新运动时期，而阐发、完善于辛亥革命前后；维新派所宣传和追求的君主立宪，同样属于资产阶级政体的一种形式，当然也包括在上述"等项"政治方案之内。因而，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在这一思想解放运动中，湖南除一般地宣传资产阶级的民权、平等思想外，特别着力地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彻底否定封建伦常和宣传种族之辨的民族思想，属于维新思想界的激进派。这里，我们可以举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以及樊锥、易鼐等的若干言论，作些说明。

梁启超事后回忆其在湖南时务学堂主讲时的情况说："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倡言革命。"[12]又说："当时吾之所以与诸生语者，非徒心醉民权，抑且于种族之感，言之未尝有讳也。"[13]如他在一学生的札记上加批说："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或几乎息矣。"[14]对清王朝残暴统治表露出强烈不满。

谭嗣同是维新派中最为勇猛陷阵的斗士，梁启超曾盛赞其代表作《仁学》"尽脱旧思想之束缚，戛戛独造，则前清一代未有其比也"[15]。在《仁学》一书中，最震撼人心、令"闻者咋舌"[16]的，是谭嗣同彻底否定封建伦常的"冲决网罗"思想和毫不掩饰的排满言论。《仁学》正文中写道："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夫彼君主犹是耳目手足，非有两头四目而智力出于人人也，亦果何所恃以虐四万万之众哉？则赖乎

早有三纲五伦字样，能制人之身者，兼能制人之心。”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伦常是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他还写道：“《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剃发之令，所至屠杀掳掠，莫不如是！”[17]矛头显然是直刺清朝统治者。

唐才常是与谭嗣同最为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其思想言论亦是甚为激进的。他痛斥秦以来的君主专制为中国“千百年之大痈，亿兆人之奇瘵”[18]。又说：“夫国者非一人之国，君者非一人之君。吾能使吾君公权于国，公国于天，赫然如俄之大彼得、日本之睦仁，尽变祖宗之成法，与天下更始，则吾虽犯天下之不韪，负天下之恶名，粉骨齑身，所欣慕焉。”[19]反清倾向是很明显的。

樊锥为邵阳南学分会会长，曾在《湘报》发表《开诚篇》《发痼》等文，力主救亡、变法，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他所开的救国药方，是将君权“公之天下”。具体说有五点：一曰“万几决于公论”，即“起民权，撰议院，开国会，以忧危责之四万万而策群”；二曰“四海一心”，即“使人人有自主之权，人人以救亡为是”；三曰“内外一途”，即要求“无满汉之见，无亲疏之见，无京省之见，无远迩之见，人人平等，权权平等”；四曰“洗旧习，从公道”，即除去一切“繁礼细故，猥尊鄙贵，……一革从前，搜索无剩，惟泰西者是效”；五曰“求智识于寰宇”，即主张“厚遣广选”，包括派留学等，并提出“此后一切用人行政，付之国会议院，而无所顾惜”[20]。樊锥的激进言论，受到封建顽固官绅的猛烈攻击。邵阳劣绅还勾结地方官，指樊锥为“乱民”，发布《告白》，将他驱逐出境。

易鼐在戊戌维新期间主要是以在《湘报》发表《中国宜以弱为强说》一文，而震动朝野。该文鲜明地提出了强国的四项主张：“西法与中法相参”；“民权与君权两重”；“中教与西教并行”；“黄人与白人通婚”[21]。措辞激烈，言人所不敢言，引起官方干涉。

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思想解放，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资产阶级民权、平等学说的传播，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做了必要的理论准备。谭嗣同、唐才常等的“冲决网罗”思想和精神以及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猛烈批判，特别是其排满的激烈言论，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直接催化剂。戊戌政变发生，谭嗣同等六君子殉难后，“唐才常愤国事之日非，恸友仇之未报，乃奔走各地，联络同志”[22]，发动了1900年自立军起义。时务学堂学生林圭、秦力山、田邦游、李炳寰、蔡钟浩、蔡钟沅、唐才中、朱茂云等，均成为起义的骨干。此次起义将挽救民族危亡与推翻清朝统治结合在一起，并且采取了武装斗争的形式，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由改良转向革命道路的一个重要环节，对辛亥革命的兴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湖南近代化的开端

众所周知，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国门之后，中国人民在不断进行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统治的同时，从60年代开始，也逐渐推动着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但是，当沿海、沿江各省逐步开放、“洋务运动”搞得热气腾腾的时候，地处内陆的湖南却迟迟无声无息，宛如死水一潭。洋务运动在湖南开展不起来，一无所成，而以崔暕、周汉为代表的封建官绅所大力倡导的反洋教运动却搞得有声有色，一浪高过一浪。甲午战争结束后，维新运动兴起，湖南的面目始为之一新。湖南的改革开放由此起步，湖南的社会近代化也由此起步。关于湖南维新运动中各项改革措施和成就，前已约略述及。为了明了它是湖南近代化的开端，下面分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几个方面再作些说明。

经济方面，近代工矿业和交通业兴起。1895年筹办的和丰火柴公司，是湖南第一家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厂，也是湖南最早的轻工企业。1896年后陆续开办的水口山铅锌矿、黄金洞金矿、锡矿山锑矿及相应的冶炼厂，由于规模较大，且部分或相继使用西法采炼，标志着湖南近代矿业的起步。1897年湖南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开工，是湖南机械工业之滥觞；且由于它一度设厂发电照明，使长沙始有电灯，也成为湖南电力工业的起点。同年湘鄂间电线架成，省城开设电报局，湖南始通电报。1898年湘鄂善后轮船局正式营业，结束了外国轮船独霸湖南内河的局面，湖南近代航运史由此翻开可喜的第一页。

政治方面，出现了带有近代民主色彩的政治机构。这主要是1898年建立的南学会、保卫局和课吏馆。南学会是联络全省官绅、讲求地方自治的政治组织。其成员分议事会友、讲论会友、通讯会友三种。主要活动方式是定期讲演和答问。保卫局为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警察制度而设，是一种由绅民出资、官为督办的警察机构，旨在维护社会秩序，保证新政的顺利推行。课吏馆是专为培训官吏而设立的，宗旨在改造旧官吏，并培养他们致身新政的能力。馆中课程分学校、农工、工程、刑名、缉捕、交涉六类，显然都与新政密切相关，而对愚昧守旧的官则是一种开导和整饬。官吏们在学习新知的同时，也讨论新政。以上政治改革措施，对往后清末预备立宪和民国议会政治，都有一定影响。

文化教育方面，近代学校、新闻报刊等事业发端。1897年，4月，《湘学报》创刊，这是一种旬刊，是湖南境内第一份具有近代文化意义的杂志。同年11月，时务学堂正式开学，这是湖南第一所新式学校，也是国内较早而著有影响的新式学校之一。其课程分“普通学”与“专门学”两种：前者除经史

外，还有公理学和“中外史地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23]；后者包括公法学、掌故学和格算学，均属近代科学知识。时务学堂成为当时维新志士的荟萃之地，其所培养的一批新学士子，后来也大多成为革命和建设的骨干之才。在兴办时务学堂同时，谭嗣同等还主张“兴女学”，提倡男女“平等相均”，反对“重男轻女”。1898年2月南学会开办后，附设藏书楼，购置、收藏新旧图书报刊，供众借阅，实为全省公共图书事业之滥觞。同年3月，《湘报》创刊，这是湖南最早的日报。它以开风气、拓见闻为宗旨，设有论说、奏疏、电旨、公牍、本省新政、各国时事、杂事、商务等栏目，大力宣传救亡、变法，成为当时在湘维新志士的主要舆论阵地，对往后新闻报刊事业的发展也有积极影响。

社会生活方面，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如：轮船航运业的兴起，使近代交通开始从水上起步。不缠足会的设立，女学的提倡，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妇女的解放。新式厂矿、学堂、机关、团体的纷纷设立，使越来越多的人逐步摆脱单家独户的生活方式，饮食的社会化有所发展。西方生活方式也开始传入湖南，省会长沙街头已依稀出现了兼营西餐的饭馆酒楼。民权、平等思想的宣传教育，潜移默化地转变着社会的风尚礼仪和人际关系。相对于政治、经济、文化而言，社会生活的变迁要显得较为滞后和微弱，然而长期密封板结的土地终究开始了松动。

以上说明：戊戌维新运动确是湖南近代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是湖南近代化的开端。尽管这个开端比起全国先进省区来已经晚了30余年，但毕竟使湖南人民洗刷了“以守旧闻天下”的耻辱，且一变而为全国风气最开化的省区之一。从此湖南人民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在接续到来的辛亥革命中，五四运动开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走在时代前列，不断开拓进取，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

注　释

①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13页．
②陈三立．巡抚先府君行状，散原精舍文集，卷五，1922年印本．
③胡思敬．江标传，清代碑传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5页．
④许姬传．戊戌变法侧记，许姬传七十年闻见录，中华书局，年版第1985页．
⑤湖南时务学堂缘起．知新报，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一．
⑥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9、337～342页．
⑦欧阳予倩．上欧阳瓣姜师书序，谭嗣同全集．书简附录．
⑧赵必振．湖南先烈传略·唐佛尘先生传略，未刊稿．
⑨梁启超．谭嗣同传，谭嗣同全集附录．
⑩梁启超．时务学堂札记残卷序，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84页．
⑪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页．
⑫⑮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9、74～76页．
⑬⑭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5、90页．
⑯龙绂瑞．武溪杂忆录．抄本，中称：“《仁学》一出．闻者咋舌。”
⑱⑲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9、164～165页．
⑳樊锥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12页．
㉑㉓湘报．第20、102号．
㉒赵必振．自立会纪实史料．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

谭嗣同仁学与湖南精神

陈云章

我对哲学素少研究，而《仁学》的体系博大，思想精深，实不敢妄置一词，但为了促进两岸学术交流，我仅在这里将大陆学术界对《仁学》的评价作一个介绍。

大陆对谭嗣同先生历来就非常尊崇，过去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谭嗣同全集》，搜罗比较完备。周振甫编的《谭嗣同文选注》，对所收《仁学》文字有详细注释，可惜久未重版。近年出版的有关著作也较多，仅就湖南来说，先后出版了徐义君的《谭嗣同思想研究》和邓潭洲的《谭嗣同评传》，内容比较扎实；另外，我想向各位介绍大陆权威著作及人民日报有关《仁学》的评述。

首先要介绍的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此书有74卷之多，包括66个学科，共收77859个条目，全书一亿二千多万字，可说煌煌巨著，其中历史卷、哲学卷、中国文学卷都有谭嗣同的词条，而内容各有侧重，中国文学卷对《仁学》是这样写的："他的仁学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致唐才常》），热情宣扬民主与科学，猛烈抨击封建专制、纲常名教和民族压迫，甚至赞许通过起义暗杀来推翻君主暴政。全书贯串救亡图存的宗旨，表达了激进的民主思想。其中，有的观点已经具有反清民主革命思想的倾向；不过尽管作者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还存有模糊认识，对清政府也仍存幻想，在行动上未能超越维新派，但他的急进思想和为国家为改革英勇献身的精神，对后来的革命党人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这段话虽未能概括《仁学》的内容，但是对于谭嗣同的革命精神，却是热情歌颂的。

哲学卷则有"仁学"和"仁为万物之源"的两个专条，可见对《仁学》一书的重视。"仁学"一条分三段，第一段介绍作者写此书的时代背景及发表经过。第二段分别介绍《仁学》上下卷的内容，说是"仁学"的思想来源和组成十分混杂，"仁学"的哲学思想是矛盾的，它既承认物质性的"以太"为宇宙万物的基础，又认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末段则指出："仁学反封建的激进思想，对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产生过积极影响。"

另一条"仁为万物之源"，指出这是谭嗣同提出的哲学命题，并指出这是吸收了宋儒"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又受了佛学的影响，与康有为"以仁字为唯一宗旨"的思想也有关连。

以上几种介绍，一方面可见大陆学术界对《仁学》一书的重视，另方面又可见其对"仁学"的评价仍偏重在政治方面，而忽略了"仁学"的本质。"仁学"的本质是什么？我以为即是梁任公所说的"将以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至少就中国来说，这是一次最伟大的尝试。胡适说过，"尝试成仁自古无"，何况谭嗣同那个时代，中国接触的西方学术还甚少甚浅，而谭氏在《仁学》一书中已经能够把中西哲学、宗教和自然科学熔为一炉，提出"仁一通一平等"这个伟大的公式，并在下卷中根据庄子"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之语，提出"有天下无国"的大同思想，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

次之要介绍的是：近年来大陆和国外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西文化汇通融合之必要。1994年《人民日报》有一篇关于第八届国际中国哲学会议的述要，这个哲学会议是由北京大学和国际中国哲学会主办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国内地和台港、新加坡、韩国、日本、泰国、美国、俄罗斯等的著名哲学家，围绕"中国传统哲学的未来展望"的主题，也就是针对学术界关于尊孔与反孔两极对立的流弊，各抒己见，切磋讨论，反观传统，畅谈未来。有些与会者提出：儒学作为一种伦理型的人学可以分疏为"仁学"和"礼学"两个层面，前者蕴含着较多的人道主义和民本主义精神，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普遍性的文化价值；后者则由于与宗法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联系较为紧密，因此，理应受到批判与冲击，历史上的儒家仁学经历了孔孟的"仁者爱人"的爱的哲学，朱熹的"仁则生矣"的生的哲学和谭嗣同"仁以通为第一义"的通的哲学三大阶段，特别是后者至今仍具有相当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有些代表不同意将儒家思想归结为只重道德而轻视经济与科技的伦理型文化，并根据历史记载指出，从孔子到王船山历代儒家学者一直是把经济作为政治、道德和军事的基础来看待的；而且历代儒家学者中不乏科学家和数学家，李约瑟曾公正地说，朱熹的科学成就比托马斯·阿奎那大得多。同时，从孔子到汉代经学和宋明理学，无一不是吸收了当时本土和外来文化各流派的有益成分才构成自己的体系的，这说明儒学不是封闭型的，它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突出表现了儒家作为管理哲学的本质。一些代表认为，传统儒家管理哲学的特点是以人为中心，以道德教化为手段，以正己正人为途径，在当代东亚社会中，人们对儒家管理哲学进行了必要的选择、补充和阐发，使它在日本成为促进工业社会发展的"企管精神"，在新加坡成为拯救社会道德危机的"救世药方"；对当代中国来说，经过认真

的分析、批判和改造的儒家管理哲学也完全有可能转化成现代化管理的宝贵财富。另一些代表亦认为东亚某些国家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源自儒家伦理的勤奋、节俭与诚信，这与韦伯所谓导致资本主义产生的新教伦理确有相通之处。然而，他们也清醒地指出，东亚某些国家是在成功地移植了西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其儒家文化传统才得以转化为现代化的促进因素，而且其经济腾飞还有赖于优越的地理经济环境和正确的政府决策导向。有些代表尖锐地指出，新儒家如何从传统儒家的“内圣”开辟出民主与科学的“新外王”，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另一些代表认为，对新儒学的基本态度应该是：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该“述要”，最后还有一段说得很好：“他们在总结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救亡图存的艰难历程时提出，应当自觉运用周易经传中的‘通变之道’处理现代中国文化的安立与未来问题，面临西方文化的强势挑战，近现代中国哲学因应危机的文化模式历经了中体中用、中体西用、西体西用、西体中用以及中西互为体用等诸多类型，近来海内外又有人提出‘兼综的融合’与‘和合学’等主张；更有人首倡以‘主体’和‘资源’的关系取代过时的‘体用’关系，从而以主体的身份同时运用传统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资源，在融合的过程中进行创造；这个发展趋势表明，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在于以超越融通的精神，吸收中西古今各种优质文化成分，进行综合创新——这种观念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回顾20世纪中国哲学走过的发展道路，代表们得出了一个规律性的认识，任何从西方引进的哲学思想要想在中国生根并占有一定地位，都必须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相结合；反之，任何中国哲学流派若想获得新生，也都必须吸收西方哲学思想并使自身现代化，如一味抱残守缺或完全照搬西方哲学的迂阔之论都注定没有前途。

值此世纪之交，某些敏感的观察家已在纷纷议论21世纪将是“华人的世纪”，代表们相信，在全世界的华人和中华文化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华文化的自我振兴和中西文化精华的互补交融必将相互推进、相得益彰，经过这番历史的熔铸，古老的中华文化终将焕发出新的生命，为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觉得，这些学者所主张的，实际就是《仁学》中已经尝试的，也就是梁任公所指出的“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这项工程极为浩大，非一时一人一国所能完成，而需要世界各国的仁人志士共同来努力，因此，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应负有更重要的责任，而“中华仁学会”在中国两岸又起了先驱的作用，这是值得自豪的。

大陆在短短的开放政策之后，《人民日报》竟能写出如此大胆扎实的“述要”，实在是一件难能可贵可喜之事，我在这里比较详细的把它摘述出来，以供诸位先生欣赏，是有特殊用意的。

基于以上所述，可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光芒万丈，任何压力只不过是暂时可能获得遏制的作用，但绝对无法扼杀它，一遇到适宜的气候，就会立即复苏，再光芒四射。目前海峡两岸不幸处于分裂的局面，但两岸人民都坚信在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万丈光芒的照耀下，很快就会统合在一起的，因为两岸的分裂，不同于往时德国的分裂，现今朝鲜的分裂，他们都是外力给造成的，我们不是这样。至于现时一些国家的内战、分裂，则是出自民族冲突或宗教冲突，这我们都没有。居住在台湾的同胞，大都是从大陆迁来的，台湾也是郑成功率领大陆沿海同胞开发和治理的，本是同根生，只是来的时间有先有后而已，这中间是没理由发生矛盾的；即使有，也一定会像我们往昔祖先曾有过若干次的大小分裂一样，也一定会在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文化照耀下，分久必合。不同的意见也一定会在孔孟之道、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得到合理的解决，两岸同胞终究会手携手共同建设统一的中国，屹立于世界。在这里，我想到雪莱的诗：“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虽年事较高，自信定能看到这一天的来临。

受《仁学》的启发，现在我想谈谈湖南人民的性格。

每一乡土的语言，都有它自己的乡音，每一乡土的人民，都有它自己的民性，这是自然的，湖南自不例外。

年青时，我听过一首叫“湖南少年”的歌，歌词中有：“若道中国是希腊，湖南便是斯巴达，中国若为德意志，湖南便是普鲁士，若要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豪言壮语，与两千多年前楚南公所讲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如出一辙。楚南公的话，得到了事实的印证。近百年来，还流传一句：“无湘不成军”的话，从曾、左、彭、胡一直到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事实证明，莫不如此，这都充分地说明了湖湘人民的倔强性格，和外省人批评我们湖南人的“骡子精神”。

1995年8月15日是我国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日，也就是日本强寇宣布向我国无条件投降的日子。自鸦片战争起，百年来，受尽战败之辱，受尽帝国主义侵略之辱，尤其是日寇侵凌残暴之辱，我们以仁义之师，伐不仁之敌，直到这个日子，才一雪前耻，终于使骄横残暴、不可一世的日本强寇，俯首求降，不平等条约一笔勾销，租界收回，这实在是我国几千年来最伟大、最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个伟大日子的取得，我三湘同胞尽了自己能尽的力量，献出了数百万热血头颅，蒙受了最惨重的损失。有些大的战役，都是在湖南打的。长沙经过三次威震中外的湘北大会战；保卫常德、衡阳的战斗，由于是逐屋逐街

之战，而使常德、衡阳成为一片废墟。长沙市之所以成为焦土，虽是由于张治中张惶失措使然，但市民因念及是毁于抗战，也没去追究此事。尤其是关系到保卫芷江飞机场、扭转战争局势的最后一次大战役，是在湖南西部地区打的。日寇向中国投降的洽降地是芷江，这真是湖南的光荣。可见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湖南人是不惜流血牺牲的。众所周知，谭嗣同先生在清代末年为了变法图强，当时处境极端危险，许多人劝他逃走，尤其许多日本朋友，都劝他到日本去避祸，可是他决心殉志，宁愿牺牲生命，以唤起国人的觉醒。他这种为国牺牲视死如归的气魄，就是湖南精神的典型，值得后世景仰与崇拜。尤其是他以心血结晶的仁学，更值得我们广为宣扬与阐发。

辛亥革命在湖南

林增平

1911 年发生的推翻清朝腐朽统治的革命，按中国旧历纪年是辛亥年，所以通常称为辛亥革命。

起义首先是在武昌发难，那是 1911 年 10 月 10 日由据守在武昌的新军（清朝原有的军队是八旗，指入关以前的军队。入关后，汉人的军队，称绿营。19 世纪末，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制，即用当时新式枪炮，称为新军）发动的。

武昌起义后，各省革命党人纷起响应，湖南是首先响应的，接着是江西、陕西、山西、上海、江苏、安徽、浙江、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四川等省相继起义，成立脱离清朝的军政府或都督府。年末，经各起义省的代表会议，举孙中山为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1912 年元旦，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成立。2 月 12 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迫宣布退位，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没有也不敢充分发动群众，因此，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力下，1912 年 4 月，孙中山被迫让位，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篡夺了民国的政权。辛亥革命的果实，拱手让人。然而，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君主的统治，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只是由于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性质，因而从根本上说来，这次革命是失败了。

1911 年 10 月 10 日发生的武昌起义，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经过较长期间的酝酿，并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初步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形成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当时，如同 20 世纪初年全国多数省份一样，湖南的资本主义也有一定的发展，并相应地产生了为数不多的资本家，随着这种发展，湖南也具备产生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阶级基础。

一、华兴会的成立和长沙起义

湖南籍的革命志士、据冯自由所著《革命逸史》第六集上的《中国同盟会最初三年会员人名册》记载，以湖南省的人最多，计156人；其次为四川，计127人；再次是广东，计109人；最少的是陕西省，4人，这就从一个方面说明辛亥革命在湖南的反映是强烈的。

湖南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最早是什么团体和哪一些领头人物，学术界看法不一致，有的认为，开端是1900年秋自立军发动的起义，即认为反清的革命在湖南是从1900年秋开始的。理由是：自立军起义在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紧迫的时候；自立会是由正气会改名的，正气会成立时，在《序文》里说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自立会组织了自立军，曾于1900年8月在安徽大通起义，遭镇压，失败。其主要倾向是革命的，故不是戊戌维新的尾声，而是辛亥革命的序幕。

确切地说，没有争议的是1904年2月黄兴在长沙约集有反清倾向的人士，在明德学堂校董龙璋的住宅“西园”开华兴会成立大会，即提出“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宗旨，明确提出推翻清朝政府。“复兴中华”，则从参与或支持华兴会的人们言论可以看出。如陈天华在“绝命辞”中提到“满洲民族，许为同等之国民，以现世之文明，断无有仇杀之事”。同时，虽未明确提出民主革命的意思，但参与者们却倡“国民革命”，他们的言论里，充满着赞美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文明和强盛的言词。所以，华兴会可以说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

华兴会成立会上，黄兴提出了“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他认为湖南革命条件已经成熟，可以先在长沙发动，取湖南为根据地，引发长江上下游各省先后响应，然后出师北伐，“直捣幽燕”，将清朝推翻。

为了发动起义，华兴会开始了联络省内军队，发动他们起义反清；又联络有反清传统的“会党”。为此，黄兴和刘揆一一道在湘潭的一个岩洞里，与哥老会首领马福益会晤，一起商量长沙起义的计划，决议趁当年西太后七十寿辰全省文武官员在皇殿行礼时，预置炸弹，一举炸死，即宣布起义。

因要购买枪支弹药，黄兴变卖了家里的田产近三百石，刘揆一等也变卖了家产，并借贷所得，共筹到近五万元，在上海买到长枪500，手枪200，又印发了大量革命宣传品，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

为了实行“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起义方略，华兴会开展了对外联络，章士钊因与江南陆军学堂赵声曾经同学，被派往担任长江一带的联络。柳

扬谷被派往担任各地秘密机关的联系，刘揆一受聘为醴陵渌江学校监督，利用这些职衔作掩护，负责调度会党和湖南、江西军队的联合。其他如陈天华、姚宏业、杨笃生都安排了起义的准备事项。

可是，由于华兴会领导人缺乏经验，各种起义的准备工作缺乏较为周密的保密措施，以致官方早就加以注意。当时《湖南官报》上还登载所谓“会匪”起事的消息，于是，湖南官方得以事先派出兵勇、差役进行搜捕，华兴会起义失败。

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后，黄兴及骨干分子相继逃往日本。1905年夏，孙中山又到日本，他在黄兴等的支持下，约集在日本的兴中会、华兴会和江浙一带革命志士组成的光复会，实行联合，组成同盟会，确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辞，共推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庶务总干事协助总理，总理不在，由庶务代行其职权，加入同盟会的湖南籍人士，前面提到，计156人，人数最多。他们陆续回到湖南，于是湖南反清革命进一步开展起来。

二、萍浏醴起义

1906年春，留日学生刘道一（湘潭人，在同盟会曾被推为书记、干事等职）、蔡绍南（江西萍乡人）受命回国，在湘、赣边境“运动军队，重整会党”，准备起义。

回国后，在水陆洲约集38个革命分子集会，刘说：“奉黄公克强面嘱，革命军发动，以军队会党同时并举为上策，宜集合会党于省城附近之萍、浏、醴各县，与运动成熟之军队联合，方可举事”。据此，刘道一留驻长沙，与同盟会本部及各方面联络，蔡绍南回萍乡上栗市老家，在萍、浏、醴边境，发动和组织会党。6月，假冒学生，前往桐木市、上栗市一带登堂演说，得到群众的信服。这一年春夏间，长江中游各省发生严重水灾，萍、浏、醴一带饥民纷纷加入洪江会。7月，龚春台、蔡绍南召集各路首领在萍乡县属大岭下慧历寺商讨起义事项，决定以慧历寺为洪江会总机关，由于会众往来频繁，因而引起官方注意。10月7日，萍、浏、醴三县官方派兵勇突袭麻石，洪江会第三路码头官李金其被清军追捕，追到醴陵白兔潭，投水死难。蔡绍南、魏宗铨在上海得知麻石事件，立刻偕同宁调元返回湖南，决定于年底（旧历）清吏封印过年时期发难。12月3日，洪江会头领廖叔宝在萍乡麻石集众二三千人，高举“汉”字旗号，首先起义。龚春台、蔡绍南等不得不改变原议，通知各码头官立即率众起义。萍浏醴起义于1906年12月4日爆发，起义后，义军纪律严明，清两江总督端方惊慌失措，急派兵前往镇压，被起义军击败，但后来因官

兵装备、武器占优势，起义军奋战至12月下旬，各路起义军失败，不少革命者如刘道一、杨卓林、禹之谟等被杀害。

萍浏醴起义失败后，由于清王朝继续加紧推行其对内镇压和对外投靠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因而人民的反抗和斗争也继续出现。1910年4月，长沙米价特贵，南门外一个贫民，挑水卖营生，一日所得，竟买不到一升米，以致全家跳湘江自尽。消息传出，人们无比愤恨，因而群起聚众发动抢米风潮，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将几个官员和豪绅加以惩处。接着，因长沙的影响，全省不少州、县发生抢米风潮，给清朝的统治以一次有力的冲击。

三、湖南保路运动

在湖南还曾发生了具有反帝反封建意义的保路运动。

19世纪末年，清政府着手修筑铁路，但因财力不足，于是举借外债，各帝国主义就争夺这项借款，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修筑由汉口到广州的粤汉路，美国的美华合兴公司经过竞争，获得了这项贷款。根据借款续约，合兴公司应在五年内将全路修通，但实际上是一再拖延，到1904年，仅修筑了广州至佛山的一段全长32英里的支线，而且暗中出售股份，这就引发了湘、鄂、粤三省群众要求“废约自办”的斗争。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发生声讨美帝国主义虐杀旅美华工，抗议美国政府拒绝改订苛待阻禁华工的条约，中国人民掀起广泛的反美运动，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得以收回路权。

保路运动，使湖南人民进一步看到了清廷的腐朽和卖国行径，这样，就积累起人民反对清王朝和帝国主义的仇恨。

经历了20世纪初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湖南人民鼓舞了斗争的勇气和信心。所以，当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昌发生，湖南人民就首先响应，并取得胜利的功绩。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发生后，湖南革命的人民首先响应．为首的是焦达峰和陈作新。

焦达峰是浏阳人，早年受到谭嗣同、唐才常的影响，产生了反对清朝腐败国家积弱的思想，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毕业于南台高小，经姜守旦介绍加入洪福会，1903年到长沙，入华兴会办的东文讲习所，并入同仇会。翌年（1904年）东渡日本，次年（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6年萍、浏、醴起义，焦奉黄兴“重整会党，联络新军”的意旨回国，参加萍浏醴起义，后亡命日本，1909年回到长沙。

陈作新，浏阳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新军49标教官。

1911年，同盟会策划在广州起义，焦达峰、陈作新等人在天心阁召集新

军标、营代表共72人开会，商议加紧起义准备。

1911年5月，保路风潮开展得很快，焦达峰认为时机成熟，就把发动新军的任务委托陈作新，焦就担任联络会党的工作。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长沙后，14日，陈作新出面，召集各界代表人士，策划响应，22日早晨，焦、陈在协操坪召集新军，带领新军起义，杀死巡防营统领黄忠浩，大小官员纷纷逃命。长沙起义取得胜利，接着，岳州、常德、衡阳、宜章、宝庆相继宣告脱离清王朝，宣告归附革命。

然而，辛亥革命中主张呼吁清王朝实行立宪新政的立宪派，一直反对采取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湖南立宪派的首脑是谭延闿，他们极力丑化焦达峰和陈作新，诬蔑焦是“匪首”，陈作新是“酒疯子”，他们指使新军的反动军官梅馨，部署杀焦、陈的阴谋。10月31日，他们制造事端，散布谣言，将焦、陈谋杀，谭延闿夺了都督席位。

概括起来，湖南辛亥革命有四个特点：其一，人数最多，居全国首位；其二，是革命派起义、武装夺取政权的；其三，最早响应武昌起义，并派兵援助武昌起义；其四，立宪派在起义胜利后发动叛乱，杀害革命者，或用其他方式夺取政权。这就具体反映了湖南辛亥革命和整个辛亥革命的过程基本一致。

从湖南辛亥革命来看，充分反映了整个辛亥革命的面貌，即全国多数省，革命派或不曾掌握政权，由原来的巡抚、旧官员变为都督；或被杀害，被迫交出政权。如江西：起义后，举巡抚冯汝骙为都督，冯不从，吞大量鸦片自杀，于是新军军官吴介璋为都督。陕西：举张凤翔为大统领；山西：举阎锡山（86标标统，是投机分子）为都督；江苏：举原巡抚程德全为都督；浙江：汤寿潜（原咨议局议长）；安徽：宋家宝（原巡抚）；广西：沈秉堃（原巡抚）；福建：孙道仁（原新军统制）；贵州：杨荩诚（原陆军小学总办的教练官）；四川：尹昌衡（原陆军小学总办）；山东：孙宝琦（原巡抚，与袁世凯、奕劻姻亲）。

从以上各方面看来，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却没有结束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权，因而也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所以，包括湖南在内的辛亥革命确乎是失败了。

黄兴书法艺术发微

史 穆

“沉沉迷梦二千载，迭迭疑峰一百重。”

在满清王朝濒于崩溃的前夕，长夜漫漫，疑峰迷梦，先知先觉所经历的革命道路，是极其艰险曲折的。黄兴与中山先生风雨同舟，驱除鞑虏，复兴中华，彪炳勋名，光垂史乘。从他上述诗句中，可以概见当时形势的严峻和他早期的革命抱负。黄兴留下的墨迹不多，文名为武略所掩，书名又为文（诗）名所掩。在纪念黄兴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谨以一瓣心香，重温其诗词，并就先生的书法艺术略抒管见。

“投笔方为大丈夫”

古代儒家一直视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敦教化的工具。士子庶民要想读书入仕，也必须以六艺为基本条件。作为书法的载体——文字，它就担负着实施政教的艰巨使命。而作为政教的实施者，按儒家要求，就是要“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从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顾宪成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儒家精神就始终贯穿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教育之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他们的节操；“有杀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是他们的人生准则。虽然为封建统治者所利用，但在儒家思想哺育下，忠臣义士，民族英雄，史不绝书；文韬武略、出将入相的栋梁之材，也几乎是世代相传。黄兴从启蒙到留学日本前夕，十七年间的读书生活，就是在儒家思想熏陶和反帝反封建新思潮的冲击下度过的。他的光辉思想和书法艺术，无一不深深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他八岁在萧举人私塾读书，每当茅檐日暖或瓜架凉生，就爱听老人们说太平天国故事，于洪杨革命事迹，心向往之。稍长，入翰林周笠樵私塾，在老师启迪下，关心时局，力求新知，开始萌发救亡图存旨趣，在城南书院，又受知于王先谦、刘凤苞诸名宿，耳提面命，德业日进。他不满足于“朝作书，暮作书”的单纯读书写字，县考获中时，写下“一第岂能酬我志，

此行聊慰白头亲”的诗句，二十七岁作笔铭云：“……雕虫篆刻胡为乎？投笔方为大丈夫。”民胞物与，解生灵于倒悬的宏图大略，已隐约可见了。

“只忧博浪锥难铸”

黄兴书法，受颜真卿影响较深，特别在人品方面。颜真卿一生，忠君爱国，正义凛然，其书法亦方正雄浑，宽博敦厚，含蓄中和，大气磅礴。黄兴继承和发扬了前人传统，他的书法作品，充实庄重，气厚力沉，用笔方面，笔笔中锋，无垂不缩，无往不收，典雅含和，不激不厉。这也是儒家“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思想体现。在颜书基础上，黄兴书作又大量融入魏碑，并取法何道州、翁常熟、刘墉诸家，转益多师，自成家数。所书《卅九初度》七律及“大丈夫当不为情死，不为病死，当手杀国仇以死”屏条，酣畅淋漓，笔随意遣，前者沉雄郁勃，有翁刘的浑厚而灵动过之；后者题款“奂池尊兄鉴”五字，酷似道州，整幅用笔“破而愈完，纷而愈治，飘逸愈沉著，婀娜愈刚健”。勾与捺的处理，与前者之收笔凝炼，全然不同，写来似不甚经心，而豪情跌宕，浩然之气倾泻于字里行间。流传最广的“笃实”“无我”两幅题词，文字虽极为简朴，内容则至大至刚，不仅是黄兴对群伦的勖勉，更是他光辉一生的集中写照。看到这两幅题词，就使我们油然兴感，肃然起敬。从书法角度看，两幅作品均呈颜书风骨，用笔技巧则迥异：“笃实”二字，圆中有方，寓斜于正，横轻竖重，起笔多用露锋；“无我”二字则纯用圆笔，寓刚于柔，横竖轻重相等，起笔全用藏锋，此其一。其二，榜书贵厚重，如果没有一、二处飞白或引带，容易失之板滞。刘熙载指出：“用笔重处正须飞提，用笔轻处正须实按，始能免堕飘二病。”“笃实”二字虽用笔厚重，但提按变化较大，每当重按之后，缀以轻提，牵丝引带，细筋入骨，“笃”字弯勾过重，但有一处飞白，很自然地打破了滞堕。“无我”二字中，三处撇法均用枯笔，使圆浑中出现枯涩，沉重中呈露空灵。其三，署款虽属细节，处理不当，势必牵动全局，且经常被人忽视。作者对此也不轻易放过，“黄兴”二字，两幅的用笔用锋不同，而且都和大字保持一致，使作品通体完美。

黄兴的思想、诗词、书法是三位一体，相互渗透、相得益彰的。诵其诗，读其书，便知其人。1911 年 10 月，黄兴写过一首《蝶恋花·赠侠少年》词，上阕：“画舸天风吹客去，一段清秋，不诵新词句，闻道高楼人独住，感怀定有登临赋。”推心置腹，料到这位大智大勇、满腔热血的侠少年，肩负着神圣的特殊使命，清秋时节，高楼独处，必然慷慨赋诗，倾吐其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下阕：“昨夜晚凉添几许，梦枕惊回，独自思君语：‘不道珠江行役苦，只忧博浪锥难铸。’”这与“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是同一思想

境界。在生民涂炭、国族存亡绝续的历史时刻，革命先驱视死如归的壮烈行动，是震撼人心、可歌可泣的。黄兴既是这次义举的组织者、领导者，又是侠少年李沛基的知音，一想到千里之外，行役珠江的年少战友，他就“梦枕惊回”，记起了战友的誓言。《蝶恋花》一词，字字温情，也字字千钧，其书法也恰如其分地表达了特定环境中的浩荡情怀，使读者也“心潮逐浪高”，恍惚看到了“妖云迷漫岭南天，凄绝燕塘碧血鲜”即将发生的场景。

“禅林唐碣任幽攀”

“漫道壮夫轻技艺，禅林唐碣任幽攀。”戬斋先生生前对我学书，从唐楷入手，上窥魏晋汉秦，下及宋元明清的打算表示赞同，赠我上述诗句。今天，在学习黄兴书法以后，我有了更深刻的感受。黄兴正是入手唐楷，股息于颜平原，但能博涉多优，不受前人桎梏，对魏碑的临习、运用，极见功力。他的作品，每幅风格异趣，几幅魏碑笔意的作品，也各尽其妙。1913 年书赠蔡锷一联：“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纯乎魏碑笔法，深得张猛龙、魏灵藏诸碑神韵，间有始平公笔法，挺拔刚毅，雄浑壮美，正如刘熙载所谓：“起笔欲斗峻，行笔欲充实，转笔则兼乎住起行者也。”书赠陈翼龙联：“建设共和新事业，铲除世界最强权。”则用郑文公碑笔意，方圆兼用，古意盎然。挽刘道一诗，则在娴熟的北碑基础上，出之以行草写法，笔势斜纵豪放，亦复凝重沉郁，“英雄无命”，“惨淡中原”，“我未吞胡”，“君先悬首”，可以想见作者当时心境，这首诗每字下端略显宽绰，点画狼藉，增加了线条分量，表达了悲壮、沉重气氛。以上三例，同属魏碑书体，由于用笔、学帖不同，各有不同的艺术效果。孙过庭所谓：“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乎纸上”，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都是指书法艺术的特殊作用。前者是因，后者是果，两者的关系又是递进的：只有外在的笔墨线条能极尽变化，内在情调才能恰如其分表现在纸上，然后才能达到“涉乐方笑，言哀已叹”，使书家（诗人）的情意感染每一个读者。没有毫端的变化，纸上情调无由体现，“乐笑”“哀叹”的效果也不可能变化，这实际上也是书意的能动作用。

“时有清风振我衣”

黄兴书虽从颜书入手，但他与某些专习颜体者是各行其道，“共树分条”的。从书法的衍变、师承关系看，颜书是对二百年前魏碑艺术的继承、部分吸收和发展，在颜公“变法出新意”以后，确立唐楷法度，开一代之规模，在颜书诸碑中，除早期的东方朔画赞尚可依稀辨认出魏碑笔意外，其他传世之作，都无魏碑迹象可寻了，后之学者，如专习一体，未免失之单一。黄兴则不然，

他在学颜的同时，很重视北碑的临习，而且造诣很深，他的行书，随处可看到北碑风骨，以南方书风之秀逸恬静，结合北碑之粗犷雄健，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康有为认为：“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又谓：“统观诸碑，若游群玉之山，若行山阴之道，凡后世所有之体格无不备，凡后世所有之意态，亦无不备矣。”话虽近乎武断，且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但北碑之壮美雄肆，囊括万殊，已为历代书家所公认，而黄兴之于书道，也是具有真知灼见的了。

清代龚自珍对于北魏诸碑，更是推崇备至，如《己亥杂诗》“从今誓学六朝书，不肄山阴肄隐居。万古焦山一片石，飞升有术此权舆”；又云：“二王只合为奴仆，何况唐碑八百通。欲与此铭分浩逸，北朝差许《郑文公》”。“此铭”指《瘗鹤铭》，与康有为之“备魏”“卑唐”，均称卓识。当然，这与清代盛兴碑学的历史有关，黄兴也不可能不受这书风的影响。除了上述的一些作品外，我们还可以从以下几幅作品中，看到黄兴对于北碑的攸游涵泳。如“微步轻盈不动尘……”屏条，清气朴人，虚和静逸，间有“刁遵”“敬使君”笔意；赠张岳军先生的“梅溪之西有石门山者……”屏条，初看只是一幅行书，魏碑笔意，已入化境，不易看出，细看则圆秀之中，时见方重，运笔结体，则“张猛龙”“魏灵藏”“始平公”诸碑杂糅，浑然一体，将读者引入了名山画境。此外如挽七十二烈士联、哭黄花岗诸烈士词、写给培臣、源水等人的绝笔，或泪痕和墨，或秉笔疾书，魏碑笔意，也赫然在目。正如孙过庭所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为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

故国早秋，天气初肃。缅怀先哲，清风徐来。

湖湘戏曲管窥

文忆萱

我虽然从事戏曲工作近半个世纪，但长期蜗居一省，所见者少，难免坐井观天之诮，故此文只能谓之管窥。

湖湘古为南楚之地，“楚人信鬼好祠”“重淫祀”“巫风甚盛”，这类记载，史书累见不鲜，无须引证。这是湖湘的历史文化积淀。还有一说是“湘女多情，蜀女多才”，也不是全无依据。湖湘山重水复，既有山的粗犷，也有水的柔情，在这种自然环境中培育出来的文化，自然具有粗犷与柔情交织的特色。浩瀚的洞庭湖畔所产生的湘妃、龙女传说就可见一斑。而屈原创作于沅、湘的《九歌》，更典型地反映了古代的楚文化。湖湘戏曲，自然是一脉相承。

中国戏曲是民间的俗文化，很难查找历史文献。截至目前为止，以现行行政区划的湖南境内，什么时候有戏曲活动，仅仅只发现一条，那就是《浏阳县志·卷十六职官二政略》记有北宋杨时在绍圣元年（1094）知浏阳县事时，曾经“凡酒肆食店与俳优戏剧之罔民财者，悉禁之”。（本文所引资料均取自《中国戏曲志湖南卷》及《湖南地方剧种志丛书》，后不另注。）这是仅有的一条湖南境内最早发现的戏剧活动的记载。至于这时的戏剧从何而至，具体是演什么均不得而知。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点旁证的，那就是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其中卷之八“中元节”条“七月十五日中元节。……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增倍。”孟元老在自序中说明他是在“崇宁癸未（1103）到京师”，“靖康丙午之明年（1127），出京南来”。则《梦华录》所记是他在1103至1125（靖康之前）年这段时间在东京的见闻。孟元老到京师时，比杨时知浏阳县事时相差不到10年。东京能有如此盛大的演出，那么，湖南境内出现了“俳优戏剧”并且到了能“罔民财”的程度，应该是可以确信的戏剧活动了。从来说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民间戏曲和发形、服饰、流行歌曲一样，是极易传播的，京师流行的艺术传到南方也是可信的事。至于南渡之后，戏曲在南方流播的记载就逐渐多了。元代，夏庭芝的《青楼集》中，记载有帘前秀、般般丑、关关、刘婆惜等诸多

“驰名湖湘间”的元杂剧艺人，自然元杂剧也进入了湖南。元关汉卿的《关大王单刀会》，湘剧至今仍然保留了其中的第四折，曲牌、唱词不但基本相同，还保留了元杂剧“末本”的传统，整出戏由主角关羽一人独唱到底。明代盛行的弋阳腔、昆山腔和清代的花部，无不都进入了湖南。

但是，由于民俗民情和语言的差别，从外地进入的戏曲，从发源地到必经地再到湖南，都会受到它所经过的地域的影响，并非原封不动的。特别是明代四大声腔中影响最大的弋阳腔。弋阳腔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是没有管弦乐伴奏，只用锣鼓击节，人声帮和。而且没有严格的规律，可以“错用乡误，只沿土俗”，这也是它所以流传最广的原因。所以明徐渭的《南词叙录》中说是“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其实，各地用的是与弋阳腔特点相同的唱法，不一定就是弋阳故调。这种唱法，现在大多称之为高腔，但是各地高腔并不相同。弋阳故调已不可知，我们也很难说出它的承传因果，所以只好称之为源于“弋阳诸腔”，也说明高腔不等于弋阳腔。

这里之所以要特别说一下高腔的原因，是它和湖湘戏曲有其特殊的渊源关系。因为在目前现存的声腔中，只有高腔算是最古老的声腔。

湖南从事戏曲研究的同仁，一般都认为在湖南最早出现的剧目是《目连传》。除了前面引用过的《东京梦华录》记载证明了它是我国戏曲中的早期剧目之外，还有几点理由：第一，《梦华录》说的是既过七夕就演这出戏，那就是从初八唱到十五，从时间上，从他说的“观者增倍”演出实况看，这是一出连续剧，而湖南保留的《目连传》，恰恰是连演七天的戏，这不会只是一个偶合吧？第二，湖湘本有信鬼好祠的传统，正好是这个被专用来超幽度亡的剧目落脚生根的土壤。这个戏在湖南演出的时间之长，流行的地域之广，其演出情况之盛大、热烈，记载很多，这里只引一段清湘潭人胡本的《艳火行》长诗前的小序：

“己巳（乾隆十四年）秋，演《目连》剧于城东之石牛铺。彩楼高结，俯临人海。妇女垂帘聚观者不下千人。因不戒于火，锻焉。闺帏弱质，颠倒于浓烟烈火之中，狎侮于白日青天之下，其折肢体、焦发肤、弃钗钏、裂衣裳者不知凡几，有惭而自经者。……”这可算得上一场巨大的灾难了吧？后来又如何？胡本的诗最后两句却是：“来岁目连还救母，红妆慎勿出深闺。”来岁这戏还会再唱。第三，这出戏在宋代唱的什么声腔，我们说不清楚。但现在保留下来的则是用高腔演唱，所用曲牌是高腔的原型曲牌，虽然在老艺人的演出抄本上也有“放流”（加滚），但原始曲牌仍然完整，据历代老艺人传说，所有高腔曲牌，都出于《目连传》，艺人历来称之为戏祖或戏娘，也说明它的古老。第四，坊间刻印的剧本，刻家之多，数量之巨，以此剧为第一。可惜的是，“文

革”期间全部被毁，现在只剩下民国初年的刻本了。

“目连”戏于宋代走上舞台，既未留下剧本，也不知道它的演出形式。元代已被编为元杂剧，有《目连入冥》《行孝道目连救母》两种存目，剧本没有保留下来，说明其生命力不强。也可能是在有了北宋连续七八天的演出之后，观众不能接受文人这种四折一楔子的演出本。明清两代，这出戏却有了两次重大的变革。明万历时安徽祁门人郑之珍，根据他所看到的民间演出，改编成上、中、下三本，共103出，名为《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清代张照也改编成十本240出的宫廷大戏《劝善金科》。这时印刷容易，这两种版本就取代历来由艺人口传心记的剧本，我们今天要探索宋元时代的《目连》原貌就相当困难了。一般来说，南方的《目连传》大多统一于郑之珍本，湖南也不例外。不过，湖南依据湖湘的传统文化积淀在口传心记时代对目连故事的诠释却仍然保留下来，这就是我们称之为“湘目连”的地域特色。例如故事中目连的母亲刘氏病了，宋元时代的演出有没有这一细节我不知道，明代却是有的，被收入郑本、张本中是由目连派人去请医生给母亲治病。在信鬼好祠的湖南却是请巫，而且各地根据习俗请巫也各不相同，如湘中一带是请一个哑巴“师公”来“收魂”，一个小鬼贪吃哑师公所得的“福物”，竟尾随着他回家；在湘西，却是请“仙娘”来“降仙”，小鬼捉弄她，把她的儿子扔到河下去了。

湖南整个《目连传》的演出也是一次民俗的大展览，每天的演出中，都有一些戏从台上演到台下，如刘氏生了目连，她娘家的哥嫂要“送鸡米”（有的叫送粥米），许多人抬着“抬盒”，挑着担子，堆满小孩衣物、鸡、蛋、酒、米、糖等礼品，她哥嫂坐着官轿，招摇过市，然后才由观众上台演“汤饼宴”的戏。目连为了给母亲赎罪拜香，就要像过去朝南岳那样，从远处三步一拜，五步一跪，拜上舞台。总之，每天都有这样的从台上到台下、从台下到台上的演出，而观众也跟着跑来跑去地观看，同时也可以和剧中人交流。因此，过去中元节唱目连戏，成了民间的重大节日，观者也如痴如狂，沉醉在这种戏与生活溶成一片的欢乐中，以至把七本《目连传》发展为四十八本，甚至延长到一演半年的程度。欢乐虽然欢乐，却不忘信鬼好祠的传统，所以演出又极为虔诚：不独开演那天有隆重的仪式，每天开演还有固定的仪式，在刘氏没有开荤之前还得一律持素。戏班更是严格：妇女不能靠近戏台，演员都须净口、沐浴，夫妻必须分房而居，在后台还不许随便说话，随便走动。演出经费全为乐捐，故亦称“万人缘”。以完成大众的超幽度亡、驱魅除祟的心愿。

另一出古老的戏要算明代高则诚的《琵琶记》。这出戏虽然湘剧的故事情节、框架结构都和高本相同，它却在写“情”上作了创造性的发展。也是用高腔演唱，却使高腔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真达到了声情并茂的程度。高本结尾一

出是“风木遗恨”，只是写蔡伯喈带着两房妻室回家祭坟，点明“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存”的遗憾。湖南人却通不过，在湘剧中把这一出变成了“打三不孝”，让蔡家邻居张广才，在蔡伯喈父母坟前，痛痛快快地大骂蔡伯喈的不孝，反衬出他妻子赵五娘的善良完善的品德。张广才要打蔡一百二十杖，虽然由牛相、牛小姐和赵五娘求情没打成，但牛氏父女求情的理由是那么令人觉得牵强可笑，而赵五娘什么也不说却让人可以理解，就比原剧那种平淡的为结尾而结尾的戏生动多了。全剧中的单折《琵琶上路》已成为湘剧经典之作，这里也不妨挑点唱词作一下对比。下面是赵五娘上京寻夫和张广才分别时的对唱：

高则诚本：

赵唱：奴深谢公公，便辱许诺。从来的深恩，怎敢忘却！只怕路途远，体怯弱；力衰倦脚。（合）孤坟寂寞，路途滋味恶。两处堪悲，万愁怎摸？

张唱：伊夫婚多应是贵官显爵，伊家去，须当审个好恶。只怕你这般乔打扮，他怎知觉？一贵一贫，怕他将错就错。（合前）

湘剧这一段却给予了尽情的发挥：

赵唱：赵氏女，离故乡，肩背琵琶，手拿雨伞，怀抱仪容，找寻蔡郎。大翁叔送我到阳关上，叮咛嘱咐两次三番。舍不得大翁叔我回头望，又只见年迈之人两泪汪汪。把几句好话对他讲：大翁叔你莫哭免悲伤。阳关道上你少行往，年迈之人须要提防。媳妇此回上京往，朝念弥陀晚烧一柱香，一不保佑爹，二不保佑娘，愿只愿大翁叔你福寿绵长。找得儿夫回乡党，登门叩谢好恩光；找不到伯喈夫还乡党，哎，我的大翁叔呀！你的恩德付与汪洋。（合）愁只愁，此一去，山又高，路又长，儿的鞋又弓，足又小。山高路长，鞋弓足小，怎能行得上，唉！何日里才能挨到帝邦？似这等，对景悲，对景伤，对景好悲伤，悲伤愁断肠，泪洒西风落两行。（重）

张唱：五娘儿，离故乡，肩背琵琶，手拿雨伞，怀抱真容，找寻蔡郎。老汉送你到阳关上，言来语去话又长。一路上，未晚先投宿，鸡鸣还须等天光。逢桥涉水须仔细，行船过渡莫慌忙。口渴莫饮田中水，去到人家求茶汤。心中恼恨不肖蔡郎，贪恋荣华不归故乡，父母在，他生不能够养；死不能够葬；葬不能够祭祀他一双爹娘。为子者不披麻执仗，却要你女流之辈，孤孤单单、冷冷清清、独自一人找上帝邦。（合同前）

共过患难的邻里情，写到这个份上，可算得淋漓尽致了。它正是湖湘民间文学中长于浓墨重彩地抒情的常用手法。而且把高腔中的滚唱发展成为畅滚，在唱腔上有了新的发展。又如常德戏的高腔《思凡》，不仅表演上与众不同，连剧本也加了工。原本写小尼想下山嫁人，过正常人家的生活，也只敢想像：

"生下一个小孩儿，兀的不快活煞我?"在常德戏中却尽情发挥："生下五个男娃娃，再养两个女姣娥。做一个五男二女，七姊妹团圆。叫爹是他，叫妈是我，'爹'的'爹'，'妈'的'妈'；扯的扯，拉的拉，哎呀呀，儿呀儿呀！兀的不快煞于我?"外省同行爱说湖南戏像湘菜，有辣椒味。我想，无非是情感的强烈和浓郁吧。

另一出古老的戏《白兔记》，在近代湘剧舞台上已只剩下一些单折了。但其中"打猎回书"一出，从1952年参加全国会演之后即引起了世人瞩目。从明成化本《白兔记》被发现后，我们才知道"打猎回书"与成化本极为接近。它的表演虽然接近昆曲，但无论南昆还是北昆的"出猎诉猎"都没有湘剧高腔那么细致、那么绵密，使歌和舞浑然一体。

这种从文学到歌唱到表演独有的精湛，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湖湘儿女的艺术积累，才有今天的一枝独秀。

明代后期，昆曲风行全国，湖南自然也同样流行，还出现一批文人创作的昆腔剧本，如龙膺就写过《金门》《兰桥》，王夫之隐居衡阳作过《龙舟会》。但民间并不满足于照样的搬演而使之地方化了。清刘献庭的《广阳杂记》中，就记载了他在湖南看到的昆曲："亦舟以优觞款予，剧演《玉连环》，楚人强作吴歈。丑拙至不可忍。如唱'红'为'横'、'公'为'庚'、'冻'为'登'、'通'为'疼'之类"。这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湘昆的早期风貌。现在，湘昆在全国的昆腔中，独树一帜，自有其湖湘特色。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保存下来的湘昆剧目不多。但即使在这有限的剧目中，仍能看出它的特色。如《武松杀嫂》这样的人所熟知的戏，湘昆演来也别具一格。当武松砍潘金莲时，表演竟是连砍三刀而潘竟以三次纵跳躲过，武松杀嫂之后，以士兵将武如芭蕾般托举下场。所有昆曲名家看过之后都说这是湘昆的风格，而不是一般的红氍毹上优雅的歌舞。演《藏舟刺梁》，南北昆曲都是以桨划船，惟独湘昆是据湖南山区河水峻急的特点用篙撑。正因为湖南的昆曲地方化、生活化，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也便于反映现实生活。硕果仅存的湖南湘昆剧团演出过不少现代戏，因而在长江中上游还能留下这惟一的昆腔剧团。湖南的其他剧种中也还保留了一些昆腔戏，同样具有浓郁湖湘色彩，如衡阳湘剧中的《醉打山门》，1952年参加全国会演就震惊四座，被前苏联艺术家赞为"魔鬼的艺术"。

清代的花部兴起，徽班进京，形成后来的京剧之前，花部诸腔也已陆续传入湖南。因湖南原有深厚的高、昆腔戏曲基础，没有形成新的剧种，而是被原有的唱高、昆的戏班所吸收，因而形成后来的湖南地方戏曲剧种高、昆、乱弹诸腔并存的局面，且一直保留到今天。使我们今天可以在同一剧种、同一舞台上看到不同风格的演出，这是前人善于吸收、善于融会贯通的结果。

所谓花部诸腔，戏曲界统称之为乱弹或弹腔。它包括南路（相当于京剧的二簧）、北路（相当于京剧的西皮）和一些杂腔小调。乱弹和高昆的区别是：在音乐上，弹腔用弦乐伴奏，昆腔以笛子伴奏，高腔则是人声帮和，锣鼓击节；在文学上，弹腔是齐言体而高昆是长短句。弹腔兴起之后，剧目迅速增多，来源不一。有的是高腔戏改的，如"三国""水浒"故事，过去在湖南多以高腔演唱，观众喜爱新的声腔，戏班也就改调歌之，所以如今有些戏虽然一直唱弹腔，但剧本上的长短句痕迹犹在。一部分是与邻近地域交流来的，我省和广东、广西、江西、湖北、四川、贵州接壤，相互交流十分密切，大量的剧目都理不清它是从哪儿到哪儿的。还有一部分是京剧的迅速向全国发展，自然也为各地输送了一些剧目。还有的便是我们湖湘儿女自己的创作了，可惜的是这些前人都湮没而无闻。

几百年的积累和岁月的筛选，留下来的是丰富的财富。艺人常说："唐三千，宋八百。唱不完的封神和三国。"到1952年我们作初步调查时，仅祁剧一个剧种的传统剧目就在1000出以外。可惜的是，当我们还来不及把它们全部搜集之时，一场浩劫全部摧毁。如今尽我们10载搜剔，尚能确凿可考者，还剩五六百出，音像俱全者不过200来出而已。不过，还算抢救出了一部分各剧种中的珍品，参与录像的这批老艺人，现在已故80%了。

清代，也是民间小戏剧种发生、形成、发展的年代——这就是各地的花鼓戏、阳戏、灯戏。最早见于记载的还是刘献庭的《广阳杂记》："甲戌元宵前一日，于郴阳旅邸，北风阴雨，觉冷甚。……饮讫，某某者忽然不见，询之则知往东塔街观剧矣。噫！优人如鬼，村歌当哭，衣服如乞儿之破絮，科浑如泼妇之骂街。犹有人焉，冲寒久立以观之，则声色之移人，固有不关美好者矣。"作者虽然很看不上这种农村的演出，却为我们留下了可贵的资料。到咸同年间，杨恩寿的《坦园日记》中，他看到的花鼓戏就已经和现在的差不多了。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十二他记有："泊西河口，距永兴二十余里。对岸人声腾沸，正唱花鼓词。楚俗于昆曲、二簧之外，别创淫辞，余固久知而未见也。时沉霾尽扫，新月微明，与桂仆以百钱另买小舟，剪水而渡。至则金鼓轰云，灯光如海，缚草为台，环以破茅。台侧别有茅屋，盖妆束处也。妆结，沿梯而上，乡人争先睹为快，咸伺于此，人数半于台下焉。余至，正演次出之半，不识其名。有书生留柳莺婢于室，甫目成，而书僮至，婢猝匿案下。书生与僮语，辄目注案下，案下人亦送盼焉。僮觉，执婢，书生惭而遁。僮婢相调，极诸冶态。台下喝采之声几盖钲鼓，掷金钱如雨。柳莺流目而笑，若默谢云。"这就是花鼓戏的传统剧目《柳莺晒鞋》。说明在同治之前，花鼓戏已正式形成，有专业的戏班可以经常演出了。

这些民间小戏的剧目，最初是一些“两小”（一小旦一小丑）、“三小”（小旦、小丑加小生）戏，像前面引的《柳莺晒鞋》就是典型的“三小”戏。到了职业戏班形成之后，每天要演出，这些两小、三小戏显然不够，便移植一些其他剧种的戏来增加自己的上演剧目。所以，到解放前夕，这些民间小戏一般都有200出以上的剧目。它们演唱的曲调自然是以土生土长的湖湘民间曲调为主，而表演上也同样具备粗放和炽烈的感情。像许多外省小戏剧种的《扯笋》，一般都是载歌载舞的对子戏，惟独湖南有《武扯笋》，除了相同的对子歌舞而外，扯笋的姑娘和守笋的男孩有一段武打戏——不是京戏那种武打，而是民间的武术套路，最后由男孩把姑娘托举下山。文戏如《山伯访友》（即“梁祝”中的“楼台会”），梁山伯离开祝家时，第一次是书僮四九给他牵马，山伯不肯上马；第二次由祝的丫环银心给他牵马，他还是不上马；银心明白：大概是要小姐为他牵马，便向英台示意，英台牵过马来，梁山伯在接缰绳的时候，抓住英台的手咬了一口，然后上马离去。就这么咬一口，把梁山伯那种生离死别、绝望到极点的感情全反映出来。这是吃辣椒的湖湘人火辣辣的感情。

湖湘戏曲的乡土特色，不是哪个著名作家、著名导演的创造，而是历代艺人和观众几百年的共同创造。不少戏剧专家都说，拿湘剧《打猎回书》的剧本，任何著名导演也排不出这样的好戏。我还可以引一折近代的轶事来证明：在半个世纪前，花鼓戏在农村还是草台（一张扮禾桶搭两块门板）或地坪演出，有一次名艺人何冬保（1952年全国会演三等奖获得者）在某乡地坪演《刘海砍樵》，演胡大姐穿的衣服是借来的，戏演得好，刚演完，观众就放鞭炮。何冬保怕鞭炮烧了胡大姐的衣，一时情急，抱起胡大姐高高举起挤出人群，观众齐声喝采。从此以后，唱这个戏如不托举下场观众就不答应。从整个戏来看，一个樵夫碰到如此美丽善良的妻子，光对唱“你是我的夫”，“你是我的妻”是不足以表达这份狂喜的，这一托举，把戏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戛然而止，真是神来之笔，谁又想得到这一艺术处理竟是如此产生的呢？这不正好说明：湖湘戏曲，是湖湘人民的艺术。

“傩文化”之谜

李鸣高

一、还傩愿

20世纪40年代以前，湖南民间盛行“还傩愿”活动。所谓“还傩愿”，就是地方上为了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驱疫除瘟，平安清吉而举行的酬神活动。因为人们所酬的神名叫“傩神”，故称之为“还傩愿”。这种动员全地方的力量举行的“还傩愿”活动的规模是很盛大的，各家各户都要出钱出力，并推选首士主持其事，时间也很长，根据财力从几天到几十天不等。酬神期间除举行请神、和神等各种宗教活动外，还要杀猪宰牛、大宴宾客以及“唱傩戏”，尽情地娱神娱人，人神同乐，人神同欢，以达到“一傩冲百鬼，一愿了千神”的目的。

有些富贵人家也有为了求子求财求寿等目的“许愿”“还愿”的。如求子者的“童子愿”，保护小孩易养成人的“过关愿”，求财的“吉愿”、求寿的“寿愿”等，冲傩也有“冲太平傩”“冲急救傩”“冲地傩”等各种名目。

二、唱傩戏

在“还傩愿”期间，唱傩戏是最吸引人的民间文娱活动，唱傩戏是附属于“还傩愿”的宗教活动之一，其最大的特点是巫师头戴各种假面具进行演唱，所唱的内容有“扮神”与“演戏”两类。“扮神”是由巫师扮演傩坛诸神的神话故事。有《扮傩公傩娘》、《扮先锋娘子》、《扮开山猛将》、《扮监牲郎君》、《扮梁山土地》、《扮师傅娘子》等节目。“演戏”是演些世俗小故事，如《南山扯笋》、《捡菌》、《捉泥鳅》、《货郎卖货》、《梅香办货》、《算匠算命》、《裁缝偷布》、《癞子偷牛》、《艄公摆渡》等节目。此外，也有把《孟姜女》、《庞氏女》、《龙王女》等整本故事改编成大型系列剧搬入“还傩愿”中演出的。这样一来，“还傩愿”中的祀神活动反而退居次要地位，演唱傩戏倒成了“还傩愿”中的主要活动。因此，湘北一带民间有“姜女不到愿不了，姜女一到愿勾销”的

谣谚。

由于傩戏中的神灵都是可以在民间找得到原型的劳动人民，几乎没有帝王将相型的人物，极其贴近生活，因此极受广大群众的欢迎。

三、傩神的传说

“还傩愿”活动中所祀奉的是个什么样子的神灵呢？民间世代相传是人类的始祖神——傩公傩娘。有关他俩传说的大意是：远古时候发生过一次大洪水，整个人类只剩下一对兄妹因乘坐在大葫芦中才幸存了下来，由于世界上只有他们两个人种，所以上天派神鹰下凡，教他兄妹二人成婚，再繁殖人类。兄妹二人开始不肯，后来，二人祈祷上苍，以占卜方式决定是否成婚。在先，妹妹提出在东山西山各烧一堆烟火，如果两股火烟能在天上合成一股，便是上天教他二人成婚。占卜的结果，两股火烟果然在天上绞成了一股。妹妹又提出在东山西山各植一株金竹，如果两株金竹能够合抱在一起，便是上天同意他二人成婚。占卜的结果，两株金竹又合抱在一起了。妹妹再提出由哥哥拿一扇阳磨，她自己拿一扇阴磨，哥哥把阳磨从东山滚下来，她把阴磨从西山滚下来，如果阴阳两扇能够滚到一起，磨心对磨心合在一起，才是上天同意他们二人成婚，占卜的结果，阴磨和阳磨又合到一起了。妹妹知是天意，只好答应与哥哥成婚，但又提出一个最后要求：她将沿着西山向前跑，哥哥跟在后面将她追，一定要二人面对面追上了，才同意成婚。她哥哥跟在后面追了三天三晚，总无法做到二人面对面，这时，草丛中走出一只乌龟对哥哥说：“你怎么这样笨，转过身去追不就能面对面了！”哥哥听了乌龟的话，便转过身去追，果然在山的另一边与妹妹面对面相会了。妹妹说：“你这是转过身追上的，不能算数！”哥哥说：“你当时没有说不能转过身来追呀？”妹妹无言对答，只好把头巾遮住脸，和哥哥成了婚。这就是现在新娘子为什么要用头巾遮脸的由来。成婚后，妹妹问哥哥：“你没有这种聪明，是谁帮你出的这个主意？”哥哥把得见乌龟的事告诉了妹妹，妹妹恨那乌龟，便找到乌龟，在乌龟背上踩了一脚，还淋了一泡尿到乌龟背上，这便是现在的乌龟背上为什么有八卦纹和尿骚臭的来由。兄妹成婚三年后，养下了一个肉葫芦，哥哥见养出的不是人，便用刀把肉葫芦剁成了肉块，把它撒到山野之间，这些碎肉块一落地都变成了人，落在平地的变汉人，落在山脚的变侗人，落在山腰的变苗人，落在山顶的变瑶人……这便是现在各个民族的由来。

这一传说在中国南方各民族中非常流行，虽然因民族的不同而产生了某些差异，但其母题基本一致。兄妹二人的名称同样有差异，大致有“傩公与傩娘”“伏羲女娲”“伏羲伏妹”“姜郎姜妹”（侗族）、“雍尼与卜索”（土家族）、

“阿央兄妹”（苗族）、“日兄月妹”（瑶族）、“老先与荷华”（黎族）、“惹木与乌木”（彝族）、“佐傩与佐婢”（哈尼族）、“西沙与勒沙”（傈僳族）、“傩普与亚妞”（怒族）、“阿拉特兄妹”（蒙古族）等。

不仅中国有此传说，邻近中国的许多国家与地区也都有相类似的神话。

四、“傩”究竟是什么

人们为傩神创造了一个洪水滔天、兄妹成婚的神话，但却无法解决傩神为什么要叫“傩”的问题。关于“傩”见于典籍的记载，《论语·乡党》云：“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孔安国曰：“傩，驱逐疫鬼，恐惊先祖，故朝服而立于庙之阼阶也。”

从孔安国的解释来看，儒家学者根本不懂得傩是什么，他们虽然看到了傩的“驱逐疫鬼”这一方面的功能，但因为他们受“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约束，未能去民间研究一下“傩”，因而并不能回答为什么“驱逐疫鬼”就叫做“傩”的问题。

几千年来的文化人对“傩”的解释大都离不开“驱逐疫鬼”这一片面的认识，说明了他们只是在街头看过民间跳傩驱疫鬼的热闹，而对民间的这一宗教文化现象，是根本没有深入进行过调查研究的。儒家有“非礼勿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清规戒律，因此，他们决不会对这种非礼的异端文化关心，想要在儒家经典中找到有关“傩”的合理答案，无异于缘木求鱼。

“傩”是在三千年前就已盛行于我国城乡的文化现象，它离我们太遥远了，历代的文化人对它又太陌生了，所以历史上难以找到正确的考证，我们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办法来找到“傩”的原生含义呢？

好在中国字是象形文字，古人在创造文字时，如何用形、声来表达它的内涵与音读，是很有讲究的。因此，我们分析一下“傩”的形、声符号，是十分有助于解开“傩”的原生含义的。

“傩”的本字作“難”，“黃”为音读符号，“隹”为象形符号，“隹”者，雀也。

“難”是“鵮”的或字。而“鵮”又是“鷬”的或字，因此，“傩”的最初的本字为“鷬”。“堇”是音读符号，“鸟”是象形符号。

依此，则“傩”的原生含义应是一种叫做“堇”的鸟类。

《说文》云：“堇者，时也。”《管子·五行》云：“修利水土，以待乎天堇”，依此，可知鷬为一种与天时有关的鸟类。

“傩”不是上天的神灵吗？怎么又变成了鸟类？你这不是越考证越玄了吗？一点也不玄。以鸟兽为神难道还少见吗？道教的东南西北四方神为青龙、

朱雀、白虎和龟蛇，不就是些鸟兽吗？我国古代的帝王不自认为真龙天子吗？民间最敬畏的雷神，不就是鸟嘴鸟爪，背生双翼的鸟神吗？

假若我们再懂得些《神话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现代科学，我们就会知道在人类的上古史中，曾经存在过一个“图腾崇拜阶段”。“图腾”为印第安语的音译，其意为“我们的亲族”。上古时代的人往往崇拜一些与人类生产生活有关的动、植物等自然物，把它们视为是人类的亲族，认为人类都是从这些“图腾”神受孕的产物。我国的商代王族，认为他们的始祖就是一位女祖先从玄鸟受孕所生，便是这种“图腾意识”的反映。

读者也许要问：“古代人为什么要崇拜鸟呢？为什么他们要把‘鸟’称为‘傩’呢？”

根据笔者的研究：古代的中国人曾崇拜鸟是因为鸟与农事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古人的农事生产，有许多是以鸟的飞鸣来定季节的，特别是水稻生产，不仅要以鸟的飞鸣来确定农时（如布谷鸟），而且人们的稻作技术，还是从鸟那里学来的呢。古书记载，少昊氏时代以鸟纪官就是崇拜鸟的一个证明。至于向鸟学习耕耘，《越绝书》及《吴越春秋》等书都有“兽耕鸟耘”及“鸟田”的记载。

原来，水稻生长最大的一个特点便是只能在溶烂的稀泥中生长。因此，人们必须通过犁田、耙田等工序，才能把稻种撒下田去。而古人开始并不懂得这些技术，当他们看到禾苗在被野牛、野象、野鹿及水鸟践踏过的沼泽地稀泥上生长得特别好时，才懂得了“兽耕鸟耘”的重要性，因此，在我国古代曾出现过一些崇拜牛、象、鹿、鸟的民族，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日以牛耕田，便是上古“兽耕”的痕迹。而耕耘水田用的犁、耙等农具，便是模仿鸟爪耘田的原理制作的。

为什么在“兽耕鸟耘”中，惟独以鸟为尊呢？这就与鸟、兽的功能不同有关系了。因为鸟能知季节，而兽却没有预报季节的功能；能为人耘田的鸟多为秋来春去的候鸟如鸿雁之类。它们秋天来，把沼泽地里的杂草清除了，有利于水稻的繁殖；春去之前，把沼泽地踩溶了有利于禾苗的生长；而在秋收之前，它们并不在南方，不会啄食稻谷，损坏禾苗。兽类则不同，它们虽也能起到耕耘的作用，但它们为了觅食，也可以把禾苗吃掉或践踏光的。基于这些原因，人们当然崇拜鸟类胜过崇拜兽类了。

但是，“鸟”与“傩”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人们不说“还鸟愿”“敬鸟神”？而要说“还傩愿”“敬傩神”呢？这就要从《民族学》中找原因了。原来，稻作文化是中国南方民族的文化，中国南方在古代是百越民族的聚居之地，百越民族的语言与中原的华夏族语言，是有许多不同的。“鸟”是华夏民

族的语言，而“傩”是百越民族的语言。你若不信，可以到南方各少数民族中去调查一下，就会知道，南方有很多民族都是称“鸟”为“傩”的，其读音由于方言的变化有罗、勒、腊、陆等多种读法。下面略举几例：

壮语称鸟为“NUO、NE、IU，侗语称鸟为NUO、NE、IU，苗语称鸟为NUO、NE，瑶语称鸟为NU，土家语称鸟为NIA……就是东南亚一带的一些民族，同样也称“鸟”为“傩”，如越南人也称鸟为“雒”（见《水经注》引《交州外域记》）。

百越民族不但称“鸟”为“傩”，而且把沼泽地、水田、稀泥都称之为“傩”，水稻中最早出现的品种，也被命名为“糯”，更有趣的是，百越民族把“人”也称之为“傩”。这一系列语言文化的现象告诉我们，百越民族是多么地崇拜神傩鸟啊！由此可知，百越民族的主要“图腾”就是“傩”，因此，“傩”应是百越民族的“图腾文化”，“傩”就是百越民族的神。而“傩公傩娘”之所以称“傩”，便因为他们是“傩图腾民族”的子孙后代的缘故。

五、“傩崇拜”的起源地在哪里？

“傩”的历史若只从经典史籍中查考，最早也只能追溯到三千年前的商代。但当我们知道“傩”就是“鸟图腾崇拜”后，我们就可以从出土文物中的鸟纹来查考我国更早的“傩”了。

浙江河姆渡遗址是我国考古界在20世纪80年代最重大的发现之一。河姆渡遗址的上限距今为6900年，遗址中出土了许多鸟纹图案，证明了百越地区在6000年前就已有了“傩崇拜”。其中有一大型双耳陶盆，显然是当时祠神的祭器，上面刻画的纹饰，一面的中间是一蔸茁壮的禾苗，禾苗两旁刻画着两只正在水田中耘田的神傩鸟，鸟的肚皮上还刻画了三个小圆圈，似乎在昭示人们应该在阳春三月开始农事活动。另一面的中间，刻画着一副假面具，面具有两只大眼睛，但没有刻画口鼻，两耳尖竖，头上戴着一顶三尖神冠，似在告诉人们这是一副傩神面具。面具的两旁，也刻画了两只神傩鸟，神傩鸟的嘴里好像含着禾苗之类的植物。这一双耳陶盆上的图画，明显地告诉了我们，当时的巫师也是戴着假面具在“跳傩”的，而“跳傩”又明显的与农事活动有关。河姆渡遗址出上了大量的人工栽培稻的遗物，证明了“傩崇拜”确是稻作文化的产物，而“傩文化”则是稻作文化所产生的宗教文化。

当河姆渡遗址出土后，全世界考古界都为之兴奋不已，曾以为河姆渡地区就可能是我国稻作的起源地了。但因为考古学家们对宗教迷信多不感兴趣，因此，对河姆渡出土文物中所表现出的傩文化特征未予重视，对纹饰的命名也多有错误。

随后，在印度及我国长江中游又发现了早于河姆渡文化的稻作遗址，考古界因而对中国是稻作文化起源地的观点又产生了动摇。

后来，中国不断发现了早于7000年的稻作遗址，特别是湖南陆续出土了7000年前、8000年前和9000年前的稻作遗址，才又恢复了中国是稻作文化起源地的信心。

迄今为止，1988年发掘的洞庭湖西北角的湖南澧县彭头山稻作遗址，据测定年代，上限为9100±120年，可算得是我国及全世界所发现的稻作遗址中最早的遗址。但因为在出土文物中未发现能明显显示傩文化特征的艺术品，因而未能确定当时是否已产生了“傩崇拜”。

但是，20世纪80年代在湖南长沙市南托乡出土了一座新石器时代的稻作遗址，其上限距今为7100年。遗址中出土了一些刻画有傩鸟纹的陶碗，却颇明显地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有“傩崇拜”了。特别是其中出土的一件大型双耳彩陶罐，与河姆渡出土的大型双耳刻画纹陶盆，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彩陶罐上有黑、红二色彩画，画的是红色的神傩鸟，口中含有禾穗，其底纹也是禾穗纹，鸟头上高照着一轮红日，双耳上各有一朵贴塑的红花，仿佛在昭示着人们应在春花开放的季节从事农耕活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神傩鸟的头上，竟也戴了一顶与河姆渡陶盆上的假面具一模一样的三尖神冠，以表示此鸟不是非凡鸟，乃是上天派来送嘉禾的神傩鸟。

将南托与河姆渡陶器上的花纹进行比较，其风格、母题和内涵如此的相似，这不应是偶然的巧合，而应有文化上的传承关系，南托文化既然早于河姆渡文化，则河姆渡遗址的傩文化显然是南托遗址傩文化的继承。

因此，就目前而言，长沙市南托遗址所发现的“傩文化”，应是中国最早的“傩文化”。湖南地区很可能是中国“傩文化”的起源地。

中国以农立国，农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文化。“傩文化”是中国农业文化的产物，在原始时代，宗教文化就是当时的上层建筑，是古代的意识形态。因此，傩文化对我国古代的民族文化是有很大贡献的。如果最终证实：湖南确是中国稻作文化和傩文化的起源地，作为一个湖南人，是应该对此感到骄傲和光荣的。

湖南杂记

王啸苏

一、戊戌政变时之长沙

湖南地接川黔，实为山国之亚，在海禁未开以前，风气不免闭塞，至同治光绪间仍然。据清史稿列传251陈宝箴传云：“光绪21年宝箴擢湖南巡抚，湘俗故闭塞，宝箴思以一隅致富强为东南倡，先后设电信，置小火轮，建制造枪弹厂，又立保卫局，南学会，时务学堂，延梁启超主湘学，湘俗大变。”

又据附列之黄遵宪传云：“遵宪历湖南盐法长宝道，署按察使时，宝箴为巡抚，行新政，遵宪首倡民治……，略仿西国巡警之制设保卫局。”

又据同卷徐致靖传云：“致靖由编修累迁至侍读学士，尝忧外患日迫，思所以为献纳计，子仁铸，时以编修督湘学，倡新学，书告致靖，举康有为。致靖遂上言国是未定，请申乾断，示从违，藉以觇上意。未几诏果求通才，于是致靖举有为堪大用，并及梁启超、黄遵宪等。”

又据同卷谭嗣同传云：“陈宝箴抚湖南，嗣同还乡佐新政，梁启超倡办南学会，嗣同为之长，届会期集者恒数百人，闻嗣同慷慨论事，多感动。”

又据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南学会序云：“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其学者有畏斋，船山之遗风，其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劼刚诸先生，为中土言西学者所自出焉。……”

又据闵尔昌《碑传集补卷·41·皮锡瑞传》云：“锡瑞湖南善化人，举人，工诗及骈文。治经出入于古今文之间，亦颇考郡国利病，有经世之志。光绪季年，陈宝箴抚湘，江标、徐仁铸先后督学，设时务学堂，俾学者究心当世之务。先生赞助甚勇……”

据此知宝箴抚湘，维新甚力。又有遵宪佐治，江标及徐仁铸督学，嗣同、锡瑞等复讲习其间。一时政治学术，忽有蓬勃之象。然内而有帝后之争权，外而有新旧之分野，故未几而发生事变。

据陈宝箴传云：“会康有为言事数见效，宝箴素慕曾胡荐士，因上言杨锐、

刘光第、谭嗣同、林旭佐新政。上方诏求通变才，遂擢京卿参新政，于是四人上书论时事无顾忌。宝箴又言四人虽才，恐资望轻，视事匪易，愿得厚重大臣如之洞者，领之。疏上而太后已出训政，诛四京卿，罪及举主，宝箴去官，其子主事三立亦革职，并毁湘学所著《学约界说、答记答问》诸书。宝箴既去，诸称便于民者，虽效益已著，皆废毁无一存云……。”

自宝箴罢黜后，其他在事诸人，嗣同已被杀，启超出亡，致靖监禁，仁铸罢官，遵宪解职，锡瑞虽在野，亦被指斥。（以上事实，分见清史稿本纪卷24及诸人传并其他记载）从此，新政倾覆，仍复旧观，民气不伸，人怀抑塞，未几而即有庚子之起义矣。

据《清史稿·德宗本纪·24》云：“德宗亲政之时，春秋方富，抱大有为之志，欲张挞伐以雪国耻。而征师徒败，割地轮平。遂引进小臣，锐意更张，为发愤自强之计。”又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九·光绪盛德记》称其“舍位忘身而变法，处至难之境，难白之地，而卒以仁智垂功德于天下，舍身轻万乘而思以保国救民。”而证之事实，所谓发愤自强，保国救民，殆无一而非幻想。

据范文澜《中国近代史·戊戌变法绪言》云：“当时改良运动倡导者，如载湉、翁同和、张謇、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虽然思想上各有不同，一般说，都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人物。他们希望中国也走一次明治维新的道路，但客观条件绝对不能允许。因为帝国主义通过洋务派与顽固派结合，确立了强大的统治机构，任何改良如果妨碍了他们，必然予以严厉的打击。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在此，戊戌以后各种改良运动无不失败的原因也在此。”

吾以为尚有其第二原因：则由于清政府自身，不能振奋，其执政与豫闻者除极少数人外，大率老者昏聩而少者轻浮，凡所措施，不餍人望。其标榜之预备立宪，亦复徒托空言。反清之势将成，忠君之说已破，民怨沸腾，横议纷起，非至推翻清廷不止。盖事有必然者。忆当30年以前，余肄业清华大学研究院，“饮冰室”为导师，教授中国社会通史及史学研究法，多所启迪。惟以问戊戌时事，仍谓光绪英断，惜乎无权。以次之败，中国实失一致强之机。自今观之，则犹沿当日之见解，而未能“高瞻远瞩”也。

二、自立军起义时之见闻

武昌庚子之役，实以唐才常为主动。《清史稿·谭嗣同传》，首云少与嗣同齐名，称浏阳二生。叙革命事，仅寥寥数语，未能详也。

今据闵尔昌碑传集补卷57唐才常传云：“前清甲午中日之役，兵挫地削，国势益危。烈士发愤讲学，倡变法以图强。于长沙创湘学报、南学会、时务学堂，推谭嗣同、梁启超主之，海内靡然从风。如林圭、李炳寰、蔡钟浩、田邦

浚，李力山、蔡锷、范源濂皆出其门。戊戌清德宗亲政，锐意革新，谭梁等皆在机要。特旨征烈士。未发，今政变作，乃广结海内豪杰以自助。或谓：‘广东僻处岭峤，得之不足以定全局，宜首事湖北……举此则中原不足定矣’。遂设机关于汉口英租界，庚子拳祸作，北京清帝后西窜，都中无主，海内震动，南方隐有独立之议。烈士遂集约汉口蒲圻新堤议于闰八月同时举兵，据湖北分兵五路：北路陈陶痴，龚超、朱洛谿据黄柏山，出河南，结陕中张云之众入长安劫清帝；东路秦力山据大通，略苏常取财赋；沈滇领左路，烈士弟才中副之，驻新堤、岳州；蔡钟浩领右路，何来保副之，驻常德；中路扼武昌为各路根本，林圭主之，李炳寰、田邦浚、王天曙、蔡承煜、傅良弼权副之，烈士则总其成。……因事益暴露，乃密约各地易期。七月末即属秦力山举事大通，先期败，逻者愈急。唐才中率众自湘赴约，所乘舟名昌和者，未至新堤搁浅，汉上援绝饷阻，势且坐困……26日夜，烈士就捕，先时火党人名册文缄，越二日与林圭、李炳寰、田邦浚、傅良弼、蔡承煜、王天曙、黎科、瞿河清等同及于难。”

据此知当时谋，尽才常主之，其组织地点，以湖南北为中心，人力则以时务学堂门人为主干，而辅之以亲密。故汉口失败以后，湖南首当其冲。在事诸人以及有重要关系者纷纷被捕。就余所闻见者，沈荩以立毙杖下而死，唐才中、蔡钟浩、何来保均被杀。沈荩，善化人，分省县丞。其兄克刚由举人官广西知府，尝言荩当审讯时，问官详询准备起事始末，并谓其处有党人名册文件，荩坚不吐实，致无佐证。又碍于家世体面，俾得保全首颈，故予立毙杖下。唐才中浏阳诸生，为才常之弟。何来保，常德廪生，本会党首领，主持湘西一带会务。当二人在长沙府审讯，余因戚某在礼房充役，得于人丛中观之。才中面黑眉浓，身躯颇瘦。来保面较丰满，态度如常。讯问时间不久，其供词均系亲递。问后退堂，刑房某人告余：“此两人快要死了。”我问其故，他说：“供后已打手摹，脚上并带木枷”。手摹，即手指摹印；木枷以木为枷。就是已经定案。越二日即被杀。

蔡钟浩，常德人。其弟湘，留学日本，归国后任湖南甲种工业学校校长。尝云：“钟浩才质甚美，又处事沈著，勇于负责。汉口事败后，仍与来保部署党人，希图起事。虽知无可为力，仍不退却，有人劝其避地他位，坚决不从，卒至为捕陨命。”

又在湖北就义之李炳寰、田邦浚均湖南慈利人，县志有传。炳寰之父树芳，以秀才习法家言，为湖南按察使署刑幕与黄遵宪相得，倾心变法。追炳寰被杀，忌者罗识成狱，竟论斩。临刑之日，余尝见之，父子先后毙命，观者咸为太息焉。（慈利县志亦有传）按察使，俗称臬台，专管刑名，刑幕乃其署中

助理刑事者。

又溆浦诸生舒闰祥，家居长沙，祖若父均仕宦，闰祥与谭嗣同、唐才常结合，与闻要务。汉口事败，名在捕中。军吏率人至门，示以拘票，未即捕击。闰祥自知无生理，饮药而死。

又善化毕永年，为江标督学湖南时所取拔贡。少时喜览西籍，醉心卢梭民权之说。1899年（光绪25年）组设湘学会，日与谭嗣同、唐才常、林圭辈讲论。戊戌政变，嗣同被杀，愤而斥卖田产至北京，设湘报，痛诋执政，其存华篇尤为世传诵，清廷遣兵围捕，越墙得脱。因亡命日本，易名安永松彦，与日本民党宫崎寅藏往还复创汉报于东京，革命言论，日益豁露。寻组设同盟会，为策划萍乡、浏阳之举。惠州事起，尝与其役，后仅以身免，因匿居僧舍中，未几病殁，年仅三十有二。

余与舒毕二家有故，尝撰舒烈士遗事及毕烈士传，为以正事实之根据。

近阅范文澜氏中国近代史第7节自立军起义云：湖南维新派多与兴中会接近，1899年（光绪25年）梁启超、唐才常、林圭、秦力生、吴禄贞等，决议在长江沿岸各省起兵，运动会党与防军，先袭取武汉为根据地。兴中会会员毕永年联络两湖龙头杨鸿钧、李云彪等数十人归附兴中会。杨、李所开山堂，势力最大。梁启超谈合作，目的在借用兴中会的会党群众。唐才常约林圭等回国筹备起事。梁启超开会欢送，兴中会主要会员也有许多人到会，彼此互约合作，兴中会在长沙的会员及会党，都介绍给唐才常、林圭。唐、林到上海，发起正气会，订定会章，其序文有拥帝论及反满语句，颇觉矛盾（此处略节原文）。革命分子毕永年、章太炎严厉反对，毕劝唐与康断绝关系，辩论一日夜，不得要领。唐才常联合会党开富有山堂，以康有为为正龙头，梁启超为副龙头。兴中会影响下的会党龙头去毕归康，毕愤极削发为僧。

上列诸人，志节超群，死事甚烈，固不借文彩以重。然即以诗文论，亦有足称者。

才常为湖南丁酉拔贡，督学江标极许其文，拟之龚定庵、魏默深。其所流传之诗，亦复磊落自喜。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屡载之。诗话又云与何来保未获识面，顾夙闻谭浏阳称其为人，谓生平肝胆交，除绂丞外，君为第一，并录其绝命诗四首。又称钟浩血性过人，治事机警，录其狱中诗四律。又称长沙烈士舒闰祥，为谭浏阳至交，录其感怀诗八章。

余于唐诗喜诵其“剩好头颅酬死友，无真面目见群魔”句。于何诗喜诵其第一章“银枷铁锁出围墙，亲故纷纷送道旁。三百健儿齐护卫，万头攒动看何郎”句。于蔡诗喜诵其首章结尾“鸡鸣午夜频回首，看剑挑灯意惘然”句。于舒诗喜诵其次章结尾“三千死士田横岛，南望中原涕泪霏”句。综览诸诗，大

率才思横溢，慷慨悲歌，各有不可一世之概。偶窥鳞爪，可见生平。

又毕烈士永年，削发于广东惠州准提寺，忧时感愤，抑塞以终。余于1902年（光绪28年）春间旅寓惠州，漫游斯寺。见其壁间题诗五绝，竟署慧澄。余喜诵其第一首云：“黑云如墨压幽燕，投袂驱车我独先。一诵遗书一盼断，忠臣血泪满红笺。”其事殆即指谭嗣同在京殉难，前曾寄书，闻耗以后，孑身北行，欲继其遗志，有所图也。

按：烈士始与才常、嗣同为至交，共谋同事。其显迹亦与康梁相接。迨后思想锐进，突过诸人，志事虽宏，饮恨而陨。故览范史而叹其纪述之详尽；诵遗什而怅其墨翰之无存。往迹回思，有余慨已。

清末湖南军事教育

李云龙

一、前清末年之湖南军事教育概况

前清末年，外患频临，国事益不堪问，清廷恍然绿营教练，勇筹旧军，概不足恃，始有整军振武之举，于京都设一军咨府与练兵处，以总理军政事务，每省设一都练公所，内分兵备、参谋、训练三处，各任其责。下面立军事学堂，培植基层干部人材，其办法取统一制，每行省一个陆军小学，全国四个陆军中学，一个军官学堂，均三年毕业递升。而当时亟欲创练新军，需低级干部多。湖南在光绪二十八九年间，临时办有武备、将弁、兵目三学堂，继又成立一个陆军速成学堂，以为练新军的预备，各省亦多办有此项学堂，均系一种速成性质，修业期间既短，且办一班即止。惟湖北武昌的江南陆师学堂，历时稍久耳。兹述湖南陆军小学堂该时的状况于下。

创办年月。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端方抚湘，始委兵备处总办宛平俞明颐观察，征工鸠材建筑校舍，计西式楼房六大栋，（偏南两栋三十三年建），上下两层，上层为学生寝室，下层为讲堂与自修室；此外办公室两栋，教职员宿舍、食堂、医务室、藏书楼、会客厅、雨操厂、仓库各一所，杂房十余间，厨房一栋。是年秋工程告竣，招生开学。

堂址：省城小吴门外演武厅后。

组织：总办、监督、提调各一员，文案、收支各一员，司书四员，教员十五至十八员，学长九员，医官二员，支应司事二员、管库司事一员，卫兵一班，杂役二十余名。

总办俞明颐，湖南候补道；光绪三十三年夏，俞公调任镇筑，湘抚另委在籍云南候补道汤鲁璠继其任。

监督初为江南陆师学堂毕业学生谢良翰；光绪三十三年夏，湘抚改委兵学教员李云龙继其任。

提调王继善，江南陆师学堂学生；光绪三十三年夏，王他适，湘抚另委历

史教员夏国桢继之。

文案吴品禹、梁锡祜均湖南候补知县；收支梁寅，湖南候补知县；支应司事周继盛，府经历，余德鑫，广东候补知府，管库司事安治、陈泽均县丞；医官曹敬山、罗正薰、康晋侯、潘让，清附生。

修身教员陶忠靖，清附生，国文教员郑业树、吴宗宝，均清举人，陈长璇，清拔贡；历史教员钱维骐、线经纲，均清附生；地理教员杨翼林、陈占著；算术教员王正枢、王承烈，清附生；廖均涛格致教员；佐久间日本千药医院医师，吉光熏留日学生；图书教员卢文缙；英文教员张超、蔡卢，均上海同文馆学生；日文教员徐绳武，留日学生，谭国辅，日本岩仓铁道学校学生；德文教员毕鸿熏，留德学生；法文教员张广缓，上海同文馆学生；兵学教员胥大诚，留日陆军学生，杨鸿图，武备学生；学长曾君典、易世珂、李鸿章、杨付清、王钺、均兵目学生，胡兆舟，陆军速成学生，范介标，兵目学生，项绩熙、皮冤九、李观荣提任管理训练工作。

课程：分教授、训练两门。教授课目：为品行修身、国文、外国文、历史、地理、数学（代数、几何、三角）、格致（物理、化学）、图书，其程度等于高中。训练课：一操练，分单人操练至中队教练；一兵学，步兵操典、射击教范、筑城教范，野外要务令等兵学基础。

班次及学生人数：自清光绪三十一年秋起至宣统三年秋止，每年招生一班，每班一百名，共五班。第一班学生光绪三十四年秋毕业，其时驻鄂第三中学堂工程尚未告竣，令留堂补习，至宣统元年始送鄂升学；第二班学生宣统元年十二月毕业，宣统二年一月送鄂升学；第三班学生宣统二年十二月毕业，宣统三年春送鄂升学；第四、第五两班学生适值辛亥革命，未及毕业均纷纷入伍参加革命，不久南北统一。归马放牛，陈少数改进军需学校外，概由入伍生升入保定军官学校深造矣。

待遇：书籍、笔墨、纸张、衣服（每年每生单布制服两套，每生三年呢制服两套），被帐（每期每生一套），灯油、膳宿、医药暨赴鄂升学计算所费等项，概由堂中担任，每月月考视其成绩高低，并奖给三至四两之奖银。

学生毕业后的服务状况：辛亥革命，莘莘学子概已参加，但初从戎，多半提任下级干部，自此循序渐进，资历日深，北伐之役，抗日之役，联翩群彦，无不义愤填膺，执戈前驱，或秉节钺兼封圻，或握军符总师干，其中杀身成仁者复不乏人。如李必潘、黄启东等之殉难菏泽，勇敢壮烈，其浩然之气，尤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岂非明耻教战所收之果欤！昔日英俊多半谢世，现尚有唐孟潇、贺贵严、曹伯闻、陶峙岳诸君健在。

云龙昔年忝任湖南陆军小学堂监督，数历寒暑，今日回忆，恍同隔世。

附言：陆军小学共办五期，第一期于1905年秋季入学，应在1908年秋季毕业，因陆军中学校舍建筑未竣工延至1909年春毕业；第二期1907年入学至1910年毕业；第三期1908年入学至1911年毕业。学生有唐生智、贺耀祖、刘兴（一期）、戴岳、陈浴新（二期）、陶峙岳、曹伯闻、刘峙、罗霖、周斓（三期）、胡达、罗藩洋（四期）、毛炳文（五期）。武昌起义消息传到湖南后，陆小学生大都跃跃欲试，是辛亥革命中一次军事上的辉煌胜利，使清政府受到沉重打击，革命形势进一步高涨。

二、湖南武备学堂与陆军小学的关系

湖南武备学堂与陆军小学的关系，如果从军事教育的制度而言，是不相涉。清末朝贵鉴于甲午之役，海陆两军，完全失败，总想建立起一种有力的国防军，时而要学德国，时而要学日本，不知如何搞法。他们知道绿营是无用的了，也知道北洋大臣的洋枪和刀叉并用，也是无济于事的了，必须从头搞起，于是发生了练兵人才的缺乏问题。虽然选送了一批留德、日及其他国家的学生，因学程关系，一时不能回国，而形势逼人，到了日俄战争，自己的领土，公然被作为外人角斗之场，无论任何丧心病狂的人，也不能容忍迁就，还是要有一套建军制度才有前途，于是有全国三十六镇（师）的计划出现。湖南的番号是第十三镇，先成立一协，感觉基层干部如队长、排长、军士在现有的军队中实无法挑选好，在我们湖南癸卯年设立了武备学堂，那班学生都是有文学基础的秀才、童生，期以两年毕业，只办一期作为建设常备遵循军的骨干。同时在绿营中挑选了一班年富力强、文学有根底的千百把总之数。另办一将弁学堂，期以一年毕业，为改良旧式军队之用。又挑选一班优秀的青年文童办一个兵目学堂，也是一年毕业，作为军队基础之用，为后来建立新军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湖南在清末除了绿营外，还有一种招募的军队，应于需要，成立了发字旗、定字旗、威字旗、健字旗等旗的字号，并不一定，有时扩充，有时裁撤。当成立常备新军的时候，抽拨了一部分编为新军，一部分改为巡防队，那些带旗营的将领，多是湘军出身的，记名总兵或总兵之类，黄忠浩以都司带过威字旗三营，后来因在广西剿匪，做过右江镇总兵。

新军初成立时（丙午年），称为常备新军湖南第一协辖第一标第二标，因小吴门外营房没有建好，就设在城墙上和纱帽塘等处，是武备学堂的学生经过两年学习期满才筹备成立的。到了宣统元年，拟完成全国三十六镇计划，经过陆军部检阅才改成二十五混成协，除辖四十刀标、五十标处，还有炮兵营、工兵营、骑兵队、辎重队，当营长和独立队队长以上的军官，留日士官学校居

多。标统协统都是从北洋六镇的军官调来，或者是北洋六镇有关系的军官。湖南留日学生，在二十五混成协当军官、参谋官、教练官管带（即营长）及营以下的分为前后左右四队。

队官大部分是武备学堂毕业的排长，有速成陆军学堂毕业的和兵目学堂毕业的。当时，因初级干部不够，还办了一班陆军速成学生，一年半毕业，是丙午年入堂丁未年毕业的。

辛亥革命前夕，第二十五混成协辖三排，每排约五十人，炮兵营只有三个队，骑兵正在筹备，辎重亦然，但是架子已经打好了。

巡防分为前左右后中五个队，每队兵力不一定，听巡抚的意旨，有辖十个队的，有辖七个队、五个队的，编多少就是多少，全国算起来湖南的巡防营是数多的省份。

至于陆军小学则是永久性的正规教育制度，小学各省一个，中学只有湖北、南京、西安、清河四个，军官学校一个，设在保定。小学三年毕业入中学，两年毕业，入武六个月，再升入军官学校两年，派往军队见习六个月，当排长两年，选考陆军大学三年毕业，人数不到百人一期，这是一定的制度。

督练公所是巡抚兼所长，藩台兼参谋处长，县台兼兵备处长，兵备道或巡警道兼教练处长，处内办事的是科长、科员，多是东西留学生和陆军大学学生。

湖南武备、将弁、兵目、陆军小学，陆军速成以及新军都由喻明颐任总办，当时他是协统，红极一时。我和程潜于1903年去日本读士官学校，都是他保送的，此人抗日尚在。

雅礼大学二三事

周千里

在湖南，雅礼中学是很有名的，知道的人很多。雅礼大学是雅礼中学的前身，现在知道的人就比较少了。它创建于1906年，到1926年冬，由于大革命政局影响停办，1928年与湘鄂两省几所大学一起合并到武昌华中大学，前后只办了20年。这段历史处于清末民初阶段，距今已半个多世纪，加上当时的学生多已作古，尚存者屈指可数，散居大陆、台湾、美国等地，如湖南省文史研究馆的馆员曹陶仙先生和居留美国的爱国人士何凤山先生，都是九十高龄，已不大过问世事，无怪乎人们对于雅礼大学这个名称感到十分陌生。

雅礼大学的筹办开始于1901年初，即光绪末年。当时美国著名学府耶鲁大学有少数毕业生热衷海外教育科技事业，倡议到中国来办学校和医院，得到学校当局和广大校友的支持，于是在1902年成立雅礼协会主持这一工作。首先来华筹备的是德士敦先生夫妇，他们选择了长沙作为办学地点。1904年德士敦先生病逝，盖葆耐先生、席比义先生、解维廉先生等接踵来长沙，1905年胡美博士也从印度来中国；经过他们共同努力，多方交涉，才租得西牌楼一所民房为校舍。学校于1906年11月10日开学，由盖葆耐先生担任校长。

学校定名为“雅礼大学堂”。“雅礼”二字，一方面是译 yalc（耶鲁）之音，也取《论语》“子所雅言，读书执礼”之义。校友何凤山先生对这两字有一段解释：“雅”就是高雅、儒雅、风雅、典雅、雅致；而“礼”是礼貌、礼教、礼让、礼节；持之以礼，礼者理也，理智、理解、理论。由这些字义的解释，雅礼学校的宗旨，从开始起就教导学生成为气质高雅、德智兼备的君子，亦即为国家造就优秀的国民。他的解释虽不能说有权威性，但可以反映学生对母校看法之一斑。

最初的校舍是一栋较大的旧式民房，有上下两层，将房间作了一些拆拼，改成教室。一间大的教室就兼作礼堂。花厅作为内操场。厨房、食堂、杂屋统统都设在这栋民房里。校舍右边的巷子里有一栋较小的民房，也分上下两层，下层住了负责人解维廉的家眷，上面做学生寝室，另外一些房子改作中外教员

的卧室和学校办公室。第一批招生三十人，使用起来还宽绰。后来学生逐渐增加，就有人满为患之感。校舍对面还有一栋民房，原来办了雅礼医院，胡美先生任院长。后来医院扩大，迁到潮宗街，这里就改为雅礼大学的学生宿舍和教室，民房外面有一块空坪，学校租作操坪，总算是有所扩大了，不过仍然不敷应用。

后来学校购置了北门外麻园岭校址（即现在湖南医科大学北院）兴建校舍。至1916年第一期工程竣工，规模初具，学校便由西牌楼迁入新校舍。以后陆续增添房舍，到1920年科学馆落成，学校才建成一所气魄宏大、绿化美丽的校园。前门面临北大马路，后门直通文昌阁，中间有科学馆、大礼堂、寝室、食堂、大操坪及教授住宅。幢幢西式建筑之间，草地如茵，树木扶疏，风景如画，大学规模日臻完善，与昔日西牌楼校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大学为五年制，本科三年，预科二年，1920年还增设了中学部。学校在美国康涅狄克州立案。我小时候看到先父书房里挂着一张羊皮纸的文凭，上面只有“雅礼大学文科学士”和父亲的名字，还有一位中国教授“周正权”的中文签名，其余都是英文。先父向我解释，说文凭上写的是“雅礼大学授与学士的权力是经美国康涅狄克州的法律许可执行的。”也就是说，这个“学士学位”与在美国所得的学位没有区别。

雅礼大学是美国人所办的学校，在抗美援朝时期，早已是雅礼中学了，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同仇敌忾，因之对这所学校有过一些“左”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其实，雅礼学校受雅礼协会的资助，而雅礼协会是一个民间机构，其基金的筹募来自民间，应该属于美国人民的范畴，与美帝国主义还是有区别的。现在，我国正进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主张吸收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先进文明成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回忆雅礼大学的一些特点，有利于我们了解它的历史面目。

雅礼大学的特点是：

第一，学生宗教信仰自由。有许多人认为雅礼大学是教会大学，这是与事实不符的。教会以传教为主，办学为辅，也就是说办学是为传教服务的。例如益阳的信义大学是挪威信义会办的，其宗教气氛就比较浓厚，教会希望学生信教。而雅礼大学是雅礼协会办的，经济来源于协会，办学也承继耶鲁大学的传统，尊重学生的信仰自由。虽然学校把圣经列入必修课（其实圣经是研究外国文学应学的一本书），但从不对学生的信仰施加压力。全校教徒不过四分之一。其中还有些本来就是教徒，像我父亲小时候就领洗入教，其信教与雅礼无关。雅礼毕业生担任神职的并不多，据我所知有欧阳峙、张君俊、陈迪元。其中张君俊在美国读神学时选修了政治课，后来转而从政，只算得半个牧师。

第二，中美职工平等。雅礼协会有条原则，就是协会所聘请的中美教职员待遇平等，同工同酬。比如大学庶务王海干先生与美国籍的教务长可以平起平坐。后来雅礼中学第一位校长黄溥甚至训斥缺课的美籍教师。在当时崇洋媚外、洋人气焰不可一世的时代，这一现象确实难能可贵。数十年后，湘雅医学院首任院长颜福庆博士在开罗遇见何凤山先生，把手叙旧，言“雅礼最可爱之处就是平等的精神”。

第三，实行通才教育。雅礼大学虽然文理分科，但是互选的学分很多，这体现了“通才教育”的精神。解放前有名的中学数学教师邓涤邦先生在雅礼大学却是学文科的。这便是“通才教育”的产物。这方面与苏联的教育理论有所径庭。解放后中国学苏联，现在苏联已告解体，中国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通才教育”是否也有参考价值呢？

第四，学校要求严格。一是管理制度严格。学校除本科生以外（有大部分在外兼职），一律在校住宿，并且一律穿制服，重视仪表。星期六外出必须按时回校。在校园内要讲卫生，不许随地吐痰，要携带手帕，要求守时，不许迟到。负责训育和管理的王海干先生，执行这一切规定，铁面无私，学生对他既畏且敬，因而培养成了优良的品德习惯。二是考试严格。学校功课紧迫，使人非得用功读书不可。有些美籍教员在月考期考之外，还有突然袭击的小考。先父教书的时候，常常带些小纸条在口袋里，上课中途突然发给学生，或检查一行，或抽试一列，或全班测验。有时当讲评，有时带回记分，作为平时成绩，虚虚实实，学生不敢不复习就来上课。这些都是学了洋教授们的办法，当然未必可取。但是学校严格要求，对于学生一辈子做学问做人都有好处。

第五，英文程度超强。由于学校美籍教师多，除中文以外都采用英文教本，使用英语教学，学生不论文科或理科，英语口笔头表达能力一般超过其他国内大学的水平。在清末民初，国内专业学英文的人多半是笔头能力强，口语能力有所逊色，而雅礼大学毕业的学生却没有不会讲英语的。雅礼大学的毕业生在湖南教英语的不少，其中如杨笔钧、李震鹏、袁贤书、杨子佳、陈虔僧、彭义裸等先生都有相当名气。先父纯熙先生在南京工专教英文，副董事长于斌主教十分赞赏，建议学校立即聘用为教务长。后来的雅礼中学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抗日战争时期，雅礼毕业生当翻译的很多。解放后，曾改为“长沙市五中”，改革开放后，又恢复了“雅礼中学”的旧名。美籍教师又回到了雅礼。如今雅礼中学的学生，英语程度仍然超常。特别是近几届统考，凡是报考外语专业的学生，没有落选的。

第六，重视中文和体育。一般人认为美国人办的学校一定偏重英文而忽视中文，殊不知雅礼大学却特别注重中文。每天上午上中文至少二小时，每周作

文一篇。当时教员水平很高，如汪根甲、黄琴台、周铁山、刘宏度等教授，或是清朝翰林，或为饱学之士，所以雅礼大学学生中文水平不低，还培养了一些有中文专长的学生，如邵子风先生后来研究甲骨文，曾任湖南大学、华中大学教授。朱汉先生则是湖南数一数二的国文教员。

雅礼功课固然十分紧张，但对体育也不忽视。学生下课后，一定要到操场去运动，不准学生呆在教室里。学校足球、篮球、排球队都屡挫省内外中西对手，其中尤以足球队享誉最高。田径方面在省运会中成绩突出。看来尽管概念有些不同，当时学校对德、智、体三方面是没有偏重偏废的。

雅礼大学 20 年来培养了一批人才。在旧社会从政的有何廉，曾任经济部次长；赖琏，曾任教育部次长；何凤山，曾任驻埃及、哥伦比亚大使；余籍传，曾任湖南省建设厅长。从事高等教育者有黄溥，曾任华中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金岳霖，曾任北大哲学系主任；曾昭伦，曾任北大化学系主任，建国后任高教部长；肖恩承，曾任北大英语系主任；还有地理学家黄国璋，采矿学家黄国瀛，心理学家肖向荣，物理学家戴理智、陶世珍和提任过湖南医学院院长的精神病学专家凌敏猷等著名教授。从事中等教育事业的人更多，雅礼中学同学会创办过三所中学：广雅中学、协均中学和敦雅女校。担任过高职和中学校长、主事的有罗敦厚、劳启祥、应开识、杨笔钧、李震鹏、陈熹、陈虔僧、沈增琪、杨子佳、曹陶仙等先生不下 20 余人。还有一批著名教师如袁鹤皋、左复、王光鼎等先生。此外，在海关、邮局、企业供职的，和定居海外发展的也不少，均有一定成就，不一一列举。从事革命工作的突出人物有柳直荀同志，他就是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中“我失骄阳君失柳”的“柳”。还有杨开慧同志的哥哥杨开智先生也是雅礼大学的学生。

与雅礼有关的同学会，据我所知有四个：一是“三雅同学会”，三雅是指美国耶鲁、中国雅礼和湘雅。会址设南京，理事长为王宠惠，赖琏、何廉、何凤山都是理事。二是雅礼大学同学会，成员限雅礼大学本预科生，会址设长沙，首任会长为劳启祥。三是雅礼校友会，会址设长沙，凡雅礼大学、中学、解放中学、五中校友均属之。四是福艺雅同学会，是一个临时性联谊组织。福湘是一所教会女中，艺芳则系曾宝荪、曾约农姊弟所办，与雅礼三合一似乎有些不伦不类，但是三校学生之间有种种关系，如系姊妹、亲友、世交、夫妇等，所以也成立一个同学会。

先父生前常常喜欢与我谈雅礼旧事，我与父亲的同学也都有一些过从，熟悉他们的情况。兹就个人亲闻，并参阅有关资料，草成此文，仅为一鳞半爪，聊供我省研究校史的同志参考。

抗战中的湖南新闻事业

谌　震

早在纪念抗战一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曾写道："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抗日战争中的湖南新闻事业，同其他地区、其他方面一样，也以生动的事实，证实了毛主席的这个论断。

湖南新闻事业始于戊戌变法，当时的《湘学报》、《湘报》为时虽短，却在湖南播下了新思想的种子。此后湖南人参加革命的多，办报的也较多。由于反动政府的压制，内战的影响，在抗战前的四十年中，湖南的新闻事业历尽坎坷，报纸集中于长沙一地，乡村很难看到，广播兴办未久，更谈不上普及。进步报纸常被摧残，黄色小报反形泛滥。及至抗日战争爆发，湖南新闻事业乃焕然一新。虽在这八年中遭遇种种困难，但质量和数量都大有进步，对抗战大业，对湖南文化的普及和提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日中的湖南新闻事业，可分三个阶段来叙述：

从抗战爆发到长沙大火（1938 年 11 月）是第一阶段。这时国共再度合作，民心振奋。平津宁沪文化人和青年学生大批撤退到湖南，因此报纸读者猛增，刊物如雨后春笋。1937 年 11 月，八路军代表徐特立返湘，接着是张治中代何键主持湘政。他与共产党真诚合作，鼓励报纸揭露地方黑暗，发动民众抗日。1938 年 1 月，长沙同时出现两种新型报纸，一为田汉、廖沫沙主编的《抗战日报》，一为革命青年创办的《观察日报》，都由共产党领导，而风格各异。前者多发表文艺作品，后者以通俗见长。但都立论鲜明，文笔锐利。原有的报纸，或大有改进，或渐次淘汰。省政府的《国民日报》《通俗日报》、老牌的长沙《大公报》均面貌一新。南京《中央日报》一度迁长出版，亦颇有可观。尤以民营的《力报》，本来就倾向进步，经营管理也较好，此时更能畅所欲言，并连续派出记者到前线和湘西采访。这时长沙的新闻界颇能团结奋斗，先后有长沙市记者抗敌后援会、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长沙分会的组织。外国记者

如斯沫特莱、国内名记者如《大公报》的范长江、《新华日报》的陆治，都曾来湘采访。来湘的学者作家画家如翦伯赞、吕振羽、沈从文、张天翼、丰子恺、赵望云等都曾为长沙报纸撰文绘画。当徐州撤退、武汉告急时，《观察日报》曾发起如何动员民众保卫湖南的讨论，对于国民党内顽固派阻挠民众活动的种种错误作法有所批评。各报还先后开展各种社会活动，如向读者捐募寒衣、征集慰问信等，既以实际行动支援前方将士，又激励了广大读者的抗战热情，效果很好。各县也出现了一批进步报纸，如邵阳的《真报》、南县的《工余晚报》、溆浦的《呼声报》等，共达 30 多种。

从长沙大火后到 1944 年夏秋长衡失守为第二阶段。这时因战局影响，报纸分散，形成衡阳、长沙、沅陵、常德好几个中心，衡阳此时成为南方交通的枢纽，因此衡阳各报的影响也扩展到邻近的粤桂赣诸省，《大刚报》销数超过一万份，破湖南历史纪录。《力报》先后在邵阳、衡阳、沅陵出版，虽各自独立经营，而立论和风格大体一致。湖南《中央日报》创刊于邵阳，虽属国民党系统而态度颇为开明，内容亦颇充实。先后在茶陵、衡阳出版的《开明日报》，先在常德后迁沅陵的《新潮日报》，都是鼓吹抗战、团结、进步的号角。但因国民党此时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对新闻界加紧控制和摧残，先后封闭了《观察日报》《抗战日报》、邵阳《力报》《开明日报》，逮捕了邵阳《力报》的康德、《开明日报》的骆何民、《大刚报》的华恕、益世通讯社的杨任之等，至于扣检稿件、警告、罚报纸停刊数日、甚至指名撤换编辑等等，更是不胜枚举。加以敌机轰炸、物资匮乏、物价飞涨，更给报纸造成重重困难。如《大刚报》在 1940 年连遭三次轰炸，工人一死七伤，印刷设备两度被毁，损失之惨重，可以想见。此时印报都用土纸，铅字难于更新，往往一片模糊。而职工生活，更是艰苦万状。但许多进步报人仍不屈不挠，坚持真理，并有一些著名的学者如国际问题专家杨潮、刘思慕、原上海《申报》总编辑俞颂华，都曾来衡阳分别主持《大刚报》、《力报》笔政，为湖南报界增添光彩。据 1941 年国民党中宣部统计，全国已登记的报纸 555 种，该部实际收到 377 种，而湖南占 64 种，在大后方各省占首位。

1944 年 6 月至 1945 年 9 月为第三阶段。此时湖南大半沦陷，长沙、衡阳、邵阳等地报纸多数停刊，有少数辗转撤退。如湖南《中央日报》由邵阳迁到安江，长沙、岳阳两地的《国民日报》合并，曾迁到桂东出油印版。衡阳《力报》、《大刚报》则先迁到广西柳州，再迁贵阳出版。省内仅沅陵的报纸较多，影响较大。但在 1945 年初，《中国晨报》又在新晃县异军突起，主编为冯英子、严怪愚，储安平、吴希之亦曾撰写社论。因其言论激烈，一时有"湘西新华日报"之称。而湖南《中央日报》也因言论"越轨"，两次受到新闻检查

所的指责。

从以上的简略回顾，可以概见湖南新闻界在抗战八年中艰苦奋斗的精神。

现在再举出湖南报纸对于抗战大业的贡献以及报纸本身的进步：

第一，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发表过许多有分量的文章和新闻。例如“七七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还说：“和平未至最后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长沙《力报》标题即就蒋的谈话略加改动：“和平已至绝望时期，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无异对蒋严厉批评。1939年4月7日，邵阳《力报》发表严怪愚的重庆专电，在国内首先揭发汪精卫与敌人签订“江平沼协定”的卖国罪行。同年3月，《抗战日报》揭露省立常德中学所编政治讲义中，竟引述周佛海的文章，而周佛海此时已随汪精卫叛国投敌。1941年3月27日，《开明日报》公布国民党特务深夜绑架该报总编辑骆何民等12人的暴行，并在社论中批评国民党假借“异党”的罪名迫害进步人士，破坏团结，其结果只能葬送国民党自己的前途，贻误抗战大业。1943年10月7日，沅陵《力报》发表社论《不要拖》，批评国民党消极抗战，经重庆《新华日报》转载，竟引起蒋介石的大怒，斥新闻检查局的嗅觉不灵。1944年5月21日，杨潮在衡阳《力报》发表《中原之战》一文，判断敌军即将聚兵武汉，打通直贯大陆南北的交通干线，呼吁当局作好充分准备。1945年5月22日，湖南《中央日报》副刊发表文章，盛赞被国民党开除党籍的柳亚子的革命精神和高尚道德，受到严厉警告，致使副刊编辑去职，新闻检查官也受到处分。在美国向日本广岛投掷原子弹、苏联向日本宣战之后，《中国晨报》在社论中断言日本侵略者将于48小时内投降，完全料中。像这类的事例，在当时都产生过积极影响，在新闻史上也都有相当的价值。

第二，在新闻编辑社会活动和经营管理方面均有所创造。例如，1942年10月10日，《大刚报》在我国首次举办民意测验，在一个月中收到读者答案一万多件。测验结果表明：99.6%的读者相信中国必能取得最后胜利；30%以上的读者主张联盟国应先以全力解决德国，再击败日本；有58%以上认为战胜之后，中国应与日本和平共处。此项测验结果经外国通讯社转播，引起各国舆论界的重视，《纽约时报》对于中国读者在德日问题上所表现的远见深表惊奇和敬佩。1943年11月常德会战时，《大刚报》通过美国驻华空军，向我被围守军散发报纸，鼓舞士气。同年底又定期出版“敌后航空版”，由美国空军带到沦陷区散发，供敌后军民阅读。此后湖南《中央日报》也曾照行。此事也经外国记者报道。此外如邵阳《力报》曾举行“敌后报纸展览”，《开明日报》曾刊印巨幅木刻《抗战门神》，《新潮日报》曾举办报纸义卖、戏剧义演以

慰劳常德守军，等等，都是很有创造性的。在经营管理方面，湖南《中央日报》、《大刚报》、衡阳《力报》都能精打细算，灵活经营，克服种种困难，保证报纸的供给和发展，这在当时都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在普及文化和培养人才方面，成绩卓著。我国报纸一向集中在大中城市。抗战前湖南多数县份已有县报或通俗报，但是内容贫乏，印刷简陋，销数甚少。抗战期间，大报分散到湘南湘西五六个中等城市，各县都有县报，其中颇有一些办得较好的，除前面所举《真报》等以外，还有《新化日报》、《湘潭日报》等等。又如溆浦的《龙潭壁报》是三个乡的联立民教馆所办，从“七七事变”起创办，由手写改为石印，又由石印改为铅印，一直坚持到1947年，长达十年之久，这对于文化的普及，实有巨大贡献。在这八年中间，湖南报界也出了不少人才，如著名历史学家黎澍，是从创办《观察日报》进入新闻界的；学者和杂文作家何满子，原是衡阳《力报》的编辑；名记者王淮冰、周沙尘、陈朗分别是《大刚报》、衡阳《力报》和《开明日报》的记者；原《抗战日报》记者黄仁宇，则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此外在文化教育界有所贡献的尚多，就不一一列举了。由于抗战中锻炼出一批人才，湖南新闻界在解放战争中更是处于“一边倒”的状态，这对湖南政局的发展自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九三六剧社纪略

徐德驷　柳铁城

缘　起

1936年，抗日救亡运动方兴未艾，但是，在反动统治的湖南，仍然坚持“不抵抗主义”的顽固立场。这时有一批进步文化界人士，在上海抗敌救国会的影响下，组织了湖南文化界抗日救国会（简称“文救”），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主要发起者有受救国会之托刚从上海回湖南的李仲融和新闻、文艺界名人唐续掞等人。为了使“文救”更好地发挥作用，团结更多的知识分子参与抗日斗争，他们根据自身特点，于同年6月成立了两个组织：一个剧社，即一九三六剧社（以下简称“剧社”），由唐掞斋负责；一个紫东文艺社，由张曙负责。

历史的评价

随着时间的推移，剧社现已鲜为人知了。只有些老同志回忆湖南文化界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的活动中有所提及，如革命前辈杨第甫同志在他的《三去延安》回忆录中，曾提到剧社及其同仁；剧社发起人之一的刘乐扬同志在《我与中央特科湖南工作站》一文中，写到了剧社的建立；熟悉长沙掌故的黄曾甫老先生在他的《长沙话剧溯源》一文中，谈到20世纪30年代话剧情况时，认为剧社在长沙市是“抗日宣传中的一支力量”，“是当时最有声望的话剧组织”，也是当时长沙文化界一支最活跃、思想最激进的左翼力量。在艰苦奋斗的三年里，演出了一系列抗日话剧、音乐，呼吁人民奋起抗战，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为保卫中华民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在尚待开发的话剧荒园里撒播了话剧艺术的种子。值此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特将他们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的活动作一概要叙述，以志纪念，并为我省话剧史研究者提供一鳞半爪的史料。

人才荟萃

剧社开始只有党员李仲融、刘乐扬同志。到1937年，杨荣国、唐掞斋、章东岩、孙伟等都陆续人了党，建立了支部。同仁们多系来自新闻、学校等文化单位的进步知识分子，是音乐、戏剧、美术、文学等诸方面的著名人士，如著名音乐家张曙（早年为南国社成员，1937年与冼星海一道参加了郭沫若领导的军委政治部三厅工作。代表作有《丈夫去当兵》、《日落西山》、《洪波曲》等）、著名导演黄灿（建国后曾任中国影协理事、长影、珠影导演）、著名戏剧家刘保罗（20世纪30年代初左联戏剧家联盟第二任党团书记。曾以饰演《西线无战事》中的保罗，轰动剧坛。自此保罗成了他的代号。保罗被捕后，田汉曾写道：“闻保罗君又以演剧而幽囚，在剧坛人才寥落的时候，真有闻学鼙而思大将之感。”）老画家陈国钊、朱人鹤，作家哲学家杨荣国、李仲融（建国后历任华东大学党组成员、南京大学教授）、刘乐扬（职业革命家、教授）以及《市民日报》总编辑、新闻界名人蒋寿世，还有教育界闻人孙伟、朱之倬等。

剧社一开始就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除自己演出抗日剧外，还广泛联系艺术界的朋友，并深入群众，帮助中小学教师、店员、职工特别是大中学校学生排演话剧、组织歌咏队、传授木刻、绘画技术，开展抗日宣传教育，并举行各种联合公演。

演出成功　声誉鹊起

剧社成立之初，演出了几场抗日独幕剧，声势不大，影响不广，于是决定排演曹禺的《雷雨》，这是他们演出的第一个大型话剧。这部杰作是1934年问世的，虽已在平津沪轰动剧坛，但内地长沙正式搬上舞台尚属首次。剧社同仁都认识到，这个戏关系重大，演不好，将影响今后的抗日宣传。对演员要求极严，须做到“闻其声，如见其人”。结果以精彩的演出，赢得了观众的好评，声誉鹊起，为以后的演出奠定了基础。

接着演出田汉的《回春之曲》。这个戏与现实结合紧密，剧本写一个华侨青年告别南洋，回归祖国，为民族解放效力的故事。由唐掞斋、廖若平、张曙、黄灿等组成演出委员会，廖若平、朱之倬执导，剧务主任黄灿，陈国钊担任舞台设计和装置，唐掞斋、孙伟、黄非丹等都参加了演出。《再会吧，南洋》和《梅娘曲》婉转深情的歌声，增添了这个戏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劈草莱，平坡蛇，华工创业艰难多；乾隆皇帝何曾哀民瘼，一任帝国主义苛例多；华工自动奋起挥长戈，何怜老幼男女鲜血流成河；二百年日月等闲过，中华民族再不怒吼将如何？……”饰梅娘的常翠贤女士，饱含泪水的呼唤，观众

潸然泪下；张曙饰男主角高维汉，他的表演热情而深沉。全剧激昂悲愤，而又缠绵悱恻，再一次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在斗争中前进

1936年秋，剧社在湖南大学一次演出中，遭到CC分子的捣乱，使演出不能进行。这一事件迅速引起新闻界进步人士的关注。如严怪愚、郑家弘等纷纷发表文章，予以谴责。同时剧社于十月中旬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长沙市戏剧音乐界联合公演”。剧目还是在湖南大学上演的《汉奸的子孙》、《神秘的太太》等几个抗日独幕剧，演员也是剧社原班人马；音乐以田汉、冼星海、孙慎等的抗日歌曲如《民族解放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救国进行曲》等为主旋律，同时也演出了赵元任、黄自、刘天华等健康的纯艺术性的歌曲和乐曲，以吸引更多的观众。

这次联合演出，事先发了新闻，《全民日报》出了专刊，造了舆论，挽回了影响，剧社受到了一次严重考验，在政治上也成熟多了。

当时形势，只要翻翻《全民日报》的专号就可想见。凡是有“日本”帝国主义字样的地方，就以“××”取代。如《救亡进行曲》中的“收复失地，打倒××帝国主义”，《救国进行曲》歌词中的“赶走我们的民族敌人，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如此等等。但他们却在舞台上公开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们不计个人安危奋起斗争。

这次演出，把许多平日不问政治的文艺界人士也发动起来了，形成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那声势浩大、气势磅礴的七八百职业青年和学生青年组成的大合唱的壮观场面，就可说明一切了，确实是长沙市音乐界的空前盛会，也由此反映出抗日民族情绪是多么高涨！

频频组织联合公演

像这样的联合公演，在第二年2月又举行过一次，即“长沙剧人联合公演”。演出了《秋阳》、《撤退赵家庄》、《爸爸你看家好》等独幕剧，都是具有强烈抗日情绪的戏剧。其中《撤退赵家庄》一剧，由刘保罗导演并担任主角，获得异乎寻常的效果。《全民日报》对此次公演作了这样的报导：“……长沙剧坛顿呈活跃，观众对之殊有好感，尤以《撤退赵家庄》一剧，为特别感动观众者。连日来，投函本报要求重演者，竟达50余封之多，可见此剧演出的成功。”观众还这样评价他们的演出：“长沙观众只有神奇鬼怪、剑侠飞仙一类的戏才留得住终场，而这次公演，观众自始至终被剧情所吸引，这不能不说演出的成功。”还有的观众在评价中指出：“今天的中国，大敌当前，不少人还沉溺

于醉生梦死之中，广大观众希望能经常观看到这样激情奔放的爱国剧的演出，使那些不知亡国恨的人们，走上复兴民族的大道，这大好的神州，才不至有陆沉之虞。我们敬佩长沙剧人的一片爱国热忱，和现身说法的崇高精神。”这之后不久，应观众要求，又组织了一次“长沙剧人春季联合公演”。同时，积极深入学校，组织各校学生参与活动，开展更加广泛的群众性的抗日宣传。规模较大的一次是1938年4月湖南省抗敌后援总会慰劳负伤将士及募捐救济难民举行的“话剧联合公演”，就是在剧社的协助下举行的。该会负责人江国栋在《公演之前》中写道：“在两年前，我认识了唐揆斋先生，是一个剧场中的事，认识朱之倬先生正是剧社排演《夜光杯》的时候……我们的公演计划通过以后，首先交给朱之倬先生修改，再交给唐揆斋先生看的。这样，才开步走了。朱先生是话剧界的老手，同时是我的老师，我把公演的事全盘请朱先生负责，同时请了唐揆斋先生和李恩施先生为我们帮忙，任一个戏的导演，明宪的《重逢》便请黄非丹先生负责。……”所有长沙市较著名的学校都参加了这次公演。

为唤起全国同胞起来抗日而工作

为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他们以强大的阵容演出了宋之的、陈白尘的《民族万岁》。唐揆斋在演出特刊上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一九三六剧社，全体同仁，从我们民族最大的耻辱“九一八”的五周年纪念日起……两年来没有一天不是为唤起全国同胞起来抗战而工作……《民族万岁》是以全国各阶层、各地域、各种职业的全体同胞的大团结，争取民族自由和解放而抗战为主题，所以我们以《民族万岁》来纪念“七七”，以争取民族解放。我们高呼：“民族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他们严肃的演出作风，精湛的演出技巧，每次都在观众中产生极好的效果。以《保卫卢沟桥》一剧为例，曾连续十多场。常常出现强烈共鸣的情景交融的动人场面：台上演员哭，台下观众哭，声泪俱下，观众当场解囊捐献。一些流亡学生更是激动万分，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打回老家去！”“保卫卢沟桥！保卫华北！”等口号。热情奔放，情绪激昂，达于极点。

他们的口号是：“舞台是我们的战场，戏剧是我们的武器。”其实他们的活动并不限于舞台，有时也和青年学生一样，走上街头，进行抗日宣传。在八角亭、司门口等繁华地段，每到下班时间就可以看到身着西装或长衫、旗袍的先生女士们，三五一群，或教唱《大刀进行曲》《红缨枪》等抗战歌曲，或作抗日演讲。长沙街头开始回荡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拿起了红缨枪，去打那小东洋。”“枪口对外，齐步前进。”等雄壮激越的抗战歌声，掩盖那街

头铺店播放出的《何日君再来》等靡靡之音，他们就是剧社同仁。

剧社是业余性质的，经费没有任何来源，也不像现在有什么赞助，全靠自行筹措。开创时，一钱莫名。黄非丹回忆说："唐掞斋太太李德卿慷慨捐助，拿出自己的首饰、积蓄作剧社开创费。"据今健在的彭成礼先生说，演出的服装、道具，无一不是自己动手，需买的大家掏腰包，能制作的就自己动手。剧场多是蒋寿世、鱼瑞生、廖若平等利用经营剧院的朋友关系，低价租借。彭先生亲眼看到唐掞斋把自家的缎子被面剪裁作服装。他们都是穷教书先生、编辑记者，或小职员，本人收入养家糊口尚不充裕，但为了抗日，为了进步戏剧事业，不惜吃自己的饭，拿自己的钱，从事这一崇高事业。

在湖南话剧史上留下灿烂篇章

1938 年冬，长沙文夕大火，形势突变，并肩战斗三年的剧社同仁纷纷出走，有的奔赴前方或敌后根据地，有的整装待发，剩下的人员还为撤退在郊区的伤病员作了最后一次慰问演出。刘保罗是几位要动身而未启程的同仁之一，他负责了这次导演和组织工作。排演了《九一八以来》、《流亡者》等几个独幕剧。因走了些人，时间又紧，日夜赶排，保罗几夜未好好休息，但始终保持旺盛的工作热情，对演员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从不马虎从事。演出是在一个寺庙的戏台上进行的，他时而台前，时而台后，还要忙于指挥歌咏队的合唱。这种为抗日救亡忘我工作的精神，不论在什么环境下都是如此。田汉悼念保罗一文中赞扬他"是一个钢铁样的文化战士，能在任何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开展文化工作"。正是这种精神激励着剧社同仁，所以哪怕这样人手不足，条件不好，他们仍然能够坚持自己的一贯严谨作风，在湖南话剧史上留下光辉灿烂的篇章，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及其来龙去脉

刘重德

北大、清华、南开，在国内人人皆知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三所名牌大学。即使在国际间，也是遐迩闻名。而后来一度存在于抗战期间的昆明的西南联大，更是名噪一时，饮誉中外，大家都知道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杨振宁教授即联大出身。目前国内外的著名学者，多与联大有关，而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却很少有人知道。我认为，它存在的时间虽然不满一年，但在中国教育史上和湖南省志上都应占一页地位，因为它具有承前启后的双重作用：一是承北大清华南开于前，一是启西南联大于后。换个说法，就是临大是前者的后身，联大又是后者的前身。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的历史，似有一记之必要，尽管是一些零碎的雪泥鸿爪，亦聊胜于无。

我当时仅仅是临大的一个学生，不可能对它作正史性的全面描绘，只能把个人在临大耳闻目睹所留下的点滴印象和前后亲身经历写出来，从一斑窥全豹以述其来龙去脉。

笔者身经三个时期，到临大读书前，我已在北京大学外语系读了三年，受业于梁实秋、朱光潜、叶公超、潘家询等名师。不幸 1937 年"七七"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北京形势十分紧张，平汉铁路不通车，不得不绕道津浦、陇海两路再转平汉返回河南滑县老家，等待事态的发展，身上只带了一本袖珍牛津词典，经过三年努力在东安市场选购来的多本英文诗集全部丢失，至今仍觉可惜。

我住在十分偏僻的乡村，既不临交通要道，又无报纸可看，而且下了几场数十年少见的大雨，周围到处是水，出不了门。由于跟外部消息完全断绝，我闷成一场病。八月底大水尚未落尽，我就毅然决然涉水步行七十里，过黄河，到省城开封打听北大去向。后在报上看到通知，叫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去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内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报到。我于是立即乘车南下注册，被分配到四十九标旧清军兵营暂住。

文学院设在南岳白龙潭圣经学校内，法、理、工等学院留在长沙上课。南岳山清水秀，风景异常优美，不失为一个读书的好地方。1937 年 12 月 4 日我曾写过一首新诗，记载了先一天雨夜的情景和个人感受。现抄录如下，权作与临大有关的一点痕迹：

雨　夜

夜，
一团黑暗。
浓密的云雾在奔腾，
满山一片静。
一所古老的学院。
倾盆大雨下个不停，
夹杂着远处的一阵大吠，
还有几声鸡鸣，
惊醒了流浪者的怀乡梦。
哪里怒马的悲鸣？
战场嘶杀的喊声？
雨正在打着松柏，
打着落叶的梧桐，
也打着坚贞的巨石，
一齐发出反抗的吼声，
巧妙地
交织成一支进军行。
松柏、巨石、梧桐，
经过彻夜的斗争，
还依然常青、强硬、直挺，
在打击中
孕育着伟大的新生！

当时到南岳上课的名教授，有清华朱自清，北大燕卜荪，至今还记得燕卜荪给我们外语系四年级同学讲授莎士比亚的情形。那时他已是英国有名的诗人兼批评家，出版有《诗集》和《晦涩的七种类型》。他学识渊博，喜欢饮酒，不拘细节，对我班上一位同学的胡琴演奏，时常驻足倾听。后来也跟着到联大，继续教书，不嫌环境艰苦，实属难能可贵。

长沙、南岳虽美，但好景不长，不得不忍痛告别。大学原来起名“临时”，并无把长沙作为短期中途站再继续迁往昆明的设想和打算，其真正含意则为迫

切希望抗战早日胜利，使三所名大学仍能回到平津办学，各自发扬固有的优良传统。不料，战争局势急剧恶化，1937 年 12 月 13 日南京陷落，全国震惊，日本侵略军继续向内地推进，长沙也经常受到轰炸，已不是安心读书之处。根据当时抗战的战略部署，临大与教育部商议，决定迁往形势较安定离前线较远的西南后方云南昆明，以加快培养抗战建国人才。1938 年元月学校派出先遣人员赴滇预为筹划，2 月 20 日兵分两路向云南进发。

教师、女生和部分体弱男生乘火车经香港越南赴滇，而身体强健的男同学则组成了湘黔滇旅行团，采用战时军事组织形式，徒步入滇，沿途作抗日宣传。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亲自挑选中将参议黄师岳任团长护送。下设两个大队，共约八百人，大队长由军事教官担任，小队长由学生产生。团部有北大教授曾昭抡、清华教授闻一多、南开教授黄钰生随团辅导。出发前，曾在韭菜园校本部操坪誓师，人人身穿整齐划一的新制服，精神抖擞，阵容壮观。为了避免敌机跟踪轰炸和体力消耗，晚上乘木船出发，到达益阳上岸，开始步行。

由于张治中主席的关怀，对沿途各县，事先都打过招呼，虽经土匪猖獗的湘西，亦平安无事，未受到惊扰。这时，沈从文避难在乡，他特为教授们设宴洗尘。路过贵州省，我们这支大学生队伍，特别受欢迎，有的县甚至派了中学生在城郊列队迎接。记得到达省城贵阳时，适逢滂沱大雨，我们冒雨行军，伞也不打，以壮观瞻，歌声响亮，步伐整齐，大街两旁的观众热烈鼓掌。步行三千三百华里，常睡稻草地铺，有时甚至与鸡鸭犬豕同室，有的脚上磨起血泡，劳累不堪，经过风吹、雨淋、日晒，历时六十八天，终于四月底安抵云南昆明。人人都脱了一层皮，但心情愉快，毫无怨言，对于“长征”的胜利，无不为之自豪。因为大家怀抱着一个共同心愿——抗战救国。先期到达的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率领眷属师生前来欢迎。

师生徒步，历时六十八天之久，经整整三千余里之旅程。…… 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即使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无先例。这确实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壮举。

临大迁到云南以后，学校当局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在这个大会上正式宣布：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仍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为常委，主持教务，于 1938 年 5 月 4 日正式恢复上课。至此，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到改名联大，算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在这里，需要大写一笔的是团长黄师岳中将。此公时年已过半百，和蔼可亲，记忆力特强，与团员打成一片，艰苦与共，深得师生们的爱戴。一路上为大家生活的妥善安排付出不少心血。尤令人敬佩的是他那一片爱护同学的热忱和廉洁的高尚品格。新近发现他给蒋梦麟、梅贻清的一封信，值得向读者推介。

最后，让我以联大校歌作为本文的结束，因为它很好地表现了贯穿三校、临大和联大三个时期所共有的国难当头、弦诵不辍、卧薪尝胆、誓雪国耻的坚忍不拔的爱国精神：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住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附　录

孟、月公校长钧鉴：

寇氛未已，坚决抗战，为民族复兴大业计，迁文化于后方，储才备用，实为当今之第一急务。在师岳不过奉张主席文白兄命，率领贵校学生旅行团步行到滇开课而已，虽云跋涉辛苦，为民族为国家服务，与数百青年同行三千里，自觉精神上痛快与光荣。到滇承招待慰劳，反使内心感愧，并所赐纪念簿，谨什袭珍藏，永远存念，以纪念此行。至捐送金表一只，川资五百元，在公等为诚意，在师岳实无受法，均完璧交来人带回矣。今已于六月一日回长沙复命，知关廑注，谨此奉闻，专函布臆，敬颂钧安。诸维亮察。

黄师岳 六月二日

我与南社湘集

马少侨

南社湘集，意即南社湖南分社，汇聚的是南社的湘籍诗人。从傅熊湘到柳敏泉，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大约活动了20年。

我参加南社湘集的时间是1946年的夏天，介绍我加入的是我的老师、社长柳敏泉先生。柳敏泉（1884～1958年），号蜃庵，湘阴县人。光绪甲辰科（1904）秀才，湖南官立法政学堂讲习科毕业。做过一任县长，长期从事幕府工作。工诗词，擅书法，是南社成员，也是南社湘集中的卓卓者。其诗歌七律学陆游，能撷元祐之英华，而探盛唐之旨趣。1938年在新化与宗子威、谢玉芝、苏鹏等创立莫江吟社，任副社长。我当时就读于新化县中，为先生所赏识，加入莫社。1945年抗日胜利，先生应湖南大学之聘，任文学院讲师，并受聘为湖南省文献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志编纂委员。1946年，与南社湘集成员曹典球、李洞庭、张平子、萧仲祁等先生商议恢复南社湘集，众推先生为社长，我和萧湘雁同时加入，为湘集中最年轻的两个社员。

南社湘集的常年活动，每年春秋两次雅集，春集在上巳或者清明；秋集在中秋或者重阳。社员参加雅集，每人每次交银币一元，作为茶酒费用；社课有时分韵赋诗，有时携带平日作品，互相欣赏品题。出席的不一定是社员，也有社会知名人士被邀或自动参加。如周鳌山、仇亦山两先生就都参加过雅集活动，周鳌山先生并且当场表演书法，看到我送他的诗作《秋草十二律》石印本，很赞赏，特书写了一副对联：“向求四海刁凿齿；欲识平生马少游”给我，书法苍老飘逸。

南社湘集复社的首次集会（1946年夏）是在青年会的大楼举行的。内容除了落实柳敏泉先生出任会长和吟唱活动的安排之外，大家交流了自己的诗作。我记得张平子先生提交了一首回文体七绝，题目是《消夏》，得到了诗人们的一致好评；张先生也很自负，颇有感慨地说：“此类诗虽雕虫小技，但只我辈能之，继起无人，广陵散将成绝响矣！”柳敏泉先生笑指着我说：“我弟子能之。薪自尽，火自传也！”即以原题命我即席作诗。我那时少年好胜，也小

有歪才，不20分钟便写好了一首七言律诗："低高树锁乱云愁，未有诗怀入梦幽。棋局几回争黑白，酒杯千举叹沉浮。离离草色天连水，淡淡山光花满楼。谁与共吟长日永，微风暖拂柳丝柔。"张平子先生读罢拍着我的肩膀说："后生可畏，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吾老矣，无能为矣，薪自尽，火自传也！"读时摇头晃脑，拖着悠长的声调，引起哄堂大笑，说张先生在与柳先生争我做"薪传弟子"。回首53年，往事历历在目，而两先生则作古久矣！

在柳敏泉先生时代，南社湘集没有社刊，社员作品的发表，有三位报界上有名的社员给予了很大的方便。一位是《大公报》主编张平子先生；一位是《中央日报》(湖南版)副刊《洞庭波》的编辑刘虚先生；一位是《上报》社长兼总编辑黄性一先生。刘虚先生与我仅一面之识，没有深交。张平子先生我在学生时代就读过他的《莺花曲》，我也仿其体写了一首《莺花曲》；加上那首回文诗的"比试"，两个建立了比较深厚的感情。我在南社湘集时代写的许多诗，都是由他在《大公报》发表的。黄性一先生很欣赏我的《后春草诗》，该诗在《上报》刊出后引起了江运鸿等先生的和韵，黄性一先生对此很兴奋，认为他的报纸有"影响"。我那时还不认识江先生，我们的建交是解放以后的事。

我最后一次参加雅集活动是1948年重阳秋集，我因故没有赶上集会，柳先生代我拈韵得"长"字，我以"满城风雨近重阳"句为辘轳体写七律四章，柳先生颇加评赏，张平子先生携去刊于《大公报》。这件往事直到1958年柳先生为我的《二十四番花信楼诗存》写"后序"还特笔点出："南社秋高，风雨续重阳之句"。可见师恩之深！这年冬，我奉使命赴安化组织起义迎解，离开了长沙，未再参加活动。

南社湘集在柳敏泉先生时代虽然没有办刊物，但柳先生却手编了一部《南社湘集诗词存稿》，编选了自有湘集以来的社员的诗。由于没有资金，未能问世。加上解放初期，社会上对旧体诗词带有不正确的看法，许多老诗人都不敢言诗。我看过柳先生受聘为省文史馆馆员时写的《自传》，就没有写自己擅长于诗，更没有写荣任过茛江吟社副社长和南社湘集社长的经历。先生逝世后书稿存萧湘雁先生处，后为其孙子取走。世历"文革"烽烟，此稿也许已难逃劫火了吧！

两院院士和他们的湖南母校

杨敬东

探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的成才之路，他们的湖南母校不能不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一、长沙名校——明德、长郡、雅礼、一中——院士荟萃、济济一堂

中学阶段，是一个人成才的重要阶段。有的人在这里打下了深厚的成才基础，为日后成为院士奠定了坚实的基石；有的就在中学里选择了成才目标，确定了日后成为院士的科研方向。

谈起中学里出院士，长沙的4所中学就格外引人注目。它们是：明德中学、长郡中学、雅礼中学和长沙市一中。在别的中学，几十年出一个院士已了不得；在它们那儿，出五六个，上十个院士，甚至有三位院士同出一个班的佳话。长郡中学1943年毕业的文伏波院士、黎介寿院士和黎磊石院士，三个同在高15班，而且黎介寿、黎磊石二位院士是浏阳院士三兄弟的亲兄弟俩。俞汝勤院士一次参加中国科学院学部的会议，"在会场上一下就遇到三位雅礼校友"。这几所中学，不仅孕育了湘籍院士，也培养了外省籍院士。雅礼中学出的1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有4人还是外省籍的。

明德中学，社会上流传着出了18位院士之说，可见院士人才之盛。笔者曾到该校调查，除台湾中央研究院3位院士未核实外，已查清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就有9位。其中廖山涛是教师，另8位是这所学校毕业的，他们是：丁夏畦、艾国祥、向达、田奇瑪、李薰、肖纪美、唐稚松、金岳霖。在长郡中学，出了10位两院院士，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6人，他们是：丑纪范、李燕、张孝骞、陈庆云、陈希孺、沈其震；中国工程院院士4人，他们是：文伏波、朱建士、黎介寿、黎磊石。雅礼中学出了1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中湘籍院士6人，他们是：李星学、萧健、金岳霖、陈能宽、曾昭抡、俞汝勤；外省籍院士4人，他们是：黄子卿、邹承鲁、盛彤笙、程熔时。长沙市一中，目前调

查到的院士有7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6人，5人为湘籍，1人为外省籍。湘籍院士是：唐稚松、陈希孺、盂少农、廖山涛、陈庆云；外省籍院士为陈述彭。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即刘耕陶。

明德中学、长郡中学、雅礼中学和长沙市一中，这4所中学先后出了35位两院院士，如果不将同一院士曾在两个学校就读而重复计算，则4校一共出两院院士31人，其中湘籍院士26人，外省籍院士5人，这5位外省籍院士毕业后就离开了湖南。

新中国成立以来，三湘院士（包括长期在湘工作的外省籍两院院士）共92人，其中湘籍院士74人，明德、长郡、雅礼及长沙市一中出的院士，占湘籍院士总数的35%，真可谓长沙名校，院士荟萃！

长沙市出一至二位院士的还有长沙兑泽中学（现长沙市六中）2人、福湘女中、浏阳云梯中学及省工业专科学校、长沙国学专科学校、湖南优级师范学校、省高等专科学校（中专），这几个学校先后出了院士彭司勋、黄祖洽、范云六、何继善、吕振羽、刘大年、黎锦熙、俞大光等。

在湖南省内的一些中学，如国立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衡阳市立中学、省立二中、邵阳二中、衡阳五中、衡阳一中、武冈县洞庭中学、双丰中学等著名学校，先后出了院士沈志云、周后元、李国杰、方智远、刘筠等。

二、大学里出的院士集聚在湖南大学、湖南医科大学和中南工业大学

在湖南大学、湖南医科大学和中南工业大学先后培育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18人。

湖南大学，承袭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之余荫，于1926年正式成立。曾创建明德中学，以“磨血精神”办学的著名教育家胡元倓出任校长，延揽了一批如杨树达、刘宗向、周凤九、陈天倪、李肖聃、钟巍等名望甚高的专家学者任教。

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湖南大学这儿毕业和就读过的两院院士就有8人之多。其中5人为湘籍，2人为外省籍，1人为长期在湘工作的外省籍院士。他们中有：在明德中学就读而后在长郡中学毕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李薰，他于1936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冶金系。李薰是我国著名的金属物理学家，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钢中氢脆奥秘的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慈云桂，1942年毕业于湖南大学机电系，电子计算机专家，安徽桐城人，长期在湘工作，是银河亿次级巨型计算机的技术总指挥和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筠，1953年毕业于湖南大学生物系，他在国内第一个建立起鱼类系统基因库。中国科学院院士姚绍

福、陈希孺、陈耀祖，都先后在湖南大学就读过。四川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荣悌，1938年肄业于湖南大学化学系。江西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天泉，1952年肄业于湖南大学矿冶系。

湖南医科大学是一所享誉国内外的高校，它的前身是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创建于1914年，是我国第一所引进外国现代医学，中外合办的西医高等学府。这所学校先后出了两院院士6人，其中湘籍4人，外省籍2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西医先驱、医学教育家张孝骞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微生物学家、世界上第一个分离出沙眼衣原体的汤飞凡，都是1914年考入湘雅医学院，1921年毕业，均荣获博士学位。他们俩都是湘雅的首届毕业生。据记载，这一届毕业生仅有10人，均成为我国医学界的著名专家。张孝骞和汤飞凡是92位三湘院士中上了邮票的两位院士。新中国成立后，邮电部发行的现代科学家邮票三组共12枚，一共介绍了12位现代科学家。现代科学家成千上万，能上邮票的寥若晨星，可见张孝骞院士和汤飞凡院士的影响之大。

中国工程院院士、肝脏病理学家刘耕陶，1956年毕业于湖南医学院，他率先在我国开辟肝脏生化药理学和抗肝炎药研究领域。

中国科学院院士、医学微生物学家魏曦，20世纪20年代初期曾在湘雅医学院就读，他是中国人兽共患病和微生态学科奠基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微生物学家谢少文，上海人。1921年从苏州东吴大学医科预备班转来，1926年毕业于湘雅医科大学，获博士学位，是我国微生物学、免疫学的开拓者之一。另一位外省籍中国科学院院士、神经生物学家鞠躬，原籍安徽绩溪，1952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

中南工业大学，其前身是中南矿冶学院，创建于1952年。在这所大学培养的院士有4位。他们的原籍都在外省，但均长期在湘工作。

在所培养的4位院士中，中国工程院院士、有色金属冶金专家刘业翔最早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他是湖北武汉人，195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6～1993年间先后担任中南工业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兼校长。他在国际上率先开展1000℃高温熔炉电解催化的研究与应用。中国工程院院士、选矿工程专家余永富于1956年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他研制的国内外独特的选矿新方法，被列为1992年全国十大科技成果之一。他是河南南召人，现仍在湖南工作。中国工程院院士、采矿工程专家古德生，1960年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留校任教，广东梅县人。他创立了振动出矿理论和采矿连续工艺优化理论，现仍在中南工业大学工作。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选矿学家王淀佐，1961年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辽宁锦县人。长期在湘工作，有从理论上统一解释了硫化矿浮选研究中长期争论的三大问题等建树，现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三、名学校、名校长、名教师使四所中学、三所大学成为院士的摇篮

明德中学、长郡中学、雅礼中学和长沙一中这四所中学和湖南大学、湖南医科大学、中南工业大学这三所大学，涌现的院士多达53人次，不能不令人惊叹！这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俞汝勤在中国科学院学部会议上一下子遇到三位雅和校友时所发的感叹那样：“一所地方的中学，毕业生中出了不少院士，这是其教育成功的标志。”

湖南自南宋以来就颇具重视教育的传统。当时全国有四大书院，湖南就有岳麓和石鼓两所，而岳麓书院又为四大书院之冠。戊戌维新时期，谭嗣同等维新志士提出“广学校、培植人才以为自强本计”，时务学堂即于此时举办，戊戌政变发生后，新政中惟有新式学堂保留下来。1904年时，“湖南学堂之多，学生之众，为各省冠”。

1903年由著名教育家胡元倓创办的明德中学，是长沙创办最早的一所近代中学，也是湖南省第一家私立中学。毛泽东同志早期在新民学会《本会总记》中写道：“戊戌政变，陈宝箴走，谭嗣同死，梁启超逃，于是时务学堂倒了，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明德方兴指的就是明德中学的创立，当时称明德学堂。

清朝末年，在长沙地区惟一的官办中学，是长沙府中学。1912年4月长郡公立中学在原长沙府中学旧址开学。先后由著名教育家彭国钧和王季范任校长。彭国钧校长亲自制定“朴实沉毅”的校训，以培养有益于国家社会的有用人才为长郡教育目标。

雅礼中学是美国雅礼会1910年在长沙雅礼大学内办的，校长是盖煤赖和解维廉。

与长郡中学同年创立的长沙一中，是湖南省创立的第一所省立中学。我国中学分初、高中首先从该校开始。创办人和第一任校长符定一是晚清秀才、著名教育家和学者。

学生能否成才，能否沿着正确的成才方向快速成长，与校长的教育思想以及他们制定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关系极大。长郡中学首任校长、教育家彭国钧和后任校长王季范破格培养张孝骞、破格录取李薰的事迹，至今仍传为佳话。

彭国钧校长平时对学生要求非常之严；素有“老虎校长”之称。但他又非常爱护学生，平易近人，特别是对学生中的成绩优异者，更是时刻关心，倍加爱护，尤其能破格培养。1941年12月，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招生，长郡中学两

位成绩优异的学生张孝骞彭治朴想去报考，但尚差一个学期未毕业，不符合报考条件，心里非常着急。彭国钧校长知道这一消息，十分珍惜他们的才华，一边鼓励他们俩报考，一边前往湘雅交涉。终于，湘雅同意张孝骞、彭治朴先报考，下学期回长郡考试后再补缴毕业证书。这样，张孝骞和彭治朴破格考进湘雅，1921年毕业时均获博士学位。这两人后来都成为我国著名医学家。

长郡中学校长王季范也是不拘一格育人才的著名教育家。李薰和弟弟李苾是邵阳籍，不属长郡中学招生范围。他们冒籍报考长郡中学，均被录取；王季范校长发现他们不是长沙府的，但惜其才，留校就读。后来，李薰成为院士，李苾成为著名科技专家。

明德中学、长郡中学、雅礼中学和长沙一中不仅是著名教育家任校长，而且有一批著名教师，如明德中学就有黄兴、苏曼殊、周谷城、李肖聃、黎锦晖、张曙、周世钊、刘寄踪等。长郡中学就有徐特立、李维汉、杨东莼、易培基、曹典球等。长沙一中有袁吉六、彭泽陶、李肖聃、汪澹华、李垂德、郭琴轩等。雅礼中学的英文教师由耶鲁大学的学士担任，国文教师大多为前清秀才或进士。

这四所中学和三所大学教师多为名流，学风好，虽各有特色，但都为学生营造了成才的氛围和环境。从这些名校走出来的院士，几十年后还对他们的湖南母校一往情深。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淀佐教授回忆在中南工业大学的生活，认为这座大学使他走上了成才之路，湖南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他满怀激情地写道：“组织上决定送我到中南矿冶学院深造。经过入学考试，我于1956年到长沙，第二次进大学当了学生。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师，既作研究，也从事教学，一干就是36年。从讲师、副教授晋升为教授，这一阶段，是我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其间经过了一系列的风风雨雨，多次到农村和工厂劳动学习，差不多走遍了湖南的三湘四水，不仅在专业研习方面有所收获，在如何当好一名教师教书育人和高教管理方面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在我的心目中，湖南是我的第二故乡。”

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夏畦在回忆明德中学时说：“我是抗日战争时期上的湖南明德中学高中部的，明德中学是有名的中学。黄克强先生早年就是在明德中学成立华兴会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的。当时明德中学的教师都是在湖南最有名的。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打下了学习的基础。在学习期间我对理科特别是数学倍感兴趣，成绩也优异，因此我考大学时惟一的志愿就是数学系，后来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数学系。”

中国科学院院士肖纪美在一篇《自述》中写道：“12岁到17岁寄宿在长

沙明德中学，我由衷地感谢老师们对我生活上的关怀和学业上的培养。老师们每夜查房，为学生盖被；学生的生日吃寿面；洗澡、理发有人关照……远离家庭的游子感到温暖。我喜欢那儿的图书馆，丰富的书刊，引我自学较为广泛的领域，并养成自觉的习惯，终生享用”。“初中数学比赛，我曾战胜高班，三次获得冠军，这是由于我在图书馆自学了不少解题的方法。”

中国工程院院士文伏波回忆 50 多年前在长郡中学高 15 班学习时“听老师讲课简直是一种享受”，老师教的学习方法“终生受益匪浅”。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星学在《难忘雅礼》这篇回忆雅礼中学求学生活的文章的开头写道：“我在长沙雅礼中学虽然只上了三年高中，但这三年所学的东西，受到各种教育，似乎比我一生任何时期都要多，对我以后的继续学习、生活和步入社会以及最后长期从事于地质古生物专业工作，都有很大影响，终身难忘。”

中国科学院院士唐稚松在一篇《自述》中回忆长沙一中对他的影响，他写道：“我的初中与高中是在湖南两所著名中学——明德与省立一中度过的，其中尤以一中对我影响为大。该校不但教师水平很高，而且有一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提倡独立思考，崇尚气节。”

两院院士受他们的湖南母校影响之大、之深，从前面几段回忆可见一斑。还有的院士由于受他们的湖南母校的影响或受母校老师的影响，选择了成才目标，确立了专业定向。

中国工程院院士文伏彼与水利结缘，成为我国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起点是受母校长郡中学和地理老师的影响。他在《院士自述》中写道：“我高中就读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长郡联立中学”。“该校注重全面发展，理科以外，也十分重视文史地教育，教地理的教师是竺可桢先生的高足。他加授的《地学概论》，讲述水文气象，联系大西北缺水、三峡水力开发，十分新鲜。受其感染，觉得祖国大好河山，水利事业前景无限。高中毕业，我报考中央大学、湖南大学都是填报的水利工程系，并都被录取了，后来我进了中央大学。从此，与水利结下了不解之缘。”

雅礼中学重视科学与爱国主义的教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星学成才的重要因素之一。他记得当年在雅礼中学科学馆、楼梯边的墙上挂着外国著名科学家如哥白尼、牛顿等人的巨幅头像。李星学院士在《难忘雅礼》一文中写道：“某一天上午，大约在 1936 年元月初旬，我们忽然发现，在这些外国大科学家相片之中，出现了一张长着八字须、戴副金边眼镜的中国人头像。正当我们不胜惊讶之时，物理课老师陈仁烈先生来了，他简单地介绍了这位中国人的生平事迹和他在科学上特别是地质学上的重要贡献：‘他叫丁文江，中国地质学事

业最早创建者之一，是位地地道道的中国大科学家，不幸刚在湘雅医院去世，特将他的相片挂出，他很值得我敬重和引以为荣。’我在大学时代读的政地，以及后来毕生从事地质古生物学事业，是多种因素和机遇促成的；当年陈老师不失时机地给我们上的这堂生动的尊重科学和热爱祖国的教育课，也许是其中因素之一。”

学生喜文喜理，常与学校和老师有关。中国科学院院士李薰在长郡中学读书时，王季范校长重视文史教学，优越的文学环境使他对文学产生极大兴趣，希望将来成为一名文学家。后因祖父去世误了考期，高中插班岳云中学，这所学校以理工科为主，受当时流行的“科学报国”思想的影响，李薰弃文就理，成为著名科学家。

陶澍轶闻二则并序

虞逸夫

清朝二百七十年间，三湘人才之众，甲于天下，过于前古。安化陶澍，挺身于僻陋之区，奋发于草莱之中，自致远大，卓立当代。生关一时治化，影响及于身后，实群贤之佼佼者。无论其学术思想与行履事功，皆有可观，足以风世。

海内有识之士，皆以为陶澍一生行事，足为后人取法者甚多，不独苦学成材一端，可为青年一辈楷模而止。诸如其治身治家之正己俭约，为官之循良清廉，爱才如勿及，举贤为己任，种种美德，无不可为广大官民之师范。

笔者蜗居逼陋，一榻之外，别无余物，旧藏图籍已尽化烟云，与陶公有关之资料，更无从查考，不得已而搜索枯肠，勉成小文两篇：一曰：《陶澍识拔左宗棠》，一曰：《陶澍婚姻趣话》，以志崇敬向往之思。深愧年衰思涩，少壮所闻所学，已百不记一。古语有之，“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遗闻轶事，固陶公之小节，吾为其小者，比于野史稗乘，当无不可。至于挂漏失当，传闻异辞，则古之良史亦所难免，况戋戋之作，疏谬自不待言，览者谅之。

识拔左宗棠

左宗棠是清朝咸、同间一时风云人物，功名赫奕，光耀中外，在近代史中占有重要的一页。尤其是他以垂暮之年，犹能不辞艰险，统率三湘健儿，远征西北，乘旄开府，坐镇边陲，余威震于俄、英，使外人不敢牧马天山，保疆卫国之业绩，永著人间，与祖国河山同在，不愧为一代奇男子。

若问究竟谁是最先识此奇才之伯乐，还是首推安化陶澍。至于左公受骆秉章之重用与曾国藩之推服，乃是后事。陶澍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平生善政，难以列举，故清室倚为柱石。陶于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辈为先达，功业名位，后先相辉，亦大致相埒。但时至今日，曾、左、彭、胡之余声犹在，不绝于世，而熟知陶澍其人者盖寡。我认为关于陶左开始订交之一段佳

话，不可令其磨灭，实有一叙之价值。

清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陶任两江总督已六载，始入京乞假，回湘探亲。清帝嘉其功高，曾召见十四次，宠锡愈恒，并手书“印心石屋”四大字赐之（印心石屋在安化石门潭水中巨石上，是陶澍幼时随父读书处）。陶即时南归，舟越洞庭，溯资水直趋安化。所经地方官府，于朝廷重臣过境，例当迎送。某县令闻讯，恐忤上官意，筹思百端，忙于安排迎接礼仪。其时左宗棠适在该县作客，询知其事，即与令言：“陶公素以俭约教民，力戒奢泰，此次顺道过县，迎送仪式，宜简不宜繁，宜俭不宜侈，场面过于铺张，虚费公帑，有悖陶公平素之教，万一失欢于彼，恐遭训斥。以我之见，不如写一副欢迎联，张贴于县衙前足矣。其他一切惯例俗套，皆可省免。”县令以此事重大，如此草率从事，成何体统，放着人情不做，万一为此而落得简慢大臣之罪，岂非自讨苦吃，因而犹豫不敢立断。令虽不言，左已心知其意，笑谓令曰：“我虽不才，深知陶公襟怀，如有差错，宗棠一身担当，决不累君。”令意乃决，悉照左言行事，除门悬一联外，衙中衙外，不复有所陈设。陶登岸时，见县令迎候甚谨，而所率从属颇少，仪仗更为简略，不类其他地方官府之所为，心已奇之。陶至衙前落轿，惟见大红对联一副，赫然在目，除此之外，别无所有。联曰：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园，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陶且看且读，喜形于色，连称妙妙，并谓：“写作俱佳，非大手笔不能办此。”即问此是何人所作？令曰：“卑职愚暗，实非所能为”，遂以实情告。陶曰：“何不与左先生同来相见？”令曰：“彼尚是田里一举子，未登仕途，何敢遽见大人。彼闻尊驾将临，先已避处廨后空屋中，待卑职召来即是。”陶曰：“如此高贤，何得以常礼待之。”更不复言，竟命前导，直至左处，二人见面如旧识，握手相视者久之。陶自忘其贵，左亦忘其贱，都不复拘于形迹。立谈移时，纵今论古，皆经世之大事，略无一语涉寒暄。左固辩才无碍，侃侃不竭，陶则倾听不倦，为之心折神往。乃揖左曰：“今日相见，过于所闻。故乡有奇才如君，竟使埋没篙莱而勿知，澍之过也。”相与大笑，顿成莫逆之交。嗣以姻联儿女，又加之以秦晋之好。

左一经品题，荣价骤增。自此脱颖而出，自致青云，位兼将相，终成一代巨人。孰知鹏搏九万，起于微末，始助其风力者，乃陶澍也。

陶澍举贤爱才之美德，长使后人为之叹羡不置。惟楚多才，名人辈出，当有闻其风而悦之者。

婚姻趣话

陶澍生而颖悟，自幼勤奋好学，为童子时已崭露头角，乡里归美。其父黄山翁之好友，爱其才俊，许之以女。以家本寒素，父又早世，书生不谙经营生产事，家道益落，生计颇为艰难。成婚之日，聘仪微薄，礼数殊为不备。先时妇家对此婚事，早有不满之情，今见迎亲又如此草率，顿萌悔意，新娘反抗尤烈。幸妇翁尚识大体，以婿本故人子，又是己所亲择，未便临时变卦，遗笑一方。祝贺客盈门，已是势在必行，惟有力促其女，成此好事。无如女心已决，百劝不听，哭闹不休，抵死不肯上轿。妇翁亦莫可奈何，为之束手无策。正在进退两难之际，适家有一婢，素以黠慧得主人喜，忽来跪禀主人曰："事已逼切至此，僵持何能解决。为今之计，不如将小婢暂代小姐出嫁，待小姐一旦意回心转，再俟机换回即是。好在外人皆不明底细，想亦无妨，不知行得否?"主翁闻言，如绝处逢生，自忖除此别无转环余地，即笑允所请。家人亦大喜过望，皆云此计大好。遂以新娘服饰盛妆小婢，送归陶家，并以所置嫁妆悉数随往，一如嫁女然。新郎默念，两家贫富悬殊，婚事竟如此顺利，新娘之贤淑可知，心益重之。婚后夫妻恩爱日笃，小家生活，看似清苦，而两心相融，自有乐趣，精神上别具一种充实富有之感。新妇处理家务，琐屑周到，井井有条理，更不烦夫婿分心过问，因得一志学业，速成其材。

陶澍发迹迅猛，不数年间，掇科登仕，日臻显达。从此携家远宦，回翔南北，无缘一归乡土。及至升任两江总督六年之后，始得乞假归省。妇家闻讯，举室腾欢，不惜巨资，扎彩张灯，大宴众宾，皆以得接贵人为殊荣。

陶澍此次富贵归故乡，直如衣锦昼行，光被四邻，泽润九族，所到之处，无不笑脸相迎，颂声盈耳，终得一吐当年贫贱抑塞之气，亦为平生一大快事。

至于今日荣归之一品夫人，乃是昔日陶家元聘之侍女，则罕有知其内情者，即陶澍本人亦勿知也。夫人以阔别多年，终得与家人团聚，回思往事，不觉悲喜交集。见大小俱在，独不见旧日侍奉之小姐，暗自惊疑，急欲求见。主母不敢复隐，谓其女闻陶郎婚后日渐贵盛，追悔已迟，改嫁不得，自愧无颜复见世人，久已潜往山间茅庵，削发为尼，今犹健在。夫人即欲往见，又不敢于夫前径吐真情，但云："小时多病，曾在尼庵佛前许过愿，今当偿还。"陶固不疑有他，夫人遂行，著一品服，严妆范庵。至则庵主已率徒众迎候门外，无不合掌致礼。夫人一一审视，环顾再三，见一尼口边有小病，相貌复与小姐约略相似，肤色轮廓，犹依稀可辨，已决定无疑，乃移步尼前，初不问询，便自敛衽下跪，叩拜尽敬。一众见状，无不大惊失色，瞠目相视，不知所措。夫人礼毕，即携尼入室，并嘱余人暂避勿扰。乃问尼曰："师姑识我否?"尼摇首曰："不识"，又问曰："请师姑细看，我与旧日相随之小翠，声音相貌有相似处否?"尼霍然猛省，泪如泉涌，衣襟都湿，惟低首饮泣，更无一言相酬。夫人慰之曰："小姐不须如此悲伤，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为。吾今日特为践约而来，皆当欢喜，何得涕泪相对。当日为解尊府一时迫切难排之忧，不得已而出此下策，以鸡代凤，初非本怀。今陶公位极人臣，群望所归，早年扼穷潦倒之境况，都成过去，贱婢弄假成真，冒受朝廷诰命，富贵尊荣，悉与陶公分享其乐，不意得此造化，亦已足矣。每念前誓，心不自安，长此负疚度日，实在难以忍受。故尔小姐必须还俗与陶公团圆，名正言顺，理当如此。况小姐完婚庚帖，至今尚在陶府，今我姓名，仍是小姐之姓名，岂得盗用终生，枉遭后人非笑唾骂。小姐即不慕荣华，亦当为婢子脱罪才是。速换穿戴，著我来时服饰回府即得，不必另作安排。我则还我本来名份，甘心退居婢位，侍奉左右如初。"尼闻夫人言，哭泣愈哀，坚拒一如拒嫁之夜。夫人熟谙小姐性格倔强，再劝无益。夫人既归，即易命服为婢女装，拜伏陶澍座下，自称有罪乞恕。陶惊起却立，急问其故。夫人曰："妾罪非一言可尽，请公安坐，听妾详禀，自明究竟"。乃将前事及今日所为尽诉无讳。陶始闻而惊疑不定，呆若木鸡，继而如大梦方醒，为之感激涕零。起揖夫人曰；"如无夫人，澍何得今日，家有贤妻德厚如此而勿知，身实有罪，当乞恕者我也。"夫人仍以主婢复位事请计于陶，陶曰："彼自毁约，初不愿为我家妇，幸夫人机智善良，通权达度，成此良缘，彼我俱感，俯仰无愧，论情论理，于心有何不安之处。照夫人目下所图，何异画蛇添足，迹近儿戏。事已至此，一切谋为，皆属徒劳，不若各安所安为好。"夫人遂不复以此萦怀，相敬愈于往昔，竟以一品命妇终。婢作夫人，信而有征，奇人奇事发古香，留与千秋作榜样。

湖南近代两位碑刻名师

易元九

胡万本，字湘林，诸生，湖南丁乡人。善刻石，道光五年（公元 1825 年）陶澍时任两江总督，赴京请假，回原籍安化石门乡探亲，宣宗旻宁嘉其功绩，御书“印心石屋”四字赐之。回湘后由胡氏上之石，所刻不溢丝毫，自此声名大振。此刻计三石：一存陶氏故乡少时读书处；一存长沙岳麓山；他石则存苏州沧浪亭，亭称苏州胜地。陶氏曾官于此，今三石历劫之余，尚完好无损，亦艺林之幸事。又胡氏其他所刻有：明代唐寅所绘《曲水流觞图》，董其昌所书《金刚经》《兰亭序》等。嘱子侄归藏岳麓山崇贤祠侧，今祠已早废，石刻亦无从寻觅，余为之唏嘘者久之。

汪镂亦湖南宁乡人，原名蔚，字啸霞，善刻印章，曾模丁敬、黄易两家印，并边款不差厘黍，成《寿石山房印集》。尤精刻帖，曾于道光二十二年（公元 1842 年）为同邑著名藏书家刘康所藏历代名人法书刻成《红豆山斋法帖》计十卷。惟第一卷，唐宋人所书为赝品。此帖已录人 1988 年上海书法杂志社所编之《历代著名书法丛目》中。是吾湘自宋代庆历五年（公元 1045 年）刘元所摹《淳化阁帖》而成《潭帖》，元祐七年（公元 1092 年）刘次庄所刻《戏鱼堂法帖》之嗣响。诚墨林之一盛事。汪氏又于光绪十年（公元 1844 年）刻《贾太傅井记》。刻记完好无损。今尚存长沙太平街太傅里。方兹旅游事业日益发展之情况下，是记或将成其热门话题云。

杨昌浚逸事述闻

刘绍东

我早年就读原湘乡春元中学，从附近老年人闲谈中熟闻杨昌浚宫保逸事。1983 年秋去苏杭各地游览，咨访当地博古多闻的老人，多能缕述杨在前清同治、光绪年间官浙江巡抚、闽浙总督时的遗闻细节，娓娓如数家珍，归查原《湘乡县志·人物志》所载王礼培撰的《杨太傅外传》，但略述名籍履历（不见杨本传），无从概见其平生。前在省古代文化文学研讨会上面晤湘乡县志办彭君，约我就熟悉的原湘乡历代人物轶事撰供资料。余极嘉许杨言行风概很有可资后人观采启迪的地方，特撰写此文乐为说项。至其与左宗棠、刘蓉辈同时尽瘁于腐烂的清王朝，血腥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恶行丑史，兹并阙而不述。封建朝代循吏名宦言行品质上之具有历史局限性和两重性，不应概以形而上学和“一点论”相科罪，当获读者谅解。

自安贫贱，志气昂然

杨字石泉，家在原湘乡三乐乡三十七都杨家山（现为娄底市西阳乡，《中国人名大辞典》误写作“湘阴人”。）父是文盲，织布匠，母绩麻纺纱，非逾半夜不睡，极穷困。

杨七岁读蒙馆，以聪明好学特蒙老师赏识，得减纳学金。八岁学“对课”（宋后叫“属对”，设为专课），老师指窗外飞雪出：“雪洁心同洁”，诸儿踌躇相向，杨起对：“人穷志不穷”。借用现谚语寄托深远，喜得老师点头拍案，啧啧赞神童不置。十岁读外地经馆，离家十二华里，因无资粮铺盖住校，常携杂粮粑或几条黄瓜度午。校侧商店李老板识其非常儿，常给资助。不久姊嫁母病，家益不支，不得不辍学谋生；李延主账房，不苛派他务，俾得瘁半日之力于学。远近人们路过常闻拨珠声、读书声迭作，争夸杨织匠家出读书种子了。

次年得到同乡刘蓉劝助，同游于罗泽南门下，与同县蒋芗泉（《人名大辞典》误作“安福人”）、王珍、李续宾、李续宜相切磋，旗贯贡酒，郊寺对诗，杨独以破衫敝组点缀在华缨纨绔，纵谈天下事，抵掌就指而神情特旺，鄙薄当

代达官名流若不屑措意。后以童生考取秀才，名气渐大，远近慕名造访的越来越多，却依然是四壁萧条，穷窘十足。同窗王、蒋诸人岁时登堂，常以钱物馈助，辄笑受不拒；乡党权绅或以非义相干，虽千金之馈必却。尝榜所撰《自勉》、《慎独》两箴（惜原文已佚）于座右以见意，即使饔飧不给也处之泰然[①]。

洪杨义军起，天下震动。老师罗泽南，好友刘王李蒋等邀练湘勇，便毅然投笔[②]。惜乎其囿于旧学师说，守君臣之小节，乖胞与之大义，忘出身的贫家，与民军为死敌；虽其志气昂然，却终难逃天下世人的指责了。

不弃糟糠，特见风概

方杨考中秀才，身价骤增，人皆刮目相看时，亲族怂恿杨母兴退婚另娶之议。先是杨父与邻里陈某幼长相善，抱陈四岁女来家抚为媳。穷人养童媳，可省却六礼苛派，是当时穷乡穷哥们习惯事。女小于杨半岁，同放牛采薪长大；后杨外读，家爷常佣织他家，女下地充主要劳力，蓬发赤足如粗婢。人喜杨翩翩美少，嫌女陋非偶。后果为杨觅到谷水富商王某之独女，以赠田十亩银千饼、他物无算的丰厚奁资啖母，母心动，呼杨示意，欲厚遣女而另婚王氏。杨坚意不可，谓："女素勤劳、孝顺而人无失德，容言亦不下中人，儿但见其善，不知其他，何得轻弃稔知之佳妇而别求不可知之人？世俗人的等级观财富观皆鄙夷不足道，儿方欲力挽浇风，归于厚淳，何得身自污之？我家历代素寒微俭朴而崇尚勤劳，此正富家小姐之所难安、儿之所引为骄人者。女家亦甚寒素。女父与吾父又皆至诚君子，累世通家，何得以素所骄人者自馁，便做鲜仁缺德事伤害人？儿与女夫妻名分早定，虽各以礼相待，言不及谑，然彼此实心诚意相爱重，由来很久了。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安忍厌弃糟糠，使其饮仳离之恨，滋我终身之惭！愿母勿复言！"母既语塞，即求得父同意，速媒催妆，三日后便成礼完婚。

其尤足多者，历朝至共和国建成，官场商界人必广置姬妾，波及吏前走贩齐民，家有余资便踵起效尤，杨后官至总督，衔加太傅，重寄封疆垂五十年，却一直同原为童养媳的陈夫人少小相依，迟暮相对，不置明姬暗妾，不近舞女歌姬，此衡之古来仕宦，真可称有独无偶。今故乡亲旧，杭州父老，于此尤津津乐道不倦[③]。

劝农惩惰，移风改俗

杨于同治九年实授浙江巡抚。值前任杭州知府少年同掌戎事的蒋瞥芗南调，各地当大兵之后，虽经蒋推行过一系列救穷起敝的实政，元气仍难恢复。

杨先微服遍访民间，探知农民所病所急、渔民商人致困的关键所在，除继续力行原有便民措施外，秋后以工代赈，广招闲民流人兴修水渠山塘，严明劝勤惩惰的奖罚制度。春初集州县吏前培训骨干力量，确立常年劝农惩惰办法，取缔赌馆、烟馆、乱坛和民间暗娼。杭州东郊一位八十七岁的王姓老文告诉我："小时犹及见赌犯暗娼带枷绑手游团，自报姓名过失，申悔改之意。"又指前面土山说："此山左角原筑有土楼，榜曰'劝农台'，下坪为集合群众场地。每年春秋末宣讲农政水利；余时或用作演戏台。民国初楼台尚存。"

另一老塾师说："曾亲闻发蒙老师王竹溪先生言：'先有湖南人蒋芗泉官杭州知府，亦多行劝农奖富的惠政，光绪初调离，绅民议建生祠留念，报杨巡抚批。杨查询蒋事甚详，碍于同乡同学关系，批'官不与闻可也'而暗加赞助。祠建成，绅民榜一联于前门云：'官不与闻可也；民到于今念之。'解放前夕，祠就圮而门联尚可辨认，今则鞠为茂草了"。

奖学祛浮，特重文治

老塾师又云：杨尤注意发展地方教育，奖掖后学。到任不久，即召集州县教谕及专管令长议订私办公奖学馆制，强制里有蒙馆，乡有经馆，县有书院。倡复陆清献（稼祥）调以胜旌清风亮节；修复紫阳书院（朱熹讲学地）以培植高一级人才。曾亲题前人名联挂杭州万松岭敷文书院门首云：

> 人只此人，不入圣便作狂，中间难站脚；
> 学须就学，昨既过今又待，何日始回头。

此联用通俗哲理语作指点鞭策，杨特录以督后学。细读反嚼，仿佛已接触到一位道学长者的岸然风貌和一位善良家长殷切期望子弟成材的急迫心情，根本嗅不到一星半点儿达官贵人气味来。

杨只秀才出身，却很擅长辞章之学；吟诗作对，尤见才气横溢，笔触远到，意境开阔。他虽仗军功起家，却十分重视文治。左宗棠镇压甘肃、新疆的捻民回民起义，从俄英帝国主义者手里夺回大片疆土，武功显赫一时。杨题赞七言绝句一首云：

> 大将西征奏凯还，
> 湖湘子弟满天山。
> 新栽杨柳三千树，
> 引得春风度玉关。

赞左武功，只用首句轻轻带过。对衔命血腥镇压农民事，杨多处笔下表示回避；其种族之思，正义之感并未完全泯灭。第二句云，今乌鲁木齐附近尚有

横亘数乡为湖南人集中居住的湖南村、湘乡村在；第三句所云杨柳，今当地人仍呼为“左公柳”。第三、四句语义双关，明写杨柳，实赞其敷布文治教化，成效显著，字里行间便把左宗棠这个名将、儒臣揄扬到了相当的高度。杨前后抚浙江、督闽浙、督陕甘，次第修复杨龟山祠，刊行李二曲《惺惺录》、《慎思录》，时或参讲书院，集训学子，力倡敦本崇实的学风，痛祛浮躁骄惰的恶习，所至皆推重文治，“儒吏”之名大噪。

恶胥授首，官纪一肃

抚署恶前郭老虎（人习呼“老虎”忘其真名）下串藩臬州县及地官权绅，上通京官阉寺，包揽词讼，鱼肉善良，前数抚台为所制而无如之何。杨先在浙掌戎事已侦得郭不少劣迹。到署不一月，委办一重案，特摘其纳贿作弊之一端引而广之，连科并究，遂置郭极典，参免多员，官纪为之一肃，一时有“清官到任，老虎落阱”之谣。时帮办江南军务、后官光禄寺卿的雷以諴亲笔书联赠赞说：

驰骤群才，尽归轨躅；
彰明九德，大正纪纲。

雷联被杨后人模制在原杨氏支祠杨宫保专龛室墙壁上，前几年，我同娄底市文史同仁往访杨旧庐，犹被保存得完好无损。联两边还夹有当时名画家任薰所绘山水花鸟图，附雷、任签名图章甚晰。记得墙上还模制有邓石如书法手迹。[4]

绝苞苴，释义军，险遭不测

清自咸丰、同治后，朝纲不振，上下官吏贿赂公行；到慈禧主政，更变本加厉。每逢岁时节令，外官督抚道县提镇等必大肆搜括地方土物珍奇上贡京官后妃阉人，此早成不成文的常规定例。杨独守道甚坚，既上绝苞苴，亦下拒馈献，朝廷官阉早就哗然相訾毁。

杨在浙江巡抚任内曾尽力筹饷练卒支援曾左镇压大军。一次俘获义军千二百余人，曾明令士胥以上百五十人斩立决，余罚苦役。杨素主德治，与曾反复力争，卒改“斩立决”为“遣散”，结果，只斩了极少数骨干，罚少数人充苦役。事为素所切齿侧目者所知，上控政务堂，罪杨“姑息纵敌”。慈禧专召左宗棠进京面询：“杨昌浚品居何等?”左答：“善人，亦信人。素淡名利，其治兵制敌素具远谋深算，不失为大臣以道事君、以礼治国之至意。”慈禧好名，闻而首肯，祸始解。一时正人君子赞左知杨之深，评杨甚当，又善为说辞，竟

能免杨于险厄。[5]

植柳西湖，潇洒自如

杨禀性恬淡，踞公堂如坐针毡。抚浙视事不久，刚立冬节到，便发动部属吏胥于西湖四周、外湖白堤苏堤两侧广植杨柳，援笔题诗云：

手植垂杨三万株，春来新绿满西湖。
他年若过双堤路，漫道棠阴继白苏。

今遗杨存者环抱，惜多被斤斧，所见不太多了。又在所居廨府前侧遍种四季花草，手培瓶菊尤多。部属兼著名诗人左念谦有亲撰亲书刻竹嵌金联赠杨云：

十里水光心地朗；
一林花色性天香。

左手迹现亦仿制在杨旧庐墙上落款写“丰孙左念谦”，下附方形图章两个甚清晰，寥寥十四字景中有情，兴中有比有赋，烘托杨心性何等精炼利落。

杨在杭满四十寿，生辰近重九，单邀左宗棠同宴于西湖灵隐寺菊圃中，饮酒赋诗甚乐（杨时瞒住僚属未做寿）。杨素对残酷镇压太平军事表不满，更看不惯官场龌龊关节，已上书乞休。旋以错批“小白菜案”罢官，归居杨家山故里一年多，又被左宗棠强荐去任陕甘总督，为己帮办新疆军务，既对外抵御俄英、又对内镇压回族起义提供坚强后盾。左倥偬旁午于乌鲁木齐大本营，却不曾忘记远在兰州的这位好友的五十生辰，特亲书贺联，雇名匠精制成楠木底、黑漆面、金粉镶的两片珍品专送陕甘督署。联语是：

知公神仙中人，勉为苍生留十稔；
忆昔湖山佳处，曾陪黄菊作重阳。

出句淡处着笔，浑处传神，轻轻映带出下边一段回忆文字来，很能叫人想像出杨泥涂轩冕的清品和高致，左联我在1948年游蓬庐时尚见悬中堂熠熠如新置，字大六方寸，笔苍劲超脱，诚左真迹；前几年从农民家中寻到上半边（云下边已刨平锯作床头板），保存在娄底市文化馆。

错详罢官，拦马立祠

光绪元年，杭州近郊农民葛品连暴病身死，葛母疑品连妻诨名“小白菜”者与举人杨乃武有奸，以“身死不明”控县。县令刘锡彤误认尸毒，锻炼成狱；给事中王书瑞劾奏，复命浙江学政侍郎胡瑞澜提讯，仍未得实，激起绅士

汪树屏等联名呈控都察院；御史王昕亦劾奏大臣瞻徇；加上“小白菜”之姑母方任慈禧太后侍从官，为之缕述冤情；乃下旨提交刑户两部会鞫。检验尸身无毒，狱大白。杨以督查不力、据详上报有误革职。事载《清七百名人传·杨昌浚传》。另据杭州人及杨故乡老人补充说：县令刘锡彤子垂涎“小白菜”，暗唆葛母主控奸杀，冀判女官卖，可攫为己有，法医之初认尸毒亦此子贿嘱所致。锡彤素号廉悍精干，不料竟为其子所卖而被绞，又祸延胡学政杨总督而革职；小人疢毒之害人，真太可怕了（近有人据此编电视剧，情节小有出入）。

杨前数乞病未准，接革职令，坦然整饬仆马上路。当时内而藩臬，外而州县绅民，争相拦马祖饯。以其惠政之及人者深，有为之欷嘘涕下者，绅民代表提出要为杨建造生祠，杨坚意劝止说：“我方得罪受谴，又立祠以积嫌猜，祸且不测，亦且累地方。必不可。”众以其言恳切，乃已。杨归家“省过”近两年，再受左宗棠保荐起任陕甘总督。杭州绅民奔走相告，立即为起造生祠于原蒋芗泉祠侧，香花供奉。不过像周初陕西峡山人之对召伯所含的甘棠相戒“勿现”“勿翦”罢了。这不仅是他的《种柳》诗提到的“棠阴继白苏”，而且更远过召伯了[⑥]。

子妇家人，改妆迎养

杨食俸近三十年，习惯布衣蔬食。先寄回历年俸资，以其半资济困乏的姊家岳家，在老家杨家山起造了上砖平房十间，添置水田三十亩。子义规兄弟早各登科入仕，子妇皆养尊习奢，衣绸戴锦，食必精烩，不能恪守乃公平昔“粗衣淡食作本分人家”严训。义规官武昌知府（一说“知州”），闻老父由杭贬归，不日行舟即至。急唤缝衣匠赶制全家人大布衣帽鞋袜，分送散居各地的弟侄男女等，严诫“不得穿尺绸寸锦惹老父嗔怒”。义规又带头辞退过多的仆佣，只许每户留男仆两人、女佣一人。想见杨平时身教之严、家风之肃，又同一般官宦人家迥然不同。

薯蔬总督，引诗为证

杨在武昌、长沙大儿、次儿处住了几天，即返杨家山新屋定居。翌日偕陈夫人徒步探西阳陈家湾岳家。岳母尚健存，忙呼长孙去谷水镇购买鱼肉。杨急止之曰：“久不啖家乡红薯、豆腐、蔬菜，只此几样便够。”并呼陈夫人同下厨。次日转访姊家亦如此。看他筷戳红薯，匙舀菜汤豆腐，快唤连喝，但觉香甜爽口，接齿便酥，腹凸然不觉其过饱，喜谓数十年从未如此这般饱啖了。作陪侑觞者皆儿时旧人，起而把盏，呼杨“薯蔬总督”，杨笑颔之以为荣。

两江总督沈葆帧远来相探，陪看屋东菜园，正萝卜、芥菜受风摇曳，长势喜人。设席即烹红薯、萝卜、杂粮酒相饷，沈甘之亦不禁过量。即捉笔在粉墙上奋书苏子瞻《撷菜诗》云：

> 秋来霜露满东园，芦菔生儿芥有孙。
> 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

替这位薯蔬总督作解嘲语，引现成苏句恰切当时情景。读之觉两位名臣心莫逆、外形迹的风范尚宛然活现在墙头字里（沈遗墨亦模制在杨祠墙上，仍完好）。

分惠亲族，风骨凛然

杨在陕甘总督任内，幼子来告：“我家附近蒋某有水田三十多亩连庄屋山土贱价出售，不及时价之半。”欲怂恿父购得之。杨说：“已有田四十亩，山、土若干，再不忧温饱；比旧时、比他人家已属过分，添产何为？但益愆累耳。”另派人带近年积俸去故里，为岳母营造土砖屋六间；助姊家购置水田十二亩；为其他穷困亲友各置田产多少不等。杨尝回忆婚后去岳家，因无睡处，从未留宿。一日以事留，与岳父同睡。夜深明月满窗，岳父鼾作，想起岳家才一间正房，半间厨房杂屋，隔邻居又远，不知岳母睡何处？潜起探之，见灶房一角，破絮隆起，隐闻鼾声起落。故杨后出仕首寄存俸助岳家营新屋四间；此回又为添置六间与己家相等，以娱其晚景。汉代二疏告老回乡，拿出皇帝所赐现金逐日会集亲友故旧宴饮，不肯为儿孙添置家产以损其智、益其过。前人都赞扬他俩。对比杨这样实心实意济助亲党，不单为个人欢度晚年设想，二疏可算不了什么了。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冬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遭惨杀，恐怖气氛四布。西后党密谕各地，清光绪皇帝认罪引退。一般督抚都见风使舵，倒向后党，对帝落井下石；杨独风骨凛然，毅然在奏折上写：“君臣之分早定，中外之口难防。臣老矣，未敢奉命。”慈禧见奏大怒。如果不是左宗棠、曾纪泽从中力为斡旋，后果会比我们后来见到的要严峻得多。杨上奏折时即招呼秘书亲随检点清理财务、庶政，随时等办移交，作好轻则罢官回家、重则受刑入狱的思想准备。其守义不屈的刚风劲节一直被人们称赞不已。

菊枯银见，死后发家

有人存疑说：“解放前尚保持完整的西阳庞家台大院，含七进十一厅百多间正房，全用青砖制瓦砌，为附近百十里所仅见之官厅大院。传为杨宫保官后所建。为何说只在杨家山建土屋十间？”应之曰：“此传之者张冠李戴了。”

先是杨从杭州贬归时，督、抚、府三署部属感受杨教益良多，深知其一介

不取，家计艰难，宦囊萧索，各自解囊集得纹银三千两。虑明赠杨必不受，特购深瓶三十，各置银百两于瓶底，再购三十瓶菊花连土移置银上。杨果欣然接纳，归置屋檐下亲自浇水培育。越岁余起赴兰州，嘱三、四媳照管。已而花根受阻，苞蕊就枯，异而发之，则粲然白镪，瓶瓶皆是。稔知乃翁直憨，告之必璧返杭州僚佐而招来政治上的纠葛，乃密告长兄义规，暂存汉口钱庄生利，后杨死兰州督署，迁柩归葬，多赖部属赙助，始得备荣哀之礼。时西阳庞家台一带尚是蓬蒿满目，荒山一片呢！

杨死之明年，长子义规调升两湖盐运使，家人益丰。又三年，始大兴土木，起造此七进十一厅的庞家大院。当时知情人都说杨宫保是"生前啖苦，死后发家"。

注　释

①余1941年就读春元中学时，常寄居附近同班同学成书纫家听其伯祖父与蒋姓老丈谈杨少青年事甚详，上述轶事人所熟闻，以质诸现存的当地老人亦无甚出人。

②湘乡县志人物志·杨太傅外传。

③据余所熟闻及附近喻星光先生的补充陈述。

④上四节据《外传》和向当地父老探访到的资料整理。

⑤上二节据杭州人、西阳人传说整理。

③上四节据旧时所闻、现喻星光、李锡福两老丈及当地老人传说，并参照杨祠墙壁上遗墨整理。

祖文吴獬事略

吴继刚

祖父吴獬（1841～1918年），字凤笙（亦作凤孙），湖南临湘人。前清光绪丙子科（1876）亚元（乡试第二名）、己丑科（1889年）第十一名进士。以即用知县签分广西，抚军马丕瑶器重其才学，暂时留任抚署执掌文案。

1892至1895年间，任广西荔浦知县，除弊兴利，举办书院，颇有政声。1895年秋，因坚持严惩当地坏人骗卖青年男女出国一案，遭受上司阻挠，愤而辞官。此后，一直从事教育事业，连同中进士前的教书生涯，共计长达五十余年。曾先后执教于临湘莼湖书院、岳州金鹗书院、湖北通城青阳书院、荔浦正谊书院、沅州（今之芷江）敦仁书院、衡阳石鼓书院、衡山研经书院、长沙岳麓书院、南京三江高等师范以及湖南优级师范（湖南大学之前身）等十余院、校。门生数以千计，遍及湖南、湖北、江西、广西、江苏等省，其中杰出弟子为数不少。诸如符定一（字宇澄，清末曾任湘省教育总会会长、财政部次长。建国后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李洞庭（名澄宇，大学教授、湘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刘范猷（名鸿，老版〈辞源〉主要编审之一）和曹典球（字籽谷，曾任湖省教育司司长、湖南大学校长、湘省教育厅厅长。建国后，先后任湘省军政委员会顾问及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等著名学者，皆出其门下。

祖父少年时代便有才名，当其十六岁以晚辈身份拜谒岳州名儒吴敏树时，吴公面试其才学，对答如流，深受嘉许。故当吴敏树去世后，祖父曾挽以联云："饮罢蜜云龙，颇难酬床下拜时，便许我第一流人物；归来华表鹤，应犹念草间吟者，愿学公起八代文章。"

1861年，祖父年二十，研读岳麓书院，当时同窗皮锡瑞（字鹿门，长沙人。光绪壬午举人，著作有《经学通论》等十余种）、王德基（字怀钦，益阳人。光绪己卯举人，著作有《玉屏集》十六卷）等，甚有文名。祖父与相角逐，深为山长丁伊辅所激赏。

己丑（1889年）秋天，前往北京第二次参加会试，途经武昌时，湖广总

督张之洞久闻祖父文名，亲自前往旅馆相见，交谈学问几乎长达一天。回衙后对僚属说："洞庭一湖水，风笙算得饮了一杯，我与诸君不过尝其点滴罢了"，足见钦佩之忱。

1889年，祖父四十八岁，考取光绪已丑科第十一名进士。阅卷者为湖北嘉鱼名儒刘心源（名幼丹，据说是清廷帝师之一），评价祖父试卷说："此文真是才人极笔之作"，副主考官潘祖荫更是赞赏不已。但担任会试总裁的李鸿藻，忌刻祖父文锋颖露，担心异日得志，必然是个忠耿直言之士，而不利于自己，于是别有用心地诬指祖父三艺中的"何堪不晓事长官，转使穷年冻馁"文句为伤时，又妄指礼义中的"禽言"一词为杜撰，所以当祖父参加朝考时，故意予以压抑。潘祖荫曾力为争辩说："宁可不使考取，决不可不取为状元。"而李鸿藻固执偏见，只许取录为第十一名进士。发榜之后，便以即用知县签分广西。当时在京的许多举人，都认为李氏倚仗权势，践踏公理，极为气愤。于是作了一副对联讽刺此事，联云："禹罪人、皋刑人、夔伶人，五经扫地；潘嘎子、李瞎子、吴才子，三子闹京。"一时传为考场新闻。

祖父早在1876年参加乡试时，主考官陆润庠主张取为解元；这次参加会试，潘公又力争定为状元，均未如愿以偿。而祖父却安然自得，足见胸怀之豁达大度。

祖父德高学邃，怀才未遇，故常有玩世不恭的表现。平日生活俭朴，终身布衣糙鞋，不为世俗所累。1914年讲学岳麓书院，初到之日，身穿布袍，手携纸伞，足踏皮钉鞋，进传达室便问刘宜轩（山长）在哪里？幸好在邻壁会客室的著名学者文湘芷（名启泉，醴陵人，京师大学毕业，在湘主持教育工作有年）、傅钝安（名熊湘，难陵人，湘新闻界名人，著有《国学概略》、《钝安脞录》等十余种）等认识祖父，不然几乎被校工叱出校门。

翌年，湖南优级师范举行毕业典礼，省城名人自省长谭延闿以下诸人士，都莅场参加。其时正当盛暑，祖父身穿大布兰衫，手持蒲扇坐在教室中，许多来宾不知其为何许人，不免窃窃私议。直到谭延闿与之倾谈时，才明白他的身份。于是大家争相一识湖湘名士而引为荣幸。

祖父素性不喜趋承达官贵人，不羡慕虚荣名利，而乐意与平民接近，同情穷人疾苦。凡平民有所恳求（包括相识和不相识者），无不尽力满足和帮助。因而家乡父老乐与来往，至今仍有老人能漫谈有关祖父的故事。

对于乡里及邻里的公益事业，祖父总是不遗余力予以赞助。如前后三次著文，宣传和赞助吴伯侗（岳州开明士绅）募捐兴办育婴堂；作《放足歌》，极力宣传妇女放足，并从自家女、媳及孙女做起。

考虑民间流传的《增广贤文》一书，有助社会教化，但内容有所不足，祖

父便收集整理民间俚语俗谚，编著《一法通》三卷。该书开头数句为："一法通，万法通；事凭忠，理凭公；大户穷，一包脓……"其中还著录不少格言和具有格言意义的对联。并出资木刻成书，赠送给稍有文化的乡民和私塾，不仅可作为儿童课读教材，而且含有劝勉青少年等人积极求学、努力进取的目的。现今岳阳、临湘、通城等县的老人，尚能背诵片段，可见流传之广。

更值得一提的，祖父在辛亥革命以前，便以身作则，倡导破除迷信和陋习（参阅后面附录），并先后在《洞庭波》杂志、《长沙日报》和《大汉报》等报刊上发表有关宣传破除迷信的文章，在社会上颇有影响。晚年并将前后发表与未发表的这类文章，收集编成《獬录宣讲》，可惜未曾出版而手稿遗失。

《湘雅摭残》一书中，评价祖父诗文云："丰才博学，兀傲自喜。其文出入唐宋名家，诗格则在玉川、白傅之间。"又云："诗思清空跌宕，而善道俗情，无意不达，颇近今日之平民文学。"评价允称正确精当。

祖父文章（包括会试闱墨），有遗著《不易心堂集》，藏湖南省图书馆。至于诗词、联语，则摘抄数首于下，以概一般。

如《柬符定一》诗云："十载离如九万秋，此生相见分无由。岂期衡岳岳东院，重聚麓山山下楼。青已出兰良足畏，朱将成碧尚何求。强颜且窃庐陵语，道放苏家出一头"。又如《新秋十咏》其中《秋江》诗云："石瘦波柔练影开，涨痕淘尽浪花堆。问郎手把秋江楫，来采芙蓉日几回。"又"秋山"诗云："石头姿性本来顽，从辟乾坤不改颜。一著荣枯间草木，被人编派作秋山。"又如《畜竹筒赞》云："不可不通，太通不能容物；不可不园，太园又不见绝俗。此君兮此君，吾守之而终身焉，足乎不足。"

祖父参加已丑（光绪十五年）科会试时，座号与曾广钧（字重伯，湘乡人，同榜进士）、魏屏侯同室，三人不约而同提前完成了制艺，便利用出场前的空闲时间相与畅谈。当时祖父正在烹调八宝鸡粥，香气扑鼻，准备为东请曾、魏两人喝粥。不料曾氏仰足不慎踢翻了粥罐，导致三人空喜一场。于是祖父戏填《踏莎行》一词以纪此事云："篮重腰酸，书多室小，今年又作同林鸟。曾南、吴北、魏中央，谈天直到东方晓。金铸缘悭，纱笼福早，荆山自是知音少。若言把握在人为，眼前香粥偏翻了"。虽是即兴诙谐之作，也称是科场佳话。

上述对祖父诗、文的评价，同样也适用于平生所撰联语。如任荔浦知县时，所撰县衙正堂联云："简政宽刑，与民为善；修文重礼，息讼宁邦。"论文句通俗易懂，讲内容切实精深。尤可贵者，在任三年，执着对联，躬行实践，政绩斐然。又鉴于荔浦文化闭塞，学风不张，于是倡办正谊书院，并亲自讲学解难，促使城乡学风为之一振。我曾于1988年5月前往荔浦访问，尚有个别

耄耋老翁，能称道此事。

祖父平生醉心社会慈善事业，举凡岳州、临湘等地的救生局、育婴堂等的创办，无不尽心筹划，勉力资助。任教岳州金鹗书院时，曾题撰鹿角救生局大堂楹联云："莫学秦皇惟赭树；要同傅相共为舟。"仁爱襟怀，溢于言表。又题华容县育婴堂大门联云："敬吾老及人老，非孝子难能若是；育他婴如己婴，只贤良适可担当。"言简意赅，发人深省。

岳阳楼向为湘楚名胜，中外驰名，历来题赠楹联者甚多。祖父曾先后题联四副，其一云："楼阁莫便登，先看文正记中，某条似我；江山只如故，试数燕公去后，得助何人。"摒除浮词俗套，着眼劝勉游人。格调高新，令人肃然起敬，可惜毁于战火。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正值清廷被迫对日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与日本的第二年，祖父辞去荔浦知县，部选沅州府教授兼敦仁书院山长，赴任前返里探亲途经岳州时，应郡守李某之请，再题岳阳楼联云："每眼前望吴楚东南，辄忧防海；只胸中吞云梦八九，未许回澜。"爱国忧时之心，贯串整个联语，遣词奇特，笔力遒劲，入木三分。几经兵燹，幸得保存，现仍悬挂于二楼之中。

最后，引用馆员李洞庭先生生前为我祖父所撰墓志铭（序言从略）作为结语吧！铭曰："维德础功言则舆，功言靡德徒区区，牛刀小试德诸余，时不可功言岂迂。发为文章经膏腴，是真才子元凯俱。其意深远其貌臞，我志不阿铭不谀"。

附　祖父轶事三则

一、联赠吴佩孚

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吴佩孚驻军岳州，耳闻湘北名士吴獬在金鄂书院执教，便特地前往拜访，意在附庸风雅。不料吃了闭门羹。祖父以今日上课恕不会客为由，未予会见，吴佩孚只得怅然归去。

1917年，吴佩孚任师长，驻军岳州，再次登门求见，并声明是向吴老师求教治军之策的。吴佩孚执礼甚恭，自称学生，祖父粗衣便帽，谈笑自若。临别时，吴佩孚恳求赠幅墨宝。祖父略加思索随笔写了"民国正需廉耻将；吴家曾出广平侯"一联相赠。广平侯系指汉光武帝手下名将吴汉，此语乃勉励吴佩孚不要辱没先宗。吴佩孚触动很深，一直挂在客厅，奉为座右铭。据说吴佩孚以后所标榜的"三不誓言"（即不崇洋人，不住租界，不去外洋），是受了此联的影响。

二、钻裤息争

传闻祖父晚年，在家乡设帐授徒时，厨妇无意中从楼上窗口挑晒了一条裤子，恰值一学生穿过裤下，不禁大发脾气，怒斥厨妇。祖父听说，便亲自三次来回穿过裤下。并问：我还是吴獬嘛，我还是吴獬吧！从而息此纠纷。事后并戏撰一联云："三过裤裆，仍为吴獬；寡闻俗子，偏重科头。"可谓谐而不谑，戏语含箴，乡里传为佳话。

三、巧题匾额

某寡妇贞操自守，教子有方，为乡里所称颂。当其六十寿辰时，敦请祖父为她写幅寿匾，祖父稍加琢磨，书写了"曹操孟德"四字。祝寿之日，贺客盈门。有人对寿匾发表议论，认为曹操字孟德，尽人皆知是个须眉男子。而老太太祝寿，与此确实风马牛不相及，不知为何用此四字，于是请教祖父。祖父含笑答道："这位遗孀既有曹大家（家读作姑、即班昭）守节的贞操，又有孟母教子成名的美德，故以'曹操孟德'来赞扬她，有什么不可呢？"众客才恍然大悟，深表佩服。

另有一妇人，心性恶毒，经常打街骂巷，为人们所不齿。祝寿前也央人请我祖父题书匾额，想借此引以为荣。祖父当然不肯书写，而此妇一再请人说项，只得写了"亚心波女"四字。妇人分外高兴，立即雇工精雕美饰，悬挂于正堂。祝寿这天，也到了一些亲友，见是名家手笔，无不异口同声称赞一番。但都不明白这四字典出何处？但又不便询问。日后有挚友问及此事，祖父才微笑着说：此妇素来凶悍，蛮不讲理，人们骂她做"恶婆娘"，"亚心波女"四字即"恶婆"二字的分写。闻者莫不捧腹大笑。

龙阳才子易顺鼎

徐德驷

我们在研究湖湘文化人物时，近代著名诗人易顺鼎是不容忽视的。易氏一门三代齐称“龙阳才子”，易顺鼎与其子君左被称为两代“神童”。

易顺鼎，龙阳（今汉寿县）人，生于清咸丰八年（1858年），字实甫，一字实文，又字仲硕，尝用笔名有石甫、种石、中庸，自署忏绮斋主人，又自号眉枷，晚年蜀哭庵。

易顺鼎一生颇富传奇色彩。幼年随父易佩绅于川、黔宦途中，既承家学，又见多识广，尤其生而奇慧，三岁熟读《三字经》。同治二年，五周岁时，家人为他祝贺生日，大宴宾客；在嘉宾满座的堂前，父亲召至膝下，命其作对；他胸有成竹，沉着应对，无不切贴，家人及众宾客为之惊异，个个啧啧称道：“真神童也”。这年，他随父在川“进剿”捻军中，父子冲散，小顺鼎被一位捻军首领在乱军之中所俘，见其容貌清俊，甚是喜爱，拟收养抚育。打仗时，亦以黄衣绣褓缚之马背，驰骋数千里，经陕西、四川，进入湖北；襄阳一战，捻军败绩，小顺鼎又被遗弃，为蒙古亲王大军骑将所获，献之亲王僧格林沁。问其身世，因满口乡音，王不能辨。聪明的小顺鼎看出了他的难处，便拉着亲王的手，自已用右手第二指儒口沫，在王爷手掌心里，一笔一画地写出自己的姓氏、年龄、父名及官衔等情况。僧格林沁恍然大悟，见如此颖异的幼儿，不禁大喜曰：“奇儿也。”抱之膝上，十分疼爱，遂召襄阳县令派人送还易佩绅，结束了他的这段不平凡的惊险经历。

13岁参加岁试。在100多参试的童生中，他很快就交了卷。学使廖寿恒为之一愣！因为这交头卷的学生，看来才髫龀之年。“再作一篇文章行吗?”学使连忙问。在他的同意下，学使以“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命题。易顺鼎一挥而就。头角峥嵘，出类拔萃，补上诸生，一时传为佳话。

其时，他把自已这一时期所作诗歌文词集结两卷，刻《眉心室悔存稿》。其中不少传诵一时的佳句：“生来莲子心原苦，死傍桃花骨亦香”，“仆本恨人犹仆仆，卿须怜我更卿卿”，“香肩倚倦长主殿，红泪流成无定河”等，名噪一

时，人称“才子”。四年之后，即光绪元年（1875年），17岁的易顺鼎又得中举人，为当时黔中年纪最轻的举人。

中举后，他取道江南，北上应礼部考试，时值严冬，他独自骑着毛驴，冒着漫天大雪，进人古老的南京城。在这里，他遍访六朝前明遗迹，一天之内写成《金陵杂感》七律20首，不乏警句：“桃花士女《桃花扇》，燕子儿孙《燕子笺》”，“衰柳绿连三妹水，冰枫红替六朝花”等等，传诵人口。

易顺鼎到北京，六次礼部考试都名落孙山，羁留京都，闷闷不乐，而对自己的才气，深信不疑，为首组织寒山诗社，与在京举子，举办诗钟，切磋诗艺；与维新人物，纵论国事。但始终怀才不遇，消极颓唐，出入歌楼舞榭，寻花问柳，诗风亦为之变，咏史抒怀已不复多见，而艳体娇娆则构成其主旋律。在此期间，尝问业于湘籍学者、诗人王闿闿。闿运诧叹，欣赏其才气，与湘乡曾广钧并称，“名易为神童，名曾为仙童。”“顾不然其诡诞”，放荡生涯。讽以书曰：“……乃至耽著世好，情及娼优，不惜以灵仙之姿为尘浊之役，物欲所蔽，地狱随之矣!”他却不以为意，自负才气，依然我行我素。

光绪十四年（1888年），正当而立之年，他以同知河南候补道前往，雄心勃勃，骤冀大用，却事与愿违，沉滞无所事事，在失望中离开了仕途，遨游各地，倘佯于山水之间。至浙江，结识湖南诗僧寄禅，偕游佛教胜地普陀山，饮酒赋诗，自得其乐。有“海是空王泪，云为织女槎”、“三代以前无贝叶，六经而外有芙蓉”（释典有莲华经，《离骚》注：芙蓉一名莲花）、“龙来拜佛成童子，客到游山变女人”等句，自以为奇隽。旋上庐山，曾筑草庐于此。有联曰：“筑楼三楹，筑屋五楹，漱石枕流聊永日；种兰千本，种梅百本，弹琴读易可终身。”又一联云：“三间大夫，胡为至乎此；五柳先生，不知何许人。”皆传诵一时。后又上溯三峡，筑琴志楼住屋于涧上，拟终身焉。不料母丧，乃回老家龙阳守制。因感命运坎坷，乃作哭庵传，综述其生平，慨叹“天下无不可哭，然未尝哭……独不见其母为可哭，于是无一日不哭，誓以哭终其身，死而后已，自号曰哭庵。”

在漫游日子里，足迹所至，十数行省。“生年未三十，足迹遍九州（《游青城山杂诗》之四)”。诗人遍游祖国名山大川，每行一省为诗一集。他的这些诗作，常以出其不意的独特感受和富有个性特点的描绘，使读者为之喜爱。他在《题酥醪观酿泉》一诗中说：“灵山能醉人，与酒同芳鲜。我本不善饮，见山辄流涎。人醉醉以酒，我醉醉以山。天以色香味，凝结成山川。”其感受之新鲜与独特，令人叫绝。“醉人”“流涎”，活脱脱地形象地表现了诗人对祖国山河热爱之深情。用语自然，无矫揉造作，正如他自己所云：“皆人人眼前语，皆人人意中语，他人或眼前有之而意中无之，或意中有之而笔下无之。我不过取

他人眼前者意中者，而出之我笔下耳。”后人对这些山水诗都给予很高评价，誉为祖国山河的“画屏集锦。”

诗人仕途虽然侘傺，生活虽然浪漫，但对国家命运极为关切。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他却离乡投奔两江总督湘籍将领主战派刘坤一。清廷授刘为钦差大臣，节制东征军务。时畿辅大军云集，但不相统属，训练不多，实战能力不强，刘坤一面对此复杂局面，犹豫不决。易氏向刘积极进言，提出：“以选将练兵为第一要著。兵虽不能速练，将固可以速选。将优则弱卒亦强，将劣则强兵亦弱，凡兵皆视将为转移也。”此后曾多次向刘提出关于战守的建议。日军围攻威海卫时，他上书曰：“目下威海海军屏息而不敢出洋，关外清军袖手而不闻攻敌。但知彼有外强，而不知彼之中乾。但知彼之有余，而不知彼之不足；未免坠其彀中矣。亟宜反主为客，变守为攻。”易氏对日军外强中乾的估计和变守为攻的主张都是正确的。他得到了刘坤一的器重，作了他的幕僚。“在军中，他坚持吃素，见战事艰难，哭泣无时。”

由于慈格太后为首的主和派屈膝投降，与日议和，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台湾；消息传来，易顺鼎悲愤填膺，痛哭呼天。在这期间，他每日埋头于前方战事电文，以日记形式详细记叙了北洋海军的覆没以及一城一地丧失的战况，包括签订马关条约始末，约三万言，收入散文集《盾墨拾余》一书中。时署台湾巡抚唐景崧与台湾爱国志士丘逢甲等共谋保台，向刘坤一求援。易氏代刘复书唐景崧，支持台湾抗战。表示“此后于尊处之事，但属力所能至，无不尽力勉为。”认为唐景崧的“商结外援，洵为今日保台要义。”并主张“不但邻国亦结，即敌国可结亦宜结。能结邻国，即多一助我之邻；能结敌国，即少一图我之敌。”闻唐拟率军死守，易氏不顾友人力阻，“葛衫布履，行李一肩”，壮行赴台，可惜唐军已败退。惟抗倭名将刘永福率领他的黑旗军坐镇台南，与台湾人民一道继续坚持战斗。易氏遂去台南，与刘永福运筹策划帷幄之中，决心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台湾。为刘军求援筹集军饷，两度回大陆。可是腐败的清王朝在主和派的把持下，“以免滋日人口实”为借口，不仅严禁东南沿海督抚援助台湾，连民间一切援台爱国举措，也令查禁。虽然他竭尽全力，各方呼吁，但都以“圣命违难”而遭拒绝，所获微乎其微。台中军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只得派代表请他速回台。身为军机大臣的昔日恩师张之洞，惧怕获罪朝廷，也不准他从事援台活动。张的电文曰：“国家多难，洋焰方张，再有枝节，不能堪矣。为国为身，均须贵慎，万勿游移。”严令其回湖南故里。他因而滞留厦门，进退维谷，抗倭不成，愤闷不已，怏怏然回了家乡。满腔爱国热忱，涣然冰消，又陷入苦闷消沉的境地。

张之洞调两江总督后，确知易闲居故里，“伤其不遇，爱其才。”招为幕

僚，又派他至两湖书院任教。光绪廿五年（1899年）被派督办江阴江防，受到军机大臣荣禄的召见，志得意满，赋纪恩诗，上荣禄诗中有“行地中犹洪水抑，措天下若泰山安”之句。光绪廿七年（1901年），前往广西任右江道道员，他写道：“新词欲赋贺梅子，他日应呼易柳州。”其高自标置如此。到任后，力主革除骚扰损民之弊，严禁私收派费……清盗抗匪，保境安民，赈济灾黎，发放牛种，发展农桑，深受士民感戴。因主张与两广总督岑春煊相左，被劾罢（后经都察院查明澄清，恢复原职）。光绪卅四年（1908年），被调任广东钦廉道道员。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清王朝被推翻，从此，蛰居沪上。作为遗老，与樊增祥征歌观剧，品题伶优，放荡不羁，不两年，穷愁潦倒，贫不能自存，见满清旧臣袁世凯僭位大总统，乃北上投靠袁之次子袁克文，当了印铸局代理局长。又得意洋洋，欣喜若狂，作诗自鸣其幸。这时荐书如雪片飞来，无法应付。可好景不长，民国五年（1916年），袁世凯帝制事败，又失去官职，委靡颓丧，飘泊京华，不复再出。看相的说他活不到56岁，于是，放恣益甚，他在《买醉津门雪中三绝》中写道：“焉知饿死但高歌，行乐天机奈我何，名士一文值钱少，古人五十盖棺多。”民国九年（1920年），抑郁成疾，逝于京寓。终年六十有三，非自料也。

综观其一生，虽出身官宦书香门第，但蹭蹬坎坷，仕途偃蹇，一生恃才傲物，受挫则意气消沉，沮丧颓靡，纵情声色，终日沉醉于冶游中。一旦春风得意，则踌躇满志，对权贵阿谀献媚，写纪恩诗。一生创作诗词不下万首，然大部分为风花雪月之作。这些作品，诗风卑靡，玩世不恭，为时人所物议，这是他可悲的一面。然而从全方位观察，我们不可忽视其另一侧面，很有特色的一面，诗人极富强烈的民族意识，在大是大非上，旗帜鲜明，表现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强敌入侵，他坚持主战；战败议和，他要求“罢和议，褫权奸，筹战事。”对外不畏强敌，对内一反以往对权贵逢迎，吟诗取媚的丑态，大义凛然，不畏权势，反对割让台湾，奋勇援台抗倭。在其著名的《劾权奸误国奏》中，矛头直指朝廷重臣卖国贼李鸿章父子。他愿“以先诛微臣以谢天下”之壮举，痛陈辽东、台湾之不可失。他写道：“辽东在，北洋之藩篱；台湾在，南洋之门户。今日无辽东，明日可无北洋；今日无台湾，明日即可无南洋。……倭既占我内地，且将取我民心，以利诱之，而桀黠者必为倭爪牙威以迫之，而驽弱者，必为倭鱼肉，……为渊驱鱼，瞻乌谁屋，中国将来必无可固之人民，无可守之山河。”李鸿章卖国媚外，“比之于魏臣司马昭、宋臣秦桧、明臣仇鸾之奸。”不仅李本人，而且言及其子。其子李经方，“前充出使日本大臣，以己资数百万借给倭人购船饷兵……其奸诈险薄，诚不减蔡京之有蔡攸，严嵩之有严世藩。”力主“将李鸿章拿交刑部治罪，并撤回李经方，革职严

办。”义正词严，读之令人肃然起敬，与一个写纪恩诗，对权贵阿谀献媚的诗人，判若云泥。在台湾危急之际，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只身深入虎穴。行前告友人曰：“幸则为弦高之犒师，不幸则为鲁连之蹈海。”其爱国壮举，风传全国，受到当时志士仁人之推崇，被时人誉为“气节功名之士”。他慷慨悲歌、壮怀激烈之作以数百计，有鼓舞台湾人民抗倭救国自卫将士的颂歌：“田横岛上此臣民，不负天家二百春；中露微君黎望卫。下泉无伯桧思郇。谁忘披发缨冠义，各念菇毛践士身；痛哭珠崖原汉地，大呼仓葛本王人。”有颂扬抗日名将刘永福的赞歌：“顺昌闻道有刘锜，赤手空拳半壁支；即墨田单为守将，睢阳南八是男儿。”有抒发自己抗日决心，马革裹尸的壮志：“泛海零仃文信国，渡泸兵甲武乡侯。马革倘能归故里，招魂应向旧南州。”这些充满爱国激情的壮丽诗篇，在万首诗中，虽然比重小了一些，但它的分量是不轻的，字字珠玑，声声血泪，爱国豪情，溢于言表，至今读之，仍不失其强烈的现实感，应该说也是他一生创作的精华所在。近人认为可与黄遵宪、丘逢甲并列，并称晚清三大爱国诗人是不无根据的。至于当代有人笼统地认为他的诗作，格调低下，只是得到“某些没落文人的赞赏”是失之偏颇的。对他我们既不应掩饰其封建性的糟粕，也不应无视其带有民主性的精华。为了进一步述说其成就，不妨引述近人的一些评价。钱仲联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点步军头领11员，易点为“天哭星双尾蝎解宝”。他认为“哭庵才大于樊山，自《丁戊之间行卷》至《四魂集》，各体俱备，山水游诗最工，其游庐山诗，经张之洞评定者，皆异彩辐射，眩人眼目，晚年颓唐，率多游戏。”汪国垣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评价更高于钱，点为“天杀星黑旋风李逵”，配诗云：“天宝诗人有任华，一生低首只三家（李白、杜甫和怀素）；读君癸丑诗存后，始信前贤不足夸。”谓其“惊才艳绝……推倒一时豪杰。”其诗“造语无平直，而对仗极工，使事极合，不避熟典，不避新辞，一经锻炼，自然生新。至斗险韵，铸伟辞，一时几无与抗手。”评语：“快人快语，大刀阔斧，万人敌，无双谱。”金成生在《近世文人吟评》中也有评：“无缝天衣妙手成，一时海内擅知名，岂徒烂熟南朝史，裁剪工夫实可惊。”章士钊也有论及，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易顺鼎著述甚丰，有《琴志楼丛钞》、《四魂集》、《盾墨拾余》、《诗钟说梦》、《霭园诗事》等传于世，计诗集72卷，词集10卷，经史杂著23卷。他的诗与当时樊增祥并峙，为诗界“两雄”，有“北樊南易”之誉。作为近代诗家中湖湘“别才子”（汪辟疆：《近代诗人述评》），他是一位多产而才华出众的有影响的诗人。

回忆叔祖颜昌峣

颜家龙

叔祖颜昌峣先生为清末至民国年间湖南著名学者、诗人及书法家。先生原名可铸，字仙岩，号息庵，1868年（同治七年）生于湘乡县神童镇，即今之涟源市石狗乡。1944年卒，享年76岁。

先生幼年就读乡村私塾，聪颖好学，勤奋过人，授县学优廪贡生。后从学于经师长沙王先谦门墙，旋而被推介于两广总督张之洞。1902年因成绩优异，由先谦推荐，被选派至日本留学，同行者有胡子靖、陈润霖、朱柏桢等10人，为湖南第一批官费留日学生。在日期间，结识黄兴、蔡锷等爱国志士。1903年人华兴会，积极参与民主革命活动。

归国后，立志教育，谓人曰：“日人胜吾，归功于小学，我今欲强我中华，教育其可外哉！”先后任教于湖南师范学馆、高等学堂、优级师范、省立第一师范等学校。1918年，任湖南省立第三师范校长，榜其门曰：“大江东去，吾道南来。”以明心志。1927年北伐军由广东北上，武汉成立武昌中山大学，校长徐季龙慕先生之名，聘为文学院教授，1928年任凯南任湖南大学校长，亦聘先生为教授。

先生赞赏王船山之唯物主义思想，故于王船山逝世216至222年期间，积极参与《船山学社》之组织与宣讲工作，与石蕴山一同主讲文史，多次就王船山学术思想作专题讲座，听众踊跃（事见《船山学刊》）。1917年前后，毛泽东就读于长沙第一师范，先生与杨昌济一道推荐毛泽东加入《船山学社》。为发展船山之朴素辩证法思想作出过重要贡献。

先生对好学进取青年，殊为关怀爱护，不少知名之士，如毛泽东、蔡和森等革命家，任凯南、黎锦熙、李剑农、黄士衡、谭戒甫、周世钊等学者，皆出其门下。毛泽东最爱研究历史，先生在第一师范主讲历史时，毛泽东听课认真，笔记详细，为先生所器重。一次，先生览阅毛泽东课堂笔记时，见其自加批注，多有辟见，乃大加赞许，并欣然语一师教师曰：“此诚栋梁之材也，国家民族有望矣！”毛泽东喜楚辞，先生曾赠以《楚辞集注》及《楚辞后语》二

书。1918年毛泽东一师毕业后常至先生家谒访，研究经史与探求治国之策。后周世钊多次与先生之三女颜珍谈及，谓毛泽东与其见面时，曾推崇先生为“有学问、有道德”之学者（颜珍我称三姑，最近听一位省立一中的老校友说，他在1949年就听说过此事）。

先生虽潜心教育，亦关怀国事，与黄兴、蔡锷等爱国志士往来密切。为使黄兴来湘从事革命活动有栖身之所，曾向王先谦力荐黄兴回湘任教。王先谦迫于境况艰难，乃复信婉辞。信曰：“黄君克强学问夙所佩服，惟此君既在日本调回，又为湖北张香帅逐出学堂，报馆遍登，声名甚大，以之在馆教习，断有不便，方命恕之。”故此未果。又曾与蔡锷商办《译社》，亦以筹资困难而罢。

民国元年，政府任命先生接办《长沙日报》，先生延聘任凯南、黎锦熙、李襄枬、李晋康等分任主笔及编辑，报纸“尽谋改良、内容大易旧观，销路激增”（见李抱一《长沙报纸史略》）。1915年12月闻袁世凯准备于次年元旦登基称帝，先生愤极，乃撰文辟斥。1916年接办《通俗日报》，时蔡锷、李烈钧等在云南组建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先生竭力支持。张平子在《清末到北伐军人湘的湖南报界》一文中对先生主持《通俗日报》作如此评价：“湘人以《通俗日报》委诸先生，报纸对时政多所建议与抨击。”

先生博古晓今，治学严谨，主讲经史时自编讲义，且殊多创见。王先谦与当时学使江建霞阅其经史讲义后皆极力赞许。王谓：“如游名山，玩之不穷；如食佳果，味之弥永，自非抱负奇伟，不能有此鸿文。”江谓：“硬语横空，笔力清瘦，妙在处处神注下文，可谓相题有识。”又曰：“议论明快，非枵腹者能道。”据易祖洛回忆，先生曾授课于长郡中学，易为该校学生，校长介绍颜先生时，谓“先生系王先谦高足，王之某些文稿，有由先生代笔者。”先生学识，由此可见一斑。

先生著有《珍琏山馆文集》《管子校释》《中国近百年史》《世界历史学》《禹之谟传》《新三字经》等。《珍琏山馆文集》出版前，吴挚甫极为赞赏，乃题词于卷首。罗庶丹、李肖聃等著名学者均赞之，“此乃桐城派之外，另树一帜，其湘乡派也欤!”湖南大学文学系教授熊知白称道：“先生之文实融裁史、汉、韩、柳之篇而新铸伟词者也。”

先生一生潜心于管仲之研究（曾在湖大开《诸子》课）。颜其所居之书楼为《校管楼》，所著《管子校释》凡数十万字，原湖南大学校长任凯南与教授李肖聃等对该着力加赞誉，李且为其作跋。1947年湖南文献委员会决议出版，推定谭戒甫任校正工作，后因时局变化而未成，该稿现暂藏于岳麓书社。

先生除擅长文史外，亦精书法。隶、楷、行、草皆有深湛造诣，而尤精于行草书。早年始学欧阳询之楷体，深得欧书端庄、精劲之妙。继而习颜真卿楷

法，悟其雄强浑厚之意，为楷书打下厚实基础。嗣后，对风貌古朴自然之《瘗鹤铭》及《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等亦作过精深研究，先生所作楷书，字小者多具唐碑精谨之态，而字大者又多摩崖烂漫恬静之姿。

先生之行笔书广纳博取，而对李邕与米芾两家用力最多。李书遒劲凝重；米字挺拔飞扬。先生之行草书中，此种气息与神韵，朗然可察。

先生之隶书秀挺可爱，其于《张迁》、《荣武》、《礼器》等汉碑临习最勤。所作隶书行笔痛快，挑、钩自然，笔姿优美而富灵动、洒脱之韵趣。

先生临池挥毫，必全神贯注，运用通身力气，从不懈怠。虽在数九寒冬，挥洒之时，解衣般礴，常是满头大汗。其认真之精神，忠于艺术之情操，实令人敬佩。

先生所书墓志有早年为我曾祖父、母所制墓表，该表后刊行问世；后有为岳麓山所书之《岳王碑》及《禹之谟墓碑》；晚年书有涟源关王桥之《黄婉梨烈女墓碑》及自书墓志铭等。

先生因酷爱书艺，于著名碑帖，常不惜重金，广为罗致，故所藏甚丰。因研习至勤，所存墨迹亦夥。然多散失于动乱之中，殊堪叹息!

我之嗜好书画，源于先生之影响。十岁前，先生旅居长沙，我就读乡里，虽无由亲聆教诲，但极崇敬先生之学问与书法。五六岁始即临习先生墨迹，兴味盎然。抗日战争爆发，先生自长沙迁居故里，与我家相居极近。故得时聆雅训，蒙先生器重，点读经史，挥毫时，为其研墨理纸，继而令为先生抄誊文稿。13岁始为先生代书普通应酬性楹联。耳濡目染，自有所得。可叹者，先生逝世时，我年方16。因相处时日短暂，兼我稚幼无知，故时先生之博大精深一时难有更多领略，所学一鳞半爪、一知半解而已!

我因殊爱先生书法，曾多方收集，今共得10余种，视同拱璧。时加览阅，每有收益。他日有成，自当感恩戴德、终身铭记。

板仓杨氏辑佚

伏家芬

（一）

女而革命表其元，慷慨悲歌孰比肩？
复壁遗书心眷眷，铁窗哺幼意拳拳。
一门三烈骄杨府，百转千回织锦篇。
万古板仓瞻塑像，凛然浩气薄云天。

（二）

后辈瞻依式母仪，依依杨柳荫荪枝。
囹圄教子图强日，戎马征夫索梦时。
心上丰碑歌未歇，陵前芳草露方滋。
周年六十重回鹤，盛世馨香祷应知。

1990年，开慧烈士牺牲六十周年，为缅怀先烈光辉业绩，弘扬革命精神，长沙市、县的干部群众踊跃捐资90余万元，在板仓烈士陵园，建立一尊开慧烈士汉白玉塑像，1990年11月14日上午，举行纪念大会暨塑像揭幕典礼。当中顾委领导同志宋时轮、耿飙将帷幕轻轻拉开时，我肃立在下面，瞻仰烈士的英容，无限钦敬。是晚，会见了岸青和邵华同志。归来后，写了上面这两首律诗，以资纪念。

我是板仓杨氏的外孙，开明烈士是我的亲舅舅，开慧烈士我唤作“霞姨”，杨开智同志我唤作“珍舅”。我七岁丧母，姨母杨开英把我们兄弟姊妹拉扯大。包括萧家的两个表兄弟（千鸿、万紫）在内，我们的童年都是在外婆家度过的，侧闻先烈之遗教轶闻，受益不少。

板仓杨氏一门三烈，为杨开慧、杨开明、杨展。杨开明为开慧烈士堂弟，杨展是她的侄女。板仓人呼杨开智为“大先生”，杨开明为“一先生”，呼杨开慧为“大小姐”。此事，珍舅生前对我说：“乡下人称我为‘大先生’，这是因

为兄弟姐妹当中，我年纪最大。称你舅舅为‘一先生’，是因为他名叫‘一清’。称开慧为‘大小姐’，是因为她们几姊妹，她年纪最大，下面还有你妈妈，你桂姨，你友姨三个。”

开慧烈士的家世，查《蒲塘杨氏六修族谱》，斑斑可考。该谱系建国前刊印，据其卷三十七“华明裔·学衷（素和）支”记载：“十五派杨万田公之长子杨书樵，清例贡生。生子四：宏模（殇）、宏棠、宏棻、宏桀”。这位书樵公便是开慧烈士的祖父，系“乡里宿儒，以授徒为业”。

宏棠字荣生，清邑庠生，无子。以开智祧继为子。所以，这位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农业学士、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开智同志，建国前，在自己的小宗族里是一位肩祧两行的“大先生”，颇为聚族而居的族人所尊重。“开智生一女，名展，待字。”便是我们所熟知的杨展烈士，周南女中高中学生，参加革命后，曾在陕北公学学习，1937年入党，1939年在晋察冀联合大学工作，1941年秋，牺牲于河北平山县之抗日战场。杨展牺牲后，1949年8月10日毛主席寄杨开智的信中写道：“展儿在八年前的抗日斗争中为国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珍舅膝下无儿女，过继珍舅妈之姨侄女“十宝”为女，后取名杨瑛。

宏棻字华生，号怀中。清郡庠生，开智生父。族谱上赫然记载着：“子一，开智，祧继胞兄宏棠。女二：长殇，次开慧，适湘潭毛润芝。”

宏桀字瑞生，号兆秀，一号缀申。子一：开明，字一清（又号溢清、克敏），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女三：长、开仁（开云），适湘阴伏慎初（我的父亲）；次，开秀，适武岗萧宗仁；三、开英，湖南大学毕业，待字。

宏棠（荣生）、宏棻（华生）、宏桀（瑞生），这同胞三兄弟，板仓人按排行，称：荣生大爹，华生三爹，瑞生六爹。荣生公早逝，他的夫人，我们叫“大伯外婆”，我们小时还见到过。华生公与瑞生公兄弟二人撑持着门户。瑞生六爹（我的外公）饱读诗书，学问很好，与同乡柳午亭、章士钊友好，过从甚密。不汲汲仕进，在当时的岳州厘金局任职，所得工资，除家用外，主要用于接济华生三爹读书。族谱记载：“宏钊字华生，后号怀中，册名（学名）昌济，清郡庠生，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及帝国大学毕业，英国伦敦泥北淀大学毕业，得文学硕士位。又游学法、德二国，考察教育。著有《修身讲义》、《论语类抄》、《伦理学原理》、《西洋伦理学史》及《伦理学根本问题》诸书行世。”据我外婆讲：“原来板仓杨家下屋只有一百担租左右，后来人口增加，家用拮据，若非你外公在岳州厘金局做事，节省点钱接济你三伯外公，他也难得既留学东洋，又留学西洋，要知道，当时的光洋，一拿就是几百块呀！”这些事实，说明兄弟二人感情之笃。

前诗提到"复壁遗书"，究竟是怎么回事？

事情是这样的，1982 年，修葺板仓烈士故居，从旧墙的壁缝中，拆出一些纸卷，打开一看，正是开慧烈士的遗墨。其中有：五言诗《偶感》五首；《给一弟的信》二封；《见欣赏人头而起的悲感》、《女权高于男权》杂感二则；《寄一弟》新体诗一首；《寄爱》散文一则。

《偶感》五首，1928 年 10 月写。第一首，是怀念毛主席的。这首的前段，因寒问暖，即景生情，一迭连声四问，曲尽缠绵之致。"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后段着力写惆怅之情："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参阅《寄爱》一文，互相印证，互相发明，确乎千回百转，柔肠寸断。《寄爱》写于 1929 年 6 月，她写道："父亲死了，我对他有深爱的父亲死了！当然不免难过。但我见父亲是得到了解脱，因此，我并不十分悲伤。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一直到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像着，假如有一天他死去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运命!"这一念之贞，是何等真纯质朴，坚忍不拔，真是金子般的心啊！她爱党，也爱从事党的活动的丈夫，这正是她身陷囹圄，遭受百般凌辱，酷刑拷打而不屈的思想根基！像她这样一位在伦理学教授的父亲熏陶下的东方女性，竟然全始全终地保存了一个有人情味、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材料制成的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精神风骨。"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千载之下．瞻仰她的遗像，诵读她的诗文，想像其为人，仍将对她的浩然正气，肃然起敬，引为骄傲！

《偶感》之二，是怀念杨开秀的。杨开秀为我外公——瑞生六爹之次女，我们唤作"桂姨"。诗云："家有一秀妹，前兹为我亲，忆昔自京归，同榻共晨昏，偶去三五日，适有冰人至，狂跳盼我归，急切如燃眉。迩后入福湘，伊自往岳州，住岳不数月，仍复归长沙，急切思若人．至复得相亲，当时各陈迹，历历在吾心。风云诚莫测，人情亦复如。追索伤我怀，五内相煎熬。愿将金石意，感尔故人心，朋情至可贵，无可相比伦。"前面提到，杨开秀嫁武岗萧宗仁，武岗，今属邵阳。她与开慧，年龄相近，姐妹之情尤笃，因此，当其有媒人来说合萧家婚姻时，急切想与开慧商量。其后随父去岳州，虽只数月，开慧急切思念，写此诗时，当已结婚去武岗，故曰"当时各陈迹，历历在吾心……追索伤我怀，五内相煎熬。"又，我姨父萧宗仁系湘西中共党创建人及武装暴

动领导人之一，画家，笔名松人。曾在周南女中教美术，以掩护地下活动。解放前，我曾见他画的梅、兰、松、竹，挂满珍舅的堂屋（客厅，在开慧烈士卧室前侧）。诗中谓"风云诚莫测，人情亦复如"云者，意当有所指，且为开秀夫妇担心也。

《偶感》之三："沪有一纯姊，思伊伤我怀；能识我衷肠，能别我贤愚。"一纯姊当指李一纯同志。1950 年我姐姐明达曾随友姨到北京看过她。那时，她在北京育英学校任协理员。她说，岸英结婚时，毛主席还请她参加了婚礼，说她"曾是开慧的好友"。当年，这位"一纯姊"远见卓识，气度不凡，为女界革命先驱，所以为烈士所敬重，引为知己。

《偶感》之四："城中有友妹，不知伊处居，爱我尚无变，情怀相永依。"友妹，指杨开英，我们唤作友姨。当时在含光女中读书，后又在湖南大学毕业，获哲学学士学位，小时候，我还见过她学士冠戴的毕业照。这位一直与开慧烈士友情深笃的人，烈士高度信赖，被捕前，曾让她在一起，帮助将党的文件和毛主席信件烧掉。解放后，与宁乡李辉结婚。她从事教育工作，曾受到毛主席多次接见。听说她生病，主席托人捎信慰问，信云："友妹：听说你得结核，贫、病，现托胡觉民转致五百元给你……"。她 1973 年病逝于北京，骨灰安葬在板仓。

《偶感》之五是总结前面四首的结束语。"良朋尽如此，数亦何聊聊。念我远方人，复及数良朋，心怀长郁郁，何日复重逢。"显然，"远方人"指的是毛主席，"数良朋"是秀妹、纯姊、友妹等人。解放后，毛主席曾多次向友姨询及杨家姐妹情况，主席说："杨家都是好人!"这其中，也许包含了开慧烈士的几分遗意吧！

在开慧烈士的遗书里，有两封信是写给"一弟"的，一首新诗也是"寄一弟"的。"一弟"，就是我舅舅杨开明烈士。

1929 年 3 月所写的第一封信，遗书中用括号说明"没有发去"。这封信，一开始就说："一弟，亲爱的一弟：……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我的依伴，你如是乎在我的心田里就占了一个地位。此外，同居在一起的仁、秀，也和你一样，你们一排站在我的心田里！我常常默祷着：但愿这几个人，莫再失散了啊!"这里所说的"仁"。就是杨开仁，我的妈妈；"秀"就是杨开秀，我的桂姨。朝夕相处的姐妹弟兄，是她从事革命活动的天然盟友和坚强后盾，一弟又是志同道合的同志，这些可依伴的至亲骨肉，在她慷慨赴义的前夕，在她的心田里占有别人无法取代的地位。这几句贴心话，多么感人肺腑，真是情真语挚啊！接下去，这封遗书讲的是托孤。她写道："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而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啊，我有点可怜他们，而

且这种情绪，缠扰得我非常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而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但是，倘若真个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地生长，而不至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这一个遗嘱样的信，你见了一定会怪我是发了神经病。不知何解，我总觉得我的颈项上好像自死神那里飞来一根毒蛇样的绳索，把我缠着，所以，不能不早作预备！杞忧堪噱，书不尽意，祝你一切顺利。”从这封遗书看，烈士生前对牺牲是有预感的。然而，后来在敌人的刑庭前，面对死亡，临危不惧，她是那样镇定，那样慷慨，将生命置之度外，决不低头苟活。语云：“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此二者，烈士可谓兼而易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此之谓也。这封信，有人将“一弟”解释为毛泽民同志，这是显而易见的误解，信中不是明明讲了小孩们的“叔父”吗？这“一个叔父”则是毛泽民。不然，信中提到“同居在一起的仁、秀，也和你一样，你们一排站在我的心田里”，又说，“但愿这几个人莫再失散了啊”，这些，将如何解释。

一弟，杨开明，何以能得到开慧烈士如此器重，在她心中占有如许重要的地位？

我家中有一本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开明烈士日记》手稿，还有一个来自老苏区的材料——杨克敏（开明）《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综合报告》。《日记》题名曰：“日知其所亡（无）”，“作于民国十四年上期，时毕业于省甲种工业学校，无相当工作，居乡自修。”（杨开英跋语）足以代表其学生时代之志趣。《报告》写于 1929 年 2 月 25 日，时正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足以反映其参加革命后之政治见解与思想作风。在烈士就义后六十年的今天，我们来读这些资料，仍可以窥见当年烈士的革命品质与精神风貌，片羽吉光，弥足珍贵。兹简述数端如后：

一、开明烈士家学渊源，有较高的思想修养与文学素养。请看《日记》：

“三月七日。晴。今日天气晴和，早饭后出外散步，见野草滋荣，杂花渐放，顾而乐之。周茂叔云：‘窗前草与自家意思一样’，愿引以自励。”

“三月九日，晴。或有问余者，伪君子与真小人轨为可鄙？答曰：宁交真小人，毋交伪君子。夫真小人者，固不失其本来面目，其偷奸贼盗之行，彰乎人所共睹，故人得因时因地以防范之，且为之露其本来真面目，故为害于人者必不大。伪君子则不然，心险而行诈，外貌堂堂，俨然君子也，而其万恶之心，包藏于内，人初或不能识其奸者，故贻祸滋大。伪君子不能逃君子之诛，真小人或为君子所有，是以少正卯为君子所戮也。”

“三月十七日，晴。晚代伯母写信两封：一与开智，一与开慧。吕淑简曰：‘心中只摆脱一恋字，便十分自在，人生最苦是沾泥带水，明明知得，只斫割不断，皆恋之一关不曾打破’，此语诚切一般青年之病。”

“三月三十日，雨。阅阳明文，尽情入理，发人深省。先生为学，主尚良知，盖万事根本于心，人性无有不善。良知者，即不昧之良心也。人苟事事俱本于心，自无所陨越，不愧为人矣。先生文章勋业，标炳天壤，不亦宜乎！”“牟叔庸先生日：群居守口，独坐防心，可引作座右铭。”

从这些日记，可以看出开明烈士十九岁时之人生态度与学问根底。解放前，我在外婆家，还见到过他所抄的一首清人龚自珍诗：“闲将物理自参详，万事何须论短长。凡所难求皆绝妙，及能如愿便平常。九秋枫叶经霜艳，六月松涛带雨凉。各有情形天不管，凭将世事唱迷汤。”墨笔楷书，有颜平原刚劲之风，与现存日记字体相似，用镜框嵌着，挂在外婆卧室的床头壁上，可惜毁于“文革”。看来，烈士将古人的哲理、格言，熔铸在自己修身立命的人生观、价值观里，这大概就是他后来豁达、谙练、刚毅的得力处，或者说，就是他精神力量的最初源泉。至于日记所载，作诗文对联，挥毫书翰，为当地所推重，犹其余事。

二、开明烈士胸怀壮志，笃实躬行。他在三月八日日记中写道：“知行不能合一，好大喜夸，名浮于实，中国之通弊也。为其如是，故浑噩一堂，迄无进步，终成其老弱之古国而已。处今日世界竞争之秋，列强崛起，孜孜焉日进千里，相形见绌，每况愈下，诚不知其可也！岂不殆哉？曾文正云：一国之风气，得数卓荦非常之人可以转移之。由是观之，欲救中国，转危为安，犹可为也。彼卓荦非常者，固果天之所特赋者欤？曰：否。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事在人为，有志者竟成之。”爱国爱民之心，革命维新之志，跃然纸上。后来，他果以卓荦非常之资，作卓荦非常之事，可惜二十五个春秋，就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志竟未酬。三月十一日写道：“青年之病，莫大于堕落而不自觉，处兹万恶之社会中，无往而非陷阱，偶一不慎，即受其患；盖青年血气未定，易为物欲所移，良可怖也。一失足即成千古恨，非有倔强不屈之精神，坚韧不拔之志气，咬定牙关，力自振拔不可。俗云：‘毋为环境所征服，当征服环境，’此之谓也。”后来，开明烈士投身革命，备历艰难险阻，终于一往无前，咬定牙关，坚忍不拔，倔强不屈，这是年青时代就养成了这种宝贵品质的缘故。三月十三日写道：“余庸顽性成，自况俗不堪耐，为天地间第一无用之人，亦第一可怜之人，然愚则愚矣，而倔强是我本能，颇不自量，时有非分之想。……曾文正公不云乎，金丹可以换骨，立志即金丹也，予诚能立志坚牢，百折不回，坚忍不拔，何患不能达其目的也哉！”现在看来，烈士的“非

分之想”，即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之远大理想，而换骨之金丹，即共产主义的伟大信仰。烈士蓄此“异志”，便与姐夫毛主席一起造反，九死不悔，可谓倔矣！

烈士曾在三月十八日日记中写道：“阅《传家宝》见杨忠悯公椒山先生之忠直耿介，才志道德，慨然想见其为人。及其为贼所忌杀，死生置之度外，毫无所畏惧，含笑狂歌以赴义，阅之诚令人拔剑起舞，感慨而痛惜也，其致妻之信及示子之遗言，均有见识之言，读之尤令人愤发，公真丈夫也。”后来，开明烈士于1929年底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国民党特务酷刑拷打，始终不屈，临刑以刺刀插入口中，犹呜呜骂不绝口。其壮烈牺牲之情节，与明代敢于与奸相严嵩作斗争而坐牢三年、备受酷刑不屈以死的杨椒山先生的行事，何其相似。两位伟丈夫，虽时代不同，理想迥异，而铮铮铁骨，盖可以千古并传矣！

三、开明烈士对党的建设，有着十分明确的观点。他于1928年任中共湖南省委秘书，六月，由省委派往湘赣边界，任特委书记，参加井冈山的斗争(此事，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有记载)。十月，省委又调他回湘工作，因当时烈士身患大病不能成行。到1929年1月13日，由井冈山动身赴上海当时党中央驻地，报告工作。所写报告，就边界之政治、经济、军事、党建、土地革命等情况，分十二部分写成，约三万字。当时戎马倥偬，而又大病初愈，写此长篇大作，颇费了一番心血。其中关于党的建设，曾多处提到。他说：“要造成割据，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什么呢？1. 很好的党；2. 很好的群众；3. 相当的武装；4. 利于斗争的地势；5. 有足供数年给养的经济力。”这里，他把党的领导摆在第一位。在论红军时，他说：“红军中的党组织，由上而下说，由军委而团委、营委，连设连支部，各班自成一小组，这个组织，我们很觉得法，很能适应于斗争。”“我们的军队其所以打败仗而不致于溃散，这个组织的好处，应为主要的原因。”他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党指挥枪”的论点。其在向中央的报告书中，检讨边界党的缺点，是很富于自我批评精神的，他说，“边界党的缺点：A. 不民主。指导机关时常仅只有一二人包办之，个人专政，书记独裁，崇拜个人的恶习有足虑者。B. 多头政治。一方面不民主，一方面又是多头政治。如特委之上而有前委之组织，使‘政出多途，无所适从’，殊有碍工作。C. 信仰个人。党员崇拜领袖，信仰英雄，而不大认得党的组织……N. 党的权威很大，可以说党权高于一切。从反面来说，就是我们的工作没有深入群众。O. 党员的意见不能反映到指导机关来，而党的指导机关决议案，亦很难普遍传达到党员群众中去。”这是一位早期的中共领导对党内民主的论述，一针见血，洞若观火，多么难能可贵！特别是在报告中，还自我检讨领导之不民主，他说：“特委的事总是书记一个人处理。个人专政，书记独裁，成为边

界的通弊。首先XXX为特委书记时，特委就在他一个人的荷包里，后来开明代理书记，特委又是开明一个人的独脚戏……。”快人快语，直抒胸臆，这种勇于自责的精神，现在读来犹令人感奋不已。谈到党员的素质，他说：“失败的经验告诉我们，党员的征收（吸收）不但要注意成分，而且要注意质量，不要只图数量的好看，党与民众必须经过相当时期锻炼才成，短期间人工强制、制造出来的，是外强中干，中看不中吃的。”他还说：“有一个时期公开的用拉伕式的‘上册子’的办法征收党员，成分又不注意，引起投机分子潜滋党内，使党只有数量的好看，而不能斗争。”多么精辟透彻，多么通俗易懂；非遭切肤之痛者，不能下此针砭。回想“文革”时，“突击入党”“突击提干”一套错误做法，令人哑然失笑。岂知党的初创时期，革命前辈早已垂戒在先。

四、开明烈士对于群众和群众路线，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年轻时，他在日记中曾写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如不能群，无异于禽兽矣。……今世文明日进，民智日开，‘到民间去’之新声浪，及持社会主义与社会学者风靡一时，无非重笃人群之道，使巩固而改善之也。诚以处此外患日逼，内乱频仍之秋，非此将无以为群，无以善后也。”十九岁的他，便已将依靠群众。关心群众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及至参加革命，他对井冈山的一段工作，是这样评估的：“边界经过年余的奋斗，血与头颅的代价，发动了广大的群众，搅乱了统治阶级的基础。在一般而论，是有相当的成绩的。”这里说明，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群众的力量。接下去谈到工作的缺点：“不过，因为白色势力的厉害，环境的恶劣，孤军奋斗，工作艰难，得不到上级的指导，得不到群众的帮助，所以革命的进程，虽然是日日向上的，但是进步的速率是非常迟缓延滞的。”这里，谈革命进程迟滞，也认识到得不到群众的帮助是个重要原因。当时，处于敌人四方包围之中，“层层步哨，密密网罗”，“这样的封锁政策，使你如在桃源洞中而不知人世变化到什么程度，有无论秦汉魏晋全然不知之苦，对外面的政治情形既不了解，又得不到上级的指示，连报纸都难得到。要在这种‘敌军围困万千重’的情况下，岿然不动，而且主动反击，化险为夷，非依靠群众不可。”《报告》在分析敌我双方形势时，他说“我们所占的优势是：一、地势熟谙；二、敌情较明；三、以逸待劳；四、历次败敌，敌畏我威；五、每次作战，都有群众参加，把军队分散杂在群众中去对付敌人，可以得到群众的掩护；六、采用游击的群众战术，军队与群众在敌前后左右，出没无常，扰乱敌人，使敌难以应付。”这里，他把群众的力量摆在关键性的位置，作为克敌制胜的法宝。在论及红军的战略战术时，他说：“每次作战，必须尽量使群众参加，实行有广大群众参加的群众战。敌强于我，避免强战，敌弱于我，设法歼灭。作战要有政治意义和群众基础，反对军事的投机主义；作战是

科学的、艺术的，反对盲目的军事冒险主义；下一与群众共生死的斗争决心，反对逃跑的失败主义；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溃我进，行动敏捷，出没无常，采用游击的方法以困敌人。红军兵力力主集中，赤卫队则以分散为宜。”如何依靠群众和走群众路线呢？开明烈士既反对尾巴主义，也反对命令主义。他在检讨边界党的工作缺点时，曾指出：“尾巴主义。地方党，常常依赖军队，跟着军队跑。……命令主义。发动群众领导群众去斗争，或要群众去工作．往往用政治力量去压迫他们来干，不来者威胁之，处罚之，即征收党员也是如此的，这个错误在有一个时期犯得很深。这个叫它是命令主义还不够，要叫他为强迫主义才对。”在这里，开明烈士熟练地运用了辩证的观点，既反对尾巴主义，又反对命令主义，而对命令主义尤为痛斥。

开慧烈士寄一弟的诗，是1929年古历四月初八日写的。自注：“没有发去。”诗中写道：“你现在是父母热爱的亲人，你许给他们归来，归来。我看见老人的心已如火焚了！归来哟，归来哟！伤心的别离，它的结晶品——凄凉、寂寞，已渐长渐大了！希望你啊，带一点消息回来！”这时的一弟，他在哪里呢？

据我父亲生前回忆：“一次，毛主席到了板仓，我和你舅舅都提出要跟毛主席去闹革命。毛主席说：‘伏一哥，你就算了吧！你是独子，又有妻室儿女。一弟倒可以去。’于是，你舅舅后来就跟毛主席外出了。”根据资料，开明烈士于1925年至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干事，1926年经刘重民、陈素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返湘开展农民运动，同年五月，马日事变后，到安源帮助建立工人纠察队，后赴井冈山任共产党大本营书记。1928年任湖南省委秘书，5～7月间，省委多次派他至湘赣边界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同年六月省委派至湘赣边界任特委书记，后督队指挥耒阳战役。我姐姐明达回忆说：“舅舅参加革命后，因是地下工作，每次回板仓，都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记得一个风雨之夜，舅舅回家了，全家都很高兴，但第二天的早上，我一醒来，舅舅不见了，我就大哭一场。”1929年1月13日开明烈士自井冈山动身，代表边界党委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由永新北乡，沿途昼伏夜行，经吉安，转南昌，艰难曲折，然后抵达上海，历时二十多天。1929年2月25日写成关于湘赣边界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报告中央。随后任湘、鄂、赣特派员。1929年下半年在汉口联络陈子峰、张益楷开展革命活动，准备赴贺龙处工作。开慧烈士写怀念诗的时候，她的一弟，估计尚在上海。

第二封信，没有注明何时写的，但从稿纸及墨迹看，是与诗同一时间写的。信一开始就说：“一弟：接到来信，万分喜慰。其实，我是一个最能达观的人，并不忧苦得怎样厉害，不过总有一点难忘情。感情一时一时像暴风一样

的来了，一些时又去了，大体是平静的。……那封像遗嘱的信，没有发来，你能回家一转，极所盼望。他未必能来上海吧？我倒愿他莫来上海哩！我又要不放心了啊！天哪！不谈了，祝你好。”这封信，说明开明烈士曾写信安慰开慧烈士，所以她的信中“其实”以下至“并不忧苦得怎样厉害”，就是答复。当时，开明烈士在上海。开慧烈士笔底下的“他”，指的是毛主席，既想他去上海，郎舅一叙衷肠，借此转陈自己的渴念；又担心他的安全，倒愿他莫去上海。这种矛盾交织的心情，正是“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的注脚。从这封信看，当时的一弟，确乎在上海。

板仓杨氏，一门三烈，杨展烈士生于1920年10月26日，参加革命后牺牲于抗日战场。当时年仅21岁。开慧、开明烈士不幸被捕，牺牲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死事之惨，湘人父老犹可忆及。

开明烈士于民国十八年除夕，被叛徒刘绍舒出卖，在汉口被捕，翌年正月初一押至长沙。我外公筹集光洋3 000元，托人求保。三伯外婆（杨昌济夫人）曾亲赴蔡元培、章士钊先生处，请求营救，于是，章士钊先生带了蔡的信件自北京坐飞机赶来长沙，多方关说。当时，省主席何键考虑到杨开明是杨昌济先生的亲侄，又碍着章先生、蔡先生的面子，开始有点松动，基本同意保释，只要杨开明低头认错，洗手不干，便可出狱。但我舅舅坚贞不屈，决不低头。提审时，他说：“我赤胆忠心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绝没有犯任何错误，错的是你们这些军阀、贪官污吏。你们审问我，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你们要杀就杀好了，共产党越杀越多。”“杨开明精神不死，打倒蒋介石，打倒何键！你们是帝国主义走狗！”特务兽性发作，便用酷刑拷打，用辣椒薰鼻子，踩杠子，把他一身脱得只留一套单衣服躺在地下，经过几次毒打，白衣变成了红衣。始终不吐一字招供。当时省清乡司令部的头头见状，气急败坏地说：“杨开明不杀杀谁?”力劝何键判以极刑。何键意本犹豫，至闻清乡司令部头头之言，乃说：“杨开明来头不小，今日我不杀他，来日恐他杀我。”其意遂决。当被绑赴刑场时，烈士还高喊：“打倒何键！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武装特务用刺刀刺进他的腰部，他还是不断高喊，特务恨极了，又把刺刀从腰部抽出，再插进他的口里，搅他的舌头，狠心地说：“杨开明！你还能喊吗?”烈士口中、腰部的鲜血不断地滴，一直滴到城外浏阳门刑场被枪杀。当时是正月二十日（1930年2月22日）下午三时。

据当时大公报刊载：清乡司令部公布杨开明的“罪状”是这样的：

“查共党要犯杨开明，隶籍长沙，与共魁毛泽东为郎舅，曾于民国十五年经刘重民、陈素月介绍加入共产党，十七年充伪省委秘书，迨机关破获，该犯逃跑，依朱、毛于井冈山，充当书记。迨井冈山击溃，该犯复潜居汉口，联络

陈子峰、张益楷等，决议同赴共魁贺龙处工作……似此甘心从逆，依法处以死刑，以昭炯戒。”

我外公看到这张告示，顿时泪眼模糊，喃喃地说：“这不是真的！假的，假的！”但是，儿子壮烈牺牲毕竟是不可争辩的悲惨现实，他老人家从此忍着丧子的悲痛，绝意仕进，装聋作哑，佯狂玩世，人称“瑞六聋子”，郁郁以终。

舅舅牺牲后，堂弟杨秀生与乡邻缨仲和等人星夜赶到长沙，将遗体运回板仓。据当时老人回忆：抬回时，用布单盖着，遗体躺在竹板上，由于开明烈士个头大，一只手还垂露在外面，那时急于赶路，也顾不了许多。到了板仓，按乡俗屈死者不能从正门进，只好拆了一段后墙，抬进下堂屋，装棺入殓。

我妈妈当时正生下我三弟（寿维），抱着襁褓的婴儿回娘家，探问舅舅的消息。走到板仓附近的河滩边，看到有人在筛砂子，准备营葬，知道舅舅已经牺牲，立即晕倒在地。由是三弟后来就没奶吃了，吃炼乳长大，身体一直瘦弱。

我外婆那时被人假传母病，哄到娘家金井探亲。回家后，一直瞒着她。后墙拆了，就说是下雨倒塌的，办丧事吃掉一坛辣椒，就从我家拿来补上。其后若干年，友姨或化装哥哥照相，或托人冒名“杨开明”自川陕寄钱，以安慰外婆。直到1949年6月外婆临死弥留之际，还在盼着儿子归来。如今重读开慧烈士怀念诗：“归来哟，归来！”真令人肝肠寸断。

舅舅曾结过婚，舅妈名叫文瑛，我姐姐还看到过他俩的照片，一坐一立。后来听说有个孩子，惜乎照片没有了，解放初期，友姨托人到处找舅妈和孩子——她家两房三代的独苗，竟毫无结果。（但愿今后有有心人，能为我们提供线索）。

开慧烈士生于1901年农历9月26日，牺牲于1930年11月14日，年仅29岁。烈士生性贤淑，待子侄很慈爱，我姐姐回忆说：“霞姨待我们很好，小时候，我和弟弟寿景与岸英、岸青兄弟一起在板仓杨公庙小学读书，霞姨从长沙买来学习用品，总是连我们一道分的，连订的《小朋友》杂志，也是一起阅读的。当年她分石板、石笔给我们的音容笑貌，至今还历历在目。50年代，我与岸英见面，谈起少年同学的往事，而霞姨早已离开我们，不觉相对嘘唏泣下。”

开明烈士比开慧烈士小四岁，生于1905年农历12月23日，牺牲时才25岁，开慧烈士生前写信托孤，将小孩们——岸英兄弟托付给她亲爱的一弟，谁知一弟却先她而逝九个月。

开慧烈士牺牲后，毛主席在中央苏区闻讯，悲痛不已，托人寄回光洋三十元营葬。在寄回的家书上写着：“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当时，我珍舅——杨

开智不敢出面，只好由我父亲伏慎初出面张罗，雇工打了一块三尺高的石碑，上刊“毛母杨开慧墓、男毛岸英、岸青、岸龙立”等字，这块简古粗糙的小石碑，至今仍在，可作艰难岁月的见证。

开慧烈士与开明烈士的坟茔，都在板仓棉花坡杨氏祖茔山上。两位烈士的祖父母——杨公书樵大人夫妇之墓，在现在开慧烈士陵园之后侧，当年开慧烈士之父母附葬于此。1962年11月，毛主席写信给珍舅（开智），略谓：“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后来，长沙市县政府为开慧烈士新营陵寝，便迁其母棺附葬（父棺仍附书樵公墓），母女合葬，亦千古盛事。开明烈士之坟墓，在其祖父书樵公坟茔之左侧，恰在开慧新茔的背面，开慧烈士生前寻找依伴之说，竟成谶语。1963年3月长沙市县群众为开明烈士修一石墓，并为开慧、开明、杨展烈士合建一纪念塔。塔高五米，长方体，正面刻“光辉长照后人心”大字题额，另三面各镌一烈士之事迹于其上，往来瞻仰者，读其英勇奋斗、壮烈牺牲之事迹，对板仓杨氏一门三烈肃然起敬。可惜毁于“文革”，只剩下一方题额石碑屹立在山头。

本文开头所写律诗，曾在湖南日报、东方日报、湖南诗词等报刊发表，许多读者来信欲知其详，爰记如上，借以知革命前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社会主义的今天，确实来之不易。

长沙板仓杨怀中先生传

曹典球

杨昌济，原字华生，后易字怀中。湖南省长沙县东乡人。父书祥（樵），乡里宿儒，以授徒为业。先生入学即受庭训，未尝就外傅，凡经史义理词章之学，皆书祥公所亲授。先生尤服膺朱子，慨然有济人利物之志。学成，未及冠，即受知学政张辛嘉，补邑庠生，亦尝继父业授徒于其乡。自署其斋曰“达化斋”，每日必书日记，曰《达化斋日记》。余检其早年日记残稿，有一则云：“予恒有自满之过，形于辞色，二三益友往往微示风旨以警劝之。此大病痛，宜痛加克治者也。资质愚虽竭立（力）学问，犹不免于笑焉，是诚莫可如何之事，惟勿好自用，以盖人之笑，斯为极不可忘者。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诗》曰：‘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反顾生平，不胜愧悚。”按：不自满，是先生一生治学最得力之处。惟其不自满，故不自欺；唯其不自欺，故以之修己，则己无不成；以之教人，则人无不乐。先生之所以能卓然成为一大教育家者，其根基实在于此！

先生所处之时代，以国内论，是危急存亡之秋，是封建王朝行将崩溃之日；以世界论，是帝国资本主义挟其新兴之势，从西至东，猖狂侵略之时。先生独居深念，默察世变，方计划己身之如何处世，国家之如何图存，而定一己救人之方针，努力躬行实践，方能无愧于所学。李肖聃作先生传略，谓先生少壮时慨然有必为圣人之志。余有先生自述之一段故事，可以为证。盖1898年，湖南戊戌维新运动，开南学会，先生方居岳麓书院肄业，独离开山长王先谦，入会听讲发问，谭嗣同答之曰：“于圣贤微言大义晦盲否塞之秋，独能发如此奇伟精深之问，此岂秦汉以下之学者胸中所能有哉？兹事体大，余亦何敢论断。总之以民为主，如何可以救民，即以如何为是，则头头是道，众说皆通矣。”据谭氏所答，是以圣人事业期许先生，李氏之言，实与暗合。由此可见，先生之思想，在戊戌时期已有一极大之变化，嗣后决志从事教育以救国救民，方针已经确定无移。又李氏传略云：“先生与族孙守仁（即敏麟、字笃生）同居岳麓书院，刻意为学，而志趣不同。……守仁好读时务家言，而怀中守程朱

之说。”证以谭氏之答词颇有不合，盖先生因笃信程朱，然并非不谈时务家言者。李氏谓先生与守仁志趣不同，是以时务与学术分为两歧，且与先生日后这宗旨相刺谬，不可不辨。

先生经戊戌政变之后，潜居影珠山麓，少履城市，绝意科举之业，惟常读《通鉴》及王船山《读通鉴论》诸书。以古证今，痛论时弊，储备经世之学，以诏来者。而又极感所学之不足，不足为人师，尝思往国外留学，求知于世界，采取东西哲学家言，以教育青年，使之尽力于国事。适值1902年，湘政府招考资送日本留学生，先生欣然应试，得取录往东京学习师范科。同往者有胡元倓、陈润霖诸人，大抵皆习速成科，期竟业早归办学，而先生与杨树达则愿习永久科，以富其所学而无误青年为主旨。先生居东三年，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更入日本帝国大学文科二年毕业，犹以为未足，远游欧西，至苏格兰亚伯淀大学肄业两年有半，得文学士学位，复赴德法考察数月始乘轮东归。当时，清廷有所谓留学生考试者，经北京廷试，给以翰林、进士、举人等名目。先生竟不赴试。辛亥革命即毅然回乡，其尚实际，薄虚名，在当时东西留学生中实所罕见。

湖南光复，公举临时教育司长为陈润霖。民国元年（1912年），湘政府请先生为之继，先生固辞，适政府改岳麓高等学堂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聘先生为文科教授，先生欣然乐从，开始编辑讲义，翻译东西文伦理学，教育学名著。

如《论语类钞》《伦理学原理》《西洋伦理学史》诸书，皆在岳麓山讲学中所著述。湖南之师范教育，前清末年虽有中、西、南三路师范学堂及优级师范学堂之设，大辂椎轮，不为无功。但至高师成立，始有西洋伦理学、教育学及哲学等课程，其规划皆先生所首创。先生自精研中国经、史、性理诸学数十年之后，又继续在日、英二国苦学九年之久，对于中西学术源流，政治风俗，了如指掌；加以本身之存养省察，事事物物，无不加以详密之分析，而后出之以语言，发之为文章，经师人师，备诸一身，以故来学之士，一受其熏陶，无不顿改旧时之宇宙观，如饮醇醪，受其影响。是以湖南之师范教育，至先生讲学高师时，乃与普通各科诸校有所区别。虽先生所采之英、德哲学诸书以作教材，多唯心派家言，然在湖南教育史中实别开一新纪元，不可忽视！

民国二年（1913年）先生兼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员，此校原为城南书院，清末改为中路师范学堂，民国初又改为第一师范学校。一师本是长沙当时极有朝气之教育机关，经先生讲学期间，更如轮船之有南针，不迷方向。民国三年某月，一师请先生讲演国事，先生示以“不死，求己，猛进，坚忍”八字。又阅学生陈昌日记载有数语云“不为我造就我，而为国家造就我；不为我

求学问，而为国家求学问。”先生批云：“颇有所见，故录之于此。《张子正蒙》言‘道能物身故大’，又言‘君子之一大也大于道’，正是此意”。又民国四年四月五日述毛泽东之履历云：“毛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以上均见《达化斋日记》）按：先生之举曾涤生为例，是民国初年历史家之眼光，若在今日，当然不应举也。先生之在湖南高等师范讲授伦理学时，有云：“余于伦理学讲义之内容，时时默想。余记其所想念者于此：劳动神圣，勤工俭学，物质救国，科学，民治主义，互助，自由，平等，博爱，……尊尊，亲亲，尊功，尚功。”（以上见民国三年《达化斋日记》）

按：先生在湖南讲授伦理学时，距俄国十月革命尚有5年，何以默想伦理学内容，首先即提“劳动神圣”“勤工俭学”八字？实为研究先生之学术思想者一个最大之问题。可见先生虽是一唯心派之学者，而于马克思学说，早有深刻之认识。盖以为中国之所以弱乱衰亡，非培植劳动勤俭之人民，终是不可救药。先知先觉，其言可谓能放诸四海而皆准。所以李锐作《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述毛泽东之言曰：“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有高尚道德性格的人，他很坚强地信仰他的伦理学，努力灌输一种做公正的、道德的、正义的，而有益于社会的人的志愿，给他的学生们。”又杨开智亦曾语余曰：“怀中先生居长沙时，毛泽东、蔡和森、陈昌、萧三等八个进步学生，常往其住宅问学。在北京时，邓中夏、萧三、张昆弟、陈绍休等进步学生亦常往其住宅问学。他们都说，愿做杨先生的仆人，得以时常亲近谈话，向他学习云云。”据此则先生之讲伦理学，其不仅是在书本讲义上指导青年，而是以高尚之人格示范青年，与共产主义之道德教育，不谋而合。杨开智又告余曰，怀中先生最器重赏识的学生是毛泽东、蔡和森，常告家人曰：“毛、蔡将来必然是中国的栋梁。”当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反对某些不合理的制度将被开除时，先生力保，曾写诗句于校中黑板上，以示自己的感慨如下：“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上参天。”可以想见一斑！

先生于1918年应北京之聘，是时主北大者实为蔡元培先生，海内进步人士方引领企望，期先生为中国哲学树一强固之基础，使东西学术思想冶为一炉，而成为中国独立之伦理学和教育学，不至偏于取材他国，而置我民族之特点，于寒灰槁木之中，毫不重视。故先生所著之《伦理学之根本问题》，于民

国七年（1918年）十一月，已在北京大学出版上卷，次年三月出版下卷共九万余字。《西洋伦理学史》于民国八年在北京大学出版，九年（1920年）九月在先生逝世后再版。全书共143 500字。可想见其价值之重要，为青年所欢迎。倘天假之年，从容著述，为益人民，曷可限量。余既编辑先生年谱之后，复为之传记如此。见闻狭陋，不足以表彰先生之潜德幽光于万一，望先生生前知好，或其亲炙弟子，有以教之为幸！

毛主席、杨开慧和我们一家

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首名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寄托了毛主席对她亲爱的夫人杨开慧烈士和亲密的战友柳直荀烈士的无限深情。

毛主席工作那样忙，操心中国革命和世界大事，可是，他对我这个昔日老友却寄以极大的关怀，使我十分感动。解放后，我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祝贺他领导中国人民扭转乾坤的胜利，并将我在白区二十多年的生活情况告诉了他。我是1950年1月17日写的信，主席3月15日从苏联访问回京，于4月18日及时给我回了信。信中说：“直荀牺牲，抚孤成立，艰苦备尝，极为佩慰”。并说我们是同辈人，不必客气，勉励我在工作之暇学习马列著作，还问候直荀的父亲柳午亭先生和我的父亲李肖聃先生。

事实上，毛主席对我们一家一直很关心。早在延安的时候，就向长沙去的同志打听我们母子的情况。进京以后，毛主席又叫他的秘书给我在国家计委燃料局工作的儿子晓昂打电话，问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有。1955年，我因生病半年没有教书。毛主席知道了，叫开慧的哥哥开智同志来看我，并安排我为湖南省文史馆馆员（兼秘书）。

1957年1月，毛主席18首诗词发表了，我爱不释手，不几天就读熟了。我想起，毛主席在和开慧交朋友的时候，填过一首《虞美人》词赠开慧，开慧当时告诉了我。词是这样写的：“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怎难明，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晓来百念皆灰烬，倦极身无恁。一勾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我就写信给毛主席，请他把送给开慧的词写给我，作为纪念，并且把我在1933年听说直荀牺牲，和泪填的《菩萨蛮》词一首，送请毛主席指正。词的内容是这样的：

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愁多少。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

1957年5月11日，毛主席给我回了信，说：“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罢。有《游仙》一首为赠。”毛主席接着在信中写了这首光辉的词作《蝶恋花》。我很高兴，那时我还在教书，给同学讲课时，我就把主席这首词讲给同学们听。有的同学又把这首词抄在笔记本上。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一位同学发现这首词后，就要求拿去发表。我说：“这是私人唱和，如果要公开发表，得经过主席同意才好。”这位同学就给主席写信请求公开发表。很快主席就回了信，同意发表，并改题为《赠李淑一》。其中转折我不知情。不久，这首词就在湖南师范学院院刊上发表了。接着，上海《文汇报》转载了这首词。很快，《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地报纸都转载了这首词，并传到了国外。我也因此收到国内外的许多来信。关于这首词的歌、舞、剧，也相继出现了。有人还写诗赠我道：“报国无庸泪湿纱，死生不计党为家。‘柳’枝虽折‘李’犹在，千古争歌蝶恋花。”以后，主席又把《赠李淑一》改为《答李淑一》，更切词意了。比如，我在抄给主席的《菩萨蛮》里写道：“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主席向我回答了征人的去处：“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我的《菩萨蛮》词的后两句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主席答我的是：“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我是在想念传闻中牺牲了的亲人，主席是答我烈士忠魂也因人民革命胜利而高兴落泪。主席的词写出了烈士的高尚革命气节和伟大革命精神，主席是了解他们的。

直荀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明磊落的一生，他不愧为毛泽东同志亲切关怀和直接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直荀早在中学时代就受到一些进步教师和革命者的爱国思想的影响，开始树立为改造黑暗的中国社会而献身的人生观。由于直荀的父亲柳午亭先生和杨怀中先生是留日同学，具有爱国热忱和极欲变革社会的共同理想，而且又有着“交情三世久，春色两家分”的亲密关系，所以1913年直荀进城上中学时，就寄居在长沙的“板仓杨寓”——杨怀中先生家中。当时，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等，时常到杨怀中先生家来，讨论治学、做人的道理，评述天下大事，探求改造中国的办法，使直荀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志在长沙成立新民学会，直荀虽不是正式会员，但却与之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经常参加新民学会组织的活动，走出课堂，奔走呼号，投身反帝爱国斗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了培养干部，1921年8月，毛泽东同志利用船山学社社址，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直荀虽在雅礼大学读书，仍千方百计地挤出

时间到自修大学学习，并和夏明翰、蒋先云、姜梦周等同志在一个小组。他努力学习，认真思考，积极发言，敢于争论。毛泽东和何叔衡同志经常到小组听他们讨论，看到直荀的迅速成长，他们都很满意。毛泽东同志曾用赞扬的口吻对开慧同志说："直荀很会分析问题，能说服人，思想进步确实很快。"何叔衡同志也曾亲切地拍着直荀的肩膀说："你这个伢子有出息，很聪明，是个有用的人才，还要继续努力。"遵照毛泽东、何叔衡等同志的指示，直荀在努力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自觉地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一面向他们虚心学习，一面宣传革命的新思想。他多次到工人运动开展得较好的安源矿区，实地了解工人生活、斗争的情况。他经常到长沙南门外天鹅塘一带找劳苦工农谈心，向他们宣传组织起来向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和封建势力作斗争的道理。他还和郭亮同志一起到铜官组织和发动工农。1924 年，直荀没有辜负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的期望，他以高度的政治热情，迎接大革命的到来。

直荀 1924 年夏天毕业于长沙雅礼大学，是湖南省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历任湖南各界救国十人团联合会总干事，湖南省学联评议部部长，湖南省政府委员，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

1927 年 3 月 29 日，直荀由长沙写了一封信给上海的弟弟柳瑟虎，谈到："上海此刻已到了国民革命军手里，不知道情形怎样，或者一切的事也和汉口的英租界一样较前腐败十倍，但这是国民最初管理政权必有的现象，望弟对此抱乐观的态度。国民政治能力是要从实际中训练得来，读了政治书而不来管理政治那种学问是靠不住的，在行动中去学习，在学习中去行动。近来农协事务颇忙，乡村中打倒土豪劣绅之运动，颇为激烈。我们现在是主张乡村中要建立以农民为中心的民主政治，想必不久即可实现。"

1927 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后到上海、天津、湖北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8 年任中央军委特派员，参加组织过渭华暴动。1929 年冬任中共长江局秘书长兼中共湖北省委书记。1930 年夏天到洪湖根据地，先后担任红六军政治委员、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三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鄂西北临时特委书记、中共鄂西北特委书记、湘鄂西省苏维埃财政部长等职。1932 年 9 月，被王明路线的代表诬陷为"改组派"杀害了。

直荀虽然牺牲了，他仍然受到同志式的纪念。谢觉哉同志 1945 年 1 月 9 日在日记中回忆："我认识直荀同志是在湖南省农民协会——高高的个子，夹一皮包，不多说话，任何事问他，都能给你满意回答。……大革命失败后，在汉口看到他，说是从南阳邓宝珊的部队里回来，在上海也看到过他。1932 年，又看到他在湘鄂西省当财政部长。办事扎实，态度诚恳，和以前一样。一天，忽不见了，初疑其因事出发，后知其被捕，被捕原因未及宣布，而苏区失败。

直荀同志及其他很多同志都从此不知下落。直荀同志受家庭教育及教会教育的熏陶很深，律己严，为人切，认识了共产党遂贡献一切于共产主义事业，其不会有任何反革命活动，是可以其品质保证的。"

为纪念直荀的蒙难，我于 1978 年写了一首七言长律：

"革命江山碧血诗，《曙光》启示耐寻思。
三军赤帜东风展，鱼米洪湖雨露滋。
横祸那知从内起，英雄蒙难入囹圄。
可怜江畔芦边骨，犹在亲人梦里驰。
延安明断昭青史，千古讴歌颂导师。"

以上就是毛主席词中的"柳"，——我亲爱的丈夫柳直荀的情况。接下来，我来说说"杨"。

我认识开慧同志是 1920 年，那是开慧的父亲杨怀中伯伯逝世后，北京大学的同事们将奠仪七百元寄到我家存转，不久开慧随杨伯母从北京护送她父亲的灵柩回长沙，陪她母亲来到我家，同我父亲肖聃老师商量为杨伯伯治丧和开慧入学事。我父亲建议开慧到福湘女中念书，说淑一也在那里，有个伴，可以互相照顾。我和开慧就这样相识了，很快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们一同进了进修班选读国文、英文、数学三门课程。开慧平日生活朴素，从不讲究梳妆打扮，洗完脸就用手在脸上擦擦。有一次，我问她这是干什么？她风趣地说，这是打自来粉。她不喜欢做礼拜，并经常向我宣传妇女解放、婚姻自主的道理。开慧还注重锻炼身体。1920 年冬天，寒假期间，她还到直荀的老家高桥方塘冲，向直荀的父亲柳午亭先生学习打拳锻炼身体。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负责湘区党的工作。这时开慧已和毛泽东结了婚，住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我还记得那年秋天，直荀邀我到清水塘去看望毛泽东和开慧，因天近黄昏，经过菜园时，我失足踏入了粪坑。当直荀扶着满脚粪泥的我走进毛泽东的茅屋时，直荀到毛泽东房里谈工作去了。开慧连忙给我打水，取出鞋袜让我洗换。那时她怀着岸英，行动不便，受了一番劳累。现在回忆起当年情景，还历历如在眼前，多么令人思念啊！

以后，开慧随毛泽东在上海、韶山、广州、武昌进行革命斗争，我就没有机会见到她了。直到 1927 年 3 月，马日事变前夕，她从武汉回到长沙。有一次，带着五岁的岸英到兴汉门外留芳岭来看我和直荀。当时，我们的儿子晓昂才三个月，她祝贺我们，并把晓昂抱在怀里，亲热地逗乐了一会儿。谁知道，这就是我和开慧的最后一次见面。

马日事变后，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开慧根据毛泽东的安排，带着三个儿子岸英、岸青、岸龙回到板仓，转入地下工作。1930年10月，开慧从板仓托一个农民送来一封信，要我替她买书和纸笔等物，信是写在一张折而皱的包过东西的纸上的，这说明她当时的处境是很艰苦的。正当我替她准备东西时，不幸的消息传来，开慧被反动派逮捕了。开慧被捕时，身边还带着孩子，当时，党组织和在长沙的朋友们都大力营救，柳午亭和李肖聃两位杨怀中先生的好友，也写信给何键希图作最后的努力，但万恶的刽子手何键终因无法使开慧屈服而杀害了她。开慧就义时，情景甚为壮烈。

1957年5月11日，毛主席在挥笔写下了那著名的词作《蝶恋花·答李淑一》的同时，还在信里要我在暑假或寒假到板仓代他看一看开慧的墓。遵照毛主席的意思，我和开慧的兄嫂杨开智、李崇德同志以及湖南省民政厅的同志一道，于7月10日祭扫了开慧烈士的墓。

在花木葱郁的开慧墓前，我们敬上鲜花和香果，含着热泪诵读祭文：

"……近接毛主席来讯，念君思君，作词悼君，嘱我暑假有暇，代他亲来板仓，奠扫君墓，获此良机，遂偿夙愿，今兹来奠，恩义双重，老友有灵，当能鉴察。"

祭奠完毕，我们观看了开慧的旧居，看了开慧和岸英、岸青童年时代的合影，望着开慧那英姿焕发的容貌，她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热泪模糊了我的双眼。开慧啊！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事后，我把祭扫的情况回信报告了毛主席。

解放后，我还曾多次去看望开慧烈士的母亲杨老夫人。我对杨伯妈说："开慧牺牲了，我就是你的女儿。"老人家对我就像亲女儿一样，每次我去，她都要像对孩子似的给我做点好吃的东西，有一次还给我做了一双布鞋。我问伯妈："你怎么知道我脚的大小?"她笑着说："是我心里想的!"1962年杨老夫人去世，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杨老夫人和开慧烈士合葬，灵柩被放在烈士陵园的正中。1969年，湖南省委把开慧烈士的故居建成烈士纪念馆，并重新修建了开慧烈士陵园。在苍松翠柏环抱中，安卧着开慧烈士的英灵，烈士墓前，高高矗立着镌有毛主席的光辉词篇《蝶恋花·答李淑一》的巨大纪念碑。这光芒四射的词篇，表达了对先烈最深切的怀念与颂扬，开慧烈士的伟大革命精神和崇高气节，与松柏长青，日月同辉。

1959年6月27日，毛主席在湖南长沙蓉园接见了开慧同志的哥哥杨开智、嫂嫂李崇德和我。下午三点钟，毛主席和我们见面了。我紧紧地握着毛主席的手，真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心情才好。只是说："毛主席呀！您送我的一首《蝶恋花》词，我连回信不赢!"毛主席把我介绍给在座的领导同志说："她

就是李淑一，开慧的好朋友，前年她把悼念直荀的词寄给我看，我就写了《蝶恋花》这首词和她，完全是照她的意思和的。"毛主席还亲切地问了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当我谈到我的孩子晓昂，下放到浏阳县农村劳动，向贫下中农学习时，毛主席很高兴，并鼓励我说："这很好，在北京，只有报章杂志看，我一年只有半把日子在北京，其余时间都在外面走动。"

毛主席接见了我们之后，还同我们照了相，又留下我们吃饭。席间，毛主席不断往我盘子里夹菜，同时不断向我提问题。

毛主席当时还对湖南省主席程潜说："你认得她吗？她叫李淑一，李肖聃先生的女儿，肖聃先生是我的老师。她的家爷柳午亭先生也是一个怪人，在旧社会不做官，打得一手好拳。"

6月，在长沙，已经是很热的天气了。招待人员怕毛主席热不过，就去开电扇。毛主席看见了，忙挥手阻止，风趣地说："唉唉，不要搞'集体主义'的。"他随手取出一把折扇，一面扇，一面说："还是搞'个人主义'的好。"

饭后，毛主席又和我们一同看了湘戏。散戏后，才一一和我们握手告别。

为了纪念这次难忘的接见，我写了一首《毛主席设宴省委蓉园喜赋》：

忆昔长沙识伟姿，重逢已是盛明时。
廿年事业惊环宇，四海人民仰导师。
话到忠魂弥恳挚，暖如朝日更温慈。
九霄杨柳春常在，附骥深惭蝶恋词。

在这次会见中，毛主席特别提起了四十多年前的往事和我的父亲李肖聃先生，直荀的父亲柳午亭先生，这更体现了毛主席不忘故旧的心情。

直荀的父亲柳午亭先生、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先生和我的父亲李肖聃先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前清末年，三人同到日本去留学，同餐共桌，差不多七八年。

肖聃先生于1911年结束留日生活回国。初在北京、湖南两地为各报馆担任撰述。1913年梁启超任司法总长，以先生为秘书，有时为梁公代笔，多收入《饮冰室文集》中。1916年返湘以后，一直任教于长沙，先后在湖南大学及专科学校讲授文学史，又兼任公私立中学国文教师。肖聃先生秉性刚正，不乐从政，生活清苦，以教书卖文为生。解放前，湖南省文献委员会成立，任《艺文志》编纂委员。解放后，毛主席在给我的信中，多次提到："肖聃先生前乞为致意。"

先父肖聃先生为国内著名学者，博通经史，学识深厚，工诗文，善联语，章士钊诵其文为"振来欲飞"。1916年肖聃先生从北京返长沙，前往拜访杨昌

济先生。时昌济先生任第一师范伦理教员，便中谈起学生中的奇士，昌济先生告之："有毛泽东、蔡和森等，均意志坚卓。非常人也。"经昌济先生介绍，毛泽东经常走谒肖聃先生，质询古书疑义，也送文章向肖聃先生请教、修改。所以毛主席在蓉园接见时称："肖聃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年轻时，也看到他到我家走访先父。

午亭先生留学八年，接受了一些新的体育思想，对体育锻炼特别重视。曾向拳王王润生先生学练"八拳"，进步很快。又以打败日本拳击家吉田道次而轰动扶桑。回国后，他坚持锻炼八拳、心炼拳、太极拳、八段锦等，早晨练拳是他一天生活中的第一课。除练拳外，他还坚持日本人提倡的冷水浴。在方塘冲老家，有一个近一人高的大木桶，木桶里盛满了水，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在桶里洗冷水澡。在长沙城里住时，和我父亲住在一起，住在顺星桥 24 号。虽然没有大木桶，每天早上用一个大而深的白色搪瓷面盆洗水擦身，一边擦，一边口中"噗噗"吐气，从不间断。他的洗冷水浴的习惯，也传给了子女，直荀也养成了冷水浴的习惯。

1916 年夏天，毛主席到了板仓杨昌济先生家里。杨先生同毛主席谈到，距板仓四十多里的高桥方塘冲住着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柳午亭先生，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回国后拒不到反动政府做官，而且还是一位体育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那时，体育运动是毛泽东悉心研究的问题之一。于是，第二天，毛泽东就到长沙东乡高桥方塘村柳午亭先生的家里，专为体育问题，访问了柳午亭先生。柳先生非常高兴地接待了他。毛泽东和午亭先生就体育问题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午亭先生介绍自己说，他以前是个"药罐子"，后来留学日本，认识到救国须要有健康的体魄，因而下决心坚持打拳，洗冷水澡，这样不仅使曾经得过肺病的身体强壮起来，还锻炼了毅力。毛泽东十分赞赏午亭先生在体育研究和实践上的造诣，曾对杨昌济先生说，柳先生在体育的研究和实践上，都有较高的造诣，许多地方值得效法。此后，毛泽东与午亭先生保持了比较密切的交往。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还要我代为向午亭先生致问候之意。

肖聃、午亭两先生不仅学识渊博，且深明大义，德行高洁，同情和支持革命。1935 年冬天，长沙一中学生响应"一二·九"学生运动，举行了"一二·二〇"示威游行，在庆祝被校方强行解散的学生会组织恢复的大会上，肖聃先生奋然命笔，写了一篇"一中"嵌字联："一以贯之，自强不息；中流砥柱，其命维新。"表达先生的爱国热忱和对进步学生运动的支持。1944 年冬，日寇侵略军到长沙西乡白箬铺李家湾新屋，强行让先生出任维持会职，被先生严词拒绝，日寇怒而对先生施以凌辱，而先生不改初衷。家人连夜将他解救送

往我工作的地点安化县桥头河省立第一师范，才幸免于难。

午亭先生早在日本时，即支持孙中山和黄兴的革命活动，并促成了孙中山和黄兴的会见与联合。李维汉同志赴法勤工俭学时，写信回乡给族人，要求经济支援，族人有异议。午亭先生跑到李家祠堂力主族人出钱支持，并指出，李维汉系你们李家的有望人才，不能吝惜这笔钱。最终李家族长同意了午亭先生的意见。大革命失败，他又协助杨立三兄弟俩逃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日寇侵华期间，长沙日军派高级军官到长沙东乡高桥方塘冲，动员午亭先生出来主持维持会，午亭先生冒死不屈，并以凛然大义，怒斥日酋。所幸该日军官亦系早稻田大学之后辈同学，听了午亭先生义正词严的答复，肃然起敬，诺诺而退。

解放后，毛主席对湖南省德高望重的老教育家十分关心，在接见程潜主席时，曾嘱其妥善照顾，因此湖南省军政委员会聘请包括李肖聃、柳午亭先生在内的一批老教育家为顾问，使他们得以安度晚年，发挥余热。

陈天倪生平及其著作

羊春秋

陈天倪先生（1879～1968年），名鼎忠，字星环，湖南益阳人。尝就学于岳麓书院，有声于时，因得上交吾湘鸿儒硕学王湘绮、王先谦、程颂万等。辛亥革命后，复殚研西学，举凡斯宾塞尔、赫胥黎、康德、卢梭诸先哲之译著，无不毕读。与同邑曾运乾，湘潭黎锦熙，长沙杨树达、杨昌济、李肖聃，宁乡刘宗向，浏阳刘善泽等知名学者，交往甚密，相与斟酌新知，切磋旧学，济济多士，使吾湘学术为之大振。民国元年，与李抱一、曾运乾、黎锦熙同主《湖南公报》笔政，每论一事，必详稽中西学说，提出独到见解，并以文笔闳肆，才思横溢，蜚声于新闻界、学术界。继任湖南官书局编撰，认为建国首要，莫先于启发民智，宣扬民治，因著《治法》一书，陈时政之失，述治国之道。适章炳麟先生应邀来湘主考县知事，陪同者以先生所著之《治法》进，章先生击节叹赏，许为“伸张公理”之煌煌巨著。章士钊又在《甲寅杂志》上，为文盛誉此书。由于二章之推挽，先生之名益噪，武昌师范大学校长石瑛、东北大学校长王永江，争相罗致。先生因推介曾运乾先生前往东北大学教授文字音韵之学，于1926年8月联袂北上，振铎于白山黑水之间。1929年，受湖南大学之聘，出任中文系之主任。经先生掌画草创，顿具规模，为湖南广播读书种子，使楚材于斯更盛。1934年应中山大学之聘出任文科研究所主任。经先生筹划，扩充研究生名额，创办《文史学报》，一时成绩卓著，蜚声士林。晚年执教于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周易概要》及《中国文学史》。予得厕身其间，亲聆教益。所编讲义，文笔极美，见解独到，体大思精，自成一家之言，同学爱之重之，虽因故缺席，亦必设法补齐讲义。予卒业后，曾将先生所编之讲义，什袭以藏之，不意在十年浩劫中，被“文化革命”之闯将洗劫而去，广陵散从此绝矣。先生主讲各大学，北及辽沈，南至百粤，东抵吴越。湖南大学著名教授刘泽善先生曾誉以诗云：“论交壮岁各消闲，二十年来鬓未斑。讲席东南都历遍，知君名已落人间。”既是推崇，又是写实，不愧是先生的知交。

先生著述宏富，但以不朽盛事，名山事业，不欲草草杀青，致使未刊诸

稿，一毁于长沙“文夕大火”，继毁于亘古未有之十年浩劫。今所辑存者，大抵皆先生已刊之著作及论文，分别从湖南大学、中山大学、无锡国专及省内外其他图书馆复印而来，全稿不及60万字，真所谓“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耳。忆先生之手稿被毁后，始则蹙额不欢，忧心如捣，继则乐天知命，淡然置之。尝谓：“斯世而有天倪，固已妄矣；天倪而欲存其名字，是重妄也。”因为诗以自解云：“本来一皂同牛骥，底事穷年泣凤麟？”“和以天倪谁识得，六儒三佛一分庄。”于此可以窥知先生之胸襟与修养矣。先生幼而岐嶷，长而勤奋，兀兀穷年，手不停披于六艺百家之言。自为诸生时，惩经说之不齐，而作《诂谳》，主笔报社时，究治道之有绪，而作《瓠言》，洋洋20余万言，虽系少作，即耆硕宿儒见之，亦为之缩手汗颜，惜皆亡佚，意其不化为朽壤，而为金玉之精。计其已刊行之主要著作有：（一）《治法》：深得余杭章太炎、长沙章行严两先生之称誉，长沙吴雁舟为之序，同益印务馆发行。（二）《六艺后论》：凡24篇，述经学之历史。因郑康成有《六艺论》，书亡，故名《后论》，盖申郑也。北流陈柱尊为之序，南京钟山书局发行。1948年商务印书馆拟更名为《经学概论》，作为大学教材，以时局丕变，建国伊始未果。（三）《通史叙例》：系与曾运乾教授合著，丹徒柳诒徵为之序，南京钟山书局发行。金毓黻在其所著《中国史学》中略云：“近人有志作通史者，又有益阳陈鼎忠、曾运乾二氏。据其叙例所论，则有卓卓可称者。果如二氏所论，改传之纪事一体，诚足以革新史体，以合近代以史为纲之法，又与章太炎先生之别立十记，以详历代大事，同一旨趣者也。”柳诒徵在书序中亦云：“通综古、断代、纪事三体，宏识渊怀，刘子玄所不逮也。”可见此书在当时之影响及其学术价值。（四）《周易概要》：系《群经概要》之一的组成部分。乃各经之纲领，按经分编，以考订为主。中山大学印行。（五）《孝经概要》：亦为中山大学印行。（六）《孟子概要》：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印行。此外，尚有先生晚年与湘阴彭昺教授合撰之《经文统抄》，以寄存于湖南图书馆，得以幸存。本书分为3编，都有20余万字。上编立前纪、虞书、夏书、商书、周书五目；中编以《春秋左传》为主，于《国语》及《公羊》、《谷梁》二传，择其叙事不悖于传，而其义不违于经者录之，又别为《读左十问》，列于卷首；下编首列《孝经》，次为《礼运》、《乐记》，又次为《儒行》、《学记》、《经解》、《檀弓》。又因经文间有讹误，注家尤多漏失，先儒笺注失当，近儒言而未详者，依亭林《日知录》之例，稍加厘订，名为《别录》，列于附编。至于未及刊行而原稿毁于十年浩劫者，计有《尚书概要》、《春秋概要》、《礼记概要》、《论语概要》，以上均为《群经概要》之组成部分。还有《六艺论衡》，此书综括群经，剖析疑义，《概要》多采旧说，而此则议论为主。《六艺微言》，以宋、明陋儒离经言理，谈空说玄，因为

荒谬，而清儒专注意虫鱼考订，遗弃心性，亦失于偏，因采六经精义，辅以宋儒名理，为书10篇，每篇皆分上下，约六经之旨，而行以《文中子》、《中说》之文以及《诸子引经考》等10余种，都百余万言。侧闻先生尝以函示其哲嗣曰："余死后，可将三书（指《六艺后论》、《六艺论衡》、《六艺微言》）汇编成册，统名《六艺通论》，皆传士林，吾无恨矣。"噫！孰知后二书竟毁于十年浩劫，使其不朽之文章，亦不能全部悬日月而照后世！

先生之大部分著述，虽毁于长沙大火，毁于十年浩劫，今所辑存者，别为四类，即（一）《六艺后论》；（二）《群经概要》，含《周易概要》、《孝经概要》、《孟子概要》，存目为《尚书概要》、《春秋概要》、《礼记概要》、《论语概要》；《三）《学术论丛》，含《诗经别论》、《诗论》、《通史叙例》；（四）诗文烬余。统名之曰《尊闻室剩稿辑存》。"尊闻室"者，先生之斋名也。先生待人接物，不见圭角；而发为文章桀骜不羁。故黄季刚（侃）称先生"博闻强记，文出入汉魏，诗在唐宋之间。"陈石遗（衍）赠以诗云："三百年来谁抗手，亭林经术牧斋诗。"张舜徽于《湘贤亲炙录》中，收余嘉锡、曾星笠、杨遇夫、谭戒甫、刘善泽等20人，而独对先生服膺备至云："舜徽所见湖湘诸老辈，以才气论，要推先生为最卓，诗文并美，逸气横溢，而典丽实贯于一时，特以不自表襮，世人知之者稀耳。"龚浩自美撰文志其墓曰："挺衡岳之英秀，放文德之辉光，南雍一老，冠冕宫墙。"是先生生已腾誉于时，死更蜚声于后。先生同乎万物，生死者，暂聚之形；而卓然不朽者，一代之文。虽迭遭天忌，泰半亡佚，而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忆章士钊先生

陈云章

一、初识章先生

章先生是我的父执，要谈我和他的关系，首先得介绍我父亲天倪先生和他的关系。我父亲原是长沙中等学校的国文教员，1924年间，他有感于军阀混战不息，政治腐败不堪，究其原因，是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乃著《治法》一书，论述治国之道。书名就是请章先生题写的。章先生在他主办的《甲寅杂志》上写文介绍，备极推许，末有"陈君何时北来，以慰饥渴"之语。先君一介寒儒，得先生揄扬，声名顿起。就在这年，章太炎先生应湖南省长赵恒惕之邀，来湘主持县长考试，王季范先生任招待。王以先君所著《治法》进，太炎先生击节赞赏，誉为"今之伸张公理"之作。东北大学校长王永江、武昌师范大学校长石瑛，因见二章对先君如此推崇，争相延聘，月薪均定为大洋三百元。当时国内各大学因经费困难，多以八折发给薪金，且时有拖欠，武昌师大亦如此，但东北大学例外。先君即应东北大学之聘。随后不久，章士钊先生亦到该大学任教。张作霖创办东北大学之初，不惜巨金，延聘人才. 所以当时各大家名教授如国学家黄侃、林损，数学家秦汾（或系徐善祥）、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音夫妇等，均前往任教。该校对教授薪给，并无定准，因人而异。例如秦汾八百元，其他五百、四百不等。章先生月薪最高，为大洋一千元。先君贺章先生八十诞辰诗："斗室能形八极风，寥寥四海一孤桐"（先生别号孤桐），这是就先生政治及学术影响而言的。先生对辛亥革命所起的作用，更是如此。

1939年，我在重庆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土木系教书时，奉父命往谒先生，貌极和易，温语良久。临别时，我笑谓先生，往慑于老伯老虎总长威名，颇有畏见之感，今尽释矣。缘因先生主办之《甲寅杂志》，以虎象为封面，而先生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时，颇能革除陋习，不受干谒，办事公严，时人遂以"老虎总长"称之。是次相晤，为余洪先生之始。随后，余受任湖南省立第九职业学校校长，即离渝回湘矣。

二、谈毛泽东

抗战胜利后，我因中原公司业务关系，经常去上海，每去必谒先生长谈。当时国共两党和谈情况，日趋暗淡，对国家前途，心忧如焚。有一次谈到了毛泽东，章先生告诉我："毛泽东的思想深受杨怀中先生的影响。杨是理学家，崇拜胡林翼。胡是研究宋明理学的。"又谓："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有一次在给杨先生的信上署名毛学任，杨问：'这是什么意思?'毛答：'学学梁任公'。杨随即送毛一部《胡文忠公全集》，要他学习胡林翼。毛反复阅读后，改字学润（胡字润芝）。杨说：'司马长卿崇蔺相如，改名相如。你既尊敬胡林翼，就改字润芝好了'。"毛润芝这名字就是这样来的。毛阅读过的这部全集，后据周世钊告诉我，原书仍收藏在第一师范，几乎每一页都有毛的亲笔批注。

章先生又曾对我讲过当年毛到重庆参加和谈时，他和覃振宴请毛的情景。覃拉住毛的手，老泪纵横地说："润芝，北伐战争、抗日战争，都是湖南人拼命。可是现在没一个在中央当部长，在外地当省主席的。连湖南的省主席自从何键下台后，也一直是外省人充任，受人宰割。全靠你替湖南人出这口气。现在湖南正遭受严重水灾，赵恒惕（当时是湖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来重庆请求赈济，毫无结果，就是没有一个有实力的湖南人向蒋说话。"毛听后，很感动，问赵仍在重庆否?他的意思是想见见赵，以了解湖南灾情的实际情况。后来赵的请赈报告，就是通过毛转给蒋的。蒋当即批发稻米20万石，法币若干万元，救济灾民。足见毛当时是很关心家乡情况的。更奇怪的是，当年赵任湖南省长时，曾有意杀害毛，而毛不念旧恶，竟愿见见他。在当时政治气氛下，赵自不便去见毛。据唐生智对我讲：以他本人和毛的关系，而毛住在张治中家里，虽距他的住处不到百米，他也不敢去见毛。所以，在当时，能以私人身份宴请毛的，至少就湖南来讲，除开章先生外，就只有覃振了。这不独因为覃对毛一贯器重，毛在广州任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时，覃任部长，私交甚厚；更重要的是，覃是国民党元老，司法院副院长，性格刚正，无所顾忌。章先生向我谈及有关毛的这些往事，使我疑虑尽释，对毛顿生敬佩之心。我在抗战胜利后从事和平民主运动，尤其是往后在中国共产党解放大军横渡长江后，我为促使湖南在这次战争中免受战祸，争取和平过渡，终至接受友人的介绍，与中共地下组织通力合作，进行掩护和经济支援等活动，章先生的谈话对我的思想转变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在1949年1月8日领衔以湖南省工业会、省商业联合会、省总工会、省农会、长沙市商会、长沙市总工会六团体为呼吁和平，发给毛泽东的电文中所说的："厌恶战争，求取和平，此为人民在完成抗日大业后之一

致愿望。窃念先生一介书生，崛起湖湘之间，数十年奋斗所追求之目标，要不外救民救国。以先生学养之深沉，爱惜民命之殷切，决不至河汉斯言。本会等决竭尽智慧，为先生和平决策之后盾。"在这里说的"以先生学养之深沉"，就是根据曾经听到章先生讲过的毛反复阅读《胡文忠公全集》而发的。至于电文中"本会等决竭尽智慧，为先生和平决策之后盾"，为实现这诺言，我不但受尽国民党的"舆论围剿"，而且几次几遭杀身之祸。事后看来，这电文的内容认识尚属肤浅，但我当时确实是把它当做真理，不顾生死，且身体力行的。

三、推选章先生任湖南省通志馆馆长

1948年初，马歇尔回国，和谈破裂，国民政府在其权力所能到达的地区，成立各级"戡乱委员会"，烽火弥天，全国人民在抗战胜利后梦寐以求的建设团结、和平、自由新中国的愿望，到此尽成泡影，中心忧伤、惶惶不安。不过我那时仍然认为，如果国民政府真是到了连南京也将难保的时候，美国必将介入，和谈必将成功。当时我也确没料到共产党真能以武力统一中国。我的一贯愿望只是希望由各政党以民主方式组成联合政府，双方都把武力交出来，建立国防军，成立无武力的政党，建设富强康乐的国家，以慰全国人民喁喁之望，以慰自辛亥革命以来，尤其是八年抗日战争中，死难的千千万万仁人义士在天之灵。因此我当时的想法是：湖南地处长江以南，距离战区较远，只要湖南享有盛名的高层人物团结一致，支持程潜领导的政府，一方面与南京政府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即半独立状态，一方面与共产党靠拢，停止征兵征粮，以表示不介入内战。这样，不仅可使湖南免遭战祸之苦，且可推动国共和谈。为此，我于1948年8月间去上海前夕，把这些想法与程潜商谈，并具体建议由我说服赵恒惕辞去参议会议长，请唐生智接充，将仇鳌领导的湖南省文献委员会改名为湖南省通志馆，由章士钊当馆长。我说：唐、章出来，不但显示出湖南人民的大团结，抬高了湖南人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可使湖南在动荡的大局中起安定作用。我并对程说：自卫方面由唐负责，以唐的声望，必可把湖南的民间武力统一起来，形成一股较大的军事力量，保境安民；政治方面由章负责，以章先生的声望，在国内外均可发生较大的影响，通过章先生与毛泽东之间的私人关系，一定可争得共产党的同情与合作的。他对我的答复是：赵去唐来，我没意见，章先生回来，我是欢迎的，只是要参议会通过设立通志馆，则要由我去进行。我随即把这个计划和几位有影响的省参议员商量，都极表同意。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先生并希望章先生能在湖大讲学一年。我到达上海见到章先生，详细讲了这些情况，他甚表赞成。就在这次谈话后几天，章先生对香港大公报发表"论泛湖南主义"的谈话。他对我说：我当然不能长住长沙，他可以在湖

南大学作十次学术讲演。我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在这期间，唐生智也由东安来了。果不出章先生所料，这两个构想——章先生任湖南省通志馆馆长，唐生智任湖南省参议会议长，都落空了。关于唐生智任议长是怎样落空的？我在《湖南和平运动亲历记》里，已详细讲过，这里就不提了，现在只讲通志馆的事。程潜在大公报上看到章先生"论泛湖南主义"的谈话后，特派萧作霖持他的亲笔信去见章先生，大意是说章先生这类谈话，对湖南人很不利。信中就根本没提到通志馆的事，显然是拒绝他回来了。章先生后来和我谈到这事时，仍很气愤，认为程潜不应该干涉他的谈话。当时，适有程的日本士官学校同学唐星在场，唐说："我和程颂云同学同事多年，再没有比我对他更了解的。他怎容得住行严（章号行严）先生呢？"我由沪返长后，即以上述情况，对新闻界发表公开谈话，还准备在人民团体及省参议会开会时提出，后因邓介松竭力劝阻，加上局势急转直下，就没有做了。

这里我只谈在1918年年底前后我所接触过的有关章先生的两件事。一件在1948年12月初我由南京去沪出席全国工业总会常务理事会议时，正值淮海战役胜负已分，南京局势紧急，下关车站及轮船码头人山人海，抗战时期的逃亡情景，重现眼前。陶桂山（馥记营造厂总经理）是和我同车到上海的，他在会上说："抗战八年受尽流亡之苦，那是为国仇，死也心甘。现在又要为内战而流亡，死不心甘。一生辛苦经营的事业，抗战时全损失了。现在刚把馥记大楼建成，眼看又将化为乌有。"他边讲边哭，大家都因此饮泣，因而作出呼吁和平的决定。此是蒋发布"勘乱建国"的动员令后，第一个公开呼吁和平的呼声。会后，杜月笙问我见过章先生没有？章先生对时局的看法如何？并表示他会去看望章先生。次日我将总工会情况及杜的话告诉章先生，并说："我在京沪车上与刘成禺先生同一个车厢。刘说：'大乱居乡，小乱居城。日本鬼子来了，可到日本鬼子没到的地方躲藏。共产党来了，就无处藏身了'。言下不胜忧愤之至。"我问章先生："到底如何是好？"章说："刘禹老是一个很容易动感情的人，……现在共产党是要同国民党争天下，而且是胜利者，争天下就得争人心，他们难道不知在八年抗战中，受尽苦难的中国人民迫切地需要休养生息吗？"章先生的这些话，深入我心。往后我在公开或私下谈话中反复引述，还在报纸上宣扬过。这对于害"恐共病"者是起了些安抚作用的。当他和颜福庆接受上海工商界等团体之托，前往石家庄会晤毛泽东后，曾有信给我，因原信被抄（他先后给我的十来封信和我所藏文物，在"文革"中全被抄走，后转交湖南图书馆，掣有收据。多年来虽经湖南落实政策部门及全国政协无数次责成该馆退还，而该馆经管人称已经遗失，终未交还。），无法引述原文。信中提到毛给他讲的打麻将牌的比喻，大意是说蒋爱打"清一色"，毛自谓打个"平和"

就算了。章先生因此断言，只要蒋有诚意和谈，和谈仍是有成功希望的。第二件事是，当1948年12月孙科接任行政院院长时，友人左恭来信，说是孙想邀请章先生出任政务委员，他代表孙征求章先生意见，章颇表同意。左要我去信促成。我接到这信时，正是蒋宣布下野的当天，南京局势危如累卵。我当即致电章先生："接胥之（左字胥之）信，嘱促驾。晚劝丈危阁勿入，已以此复胥之。"章先生当即复电："遵嘱，甚谢。"从此，直到1953年我到北京中央水利部工作时，才再度见到章先生。

四、章先生对陈明仁思想的影响

陈明仁于四平街之战大败林彪后，不但未受赏，反为陈诚压抑撤职，愤激不平。白崇禧乘机重用他，先委为"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旋改兼第一兵团司令，移驻长沙。陈对白不胜知己图报之感，白更以心腹待之。程、白之间，原有宿怨，往年程曾被李、白关押于武汉，当李宗仁、孙科争选副总统席位时，程又奉蒋命支持孙科。旧恨新仇，李、白必欲去之。程当时虽以长沙绥靖公署主任（辖湖南、江西两省）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但他在军事、政治上都毫无自己的基础，蒋是在已经迫使他放弃竞选副总统之后，才给他这个职位的。"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都只是凭一纸文书而已。当时湖南地盘，正在白崇禧的"华中剿总"掌握之中，白深知排挤程潜，蒋必不会袒程，所以他要陈明仁移驻长沙，即是蓄意取代程潜的。1949年5月17日，白终于给程潜一个手条，大意是奉代总统李电谕，湖南省政府程潜主席调考试院代理院长，遗缺由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兼代。程在接到这手条后，即找唐伯球和我协商对策。当时程对我们讲，如果陈明仁当上湖南省主席，不但和平过渡搞不成，你们的生命也没保障。那时，不但他把陈明仁看作是白崇禧的亲信，反共的猛将，顾忌很大，我们也是这样想的，从而决定发动湖南省参议会、湖南省市工农商六团体、湖南官绅及湖南青年将领电代总统李宗仁表示坚决挽留程。李迫于形势，终于收回成命。这件事使我考虑到：要使湖南在这次内战中免于战祸，不通过陈明仁是决不可能的。以后与陈经过几次密谈，陈表示，他从黄埔毕业后，这是第一次回湖南工作。长沙在抗战时期经受过四战一火（指四次长沙会战及1938年文夕大火），损失太大，元气未复，要是他在武汉，就一定把武汉当四平街。从这些话，可见他的思想倾向是很明显的。往后我和他交谈的内容，就是以他这思想倾向为基础的。不过他总认为，搞和平，是对国民政府、对国民党、对蒋介石的背叛，他更不能忘怀白崇禧对他的深情厚意。5月底前后的一天中午，陈给我来电话，要我即刻前往一谈。见面后，他第一句话就问："报上刊登的钱江潮那篇《武汉归来》，你看过没有？"旋又

问："钱江潮在各处讲演，宣传赤化恐怖，你去听过没有?"我说；"他的讲演我没去听，他的文章我也没看过，我想他无非是宣传对共产党的恐怖而已，其实你对共产党的了解远比我多，你同他们是打过硬仗的，我连共产党的面也没有见过。不过，我虽不了解共产党那边的真实情况，但从和谈代表团团员的行动来看，不但了解共产党的作风，也了解国民党的前途。如果共产党真是如钱江潮所宣传的那样，为什么和谈代表团到北平以后，没有一个南返的呢?到底国共两党谁对谁不对，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了。"我看出陈当时最大的顾虑，似乎是道义上难以割断同蒋介石、白崇禧和国民党的关系，就针对他的这种顾虑，以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的几位先生同他对比，企图以此来打消他的顾虑。我讲了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刘斐，说他们如何如何。着重是讲章士钊；"章先生不但深通历史，而且他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人物，抗战时期没有被日寇拖下水，国人很推崇他的大节。他今天认为这样做无损于大节，对得起千秋万代。怎么章先生能做的事，你反而不能做呢?"我讲到这里，他一跃而起，说："好！你说的有道理，章先生能做的事，我也能做！不过，我要声明一句，这件事只你我两人知道，要是传出去了，白崇禧会要我的头，我也会要你的头。"

1954年陈明仁到京出席一届人大，其时，我在中央水利部工程局工作，他特托贺贵严约我前往一晤。在谈到这类往事时，他说："我没有同章先生深谈过，我们一道去看他。"他问我要不要带礼物，我指着桌上的加利克烟，他把仅存的五罐全带了。在他和章先生谈及当年受其影响时，章连说："想不到我对湖南能起这么大的作用。"章先生即席写了一首诗送给他，记得诗的最后一句是"流到磻溪挂蒋牙"。不知此条幅仍在否?

五、北京重晤

自1949年底在沪分别章先生后，一直到1953年我到中央水利部工作时，才又在北京重逢。那时，他住在东四八条朱启钤家，看门的老工友高翁乍见到我，惊喜之情，溢于颜色，因为我在1951年被关进牢房时，外面传言说我被杀害了（这主要由于1951年长沙市公安局局长王丕敏的违法乱纪，他把旧时一些在长沙颇有财名的"资本家"拘捕，敲诈勒索。王于1952年被正法)。见到章先生后，谈些别后往事，不胜慨叹。朱启钤是袁世凯"筹安会"的主要分子，为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张学铭的岳父)，马君武诗中的"赵四风流朱五狂"，这"朱五"就是他的五小组。他的客厅颇大，四壁图书。这一次章先生就是在这间客厅接见我的。但我看到他吸的香烟．竟是北京一般市民吸的"恒大牌"，惊问："您老怎么抽这种烟?"章先生笑向我说："我现在的薪水比不上过去的司书、录事，怎不抽这种烟!"此后，我在北京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每

个月总得去谒见一两次，大都是在他卧室内用屏风隔开的那间小书房里谈话的。兹将几件颇堪回忆的事，记述于次：

1. 劝他莫学俄语

章先生曾告诉我，他利用收音机艰苦学习俄语情况，并出示他正在翻译的用毛笔写的普希金传。我很不以为然地对他说："现在年纪比较大的人学俄文，都是为着学以致用。像我这个搞土木工程的，在'一边倒'的形势下，一切工程规范都是以俄为师，不速成学俄语，就没办法做事。以您老的硕学耆年，不但是当代的国学大师，又精通英国文学，目前又不是为着糊口的需要，何能尽弃所学而学俄语?"他说："普希金真了不起，可说没有普希金，就没有俄国文学。"我接着讲："普希金的伟大，您难道是学习俄文后才知道的吗?您老一生，大概从没度过这样清闲的日子。我希望您趁此把一生的经历写下来，传之后世，这对未来历史家的贡献是很大的，千万别把这宝贵的时间耗费在学俄文方面。"他虽并未就此作正面回答，但从他表情上看，似乎感慨很深似的认同我这意见。不管怎样，他往后再没同我谈过学俄语的事了。

2. 写文史资料

1960年，周恩来在招待全国政协年满60以上委员的茶话会上，号召写文史资料，随后就邀集北洋政府时代大官僚汤芗铭等来北京撰写。章先生对此很高兴，认为周总理此举将对中国近代史史料整理产生极大的影响，功不可灭。他为此写得极勤，并请章太炎先生的侄女住在他家帮助他抄写整理，因而留下了若干篇重要史料。我想这类稿费收人，对他当时的生活费用也是有所帮助的。文史资料委员会给他的稿酬不管是发表或留作内部资料不予公开发表的，都是最高的。不过，这中间他也得罪了一些人，比如他写的有关康有为的某一段史料，康的大女儿同璧阅后就很不高兴，曾对我发过牢骚，并针对章文内容为文申辩，也发表在文史资料上。章先生要我转告她，说他和她父亲的私交，一贯很好，但写历史就只能从事实出发。"笔则笔"，不能阿其所好。这段历史他不写，知情的人也会写的。事有凑巧，在人大、政协开会期间，章先生很少在宾馆就餐，有一次我获知次日中午有熊掌吃，是黑龙江省政府供给的，在那要逢年过节才能分配几两肉的艰难岁月里，煞是难得，我欣然去邀章先生。聚餐时，适与康同璧先生同席。餐后，两位老人在我房间里就此交谈，嫌疑冰释，欣然握别。

有一次我和章先生谈到文史资料内容，我说："有关北洋政府时代及抗战以前的史料，大都真实性很强，尤其是关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

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史料，更为珍贵。但一写到抗战时期，尤其是写到解放前夕有关作者个人的政治活动，一些笔者总是把自己描绘成一贯拥护共产党，他的一切政治活动都是为共产党而活动，都是为追随共产党而反蒋，这类文章，不但缺乏真实性，无任何史料意义，而且会给未来的历史学家造成错觉，给他们在鉴别史料真伪上添加烦扰。我认为，不能写真的，就不要写假的，所以文史资料委员会几次向我约稿，我一个字也不写。眼看有些人写的回忆文中某些不合事实的部分，我也从不去函更正”。章先生说：“前代的历史应该是后代人写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断至五代。太史公写‘今上本纪’，那是在他个人特殊条件下写的，不足为训。因此我也只是写些在30年代以前亲身经历过的旧事，并且绝不写为自己辩解的事，这些就留待历史家去写。”

3. 拒看《甲寅杂志》

有一次我在东安市场旧书店里，看到了一大叠《甲寅杂志》，据店主告诉我，这是一位收藏者寄卖的，从创刊至结束，一本也不缺。我很高兴地走告章先生，表示我要买下送给他。他说：“我不但不看这些东西，想也不愿想它，都全过时了！一无是处。”我听后诧异之至，问：“您老怎么能这样看待自己的文章事业呢？当然，从《甲寅杂志》的政论观点讲，早就过时了，但从文章角度讲，那是千古不磨的。至于政论观点过时，太炎先生岂不更过时？而又有谁敢否定太炎先生的学问文章呢？贾谊的《过秦论》，韩愈的《谏迎佛骨表》，苏东坡的《万言献策》，其观点不都是过时了吗？但从古迄今，哪一个读中国书的人，不读这些文章？”讲到这里，我亲眼看到章先生眼含泪珠对我说：“若干年来，我才听到你给我讲这些话，真是增加了我的勇气。但《甲寅杂志》你不要给我买，我上海家里还有，这里也放不下。”

后来，我和北京图书馆馆长左恭谈起这段话，他告诉我：“章先生到北京后，处境很不顺，政治压力也很大，这些都是为着他与鲁迅之间的事造成的。一般不了解当年真实情况的人，都把他当做‘三一八’惨案的刽子手，我们党内有些领导同志也是如此，所以都不敢亲近他，我也是如此，怕惹麻烦。”坐在旁边的一位文化部某局长插话：“整天围绕在章老身边的，不是遗老，就是遗少，还是少去的好。”写到这里，我顺便提一下左恭，他是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孙科系统的人，却是个老共产党员，一贯利用他与孙科的关系，替共产党做工作。他是通过我在上海认识章先生的。1949年初孙科出任行政院长时，就是他代表孙科邀请章先生任政务委员的，被章先生谢绝了。这时，我对左恭讲：“行老不但居室狭隘，出无车，而且生活费用也很困难。但上海的家里，藏书极富，尤其是英文书籍。行老曾告诉我，有很多书在英国也是绝版。我建

议北京图书馆全给买下来。”左是读书人，对章先生甚敬重，我当即陪他去见章先生，谈到收购藏书时，章欣然同意。但终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章先生的夫人吴弱男女士早已去世，不知章先生的藏书是否存在？深为怅然！

4. 想出使英国

我到北京后，李烛尘先生夫人郁素云老太太就要我莫同烛老讲外面不好的事，莫谈政治。我认为她这话极有哲理，以此我对任何前辈先生谈话时，恪守李老夫人这一教导，正如陶渊明所讲的，“抗言谈在昔”。对章先生更是如此。但仅有一次例外，这也是章先生自己谈到“一边倒”外交时谈起的。他虽未批评这外交方针有何不当，但他深以闭关自守，四面树敌为忧。他当时认为同美国的关系已是无可调和的了，但必须争取同英国友善，倘能如此，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必将改观。他为此给毛写了一信，表示他在英国有很多旧亲，英国朝野对他也有好感，他愿意前往游说。言下他以为毛泽东会接受他这建议，并甚有信心。那时正值反胡风运动如火如荼，举国惶惶，知识分子屏息静气的时候，而他竟有如此想法，我真是无言以对了。我曾把他这遐想，告诉吴则虞。则虞说：“章行老真可说是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六、他不是“三一八惨案”的刽子手，也从不认识鲁迅

解放以后，鲁迅的地位上升到了顶点，凡是鲁迅骂过或批评过的人，大都先后成了人民的敌人。所谓“四条汉子”，更无论矣。真是一字定褒贬。但奇怪的是，鲁迅肯定过的好人，也有变成敌人了的。这中间以萧军、胡风为最突出。章先生是被鲁迅骂得最早，骂得最凶的，并被指斥为“三一八惨案”的刽子手，是一只应该穷追猛打的“落水狗”，这就给章先生的“反动罪行”定下了铁案了，谁还敢讲半句公道话。毛泽东基于他同章先生的特殊关系，对章先生的确很友好，而且始终如一。

章先生究竟与“三一八惨案”有什么关系，以及鲁迅为什么要这样痛骂章先生？毛都很清楚，但如不在一定的场合里予以澄清，毛也不好说，无法相助。为此，据章先生告诉我：毛特邀请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七八位高层领导便餐，请章先生参加，并请章即席说明他与“三一八惨案”的关系及与鲁迅之间的关系。章先生将真相讲过以后，毛当即要周恩来总理转告许广平，尊重事实，别再乱讲了。从此，章先生的处境确较顺利多了，旋被推选为人大常委，这样就“出有车”了。开会期间，章先生风趣地告诉我，他被推上主席台了，颇呈舒畅之态。

至于章与鲁迅之间的裂痕是怎样发生的？就我所闻，章先生出任教育总长

时，鉴于教育部冗员甚多，挂名不到差，拿钱不做事，各有来历，历届总长无可如何。章到部后，决意整顿，将这类人员全部裁汰。鲁迅是北大讲师，在教育部挂个签事名义，月薪三百余大洋，也在被裁之列。据章先生告诉我：这类具体人事上的事，都是秘书长刘百昭决定的，他很少过问，当时他也不知道鲁迅其人。

关于"三一八惨案"，我综合章先生告诉我的，包括他在毛便宴上所讲的，以及亲知其事的几位朋友所介绍的，简述如下：当惨案发生时，章先生在天津。惨案前三个月就辞去了教育总长，他那时是执政府秘书长，国务院总理是贾德耀。惨案发生的当天，《世界晚报》登载一条消息，说惨案的主谋是章士钊。《世界晚报》对章有宿怨，因章任司法总长时，段祺瑞之子某曾与《世界晚报》构讼，段子胜诉，《世界晚报》认为系出自章的偏袒，曾著文攻击。章认为《世界晚报》说他为惨案主谋，显系蓄意报复，愤不可遏。次日即在各大报刊登启事，指责《世界晚报》凭空捏造，意存煽动，有干法纪，将提起诉讼。本来，报纸报导消息，误于传闻，这是常事，无足介意。而章先生竟小题大作，自惹是非。《世界晚报》遂登长文反击。加上章先生在教育总长任内，推行复古教育，尤其是为北师大学潮事，结怨正多，因而遭致各方群起攻击，酿成轩然大波。假使章当时稍为沉住一点气，等到国务院总理贾德耀及全体阁员为惨案引咎辞职，谁为之？孰致之？真相大白以后，《世界晚报》这类出自传闻的消息，就自然消释了。倘"惨案"真出自章的主谋，贾德耀领导的国务院，会代他受过而全体丢官吗？这是最明白不过的事。沈从文和我谈起这段公案时，感慨很深地说：章先生20多岁就名满天下，当时亦刚40出头，自认为以司法总长之尊，何能受谤，遂愤而致此，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对他自己来说，确实是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做了一件最不利自己的事。真是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这是很可惜的。

写到这里，我还讲一段小事。章先生和我谈起毛约请他向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讲述他与"三一八惨案"关系的有无，恰好周作人先在章家，待我一落座，周就告辞而出，我想必定是他先和周谈起这事，才引起他向我重谈的。在章先生讲完这情况后，接着说："周作人刚才讲，他大哥应该感谢我，要不是骂我，他大哥不会那么早就出名的。"章先生说："不是真出自学术问题或政治问题，我从不与人争辩，对鲁迅正是如此，我和他也从未见过面"。

七、馈赠蔡和森、毛泽东22 000元

似是1960年，章先生被单车撞伤，住北京医院治疗。毛泽东获悉后，送给他人民币500元作疗养费用。往后，在毛约他晚餐桌上，章对毛说："你送

我500元，我不敢受，我要还给你。"毛听后大笑，连声说："行老！这点钱算什么，作还你账的息金也远远不够。"在章的记忆里，只是毛向他借过10元、20元的，忙说："这算什么！"毛说："行老！你不记得了吗？我和蔡和森于民国九年为着筹款去法勤工俭学的事，曾拿着杨先生（怀中）的信在上海找你支持，你当即给我们一张25 000元的汇票，要我们留3 000给你用，其余的都给我们。我和和森等7人平分了，我自己多分了1000元。他们都去了法国，我没去，拿了这4 000元在国内搞革命。"章先生初听时茫然，餐后闲谈时，他突然记起来了，对毛说："是有这回事，那年孙中山、岑春煊在广东组织军政府，电邀我任秘书长，推辞不获。我电谭延闿（当时湖南省省长）借钱作旅费，谭汇来25 000元，其实我有3 000元尽够了，所以只留下3 000元。杨先生信的内容，我已记起了一点，似乎有'门生蔡和森、毛泽东皆天下奇才也'。好像这笔钱是蔡和森来借的，汇票是我给他的。"毛说："是的，和森比我强，杨先生也喜欢他些，可惜牺牲得太早了，汇票是您交给他的。"在谈到杨怀中先生时，毛问章有他的照片没有，章答："可能有，寻寻看。"待我另一次去他那里时，章先生出示在他上海家里找到了杨送给他的一帧半身相，正待送去。章先生在相片上写了几行字，内容我忘记了。

关于他送给蔡和森、毛泽东光洋22 000元的事，事有凑巧，又找到了物证。1961年黎锦熙先生的夫人贺澹江女士，在清理抗战前黎先生留在北京旧居的藏书时，在书柜最下层发现一报纸包，内藏毛泽东先后给黎先生的六封信和四五本"新民学会"通讯录。这份齐全的"通讯录"，据悉是海内仅存的。"通讯录"的某辑里，载有毛给某某（名字我忘记了）的信，内中就讲到这笔送款的事。1962年人大、政协开会时，章先生从香港到广州坐上这趟沿途迎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专列，我在长沙上车，见到章先生，告诉他这事，他很高兴。我并告诉他，黎先生把信和"通讯录"全部捐赠给中央党史办公室了。"党史办"把重印的"通讯录"送给黎先生一份。他要我向黎先生借给他看，我到京后第二天就借了给送去了。从这件具体事例，可见章先生是何等重视友情、爱惜人才的。当时的22 000元光洋，可抵得上好几户中产阶级的全部家产。章先生本人一生，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但他就是这样不存私心地慷慨助人，可以说这就是他毕生处世的风格。

八、迁出朱家

解放初期，北京的房子较空，像章先生这样身份的人，政府给他安排一所较高级的住宅，这是必然的事。但章先生一贯重视友情，对个人生活要求，一贯随便，所以应朱启钤强邀住进他家。朱为何如此？这是因自"筹安"失败，

洪宪皇帝"宾天"以后，朱闲居北京几十年，无所事事，度其失意政客生活，一下子听到共产党掌权了，而且首都就是北京，走避无路，疑惧重重，惶惶不安，因此强请章先生住在他家，借作"护身符"。往后，经过"土改""镇反""三反"等极其激烈的政治运动，他感到自己不独安然无事，而且被邀为北京市政协委员（这可能也是章先生推荐），跻身民主人士之列，遂顿生飘然之感。加上章先生那几年处境并不特别顺适，朱又感到自己的住房较紧，遂萌"逐客"之念。正在这时，他在百货公司做会计工作的儿媳某，因涉嫌贪污，公司追究正急，畏惧自杀。在自杀的前一晚，她在章先生房里谈了很久，朱遂以此责怪章先生没劝阻她。章先生和我谈及这事时，颇露不快不安的情绪，并说："她媳妇和我谈话时，只是说她受冤，没说她要自杀，我怎么去劝阻呢?"章先生从不开口求人，不愿向政府要房子，言下之意，似只有忍受而已。我听完后，义愤填膺，顺口安慰几句，就告辞而出，直奔李烛尘先生家，把这情况详细向李老讲了。烛老是个正气凛然的人，他和行老几十年旧交，但到北京后，基于当时的政治气氛，彼此间往来甚少。他曾听说朱家的房子大、房子好，朱自己住东屋，将北屋全让给行老住，优礼有加，行老生活得很好。听我介绍后，深为诧异，连声说："我们经常在毛主席家见面，只听见他给别人讲困难，要求照顾，怎么连自己住房也不讲讲呢?"我说："行老就是这么一个人。"在我和烛老讲过这话的第三天或第四天，烛老就告诉我，已对毛主席讲了，说行老寄人篱下，很受气，生活也不很好。毛主席听后，为之动容，连说："我不知道，没照顾好。"烛老以为章先生只有两位夫人，毛说："不是，有三位，一位在香港，也是应该去看看的。"烛老问我是否如此?我说："是的，解放后，他就一直没去过香港。"我随即把烛老讲的这情况，走告行老。他欣然说："烛老给我讲讲，最合适，我应去看望她。"章先生就是这样迁出朱家，住进史家胡同25号的。从此，章先生的处境顺畅些了。1962年第一次去香港见到了与他分别13年的殷夫人。

九、章先生的立身处世之道

章先生就读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时，因鼓动学潮，走上海，得识爱国学社章太炎、蔡元培，相交甚笃。我感到他与蔡先生的处世之道，有许多相同之处，其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性格方面。据钱基博先生介绍，蔡先生"退然若不胜衣，与之言事，类有然诺而无讽示。"而于章先生则尝谓："吾行吾素，知罪惟人，……生平不工趋避之义，夙志不干违道之誉，天爵自修，人言何恤!"其相同之处，则在不党同伐异，不守门户之见，择善固执，不轻以己见徇人，不曲学以阿世。蔡先生在北大时，用人惟才，不较资历，兼包并蓄，不论学派，

聚辜鸿铭、胡适之、陈独秀、梁漱溟、张竞生于一堂，各张其学，一视同仁，略无轩轾，开风气之先，楷模后世。所有上述诸公，都是章先生的朋友。但他们之中，无论政治思想或学术思想，彼此都很少相同之处。此中如胡适之，算是真同章先生打过"笔墨官司"的，但当"官司"打得正酣之际，章却约胡合影，并题白话诗送胡："你姓胡，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十五年后，这个像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诗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胡报以旧体诗："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这两位大学者的唱和诗，充分说明了他们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和友情截然分开的民主襟怀。说也奇怪，章先生在辛亥革命以前，确实是"曾开风气"的先驱者，是中国学界中最早领导学生罢课者之一；但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却成了"复古派"。这不独他如此，他的盟兄太炎先生更是如此。不独太炎先生如此，在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算是叱咤一时的开风气的风云人物了，后来竟然成了"保皇党"。这三位"同是曾开风气人"，都因不能顺时前进，而成为阻碍时代前进的人。

关于章先生的立身之道，最能说明实质的表现莫过于他对陈独秀的危难不移的友情了。就政治思想、学术流派而言，两人之间，真是风马牛不相及，水火不相容。但当陈独秀于1932年以"危害民国"罪名受审于苏州高等法院时，先生不避政治风险，不畏强力，奋起为之辩护。当时由于被诉人、辩诉人都是名震中外的人物，加上"辩诉状"理直气壮，文气逼人，旁征博引，震动法庭。当时的《实报》评论说："陈卒赖其（指章）力，得免于死，判刑八年。"他的这篇"辩诉状"，对于国家、政府、政党三者之间的区别与关系，以及什么叫犯叛国罪，政治家应容忍不同政见不同政党等理论，阐述极为清楚。其言曰："国家与政府并非一物，国家者，土地、主权、人民之总和也。政府者，政党执行政策与政令之组合也。定义既殊，权责有分。是故危害国家土地、主权、人民者，叛国罪也；而反对政府者，政见有异耳，若视为叛国罪，则大谬矣。……我国为民主共和国，奈何不能容忍任何政党之存在耶?"辩诉状中说："孙总理有云'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为何孙总理宣传共产，奉为国父，而陈独秀宣传共产主义，即为危害民国?于法于理，能服人乎?"这就是说在法律面前应人人平等。更感人的是：章先生完全抛弃了他与陈独秀之间判若河汉的政治学术歧见，而为之请曰："现政府致力讨共，……必欲使有志之士（指陈）庾死狱中，何苦乃尔?……为保存读书种子，不但不应治罪，且宜使深入学术研究，国家民族，实利赖之。……综上理由，本律师要求法院宣判陈独秀无罪……"这篇"辩诉状"，文章铿锵，正气凛然，至今读之，如见其人。

十、结　语

余生也晚，于章先生道德、文章、事业知道的很少。不过，我总觉得他毕生成就，未尽其才，才大识广，未尽其用。撇开政治不谈，以学术著作之富，就远逊于章太炎、梁启超。当年三人都是仗笔救国的仁人志士，尽管立论观点有所不同，但文笔之健，影响之大，可以说都是那个历史时代的主宰人物。钱基博先生《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在讲到章先生时，谓："士创既能罢学之上海，从诸公（指章炳麟、蔡元培、张继、邹容）游，不可无以自见，独抵掌说军国民之义焉，炳麟则大喜，以为得一奇士"……而容著《革命军》一书，士钊则润泽之，初版签书"革命军"三字，乃士钊笔也。……一日，炳麟携容与张继及士钊同登酒楼，痛饮极酣，曰：'吾四人当为兄弟，戳力天下事。'炳麟年最长，自居为伯，而仲士钊，叔继，季容。自是，士钊弟畜二人，而呼炳麟为兄也。容十九岁，年最幼，而气凌厉出士钊上，卒然问曰：'大哥为文驳《康有为书》，我为《革命军》，溥泉为《无政府主义》，而子何有?'士钊笑谢之而已。"后遂著文《孙逸仙》。钱基博先生论之曰："其时天下固懵然莫知国父之为谁何，而上海之与国父有旧者，独一秦巩黄，尤诵而心喜，为之序曰：'四年前，吾人意中之孙文，不过广州湾一海盗也，而岂知有如行严所云者。举国熙熙皞除，醉生梦死，彼独一人图祖国之光复，担人种之竞争，且欲导扬人权于专治之东洋，得非天诱其衷而锡之勇者乎！'。炳麟则为题词曰：'索虏披昌乱禹迹，有赤帝子断其嗌，掩迹郑洪为民辟，四百兆名视此册。'自是国父名著，播之文章而宣于士夫矣。"当是之时，何其壮也！就年龄而言，太炎长先生12岁，任公长先生8岁，辛亥年，先生才30岁耳。论寿命，太炎67岁，任公53岁，先生则高年至92。而先生之著述成书者，较之任公太炎，则相去甚远。晚年印行之有关逻辑著作及《柳文指要》，为迎合陈伯达、康生此类文贼篡易的所谓唯物观点，几致精论大失，洪识顿减，良可叹也！何故如此？盖章、梁二先生自知政见无由实行，师宁武子之愚，乃退而著书讲学；先生则未能忘情政治，不可为而为之，年登耄耋，为之客死香江，可伤也矣！

有谓先生为政论家而非政治家者，我觉得这说法很有道理。我未研究过国民党创建历史，但熟闻先生与黄克强友善，亦极为孙中山所敬重。当孙黄合组同盟会于日本时，强邀入盟，黄为之禁先生于别室，长谈达二昼夜，终未之应。又从钱基博先生文中得悉：辛亥革命后，推国父为临时大总统，……其中经纬万端及中西立国异同本义，殆无一人能言。士钊归自英伦，晤桃源宋教仁于游府西街，宋坦然相告曰："子归乎！吾幸集子所言，以时考览而明宪政梗概。"出示一册，盖士钊投寄北京《帝国日报》之英宪各论，剪裁成册也。于是士钊乃以明宪法、通政情，为革命党人所欲罗致。吴敬恒、张继、于右任等联翩相造，邀之人同盟会，未应。又谓："同盟会既改组为国民党，黄兴重邀隶籍，士钊又不许"。窃意所谓民主政治，即是政党政治，这点，章先生是完全清楚的。既欲从事革命，从事政治，而又自外于政党，是犹张空拳冒白刃，固无能为也。以此，我常设想：设使同盟会创立之初，以先生之物望，益以孙黄之敬重，则同盟会主盟者有可能将并先生而三矣。又设使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先生能接受吴稚晖、于右任之邀入盟，或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之初，先生能接受黄兴之邀入党，以先生之才气横溢，民主襟怀，凌云健笔，正直无私，可能导致不使孙中山先生让位给袁世凯之事，国民党亦将因之有立言重心，局势或将改观，则民国历史又是一种写法矣。惜乎，先生见未及此。

综观章先生一生中在政治和学术上的最大失误，就是在短短一年多一点的段政府时代里。当1924年直奉军阀混战正酣时，冯玉祥临阵叛离直系首领吴佩孚，回师北京，拘禁总统曹琨，转而联盟奉系张作霖，合力倒吴，拥戴皖系首领段祺瑞继曹锟主政。段就商于章，章谓约法既坏，如沿用总统名义，于法不合，建议改称"执政"，段从之。但组织这政府的三派，都是尔虞我诈，互不相容的军阀，如何能合作？这三派之中，有力量有地盘的只有张作霖。冯玉祥所能控制的地区不出北京城。当时广州国民政府正准备出师北伐，统一中国。段政府不合法，不稳定，无力量，有如燕巢飞幕。章先生对此应是完全清楚的。而竟起与之助，并欲借以整顿学风，限制学生参与政治活动。所有大学招生考试及毕业考试，均由教育当局统一举办（较之现在之统一招生还多一个统一毕业考试）。对大学教授之学识资历，均由教育部进行甄别，而且要对大学进行合并。以上种种，即使政府强而有力，也很难做到，何况如鱼游沸鼎中之段政府??章先生四出树敌，遭致群起而攻，百诟丛集，忧愤去职，移寓天津，抑郁寡欢，改字孤桐。一失之误，乃至如此，可惧也矣！其所以终能载誉终身者，徒以世人重其道德文章，尤重其在抗战时期所表现之民族气节也。才为世出，未尽其用，上为苍生痛，而下以哭其私耳！惜哉！

湖湘文史丛谈·第一集

蔡锷将军之母

曾光炎

蔡母不知何地人？亦不知何姓？两三岁时，岁饥逃荒，其母弃之于道，为王姓收养，抚育成人，遂姓王。

母嫁邵阳蔡公正陵，家贫。初生锷，梦在山坡有虎自松林来，近之甚驯，俄而锷生，因呼曰虎儿，名艮寅，字松坡。艮寅者，取艮为山，寅属虎义。当锷5岁，举家迁武冈州西山门王板桥（今洞口县山门区水东乡）。初居青山铺，次居大坝上，后迁山门镇。

正陵公初做裁缝，继做小贩，也曾教过私塾。母在家，日则砍柴，磨豆腐，煮酒，卖饭，夜则做针线，佐夫营生。所居之地，门当山道，仄径崎岖，行者甚艰，阴雨黑夜，尤为险恶。母常搓草绳作脚码子悬于门侧，过客无草鞋泞滑不能行者，听自取之，不受值。又析杉木皮晒干，束为小把，夜置篼火，束把于门前，夜行无火者，听取燃之以照路。其卖饭也，迟早多少听客便，钱有不足，短数文不争；身未带钱，赊欠亦可，还则受之，不还亦不追问。有时饭少，辍儿女之食，悉以应客。有儒者过，必以礼接，命子出谒请教。如此者久行不懈，故远近皆称母贤。

正陵公殁，母独持家，备尝辛苦，而志益励。及锷发迹，在广西、在云南、在北京，板舆迎养，母仍躬亲家务，服浣濯之衣，屏兼珍之味，勤劳俭朴，一如在家。拒绝达官贵人请谒。语家人曰："吾不乐居繁华地，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狗窝。"故虽侍奉殷勤，居不久辄又思归。其在家，养牲、种蔬、夜绩不倦。而待人接物，更加和善，无丝毫富贵意态。

其在北京，锷已官位显赫，偶不如教，竟杖之。袁世凯将称帝，深忌锷。母动锷曰："吾老矣，当携汝弟辈南归省墓，汝行汝志，毋吾虑也。"即行。锷起义云南，袁败，恚忿而死。母大喜曰："吾固知虎儿之能有为也。"

锷病殁，国葬，拨银2万元治丧，以其余买长沙天鹅塘樟树园1号宅以母居。母勖子课孙，清淡朴素，一如昔日。民国24年农历四月二十日（193年5月22日）殁于长沙本宅，享寿78岁。湖南省政府主持成立治丧委员会，讣告

中外，备极哀荣。

弥留时，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造第候疾，启曰："万有不测，安灵麓山，俾故将军得奉侍泉下何如？"母曰："吾欲还伴老公，生既久违，死不忍使老公独寂山门也。"治丧委员会乃奉灵葬正陵公墓侧。

1985年5月1日，政协洞口县委员会文史工作组至山门访谒蔡氏墓，其地在今山门区横溪乡金鸡田村长塘组，蔡公正陵墓、蔡母王氏墓，皆有碑，尚完好。

蔡公正陵，一名俊陵，字湘泉。三男二女：长男锷；次男鹤，改名钺，字松垣，留学日本，曾任湖南省造币厂厂长；三男庚，改名钟，字松墀，一字德清，留学美国，曾任总统府参议，建国后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毛泽东指挥若定 程颂云高举义旗

李华钰

毛泽东同志与程潜将军有着特殊的交往。

早在1945年8月28日，为实现国内和平主张，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等党中央负责同志赴重庆谈判。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各方上层人士广泛接触，共商和平建国方针。9月20日，毛泽东会见了程潜、叶楚伧、陈立夫和贺耀祖等。不久，程潜专程拜访了毛泽东，长叙旧情，纵谈时局。在谈到抗战胜利后，全国将实行普选时，毛泽东对程潜说："你可以竞选副总统，搞成了，好主持国共和谈，如果搞不成，你就只要一个湖南。"程潜说："我冒得钱，搞人家不赢。"毛泽东说："你跟你的部下商量，找他们想办法嘛！"

1948年7月，程潜回湘主政，担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为了实现湖南的和平，程潜积极设法同毛泽东和中央湖南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程潜知道李达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通过省政府顾问方叔章同李达联络，争取支持。方叔章在一次同程潜的谈话中说："颂公，如果共产党的军队来了，你准备走哪条路？为湖南人民着想，也是不能打的。"程说："我总不能投降呀！"方叔章说："颂云你不能投降，还可以讲和嘛。"程欣然表示："不能打，不能跑，只有和。"

1948年12月25日，中共陕北权威人士谈国内战争罪犯名单问题，程潜被列为第一批43名战争罪犯之一。当时程确实很震惊。以后他曾对人说过，他被列为战争罪犯，可能有三层意思：一是中共方面促成他决心起义；二是被列为战争罪犯，减少蒋介石南京政府和桂系的猜疑；三是中共方面某些将军对他有误解，说他是战争罪犯，也并不冤枉。他还说过，中共政策是既往不咎，论功行赏，说明共产党伟大，战争罪犯也敢于起义。

1949年1月19日，中共湖南省工委根据毛泽东关于争取程潜领导部属起义的指示，在岳麓山桃子湖方叔章家里举行一次聚会，有程潜的要员萧作霖、邓介松、程星龄，湖大教授李达、伍意浓、萧敏颂，省工委军事策反组组长余志宏出席。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商讨了对策。李达说："程颂云应当保卫湖南的和平。蒋介石不会有重兵到湖南来。白崇禧从武汉后退时，到湖南的一个时期，可能要同共产党较量一下。今日的问题是要集中对付桂系，要早有准备，应善于自处。"这些话自然传到了程潜的耳中。

1948年初，毛泽东三次电报指示华南局，设法护送李达去解放区，并写信给李达说："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加经营。"因限于当时条件，李达一时未能成行。1949年4月，程潜担心李达的安全，派方叔章前往看望，动员他去乡下暂住。李达告诉方叔章，他很快要离开长沙去北平。方将李达的谈话告诉颂公后，程约李达在他的寓所会见。程特请"鹤鸣兄"（李达）向毛问候，转达他决心起义，愿做湖南实现和平的工作，"并请润之兄指示行动方向"。临行时，颂云送给李达500银元作路费。李达于4月16日离开长沙，5月14日到达北平，18日在香山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受到热情款待。当天晚上，毛泽东同李达彻夜长谈。李达谈及程潜决心领衔实现湖南和平起义，特要我向润之兄请示今后行动方向。毛泽东表示期望颂云团结部属，造福桑梓，并将尽快安排重要人士与程联络。

1949年2月，毛泽东在石家庄会见章士钊、江庸等民主人士时，托章转达他对程潜的期望。同年3月底，程潜及程星龄经武汉去南京，同李宗仁商谈与共产党和谈时，章士钊从上海赶到南京会见程潜，特意转达毛泽东对他的期望。章说：毛泽东是中外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他期望程颂云能率领湖南军政要员和部属走和平起义的道路。过去的事，既往不咎，要给予礼遇。程听了非常激动。

1949年4月，章士钊和刘斐、张治中等人作为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赴北平，同中共举行国共和谈。和谈破裂后，章士钊、刘斐、张治中仍留在北平。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再次会见章士钊，谈及关于湖南和平起义之事，望程颂云和陈子良合作实现。不久，章士钊到达香港，要程颂云速派人去香港同他联系。程颂云派程星龄、刘岳厚到香港会见了章。章说，毛泽东对程潜、陈明仁领导湖南和平起义期望殷切。陈明仁将军在四平街的问题，既往不咎。当时，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程星龄、刘岳厚从香港归来，当即向程潜和陈明仁作了汇报。

1949年4月下旬至5月初，中共湖南省工委决定由余志宏同程潜、陈明仁会见，希望他们写一份起义《备忘录》送中央和毛泽东。程潜在《备忘录》中表示决心根据中共公布的八条二十四款之原则，谋求湖南局部和平，具体进

行办法，亟望双方指派军事代表立即成立军事小组，俾能详细商谈，并密切配合行动。《备忘录》由省工委派专人送武汉中南局转呈毛泽东。

中共中央联络部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经李克农、吴克坚的工作，在上海华东局的配合下，决定派周竹安（地下党员）、黄雍（程潜的学生）回长沙，设立地下电台，直接同中央联系。经过筹备，长沙地下电台于1949年5月开始工作，将程、陈将军的活动情况及白崇禧撤退长沙的措施及时向党中央和第四野战军作了报告。1949年6月2日，周恩来副主席致电香港乔冠华："争取程潜、李默庵、陈明仁站在我们方面反美反蒋反桂极为必要，请你们认真进行此项工作。如有可能，应与程潜或李默庵建立电台联系。"长沙地下电台收到后及时转告了程、陈两将军。

1949年7月2日，中共中央发电："程潜只要决心反桂系，并布置截断桂系退路，表面上主张湘桂合作，以麻痹桂系，是可以谅解的。他应力求留在长沙，作为内应。"

7月4日，毛泽东致电程潜："颂云先生勋鉴：《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着迅赴事功，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长沙地下电台将此电文分送程潜、陈明仁两将军。他们阅此电文后，极为高兴。程潜说："毛润之兄如此关切湖南人民，对我如此信任，一切安排周详，一定不辜负他的期望。"随即约陈明仁研究行动方案，组织力量，采取措施应付白崇禧，积极准备湖南和平起义，立即派国防部少将、总监督导刘纯正赴汉口，同四野首长接洽。行前，程潜交待："毛泽东同志电文收悉，一切按电文所嘱办理。现在受白崇禧的压迫，可能要对湖南下手了，我实在无法对付他，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把部队尽快开进湖南来，我把责任尽早交给他们。"刘同地下党派的夏国祥等于7月16日在汉口会见了四野首长和南下湖南省委负责人王首道、萧劲光、谭余保、袁任远等，转达了程潜的问候和意见，受到热情款待。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及南下湖南省委负责人接中央军委7月4日电（毛泽东拟稿）："王（首道）、萧（劲光）专电及程潜《备忘录》均悉。此事请林（彪）、邓（子恢）注意处理，我们认为程潜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如程潜发表声明反美反蒋反桂，似应予以率部起

义之待遇，使程潜能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我们亦可考虑予程潜以高级名义，例如南方招抚使之类，俟南方各省平定，程潜则来中央政府担任工作。程潜是孙中山的老干部，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近年治湘措施表示进步，若得程潜真心站在我们方面，将有很大利益。"四野首长和南下湖南省委负责人根据中央电示，研究部署了军事进攻方案，将十二兵团进至岳阳、湘阴、平江和浏阳一线，十三兵团进至石门、常德、益阳一线，十五兵团沿湘赣边进至攸县、茶陵、酃县等地，对湖南形成包围圈，军队暂不进长沙，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谈代表团，金明任首席代表，唐天际、袁任远、解沛然和李明灏为代表。恰在7月中旬，程潜赴武汉的代表刘纯正到汉报告。知道程潜将军准备起义具体行动计划后，金明首席代表等随军行动，很快到达了平江县城，等候程潜、陈明仁派来的代表团接洽。

7月中下旬，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解放了岳阳、平江、石门、常德等地，白崇禧在长沙深感危机，一面加强军事防御，督促各前线部队备战，命令陈明仁统率一兵团在长沙布防固守，将长沙变成"第二个四平街"；另一方面将程潜掌握的兵权削掉，统归陈明仁指挥，逼程潜离湘去穗，担任广州政府考试院院长，改组长沙绥署，成立湖南绥署，改组湖南省政府，令陈明仁代理省主席。程潜此时处境艰难。为迅速改变此种处境，程再次派唐鸿业去香港，与中共方面取得联系。程对唐鸿业说，我现在如此艰难，毛润之何曾知道？希望人民解放军迅速进驻长沙。唐鸿业到香港后，与乔冠华和章士钊等人取得了联系，转达了程的要求。

在这紧张的关键时刻，毛泽东致程颂云的信，由李明灏带至汉口，并经中共党组织派刘梦夕护送，于7月11日上午将信面呈程潜。信中说：为了整个湖南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湖南走和平解放的途径，这是完全必要的。至于如何行动，请你自行权宜，相机处理，一切仰仗主持，请不必有任何顾虑。程阅信后说："湖南的问题，去年就开始酝酿，宝盖子没有揭开，顾虑颇多，现在有了毛泽东的指示，不仅我个人的去处不用顾虑，而且整个湖南问题能够得到圆满解决。陈明仁将军的情况，有毛主席的指示，我可以再同他具体研究。"上述情况，刘梦夕及时向地下党组织作了汇报，并通过地下电台及时报告了第四野战军首长。

程潜与陈明仁将军根据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军委的电讯指示，认真研究部署起义的计划。为应付白崇禧桂系压迫，程潜决定改组长沙绥署，新组建湖南绥署；湖南省政府西迁邵阳，省主席由陈明仁代理；程潜将军暂离长沙去邵阳；长沙市区准备修筑作战工事，实行坚壁清野；准备草拟通电，组成和谈代表团。由于局势紧张，加上对白崇禧采取调虎离山之计，程潜将军决定于7月

21 日暂时离长去邵阳。当天上午八时，白崇禧赶来省政府院里为程颂云送行，实际上是监行。白崇禧在程颂云走后，即命陈明仁用血战四平街之精神，在长沙与共军决一死战，他自己在衡阳坐镇指挥。当天下午，白崇禧飞抵衡阳。从此，长沙城变成了陈明仁将军的一统天下。

7 月 18 日，中共军委电示林彪、邓子恢、萧克和赵尔陆（毛泽东同志拟稿）说："程潜十六日晨与你们派去干部所谈诸点，均甚好，均可照办。在程潜、陈明仁等宣布脱离伪中央后，可以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名义出现，以便给蒋、阎、李、白等以打击，俟我们占领湖南各要地后，将其部队交我整编。我们已经过我们在长沙的电台告程潜，我军侧面占领平、浏、醴，正面占领岳州、湘阴，但暂时不占长沙，以利举行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并叫程潜及有关各方保持镇静，不要恐慌。如程潜部在对桂系作战中，能先有配合行动则更好。这些都需你们派代表数人（其中应有李明灏）与程潜代表数人举行会谈确定，并组织联合机构，然后行动。此项会谈应立即举行。如程不便派代表来汉口，则你们的代表可以去长沙。"四野战军首长和南下湖南省委负责同志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示研究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谈代表团及南下湖南省委主要负责人，迅速离开汉口赴湖南，7 月 22 日离开武昌，23 日到通城，晚上到达平江县城，领导同志住平江天岳书院。王首道同志同程潜派去汉口的代表刘纯正商定，刘迅速返回长沙向程潜汇报，尽快派代表赴平江商谈湖南和平起义的具体事项。

刘纯正于 26 日返回长沙。此时程潜还暂居邵阳，刘向长沙绥署副主任唐星作了汇报。唐星当即与陈明仁商量，电话告知程潜，请他尽快返回长沙。27 日，陈明仁将军派程星龄、李君九两同志，在湖南省工委委员欧阳芳的陪同下赴平江，会见了王首道、金明、唐天际等领导，初步商定和平谈判有关事宜后，29 日返回长沙。为了有利于双方谈判工作的顺利进行，李明灏随程星龄等人先进入长沙，会见陈明仁。程潜 7 月 29 日由邵阳回到长沙。这时，李明灏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又受毛泽东之重托，见了程、陈两将军，师友重逢，格外欣慰。程、陈对李不辞劳苦非常敬佩，并表示一切行动听从中共的调遣。很快就商定了起义的方案。决定成立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程潜任主任；成立临时省政府，陈明仁任主席；所有起义部队暂用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名义，归陈明仁指挥，逐步集中于浏阳、醴陵休整，并将方案立即电告平江的首席代表金明。

8 月 3 日下午 8 时，程潜将军委托湖南省政府新闻处长刘伯谦在长沙中央日报社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代表程潜宣布未江通电，呼吁全国和平。当天，程潜还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及四野首长发出专电，表示脱离广州政府，"程潜

与子良已令所属军队一切行动均按中共指示办理，绝不妨碍当前最关紧要之军事行动。在如何争取军心，如何安定军队方面，敬拟权宜之计，暂设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原第一兵团暂改称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8 月 4 日，程潜、陈明仁两将军领衔，发表通电，宣布湖南和平起义，加入人民民主政权。并望西南、西北各省一致响应，奋起自救，湘省军民誓为后盾。此通电震动全国，对国民党党、政、军是一次重大打击。与此同时，程潜主任还发表了《告湖南民众书》、《告全体将士书》，陈明仁发表了《告全省各级官员及所属军师官兵及全省人民书》，号召全省军民服膺新民主主义，重振革命精神，深信义旗一揭，一定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是湖南三千万人民的新生。

毛主席、中央军委接到程潜将军宣布湖南和平起义的电文后，非常高兴，于 8 月 5 日由毛主席亲拟致程潜将军电："颂云先生勋鉴：未江电示敬悉。为对抗广州伪府，为维护湖南秩序，为稳定军心，为便利谈判，为号召各方，所提设立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及陈明仁将军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并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派出临时性质的省政府主席及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官，均属必要，可即施行。省政府移交会议略延时日，以期避免刺激军政人员，亦属有益无害。弟等并认为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不应为空洞名义，应行使必要之职权，除敝军已接收之地方外，其余地方应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指挥，庶使秩序易于维持。总之，解放湖南及西南各地需要借重先生及贵方同志之处甚多，只要于人民解放军进军及革命工作有利，各事均可商量办理。此次先生及陈明仁将军毅然脱离伪府，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薄海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毛泽东、朱德，八月五日。"程潜、陈明仁两将军率湖南党政军宣布湖南和平起义，长沙获得和平解放，受到全省人民的热烈拥护。

为了进一步做好湖南和平解放后的各项工作，毛泽东、朱德于 8 月 16 日，再次致电程潜、陈明仁暨全体起义将士们："接诵八月五日通电，义正词严，极为佩慰。中国人民事业的胜利，已成为全世界公认的定局。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等残余（匪党），不甘失败，尚图最后挣扎，必被迅速扫灭，已无疑义。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尚望团结部属，与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准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革命精神教育部队，改变作风，力求进步，为消灭残匪，解放全国人民而奋斗。"程、陈两将军及全体起义人员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他们一方面组织起义官兵逐步集中浏阳、醴

陵一线学习，整编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则积极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兵团和南下湖南省委的领导同志，成立湖南长沙军事管制委员会，萧劲光、王首道、陈明仁分别担任正副主任。扩大湖南省临时政府机构，陈明仁、袁任远担任正副省长。并组织全省军民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全省一派新的景象。

为表彰程潜、陈明仁两将军为解放湖南及紧接着解放大西南所作的贡献，毛主席、党中央特邀请他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9月7日，程潜到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到车站迎接。程潜将军感激得热泪纵横。10月1日，程潜、陈明仁同中央首长一道登上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周方先生与平民教育

肖　扬

周方（静庵、卓甫）先生（1882～1979年），湖南新邵县人，我馆已故馆员。解放前，以教育救国为己任，坚持勤俭办学，从事平民教育，因而博得“平民老总”的美誉。著作有《抗战必胜弹词》、《三化教育弹词》等民众读物。解放后，继续从事教育。后来退休定居北京，虽然年事已高，仍积极参加街道扫盲，兴办儿童阅览室，编黑板报。今年（1992年）是周先生诞生百周年纪念，为了纪念这位老教育工作者，现将他所从事的湖南平民教育的概况介绍于下。

长沙曾是平民教育的策源地，1916年冬，湖南高等师范的学生中，有邓康（中夏）、周方等人创办工人夜校，以校内工友为主要对象，由在校同学当老师，教材是自行编选的，开篇第一课即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样一首脍炙人口的悯农诗。

1920年7月，湖南学生联合会开办了一所“平民半日学校”，费用由各校学生提供，教员由各校学生担任，教材全用白话。1921年10月10日，罗教铎、周方等通过省教育会倡导长沙各中、小学附设平民学校，推行识字教育，另创设一个基本平民学校总其成，由周方担任主事。

为了在全省进一步推动平民教育，省教育会于1923年下半年召开理、干事联席会，推蒋兆骧、罗教铎、李六如等7人组织筹备委员会，奔走月余，得会员500余人，于1924年1月成立“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选罗教铎、蒋兆骧、李六如、曹典球、方克刚、张唯一等15人为董事，推曹典球任董事长，聘周方任总干事，曹典椅（伯韩）、彭慕陶任驻会干事，郭亮、姜梦周、陈子仁、廖锡瑞等20人为干事，下设宣传、推行、编辑、总务各科协力进行工作。曹董事长又商得教育经费保管委员会同意每月给予经费200元。促进会编印《新千字课》，并在长沙《大公报》上出了平民教育周刊。从此，平教声浪日高，工作进展迅速，尤其郭亮在各工会组办夜校，李亚农（省学联主任）推动各校附办平校，更起了领导作用。一年中，省城长沙以及各县市的平教会、平

民学校，风起云涌。在平民教育促进会周年纪念会上，周方写楹联道："新世界是平民大舞台，我们当努力爬上去；旧教育为贵族装饰品，大家应尽量翻过来。"会务的发展，给周方以鼓舞，作为总干事，他心之所思，口之所说，手之所写，无不是平民教育的事情。甚至在一中和岳云中学上课时，也鼓励学生注意向家人、邻人中间扫除文盲。难怪当时长沙《大公报》主笔李抱一笑称周方是"平民老总"，这话被记者写了下来，登在报上，一时传为美谈。

当时，通俗教育馆馆长傅君剑，聘周方为讲演员，并要求他为该馆出版物写稿。周曾写过《孔子是平民教育的老祖师》一文，称道"孔子少孤，出身微贱，当过赞礼生，管过会计，牧过牛羊，是以工兼学而成为博学多能的大儒生。"称道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并按这个主张广收学生，例如一箪食一瓢饮的颜回，鹑衣百结的子夏，做买卖的子贡，等等，都是孔门的高足弟子，孔子"不愧为平民教育的老祖师"。

正当平教顺利推动之际，省政府里面却出现了平教会"赤化"的传言，省长赵恒惕要求曹典球改组董、干事会，曹只能照办，把李六如、蒋兆镶、李亚农、郭亮、曹典琦、廖锡瑞等一班董事、干事都辞退了，平教顿觉黯然。但周方仍留任总干事，彭慕陶留任驻会干事，被辞退的董干事也还是遇事协助，因而全省平教工作依然有所进展。

1925 年 9 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南京召开全国平民教育年会，周方等人去参加了会议。由于湖南平教工作切实，得到赞誉，遂决定于 1926 年来长沙召开全国平民教育年会。方克刚借此向赵恒惕请得了 3 000 元特别补助费。

董、干事还会商发动学生，决定指导学生利用寒暑假到各县乡镇推行平民教育，组织平会、平校或平民读书处，得到各校学生的响应。加上商务、中华、世界三书局乐捐了万部平民读物，这对推行平教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据统计，1926 年全省已有 50 多县组织了平教会，办了2 000多个平民学校及平民读书处，就学人数约 40 万人。在年会中，曾被陶行知誉为"办理切实，可称全国平教之冠"。周方后来回忆说：陶先生把成绩归美于平教会董、干事之努力所致，而不知中共一贯领导、协助之所得，如蒋兆骧等人就是中共派定做平教工作的。

忆父亲杨树达

杨德娴

面对青山，迎着夕阳，在岳麓山下湖南师范学院至善村前的马路上，缓缓地漫步着一双人影。金色的晚照，镀亮了他们萧疏的白发。散步的大学生们，对他俩都投以略带惊奇的目光和善意的微笑。一来是这位虽呈老态但仍不失为高大魁伟的男子与其矮小纤瘦的夫人恰成对比，相映成趣；再就是因为他们那紧紧地手牵着手的亲密姿态了。要知道，那可是 20 世纪 50 年代啊！即使是热恋中的年轻人，也没有那种胆量敢于公开表露他们的感情呢！难道我的父母亲就那样的思想新潮、举止西化吗？不！不是的。因为我的父亲时已年过七旬，由于长期无休止地阅读、写作，目力已极度衰退，所以这散步就不得不借助于母亲的牵引扶持了。而这每日的黄昏散步，也正是由于目疾的缘故，父亲近来才允许给自己这一点工作之后的休息。因为在父亲的概念中，休息、闲散、逸乐这些行为不仅是对时间的挥霍浪费，而且无异于过失和犯罪。那么，从我所知道的父亲的一生中，他究竟有没有过休息以至娱乐呢？穷索记忆，那就要回溯到非常遥远的岁月，也就是我的童年了。

那时，父亲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不知是听从了谁的劝告呢还是静极思动（毕竟还是个有活力的中年人啊），忽然想起要打网球。于是购置了球、球网和球拍。那长长的白色球网，那比皮球要硬也跳得更高的小球，那沉重精致的球拍，都引起了我的神秘感和好奇心。而比这些更大无数倍的好奇心乃是生性严厉、终日伏案、不苟言笑、体形胖大而规行矩步的父亲，将怎样去使用这些玩意儿呢？球场当然是自己家里的四合院。对手呢？十七八岁的哥哥虽然有两个，但不知是他们对于网球运动尚未窥门径呢，还是慑于父亲的尊严而不敢和他老人家成为竞赛伙伴一比高低。于是，这项任务便落在当时在北京大学住读的堂兄杨伯峻身上了——当然还得等到他有时间来我家的时候。我焦灼地等待着，激动地盼望着，想看到父亲怎样由一个令人生畏的威严的化身、一个终年禁锢在书斋宝座上的偶像，而变成一个驰骋球场的活生生的人呢？我相信怀着这种心情的决不止我一个，肯定包括我们全家。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球网系在

院中树干上，全家男女老幼和佣人们都在旁边围观，其紧张热烈的气氛，绝不亚于世界的网球迷们欣赏温布尔登大赛。运动员上场了，父亲不失斯文地把长衫掖在腰际，挥拍上阵。我们对网球运动完全是门外汉，但见他们把球儿打出去，对方总是接不着，不断地落空，徒劳地奔跑，弯着腰，低着头，没完没了地寻球捡球（两人都是近视眼，还得观众帮忙），始终未曾出现过精采纷呈的场面。不但打的人非常劳累，看的人也十分辛苦。比赛的结果如何，已不遑计及，但从此以后，运动员便告挂拍，白色的球网从此便扔在小屋的废物堆中蒙尘去了。

这便是我一生中仅知道的父亲的一次体育活动。

一个爆炸性的大新闻！父亲买了一架旧留声机，附带一些旧唱片。什么谭鑫培、刘鸿声、龚云甫、梅兰芳、程砚秋等京剧艺术大师的著名唱段。父亲居然对京戏发生了兴趣！一个晚上，父亲和母亲、母亲的干妈带了我（获此殊荣，兴奋可知），分乘人力车直奔旧刑部街哈尔飞大戏院。到剧场坐定后，灯光下看到父亲胸前抱着一个好大的包袱，我想大概是衣服什么的吧！旧社会一晚上要演六七出戏，前面的自是无名之辈；及至名角出台，父亲才打开了腿上的包袱。天啊！里面足有二三十本“戏剧大观”“戏考”“大戏考”之类的书。原来父亲听戏也像做学问一样的认真，决不满足于囫囵吞枣地去欣赏那或低回婉转或响遏行云的绕梁三日之韵，而是要一丝不苟、逐字逐句地去对照着听、对照着看，于是把书匆匆分发给我们，要我们赶快把台上演出的剧目戏词找出来。可惜书带得太多了点，一时无从下手。

“在哪本呀?”

“在生部吧!”(指以生为主角的剧目分类)

“不对，是在旦部。”(戏中生、旦并重、难以区分)

“啪啪！啪啦!”有书从腿上掉下去了，我得钻在坐位的狭小行间和看客的腿脚缝中去摸索。“蠢死了，快点啰!”

“好了，找到了。”

“怎么唱的和书上有些不同呢?”

父亲生性急躁，我们在他的催促下，弄得手忙脚乱，而且交头接耳，叽叽喳喳，不免影响了四周邻座，引起了各方的不满和抗议。唉！这样的看戏，简直叫受罪呀！幸而父亲的京戏瘾头就此昙花一现，从此又回到书斋，不再作顾曲周郎了。

这就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一回陪父亲上戏院欣赏戏剧的活动。

父亲除了去授课外，终日独处书斋，从不与孩子们接近或稍假以辞色。每天全家相聚的时刻是在晚餐桌上，还得严守“食不言”的古训，不许出声。平

时，孩子们在院子里嬉笑玩耍，偶然声音大了点，也会遭到严厉的训斥。可是，父亲对朋友、客人，又是多么的热情啊！高谈阔论，神采飞扬，还不时发出爽朗宏亮的笑声。

父亲自幼家境清贫，所以一生生活简朴，除买书外，非常节约。对孩子们的零用钱，简直到了极其吝啬的程度。记得我读初中时，为了要缴郊游颐和园的一元钱，曾流出了多少伤心的眼泪啊！可是，父亲对于他的学生又是何等的慷慨大方！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父亲从北京到回到家乡湖南大学任教。因战事，湖大迁辰溪，敌机又数次轰炸湖大校舍，父亲的几种书和棉被亦被焚毁，我家就搬到距学校数里的马溪居住。那时空袭警报频仍，有时一日数起，中文系的学生总是到我家来躲警报。抗战期间，教授生活非常贫困，可是开起饭来总是一大桌人。对那些家乡沦陷，与家庭失去联系的学生，父亲亦给予经济上的援助。解放后，生活转丰，更经常接济有困难的学生，甚至泽及早期门生的后人。

父亲执教数十年，门墙桃李，何止百千，不论是对本校学生或素不相识的执经问义的好学之士，都一概谆谆教导，诲人不倦。并对他们的工作、谋职、生活以至婚姻等无不关怀备至，竭力相助。而对于儿女们仅是在避地乡居的一个暑假里，教了几首唐诗和一篇《桃花源记》。

幼时不懂事的我，曾多少次不无遗憾、不无羡慕、不无怨怼，更不无痛苦地感到父亲的爱心、笑容和话语给予别人的是那么多，而给予我们的又是多么少啊！在若干年后，尤其是看了父亲的回忆录后，我才逐渐体会到父亲那种严厉、含而不露的独特方式的爱。是的，孩子们是自己的，就在家里，近在身旁，等工作稍闲时再去尽情地爱抚吧。可是，时间对父亲来说永远是那么不够用，对学术的追求和探索占据了他的全部身心。就这样，年复一年，孩子们终于都长大了，一个个走上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若干年后，父亲的著作等身，誉满学坛，受到了政府和人民的重视，受到国内外学者专家们的景仰和高度评价，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英才俊彦，为祖国、为人民、为人类历史、民族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一个愚蠢的小女孩因渴望亲情、渴求理解而感到孤寂的童年是多么的无知与自私啊?

父亲那锲而不舍，好学不厌，孜孜以求，终身不辍的顽强治学精神是认识他的人所共知的，也镌刻在儿女们的心中。不论是在抗战时期，生活困难、营养不良、贫病交加的日子里，还是在风雨如磐、黎明前的漫漫黑夜中，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万象更新、精神振奋的欢乐时刻，他都是每晨四五时即起，在微弱的煤油灯下（在辰溪和刚光复的岳麓山，家中都没有电灯），开始一天的工作。父亲像是一位淘金者，淘洗着、筛选着每颗金色的微粒。父亲是一个潜水人，

在浩翰无涯的知识海洋中，采集着闪光的贝壳和明珠。终于有了收获，受到了尊敬，得到了荣誉。但这只是他辛勤劳动的结果而不是目的。他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个人；恰恰相反，而是为之奉献出全部自我，摒弃了生活中享受，付出了家庭的天伦之乐。

上了年纪的父亲，对儿女们慈祥了，常希望大家团聚在他身边。对于孙子们一辈，更是如此。每天在繁忙的工作中，也要抽出几分钟来逗弄玩笑一阵，是一位慈爱的老祖父。

父亲晚年，仍一如数十年来的老习惯，每早天不亮就在灯下工作。由于目力使用过度，左目几近失明，右目也视力很差。看到他紧眏着一只眼睛，一只手拿着书，鼻子几乎碰到书页上，另一只手拿着放大镜紧挨在近视镜前上下移动着的吃力情景时，真叫人揪心。为了能使他老休息一下，家人买来了留声机和唱片。他为了不过拂人意而勉强听了几支歌曲之后，就再也置之不理了。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取代他手中的书、笔、放大镜。别人看着痛苦，他却乐此不疲。

解放后，父亲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毛主席来湘，数次召见了他。毛主席还多次写信勉励父亲。1955年9月，父亲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毛主席接见和宴请了他，父亲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并参加了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学术会议，承担了哲学研究所笺注《盐铁论》的课题。回湘后，父亲不顾身体有病，更加勤奋地笔耕不辍。原定为期一年的工作，在短期内即初步完成，只剩下最后的加工润色了。1956年2月，突患脑溢血和消化道出血，遂卧床不起；口不能言，完全处于昏迷状态，如此数日。在弥留前的深夜，我未入睡，于万籁俱寂中，忽然听到他突然并发出断续而模糊的声音：“我…还有…事情…要做呢！”这是指《盐铁论》要做的最后润色工作而言。这是他老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在病魔与死神的胁迫下，他在抗议，他不甘屈服，他不能接受病魔强加给他的休息。

暮色中，至善村前，麓山门一带的黄土马路上，再也看不到散步老人的身影了。一个永不知道休息的人，终于获得了他一生中最后的、永恒的休息。

怀念我的父亲杨道馨

杨得琳

我的父亲杨道馨，字鳣堂，湖南津市人。1886年（丙戌年）7月27日生，1934年（甲戌年）6月27日卒，终年48岁。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为推翻清朝帝制，创建共和政体，艰苦斗争，不遗余力。

我父亲早年从事反清活动，被清政府捉拿甚急，曾亡命日本，进入东京政法大学，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钻研革命理论，寻求救国良方，和当时亡命在日本的同盟会会员黄兴、宋教仁、覃振、程潜、林修梅、林伯渠、周震鳞、杨熙绩、胡汉、仇鳌、唐有壬、黄贞元等共同致力于反清斗争，鼓吹民族革命。（以上父辈，我都见过。他们的子女，大半是我的同学好友，现在健在的还通信联系）

我父亲回国后，为革命奔走于粤桂间，曾任南宁府学堂英文、格致等科教席，后被擢升为监督。革命党人黄兴等攻打两广总督府时，我父曾亲身参加。但因弹尽药竭，功不果成。广州起义之后，我父亲出任广西省桂林市女学堂校长，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袁世凯背叛民国，倒行逆施，刺杀宋教仁于上海火车站。黄兴在南京任讨袁总司令，蒋翊武在广西联络以为响应。我父亲参与同行，并曾劝蒋莫穿军服。当巡防营捉住蒋时，初以为是唐蟒，后询知其为蒋翊武，而袁世凯又正在悬赏通缉蒋翊武，因而被清巡抚杀害于桂林丽泽门外。当时我父亲迅速改道避走，幸免于难。

不久，我父亲从广西回到湖南，当选为湖南省议会议员。林伯渠、胡毓贞等同选为湖南省议会议员。我父亲当即为蒋翊武请葬于长沙岳麓山，并为修墓主祭，为其遗族请准发给抚恤金。

1913年，汤芗铭任湖南都督，是袁世凯的心腹，诬国民党人为“乱党”，革命志士惨遭杀害，三湘四水间，顿时腥风血雨，天昏地暗。我父亲奔走湘南联络，游说边境驻军，为驱汤运动曾尽全力效劳。

1917年秋，零陵镇守使刘建番和驻衡永间的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联名宣布独立，接着，湘西镇守使田应诏和张学济、胡瑛、林德轩、周则范

等也都宣告独立，拥护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当时我父亲被任命为辰溪县知事。驻军司令是胡瑛，副司令是萧培阶，参谋长是赵植棠，我父亲曾参与戎幕。

1920 年春，我父亲由辰溪回到长沙，与覃振、易象等为了拥程（潜）倒赵（恒惕），日夜奔忙，在离升门寓所秘密办报发报。我和大姐杨得琼也参加折贴滚卷报章等宣传品。不料事机泄露，赵恒惕将易象等 9 人捕去杀害。当日凌晨，我父亲匆忙离家，避难于日本领事馆，嘱我母亲熊必麟率我姐弟妹及林伯渠长女林秉衡，乘日本商轮赴汉口。上船之后，乃至傍晚临开船前，我父亲才化装登上日本商轮。到达汉口后，与覃振相会于旅馆，见面时，覃振正在洗脸，我亲眼看到他用手拍自己的后颈说："这个脑壳算留下来了。"我父亲说："我们脱险了，可是他们（指易象等 9 人）却牺牲了!"旋即一同到上海。

居沪不久，我父亲和林伯渠、覃振、程潜等应孙中山先生电召，由海道赴广州。1921 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就任非常大总统兼陆海空军大元帅。覃振被任命为总统府参议兼法制委员，我父亲被任命为总统府简任谘议，林修梅被任命为总统府代理参军长。林因患牙病不幸在广州逝世，孙中山先生异常痛惜，下令追任林为陆军上将，举行国葬，在广州举行追悼会，到会人士 1 万多人，每人分发《林修梅遗著》一册。我父亲亲身参加追悼会并得遗著一册，至为悲痛。

当时是革命人士的大会师，革命组织庞大。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出师北伐，孙中山先生由粤人桂督师北伐，我父亲随北伐军到达桂林。因陈炯明叛变，大元帅在广州蒙尘于海珠永丰舰上。当时覃振负责党务，恢复国民党组织，成立了国民党湖南支部筹备处，着手发展组织。我父亲受命为国民党湘支部筹备委员，由桂林回到长沙。

1924 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成立中国国民党，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革命军北伐，熊克武将军驻节湖南省石门县，参谋长是赵植棠，覃振也在石门，我父亲就任石门县知事，为革命军运筹粮秣。与此同时，黄贞元亦在湖南常德任府尹。

1925 年春，我父亲应覃振、程潜等之邀赴上海，与程潜对门而居，朝夕过从甚密。3 月 12 日，不幸孙中山先生在北京与世长辞，举国哀悼异常。

1927 年，我父亲由上海到汉口，住金台宾馆。此时为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我父亲和林伯渠、覃振、于哲嗣、唐蟒、唐有壬等都是同盟会老会员，辛亥革命的老战友，经常在一起聚集往来。我大姐杨得琼在武昌妇女部蔡畅部长领导下任干事。我在长沙第一高级中学读书，每个同学都以生龙活虎般的热情投入火热的革命洪流之中。正在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中，1927 年 4 月 12 日，

蒋介石叛变革命，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之中。湖南反动军阀与国民党右派也在长沙发难，许克祥叛乱，制造"马日事变"，许多革命青年惨遭杀害。我即离开长沙，乘火车到达汉口。同班同学刘千昂（后改名刘昂）也到了汉口。她住在青年里，即她姨父李富春、姨母蔡畅的家里。我们经常往来（去年为了纪念她舅父蔡和森，她曾来湖南并到过我的家里）。这次我和父亲住在一起，汉口夏天炎热，晚上在马路上乘凉，常常畅谈到凌晨，谈时事，谈国情。使我难以忘怀的是，我父亲曾说过一句话："共产党一定会成功的。"

不久，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浩浩荡荡从汉口开向九江，准备进行南昌起义。父亲、大姐和我三人一同回到长沙。我父亲在长沙曾患伤寒重病，历时数月始告痊愈。

1928 年，我父亲回到津市原籍。当时虽有杨熙绩劝之入粤，并云："忆昔东渡，尚有几人?"且赋诗言志；覃振在宁，函电交驰，促其出任要职。父亲均一一婉辞谢绝，只专心致力于办工厂、学校、任湖南津市九澧贫民工厂厂长、湖南津市澹津女校校长。家中古书不下数万卷，书籍叠及天花板，终日圈点古书，忙于书斋。

1934 年夏，父亲在澹津女校校长任内，因举行毕业典礼时，到校演讲厅会餐，吃了不洁之食物，回家即患痢疾，仅七天时间，即与世长辞了。

当时我尚在日本奈良女子高师留学，得知父亲病重消息，迅即从海外驰归。船抵津市码头，诸妹相迎。当我低头看到她们脚上穿着孝鞋，立即昏倒。回家匍匐灵前，悲痛欲绝。千里迢迢，奔驰到家，竟未能和我亲爱的父亲作最后的诀别，至今犹抱终天之恨。

记黎锦熙

谌震

提起黎锦熙先生（1890—1978年），许多人知道他是语言学家，却忽略了他对方志学的贡献；许多人知道他与毛泽东谊兼师友，却不清楚他对青年毛泽东有何重大影响。

黎锦熙是湖南湘潭人。字劭西。16岁中秀才。1911年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学校史地部。民国初年，他在湖南非常活跃，既任师范学校教员，又先后任湖南两家大报《长沙日报》和《湖南公报》主笔[①]，还应省立编译局之聘，编辑中小学课本，与友人创办《公言》杂志和宏文图书编辑社，并且成立一个哲学小组，吸收优秀的学生参加，其中有毛泽东。

1915年9月，他到北京教育部任职，编辑中小学教科书。1916年10月，北京成立"国语研究会"，蔡元培当选会长，黎和钱玄同都是该会的发起人和委员。1920年起，他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直到逝世为止，前后近60年。抗日战争中，北京师大迁到西北，与其他几校组成"西北联合大学"，后来又单独成立西北师范学院，他曾任院长。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在北师大迁回北平、恢复校名等问题上处置失当，激起学潮，黎锦熙只得暂到湖南大学任教。1948年回到原校。平津解放前夕，蒋介石派人送上飞机票，他拒绝去台。1945年加入九三学社，解放后，曾几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但他始终未离开讲坛，终年89岁。

"为最大多数谋最大福利"

黎锦熙治学，目的是"为最大多数谋最大福利"。在他看来，中国人的最大福利就是普及教育，让大家都有知识，都有觉悟，都能奋发图强。因此他从1915年起，主张"言文一致"（普及白话文）和"国语统一"（即推广普通话），发起"国语运动"。这与胡适、陈独秀倡导的文学革命，可说是目标一致，相辅相成的。不过他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偏重于学术研究罢了。在五四运动爆发后，"国语研究会"的会员由1 000多人猛增到9 800多人，可见其

切合国家的需要和时代的潮流。

黎锦熙的著作有30多种，另有300多篇论文，涉及文史哲多方面，而以语言学为主，博大精深，难以概述，这里只能简述其社会影响。一是语法方面。中国向来不重视语法，清末才有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但那是研究文言文的。五四时期有人说：有新文学，但没有新文法。黎锦熙决心弥补这个缺陷，搜集大量的书面和口头资料，于1924年出版了第一部白话文的语法书《新著国语文法》，其中有许多创见，因而大受欢迎，再版达24次之多。其次是在语音方面。由于他和钱玄同、吴稚晖等人的努力，1918年教育部公布了"注音字母"，1923年他们又拿出"国语罗马字"方案[②]，以代替那沿用千余年的"反切"法，它与后来的"拉丁化方案"，同为汉语拼音奠定了基础，为语文教学、中外文化交流，开辟了方便的途径。1935年，又因他们的努力，南京政府教育部曾公布一批简体字324个。所有这些，都是从中国最大多数人着想，谋求中国文化教育的普及。

黎锦熙等研制"国语罗马字"，目的不仅是要取代"反切"，而且想以拼音文字代替方块字。几十年的经验证明，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在20世纪90年代汉字进入电脑以后，汉字的主要缺陷已经克服，汉字的优点反而突出了。这是当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结果。我们决不能因此而责备前贤，何况他们经过多年辛勤探索的汉语拼音，仍然是我们不可缺少的工具呢？

黎锦熙既是从最大多数人的福利出发，所以他在学术上从无门户之见。研制"国语罗马字"的过程中，曾有两派之争，"京音派"主张以北京话为标准，"国音派"主张照顾到全国现状。黎锦熙认为两派的歧异很小，只涉及"统一国语中'八十分之一'的小问题"，应从大局出发协商解决。后来左翼人士又从苏联引进"拉丁化"方案，说"国语罗马字"是资产阶级的。黎锦熙则认为，两种方案目标相同，只是罗马字失之太繁，拉丁化失之过简，后来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比较完善可行。他在兰州任职西北师范学院时，环境极为艰苦。有人劝他：老师是第一流学者、部聘教授[③]，这块金字招牌挂在那儿也受欢迎，为何偏要挂在这穷山恶水的破庙里？他一改平时的和颜悦色，严肃地回答：我这块金字招牌就是要挂在这破庙里！西北教育落后，开发的责任叫谁来担当？学生听了，都有愧色。

抗战建国的第一步

1938年春，西北联合大学从西安迁往陕南，师生千余，大都步行，越秦岭，到达城固县。一时还无法上课，千余人闲着，怎么办？黎锦熙便出了个点子：修志！这事得到城固县长余正东的全力支持，他本是黎的学生，就请黎主

持此事。黎写出一方案，得到学校师生和地方官绅的赞同。于是1 000多师生纷纷下乡调查研究，取得了丰富的资料。可惜余正东不久调离城固，继任的两位县长都任职不久，城固县志未能修成。但是他的修志方案却引起国内的重视，遂以《方志今议》为题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当时国共第二次合作，曾在“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方志今议》的序言说：“抗战建国，我以为文化界中人要真正负起责任来，第一步工作，就是给所在的地方修县志。”为什么呢？因为修志就是调查研究地方情况的过程，也是师生从实践中学习和运用所学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也是向人民宣传抗战建国的绝好机会。那时内迁的学校和文化机关很多，如果都能够像西北联大那样，利用各种空隙时间下乡调查研究，其效果将会何如呢？可惜国民党害怕动员民众，所以像西北联大这样的修志活动，在当时恐怕是绝无仅有的，而且遇到重重困难。师生下乡后，“问其年龄人口，则疑将按户抽丁；问其生产职业，则疑将派捐加税；问及地方情况，则疑是某机关派来圈地者；访之士绅保甲，亦多秘而不宣，以为外路人结队来此，问东问西，意欲何为也。”但这些情况正从反面证明：要抗战建国，文化界就必须深入民间，一方面了解民情，一方面唤起民众。《方志今议》把修志看作是文化界“抗战建国的第一步工作”，实在是有远见的，远超过旧时的修志理论。

过了两年，余正东升任陕西省第三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他对修志极为热心，很想贯彻《方志今议》的主张，修出几部新型的县志。他所管辖的6县，都在陕北，地瘠民贫，如洛川县人口不满6万，“山原无林，川沟无水”，其贫困可以想见，何况在抗战时期！然而由于余正东有决心，有办法，全区绅民支持，黎锦熙尽力支持，推荐高手参加，稿成后由他校订，在几年之间，先后修成洛川、同官、黄陵、宜川4部县志。1986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辞典》，收录其中3部，认为都是佳志。《宜川县志》“篇目、内容与载述方法，较旧志不同。气候、人口、工商、社会、财政、军警、司法、党团、卫生诸志为旧志所无。载述方法较为科学，如‘人口志’分为动态之分析与静态之调查，‘气候志’分为气候区域、气象、物候、气节、暑候。…… 对于旧志所载，经采摘后分别纳入各志之中，求‘新旧冶于一炉’”。《洛川县志》的特点之一是重视方言谣谚，“包括方音谱、方言分类词汇、俗语类征、歌谣小集等小目，约6万字。”《黄陵县志》“于黄帝陵及相关事实多作叙述，表现了地方特色。”《黄陵县志》付印时，日寇方攻陷洛阳，进逼潼关，西安机关工厂学校纷纷疏散，承印县志的印刷厂也奉令拆卸机件，准备天亮就撤退，夜半忽从前线传来胜利消息，于是县志得以顺利出版。在抗战时期能修成这样有创见有特色的4部县志，真可说是文化界一项奇迹。《方志今议》附录了有关4志的序言，其中总结的经验和建议，很可供后来修志者参考。这不仅是黎锦熙对方志学的贡献，而且也表现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奋斗精神。

青年毛泽东的“慈母”

民国初年，黎锦熙在湖南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任教，毛泽东是他的学生，但师生的年龄相差仅3岁，课堂下常以兄弟相称。据黎锦熙日记，仅1915年4月至8月，两人交往即达19次。黎去北京后，两人继续通信。解放后，黎锦熙将他珍藏多年的毛泽东书信6封以及在北京主办“平民通讯社”的新闻稿捐献国家，成为研究毛泽东早期思想和革命活动的重要资料。

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极表敬仰和感激之忱。1915年11月9日的信中说：“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1920年6月7日信中说：“先生及死去了的怀中先生，都是弘通广大，最所佩服。”1917年8月23日的信中，更说“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这些都是出自肺腑之言，因为他在信中对黎简直是推心置腹，端出全部的思想向黎求教。如1917年这封信长达3 000多字，谈哲学，谈社会，谈学校，对于孙中山、袁世凯、康有为都评价不高，而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如果不是毛泽东的亲笔，谁能相信这位革命家曾经如此佩服镇压农民运动的曾国藩呢？信中又说：“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又如1920年6月7日信中说：“旅京湖南学会”是个“混合的团体，很不容易共事，不如另找具体的鲜明的热烈的东西，易于见效，兴味较大。我觉得具体、鲜明、热烈，在人类社会中无论是一种运动，或是一种学说，都要有这三个条件。无之便是附庸，不是大国；便是因袭，不是创造；便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把这些话向黎锦熙倾吐，可见其相知之深。

毛泽东在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洋洋两千字，转述了黎锦熙的治学之道。此信开端即引孔孟和朱熹之言，认为黎正是他们所说的博学，“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而且“条理加详密”，“入手之法，又甚备而完”。毛泽东原来想在深山攻读古籍，打好基础，“然后下山而涉其新。”黎锦熙说这是“先后倒置”，认为“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没有通识，不了解社会情况，就会钻入死胡同。黎又指示语文、史地、体育、美术各科的功用与学习要领，并介绍他读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此书是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尔（182～1903年）所著《社会学原理》的摘译，强调用科学方法研究社

会现象。毛泽东读后，抚卷叹曰："为学之道在是矣！盖是书名《群学肄言》，其实不限于群学（社会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最后又谈到国学，并且对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一书极为赞赏。认为曾与黎与斯宾塞尔的为学之道都是相通的，而感慨"当世诸老艺生"虽或精于专业，但大都缺乏常识，"暗于通宗"！从这封信可见黎锦熙对于青年毛泽东确有重大影响，至少是把他从故纸堆中引出来，把目光射向世界。

本馆成员的早期革命活动

俞润泉　辑录

毛泽东同志手创的新民学会成立于1918年4月17日，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为宗旨，以后经过讨论，毛泽东同志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怎样对中国和世界进行改造呢？后来有了不同的意见。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主张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1920～1921年，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相继成立，新民学会就自然地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停止了活动。这个我国早期的革命组织，3年多共发展会员70多人。

在历史的长河中，尽管各人的经历不同，新民学会会员除个别人外，绝大多数都对中国革命作过一些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们中的一些成员除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外，从事教育和文史研究工作的也不乏其人。例如参加本馆工作，或为领导、或为馆员的就有5人。他们在参加本馆工作后，意气风发，回忆自己年轻时代的峥嵘岁月，都写了新民学会的回忆文字，有的未正式发表，仅存于本馆的历史档案中。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共中央、中共湖南省委陆续地公布了一批历史文献，更加丰富了对新民学会的研究资料。

曾为新民学会会员、后为本馆领导或馆员的5人是：

刘明俨（1900～1977年），涟源人，字望城，后名刘若云，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地下革命斗争，多次入狱。解放后，他先任过涟源县县长、湖南省教师进修学院院长、湖南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

陈书农（1898～1968年）：长沙人，字启明，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长期从事中学、大学教育及其他工作。1953年入本馆为馆员。

蒋竹如（1899～1967年），湘潭人，字集虚，长期从事中学教育工作，1953年入本馆为馆员。

李思安（女）（1892～1975年），长沙人，字钦文，曾长期在东南亚从事华侨教育工作。1953年入本馆为馆员。

周敦祥（女）（1898～1980年）：长沙人，字朓如，曾长期在东南亚从事

华侨教育工作。1953年入本馆为馆员。

现在我们将他们留下的文献资料和回忆文章辑录如后：

1. 文献资料

刘明俨于1920年9月15日给毛泽东的信；

李思安于1920年8月19日给毛泽东的信；

毛泽东于1920年11月25日给李思安的回信。

2. 回忆文录

陈书农：《回忆新民学会情况》；

周敦祥：《女界钟》；

李思安：《回忆驱张运动》；

蒋竹如：《湖南学生的反日驱张斗争》。

刘明俨给毛泽东的信

润之兄：

相对忽又四个月了，这四个月中，在中国可算演了几出很大的新戏，你看得也有趣么？但是，可怜的小百姓，又有一部分免不了要搭着吃亏哩！

至于法国这方面的情形，因我是瞎子又是聋子，所以没有什么相告。就是“自己”也不过每天吃几块面包，算是上帝命我来收一份粮的职务罢了。我们在半淞园照的纪念片已收到了，劳你寄来，谢谢！今由子升兄带回银洋一元，作为洗印费，乞察收。

不多说了，以后乞多时赐教言是盼。就此顺祝

近好

弟　刘明俨

九年九月十五日

（民国九年即1920年）

李思安给毛泽东的信

润之先生：

十二号平安抵沪，预备二十二日动身，没有英法船，只好乘日本船，且价较廉。因我在长沙和你商量借款的地方，都失望了，所以萧君想搭三等舱，不过四十元。但是费用实无从减省，昨日又向谭常恺君商量在合作银行借了三十元，今日去取。萧君若要时，还是分一点把他，不然，我也不敢动用这多，恐欠多了账，难于偿还。

近阅报载南洋来函，说英政府要取缔华侨学校。唉！这个信一来，于我们

的行，不免有点气馁咧。不过还是决意前进，无丝毫退缩意，请放心。以后望你常常指教，使我在黑暗中得线光明。

《湘江评论》出版吗？前日和毛飞君谈话许久，望你在这时候快些做几篇文章，将改造湖南的意见大大的发表，乘得一班伟人们的势力尚未十分巩固。不然，时机一失，难再得了。（下略）

思安上。

九年八月十九日。

毛泽东致李思安

钦文姊：

你这信我八月里就接到了。后来还接到你在新加坡寄来的一封长信，并一些印刷物。很感你的厚意。我因事忙，没有即答，想能原谅我罢。《湘江》尚未出版。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好的。大伟人虽没有十分巩固，小伟人（政客）却很巩固了。我想对付他们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们，由我们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到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你以为然么？你事务谅是忙的。我劝你总要有时间看一点新书报，并且希望你能够继续省察自己，能够知道自己的短处。你前信嘱转集虚，已转他看了。有暇望告我以近状。

弟　泽东。十一月二十五日

陈书农的《回忆新民学会情况》

新民学会成立前有个酝酿的过程。二三年前，毛泽东同志还在第一师范读书，为了寻找朋友，发表了一篇“嘤鸣求友”启事，内容记不清了，解放后有一个记载，周世钊可能记得。罗章龙就是见启事而认识毛泽东同志的，李立三也算半个朋友，以前在校内早就有联系往来。

新民学会成立我记得是1918年（民国七年）4月7日，星期日，我的一篇日记有过记载。有的人说是七月份，那是完全错误的。我清楚地记得开会时，蔡林彬门口一棵桃树开满了花。开会前是口头通知，分头去的。有十三人参加会议。毛泽东、蔡和森、肖三、张昆弟、罗学瓒、陈昌、熊光楚、萧子升、罗章龙、邹蕴真、陈书农、何叔衡，还有一个记不起来了。会上通过了章程，章程的宗旨记不清了，大体是探讨学术，商量国家大事，做人的方法等。这些都是有文字记载的。章程不太长，是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事先和大家商量了的。因此在通过时没有发生争论，只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就一致通过了。当

时我也是学会干事之一，萧子升是总干事。从此，新民学会正式成立了。

后来发展会员，只要本人申请，彼此同意，由领导机构批准即可入会，发展的速度是较快的。1919年11月16日周南女校会议，欢迎新会员入会，会员都学联会中较积极优秀的同学。会后照相留影共四十一人，我认识二十八个人：贺延祜、易克穠、李思安、任寿鹏、蒋竹如、周敦祥、李云杭、唐耀章、陶期咏、毛泽东、陈纯粹、周世钊、魏璧、熊梦飞、钟国陶、陈书农、黄胜白、劳启荣、匡日休、喻恒、彭璜、熊瑾玎、何叔衡、罗宗翰、夏曦、钟秀、张怀、萧青野。

新民学会在五四运动中起作用很大，很多革命活动都是通过学会筹划领导的。开始活动是半公开的，五四时就完全转入地下。《湘江评论》是学联的刊物，但主要文章都是毛法东同志写的，蒋竹如写杂感，我写日本等国的一些新闻，校对等都是由我、蒋、毛三人搞，文章都是送到落星田学联会编出。出版后，毛泽东同志自己拿到街上叫卖。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上，毛泽东同志提了一百个问题（具体内容记不清），可能发表在《湘江评论》第五期上。毛泽东同志写了一首白话诗，叫《我不要发》，发表在《湘江评论》上。湘江学校出版的《新湖南》，恰是龙毓莹主编的。《湘江评论》被动封后，毛泽东同志主编《新湖南》，继承了《湘江评论》的革命精神。

毛泽东同志第一次从北京回长沙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思想已明朗化了，但当时没有作为学会宗旨提出来。

"驱张"是五四运动后学会进行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毛泽东同志由北京到上海后，曾写了一封信回长沙，说他在上海靠洗衣服维持生活，而洗衣服的钱大部分花在车上了。此信可能落在陈夙荒（当时楚怡校长，新化县人，已死）手里。

毛泽东同志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是非常灵活的，这里有两个例子：徐庆誉是一个基督教徒，我们没有让他参加新民学会，在驱张运动中，毛泽东派他去常德冯玉祥请愿，因为冯玉祥也是基督教徒；易礼容是商专毕业的，熟悉经济工作，毛泽东就要他去担任经济工作。

1921年夏季，新民学会自行解散。在解散之先，毛泽东与萧子升发生过争论。毛泽东对萧子升说："你是跟我们走？还是当一辈子绅士？"毛泽东主张解散新民学会，萧子升不同意。新民学会解散就有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

周敦祥的《女界钟》

那是六十年前的钟声，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省的轰鸣。它的创刊是根据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由我和劳君展、魏璧三

会友办起来的。它作为《湘江评论》的补充，发出了湖南女界自己争平等、求解放的怒吼。

记得1919年7月中旬毛泽东同志主编的《湘江评论》出版了，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这样写道："我道，女子本来罪人，高髻长裙，是男子加于她们的刑具。还有那脸上的脂粉，就是黥文。手上的饰物，就是桎梏。穿耳包脚为肉刑。学校家庭为牢狱。痛之不敢声，闭之不敢出。……"这是对当时妇女生活的写照，句句都说到我们心上！多少年来，虽然有人议论过女子问题，同情女子的遭遇，但只是叹息几句，埋怨命运而已！毛泽东同志用锋利的笔，只几句就描绘出女子的痛苦情景，指出革命的道路。《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连续刊登了《民众大联合》的文章，其中谈到女子的小联合，他十分同表女子的遭遇，鼓吹女子解放。文章说："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们参政？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们交际？""什么贞操，都只限于我们女子，烈女祠遍天下，贞童庙又在哪里？"他号如召妇女们联合起来革命，摧毁那吃人的旧礼教。它强烈地激动着我们的心弦，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可是只出了四期便被封闭了，大家感到十分痛惜。

一天我们议论着这件事，有人说："《湘江评论》停刊了，我们不能换个名字出版吗？"

"对，我们就出个女子的刊物吧。"

这个意见很快就得到大家的赞同。起个什么刊名呢？我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一个同志提议，叫《女界钟》吧！钟声是唤起人们的声音，女界钟又是唤醒妇女的声音，这是多么合适的名字啊！事后大家推选我当总编辑，可是我还是个学生罗！学历浅，没有经验，心里总感受到害怕，总怕办不好。

劳君展的《新民学会的有关回忆》

我们在周南办了《女界钟》，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宣传妇女解放，反对娶童养媳。陈启民老师是主编，毛泽东同志很支持，他在《女界钟》上写过文章、诗。周敦祥、魏璧都写过文章。

有一天我放了学回家，正在为办《女界钟》发愁，不想毛泽东同志听说我办刊物还有些胆怯，特意前来鼓励我。他说："你怕什么，好好搞吧，我们支持你呢！"《女界钟》有了这个有力的支持，我的胆子壮起来了，大约在10月下旬终于出版了。这是湖南省妇女界的第一声呐喊，它在长沙城里长鸣！

从此《女界钟》就担负起向妇女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任务，唤起更多的妇女冲破孔孟之道、"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藩篱，走上为自由解放而斗争的道路。毛泽东同志不仅勉励我树立信心，而且给这个周刊写文章，支持把

它办好。记得他给《女界钟》写的第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论述妇妇要实现经济独立，这篇文章是为赵五贞自杀而出特刊写的。

赵五贞是一位年轻姑娘，在五四运动倡导的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下，她不满于封建包办婚姻，在被迫出嫁时，坐在花轿里自杀了。当时我们从调查中知道，她在出嫁时前曾经对她嫂子说过："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做女子真是背时呵！"过门那天，她请求花轿要从住在远一点的南门外的姐姐家门口过。终于，她怀着对婚姻自由的憧憬，在花轿里用剃刀自刎而死。这是对封建包办婚姻的反抗，用鲜血控诉了孔孟之道的罪恶。

这件悲愤的事情发生以后，毛泽东同志建议《女界钟》出一特刊附于《女界钟》第四期，陈启民帮我编辑，陶毅、周世钊等写了文章，主张改革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制度，代之以婚姻自主、自由恋爱。湖南《大公报》也展开了讨论，在先后发表的20多篇文章中，有的不仅提出了要改革婚姻制度，而且涉及到改革社会制度这一根本问题。因此在长沙市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女界钟》在湖南敲响了捣毁"孔家店"，砸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枷锁的斗争钟声。它倡导科学和民主，反对男尊女卑，要求男女平权，教育平等，婚姻自主，社交公开，主张妇女经济独立，同时，反对蓄婢，缠足，向社会上展开宣传教育。记得我们还对一些财主家的婢女作过宣传，结果有一个婢女逃出了火坑，同她心爱的人结婚去了。

妇女解放斗争的钟声，使敌人胆战心惊，《女界钟》大概出了四至五期，就被军阀下令封闭了。但是斗争的钟声却是他们封锁不住的，妇女们越来越多地走上了求解放的道路。有的女同学因为参加争取妇女解放活动而被学校当局"默退"后，毫不畏惧地冲出男女分校的规范，到男校去读书；一些女同学还参加了新民学会……

李思安的《回忆驱张运动》

1918年4月17日，新民学会在周家台子蔡和森家里开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何叔衡、张昆弟、萧子升、罗学瓒、陈书农等十三人。

我是第二批参加新民学会的，即1919年11月新民学会在周南女校开会那次。这次会议讨论了新民学会章程，选举何叔衡和我做正副执行委员长，毛泽东等为评议员。

新民学会在毛泽东领导下，开展许多革命活动，如五四运动时，新民学会请徐特立介绍巴黎和会。1919年11月，长沙发生赵女士自杀事件，毛泽东立即要我们调查。他还亲自写了好几篇关于妇女解放的文章，在当时的长沙报纸上发表，影响很大。我看了，就愈加不满我父亲对于母亲的虐待。

张敬尧的残暴统治，激起了湖南人民的痛恨和反对。毛泽东早在1919年春夏就以新民学会为核心，积极组织驱张运动，为使湖南驱张运动在全国造成声势，获得全国人民的支持，毛泽东决定派驱张代表团分途前往北京、上海等地活动。他亲赴北京。

出发之前，毛泽东选择了一个较为隐蔽的小学（正在修建，可能是楚怡）开会，毛泽东亲自规定以"人格"为口号，与会者要回答口号才准入会场。毛泽东之所以拟定以"人格"做口号，是因为1919年12月2日在教育坪烧日货时，张敬尧骂学生做"土匪"，伤了我们的"人格"，意思是激励大家到会，积极从事驱张运动。当时，驱张代表团思想不统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多数人很坚决，主张立即罢课，直到张敬尧滚出湖南为止。也有少数人摇摆不定，怕误功课，不同意罢课。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鼓励大家满怀信心，勇敢战斗，不要中途而废。

我们1919年12月7日（可能是17日，只记得有个"7"字）分途去武汉。毛泽东提议路上看到熟人不要打招呼，到汉口再集合，这样，免被张敬尧的走狗发觉。记得我和徐瑛在长沙上车，到霞岭（注：可能是霞凝）见到蒋竹如上车。出发之前，毛泽东就同既是长沙明德中学校长，又是汉口明德大学校长的胡子靖联系好了，我们到汉口就住明德大学。在汉口，毛泽东布置我们分途做宣传发动工作，动员旅鄂湖南学生同我们一道驱张，并串联湖北学生支持我们的驱张运动。这样做，不仅使湖南驱张运动声势浩大，而且也促进了湖北学生的反帝反封建运动。

在汉口大概停留十天左右，我们便一同上北京。记得是严寒天，我们在北京过春节，男生住在北大三院附近的马神庙。北京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学生觉悟都较高，他们对新华门当时的徐世昌总统府请愿。我记得，大雪天，我们从一个安了很多电灯的大桥经过，来到总统府前，哨兵的枪都上了刺刀。我们一点也不怕，向他们讲述张敬尧的罪行，争取他们的同情。总统府不接见，我们一连去了好几天。路上，我们议论纷纭，毛泽东也时而插两句中肯的话，时而讲两句诙谐的话。经过几天的斗争，内阁总理靳云鹏的秘书长才不得已答应公民、教职员、学生各派代表二人谈判。毛泽东是公民代表，教职员代表是杨遇夫，我和柳敏为学生代表。记得杨遇夫声色俱厉，拍桌打椅质问秘书长：湖南学生离乡背井，来这么多人，你们为什么不接见？湖南闹得这么凶，你们为什么不解决？秘书长被骂得哑口无言。直到1951年毛泽东接见我们时，还问我："你还记得那次到新华门坐冷板凳吗？"

请愿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还得靠群众自己起来斗争。在毛泽东的布置下，我们在湖南会馆召开在京湖南学生大会，还把躲在北京的13个湖南议员拖到

会场，要他们签名同意我们驱张。记得毛泽东当时身穿黄呢子大衣，揭露了张敬尧的罪恶，讲了湖南人民的痛苦，并表示坚决跟张敬尧斗争到底，直到张滚出湖南。彭璜接着发言，我第三个讲话。本要我讲张敬尧烧株洲的罪行，因我讲话不喜欢别人限制，要求不出题目。毛泽东说，那好吧，就随便讲。我上台发了一通议论，台下好多人还流了泪。1951年毛泽东接见我时，还谈及此事："你还记得那次在湖南会馆讲话，慷慨激昂，义愤陈辞吗？"

在北京，我们举行了驱张示威游行，参加的人很多，队伍前列有许多揭露张敬尧罪行的大牌子，记得有"祸国害民的张敬尧""贩卖鸦片的张敬尧"等，还把在武汉车站拍摄的张敬尧贩卖鸦片的照片拿出示众，使张声名狼藉。

毛泽东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平民通讯社，宣传驱张运动，以此大造舆论，使张敬尧在全国比狗屎还臭，真成为过街老鼠。

1920年2月，毛泽东派我同柳敏、陈纯粹去广州，希望孙中山用武力支持我们的驱张运动。当时粤汉路不通，我们只得绕道由上海再到广州。刚到上海，我们收到北京的信，说上海即将召开全国第三届学生代表大会，要我们不去广州，参加全国学代会，并要我们在会议期间，抓紧时机，努力活动，控诉张敬尧的罪行。出席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的都是全国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三届学代会未结束，毛泽东也到了上海，立即邀请全国学生代表、留法预备团和驱张代表团到松社（蔡松坡读书地方）举行茶话会。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希望全国青年继五四运动后，能像湖南驱张运动一样，立即掀起一个反帝、反封建运动高潮，并鼓励大家不要怕，勇敢斗争，回去好好干。还劝勉赴法学生好好学习别国经验，回国后更好地革命。我记得，会后，我们几百人围成半圆形坐在草地上摄影留念。

在上海半淞园举行了在沪新民学会会员大会，讨论了新民学会的宗旨及今后活动。会后我们也照了相，就是我家里挂的那个半淞园照片。

毛泽东在上海住安南路民厚里二十九号，他常到环龙路四十四号医院里找孙中山交谈，也找过廖仲凯。

我记得，当时上海博君健办了一个《天问》周刊，毛泽东在该刊上曾发表过好几篇关于张敬尧的文章。解放后，我送了十一份《天问》给湖南省博物馆。

由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新民学会广泛的活动，湖南各界人民的英勇斗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驱张运动终于取得了胜利。1920年6月，张敬尧滚出湖南。

蒋竹如的《湖南学生的反日驱张斗争》

当五四运动在北京像火山一样爆发的时候，处在军阀张敬尧残酷统治下的湖南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新闻全被封锁。当时长沙《大公报》的新闻稿往往被检查员临时抽去，又不准报纸开天窗，编者只好临时拼凑稿件来填补。五四运动爆发一星期之久了，湖南学生还不能从报纸上得到一点关于北京学生运动的消息，只能零星地从校外听到一些风声。省会长沙笼罩着一片阴森的气氛。直到五月中旬，我们才陆续从报刊上看到了有关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一鳞半爪的报道，但仍不知道运动进展的真实情况。

我当时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并已参加了毛泽东同志发起组织的新民学会。5月23日晚上，我正在一师十三班的自习室里复习功课，忽然毛泽东同志把我叫了出去。并告诉我：北京学生派来了两个代表——邓仲澥和×××（现已记不起姓名），要求湖南学生起来罢课，和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两代表暂住在楚怡小学何叔衡那里。我们现在要商量一下怎样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于是，他邀我和陈书农、张国基等几个人，到一师后山操坪里，在月光下商谈了一阵。决定通过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每个学校推举一个或两三个代表，于25日上午到楚怡小学开会。第二天，我们便分途进行，通知各校推派代表。

5月25日上午，我和陈书农很早就到了楚怡小学。随后，各校推举的学生代表也陆续来了，其中有湖南商专的易礼容、彭璜，湖南工专的柳敏，湖南法专的夏正猷、黎宗烈，明德中学的唐耀章，雅礼学校的李振甫，周南女校的魏璧、劳启荣，楚抬工业学校的朱后郑，长沙师范的缪瑞祥、高标，妙高峰中学的何培元等，共计二十多人。毛泽东同志介绍双方面的代表见面后，就请北京来的两位代表报告五四运动发生的经过情况。接着，两位代表相继发言，汇报北京学生和市民群众游行示威的经过和继续罢课的目的。希望湖南学生实行总罢课，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要求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拒签巴黎和会通过的对德和约。大家聚精会神地听到两位代表介绍天安门前五千群众集会的热烈情况，都很激动兴奋；听到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莫不击掌称快，连说"烧得好！""打得好！"两代表报告完毕，毛泽东同志便提出罢课的问题，征求大家的意见。结果一致主张罢课，和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随即作出决议：一、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作为发动罢课和统一各校学生行动的领导机构；二、到会代表散会回校后，抓紧传达北京两代表的报告内容和会议的决议事项；三、全省学联成立后，立即实行罢课。会上还酝酿讨论了全省学联的章程，主要内容是：设正副会长各一人；分

评议、干事两部，各设部长一人，评议员和干事各若干人，评议员由各校派出的代表一人充当，干事部分设总务、交际、社会服务、编辑四股，各设股长一人。两天以后，各校学生代表都正式推举出来了，章程也草拟好并油印出来了。

5月28日上午，各校代表齐集省教育会，举行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首先逐条讨论通过了章程，然后进行选举。选举结果：法专代表夏正猷、商专代表彭璜分别当选为正副会长，商专代表易利容当选为评议部长—（干事部长姓名记不起了）。同时通过了罢课宣言。

学生联合会的会址设在落星回湖南商专，它的办事人员大多是新民学会的会员。毛泽东同志有时也住在商专里面，就近指导学联的各项活动。可以说，他是这个富有战斗性的新的学生组织的实际领导者。

学联成立后，曾将章程、宣言和成立大会的新闻稿，分送长沙《大公报》和其他报纸，请予刊载。结果除《大公报》把章程作为"来件"登出外，其余都被检查员扣留了，没有登出来。

学联成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发动各校实行罢课，和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当时长沙各校学生的思想并不一致，大多数学生是极力主张罢课的；一部分学生模棱两可，采取徘徊观望的态度；少数学生是反对罢课的。学联开了好几次会动员酝酿，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直到6月2日召开全市学生大会，才通过决议，定于6月3日举行总罢课，并发布宣言。宣言略称："……夫学生之求学，以卫国也，国如不存，学于何有？我湖南学生出于良心之感发，鉴于时势之要求，决议自6月3日起，全体罢课，力行救国之职责，誓为外交之后盾。"

6月3日，大多数学校罢课了，只有明德、法专和几个女学校没有罢课。法专代表黎宗烈、邱惟勤对罢课坚持甚力，带领部分同学手持木棹站岗，不许上课，终于达到了罢课的目的。经过毛泽东同志的耐心说服，明德也随即罢课了。法专代表夏正猷以身为学联会长，而自己的学校不能带头实行学联的决议，引起各校学生的不满，遭到攻击。他不久便辞职了，学联改选彭璜为会长，湘雅代表应元岳为副会长，长郡代表彭光球为评议部部长。在这次改选中，我被选为干事部部长。这时，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全国，各省重要城市工商学界，纷纷举行罢工、罢市、罢课，到处游行示威，掀起了反帝爱国斗争的高潮。

在全国性的罢工、罢市、罢课的威胁之下，北京政府不得不免去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并电令在巴黎的中国代表顾维钧拒签和约，以缓和全国人民的愤怒，显示了革命群众的强大威力。

在五四运动期间，学联除领导各校学生举行罢课以外，同时展开了以抵制日货为中心的反日爱国运动。为此，曾经在各校学生中组成许多讲演队、检查队和戏剧队，每天轮流在街头和沿江码头进行活动。当时，群众反日爱国情绪高涨，日商戴生昌公司的轮船，无人乘坐，常常空船往返。尽管该公司再三宣布减价甚至不收船费，赠送香烟、毛巾，还是无人问津。只有张敬尧的部队不听学生的劝告，去坐日本的船。不但如此，他们还当街打骂讲演员。由于他们的这种行动，引起日本轮船上的水手也猖狂起来了。有一次，一个日本水手居然上岸来打讲演员。我们把这件事控诉到法院，法院慑于群众的威力，不得不判处日水手三个月徒刑。从此，那些日水手才不敢再行凶打人了。

检查队负责检查各商店的日货，这项工作是和长沙国货维持会共同进行的。双方通力合作，一经检查出来，就限令商家把日货卖完，以后不得再贩日货。虽然严厉检查，并举行过一次焚烧日货的示威游行，但是少数奸商利令智昏，偷运日货事情仍时有发生。其中坡子街华太长号的老板最狡猾，他经常哄骗检查员，口头说得很好："只要拍卖完毕，决不再进日货。"暗地里却囤积日货，并把日货贴上国货标签，冒充国货出售。因此，引起学生的极大愤慨。学联评议部专为此事召开一次大会，商讨对付办法，大家主张捣毁华太长，以示惩罚，而会长彭璜和少数人不同意这样做。我和评议部部长彭光球为惩罚奸商，平息公愤，发动长郡、法专、一师等校学生四百余人。把华太长捣毁了，并在店门口贴上公告，揭发华太长贩卖日货的罪行。事后，华太长老板串通苏杭同业公会提出抗议，要求赔偿损失。学联置之不理。事情闹到张敬尧那里去了，他也知道公愤难遏，没有理会。这件事一时轰动长沙全城，奸商们虽然利欲熏心，但也不得不稍稍敛迹起来。

戏剧队专演反日爱国内容的新戏，以唤起群众的觉醒。当时演得最多的一个剧本是《亡国泪》，描写朝鲜古国的凄惨和日人统治朝鲜的残酷。这种戏剧在传活动，不仅行之于长沙市，而且扩大到外县。

学联在开展上述种种活动之外，还掀起了反对旧礼教、提倡新文化运动。1919年6月10日，学联发行的《救国周刊》在长沙出刊了。除登载有关反日爱国活动的新闻报道外，并著文抨击旧礼教，宣扬新文化。为了巩固群众的革命热情，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推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在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下，学联通过决议，创办《湘江评论》，推毛泽东同志负责主编。《湘江评论》创刊号于7月14日出版，好些文章都是毛泽东同志一手写成的。他那时在修业小学教三班历史课，常在深夜为刊物写稿，每期稿件都由我去接取付印。第一、二期各自二千份。三期三千份，四期五千份。除留少部分赠阅、交换和保存外，大部分由学联组成的卖报小组拿到街头叫卖，每份售价双

铜元一枚。

《湘江评论》是当时长沙出版的各种刊物中思想性最高、战斗力最强的一种，在全国范围内博得好评。北京《每周评论》著文介绍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一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是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这篇长篇论文，就是毛泽东同志撰写的。由于《湘江评论》宣传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思想，使得张敬尧大为震惊，坐立不安。于是，又拿出他那套查禁封锁的老办法来了。八月中旬，第五期刚刚印好，还未来得及发行，张敬尧派来了军警，闯进商专，封闭了学联和《湘江评论》。我们事先得到了风声，把学联的文件、印章和未卖完的各期《湘江评论》，一箧一篓地转移到河西的湖南大学筹备处去了。学联虽被封闭了，但我们并未为军阀张敬尧的淫威所吓倒。从此以后，毛泽东同志和学联其他负责人搬到湖大筹备处，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对张敬尧的黑暗统治，进行揭露和抨击。

1919年11月16日，第三届学联成立了，以重新组织的方式恢复活动，并发表了一篇重组宣言。宣言指责张敬尧一类军阀"如昏如醉，倒行逆施，刮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菅人民，蹂躏民权"。这个宣言，实际上是代表全省人民的一篇驱张宣言书。

重新恢复的学联，选举法专代表徐庆誉为会长，一师代表张国基为副会长。评议、干事两部人员继续留任。毛泽东同志像往常一样，和学联的主要干部研究形势，商讨工作方法。自学联恢复后，仍和国货维持会保持联系，一道进行抵制日货的工作，但彼此之间不协调，时常发生磨擦。原因是学生爱国心切，对贩卖日货的奸商积极查禁，雷厉风行，而国货维持会部分人员却阳奉阴违，有的甚至与奸商伙通一气，受贿舞弊事情时有发生，激起学生的强烈不满。学联恢复后半个多月，就查获了日货不少。为了坚持抵制日货运动，提高群众的爱国热情，学联不顾张敬尧的威胁迫害，于12月2日通知各校和各界在教育会坪再次举行焚毁日货示威大会。这天，好几批学生纠察队拖出大批日货到教育会坪集中焚毁；许多店员工人及工厂工人也参加了。群众正在开会讲演时，张敬尧为讨好日人计，便命他的儿子张继忠率领军队把守教育会坪，阻止焚烧日货，同时又命张敬尧前来向学生训话。张敬尧面目狰狞、怒气冲天地对学生破口大骂："你们为什么不在学校里读书？到这里来干啥？有书不读，胡作乱为，简直是土匪！你们这些男土匪、女土匪，扰乱秩序，破坏治安，我就要用对付土匪的办法来对付你们！"学生听了这些诬蔑的话，气得忍无可忍，马上就有好几个从队伍中跑出来反驳。有的说："不要信口诬蔑。我们是爱国学生，决不做无耻的卖国的土匪！"有的说："奸商不爱国，甘心为日本人尽忠效力，可耻可恨！希望军人不要与奸商一鼻孔出气！"这些话刺伤了张敬尧，他命令那些如狼似虎的士兵，用枪托毒打学生，打伤十几个人，内有一人重伤，几乎送了性命。在主席台上的徐庆誉等人，都被捆绑起来，拖到内面打了一顿，才放出来。这次日货没有烧成，学生反遭毒打，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从此爆发起来了。

12月3日下午，毛泽东同志和新民学会会员周世对等都在白沙井枫树亭易培基家里开会，我也参加了。毛泽东同志是会议主持人，对形势作了透彻的分析。决议发动各校学生长期罢课，组织驱张请愿代表团，分赴北京、衡阳、常德三地活动，利用各方面力量驱逐张敬尧。会后，毛泽东同志嘱我立即去学联布置全市学生罢课运动，尽快组织赴京代表团。我到学联没有找到徐庆誉、张国基，便和评议部长彭光球商量好，马上发出通知，请各校学联代表于四日上午到学联开会。届时，各校代表到齐了，正副会长及各部负责人都到了。会上，我提出了枫树亭的决议。接着彭光球发言，他慷慨陈词，赞成罢课。随后各校代表相继发言，意见有分歧，但绝大多数是赞成罢课的。最后通过决议，一、组织驱张学生请愿代表团赴北京请愿，要求撤惩张敬尧；二、各校在12月6日一律罢课，同学自动回家，不许走漏消息；三、长期罢课，张敬尧不离湖南，学生不回校；四、各校学联代表向学校当局交涉退还伙食费，作为学生回家旅费。

我回到第一师范，当晚召开了全校学生大会，通过学联的决议，并由大会推举我和钟秀两人为赴京请愿代表团代表。会后，我向一师当局交涉，退出学生入学时所交押金，作为罢课后回家的旅费。12月6日，一师学生全体罢课，各人捆好行李回家去了。其他学校学生，绝大多数也都罢课回家了。张敬尧对学生的行动是很注意的，防范严密。学联怕走漏消息，影响代表行动，便通知各校参加请愿的代表，于7日下午起分批出发，尽快离开长沙。

先是，在学联决定长期罢课的那天晚上，派了易礼容代表先赴汉口明德大学商借两间房子，作为代表团在汉口停留的地方。因为毛泽东同志在长沙布置后方工作和组织赴衡阳、常德的请愿代表团，不能同我们去北京的代表一道行动，我们需要在汉口等他，这是他亲自布置的。

我们自长沙出发前，毛泽东同志还邀集大家谈了一次话，主要是如何检点行动，避开张敬尧的耳目。因此，我们分作好几批出发，每批二三人或三四人不等，彼此不打招呼。我们到汉口后住在明德大学，和旅鄂湘籍学生取得了联系，得到他们的同情和支持。随后，毛泽东同志来了，于12月17日继续乘车北上。到京后，全体代表住在马神庙北京大学寄宿舍，毛泽东同志和由沪来京的傅熊湘等，则住在相隔不远的毗卢寺。

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们首先和北大学生以及北京学联取得了紧密联系，他们表示极力支持；其次，联系旅京湖南学生联合会，还联系了国会中的湘籍议员如符定一、罗正纬、陈嘉言等，得到了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在经费方面，也获得了若干援助。

我们在北京湖南会馆开了一次同乡大会，但开得不大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这次开会的目的，是想要求在京湘籍名流士绅同伸义愤，大家签名上书请愿，以壮声势。结果真正有力量说话的人到得不多，既不愿上台讲话，也不想签名。经过大家包围劝说，才勉强签了名。我们在京一连向总统府进行七次请愿，都无具体结果。有几次无人接见，只递上了呈文。有一次冒着大雪到了怀仁堂，坐了很久的冷板凳，国务院总理靳云鹏才派了一个秘书出来接见，接受了我们的请愿书，答应转达上去。结果也是石沉大海，渺无消息。但是张敬尧的臭名，已因我们的宣传传播开了。不久，代表团派遣彭光球代表转赴衡阳，加强赴衡阳代表团的活动，要求吴佩孚早日撤军。彭去衡月余，吴部撤防仍无动静。于是，旅京湖南学联特派代表罗敦伟赴衡见吴。我们代表团派我一道同去。农历庚申年元旦，我和罗乘车到株洲，下车后准备搭帆船往衡阳。穿过株洲街心时，家家关门闭户，景象萧条，昔日繁华市容，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我们踏雪走到江边，约莫走了三里多路，才找到一只小篷船。逆水行舟，农历正月初五才到衡阳。

我们于到衡阳的第二天联名写了一封信给吴佩孚，要求会见。吴随即派了人来，约定会见日期。见吴时，我们利用吴与张敬尧的矛盾，要求吴早日撤军，不再为媚日卖国的张敬尧保镖。他回答说："我早有意撤兵。现在计划已定，舟车俱备，只等上峰批准，即行开拔。"我们问他："假如上面不准呢？"他说："那也要走，我再不为张敬尧守门了。"我们辞出后，罗敦伟回北京，我就留在驻衡代表团工作。两个月后，吴佩孚开始撤军了。我们代表团转赴郴州，要求谭延闿早日进军，驱逐张敬尧。

黄兴长子黄一欧

龚业隆

黄一欧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家黄兴的长子。1891年，黄兴与廖淡如结婚，翌年10月22日，黄一欧出生于长沙县。他的一生有着不平凡的经历。

1904年，黄一欧12岁，就读于明德中学小学部，在校寄宿。这年农历9月16日，黄兴30岁生日，他先天晚上回家。这天他看到差役来捉黄兴，情急智生，急忙跑到学校里，告诉平日接近的沈迪民老师，沈叫他待在房里，迅即跑出去，找人设法让黄兴脱了险。一欧从小即表现出他的机智勇敢。

黄兴领导华兴会在长沙起义失败，逃亡日本，株连家族，黄一欧亦于次年逃亡东京。1906年12月上旬的一天，黄兴要他加入同盟会，带他到民报社，填写了誓词，孙中山和章太炎签名作为介绍人，随即宣誓入会。时黄一欧刚满14岁，是同盟会最年轻的会员。

黄兴很重视对子女的培养教育。1907年春，黄兴从香港到东京，请宋教仁为黄一欧教汉文，约定每天下午3时去宋教仁寓所听课。孙中山先生对青年非常关切，时常向留日学生宣传革命道理，特购自行车给黄一欧代步，并勉励其努力学习，注意锻炼身体。有一次，孙中山先生讲演时，由于反动派捣乱，引起骚乱，黄一欧等8人负责维持会场秩序，反而被捕，中山先生亲自托犬养毅说项，才被释放了。

1910年2月，黄一欧在东京东斌学校学习，寄住在宫崎寅藏家里。当时宫崎家境贫困，常以豆渣食品充饥。黄一欧艰苦与共，从无怨言。1911年2月底，通过宫崎寅藏的内弟欧田九二四郎介绍，向日本人仓地铃吉买到一批枪弹，由黄一欧负责运到香港。黄冒充宫崎龙介（宫崎寅藏长子），身着和服，讲一口日本话，同日本浪人亀井一郎一道，将几十枝手枪和万多发子弹装在四口大皮箱内，乘一艘外国邮船运到香港，交给统筹部。当时统筹部长为黄兴，下设各课，胡汉民、陈炯明等分任课长。另设实行部，由方声洞负责，主持制造炸弹及进行暗杀清朝官吏事宜。黄送去的枪弹，解决了革命的迫切需要。

1911年3月，黄兴派黄一欧、陈方度、柳聘农、胡国梁等潜伏广州巡警

教练所待命。他们到教练所，开始感到很陌生，慢慢和同学们搞熟了，即在同学中暗地进行反清革命的宣传工作，送些同盟会宣传革命的书报给同学们看，受到大家喜爱，竞相传阅，传播了革命种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效果。这时，黄一欧等还接受了一项艰险的任务，即替广州设立的秘密机关运送枪支弹药。当时在广州为起义设立的秘密机关有30多处。他们身穿巡警制服，手夹包袱，包袱里藏着手枪和子弹，送往指定的秘密机关。那时，清政府防范甚严。3月间，广州的气候已很暖和，他们夹着沉重的包袱，提心吊胆地穿过大街小巷，眼观四方，心情紧张，武器送到秘密机关的时候，常累得大汗淋漓，但内心感到无比欣慰。

紧接着，4月27日，黄兴父子参加了震惊中外的黄花岗之役，这次战役牺牲80余人。事后，潘达微冒险收殓遗骸72具，合葬于城郊黄花岗。是役，黄兴伤右手，断两指，脱险隐蔽，继续从事革命活动。黄一欧为这次大起义的幸存者，以后到海外进行反清革命宣传等活动。

黄花岗战役集各省革命党的精英，与清朝拼搏，虽义举未成，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的伟大壮举，震动全球，造成了革命有利形势。不到半年，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首义，埋葬了清王朝。黄一欧奔回祖国，参与了光复上海、南京之役。革命军进攻南京时，黄一欧任江浙联军沪军先锋队副司令。农历十月中旬的一天，率江浙联军猛攻南京。在战斗非常激烈的时候，张竹君带领救伤队到前线支援，抢救负伤战士，并捎来黄兴给黄一欧的信。黄一欧急忙拆开一看，信中写道："努力杀贼！一欧爱儿。十月初一日。"还盖了黄兴当时常用的一颗私章，章子上刻的是"灭此朝食"。黄一欧读后，深为感奋，并以此勉励战士。那时黄兴正在汉阳督战，知道黄一欧参加江浙联军，率部进攻南京，特地托人带信，鼓舞一欧斗志，也鼓舞了联军的士气。

1912年冬，黄一欧赴美国深造，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外交经济系学习。课余参加了国民党美洲支部的活动，揭露袁世凯独裁专制的罪行。1941年7月，黄兴来到美国，游历各地，向美国各界人士、国民党支部和华侨发表谈话，阻止袁世凯帝制的阴谋，争取各方支持。黄一欧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黄兴还遵照孙中山先生电令，阻止袁世凯向美国借款。10月2日在纽约，黄一欧兄妹陪同黄兴参观了唐人街、黑人和犹太人杂居的贫民窟、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历史博物馆、纽约时报等处，扩大了眼界。1915年秋，黄兴指派一欧参加讨袁运动，协助蔡锷发动护国战争。时蔡锷将在西南发难讨袁，密信告知黄兴。黄兴分析研究后，认为袁世凯必然妄图实现称帝野心，讨袁时机成熟，云南发难较有把握，于是自己在美国筹款，作为讨袁经费，并与各方密切联系，积蓄力量，嘱黄一欧立即动身赴日本。行前交给黄一欧两封信，一致孙

中山，谈袁世凯必称帝，革命时机已到，如有所命，极愿效力；一致张孝准，嘱其与蔡锷密切联系，相助进行。黄兴还要一欧向宫崎寅藏探问外交动向。黄一欧往访了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藤田。因藤田是宫崎寅藏亲戚，常来宫崎家，故而相识。宫崎还介绍黄一欧到藤田家里谈过多次，藤田表示愿意暗中支持反袁运动。黄一欧及时将所得情况密告黄兴，这样就使黄兴掌握了情况，争取了国际友人的支持。

1916年，全国讨袁形势趋于高潮，孙中山先生两次去函美国，促黄兴回国，共商大计。黄兴6月5日由美乘船到日本，轮船尚未靠岸，头山满、宫崎寅藏、萱野长知等乘船接往东京。黄兴7月8日回到上海，同日，蔡锷也乘船到达，黄兴命黄一欧代表前往码头迎接。31日，蔡重病东渡日本就医，黄兴、黄一欧等往码头挥泪送行，岂料这次分别竟成永诀。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黄一欧任广州国民政府参事。北伐战争结束后，任天津第一特区主任。1931年，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抗日战争期间，随立法院迁居重庆。他对蒋介石集团的统治深为不满。在中国共产党爱国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决意脱离旧营垒，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1941年自动离开重庆，避居湖南农村。1949年，任湖南省政府顾问，团结辛亥革命老人，积极参与了湖南和平解放活动。他一生为反对清朝统治，反对封建军阀，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促进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很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黄一欧先后担任了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顾问、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民革湖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积极参与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有许多亲友在台湾和海外，利用这些有利因素，密切和他们联系，以亲身感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内形势，为促进祖国统一，付出了心血，做了许多利于祖国统一的有益工作。在晚年，他以亲身经历，撰写了许多文史资料，特别是辛亥革命回忆录，为研究我国近代史提供了宝贵资料。1961年，他应邀去北京参加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捐献了珍贵的历史文物。他重病住院期间，我常去探望，他头脑清晰，记忆力强，口述了一些重要史实。

黄一欧1930年与彭承祉结婚，生有二个儿女，均继承父志，从事民主党派和海外联谊工作。

1981年1月12日，黄一欧因病在长沙逝世，终年89岁。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挽联云：

名著两代，辛亥遗老无多位；
书迟一步，民报旧址问何人？

回忆蔡和森同志

周 方

1917年，我在长沙主办平民教育，租居溁湾市周家台子。这时，蔡和森在优级师范毕业，与我同居一处，相处了三年的时间。

蔡和森，学名林彬，1895年农历三月初五日生。湘乡县永丰镇人。家贫寒，13岁在该镇蔡广祥店当学徒。因年幼体弱，每天早晚开铺关店，背着铺板东倒西歪，店主不仅不加体谅，反嫌其无能力，稍不如意，便责骂鞭挞。他回家向母亲葛健豪诉苦，母亲多方劝慰。他在这里足足呆了三年，一直到学徒期满，便卷起铺盖回家。这时和森年已17岁，除略知记账和珠算外，毫无新知识。不过，他在店的三年，却深深认识到了店主的媚富嫌贫、欺软怕硬、唯利是图的丑恶面目，自知赋性刚直，决不宜于店员生活，所以立志要读书。当时，永丰镇仅有一所国民小学，于是他进了这所学校。由于他年长失学，被编入初级小学三年级。经过一个多月的勤学苦练，就能开笔写短短的文章了。教师加以鼓励，进步更快，暑假自学尤其勤奋。下学期就跳入高级班。在高小又超常升级，只读了一年半就毕业了。教师都称赞他为高材生，劝其父亲继续让他升学。可是附近无中等学校可入，下省去读，家贫哪能供给学膳费？父亲以力不从心，答复了老师。和森再商于母亲，母暗出嫁时玉钏一对，金银首饰一包，交和森向典当铺抵押，得大洋数十元。于是，欣然下省，考入了铁路学堂。读完一年，又没有钱了，回家筹学费，母亲再也没有办法。在家，仍勤苦自习。暑假，见报载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招生，不要学膳费，便再次下省应考，名标前列，便兴高采烈地入学了，与毛泽东同年级而不同班。

和森在一师，结识了许多寒苦有志的同学。毕业后，湖南高级师范招收文史专修科，他考入文史乙班，与邓康（中夏）等同学。高等师范校址，即原来的岳麓书院，是一个最好的天然读书环境。自宋以来，岳麓书院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有藏书楼，收藏古今图书很多。民国前即改湖南高等学堂，添聘东西教授。和森考入后，每于课外纵览古今中外名著。因文科教授中的杨怀中、徐特立两先生，原兼授一师的伦理、教育学，和森常就两师问学，所得启示尤

多。他除习文学外，对哲学、社会学自修更加专勤。在钻研外国哲学时，有感于充实英文阅读能力的必要，便在铁路中学和一师所学英文的基础上，再入该校英语选科高级班学习。其后，他竟能翻译英文原著《世界进化史》，可见他自修的努力。

1917年夏，和森毕业于高等师范。这时，同学多为个人职位奔走，他为刻苦自学、锻炼身心计，便与妹妹蔡畅商妥，佃居我租的周家台子“沩痴寄庐”，迎老父母及姊庆熙母女同住。蔡畅那时任周南小学体育教员，收入不多，姊母女靠老家田租维生。和森又分佃房东约半亩地种菜以自给。一家人聚处，母与姊尤善于持家，半丝半缕，一菜一汤，每经其母亲手调制，别具精美香甜风味。和森居此，除作留法勤工俭学准备，及锻炼身体，与胃病、喘哮作顽强斗争外，毫无其他营求。其锻炼身体方法，常至室外作深呼吸外，种菜、灌溉等都在阅读休闲时间行之。春秋晴和，有时露宿室外，以饱吸清新空气。早晚间习游泳于附近池塘中，后约友游泳于湘江，技益进，而体气日健。一日游岳麓山顶，突遇暴雨，衣履尽湿，便率性于大雨之中，以衣裤作巾，擦至遍身红润。雨止日出，继续日光浴，晾干衣服，翩翩而归，与母姊谈笑，自谓用暴雨行天然淋浴，变坏事为好事。其善于应付事变常若此。据他言，初习因是子静座法颇勤，但进步甚缓，后闻楚怡小学有同善堂传授静坐法可疗病，便往学习，归，行之无间，体日加强，便怂恿姊庆熙同去学习，姊亦静坐有得，习以为常，姊弟哮喘病都渐有所减轻。

1918年春，毛泽东同志奉母来省治颈扁桃腺炎，亦寄居周家台子。毛泽东常来此侍候。他每于母前温语取乐外，便同和森纵论研究学术，济世救国救民的准备工作。有一次，他俩着草履，背包袱，同游洞庭湖滨，约半月后始归。蔡母问：“你俩旅费不多，何以经久远行？”和森细说经过以为笑乐。他谓有一日傍晚，过一大宅高楼下，闻书声琅琅，两人好奇心发，便叩门登楼。只见一塾师督七八个学生诵读，讶其衣着，而不与为礼。他俩与语言古今教授法优劣，谈吐风生，并涉及上下古今。那塾师惊奇，命学生备酒肉款待，并留宿塾中。又一日过田垅中，见农民敲锣打鼓插田，他俩为向劳动人民探知风土人情，便结束衣履，下田插秧，共同协作竞赛以为乐。农友见他俩来自异地，中午，饷以甜酒和粉蒸肉，互相交谈各地风土人情，怡怡如一家人，他俩辞行，农友还恳切相留。因此，这些日子，他俩在“见人说话，遇事帮忙”的八字之下，得收获和帮助不少。和森深切地说：“天下农民是一家，只要乐于助人，走遍天下都不难。”这就是他亲近劳动人民的深刻体会。

1918年9月（应为4月），毛泽东所酝酿的新民学会，就在“沩痴寄庐”成立了。开成立会时，共到会员13名。学会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研究

学术，改良社会”为宗旨。以后继续开会两次，宗旨有所修改。至1921年开第三次年会时，毛泽东赞成蔡和森在法国巴黎提出的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宗旨，到会人都一致通过，但外地会友多来函提出异议。嗣后新民学会未续开会议，毛泽东将会友前后通信编成三集，其中蔡和森的通信颇多。

蔡和森与我佃居周家台子自修期间，与杨怀中师所住的饮马塘相距仅4华里。和森常于星期日或风晨月夕，到那里去向杨师问学质疑。时高师改为湖南大学筹备处，图书管理员系高师同学，和森借阅各种参考书册，经杨师启示指点，钻研更深。后来杨师应北京大学教授之聘，与蔡元培、李石曾等学者倡导留法勤工俭学，函召蔡和森游北京，和森即整装前往，我与毛泽东等送行至轮渡码头。船过洞庭时，风雨大作，星月皎洁，一望无涯，和森诗兴勃发，写了一首五言律诗《少年行》寄回给母亲，一家人争着诵读。和森在求学时期不曾作诗，但这首诗快吐襟袍，蓄蕴深厚，为众人称颂。

蔡和森同志在京纵观博览，入故宫，爬登御座，曾写信回家告诉母、姐以为笑乐。经杨师的介绍，他与蔡元培、李石曾等先生讨论留法勤工俭学事宜特详。回湘后鼓吹甚力，与何叔衡、萧子升等就楚怡小学组织法文补习班，聘李成如为义务教员，又借楚怡工场作试验地，处处以身先人。一时，湖湘有志工读的学子闻风会集长沙。和森家无宿储，兄妹一同赴法，因筹集旅费不易，一日与母亲葛健豪商及此事，母亲怏怏不乐，和森笑曰：“阿母五十多岁还健，如愿同去法国勤工俭学，你的刺绣工艺也是一条好出路。”母意跃跃欲试，和森兄妹加以怂恿，便请母拿定主意，以便筹款同行。母曰：“我同你们去，毫无其他顾虑，只怕一旦卧病远方，欲归不能，奈和？”和森大笑：“阿母既愿出洋，法国医院比中国的强；就算病故繁荣的法国巴黎，葬入华侨公墓，你是华侨中惟一的老女留法生，清明挂扫，谁不向你坟墓献束鲜花，这是死的何等光荣呀！”又说：“你的儿女都是四海为家，假如你病故长沙，葬入岳麓山下，或者死在老家，葬于万山丛中，那时有谁来替你扫墓？到处黄土好埋人，你在生不怕远涉重洋留法，倒怕死后无地安葬吗？”蔡母听了此番话以后，决计同儿女一道赴法。青年时代的和森，处事果决，能为人所不敢为，又善于以理服人，其才华已经毕露。

其时，向警予女士亦从溆浦辞去小学校长职，来到周家台子，加入蔡家留法行列。那是1920年的中秋节前夕，他们一家人离开长沙，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准备赴法。蔡母欣然相从。到沪寓法租界旅店。和森与向警予整日奔忙，或接洽名流，筹措旅费，或作演说，鼓吹青年赴法。一日，吴稚晖从法国巴黎归沪，说法国法郎大贬价，并排斥华工，留法勤工俭学遇到了难处。准备留法的青年于环球学生会听过吴稚晖的演说后，迟疑不决，徘徊中途者颇多。蔡和

森多方鼓励，引导前往。他同妹妹蔡畅奉母先行放洋，即是英明果决的又一事例。

登轮后，蔡和森与向警予女士同心协力为留法同仁服务。有晕轮或其他问题的，他俩常尽力协助，关怀备至。在船上，他们建立了革命感情，抵法后不久即结成“向蔡同盟”，蔡母更引为最大的快乐。嗣后，蔡向两人对留法同仁的公益、公安及一切应享权利的维护争取，都看作个人应尽的义务，总是奔走接洽，尽力所为。1922年，法政府取缔中华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和森与警予被留法同仁推为代表，争持甚力。最后，被法政府以宣传共产主义罪名遣送返国。

此时，蔡母与蔡畅仍留法勤工俭学。至1924年，因蔡畅与李富春去苏联留学，蔡母带着蔡畅的小女回国。她们回国的旅费，还是和森用很低的代价卖掉自己所译述的《社会进化史》稿支助的。蔡母过新加坡时，住女友张良权处数月。她想在南洋谋求教书职业，但未得，便回长沙。那正是暑假，适逢我在湖南平民学校主教，蔡母的长女蔡庆熙经我应聘于平民女校（地址颜子庙）。蔡母原系周南师范速成班（女子教员养成所）毕业，今又新从法国归来，经原平民学校庶务彭慕陶与我推荐，在平民女校担任校长。长沙的革命妇女，一般常来平民女校活动，蔡母在此任职后，这里更成为革命空气最浓厚的场所。凡稍具有新思想的女生，多纷纷投入该校。蔡母谆谆教诲，犹如自己子女。其他教员亦多奋发蹈砺。故平民女校日异月新。暑期，中共湖南党的组织，曾借此办过党校，为革命培育了不少干部。下学期，女校两个班增至四个班。党所领导的革命团体，亦常借此为开会场所。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勃兴，湖南成立了“济难会”，会址设平民女校。葛健豪校长指导员生踊跃为济难会募捐，并组织员生作街道讲演，以激励市民的反帝爱国热忱。

1927年的春夏之交，蔡和森同志从莫斯科归国，路经长沙时，蔡母住平民女校旁的天茂花园。和森在家虽只作过短暂的停留，但革命活动频繁。此后党的组织凡不能公开的会议都在这里进行，不能公开的文件由蔡母保存。蔡家母女寓居的天茂花园成了党组织的秘密机关。和森那次回到家里，在教育会坪作过讲演，也在平民学校和女校讲过苏联革命的经过。他还对女校的教育提出过一些改进的意见和办法。蔡畅由苏联回国后，也经广州回到长沙，在天茂花园住过。后由此赴南昌工作。她对女校的教育也多加以指点，支持母亲和姐姐办学。因此，在蔡母担任校长这一时期的湖南平民女校，革命空气十分浓厚，故长沙“马日事变”发生，遭到反动政府的封闭，蔡母葛校长的家亦被抄。幸庆姐（蔡庆熙女士在校同事均称为她为庆姐）事前早有准备，已将秘密文件妥善加以处理，或焚烧，或转移，使侦探一无所得而去。可是，警方仍特别注意

监视，蔡母只好同女儿及孙辈，于1927年撤回老家永丰去了。

1928年，长沙秩序较为安定，蔡母又全家迁到长沙。向警予在武汉被捕的消息传来后，她立即前往营救。因未找着门路，警予牺牲了，乃转赴上海。其时，蔡和森与蔡畅兄妹都在上海，因革命形势紧张，在上海居住不便，又转回长沙。此时，和森的哥哥麓仙也早已为革命牺牲，全家都靠庆姐张罗生活，辛苦万端。并且，在大革命中失去联络的共产党人转入地下活动，常有同志前来依投蔡母家。蔡母与庆姐总是千方百计为他们作掩护。1931年，蔡和森同志在广州壮烈牺牲，蔡畅怕母亲伤心，一直瞒着，因此蔡母与庆姐都不知道。长沙大火时，她母女又转移回到了老家居住。

忆彭石钧先生

胡文质

吾湘曾有耆绅彭石钧者，人称之为彭三爹或彭三胡子。先生籍长沙县，早岁参加革命，为同盟会会员，随孙中山先生多年，任随身秘书，深为中山先生所器重。其人性情爽直，好仗义，耻阿谀，故多得罪于当道达官显宦，尤为一些吹拍逢迎者所嫉。为此，先生曾落选于国民党中央委员，愤而归里，息影长沙，不复过问国事矣。湘人知其为革命前辈且为人刚直敢言，凡社团公益事业，如慈善救济团体，莫不推先生领衔，以扩大其影响，而先生为敬恭桑梓，亦乐予支持，在当时半封建社会的统治下，对怜孤恤寡，济困扶贫、为民请命等，确实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为当时人民群众所公认。誉为长沙“三老”之一（其他二老为仇亦山、左益斋）。

1939年薛岳任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湘省主席时，慕名亲访，聘先生为省府顾问，并以前辈待之，凡军政重要会议，均请列席，以备咨询，先生之言必听，而计必从也。由是身价倍增，而名亦大震于湘省矣！但先生本性刚直一如既往。当时官场阿谀吹拍之风极盛，有图趋附于先生借作进取之梯者，均投之以白眼，使其畏而远之；而其待下也，则平易近人，爱护有加，如有相求，先生无不为之竭力玉成，其做人与处世之相左，竟有如是者。

1944年，长沙市陷入日寇手。余在非敌占区长沙河西，曾访先生于卯田私寓，承其热情接待，留余中餐，先生平日自奉俭约，虽无佳味，却盛情可感。此次访先生短暂的三四个小时内，却亲见其连续接待几个求助孤儿寡妇、老弱病残之逃难市民，为其写信书条，责成当地政府妥善安排。先生语余曰：此类事件，日必处理十余起，甚至达数十起，诚应接之不暇，而先生同情心切，虽累不倦。

当时日寇占领市区，市民扶老携幼向四乡避难，长沙县政府早已移驻长沙河西卯田，并成立一支强大之地方武装——岳云部队，以对付日寇下乡“打闹”，致使敌人只能龟缩市区，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四乡境内仍属我施政权力范围之内。而先生作为省府顾问，自有其特殊身份，对下书条写信，亦有其特

殊效用。因此四面八方难民前往求先生写信书条解决问题者，此去彼来，络绎不绝，而先生却一一接待，从无愠色，有时甚至解囊以助。

薛岳以后，吴奇伟、王东原先后主湘，对先生照例加聘。1948年程潜主湘后不再复出矣。

先生既已挂冠，而平日对其有嫌怨者，乘机落井下石，诽谤先生，不一而足。时国民党《湖南日报》推波助澜，凭空发表攻击先生贪污难民救济款新闻一则后，社会舆论更大。先生见报后，曾与人曰："我彭三胡子要发财，何必与难民争食（当时先生尚任市临时救济协会主任委员），我头可断，血可流，但对此有损人格的无耻诽谤，是绝不能容忍的，殷望政府迅速召集各公法团体及救济协会诸委员，清算账目，彻底澄清此一事实。并宣称彭三胡子从今天起绝食以待，若不弄清楚，我死后眼睛亦将暴出！"有关部门经过几日清算，证明账目清楚，确无贪污事实，并向社会宣布。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主任委员张炯为此亲往先生处，谓事已大白，劝其进食，一场风波，至此乃告平息。

嗟夫！宦海浮沉，风波难测，曾几何时，昔日春风杨柳，已变作秋雨梧桐景象。世道如斯，能不令人浩叹！先生昔日为民请命，奔走呼吁，恤寡怜贫，扶危济困之美名，亦随岁月之流逝，不复为人所知矣！据悉先生不久迁居故里，抑郁而终，身后萧条，一无所有。

吾湘商界名流左益斋先生曾赠先生以诗，中有"眼底无馀子，胸中有难民"之句。至今读其诗，忆其事，犹仿佛如见先生其人。

怀念刘寄踪先生

龚业隆

刘寄踪先生是著名的国画家，以画鸡名于世。解放前在公私立学校任教，我有幸受教其门下。建国后，他在明德中学过早退休，后被聘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我住彭家井时，与刘老家相隔咫尺，过从甚密。他自有旧平房，名曰"梧轩"；屋前有一空坪，命名"半亩园"。他粉笔生涯数十年，淡泊名利，两袖清风，连一张像样的画案都没有。他托我买一块三夹板，作绘画之用。他卧室很小，仅容一床、一桌、一柜。一次，我坐在桌子旁，看到桌上一些小纸片，纸片上都是他的习作，有几张画的是各种形态的耕牛，我饶有兴趣地欣赏着。刘老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学习不倦，我深深地为他的勤奋学习、老而弥坚的精神所感染。刘老似乎猜测到我喜爱他的作品的心情，从柜子里取出他画的群鸡和耕牛图给我看，并说："我原来画鸡的时候多，现在学着画耕牛，俯首甘为孺子牛嘛。"我仔细端详，看到耕牛似举步前行，牛尾好像向左右甩动赶苍蝇，鸡群图上的小鸡则像追逐争食，都给人以真切生动的感觉。我不禁惊叹："真是画活了！"刘老接着我的话说："画动物就是要给人以动的感觉，形似还要神似。艺术应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单靠书本知识是不行的，要创作出好的作品，就要深入生活，深入实际，多观察，多速写，做到形神毕肖。"

我曾在报刊上剪下雄鸡和狮子图给刘老看，他拿了就高兴地临摹着。他永不满足，不放过任何学习的机会。在绘画构图上，刘老还力求有新意。81岁时画了一幅国画送我，画的是两鱼一鸭，这是他用白石翁"稻谷年丰知鸭贱，桃花时到忆鱼肥"的诗人画的，此画构图刘老是费了一番思考的。画的上款写的"叶浓吾友"。我对他说："您是老师，我是学生，应该称吾弟罗。"他笑着说："八十岁的老师，七十岁的学生，还是称吾友吧。"

1938年，刘老从长沙避难回汉寿老家，我国著名文学家郁达夫亦寄迹汉寿，一个长于文学，一个精于国画，两人一见如故。那年秋天，郁达夫到刘老家作客，畅谈竟日。达夫先生欣然命笔将所作一首七绝诗写成条幅相赠，其中

有“男儿合战沙场死，岂为凌烟阁上图”之句，报国之情，溢于纸上。刘老很喜欢这幅字，一直珍藏在家里。

刘老的画不仅在国内参加展览，还在新加坡等地展出，获得好评。湖南展览馆美术馆里，陈列了一些刘老的国画，一次国际友人以400元购去一幅，展出单位送给他80元润笔费。刘老以他的画可争取外汇而高兴，他说：“我的画可以降低些价格，多争取点外汇收入嘛！”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刘老晚年患心脏病，提笔有些吃力，仍然有求必应。报社、电台、博物馆等单位索画，刘老总是满足他们的要求，还说这是应该做的事情。

1987年，刘老因病辞世，享年90岁，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湘剧艺人中的爱国者

文忆萱

湘剧以省会长沙为其活动中心，艺人受新思潮的影响也就得风气之先，因而具有更深的战斗传统。就以结合时事编演现代剧为例，在清末民初，湘剧就编演过《刺恩铭》、《袁世凯逼宫》之类的戏。到抗日战争开始，演出的历史爱国故事剧和抗敌救亡的时装戏就更多了。加之在田汉的组织下，湘剧成立过七个抗敌宣传队，在各地作抗敌救亡宣传演出，影响面很大。湘剧艺人中爱祖国、重民族气节、与恶势力抗争的故事不少，这里介绍的只是其中的几位佼佼者。

骂贼长桥畔

湘剧有个花脸行艺人叫罗裕庭，是宁乡道林人，出身于梨园世家。他曾祖罗万善，是晚清以唱高腔驰名的湘剧艺人。他父亲叫罗德明，是用湘剧唱皮影戏的。罗裕庭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后来便随父亲唱皮影戏。皮影戏班人员很少，要求每个人都一专多能，既要能唱，又要操纵皮影，还要轮换操乐器伴奏。罗裕庭人聪明，又略有文化，在皮影戏班从艺几年，吹打弹唱无一不精，他嗓子好，唱得又有韵味，很受观众欢迎。但他不满足于演皮影，只想粉墨登场演出，二十出头，便投到长沙著名的湘剧同春班内。可是，他毕竟是唱皮影出身，没有经受过严格的基本功训练，加上年纪已过二十，再练也唱不成做工戏和武打戏了。于是，他根据自己的天赋，有一副得天独厚的好嗓子，下决心一边练功架、台步等花脸行的基本功夫，一面专攻紫脸戏。

紫脸是湘剧特有的名称，专演花脸行中以唱为主的戏。这类戏数量不少，但需要高昂宽宏的嗓音条件和深厚的唱工工底。由于这类戏中一些代表性人物如《高鹞子观星》中的高行周、《斩雄信》中的单雄信、《珠帘寨》中的李克用等脸谱的基本颜色是紫色，所以称为紫脸。大略相当于京剧的铜锤花脸。罗裕庭嗓音又高又亮又宽，有多年唱皮影的基础，再加上自己刻苦琢磨，在传统唱法上还有所发展，唱腔雄浑高亢，能充分表达剧中人物慷慨悲歌的感情，几年

工夫，不仅驰名艺坛，而且把紫脸唱腔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他一面在演出上下功夫，一面向编导发展。因为有些文化，接受新事物、新思潮也较快，民国初年他就编演了时装戏《袁世凯逼宫》。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又以他为首编写了大型新剧《血溅沈阳城》，并组织当时在长沙演出的各湘剧戏班名角排练，当年十一月就在长沙六家大戏院中轮流演出。这出戏揭露了日本侵略军在沈阳大屠杀的血腥罪行，鼓舞了广大民众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也激励了湘剧艺人逐步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

他只有一个独子，叫罗汉超，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他毅然送子当兵抗敌。后来，罗汉超在淞沪战役中阵亡，消息传来时，他正在演出，但他咬着牙硬是坚持演完那场戏，刚进后台不及卸妆便痛哭失声。

独子战死，他更是以身许国，积极投入各项抗日爱国活动。当时省会戏剧界成立了抗敌后援委员会，他当选为常委，兼任委员会下设的戏剧编纂委员会委员继续编写抗敌救国新剧，而且把传统剧目以"旧瓶装新酒"方式，改写或增写入爱国、抗日、骂汉奸的内容。1938年，田汉在长沙组织湘剧抗敌宣传队，他率先响应并发动艺人参加，自己还担任了第二队领队。他除了积极排演爱国题材剧目外，又陆续排练田汉所编的新剧，到城乡各地演出，宣传抗敌救国。后来，抗敌宣传队被当局撤销，他还是领着全班人马继续作宣传演出，靠演出来维持全班生计，但他从不动摇爱国抗日初衷。

1944年农历四月，他和全班人在耒阳县的涌金戏院演出，日本侵略军突然袭击耒阳，他们来不及后撤，全班被困在耒阳。他的妻子、侄媳因患病得不到医治而死，他的侄子湘剧生角艺人被日军枪杀，他自己则被关在涌金戏院隔壁的财神殿内。日本侵略军听说他编演过抗日新剧，对他残酷毒打，并叫他改词演唱，他不但没有屈服，而且痛骂日军。日本侵略军将他继续关押，他以绝食抗争。日军退出耒阳后，戏班中艺人寻至财神殿，才见他全身是伤、死在屋角，尸已腐败。这位爱国艺人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民族的气节，他用自己的鲜血为中华民族写下光辉的一页。后来，著名戏剧家田汉在《湘剧忆事》长诗中写道："寇氛逼耒水，裕庭罹网罟，骂贼长桥畔，生气犹虎虎。"生动形象地歌颂了这位爱国艺人的浩然正气。

饮恨龙潭水

提起吴绍芝，三十年前湘剧界和爱好湘剧的人士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也是宁乡人，八岁就进湘剧华兴科班学戏。戏曲界的科班，就是成批培养人材的艺术学校。科班规矩，学徒都要按科班名称中的一个字取艺名。吴绍芝在华兴科班时，艺名叫吴华钦，学生角。四年出科（毕业）之后，他就进入

同春班唱戏，初演《打鼓骂曹》的祢衡、《捉放曹》的陈宫、《收姜维》的孔明这类唱工戏，一下就崭露头角，轰动长沙。不料好景不长，他刚刚出名，就"倒嗓"了（男孩变声期，嗓子哑了）。这打击太重，十多岁的吴华钦几乎无法承受。

同春班中当时最著名的小生李芝云，认为吴华钦是可以成为一个好演员的，目前不过是变声期，只要保护、训练得法，过几年嗓音仍可恢复。不过根据他的嗓声欠宽，学生角并不合适，便表示愿收他为徒，改习小生。吴华钦在随李芝云学艺期间，常常叫人把自己反锁在室内，以便专心练功学戏。他用心学，李芝云用心教，几年中，尽得李芝云真传，嗓音也逐渐恢复。到他重返舞台时，首演《磐河桥》一剧的赵云，就得到同行和观众的一致赞扬。他感激李芝云给了他第二次艺术生命，从此改艺名为绍芝，用以表示不忘恩师的盛情和继承李芝云衣钵的决心。

吴绍芝成名之后，并不满足已有的成就，又向老一辈小生粟春临学"胯衣戏"（相当于京剧的短打武生）。当时湘剧舞台，名角正多，他随时吸取师辈的独到之处，博采众长，集于一身。湘剧小生行表演分"穷（书生）、文（士）、富（官员）、武（将）、长靠短打"等戏路，他无一不能，而且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的唱腔，本嗓、假嗓结合运用，刚柔相济，因而形成他特有的艺术风格，被人称为"绍派"。"绍派"被同行和观众所承认，以致在他之后的小生，十有八九都宗绍派，被视为"绍派小生"，对湘剧小生艺术的影响达半个世纪。20世纪30年代，京剧名家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等到长沙演出时，都看过吴绍芝的戏，一致称赞，程砚秋说吴绍芝的表演艺术"不在叶盛兰之下"（京剧名小生）。

抗战开始后，吴绍芝也是积极参加演出抗敌救国新剧的艺人。田汉组织湘剧抗敌宣传队时，他立即参加，和另一艺人黄元才共同担任第四队的领队，在湘潭一带城乡演出田汉写的《江汉渔歌》、《土桥之路》等新剧。抗敌宣传队被取缔之后，他们改称岳云湘剧团，仍然演宣传抗战救国的戏，流亡到桂林。那时生活极为艰苦，团里人陆续离去另谋生路，留在桂林的湘剧艺人只剩十八人，在田汉帮助下，他们又组织中兴湘剧团，演出《新武松》、《梁红玉》、《史可法》这些爱国题材的古装戏。《新武松》一剧是田汉写的，很有些抨击时政的台词，当局要他们改，而且有人到剧场来闹事，田汉坐在后台，演主角武松的吴绍芝仍然一句不变，照常演出。

1943年，吴绍芝和他的剧团又从桂林沿途演出回到湖南。1944年长沙沦陷，他携妻带子仓皇奔出，向湘西逃难。途中，他参加了湘剧福如班，边演边走。这样的流亡演出，十分劳累，加上衣不蔽体，食难饱腹，他最爱的儿子在

中途病死。饥饿、劳累、伤心，终于使这位一代名伶在途中病倒，最后死在湘西溆浦县属的村镇龙潭水，死时还只有四十三岁。田汉后来写有怀念他的绝句：“梨园自有寸心丹，百战罗（裕庭）、吴数二难。歌舞何须唱消歇，精忠今已照人间。”

为留清白在人间

民国十年前后，湘剧兴起创办女科班之风，当时称为神班，最著名的有福禄、九如两个坤班。九如坤班是艺人黄元才所办，既有女科班，也有戏班。女孩子学戏，一般不爱学净丑两行，特别是丑行，女孩子既缺此天赋，而且有顾忌，表演上放不开。黄元才两个女儿都在读书，他看到丑行缺人，便叫两个女儿也入科班，边读书边学艺。他的小女儿叫黄咏琴，美丽聪慧，天真活泼，黄元才便叫她学丑角，科班艺名如顺。黄如顺聪颖好学，读书、学艺两不耽误。她出科后，便在他父亲的九如班唱戏。演《打渔杀家》的教师爷，《小放牛》中的牧童，饶有风趣，观众竟不知是一个俊俏的小姑娘所饰。

黄如顺并不愿终生从艺，特别看到一些大师姐，舞台上一露头角，便为豪强、富室相去，更觉得寒心。因此，她仍然白天上学，晚上演戏。十三岁时，她考入衡粹女子职业学校。当时社会上戏曲艺人多受歧视，黄如顺虽然在学校隐瞒了艺人身份，但时间一长，师友也有所风闻，冷嘲热讽，时时有之，甚至在上课前有人在教室黑板上画一个戴纱帽的丑角形象，等她进教室便哄堂大笑。个别教员还有暗存狎侮之念的。黄如顺忍无可忍，中途退学。她爱美术，又不甘心就此荒废学业，便远走南京，投奔一家亲戚，想考美专。还未应考，亲戚家的男主人又起觊觎之心，她愤极深夜出走，徘徊江畔，几欲轻生。幸而女主人谅解，追寻到江边，苦口劝解，并资助她路费返回长沙。黄如顺求学之愿成为泡影，仍在九如班唱戏，同时试学编剧、试写文章。她为响应名人贺华元等的倡议：抗议女艺人出“局”（唱戏侑酒），曾写文章在报上连载，她抨击“叫局”恶习，号召女艺人自重自爱。九一八事变后，她紧随罗裕庭参加戏剧编撰委员会的新剧创作，参与了罗裕庭的《血溅沈阳城》的编写。她自己写的剧本都由九如班上演，可惜的是，到解放时，只留下《玉印银环》一剧，1953年曾由长沙湘剧三团重排上演。剧本在“文革”中再度被毁，现只有九如班同科姐妹尚可记忆了。

1935年，黄如顺随九如班到浏阳县演出，在浏阳驻军的罗师长，见她才貌，把她找到师部，逼娶为妾，她当众拒绝，拂袖而去。她父亲黄元才知道大祸临头，带领全班人员，连夜离开浏阳，返回长沙。但是，那个姓罗的并未死心，不断派人到长沙来施加压力，黄如顺感到社会太黑暗，一个年轻的女艺人

实在难于抗争，服安眠药自杀。遗书给父母姊妹，将她个人积蓄，全部捐赠绥远前线抗敌战士。这个以死抗争的女艺人，死时还只有十九周岁。1936年12月15日《大公报》登有报导，并发表了她的一封遗书。

“本市南门外沙家巷十一号所住湘剧坤伶黄如顺，于本月十一日夜晚，忽服安眠药自死，比由其家属护送湘雅医院诊救。自上项消息传出后，虽报章腾载，但自杀原因颇多揣测。兹悉该伶服药过多，已于前日（十三）下午四时殒命。记者曾访死者家属，得阅遗书，爰志如下，以证该伶自杀，抱有决心也。”

遗书云：“社会不是我的，恐怕永远也不会属于我。完了！一切完了！这个无可奈何的人生，全在愧、愤懑、痛苦以及混乱的狭窄中混去了一半，再也不愿意继续在不起波浪的宇宙间生活。我厌倦！我恨恶！现在我所需要的，是离群脱俗去安眠。不吃不喝，不损人，亦不利己，完成清高者所负的超脱的使命。我今天是如何高兴啊！只要你们放松我这一次，我在幽灵深处，永远是感激的。妈妈手上，我存洋一百一十元，慧姐处存洋七十元，这是我年余来在烦恼的编排新剧中所积下，请为我捐献绥远抗日战士们吧！卑卑不足道的我，对国家总算是尽了最后一点赤诚的心。箱内有信札三封，是我要向你们所说的话，请收阅。”

一个有理想、有才华的年轻女艺人，在黑暗的旧社会中，处处受到恶势力的压迫，终于走上了宁为玉碎的道路，死得那么从容，那么坚决，却念念不忘被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多灾多难的祖国，献出了一个十九岁姑娘编剧所得的全部报酬去支援抗日战士，这是一颗多么赤诚的心啊！

张曙在长沙创办紫东艺社

柳铁城

长沙市开福区北正街北端，有一条僻静的小巷，叫紫东园，六十多年前，这里住着著名音乐家张曙。他以居处街道名称，于1936年开办“紫东艺社”。这是当时湖南文化界抗日救国会的一个外围组织（还有一个组织叫一九三六剧社），吸收了小学教员、中学生、店员参加歌咏活动，教唱抗日歌曲，还联合美术界人士朱人鹤、翟翊指导绘画，传授木刻技术。一时紫东园这条小巷，打破了长期的沉寂，星期天更是热闹，有不少青年登门求教。

张曙原籍安徽歙县，原名张恩袭，又名曙云，早年曾在上海艺术大学和国立音乐学院学习，参加过田汉创办的南国社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到长沙在明德中学担任音乐教员。他上第一堂课就教《大路歌》，接着教唱《开路先锋》，校园里课余时随处可听到“哼！哪喀！嗬！嗨！咳！嗬！嗨！……”修路的号子声。教唱《毕业歌》后，校内到处呼唤“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歌声鼓舞着我们，我们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张曙在教学上深入联系学生，课余组织指导音乐活动，深受欢迎与爱戴。明德中学国文教员章东岩与张曙合作成立了湖南学生抗日救国会（简称“学救”）。在民族先锋队的配合下，很快发展到二百多人。1936年10月紫东艺社团结刘已明、黄源洛、刘卧莲等学院派音乐家和中学生、小学教师参加合唱的音乐会，在教育会坪内中山堂聚集庞大的合唱队伍，高歌救亡歌曲，为大众所欢迎。正统派的高雅音乐《天伦歌》、《卖布谣》、《闲居吟》也受到赞赏，形成了音乐界的统一战线，影响深广，是长沙最早的一次盛大的音乐会。

20年代末黎锦晖创办明月歌舞团，演出《毛毛雨》、《桃花江》等歌舞音乐，在社会上曾风靡一时，流行甚广。张曙积极从事抗日联咏活动，以紫东艺社为阵地，扩展中小学青年教师歌咏队伍，用高昂的歌声表现了人民抗日救亡的坚决意志，也是对黄色音乐的有力鞑伐。

张曙在1925年参加田汉组织的以戏剧活动为主的南国社，并演出过《回春之曲》，饰演爱国华侨高维汉。到长沙后在一九三六剧社演过《南归》和《我们的故乡》等话剧。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

1938年2月28日张曙随郭沫若去武汉，4月参加国共合作的军委政治部三厅工作。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田汉任艺术宣传处处长。为“保卫大武汉”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张曙与冼星海一起创作和教唱抗敌歌曲，组织了声势浩大的万人大合唱。10月，日寇进攻武汉，张曙随三厅转移到长沙，后去桂林，于12月在敌机轰炸中不幸牺牲。一生为革命音乐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创作歌曲二百余首（现存七十余首），尤以《丈夫去当兵》、《日落西山》、《保卫国土》、《洪波曲》等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内容大多为歌唱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精神，素材来自生活。有鲜明的民间风味和浓郁的民族特色。

张曙牺牲后，安葬事宜，有当时在三厅工作的黄甫苏同志参与。事后若干年，谈及此事，据云：遗体埋葬在桂林市郊将军凉水井。张曙创作的最后一首歌曲开头两句歌词是：“十二月天吃凉水，点点滴滴记在心。”他牺牲的时间正是十二月，墓地正是凉水井，竟如此巧合。

张曙是我国现代有成就的人民音乐家，牺牲时仅仅29岁，英年早逝。他短暂的一生，为党为人民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在长沙居留几年，将紫东艺社办得有声有色，使新音乐工作得以发展，长沙人民应该永远怀念他。

怀念谢翰华同志

彭小峰

今年3月21日我去山东济南参加中央文史研究馆召开的会议回来，刚下火车，馆里的同志告知我，谢翰华（字梅奴）馆员因患脑溢血病，医治无效，不幸于3月14日溘然辞世。我突然听到这一悲讯，内心感到十分悲痛，痛惜我馆失去一位才艺卓越、年高德劭的好馆员，我自已失去一位值得尊敬、令人仰慕的良师益友！

我认识谢老的时间并不很长，是到省文史研究馆工作以后才相识的。他那忠厚长者的谦逊态度，永不疲倦的好学精神，精益求精的精湛才艺，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谢老是一位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金石篆刻家，他在30年代青年时期即已崭露头角，蜚声国内，著有印谱行世。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以刀笔代枪，刻印数十方，拓成长卷，为唤起民众，抗敌御侮大声疾呼，进行抗日爱国的宣传，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并博得高度评价。以后，他为生活奔走各地，但爱国之心历久未衰，一直凭着艺术家的良知良能，为丰富祖国文化宝库默默奉献。他几十年奔波在外，主要靠雕刻谋生，最后依然是一身正气，生活清贫。在"文革"中，他受到不公正对待，被抄家，被批斗，甚至身系囹圄；落实政策后，他并不以此耿耿于怀，也不消沉疏懈，仍然一本对金石篆刻的执着追求，握着相依为命的刻刀，为歌颂社会主义，为赞美改革开放，为弘扬祖国传统文化，更加精神焕发，辛勤耕耘不息。这显示了谢老的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宽广淡泊的胸襟。

谢老学识渊博，篆刻造诣很深，饮誉海内外。他对金石之道孜孜以求，博采众家之长，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但他从不夸耀自己，也不随意贬低别人；他虚怀若谷，没有半点架子，相反，总是谦逊地说自己的篆刻艺术进步甚微，愧疚良深。其实，他到晚年，技艺日臻成熟，宝刀未老，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高度。前年9月，应中央文史研究馆之邀，我馆一部分馆员赴北京参加全国文史研究馆书画联展开幕式，并进行参观学习，谢老属被邀之列，他接到请柬，喜形于色，欣然接受，并同大家一道前往。北京，他已经阔别40多年，

岁月悠悠，这次旧地重游，目睹祖国首都的巨大变化，人事沧桑，使他感慨不已。在北京的一个宁静的夜晚，他和我作了一次促膝长谈。他怀着深沉的感情，向我述说了过去几十年的动荡生涯和坎坷遭遇，谈了他的艺术成长过程和治学态度，还风趣地介绍了他个人生活中的许多悲欢往事。他最为惋惜的是他的治印的成果在"文革"中被毁于一旦，所有治印书籍荡然无存，因此，给他在研究整理工作中带来不少困难。追怀过去，谢老壮志弥坚，"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他决心在来日无多的晚年，继续为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文化传统献出自己一颗赤诚之心。他不无遗憾地说："现在年老了，视力十分衰退，几至不能捉刀，树欲静而风不止，心有余而力不足，心手相乖，良可痛也！"

今年春节前夕，他老正在住院，我代表组织去医院慰问和看望他。那天正下着霏霏冷雨，病房里空落落的，只见他闭着眼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我轻步移到床前在他耳旁轻轻唤了一声："谢老！"他睁开双眼，看到是我们来了，顿时坐了起来，显得分外高兴。他说他的中风后果并不严重，神志清醒，言语自如，行动基本正常，他准备很快出院，然后在家治疗。对此，我稍感欣慰。将要离开病房时，我合十祝他老早日康复，春节愉快，健康长寿！这时，他眼睛湿润，深情地目送我们，频频颔首，表示谢意。谁知此次看望竟成为和谢老的永诀！

谢老已经走完他的七十八个春秋人生历程，哲人永逝，艺苑留芳，风范长存。我们将以努力做好工作，弘扬祖国优秀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对谢老的最实际的纪念。

电影明星王莹在长沙

柳铁城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和母亲回到长沙，租赁营盘街两间楼房住下，恰好庆嫂（叶隆庆）也由耒阳返回，我母亲和故友重逢，欣喜万分，知庆姨还未定居处，遂邀她来我家暂住。10月中旬，我患病高烧不退，经诊断为副伤寒。庆姨是一位高级护士，她认为得了这种病要卧床静养，吃流汁，注射退烧药剂，更重要的是护理工作，她便主动提出为我担任家庭特别护理师。在庆姨精心照料下，我的病况日益好转，体温逐渐减退，她仍教我卧床不要乱动，由半流汁渐改为面食并增进营养，因之一月之后，我的身体渐康复。为了使我减除病魔袭击后的烦扰，庆嫂坐在床前给我讲故事。最使我不能忘记的就是她与同学王克勤相处在一起，而被牵连无端受罚的经历。王克勤后来改名王莹，成为著名的电影明星与革命者。

70年前长沙湘雅医院护士学校招生，考试中录取了一个成绩最好，但年龄最小的学生王克勤。她个子不高，相貌端庄，明眸皓齿，目光炯炯，显示着聪明敏慧。

王克勤原名喻志华，安徽芜湖市人，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洋行任职，母亲是一位中学音乐教师。她是唯一的独生女，从小受到父母的宠爱，在母亲的教养和熏陶下，能歌善舞，在小学举行的游艺会上，经常展现出表演才能。她一家三口本可以愉快幸福地生活下去，可是父亲生活孟浪，商业上投资失败，又挥霍亏空洋行巨款，家境一落不振。母亲忧虑成疾，在她10岁那年病故。父亲随后续娶，后母对她百般虐待，11岁那年竟至将她卖给人家作童养媳，用这卖身钱偿还债务。喻志华又遭受婆母的折磨，她毅然逃到外婆家，后又辗转到长沙，找到了舅父王守仁，被舅父母所收养。舅父是长沙一所私立中学的教师，舅母在铁佛东街一所教会小学任教。喻志华是更名王克勤考入湘雅医院护士学校的。

王克勤在1926年8月到湘雅后，学习认真，加之领悟力强，成绩优异。她服饰朴素，仪表大方，举止潇洒，待人接物文雅而有礼貌，没有多久，她结

识了许多朋友。当时医院的规模不大，每年护士学校只招10名学生，分配宿舍时，3人一个房间，新老学生搭配，同房中高班同学叶隆庆与王克勤同住一室。叶隆庆比王克勤要大好几岁，是三年级学生，她待人谦和热情，性格爽朗，她知道克勤的身世和不幸的遭遇后，非常同情，她像一个大姐姐一样，从生活到学习无微不至地关心小克勤，她们结成了姊妹般的亲情。每到星期日，叶隆庆总把她带回家里尝尝家庭的温馨，或者到岳麓山、天心阁去领略大自然的美景，舒畅心情。

叶隆庆有一个表姐名叫张端芳，也常到叶家来，与克勤认识了。她是湖南纺纱厂的工人，1927年初她邀克勤去对河纱厂玩过。这时大革命运动已开展起来，工厂里成立了工会，到处都贴了“工友和农友团结起来、打倒列强、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克勤感到很新鲜，也受到了鼓舞。克勤也由此认识了几位青年女工。

王克勤回到学校以后，把工厂参观所得的感受和同学们谈起来，大家认为我们也应该投入这时代的洪流。宁静的湘雅医院护士学校，也开始和其他学校及外界工厂联系起来，他们走出校园参加提灯会游行，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向封建势力及土豪劣绅宣战。并组成文艺宣传队演出了《豪绅家的丫头》话剧，剧中克勤饰演小丫头沦为奴隶的悲惨命运，控诉土豪劣绅的罪行，极大地激起了人们的义愤。

湘雅医院对面是雅礼中学。那时中学是男女分校的，雅礼学生会想开展戏剧宣传活动，苦于找不到女演员，同学中有人看到过王克勤演出的话剧，认为是最佳人选，于是派人到湘雅护士学校联系，要求两校合作演话剧，并征得本人同意，王克勤参加排演独幕话剧《咖啡店之夜》。

《咖》剧于1927年2月，在雅礼中学大礼堂演出。这是田汉于1920年在日本留学时创作的。剧中主人翁白秋英离开农村，到城市的咖啡店当侍女，她是在父母去世后，伯伯、叔叔怕她在家里打扰，急于要把她嫁出去，被逼着逃到城里来的。听说恋人李乾卿也到城里进了大学，在这举目无亲的人海里，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着李来接她，天天翻阅李的小照和来信，这一夜在咖啡店白秋英和李乾卿不期而遇。李已另有所欢。“穷人的手和阔人的手是永远握不牢的。”白秋英醒悟了：“眼泪是不解决任何问题的，勇敢地活下去吧！”这是一幕悲剧，王克勤饰演白秋英，她与剧中主人翁有相类似的命运，体会角色的感情深刻，表演细腻。她目睹昔日的情人竟是一个爱情的骗子，她痛哭受到欺骗，她也从这认识到，只有和命运抗争，坚强地生活下去，白秋英由颓丧而走向曙光。王克勤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眼泪和赞誉。这显示了她聪慧和天赋的艺术才华，无怪乎以后竟成为一颗影剧双栖的耀眼明星。

大革命的浪潮在湖南更高地卷起，卷进了长沙城，产业工人组织最早行动起来，农民协会也发动农民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城市店员工人、泥木业工、人力车工也都有相应的组织在行动。学生在各校有学生会，市、县又有学联的统一领导指挥。王克勤最先行动起来，在学校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游行，宣传打倒列强，除军阀，铲除土豪劣绅，宣传妇女解放，禁止赌博和吸鸦片，反对封建迷信。她并且与纺织厂工人张端芳联系，为地下党组织传送情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湖南继之发生了"五二一"马日事变，形势突然变得险恶，敌人开始镇压革命人民，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及怀疑对象。长沙城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王克勤是一向活泼好动的人，也忽然变得沉默寡言了。叶隆庆看出了她的心思，关心地找她谈。形势的剧变令人意想不到，王克勤痛恨反革命残酷对待革命群众，也担心会殃及自己，准备撤离。叶隆庆帮助她清理最简便的行装，焚掉《新青年》《向导》等一些爱读的书刊。扎上小辫，换成村姑打扮，叶隆庆把积存的仅有 20 元银元，交给她作路费后，从医院太平间后门送出去，直达湘江码头上了小火轮。可巧这天晚上正是王克勤轮班到病房实习夜班，叶隆庆也只好为她顶替，免露破绽，拖延时刻使克勤安全脱险。

叶隆庆下午 7 点半钟就进入内科病室，接过班，照例检视病人的体温和脉搏，就安排病号眼药，然后到值班室翻阅病历记录。她总觉得今晚的时间过得太慢，心里老惦记着王克勤，并祝福她一路顺风。时钟快到 10 点钟了，叶隆庆正私下感到宽慰，忽然一个穿军装的人闯进病室办公室，另有两个背枪士兵候在门外，来人径问谁是王克勤，值班医生和护士面面相觑，叶隆庆方答道："王克勤请假外出，大概快回来了，我是顶替她值班的。"接着两个枪兵进来，不由分辨，将叶隆庆推搡着押走。

湘雅医院派人打听，设法营救，才知叶隆庆已被送到新成立的铲共法院关押。经过好几次审讯，叶隆庆是一问三不知，只承认与王克勤是一般同学关系。经半年后，因无任何罪证，只得由湘雅医院院长王子玕具保开释。

叶隆庆 1906 年生，毕生未婚，从事医务工作，待人宽厚热情，乐于助人，尽忠职守，品德高尚。退休后，住东茅街一栋平房的集体宿舍内。我曾去探望。1981 年她又迁居对河咸嘉湖省卫生厅离退休老人幸福楼，并与由麻风医院退休的姨侄女张孝珍同住，张亦系未婚独身，俾便照应。我曾与妻子携孙女杨帆专程前往访候。老人年逾古稀，仍精神矍铄，谈及往事，记忆犹新，感慨万千。老人于 1991 年病逝。

王克勤逃离长沙后到南京，在地下党组织帮助下又逃到上海，改名为王

莹。不久，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济难会"。相继在中国公学和复旦大学文学系学习。她在学校刻苦读书，也经常参加一些校内的文艺活动。1930 年 5 月 11 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莹是复旦剧社的成员，在校外又参加了夏衍等人组织的上海艺术剧社。后来，党的电影小组又把王莹推介到明星电影公司，主演了《女性的呐喊》、《铁板红泪录》、《同仇》几部电影，每个角色都演得恰如其分，受到影剧界和广大观众的赞许。玉莹除潜心影剧创作外，还写小说、散文、评论等发表，被誉为"影剧两栖作家明星。"

夏衍编写的剧本《赛金花》，1936 年 4 月发表在郑振铎主编的《文学》杂志上。赛金花是清末名妓，剧本是借这一位历史人物，来讽喻当时政府屈辱妥协的外交政策。于是剧人协会一致要排演《赛》剧，就在宣布角色名单后，谁也没料到竟引起一场风波。

蓝苹原名李云鹤，山东人，从小迷上了京剧，在王泊生所办的京剧院学习过，她曾下海进京剧班当演员，后通过影剧评论家唐纳的关系，到上海电影公司，拍过电影《王老五》，在业余剧人协会主演过《娜拉》，和赵丹合作主演了 19 世纪俄国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创作的话剧《大雷雨》，在影评家唐纳的吹捧下，蓝苹得意忘形，自以为了不起。剧人协会这次宣布《赛金花》角色，名单中王莹排在 A 组，蓝苹为 B 角，没等名单念完，蓝苹已是脸色苍白，全身抖颤，冲出会场，又哭又闹，只问"王莹哪点儿比我强？我才不与她垫背……"，大家对她这种自高自大的态度，和飞扬跋扈，泼妇骂街的作风，十分反感。王莹提出忍让放弃的想法。一个演员突然提出，如果赛金花不由王莹扮演，他就退出剧组，这样激起了大家跟着附议。不久，由金山和王莹新组的四十年代剧社，排演了《赛金花》，于 1936 年底在上海公演了。由史东山、于伶、洪深、应云卫等组成导演团，洪深执行导演。盛况空前，轰动上海，金城大戏院日夜两场，场场爆满。不久，《赛金花》又到南京，在国民大戏院公演，观众踊跃，座无虚席。一场争演赛金花的闹剧以王莹获胜，蓝苹惨败而告终。

谁知 30 多年以后，蓝苹已成为"第一夫人"江青了，她没有忘记当年争演《赛金花》一箭之仇，竟在 1967 年，以"30 年代黑明星""叛徒""美国特务"等罪名，将王莹逮捕入狱，一关就是 7 年，刑讯、逼供，百般凌辱摧残，使王莹一病不起，在 1974 年 3 月 3 日含冤去世。死亡书上没有姓名，只有"6742"——一个囚徒的号码，而且立刻焚尸灭迹。一代璀璨的明星，一个为党为革命作过许多贡献的艺术家，含冤而死，令人气愤，使人悲痛、惋惜。

苗俗漫谈

阳盛海

只要您进入苗乡山寨，热情好客的苗家人便视您为贵宾。年逾花甲的老大爷会双手捧着那又长又亮的金竹烟杆递到你面前，请您抽上一锅浓浓的土烟；青年小伙子会斟上香喷喷的高粱酒，同您尽情地干上几碗；姑娘大嫂们会端来香甜可口的油茶，请您吃上四大碗方肯罢休……。可是，做一个苗家客人也得注意，不可犯了苗家的规矩。那么，到苗家做客，要注意哪些规矩呢？

行走

苗家人是十分讲礼貌的，凡事以礼待人。同客人走在一起，必须让客人先行，即使是年迈的苗家老爹也是如此。与人路遇，要先停步让于路边，从对方的一侧绕行而过。如在本寨区域内遇见客人，不论生熟，要说一声“您来啦”，“进屋坐”等打招呼的话。若是遇见山寨的客人，不分亲疏，都必须以主人的身份挽留。进入寨门以后，客人必须主动让主人先行，这时主人也会主动走在前面带路，表示欢迎客人。

进屋后，未经主人允许，不要随便进卧室，特别是女性的房间。

言谈

苗家有一句格言：“唱歌无大小，讲话有高低。”意思是男女青年唱俗歌可以不避长辈，但绝不可在长辈跟前嬉笑戏谑。在日常生活中，也得严格注意辈分。辈分是不论年龄的，即使是孩童，只要他辈分大，也必须尊重，不可无视。日常生活用语，也有许多讲究，如睡觉苗语叫“乜”，但在喜庆节日或对客人来说，就必须说成“瓦埚”，含有祝贺之意。苗家很注重对人的称呼，对年长的男女老人，可呼为“同年爹”“同年娘”。男客人对平辈的男者，只要年龄相仿，可称“同年”、“老庚”；对同辈的女者，可称“同年嫂”“同年妹”。苗家最喜欢这种“同年亲”，他们在山田中唱道“除了锦鸡无好鸟，除了同年无好亲”，同年才是至爱亲朋。男人对女子的称呼要特别注意，

年轻的男女切不可直呼姑娘为“妹妹”，而应称做“同年妹”或“表妹”，因为“妹妹”是苗家的特殊爱称，一般只用于夫妻之间。还要注意，同辈人只呼名而不呼姓，表示亲切和尊重；对长辈或老人，姓和名皆不能呼，只能呼以辈称。

就坐

到苗家做客，就坐的方式也是很讲究的。当你进入茶堂（伙房）时，主人便热情地招呼你坐下。客人应当坐什么地方为宜呢？一般来说，苗家的茶堂都以火塘为方位，年长的人坐上方，左侧坐男主、客，右侧坐女主、客，下方为未成年的孩童座位。倘若不按这个规矩就坐，男人坐到女人的位置上去，会受到别人嘲笑；女人坐到男人位置上去，会被视为你不懂礼节。苗家伙房的矮木凳是靠墙放的，你如要起身走动，必须从别人前边走过，因此你应该招呼一声“对不起，从你前边过了”。酒席上的坐位也须按辈分，同席的长者、贵宾坐首位（俗称上席），席左为大，席右为小，下端次之。如果坐错了，会导致不欢而散。

吃喝

来到苗家坐定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吃油茶。油茶是一种用糯米、玉米、花生、黄豆等加工油炸之后，以油炒的茶叶加水煮沸，再冲泡上述食物而制成的一种香酥可口的饮食。主人用红漆茶盘端着香喷喷、热腾腾的油茶，恭恭敬敬送到客人面前，这时客人务必起身用双手接其中一碗。吃完这一碗后，切勿将碗送还橱灶，须等主人用茶盘来接，否则主人会误认为你不乐意或嫌她做的油茶不好吃。主人接碗时，每个客人的碗所放的位置是绝不会搞混的，苗家姑娘大嫂在这方面有惊人的记忆力，即使客人众多的场合，他们端送油茶总是“碗归原主”。如果客人觉得实在吃得太饱，或不习惯吃，可以向主人说明原因，但不要说油茶不好吃之类的话。如果主人同意你的要求，则只用一只手来接碗，如仍用茶盘来接那便表示让你继续吃完四碗方肯罢休。吃完油茶，主人会端来一杯清水或淡茶，这是用来漱口的，倘若你把它喝了，就会闹出笑话。苗家有好客的风尚，一家有客，众家来请。每次吃油茶时，隔壁邻居也做好油茶端来敬客。这时，客人即使吃得太饱，也必须再吃一碗，以示领情。宴席上，主人斟酒时，客人必须起身双手接杯。主人举杯邀请时方可喝酒。吃菜也同样，主人给客人一一夹菜，然后自己再吃。客人推让，主人会以为讲客气，总是让你吃下去。有时主人把菜夹起，猛然放到你的饭碗里搅拌几下，表示让你一定要吃掉。更有甚者，主人有时会夹起一块肉，在你鼻子下边一抒，这样一

块肉，客人无论如何是要吃下去的。

苗家人是通情达理的。倘若远道而来又不知苗乡习俗的客人，他们会热情指点，不会处处计较的。请您不必顾虑，苗家人会礼貌、热情地欢迎您到苗家做客。

长沙战国帛书、帛画发现始末

吴铭生

长沙战国楚墓出土的帛书（又称缯书）和人物御龙帛画举世闻名，海内外都晓得这两件文物是中国罕见的国宝。但它俩的命运各有千秋，帛书是解放前被“土夫子”盗掘的，已流失海外，而人物御龙帛画却是劫后余生，70年代始重见天日。奇怪的事是，这两件国宝竟同出于一座墓葬，一穴藏二宝，可谓有趣的巧合。其中帛书和人物御龙帛画发现的始末更令人关注，本人就所了解的情况，详述于后，供读者了解。

战国帛书痛失海外

解放前，长沙“土夫子”盗墓，在全国来说是很著名的，所盗掘的文物难以数计，其中不少珍贵文物已流失海外，令人万分痛惜。战国帛书究竟是谁盗掘的，原来是“土夫子”任某所为，他是“土夫子”中的高手，资格老，本事强，盗墓百发百中，从不落空，此人在建国后被录用在省文物工作队当发掘工人。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他在长沙市南门子弹库附近（现址为省林业勘察设计院）找到一个洞子（古墓），邀了几个同伙，先打竖井往下挖，穿过膏泥，将木椁凿洞，从中盗取文物。任某有次对我说：“那个洞子很费力，里面有青膏泥不好挖，尤其是椁板太厚难得凿穿，得手的东西不多，有几件铜兵器、漆耳杯、木人（木俑），还有一些残碎的纺织品（即帛书破片）。”我问他这个洞子的东西，卖给谁了。他说：“卖给唐裁缝，价格便宜，那些烂丝织品没算钱，相送给他。”唐裁缝姓唐名鉴泉，他原来做过裁缝手艺，许多人都叫他唐裁缝。唐在长沙市原东站路（老火车站附近）开了个“唐茂盛”小古玩店，本钱不多，只做本庄生意，就地进货就地卖出，从中赚些转手钱。唐与“土夫子”任某做了这笔生意，非常高兴，可以卖个高价赚大钱，但他对这些破丝织品，只发现上面有文字和图像痕迹，究竟是什么东西，却不清白，只好找个行家去问。唐晓得著名学者商承祚先生爱好文物，是个有大学问的人，而且与自己有过交往，于是写信给商，详细告诉丝织品的情况，并表示愿意卖给

他。此时商先生正在重庆，因事繁忙，不能亲自到长沙看原物，就委托他的一个朋友——沈筠苍先生前来了解情况。沈在唐裁缝处看了原物，复信给商先生说：唐出示的原物，是将丝织品残片铺贴在白纸上，外面再用报纸垫托，大块的不多，小块的很多，将来拼复原件恐怕不可能。商先生接到信后，虽然考虑到拼复原样难度很大，但觉得这件文物的历史价值不同寻常，因此与唐裁缝议价。正在讨价还价的时刻，不料长沙大古董商蔡氏从外地回来了。蔡得到上述消息后，马上找唐裁缝，愿出高价买这批东西，于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帛书就为蔡所得。上面所谈的就是商承祚先生几乎拥有该帛书的大致过程。蔡氏是长沙有名的古董老板，他常做洋庄生意。所谓洋庄生意，就是与洋人打交道，长沙收进上海卖出，获利丰厚。他虽不是很有学问的人，但读过不少诗书，肚子里有很多墨水，尤其是多年经营古董，见多识广，所以对这些丝织品的历史价值，心中有数，于是倍加珍惜。蔡得手后，闭门在家将帛书残片精心整理，一块一块拼接，同时要他的大儿子蔡修焕当助手（此人是个人才，善于工艺美术和设计，现已定居海外），还请了几个有经验的表画师傅帮忙，帛画拼好之后，又由蔡修焕将文字和彩色图像进行临摹。民国三十三年（1944 年），长沙被日寇侵占，蔡逃难到湘西安化县，并在该地将帛书的研究成果，石印成书，题名《晚周缯书考证》。同年 8 月，蔡氏将此书寄送商先生，那时商先生客居贵阳。这件帛书原物对商先生来说，虽然没有得到，不能如愿以偿，当然感到十分遗憾，然而蔡氏《晚周缯书考证》对他日后所作的比较研究，仍有参考价值。蔡氏将帛书石印成书后，鉴于帛书残片变色的原因，影响其文字和图像难以看得清晰，于是想用先进摄影技术来恢复“庐山真面目”，当时长沙缺乏这种先进设备，经他的朋友钱无咎先生（此人系教会办的雅礼中学语文教师，喜欢古钱币，解放后与蔡同在省文物管理会工作，50 年代著《古钱帛考略》）的介绍，找到该校的美籍教师柯克斯帮忙。柯克斯究竟是什么货色？据商承祚先生在《战国楚帛书述略》（《文物》，1964 年第 9 期）一文中说，柯在抗日战争前几年，以雅礼中学教师身份出现，冒充“文物考古学者”掠夺长沙出土文物，将历年盗窃的文物捆载而去，并在华盛顿举行过一次展览，还印发了图版说明册。1941 年，我再次来到长沙，了解有些汉代砖室大墓，他居然指示“土夫子”进行盗掘，而且守候在工作地点指挥一切，有时夜间还睡到墓里等候天明，将随葬品全部无遗地盗走，我曾亲眼见到被盗的部分墓葬。从上述事实来看，柯克斯是个赤裸裸的文物强盗和骗子，其罪行累累。这次，蔡氏既然找到柯克斯帮忙，无异于自投罗网。柯当时对蔡所托之事满口答应，热情相助，表示一定满足蔡氏的愿望，将帛书带到美国驻沪领事馆拍照，并保证文字与图像都会拍得清晰。蔡当时心里还是有些矛盾，也存戒心，一方面相信美国的先进

摄影技术，另一方面也晓得柯不是个好人，有些不放心。民国三十五年（1945 年），蔡亲自将帛书带到上海，找到他的关系客户古董商金财记老板磋商后，打定主意委托柯去照像。蔡就住在上海等待结果。最初柯谎称驻沪领事馆的摄影设备出了毛病，正在修理，后来又说设备无法修好，为了不使蔡先生失望，来不及通知，就委托好友乘飞机带去华盛顿拍照，等几天就可以带回来，不必担心。蔡听了这番话大吃一惊，意识到这是一场骗局，后悔莫及，就与柯争吵不已，柯克斯非常狡猾，为了缓和这个为难的局面，提出拿几千美金作为担保抵押，蔡拒不同意，相持不下，形成僵局。最后柯一走了之，回到美国。造成帛书无法追回，使蔡财物两空。此件国宝就是这样被柯骗走，起初密藏于耶鲁大学图书馆，后来佛利亚博物馆将其拍成照片，也不外传，使我国的学者得不到照片资料进行比较研究。这样一幅距今两千余年，具有古代宗教思想、天体意识、书画艺术研究价值的帛画，流失海外，国人至今愤慨不已。

人物御龙帛画重见天日

人物御龙帛画，其所以能重见天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归功于“土夫子”任某。如果他不提及盗过帛书的往事，这座在解放前被盗的木椁墓就不会找到，此帛画就会长眠九泉之下，永世不会重见天日。该墓发现的始末说来话长，同时与本人也有关。我自 1957 年错划为右派后，就下放农村监督劳动，1962 年将我调回博物馆，当作发掘工人使用，既要同任某等一起清理古墓，又要绘图、照相和整理资料，真是劳力又劳心。我与任某等发掘工人的关系相处得很好，他们不歧视我，而且照顾我，在工地上我干不了重活就干轻活，不会挖土就倒土，我非常感激他们把我当“人”同等看待，日子久了，彼此就成为知心的朋友。1964 年，我们一起在南区某个基建工地清理墓葬，劳动之余就聊天，有关他们解放前那段盗墓的历史，也成了话题，我喜欢问，他们也愿意讲，左谈右谈，又谈及任某当年盗掘战国帛书之事。任说：“那座木椁墓，我只得了一些兵器、漆木器，还有丝织品（指帛书），便宜卖给唐裁缝，后来唐裁缝又卖给蔡某，他赚了一笔钱。这座墓的东西没有搞尽，估计里面还有一些，要是再清理，说不定还会出好文物。”我听了这番话，非常感兴趣，马上就问任，这座墓具体地点在哪里？他说就在子弹库附近，位置我很清楚，等一下我带你去看。当天下午，他就领我去看现场。在今省林业勘察设计院后面，找到了这座当年出土帛书的墓葬。此时墓葬一角已被该院所盖的临时性围墙压住，到处长满了杂草，任还用锄头挖了这座墓的回填土给我看，证实确是战国墓。看了现场后，我动了心，很想将这座被盗掘过的木椁墓重新清理，一方面能了解帛书墓主人的身份及其相关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了解墓里面是不是还

有珍贵文物。于是，我将上述情况和个人想法，向省博物馆分管考古工作的领导汇报，请求派个干部和我一起去清理。领导听了汇报也感兴趣，并且认为这件事很重要，只是说现在考古部的人都很忙，这件事以后再说，言外之意即是不同意我去清理。后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了，我被中断了考古发掘工作，又成为斗争的对象。1969年起，我又发配到五七干校和西洞庭农场接受监督劳动。1976年，我从农场凋回，仍然是个没有改造好的右派，省博物馆安排我在火车站考古工地当发掘工，继续监督劳动。这时，我又与任某一起劳动，老友重逢，无话不说。任某特意告诉我：“他曾经带我看过那座出帛书的木椁墓，已于1973年5月由考古部重新清理，‘头箱’和‘边箱’里没有什么好东西，想不到在椁板下面隔板上出了人物御龙帛画，真是贵重。”我听了非常惊喜，这座墓终于清理了，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并对任说：“这座墓葬你有功，若不是你记得地点，其他人很难找到，这件贵重的帛画就不会发现。”他只是笑，并没有为自己表功。后来，我从博物馆资料室查阅当年发掘的简报——《长沙子弹库战国木椁墓》(《文物》，1974年第2期)，才了解到任某在解放前盗掘此墓时，所打的盗洞只掘在放置随葬物的“边箱”上部，而人物御龙帛画放置的位置却在椁板下面隔板（俗称内板）上，因此没有受到破坏。此画是在逐层清理葬具时发现的，经过室内整理，才现出“庐山真面目”，一幅距今两千余年的人物御龙帛画重见天日。

该墓年代属于战国中期偏晚，墓主骨架经湖南医学院鉴定为男性，年龄约四十岁左右。葬具为一椁二棺，属大夫一级的贵族。

出土的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上端有竹轴，轴上有丝绳，是一幅可以悬挂的幡。画面有一男子侧身而立，危冠长袍，手拥长剑，立于龙舟之上，龙尾立一鹤，水中有鲤鱼一尾，画之上端有华盖。此画显然不是纯粹的画饰，而是一幅寓墓主人“御龙升天”“引魂升天”的幡，其内涵与《楚辞》不无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它的研究价值不局限于绘画艺术，更富有意义的是提供了研究楚人神话、民俗观念、宗教思想等珍贵的实物史料。

人物御龙帛画的重见天日，从发现的过程来谈，既是劫后余生，又是不幸中的大幸。其当事人任某，如今已作古多年，究其一生，历史上曾有过错，但解放后为湖南的考古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永远令人忆念。

人物御龙帛画出土问世后，受到郭沫若先生殷切的关注，1973年6月，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将此画的照片及摹本，呈送郭老。郭老看后，兴奋不已，作《西江月》一首，题长沙楚墓帛画：

仿佛三闾再世，企翘孤鹤相从。陆离长剑握拳中，切云之冠高耸。

上罩天球华盖，下乘湖面苍龙。鲤鱼前导意从容，瞬上九重飞动。

屈原墓今昔

周秉钧

屈原的墓在湘阴县北七十一里，载于唐代的《元和郡县志》。明代的《一统志》说得比较具体。《一统志》说：“屈原墓在汨罗山上，汨罗山即今烈女岭，在汨水东北。”汨罗山在什么地方呢？汨罗市市志办公室编写的《楚塘乡志》说：“汨罗山在楚塘乡楚南村和范家园乡永青村境内，汨罗二水汇流其下，京广铁路穿山而过。在约一平方公里的山丘上，散布着十二个高大的封丘堆，这便是屈原十二疑冢……墓前有清同治六年（1867年）和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刊立的墓碑，文分别为‘故楚三闾大夫之墓’和‘楚三闾大夫之墓’”。这里详细地说明了屈原墓现在的具体位置。

屈原虽然有墓，在封建社会里往往是残碑片石，草树荒芜。杜佑《通典》说：“罗江有屈原冢，今有石碑，文为楚放臣屈大夫之碑，其馀字灭。”碑上文字被风化磨灭了，无人修理，这是在唐代的实际情况。

清代嘉庆七年（1802年）贡生周嘉湘作诗描写屈原墓说：“鲤鱼岭上寒猿泣，狮子滩头杜宇哀。二十四坟何处是，残碑无字蚀苍苔。”汨罗山又名烈女岭，后来音变，呼为鲤鱼岭。二十四坟，即指屈原墓的许多疑冢。残碑无字，遍布苍苔，这是屈原墓在清代的实际情况。

解放后，国家对文物十分重视。1956年公布屈原墓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6年又建立了新碑。1981年汨罗县人民政府又将十二疑冢间的小墓群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这就是屈原墓在现代的情况。

屈原墓相传为女媭所筑。她若有灵，抚今思昔，应当破涕为笑了。

马王堆汉墓女尸复制始末

张兰欣

1972年5月，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极其珍贵精美的漆器、丝织品、帛书、帛画等文物，特别是二千年不腐女尸轰动中外。女尸是长沙国丞相轶侯利苍的妻子，出土时肌肤完整，且具弹性，关节还能活动，进行保养处理的医师，还能向体内注射防腐剂，是世界上首次发现的罕见的湿尸。出土后，“女尸热”立刻席卷长沙，群众视为特等新闻，津津乐道，民间顿时流传起关于墓主人身世的种种哀艳离奇神秘莫测的故事，甚至有人假大家之名写成文章流传。当时这批文物曾短时间在湖南省博物馆展出，那盛况真可以说是万人空巷，人们争先恐后，都以一睹女尸真面目为快，把博物馆挤得水泄不通。这次重大的考古发现，得到了周总理的关怀，中央拨专款200多万元，为这批文物修建一座有恒温恒湿设备的文物仓库。女尸存于地下室中。1974年馆领导决定复制女尸模型，作为检验今后有无变化的依据。我曾一度学过雕塑，接受了这一任务。女尸泡浸在甲醛溶液的木棺内，既不便测量，更不许触摸，要分毫不差地进行复制真有些困难。女尸的发现对于医学史和防腐技术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日本人曾想以丰田汽车、美国想以月球上取得的石头交换一根头发来进行化验而不可得。复制工作责任重大，难度也很大，在泥塑时，我多少带着几分惶恐的心情，小心翼翼地反复琢磨，经过大约一个月才完成。这时，女尸已经陈列在新建的文物仓库，仓库既保存文物，也作展览场所，一年四季都保持9℃以下的低温，室内寒气逼人，为控制观众人数，需一定级别持有证件者才能参观。我也只能在开放展出的同时进行工作，观众参观“死老太太”时，竟然多了一个活老太太了！遇到突然停电，得从地下室摸黑上来，讲解的姑娘们都说我够大胆的。泥塑完成后，上海自然博物馆制模专家白春生师傅应邀带了两个助手来帮助翻模制作蜡像，用的石膏都是架起灶来亲自动手炒的。制蜡像的材料是白蜡、黄蜡加热溶解后加入少量的硬蜡酸，按女尸肤色调配油采。女尸生前秃顶，仅两鬓及脑后有些许头发，与所戴编织精致的一束假发合盘成髻。蜡像烧铸成后，四处寻访，才以较高的价格征得一理想妇女的长辫作

材料，头发是顺着长势一根一根装上去的，那工程的细致是够惊人的了。最后浑身上下再用油彩加以调整润色，当模型与原件相并列审查验收时，达到几乎似真的程度。

应各地纷纷要求，馆里组织了马王堆出土文物在省内外巡回展览。所到之处，观众的踊跃是其他任何文物展览所不能比拟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马王堆出土文物及湖南历代文物珍品展，从1985年起先后在日本、香港、英国等地展出。女尸模型取代不便外运的原件渡海出洋，增添了展览的吸引力。国外报刊以大量的版面、醒目的标题争相报道，港报还刊登了女尸原件和复制品对比的照片，誉为“真假难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而悠久的文化，以马王堆出土的珍贵文物及千年不腐的女尸，铁证般地再现于世界人士面前，海外炎黄子孙参观后，无不以此自豪！

《水经注》湘中诸水正误

李行之

《水经注》一书，久为学术界所推重，有的人甚至把它看作“圣经贤传”，不敢稍加疵议。不过，它虽是一部有价值的书，而其成书时间，据前人考定，约当北魏廷昌至孝昌（512—517年）这一时期之内。由于当时政治、交通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所以该书于北地水道记述较详，而向来被称为水乡的江南，却反而简略。由于江南地区系作者足迹所未曾到，只是根据地志、图经、山水记等撮合而成，既然是地非亲历，自然就难求实证，每遇矛盾，无所折衷。其次，是书流传已久，在这一千多年中经过多数次传抄翻刻中，造成的脱漏和伪误，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再次，曾经唐人李吉甫的改造，而且在宋崇文总目中即已缺少五卷。由此可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水经注》，已完全不是郦书原貌。因此，每使人感到“展卷则脉络分明，履地则伪误百出。”

自明以至清末，治《水经注》的学者，不下三十余家，他们从事校勘、注疏等工作，对其中的衍讹和讹脱，多所订正。但是，他们大都如刘承干氏所早已指出的：“就文笺义，不问地形，偶辨讹淆，仍囿窠臼。”即使号称明清四大家者亦莫不如此。宜都杨守敬，所作《水经注疏》及水道图说，虽号称通情，也仍然是“恪遵师说，罔敢稍违，是故近代鸿篇，而犹依傍步趋，罕抒心得。”此外，惟浙人丁恭甫，颇能独树一帜，他认为“郦氏原文，乖于地势，前后互易，便合真形。”但是他著的《水经注正误举例》仅仅谈到浙江和两广。至于近人岑仲勉的《水经注校笺》，又仅完成郦注的第一卷，同为未竟之业，不免使读者感到遗憾。

在许多地方志和其他一些地方文献中，指出郦注的错误之处者颇为不少，由于这些资料比较零碎而又分散，故不为人们所重视。笔者虽每欲加以搜录，而人事牵引，未能卒业。现就手边所有资料，依次排比，间亦略抒己见。抛砖引玉，窃自比于丁谦，晚景无多，只合先谈湘中诸水。纰谬和疏漏的地方，所在难免，深望大家补充订正。

湘　源

《水经注》：“湘、漓同源，分为二水，南为漓水，北则湘川。”又“漓水与湘水，出一山而分源。湘、漓之间，陆地广百余步，谓之始安峤，峤，即越城越峤也。”

以上两说互异，虽同出郦注，而同源？异源？未能折衷一是。

据《湖南省志·地理志》（1962年出版）：“湘水发源于广西省临桂县海洋墟的龙门界，流经兴安县太平堡，至漾潭（应作渼潭，地理志误）分左右二江，南称漓水，入桂林。北流称湘水”。

又王九溪《湘水记》：“甲戌（1754年）秋，余至粤西，呼土人为前导，始得探其源而记焉。湘水发源于海洋山，山下有洞，可容十余人，入洞，行二十余丈，遇一小谭，广可三十余步，深不可测，潭周每路可通，不可以渡。土人云：‘此即湘漓二水之源也。’及出洞，见小溪一线，宽不过尺许，涓涓不息，窅深幽曲。沿涧行二里许，至太平堡，又九十里，至渼潭，潭下半里，中横一洲，名曰铧咀，逆距中央，江水至此，辄分左右。咀北，有大平坝；南有小天平坝，即楚粤二水分界承流之处，南为漓水，北则湘川。”

又据刘甲柱《灵渠三议》说：“湘水主源为海洋河，出临桂县的龙门界；漓水上源为始安水，出灵川县的点灯山，漓水南去，湘水北流，中隔一山，其最近距离约一公里半，因作灵渠，沟通两水，并分湘入漓，以便航运”。此系近年实地考察所得，非求诸纸上者可比。揆诸常理，若湘、漓果出一源，则又何为而开凿一兴安运河？

按：王九溪虽曾亲自进行考察，由于他只考湘水，未及漓源，故有片面之失；至于《湖南省志·地理志》则纯系抄袭《湖南全省舆图说》旧文，故亦因治致误。综上所举，应以刘说湘、漓异源为是，断不可因分湘入漓，即认定湘漓同出一源。

石　鼓

《水经注》：承水“至湘东临承县北，东注于湘，谓之承口……县有石鼓，离六赤，湘水所遥，鼓鸣，则有兵草之事。”

据《湖南省志·地理志》：“自衡（衡阳市）又北二公里，至石鼓咀，在石鼓咀左岸，有蒸水来汇。”又“蒸水，（古作烝水）俗称草河……至衡阳市石鼓咀注入湘水。”

又据王闿运《衡阳县志》说：“山势青圆，有类鼙鼓，山体纯石无土，即状为名。若六尺小石，不得言湘水所迳。”“昔庾仲初为零陵太守，有观石鼓诗

云：'鸣石含泉响，雷骇震九天。'又曰'翔霄拂翠颠，绿涧激崖间。'由此可知，石鼓之名，由水激响。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五月甲子，蒸水暴涨，漱激石鼓，响声如乳，覆舟折栋，纵横湘曲，知府高人监，登山瞭望，见水势喷薄，声若雷辟，顾谓左右曰："石鼓鸣矣。"

按：石鼓山，在衡阳市东北的瞻岳门外，俗称石鼓咀，山下为蒸水入湘处，故号蒸口，俗称草河口，宋朝至道年间，曾在山上建立石鼓书院，为当时全国四大书院之一，该地至今犹为衡阳名胜，如前所述，石鼓为山名，实非六尺小石，郦注云云不确，显系传言失实，自应以王闿运所说"即状为名，""因水激响"为是。

耒水、南岳、麓山

《水经注》："湘水又北，逞衡山县东，山在西南……山海经谓之岣嵝，山为南岳也……湘水东北迳湘南县东……。衡山东南二面，临映湘川……

郴县有耒水，出来山之西，至湘南西入湘。

湘水又北，迳麓山东。其山，东临湘川，西傍原隰，息心之士，多所萃焉。"

《水经》：湘水"又东北过阴山县西，洣水从东南来注之，又北，迁澧陵县西，漉水从东来注之"。

据《湖南省志·地理志》："湘水（自石鼓咀）又东北五公里至耒河口，耒水自南来注之"。

按：以《湖南省分县地图》考之，耒口距石鼓咀仅五公里，而由来口北至衡山县东，计其里程，约在六十公里之外，然而耒水入湘，不在衡山以北，而实在衡山之南甚明。同时，南岳距湘水，也在十六公里之外，说是"临映湘川"，是亦夸张失实。

既过麓山，再迳洣水，迳水，是麓山在洣水之南，其实，则大谬不然，麓山在长沙，南距洣水入湘之处，还在一百华里之外，打开地图一看了如指掌，毋庸多议。

前面既然有在洣水前说到麓山，而下而在"迳船官西"后，又说"湘水又迳麓山东，上有故城，山北有白鹭水口，湘浦也。"这么一来，就出现了两个麓山。

据盛宏之《荆州记》："长沙西岸有麓山，自湘西左渡登岸，夹径乔松，泉涧盘绕，诸峰叠秀，下瞰湘江。"

又《元和郡县志》："麓山在长沙县西南，隔湘水六里，盖衡山之足也，故以麓名。"

按：如上所述，则湘中只有一个麓山，诸书无异词，而郦注重出，致生歧义。如细玩原文，则"东临川侧"一段，或系后人传抄割裂，似应归并到"上有故城"之前为是。河甯汪土挥所著《水经注图·附录》中，也认为"东临川侧…多所萃焉"一段，应在"上有故城"之上。

而"上有故城"一语中的上字，也颇有可疑之处。以麓山的地势而言，山上实无可建城之处，若说是陵谷变迁，今非昔比，然则以"汉魏最初名胜"见称的麓山寺犹在。寺内的六朝松也直到清光绪末叶才为风雪所毁，如有古城，则断不至毫无痕迹可寻。同时，据彭青野《湖南古城址调查述略》中所举湖南省内先秦及汉唐以来古城址数十处，也无一建于山上者。然细考麓山附近，山南近湘水处，有古城址一处，与南津城隔江相望。王闿运《湘潭县志》说是"故湘西县城"，目前，尚有"土城"的遗址可考。其地犹名土城头，由此看来，上字实为南之误。很可能是由于古籍蠹蚀汗漫，传抄翻刻者妄加臆断，遂至讹伪。

南津城、桔洲、瓦官水口

《水经注》："湘水又北运昭山西……。湘水又北迳南津城西，西对桔洲，亦作古字，为南津洲尾，水西有桔洲子戌，故郭尚存；湘水又北，左会瓦官水口，湘浦也。"

据《湖南省志·地理志》：湘水"迳昭山入长沙边境暮云市，又北二十一公里至靳江市，靳水自西南来注之。湘水又北七公里迳长沙市，水中有水陆洲，古名桔洲。"

按：瓦官水口，即今天的靳江，东在桔洲和南津城之南，由于郦注的叙次颠倒，以致后世聚讼纷法。《湘潭县志》即认为"莪洲当为桔洲，兴马即南津洲。"削足适履，以合郦注。

《湘城访古录》说："桔洲在今省河中，历来亲履其地者都无异词，郦注云：'桔或作吉'是不知湘中形势，又风闻桔洲之名，遂不敢剧断，两存其说，致启疑端。《梁书》云：'太清三年（549年），遣鲍泉讨肖誉，军于石椁寺，誉逆击不利而还，泉进军桔洲，誉又大败，于是焚长沙郭，徙民城内。'此明指今之桔洲而言，益泉军由洞庭溯江而上，始军石椁，继屯桔洲，若桔洲即莪洲，则将从湘水上流沿江而下，又岂得先军石椁？以此证彼，是非判然。《晏公类公》云：'桔洲在长沙西南四十里，'皆承郦注之伪，不足据"。

《湖南省志·地理志》在《城治与无地考》一节中说：南津城"其地应在临湘故城之南的湘江东岸，约在今金盆岭附近临江一带地方。"经实地考察，在金盆岭西北，现在还有"城头增"的地名存在，则省志之说，是为可信。南

津城的位置既空，则南津洲的位置也随之而定，桔洲也就不便他移，郦书的叙次紊乱，也就不待多言了。

我们细玩郦注原文，若将“又北，道瓦官水口，湘浦也”十字，移前一行，置于“又北，迳南津城西”之前，便全部与自然实体相合。有如丁谦所云“前后互易，便合真形”了。

青　阳

《水经注》：“秦灭楚，以立长沙郡，即青阳之地也。秦始皇二十六年，荆王献青阳以西。《汉书·邹阳传》曰：‘越水长沙，还舟青阳。’注：张晏曰，青阳地名；苏林曰，青阳，长沙县是也。”

据康熙《长沙县志·治革辩》：“玩‘越水长沙，还舟青阳’之文，长沙、青阳，明是两地，似难强而为一。即苏林注亦必传袭之误，盖长沙名县，始于隋，苏林之时，尚未改临湘之目，《水经注》之说，皆无稽，今不取。”

按：近年以来，对青阳究在何地，时人颇多讨论，虽对其位置说法不一，而对青阳之不在长沙则众口一词。清人王万树《衡湘稽古》中说：“青州、营田之间，为青阳故地。”考之郭嵩焘《湘阴县图志》，青州、营田之间，“其地恰当湘口，自古为入湘关隘重镇。”又有“秦骑望，高锯湖中，周望万顷，以及铜盆、万石两议，皆湖中楼泊要害。”从《湘阴县地图》来看，其地有青华山，又称大青山，山北，即青草湖。以当时的形势考之，则青阳故地在这一地区之内，最为可信。其地，古隶长沙郡，今属湘阴县北境。

临湘故城、湘州城

《水经注》：“又右迳临湘故城西，县治湘水，滨临川侧，故即名焉。王莽改号抚睦，故楚南境之地也。秦灭楚，立长沙郡，即青阳之地也。……汉高祖五年，以封吴芮为长沙王，是城即芮筑也。汉景帝二年，封唐姬子发为王，都此，王莽之镇蛮郡也，于《禹贡》则荆州之域。晋怀帝以永嘉元年分荆州诸郡立湘川，治此城之内。”

据《天下一统志》：“汉时临湘故城，为长沙郡治者，在今城之南。”

又《湖南省志·地理志》：“临湘故城，在今长沙市南门外。”按：近年以来，有些人认为长沙古代只有一城，其根据是《水经注》说：“郡在水东，州城南，旧治在城中，后乃移此”。这里只言郡治，没有说郡城，既然“旧治在城中，后乃移此，”则更是从城中移向城外之明证。其实，则大谬不然：

第一，我们只要把上面所引《天下一统志》的话与《水经注》所说“郡在水东，州城南”加以对照，即可看出郡治，即在临湘故城，今城即《水经注》

所说州城，郡城在南，州城在北，明是两城，岂得强合为一！考之诸府、县图志，也都说“临湘故城，在府城南，”咸无异词。

第二，从“又迳临湘故城西”至“青阳，长沙县是也”。专述故城的得名、改郡及其历史沿革。下面从“高祖五年以封吴芮为长沙王”句开始，即已转叙州城的历史沿革。我们如将这两段文字加以对比，则文意既不相属，各成系统，述两城之沿革，泾渭分明。

第三，前面既有“楚南境之地也”，下面又说：“于《禹贡》则荆州之域。”若为一城，又岂得两言地望！

第四，前面既已说到“王莽改号抚睦”，下面又从“高祖五年”等起，再等到“王莽之镇蛮郡也，”若记一城之事，善长又岂得如此颠倒为文。

同时，更改郡县名称，本为同一时间的事，若当时郡县同城，又岂得割裂前文，前后分置，可见其名从事实，各有攸归。

第五，据《方兴胜览》：“城南书院，在临湘门街，”又据《通鉴辨误》说：“长沙城门，往浏阳者，称浏阳门；往醴陵者，称醴门。”以此例彼，亦足为当时出府城南门即至临湘故城之明证。

第六，《杜工部集》所载《清明》诗两集，其中有：“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之句。又有：“秦城楼阁鸳花里，汉主山河锦绣中”之句。还有：“茅斋定王城郭门”之句。若仅一城，杜甫岂有不知定王刘发为汉人之理。综合前面所举六点，可见临湘故城和湘州城当时并存，断无疑议。省志所说“临湘故城在今长沙市南门外”的话是完全可信的；至于湘州城，以贾谊宅的遗址和现存诸文献考之，则在今长沙市五一路以南，樊西巷以北这一地区之内。

其所以使人误会古代长沙仅有一城的原因，则是由于郦注的脱漏。如将郦注原文仔细推敲，根据其行文惯例，则在“汉高祖五年封吴芮为长沙王”一语之前，应有“又迳州城西”之语，由于传抄脱漏，遂生歧义，“聂五”“郭公”，在诸古籍中出现的例证，实属屡见不鲜。郦注中有此脱漏，也就不足怪异了。

吴芮塚

《水经注》：“临湘称北，有吴芮塚，广逾六十八丈，登临极目，为廛郭之佳憩也。”

据《天下一统志》及清《嘉庆一统志》说：“汉长沙王吴芮塚，在长沙县治西北。”

又据《长沙县志》卷三十说：“吴芮塚，在县西北，高帝五年，封芮为长沙王，卒艺此。”

按：近年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已发现吴王塚在今河西滦湾镇北咸家湖附近的象鼻山，现已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见 1985 年《湖南年鉴》）。由此可证，应以"在县西北"为是。郦注在"临湘县北"一语中，县下落西字。

麻　溪

《水经注》："右合麻溪水口，湘浦也。湘水又北迳三石山东……湘水右迳浏口戌西，北对浏水。"

又《梁书》武帝太清三年七月（549 年），"湘东王绎遣世子等讨湘东刺史河东王誉，至麻溪，军败溺死。"胡氏通监注说："《水经注》，麻溪水口，在临湘县北，浏口戌南"。

按：在浏河口之南，确会麻溪，故《长沙县志》说："麻溪为五代战争之地，今不能指其处，盖久已于为平陆矣！或谓即今之麻木桥水，然《水经注》云，湘水各合麻溪水口，湘浦也。其在湘滨确然无疑，今麻林桥距大河数十里，其非古之麻溪可知。"

然而《明史·地理志》说："麻溪流入湘江，曰麻溪口。"清初陶之典又有《附舟之麻溪》五言诗一首，由此可见，麻溪由六朝以至明清，都是源水长流，未尝淤为平陆，况且五代马氏会春园中的碧浪湖，至今还有遗迹可考，而从陶之典附舟至麻溪算起，到同治六年《长沙县志》成书时止，历时不过一百余年，一条可以行舟的麻溪，怎么会淤得一无痕迹可寻？实于事理不合。

考之《夷坚志》："长沙古语，'骆驼咀断，状元出。'骆驼咀者，山也，其形似之，在州北，正值水口，其下曰麻潭，皆巨石屹立。淳熙七年，辛幼安作守，创始营作，广辟衢陌，许僧民得以石赎罪，皆凿于潭中，所取不可胜计。"

嘉庆《长沙县志》："麻潭山，在县北五十里，山多石，为长沙水口，形家称芦花鞭。"

又光绪《湖南通志》："今浏水入湘处，名浏河口，亦名驼口，俗呼骆驼咀（今已讹为落刀咀），去麻潭三十余里，今凿石正在麻潭山下丁字湾大字岭一带，皆有矶头，久已凿去，知《夷坚志》所指骆驼咀即指此也。若驼口，则并无石可凿矣。"

我们再看陶之典诗中所描述的麻溪的情况是："沙尽石犁犁，疏凿劳神斧。""十里九下滩，飞雪奔霆鼓。""日昃雄柳阴，麻溪指前坞，登崖缓步行，思深输挽苦。"

从上面诸文献中可以看出麻溪之在麻潭山附近无疑。查《长沙县地图》，在麻潭山东南有霞凝港（县志作下泥港，亦作夏泥港）水经流入湘，则麻溪应为今霞凝港水的古名无疑。其地旧属长沙县，今属望城县。

由于郦善长不知有两个驼口，竟把麻溪向南移了四十多华里之远。而后人未加深考，却老是在浏口戌之南去探讨，那自然是缘木而求鱼了。

在郦注中的这种错乱现象，前面已经谈到的有麓山、桔州、南津城、靳江等，可以说是并此而五了。

涝水、浏水

《水经注》："浏水出临湘县东南，浏阳县西北，过其县东北，与涝溪水合，西入于湘。"郦注无异词。

据陈运溶《湘城访古录》："涝水，即涝塘河水（今讹作捞刀河）；浏水，即骆驼咀水（今讹作落刀咀）。浏水、涝水，俱系分流，其入湘之处，相隔十里，《水经注》云台流，误矣。"

又《湖南省志·地理志》："湘水又北五公里，至长沙北郊，浏阳河自东来注；湘水又二、五公里，捞刀河水自东来注。"

按：涝、浏二水，近在长沙北郊，其为分流入湘，人皆见之，也就无庸考辨了。求诸地图，两水之所经流，中隔大山，实无可合流之理。

铜官、临资口

《水经注》："湘水之左岸有高口，水出益阳县西北，迳高口戌南……高口水又西北右屈，为陵子潭，东北流注湘，为陵子口。湘水右岸，铜官浦出焉。湘水又建铜官山，西临湘水……。"

据《长沙县志》："铜官渚，县西北六十里。亦作铜官浦。"又"乔口，县西北九十里，即《水经注》高口水也。"

又《湖南省志·地理志》：湘水"经铜官滩，至靖港，沩水自西南来注入。又偏西八公里至乔口，入湘阴境。湘水又东北七公里至樟树港……湘水又西北七公里，至濠河口分为左右两支；左支，向西至刘家坝，折而东北至临资口，左岸有资水汇入，又东北至芦林潭。右支，向东北经湘阴至芦林潭，与左文汇合。"

按：由铜官经乔口、樟树港至濠河口，已相距二十二公里之远，由濠河口屈曲西行至临资口尚有三十公里左右，而郦注置铜官于临资口之下。其误一。

考之《湖南省地图》，资水下流分三支，南支至乔口入湘；中支至临资口入湘，北支入湖；乔口水不可能至临资口入湘。其误二。

考之郭嵩焘《湘阴县图志·水志》："湘水自门泾江西北流，出濠河，又西出白马潭，注临资口。注：《水经注》谓之陵子口。《越南水道考》引《山海经》：'长沙之山，泚水出焉。'定高口为泚水。临泚口为泚湘二水交会处，其

名相沿已久。《水经注》伪为陵子口，于名义无取。并泚水之经流亦失之矣。"又"锡水入湘，谓之锡口，泚水入湘，谓之泚口，以此支津，东临湘水，并非水源尽处，故得临泚之名。临潼、临洛、临洮，皆其例也。《水经注》误为陵子口，论水源流遂至湮没。而以其上源南出乔口者谓之高口水，盖亦不定此水为何名矣。"其误三。

汨水、罗水、湄水

《水经注》："湘水又北，右会东町口，溳水也……湘水又北，汨水注之。水东出豫章艾县桓山。汨水又西迳罗县北……谓之罗水。汨水又西，为屈潭，即罗渊也。"又"溳水出豫章艾县，西过长沙罗县西。溳水又西流，积而为陂，谓之町湖也。又西累石山，入于湘水"。

据郭嵩焘《湘阴县图志·水志》："《水经注》析东町口为殒水，而叙汨水经罗县北，谓之罗水，流注于湘，谓之汨罗口，即春秋之罗汭，是道元分溳水与罗水为二，而合汨水、罗水为一，所谓汨水即罗水也。"

又"叙罗水源出豫章艾县，混入溳水，而一以汨水为名，于是移汨水之名于溳水"。

又"道元别溳水于汨，而以东町口当溳水。即今百丈口，实为溳水经流，其后水源歧出百丈口，又引溳水入湄，而为汨水分流之支津。"

又"汨水既受百丈口水，别析为支津，为湘入湖之始，自东时湖以北，连洞庭为一，湘水与汨、罗二水逶迤入湖，中无大山之阻隔，故道元皆以湘浦为名。其实，溳水、罗水直达洞庭，并不倚湘口为灌输，不宜混淆，亦未便以湘口一源统括之矣！"

又"《水经注》汨水西运罗县北，秦立长沙郡，因以为县，谓之罗水，又混汨、罗为一。其实，汨、罗两水源流各别，罗水南出小江口与汨水会，中间忽分忽合，一统志因云：汨罗分二水，一南流日汨水，一经古罗城曰罗水，至屈潭复合。但据中间分合为言，不知汨源出义宁州，罗源出巴陵。其入湖处，南为汨口，北曰罗口，中间两水合为汨罗渊，而其源流曲折，遂元考定之者"。

又"南出沉沙港，曰汨口；北出小河口，曰罗口，道元统名之曰汨罗口，而罗水之名遂隐。"

《平江县志》："溳、汨实一水也。"

按：郦注于汨、罗二水的叙述错乱特甚，今以郭氏之说考之《湘阴县地图》概括如下：

汨水发源江西艾县（今修水），罗水发源巴陵（今岳阳），郦注以汨源加之罗水，其误一。

汨溳音近，溳水实即汨水，而郦注别汨、溳为二，合汨、罗为一，其误二。

汨水西行，至沉沙港入湖，谓之汨口。罗水北行，至小河口入湖，谓之罗口，郦注牵混为一，统称之曰汨罗口，其误三。

汨水至百丈口，旁支溢出入汨，至东町口入湘，只能说是湄口，不能说是溳口，其误四。

考《湖南省分县详图》磊（郦注作累）石山，恰当罗口，距离溳口绝远，其误五。

既到汨罗江，又将溳水单独列出，则明显看出，不知汨、颁溳一水而异名，其误六。

湖南平江杜甫墓踏勘纪事

俞润泉

1981年我在湖南教育学院平江分院文科教书，分教“唐宋文学”，用朱东润的本子为教材，开教研会时我汇报了如何讲唐？我提出了一个困难：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爱国诗人杜甫的生平不好讲。他的死有两说。“唐书新旧分明在”，都说他死于湖南耒阳，“阻水缺食，得县令聂某所遗牛肉白酒，一夕卒。”当代文学泰斗、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因深知毛主席最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著《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说，杜甫死于牛、酒不是不可能的，而且进一步说他是吃多了腐败的牛肉，中毒死的。郭沫若是学医的，他在一千多年后诊断杜甫死于“腐胁症”（现代医学叫“脓胸症”），未满六十，陈尸荒野。但是，又有一说，唐·元稹《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说他死于潭岳之间。元稹距杜甫之死只有40多年，此说为后世学者一致采纳，否定唐书非是。但郭老是国家领导人，一语千金，学生如问我难以细说。我在教研会上还说，杜甫在黄河、长江之间，有墓八处[①]。古人说：“大抵名贤所在，人各以为重。”如有学生问我，我如何回答呢？教研组长王果，是我的老学长，说：“我们分院在平江，平江有杜甫墓，举世咸知，杜甫之死，这个课要讲好。”分管文科的副院长龚竟成说：“俞老，您带着问题去为平江杜墓察访一番吧。”于是。我于1982年5月7日启行。对平江杜墓进行了7天的踏看和访问。与我同行的还有一位青年的业余研究者毛炳汉先生，他现在是省社科院研究杜甫的专家了。

1982年5月7日，我们从平江青冲乘上公路汽车到平江县城，持介绍信到县委宣传部，承热情接待，安排在县委招待所住下。下午3时，宣传部的同志陪我们去新成立的文物管理所，所长胡啸椎因公外出，由专干陈果能同志接待。小陈十分热情地告诉我，平江杜甫墓50年代以前并不为众人所知，1960年原湖南省军区副政委平江人吴自立将军，关怀乡梓，专程去小田，并召开了座谈会，那时杜甫墓虽失修，但未毁。到了1967年，灾难降临石浆乡、小田乡，“红卫兵”破“四旧”，打着挖掉平江封建头子杜菩萨的祖坟的旗号前来毁

墓。据说：这些小青年并不知杜菩萨名叫杜甫，只听说这墓里有金山银山，结果，毁墓之后，什么也没有，只挖出了几捆破书（这些小青年屈指数来，现在也有四五十岁了吧，我真希望读到他们的忏悔录）。

小陈秘书是平江文管所的“老干部”，杜甫墓的大专家，接待访杜的名人不少。自从吴自立将军光临之后，岳阳地区文物普查组以此为重点多次前来考察，研究恢复原状甚至扩大景点的讨论；山东大学“杜甫学”专家萧涤非教授派他的助教来过；北京某单位×××专家来过，取去重要原始资料，一去不返；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樊维纲讲师（按：后评为教授）来过，发表了论文，但并未寄给平江文管所……我当即表示我们的单位就在平江，文字资料雇人手抄，发表文字一定寄呈。于是得到了最完美的合作。当天，小陈同志请我们在他家晚餐，陈夫人以平江名菜苦瓜炒鸡招待我们。第二天（1982年5月8日），我和毛炳汉在平江县文化局副局长、专门研究杜墓的钟弄璋同志热情的帮助下去了文化局、县图书馆、县档案馆，看资料和购买内部发行的平江县地图。我们用一天一晚的时间细读了平江县所藏于杜甫墓有关的一切文字资料，最重要的包括同治版《平江县志》[②]清代平江著名人士李元度、张岳龄的诗文全集（按：李、张两人是平江杜墓的发现者和重修者），特别难得的是我们找到了一本清光绪年间刊印的《杜甫墓志》（无封面，共48页，现仍存平江县图书馆），通过钟局长，我们出资请一位老先生抄录了我们所需要的有关材料。

5月10日，晴。清早起床与陈果能及毛炳汉乘公路汽车由县城出发去小田。

小田属平江安定区，在平江之南，与浏阳接壤，是一个平原、丘陵区。汽车由县城出发（如果是小汽车的话，可以由公路转简易公路直达小田杜甫墓），先到大桥（即安定桥，石桥，为当地“善人”程安定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修建，横跨汨罗江支流泸溪水之上）。相传杜甫于770年就死在大桥这个地方，当然，那时候还没有桥。汨罗江水本来就十分清澈，泸溪水更是一清见底，虽现在已不通航，但江上有渔舟一二，游弋其间，风景十分优美。民间传说，杜甫病重在汨罗江上小舟中，儿子宗武侍奉在侧，一时大雨，汨罗江风浪很大，乃移舟泸溪，饥寒交迫，本已病肺的杜甫就死于舟中了。现在看来，这里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小地方，但唐朝时却不同，在唐朝这里叫“中县坪”，是昌江县县邑所在地。706年属岳阳府，杜甫死于770年。直到五代后唐（923年）昌江才改名平江，移到现在县城去的。从大桥到小田仅5华里，5月骄阳袭人，陈果能又特别熟悉当地风情、掌故，滔滔不绝地讲，我们虽花了一个小时，到达杜公祠，也不觉困倦。这里是一所小学，很多人认识陈果能同志，十分亲密地说：“老陈，你带工程师来修杜墓了吧。”我们没有在小学多坐，立即

去看杜墓。杜墓在"杜公祠"后面，我怀着无限景仰的心情而来，及至见墓，竟是一抔黄土，几块断碑，在荒原蔓草之中（请注意：1987年，作为省一级的文物单位，已按1867年所重修杜墓复原了。）

18年前我们看到的"杜墓"是这样的：

封土堆直径8米，高1.3米，周围曾用红砖围砌，但大都零落。墓前有青石墓碑一块，高2.2米，宽0.92米，石柱四根（现缺一），无字碑两块，在四柱与墓石之间。墓碑上的文字是："唐左拾遗工部员外郎杜文贞公墓"。

原有碑顶，那时已无存。在杂草中我看到了一个直径0.25米的石球，是碑饰之一。以后又在现已作为学校的洞内，发现了一个残破的石碑顶饰，作为阶石的代用品横卧着。

墓堆左侧，有一处现已被砖石填塞了的窟窿。陈果能同志告诉我，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破四旧，就是从这里掘开，现出了一座拱式双层墙的砖室墓，挖出了一些墓砖。现在残存的墓室据岳阳地区文物考古工作队的张中一测量，墓室长1.5米，宽1.3米，墓壁用长22厘米、宽14厘米、厚3.5厘米的青砖平砌，用楔形砖起券而成。墓室后壁设有两个小龛，留有后人修复和粉刷的痕迹。

这座古墓是光绪九年（1883年）重修的，督修人张岳龄。据说（请注意：仅仅是"据说"）启墓重修，并无骸骨，但墓室俨然后制，关于这一点，有许多专家例如樊维纲、丘良任、周新民、凌辉、李嘉球、陈贻焮、丘菊贤、熊治祁、毛注青等都撰文述说过。在这里，也就不一一介绍了。

现在讲一讲我在18年前所见的"杜子洞"。杜子洞全称是"杜文贞公祠"。"文贞公"这个称号是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年）封赠的。元顺帝是蒙古族人。由成吉思汗的子孙来封赠汉族诗圣杜甫谥为文贞，这一点就足证杜甫是全中华民族公认的先贤了。"杜子村'于光绪九年修建，有两个大门：左边是正门，门上有牌楼花饰，下有青石刻"诗圣遗阡"四字；右边门上青石刻"幽阐阁"三字。现在（1982年）在两门的中间另开一较大的门，算是正门。从正门进去就是响堂，从"诗圣遗阡"门进去就是墓庐，可直通杜墓。杜墓在整个建筑的围墙内。现在杜墓的围墙已拆，使墓在祠外，"诗圣遗阡"门也改为了一个窗户——一间教室的窗户了。

从正面进入响堂，现在是平江县安定区大桥乡学校的礼堂。响堂两壁原来刊刻初建记事的石碑已经挖去，用黑色油漆涂成了两块大黑板报。正墙上原有山阴沈翰据南熏殿旧本缩临的石刻杜甫象，现在（1982年）只剩一顶帽子，眉目以下均已毁去，响堂后进是一片广阔的空坪，右边建了一些教室，左边是光绪九年原建的"铁瓶诗社"。张岳龄倡修杜墓，他是第一个捐钱的。自号铁

瓶道人，著有《铁瓶诗抄》。"铁瓶诗社"大约就是当时文人聚会之所。辛亥革命前，杜祠有田租两百亩，由杜氏族人经管；辛亥革命后，在这里办了省立第三高级小学；解放后，仍是完小，现在是平江安定区大桥乡小田学校。

小田学校现1982年）有9个班，小学生352人，教师11人。我们在这里差不多盘桓了一整天。老陈带来了皮尺，雇请了当地一位泥工协助，丈量了房屋的各项数据。他是一个内行，指着屋架结构说，这是典型的清代建筑。响堂里的柱础，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即红石方形础（41厘米×40厘米）、红石鼓形础（直径4厘米）和莲花瓣覆盆式饰纹的麻石柱础，下方上圆，通高32厘米。老陈说：这种柱础具有唐代石础造型风格，因此可能在中、晚唐时，这里就建有祠宇。

5月11日，我结束了在平江4天访问，还要回去上课。但是陈果能告诉我，在平江三阳区清水公社万古大队有一位年高90岁的杜次彭老先生（1892～1983年），据说是杜甫第58代孙，平江杜姓辈份最高的长者（家字辈，谱名家熙），住在三阳公社，是民国16年（1927年丁卯）重修《杜氏族谱》的唯一健在的纂修者，只有他的手上有比较完整的一部《杜氏族谱》。我因必须赶回学院上课，所以由毛炳汉一人去三阳访杜次彭先生，查阅和抄录了有关重要资料，写了一篇《访杜次彭老人》。毛炳汉12日下午到三阳，先找到三阳小学教师杜勇民先生，他是杜次彭老人的次子，1932年生，是杜甫的59代孙吧。杜勇民带毛炳汉去他家，与老人畅谈了一夜。1982年5月时，老人还是耳聪目明，记忆清爽。老人有一个孙女杜娉婷嫁到小田，据说是杜甫第60代孙女。杜勇民笑着说，我们派她为老祖宗文贞公守墓。杜次彭于1983年初去世，在湖南众多的研究杜甫的如丘良任、樊维纲……等专家教授中，仅毛炳汉会见了这位长者，为他拍了几张照片，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次考察平江杜墓的一项收获吧。

至于我所做的事除上述的以外，还在当时尚未修复的杜墓旁边拾到一块墓砖，重1.75公斤，由小田背回县城，由县城背回学院，请木工做了一个箱子寄往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中国唯一的"杜甫纪念馆"。此外我和陈果能同志在光绪年间李元度、张岳龄所督修的"杜子祠"围墙上的一暴露处，用松烟做了一个砖的拓片（青砖），文曰"杜文贞公祠"。

以上两件都存成都杜甫纪念馆，该馆回信说："墓砖花纹有唐代风格，可供研究，连同祠堂青砖拓片在我馆展览室陈列，谢谢！"

这是距今（1999年）18年前我的亲自经历。现在当然有很大变化。1987年平江杜墓由湖南省修复成，列为省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杜甫死于唐大历五年（公元770年），距本世纪末为1220年。从1990年起，湖南文史界决定每

十年举行一次纪念会，谨以此文献于杜甫去世1220年纪念之前。

下面，还想谈谈三个问题：(1)平江杜墓是真是假？全国有8处杜甫墓，这是中国人民对“诗圣”的热爱，我们对每一个杜墓的研究都是有益的，但是要肯定孰真孰假，就无必要。现在学术界坚持《唐书》杜甫贪吃酒肉，饱死于耒阳的只有郭沫若一人，这是他的偏见，具有在政治上逢迎的目的。据说，连毛主席也并不同意郭氏的意见，毛主席论诗，从来没有批评过杜甫。杜甫死于湖南“潭岳之间”，时间是秋天或仲冬这一点，现在史家有此共识，但真墓是否在平江小田，还是有疑点的。因为平江杜墓据《杜甫墓志》图录及“文革”中发现的墓砖虽似唐制，但杜甫那时已贫病交迫，死于舟中，仅一子相随，只能暂时殡葬，能否如此营造，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多数学者倾向真墓还是在河南偃师首阳山下，但曾殡葬于此则是可能的。平江杜氏据谱牒所载由福建迁来，杜甫子孙如何流落福建，于史无据。(2)杜甫遗骨在何处？在湖南的两处杜墓都是衣冠冢，平江杜墓在清同治修理时已无骨殖，所以只好将当时能找到的几部杜甫诗集封于冢内。尸骨的保存有很多因素，我国古代著名的英雄人物、学士诗人，从黄帝轩辕氏，到炎帝神农氏，墓葬多处，黄炎子孙谁见过老祖宗一根骨头呢？这里还有一些民族宗教习俗问题，例如古代南亚一些佛教国家如印度、尼泊尔、锡兰等国是重视骨殖的，相传释迦牟尼留传下来的四颗牙，简直是无价的宝贝，一些名僧的骨灰中出现的某些凝聚物也称为舍利的不明物，奉之如神明。汉民族没有这种习惯，例如唐朝的韩愈就写过著名的《论佛骨表》，坚决反对。因此平江杜墓，中国8所杜墓均无骨殖是不值得奇怪的。(3)我个人对此的认识。我认为所谓墓葬是一种纪念碑性质的标志，不可不考，也不可断然地肯定或否定。作为湖南人，我们有兴趣研究湖南的两处杜墓，作为河南人，也会有兴趣研究巩县、偃师的杜墓，都是有益于中华文化的事情。这就是我在18年前因教学需要拨冗踏访的真意。

注释

①陕西二处（华县、鄜县），河南二处（巩县、偃师），四川一处（成都），湖北一处（襄阳），湖南二处（耒阳、平江）。

②《平江县志》凡十三修（不包括1994年的《平江县志》）。始于宋宝佑（1253～1258年），元延佑（1314～1320年）再修，明永乐（1403～1424年）续修，但早已不存，到清同治年间尚有明宏治辛亥黄华本（1491年），嘉靖辛丑李鍪本（1551年），隆以庚午夏子谅本（1570年）和清朝康熙、乾隆、同治的三种本子，清以前的已全部不存，湖南仅存乾隆二十年石文存的增修本，现在湖南图书馆。

岳麓书院“整、齐、严、肃”四字谈

谭绪缵

湘省岳麓书院自宋开宝年间创建，于兹已千有余年，今湖南大学溯其前身谓为千年高等学府，即职此之由也。乾道初，张栻来书院主教，朱熹与之论中庸之义，曾手书忠、孝、廉、节四大字于堂，以为学子持身行已之本。至清乾隆初，衡山欧阳正焕御史来院复手书整、齐、严、肃四大字于堂，今至岳麓书院参观者，入门登堂，即可灼见忠、孝、廉、节四字于内壁，整、齐、严、肃四字于外墙。忠、孝、廉、节四字书义，前人述论多矣，姑置勿论，而整、齐、严、肃，实必有说。考《明史·李迁机传》：“万历十一年（1583年），会试复第一，以进士第二授编修，累迁祭酒。故事。祭酒复视事，则二生共举一牌，诣前一大书整、齐、严、肃四字，盖高皇帝所制以警师儒者，迁机见之惕然，故其来教，一以严为主。”又查《明会典》卷七十八载洪武十五年（1382年）学规，其一有云：“为师长者，当体贤之道，竭忠教训，以导思蒙，勤考其课，抚善惩恶，毋致懈惰。”据此两载，知整、齐、严、肃四字之制，原出明太祖之警师儒者，以教学育人应予以严为义，所云“勤考其课，抚善惩恶”云云，即严师之规，具体而微者。若此，宋代为学，必责其师教之严，师严而后道尊，而后高徒可见，而后可免误人子弟之机；此则欧阳正焕所书整、齐、严、肃于岳麓书院之意也。今人为人师者，振铎立教，视此四字，岂可忽乎哉！

岳麓书院“忠孝廉节”石碑为文天祥所书

虞逸夫 杨 桦

岳麓书院位于长沙岳麓山下，书院正厅即为旧时书院讲堂。左右壁分嵌“忠孝”“廉节”字，字高213厘米、宽141厘米。由于“忠”字的右上方刻有“晦庵朱子书”的款识，相传为南宋理学家朱熹手书。方志沿袭其说，从无异议。不久前长沙市文工队发现是宋末名臣文天祥所书，这样把此碑初刻至少推迟了106年。

1983年夏天，本市蔡锷北路一家店面翻修时，在旧墙上拆下两块刻有“廉节”二字的大石碑。碑为青石琢成，字的体貌和尺寸与书院本完全一样。遗憾的是还有“忠孝”二石遍觅不得。经过一番洗刷，碑版焕然一新，石面莹净，字迹完好。在“节”字碑的左下方，携有摹刻年月和书者的姓名。全款首行为“大清嘉庆二十年乙亥岁春月吉日摹刻”，第二行为“宋文天祥书于□□□□”。考《长沙县志》云：“庙之左偏为明伦堂，高二丈六尺，阔三丈九尺，高三丈六尺，左右壁摹刻忠孝廉节四大字。”下有“宋文文山手书”注文六字，与碑面题款相符。

原来这四个大字，是文山先生当年为官湖南时书刻在长沙孔庙里的遗迹。我们发现字碑的地点，正在市区蔡锷北路学宫街与红墙巷之间的孔庙旧址上，证实《县志》这条记载是可信的。《宋史》文天祥本传说：“咸淳九年，起为湖南提刑。因见故相江万里，万里素奇天祥志节，语及国事，愀然曰：‘吾老矣，……世道之责，其在君乎。’”这是文山第一次来到湖南，时年三十七岁，驻留潭州仅一年，第二年就任赣州去了。十年之后，他又再次到过湖南，这是读了他的《湘江宿别》诗才知道的。全诗为：“浦湘一夜雨，江海十年云。相见皆成老，重逢便作分。啼鹃春浩荡，回雁晓殷勤。江海人方健，月明思对君。”从诗中看出，他第二次到湖南已是十年后的春天，和旧友相见，有皆已成老之感。这次停留的时间更为短暂，可能是路过长沙，所以“重逢便作分”了。由此可以断定，题字孔庙的事，只能是在他初次为官湖南的一年间。

长沙市文工队原希望在朱、文两人的全集中能找到一点线索，来解决谁是书写人这个悬案。可惜落空了，竟没有发现他们在长沙书写“忠孝廉节”四字的原始资料。《宋史》本传更未提及此事。说朱子书此四字的唯一依据，只有《长沙县志》，而《县志》又难以尽信。《县志》学校门前有这样一段记载：“岳麓书院，……绍兴元年毁于兵，乾道元年安抚刘珙重建。聘张南轩主教事。三年，朱子知潭州，手书忠孝廉节四字。……绍兴五年，朱子为湖南安抚使，牒委教授，兴学岳麓。”这段记述，与史实大有出入。按乾道三年（1167年），朱子首次到湖南，是专访张南轩讨论学问来的。其本传并无出“知潭州”的经历。朱子“知潭州”的说法既属虚构，则下文“手书忠孝廉节四字”一语，便无着落，其为想像之辞无疑。朱子“监潭州南岳庙”在高宗绍兴末年，其时张南轩尚未在岳麓书院主教事。朱子为湖南安抚使，实为宋绍熙四年（1193年），非绍兴五年（1135年）。朱子生于建炎四年（1130年）。到绍兴五年不过六岁。《县志》失考一至于此，足见记载是不可尽信的。

朱、文两人都在湖南做过官，又都到过湖南两次，《县志》说他们都曾写过这四个字，而现在刻本虽有两个，字迹并无二致，只能是一手所书。朱、文两人必有一虚一实是肯定的。我们为什么要肯定文文山而否定朱子呢？还得从这四个字本身来说明问题。现分几个方面加以论证，以求一是。

南宋初年，在学术界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主要流派：一个是以朱子为首的理学派，另一个是以陈亮为首的事功派。前者以阐扬儒学为旨趣，以潜移默化、影响社会为功用；后者以积极参加现实的政治活动为手段，以事功来改造社会、实现其学说为目的。到了南宋末年，文天祥受命于危难之际，只身系天下安危，一心致力于救亡图存的现实斗争，成为名副其实的事功派。他看到当时国势岌岌可危，大小官吏人自为计，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投降变节不以为耻。他针对这种不可收拾的败局，提出“忠孝廉节”四字作为救世良策，正和春秋时管仲相齐，提出“礼义廉耻”四字作为治国纲领的用意不谋而合，同是出于当时国家形势的需要。他本人的一生，即是这四个字的活注脚。《宋史》本传说：“天祥至潮阳，见张弘范，左右命之拜，不拜，弘范曰：‘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事宋者事皇上，将不失为宰相也。’天祥曰：‘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由此可见不但故相江万里奇其志节，连元朝的劝降人员原为宋臣的张弘范亦有“忠孝尽矣”之叹。今读文山遗集，其忠孝思想，随处可见。如在《沁园春》词中，开首便云：“为子死孝，为臣死忠。”在《平原》诗中云：“出入四朝老忠节。”在《正气歌》中云：“时穷节乃见”，“在汉苏武节”。见于其他诗文的例不胜举。从文文山所处的境地和他一贯的思想来看，这四个字正合乎他的身份和口吻。

至于朱子的一生，做官的时间很短，在书院讲学和著书的时间则很长。他治学的态度和教育的宗旨很明确，曾提出过不少纲领性的主张，如“主敬”、“明伦”、“慎独”、“道中庸”，如“操守涵养”、“格物穷理”。在他的《语类》中曾说：“学者功夫，唯有居敬、穷理二事。”在他的《仁说》里又说：“而纲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从他所标举的这些观点，都很难论证“忠孝廉节”四字出于他的手书。

再说文文山，他是一位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他的节义文章为后世所敬仰。但在元朝来说，他是赵宋王朝的亡国宰相，他被蒙古族统治者杀掉，死后在官方并不吃香。朱子的情况就和他大不相同了，他是孔子以后我国千百年来影响最深远的大哲学家，在学术界享有集大成的绝对权威，不止是南宋一代学人的领袖。元朝统一中国后，其人其学得到著名学者许衡和吴澄等的崇奉和提倡，朱子学派仍占统治地位。明、清两朝把朱子的地位抬得就更高了，他著的《四书集注》，是朝廷命定士子必读的课本，科选试题尽出其中。他在官方和学术界的权威地位，历经元、明、清三朝而不衰。这样崇高的威望，就决非文文山所能比拟的了。由此可见，要是这四个字果真出自朱子的亲笔，后人怎会无缘无故抬出个文天祥来冒名顶替呢？只有说这四个字本是文天祥书刻在孔庙里的，后人把它翻刻到书院的时候，为了增益其声价，加强其影响，换上了朱子的名义，以广号召，倒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

关于朱、文两人书法的艺术风格，也有作一番对照研究的必要。他们各自的书法风貌，从传世遗迹中可以窥见其梗概，无论体势与流派，都是截然异趣的。此事还得从书法的流变谈起。今天的楷书，六朝时已经形成，当时谓之今隶，以别于秦隶、汉分。历来书家的楷书，宗于篆书的用笔多圆劲，字势向纵发展取法汉分的，形态笔意类皆方整，势向横拓。以此来衡鉴古今书法，其渊源皎然可辨。朱子书朴茂凝重，笔势横向，波磔分明，字形大抵近扁，无疑是远宗汉分的。文山书则沉着痛快，笔势圆转飞动，横敛纵放，形体偏长，犹有斯篆遗韵。这四个字写得挺拔有力，有威武不屈的气概，而且完全符合文山笔圆势纵的书法风格。古人所谓字如其人，是很有道理的。

朱、文两人的书法风格，源异派分，一望可辨，既如上述。再来谈谈碑上落款的问题，也是不难分出真伪的。我国古代遗存至今的石刻文字，书法者的署款方位虽无定格，亦非无亦可求。六朝以前，无论大小碑刻，大抵无书写人自题款识，汉碑皆然。相传夏承、郭有道二碑为蔡邕书，某碑为梁鹄书，某碑为钟繇书，皆后人悬想测度之辞，不足为据。北魏时碑刻盛行，书家落款的渐多，如王远书石门铭、朱羲卓书魏灵藏造像等，署名皆在文后。唐代重书法，碑版书手，皆一时名流，如欧、虞、褚、颜所书各碑，自题名皆在碑文之前、

撰文者姓名之下。至于摩崖巨制，楼观榜额，书者名款未有不在末尾者，不独郑道昭书白云堂、颜真卿书逍遥楼为然。今书院本“忠孝廉节”四字的书者名款，却在第一字——忠字的右上方，按之古刻，从未见此格式。这是可疑之一。古人的碑刻上的题款，具姓名者多，或署别号，而没有自称为子的（后人著书为文，间有自称曰某子的，又当别论。先秦称老子、孔子等，皆其门弟子对其宗师的尊称，非自称）。书院本落款作“晦庵朱子书”，非但不合古制，就是和他本人的其它手迹相较，亦无先例可援。最常见的款式是“新安朱熹书”，没有一例作“朱子书”的。这是可疑之二。由此可见这个朱子题款，本无原迹可据，显系后人听取传说追加上去的。孔庙本文山落款的位置，则在四字最后“节”字的左边们下方，恰好是古人相承的题名处所。款分两行，首行记翻刻的时间，说明不是原刻；第二行标明原书者为文天祥，并且有书写时的地点，以示慎重。地名虽已剥蚀，无可考查，仍不害其为书之有地。因此，这四个字文山所书，可无疑义。

现在既然有了两种刻本，就有把二者作一番比较的必要，书院本为清道光七年摹刻，孔庙本为清嘉庆二十年摹刻，比书院本早十二年。虽然两本为清代翻刻，俱非原物，但翻刻还是有迟早之分。两本的字形和尺寸完全相符，正为来自一源，所以外貌不致面目全非，粗看是很难分辨其优劣的。但只要把两本并列对校，就一眼能看出大同中存在着不少小异之处。从字的结构来看，二者的笔法位置已略有变动，如“廉”字中两点显得呆滞做作，“廉”字中二竖末笔出锋已形变如木刻鸡头，左长撇上部和右下部的枯锋已填实，收锋变成了圆饼式的附加物。通体只见描刻失真的痕迹，全失运笔的原意。可见孔庙本比书院本不但摹刻得早，而且刻工也精妙得多。

大凡古碑刻每经翻刻一次，势必走样失真一次，这是没有例外的。如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翻本《爨宝子碑》，岳麓山陶澍翻刻的《麓山寺碑》，不与原刻相比，看去还像个样子，一比就显得二者形神俱异，相差不可以道里计了。由此可以认定，孔庙本是书院本的原始底本。至于初次翻刻的时间，可能并非在清朝嘉庆，而是在更早的年代，为元、为明、为清初，不可确知。这个问题，我们暂时只能存疑，有待于博雅考定。

关于岳麓书院“忠孝廉节”四字书者的归属问题，我们从各方面作了初步考证，确定为宋末文天祥。

文天祥在湘年考

刘松洲

《文史拾遗》1990年第2期79页载有虞逸夫、杨梓两先生《岳麓书院“忠孝廉节”石碑为文天祥所书》一文（以下简称《岳》文），其中提到文天祥来湘二次，均未注明具体年月，只说：“文山第一次来到湖南，时年三十七岁，驻留漳州仅一年，第二年就任赣州去了。十年之后，他又再次到过湖南，这是读了他的《湘江宿别》诗才知道的。”“从诗中看出，他第二次到湖南已是十年后的春天……”

查阅史料及文天祥著作，他第一次到湖南长沙，是来任提刑之职的，具体年代是咸淳九年（1273年），除《文天祥年谱》记其事外，还有文山先生自已所写《衡州上元张灯记》一文（又作《衡州上元记》）为证。他在文章初段就写道：“……咸淳十年（即1274年），吏部宋侯主是州（即衡阳）予……以王事诣长沙，会改除，于是侯与予为客主礼。”这就是说，咸淳十年宋某做衡阳州官时，文天祥于这年初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前来到了衡阳，他是刚好解除湖南提刑一职改调江西赣州做知州。离开长沙到赣州去上任路过衡阳的，说明他上年（咸淳九年）还在湖南提刑任上。《岳》文说：“十年之后，他再次到过湖南”，这是不确的。因为“十年后”已是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公历为1283年）。文天祥已在此前一年就义，南宋王朝也已灭亡好几年了。查文天祥于宋景炎三年（127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广东海丰五坡岭被俘。当时他的部队正在开饭，遭到元军突然袭击，他知自身难免，便服脑子（冰片）自尽，昏迷良久，清醒过来，发现已成战俘。以后他一直被囚于燕京。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公历1282年1月9日），文天祥在燕京柴市壮烈牺牲，1283年后怎么可能再到长沙？

《岳》文所云文天祥第二次到长沙的唯一依据，仅是文山一首五律《湘江宿别》中起首二句：“潇湘一夜雨，江海十年云。”认为“十年云”即是他十年后又至湖南，这不免牵强附会。拙意以为，这二句并不能肯定是他解除湖南提刑与湖南友人分别10年后的1283年他再来湘相聚，更可能是：他在1273～1274年初在湘时，与一位10年前在湖南以外的某地分别的朋友在衡阳相会了。笔者考证的依据如下：该诗第6句为“回雁晓殷勤”。句中“回雁”可作动宾结构，更宜作名词一指衡阳回雁峰，全句意为“早晨（晓）的回雁峰对客十分殷勤”。文山抵衡阳时正值元宵，如把“回雁”当做“大雁飞回”，是不合节序气候的。诗第4句“重逢便作分”，《岳》文说是：“这次停留的时间更为短暂，可能是（文山第二次）路过长沙，所以‘重逢便作分’了。”

窃意以为是文山1274年元宵节（调职中）路过衡阳，在此恰遇十年前分别的老友，短暂相聚即分手。第5句“啼鹃春浩荡”，可意译为元宵新春，花灯闹出了啼鹃之地的浩荡春意。“啼鹃”许是宋时衡阳城内某一街名或景点名。愚意以为《湘江宿别》之“湘江”，非长沙城边湘江，而是衡阳城边之湘江，该诗是文天祥《衡州上元张灯记》的同时之作。因作者手头资料不尽完善，如有睿智之士在其他史料中发现《湘江有别》诗前诗后附有文山小序或小跋注明确是夜宿长沙之湘江，则拙文对该诗之考证分析尽可作废。不过，《岳》文说是文山于1283年后路过湖南是绝对不符史实的。

岳麓禹碑及杨慎译文

谭绪缵

禹碑，又称神禹碑，取孟子“圣而不可知之谓神”为义，它是长沙岳麓山著名古迹之一，相传是禹治洪水时留下的石刻。《岳麓志》云：“高明广大，具岳之体。自平地以极山巅，可七八里，峰顶东西广约五丈，南北倍之，怪石悬绝，禹碑刻其上。”所称禹碑，其实非碑，江昱《潇湘听雨录》云：“今岳麓石壁七十七字，凡九行，末行空四字……，是嘉靖以来升庵辈所见者，即此磨崖石刻非碑也。”是知岳麓禹碑，原为磨崖石刻，就是指在悬崖石壁上刻字。岳麓禹碑，不是最初的大禹石刻，它是从衡山岣嵝碑摹拓而来，岣嵝碑者乃为禹碑之祖。所谓岣嵝，是指岣嵝峰而言，也就是衡山祝融峰。《水经注》说：“湘水又北迳衡山县东，山在西南，有三峰，一名紫盖，一名容峰，容峰最为竦杰，自远望之，苍苍隐天，故罗含云：‘望若阵云，非清霁素朝，不见其峰。’丹水涌其左，澧泉流其右。《山海经》谓之岣嵝，山为南岳也。山下有舜庙，南有祝融冢。楚灵王之世，山崩，毁其冢，得营丘九头图。禹治洪水，血马祭山，得金简玉字之书。”由这段记述，足以明了以下两点：一、《水经注》之容峰，即《山海经》所说之岣嵝，是衡山最为竦杰的主峰，又因有祝融冢在，亦即为祝融峰无疑。二、知禹治洪水，曾登衡山杀马祭祀，并得金简玉字书，此一传说，实袭汉人所撰之《吴越春秋》。该书有云：“禹登衡山，梦苍水使者，授以金简玉字书，得治水之要，刻石山之高处。”自此说一出，就成了：“言禹碑者之权舆”。而岣嵝碑之名，即滥觞于此。首先，唐韩昌黎赋《岣嵝山》诗，云：“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摹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鸾飘凤泊拿虎螭。事严迹秘鬼莫窥，道人独上偶见之。我来咨嗟涕涟洏，千搜万索何处有，森森绿树猿猱悲。”这大概是韩愈听了道人偶见岣峡碑的传说，以为字形奇特，事严迹秘，因生好奇，便登衡山搜索禹碑真迹，最终未见，遂感而赋此。这就是岣嵝碑初次见于诗人的笔底。此外，刘禹锡《寄吕衡州温》诗，也说：“尝闻祝融峰，上有神禹铭，古石琅玕姿，秘文螭虎形。”此言祝融峰之有禹碑也。自二诗出，一言岣嵝，一说祝融，则衡山之有禹碑，信而不诬，于是闻者接

踵，登山欲访真迹，至宋如郑樵朱熹张栻等学者均来斯地，但皆以“不见禹碑为恨”，由是人皆疑韩、刘之诗，乃均得之耳食，不足取信。若《丹铅余录》等书即曾云：“古今文士称述禹碑者不一，然刘禹锡徒闻其名矣，未至其地也。韩退之至其地矣，未见其碑也。”何时何人曾亲见此岣嵝神禹碑呢？南宋张世南《游宦纪闻》卷八则云：“何贤良名致，字子一，嘉定壬申游南岳，至祝融峰下，按岳山图，禹碑在岣嵝山，询樵者，谓采樵其上，见石壁有数十字。何意其必此碑，俾之导前，过隐真屏，复渡一二小涧，攀萝扪葛，至碑所，为苔藓蔽，剥读之，得古篆五十余，外癸酉二字俱难识，韩昌黎所谓‘科斗拳身薤倒披，鸾飘凤泊拿蛟（虎）螭’，而其形模，果为奇特。字高阔约五寸许。取随行市买，历碎而摸之。字每摹二，虽墨浓淡不匀，体画却不甚模糊。归旅舍，方凑成本。”据此，是自唐以来未曾为访古者亲见之神禹碑，至南宋时却被何致其人所亲发现，并摹拓成本。“嘉定”是南宋宁宗年号，“壬申”是公元1212年，然则，何致见到这岣嵝神禹碑，迄今已是七百八十年了。《纪闻》又说，何致将岣嵝碑摹拓成二本，一自存赏玩，一送转运使曹彦约。曹得拓本，大悦，因令衡山县令寻求真迹，据山寺僧人法园回报：“禹碑自昔，人罕见之。”岣嵝碑仍然是个谜。于是，人皆以何致摹拓本，殆为诳曹者（按：后人或以系何致之伪造），何致因刻之岳麓书院后巨石，这就成了今岳麓禹碑的起源，以此可知岳麓禹碑乃是由衡山岣嵝碑翻刻而来，而非神禹碑之祖。据张世南《纪闻》所载，何致翻刻禹碑，是在岳麓书院后巨石上，但今人所见者，却在岳麓山左侧高峰之悬崖石壁，并非巨石，刻石之地点不同，令人质疑。因而近代考据家王伯绥遂谓：“何刻毁于明季，顺治末年观察彭叠峰而述据原文原楷，复镌岳麓之崖石。”（见《嘉庆通志》）王伯绥以今岳麓禹碑是清初彭而述据何致原本镌刻，议者多有不同意见，而明代潘镒之翻刻说，由此以出。说者以为何致自将岣嵝碑翻刻在岳麓书院巨石后，自宋历元至明约四百余年，此碑隐秘未显，即所谓“蕴晖零露”，至明嘉靖癸巳（公元1533年）郡守潘镒得樵子之传播，遂在荆莽中得此石刻，加以字迹之清理，因行摹拓，何本翻刻，始传于世，而今岳麓山悬崖之神禹碑，即由何致巨石本翻刻而来。《嘉庆通志》说到潘镒翻刻本时，有“逮明嘉靖太守潘镒剔土拓传，盛行于世，此吴越秦豫滇蜀之禹碑所自昉，要皆本岳麓碑而翻刻之者。”这就是说，如果禹碑的最初发现，是在岣嵝，那么翻刻此碑传播至各省的，实自岳麓山始，这也就是今岳麓禹碑存世之重大价值了。

自明代岳麓禹碑翻刻传世，于是引起学术界的注目，考证者说，禹碑书法，既非古篆，又非科斗，更有异于甲骨文，遂疑为伪造，此以明郭宗昌、清王昶、钱大昕诸家最为代表。而翻译者却信实不疑，以为确属大禹文字，此以

明代新都杨慎、靖阳沈镒、仁和郎瑛、南昌杨时乔四家为最有名，而杨升庵（慎）又为之冠。今姑置真伪之争不论，仅将禹碑原文及杨慎译文并录于后，以飨读者。

碑文是根据陈运溶《缩摹禹碑图》临摹，见《湘城访古录》卷一，全文九行，直书，末行空四字，与今岳麓山巅之磨崖石刻同。明杨慎曾作译文如下：

承帝曰嗟，翼辅佐卿，洲渚与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裒，劳余伸禋、郁塞昏徙，南渎衍亨。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窜舞永奔。

译文亦七十七字，句读成韵，是一篇颂扬禹治洪水之作。前六句，是舜命禹治水，以洪水之巨大灾害，发出感叹。后十三句是禹受命治水，勤劳工作，祭祀山川；洪水被治理后，各地安居乐业，无愁衣食。第十六句“南渎衍亨”，据杨慎说，旧作“南暴昌吉”，他以为文义不贯，字形亦不类，苦思不得，是夕梦一鱼首黄衣指谓曰：‘此南渎衍亨四字也’。寤而观之，形义两协”。（见吴玉搢《金石存》引）。正因杨慎无法解释禹碑中之奇字，竟托之鬼神梦寐，所以对杨氏译文，人亦有存疑伪者。此又神禹碑之有待深入研讨者也。

《船山故居沿革及坟墓》的按语和附言

陈墨西

一、按 语

同治十一年《衡阳县志·承水篇》按语

墨西按：征求地方故实，以志乘为重要根据，清同治中，王湘绮闿运所修《衡阳县志》，尤有盛誉于当时，予考索船山故居沿革，首于此中取材，宜也。顾上段承水篇记载，对于船山故居，实涉混淆，予又不能不取有力证据及目击情形，为之一一指出。盖船山悲痛黍离，崎岖久无宁岁，追求致命而不得，遂专一闭户著书。岁庚子（清顺治十七年），始避地于衡西之金兰乡，卜居于“茱萸堂”（船山诗中堂作塘，本无屋也）。初造小室曰“败叶庐”，次筑“观生居”于茱萸堂上。越十二年，再徙石船山下。去“观生居”二里许，筑“湘西草堂”，因进滇氛，泛宅数载，后复归草堂，隐居著述十七载，至岁壬申而终，此船山季子敔“湘西草堂”记中所说明者也。而上段记载则谓船山“初创庭宇曰‘湘西草堂’。子孙世居之”。予本月二日亲至草堂查询，则王氏无一人居此。又谓“正室曰‘竹邁堂’”，予所见草堂庭宇，仅三开间一进，别无所谓正室也。又谓西偏为“败叶庐”。予所见草堂整齐三间，更无所谓西偏也。又谓“旁有梅家，夫之幼女瘗焉。”予在草堂之旁，绝不见有此种遗迹也。及予出草堂西北行二里许，至船山初居之茱萸堂，今谓之竹花园，而船山之后嗣多居于此，故上记误谓世居草堂也。竹花园有正室有偏室，故上记误以为草堂有正室偏室也。竹花园即竹邁堂，花邁音近，故转为花，不称堂而称园者，其地素产丛竹，望若园林也（今则砍伐将尽矣）。其西偏犹有故墙一堵，遗族称系“败叶庐”之残壁，虽未必真（王敔记“败叶庐”曰：“蓬檐竹牖，编篾为壁。”今墙系青砖，不应为船山旧居，当系族人修改“败叶庐”之所留迹）。然可证“败叶庐”固在此而不在湘西草堂也。败叶庐之西，有观生居故址，已犁为田；竹花园之西，梅冢犹有片石为志，凡予本月二日所亲见亲闻如此。湘绮不知船

山在筑草堂之先，尚有故居，遂举故居所有建筑名称，概以属之湘西草堂，以继建为初创，合两地而为一，致两地咸失其真相，此又证实船山故居沿革所直纠正者也。虽然求船山故居之沿革，固宜以茱萸堂为先；而言船山故居之保护，要宜以湘西草堂为重。盖草堂为船山终老之地，且自前清道咸以来，经陶澍、唐鉴诸名人之题赞，湘西草堂已名闻全国，而前之茱萸堂今之竹花园，其名犹未出于里邑，且久为船山遗族之私宅，国家可不复置议，故予在湖南第一届全省人民代表大会提案，专请恢复湘西草堂，并饬地方永远保护。而此下所提供船山故居材料，皆属湘西草堂沿革云。

《船山记》按语

墨西按：姜斋先生继筑湘西草堂于船山之麓，潜居十七年，成书数百卷，遂终老于草堂，实终老于船山也。先生殁于壬申正月初二日，此记作于辛未深秋，相距仅三月余，殆自知其与船山永相依附，有合无离欤？故曰："船山者，吾山也。"又曰："吾终于此而已矣"。盖自从游者称先生为船山先生，而船山之名，遂不复为山之有，而为先生所专有，顾先生专船山之名又实船山之幸，不然部娄之岑，安能名远，况先生所记之船山之草木习俗，无一不觉其陋，然正惟习俗之陋，益足显君子之居，人杰而后地灵，岂不然哉！今船山之名，久震于天下矣，更从而永崇之，则此一拳石之多，何难与泰岱争高，南山并寿乎。由此可证，形势之轻微，无害于精神之远到，凡志坚而力果者，其前途皆不可限量也。予搜寻湘西草堂沿革，而先之以船山，因有船山而后有草堂也，故录先生此记，亦循流溯源之义耳。

王敔、王嘉璋、王承佺《湘西草堂》三记

墨西按：右记三篇，阅之可知清道光以前湘西草堂之大概，而以王敔一记，尤为明晰。敔为船山季子，亦清康熙时衡阳宿儒，凡船山道义之能显于时，与其著作之能传于后，皆由敔所致力。船山晚年，敔筑"蕉畦室"于草堂之侧，课徒养亲，从游者称蕉畦先生。船山殁后，草堂被灾，敔重建之，记中所谓易瓦以葺，炼砖以砌是也。及蕉畦室亦被灾，敔遂专居草堂，传仅三世而无出，遂转属他房，又渐转属异姓。王嘉璋记中所谓："蕉畦见背，芸者继亡，房内兄弟，互相管守，越及今日，竟属豪右。"是也，嘉璋字霜枫（有传录后）为敔兄攽之曾孙，曾佐其父永萦赎回草堂，其记中所以郑重言之，事约在清乾隆四十年之后，永萦字其旋（有一跋录后）故王承佺记谓："幸赖其旋公出，向人赎回，重加修葺，以授后裔管业"是也。承佺者，船山八世孙，王湘绮《船山传》谓其"善事继母，奉叔惟谨，能守其家训。"亦船山遗族之良者。其记中复称嘉庆癸酉后，如何转移而作船山祠，如何赎回祠产及修复祠宇重立家祀，草堂重要过程，皆约言之，至请禁樵采，又承住所倡者，时为道光甲申岁。计船山初筑草堂，约在康熙壬子，至尔时已一百五十五年。草堂之变迁，约略于此。

《湘西草堂》图记按语

墨西按：阅上录三记，知草堂虽由王其旋赎回，然只赎回屋宇及园塘，而田犹未赎回也。阅此图记，知附草堂之田，初由王售刘，继由刘售朱，至清咸丰十一年，因朱砍伐堑树肇讼，经衡阳县令林廷式断归草堂四四亩，由朱书立捐契存案，并禁王氏子孙永不得典卖，于是草堂屋回复完，直至清末而无变更，此又言"湘西草堂"沿革者，所不可不知也。

《湘西草堂题额》按语

墨西按：此额此跋，予在草堂所目击，就而录出。第一行为上款，中横列《湘西草堂》四大字，下为跋语及下款。所谓旋翁，名永萦，字其旋，船山曾孙也。其就祖宗之堂额，庆子孙之寿辰，事殊不伦，而跋中："李制军屡造庐焉，题其额日湘西草堂。"等语，此外又绝无根据，以船山之高洁，生平不接清室贵人，何得有李制军造庐之事？草堂名本船山所自定，何得谓为李制军所题。殆以事隔百余年，传闻本多失实，遂以齐东野人之语，谬为引证，而不察其真伪乎？然额为乾隆乙卯所题，乙卯为乾隆六十年，距今又百五、六十年矣。予所见草堂故物除玉音遗像外，仅有此额，且其旋之于草堂，又有收复再造之功，虽李顺翼一跋，词多可笑，欲明瞭草堂沿革，其中亦有不可废之言焉。

《霜枫公传》按语

墨西按：王敔以下各篇，皆从王氏五修族谱录出，其旋、霜枫父子，于湘西草堂沿革，皆有重要关系，故于录湘西草堂记及图记之后，兼录此父子两人一跋一传云。

官书文告三首按语

墨西按：右三首文告，录清官府保护船山故居之事实，此与道光四年甲申衡阳帅令之出示培护船山坟地，光绪三十四年戊申，衡、永、郴、桂、谭巡道启瑞之修理船山墓庐（二事皆录在船山坟墓篇），皆可见其尊崇船山之诚意，顾王胡二示之颁布，则在宣统元、二两年，并勒有石碑，立于湘西草堂门首，乃不逾年，而清室遂亡矣。是清室之尊崇船山，实与其国祚相始终，而船山固终身不臣服清室者也，清室犹尊崇如彼，然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尊崇船山，更将益于清室也。

《像赞》按语

墨西按：予在湘西草堂见旧藏船山画像一轴，题此八字为赞，篆文遒劲，确系名手所书。惟八字正中篆"玉音"二字，初昧其由，询其嗣人亦不明了，

及阅王氏谱牒，并复查船山遗书，见王敔所为姜斋公行述，知上四字系明永历帝对船山诏旨有“可见孝恩，足徵恬品”两语，故王敔从而节出此句。下句虽未有记载，然与上句同称“玉音”，必系永历与船山另一旨中语无疑。且知此像当为王敔所制。今传至三百年，自宜珍重，已嘱其遗族新加装裱，妥慎保存矣。

《湘西草堂》额联按语

墨西按：思贤讲舍者，清光绪中，湖南绅商捐资课士之所，性质等于今之私立学校。膏火之优，仅亚于当时官立校经堂。主持者为郭传郎嵩焘。郭生平最崇拜船山，思贤者，思船山也，因于讲舍中建祠祀之。右联为郭特撰并书，悬于祠中，予六十四年前曾肄业讲舍，故能终身诵之。鼎革之后，此联想已无存，惟都在清时，有书家第一之称，此联万一或能寻求，亦文委会所宜保存之物也。

二、附言

湘西草堂之现状

草堂自王其旋父子于乾隆中向刘姓赎回，并加修理，其后嗣继奉为船山祠，不复为何房所私有。又自清咸丰辛酉，衡阳林令判回礼祀田，于是祠产复完，由还时迄清末，更于清末迄解放以前，近百年来，祠中或有人看守，或无人看守，或由佃人居住，或由遗族居住，未有固定，而大体无甚变更。解放后，于1950年废保为乡，分现今竹花乡地为枫马。石船两乡，并于草堂内设立枫马乡乡政府，草堂不啻无形消灭。迨1915年春初期土改，径附草堂房屋田地，改属李姓，而船山之草堂，在此一时划已告寿终正寝矣。幸1952年下期土改复查，又将草堂房屋及田地之大部分收回公有，犹保留船山祠及湘西草堂之名，又合并枫马、石船二乡之为一，易名为竹花乡，将乡政府迁于附近之邹氏宗祠，另以田宅分授李姓，此又草堂最近最大之沿革也。顾草堂虽存，已非解放前之旧，堑树素多，剪伐已尽，老枫孤立，伏马不嘶（草堂左侧有老枫，其根突出形似伏马，故日枫马）。画像空留，已伤鼠啮（语详题咏篇）。名人题赠，片木无存，老屋三间，壁上犹署船山山祠三字，门左竖立二石碑，即刊清吏保护词字之文告者，堂内孤悬一额，即湘西草堂旧额，而附王其旋之跋者，以外草堂旧物一无所见，如此凄凉景象，又不得谓非作两年乡政府所造成（原提案中以原枫马乡政府为竹花乡政府实系传闻之误）。以名贤之故居，遭非常之毁损，鄙人身负言责，素有所闻，所以特在省人民代表大会提案，请求恢复保护，其如何执行议条，则不能不深赖贤明地方政府矣。（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特识）。

路述当地各界对船山故居之意见

鄙人以征求船山故居材料，于本月二日，在衡阳县第十区区公所召集当地父老、文教部门、船山遗族及行政干部开一座谈会，到者共三十人，首由鄙人报告谈话要旨，略谓：“我前在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请求恢复船山先生湘西草堂故址，并饬地方永远保护一条，经大会交省人民政府转衡阳县人民政府处理，此次由文物管理委员会函请我提供船山故居沿革的具体材料，故我今天特邀请诸君前来座谈。我现提供三点，要请诸君讨论：（1）对船山故居沿革，请各举其知，详细告我。（2）对船山故居之恢复与保护，诸君如有意见，可提出供政府参考。（3）船山遗迹遗著，闻秘藏于衡阳各处尚多，应请诸君商酌办法，劝令献出，归国家永久保存，事尤重要。凡此三点，希即商得有效办法，以便我回复省文委会，转呈上级处理为荷，云云。余报告毕，全场发言甚多，理论勿庸具述，结果第一点由船山遗族王荫林交出《邗江王氏五修族谱》两大本，对草堂沿革登载颇详。第二点全场对政府之决定恢复保护船山故居，同声感颂，惟决定：“由区公所通知竹花乡乡政府，将现居湘西草堂之李姓，从速迁出，责令船山遗族保管，后山树竹，严禁砍伐，新开荒土，尽行收回，以植树苗，期复从前茂木之旧。”此系为政府所可采者。第三点搜集船山遗物遗著，决议除遗族所藏应自动献出外，其全区各家之搜求，以学区为单位，由三中心小学校长具体负责，通知各乡校校长，并向学生试探，询其家长有无此项旧藏，如得有线索，即联合多人，劝导献出。进行以半月为限，定月之十八日，三中心校长至区公所会议，将得到之件，暂交十区公所保管，由区公所于二十一日通知鄙人，以凭转报，当日议定如是。鄙人于月之二十五日又函致十区公所及船山遗族，嘱其对此事之注意，今逾二十一之期，业已数日，犹未见两处有何消息，大约前项议条，已无结果矣。此事如欲发生效力，尚非另设特别办法不可，应请政府主持为幸。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墨西对保护船山故居之意见

一、船山乡名不宜轻废也。名贤居留之地，地与人即共同不朽，尊重名贤者，称名贤常称其地而不称其名，然称其地即知属其人矣。如船山地也，仅举船山二字，人即知为船山先生，而不以为石船山也，是船山之地与人名已合为一而不可分离。衡阳设镇之时，称船山镇者约二十年，改乡之时，称船山乡者又十余年，乃缩小乡镇范围时，竟将船山乡名取消，改名曰竹花乡，此虽因竹花园，亦系船山故居，遂根据而有此改易，然而竹花之名，本乡以外，知者殊少，若船山二字，声誉所播，则上溯三百年，远遍全中国，顾竟以此易彼，宁非轻重颠倒乎？应请将竹花乡之名，仍恢复为船山乡，庶乎名正言顺矣。

二、竹花、曲澜两乡应合并为一也。“湘西草堂”，及最先船山故居，均属

今竹花乡地，船山坟墓则在“曲澜”乡之“大罗山”，两地相隔约七、八里，分为两乡，则各占船山重要部分之半，仅称竹花乡为船山乡，犹觉有所偏枯，若合两乡为一，称之为船山乡，则名实皆符矣。且两乡之地，合并之亦不过十余里，全县之中，一乡之地逾十里者尚多有之，不能谓此乡之区域过大也，况即合并之后，较前此之船山乡尚小十余倍乎，故鄙意以合为是。

三、恢复“湘西草堂”宜扩充建筑也。草堂仅简陋之古屋三间耳，今由公家定作永远纪念船山之地，自非新加建筑，不足以崇观瞻案。至建筑应由何种方式进行，尚非省文委会派员审查后不能预拟，惟舆论亦有可以参考者。本月二日开座谈会时，桐梓坪中心小学万校长云桂，提议将竹花乡乡校迁入草堂（该校现有校舍不敷用），似乎亦可，然即作小学，亦非草堂现有房屋所能容纳，并不能喧宾夺主，故当时未将此案决议，仍待政府将来定夺耳。

四、船山墓庐附近宜成立一船山图书馆也。文化之发展，以图书为重要机构。中央人民政府前有表示，欲使全国各乡皆有图书馆、博物馆成立，意至美也。而事实竟有与此相反者，如以衡阳县区域之广，人口之多，乃无一图书馆存在，博物馆更无论矣。鄙人曾在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全省新成立各县，须克期成立一图书馆之案，意因衡阳县原有之图书馆，已为衡阳市与衡南县分去，故衡阳县无之，欲大会交下此案，俾新分治之衡阳县，亦能从速成立图书馆也。不意大会竟将此案交省人民政府参考，而不交省府执行，所以衡阳县无图书馆如故，鄙人不胜叹息。船山本衡阳唯一模范人物，今能于船山墓庐成立一图书馆，则所以资观感而兴起者，岂不大而远乎，祈政府即加察核为幸。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墨西对船山坟墓之陈述

余之谒船山墓，系与赴湘西草堂同日（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一日）。赴草堂在午后，谒墓犹在午前，墓地旧属衡阳九都金兰乡高节里，一称高陂町，今属十区曲兰（县志作澜）乡，距湘西草堂约八里，由曲兰西北行三里至草堂，东南行五里则至大罗山墓地。墓系东向，前临大路；白马水环之，树木成丛，风景优美，循路下山稍左，墓庐在焉，为清光绪戊申年衡、永、郴、桂、谭巡道启瑞所重修，房屋五间，谭题额曰：“明王行人之墓庐”。今为船山遗族王迪光兄弟三户所居。惟墓道久未修理，墓址亦不稳固，神道等碑，未见竖立，墓上刻石，字已模糊，尊重名贤，似不宜熟视无睹。昔展季之垄，樵苏有刑，信陵之坟，守卫不阙，凡保护名人墓地，历史先例极多，况船山之贤，实足侪乎展禽，超乎无忌耶？则船山坟墓之应保护，又何疑乎。本省名胜古迹保护暂行办法第二条第二项云：“凡有关革命历史文化之陵墓碑表（如古代著名陵墓及革命烈士坟墓之类）及其附属物。”船山之学说，处处见革命精神，满清之覆亡，

大都由船山教育之推动，是船山不仅为一大哲学家，实亦革命文学家，则根据本省法令，而船山坟墓亦不能不保护焉。余近接湖大教授马宗霍来函，略称“先生提议恢复湘西草堂，某极表同情，不惟草堂，即高节里大罗山船山所葬之地，某十余年前亲往拜谒，顾墓庐虽存，墓地已有崩剥之象，其时某尝向当道谈及，请加整饬，竟无注存之者，此次若得与草堂同加修理，则一举两成，尤胜事也。”云云。此外以口头向余申说，并劝余提此节者尚多，难以具述，是征诸一般舆论，船山坟墓亦宜修理也。余谒墓时，闻船山遗族云：“在翁未提议条恢复草堂之前，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曾派员来此察勘，已有修船山坟墓之拟议，惟未明白宣布耳。”是省文委会早知此事之应兴办，当有具体计划，不日实现，又可断言矣。余提案请恢复湘西草堂时，并未提及修理坟墓，初由未明坟墓情状之故，现既明了情形，觉此为一人之事，在势必须并行，两地又相距不远，自可并为一条办理，由文委会设计报明上级处理时添此一层，必被核准，即可图功，以孚众望，此吾对船山坟墓之拟议也。墓上刻王湘绮联二首，一曰：“前朝干净土，高节大罗山”。一曰：“世臣乔木千年屋，南国儒林第一人”。二联写尽船山生平，非湘绮不能道也，惟刻字完全漫漶，非有家乘载此，几不知墓上有此二联矣。近人张翰仪亦有墓联一首题于墓庐曰：“故国剩金盘玉鱼，青冢独崇高节里；遗亦览石船枫马，丹心长照大罗天。”亦有意义，然较王联逊之远矣。坟上无他文字，余拟题墓七律一首，附录于后，诗曰：“坚贞西北推孙李，宏博东南数顾黄，桀涧各修千古业，姜斋实集四贤长。大罗撮土辉南国，高节逸民类首阳，七尺虽埋人永活，年年天许荐馨香。”款曰：“甲午仲冬谒高节大罗山王船山先生墓，同邑后学陈墨西敬题。”上诗请当代大诗家教正之。

船山残稿题跋五种案记

题跋五则，为九年前友人姚子仙所抄示，予曾编入衡阳文献中，兹将录附船山学术篇后，用见船山手泽，虽残纸只字，人人皆珍若拱璧，更由姚氏之说，又可证船山遗著，秘藏衡阳各地者，必犹甚多，但藏者每不肯认承耳。以余所闻，尚有数处藏有船山手稿残本，现正函托友人代谋，均未得到答复，或藏者之态度，亦如姚氏所说之刘安世乎，安世之先人即王湘绮传船山末所称手录船山书数十万言藏于家之刘介之。今姚氏已亡，介绍姚刘相晤之王曾二君亦故，安世是否犹存，予尚不知，其人即存，或因他变将原书毁坏，亦不可知。若人书皆由无恙，拟俟省文委会派员来此调查时，合力宣布政府之德意，或可设法取出；如果有效，则船山遗族及他家之所秘藏，亦将不致于沉埋矣。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附：衡阳马宗霍先生承教录所问各点具答于下

一、船山学社向未参加，现存几人，无从探问。前岁船山先生生日，曾举行祭典一次，某亦被要与祭典，后亦未得到通知，不审尚举行否？

二、船山遗书，上海太平洋书屋有排印本，视金陵刻本，多古诗唐诗明诗评选及相宗络索数种，此亦旧有单行本，非别得秘抄也。某往者尝获见邵阳曾氏所藏船山五世从孙手抄船山读通鉴论、宋论、春秋家说、春秋世论原稿，凡金陵刻本之缺字、讳字、脱落之字皆在，其异同之处亦多，疑为邓湘皋校刻时，邹汉勋所窜改，玩味原文，实视改本为胜，某当即借得对仇，识以朱笔，现正从事辑录，别成校记，拟付印行，庶船山此数书真面目，沉霾三百余年者，得与海内共见。

三、船山为吾乡先贤，其著作之多，识见之卓，思想之伟大，实在顾、黄之上。旧有刘毓崧、王之春两人所作年谱，皆不能得全，颇欲重撰一编，虽不敢望白田之谱晦庵，或庶几石洲之谱顾阎。然蓄意虽久，讫未著笔，盖惧失学力之不副也。

四、省文委会曾得船山宋论手稿数纸，确为真迹，乃知南岳图书馆前所印行之船山手书，实传写之本，非其真也，此外见未……。

左宗棠的一件遗墨

唐自斌　易元九

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说过：“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从在湖南湘阴老家做塾师起步，直到成为晚清显赫的封疆大吏的左宗棠，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近代史上，左宗棠不仅是一位功勋卓著的爱国主义将领，而且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书法艺术家。笔者有幸收藏了左宗棠亲笔书写的一篇诗作：《题孙芝房侍讲苍筤谷图》。以笔者愚见，无论就诗文的深远意境，还是书法的英伟精湛，左氏的这件遗墨均称得上是难得的珍品。故不揣冒昧略作介绍，以飨读者。

诗题中的孙芝房，指清朝道光进士孙鼎臣。孙鼎臣（1819～1859年太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字子余，号芝房），“官至翰林院侍读，深究古今学术政教治乱所由……其言明达适治体。以论事切深，时不能用，乃假归……辑河防纪略及诗文等，总为苍筤集。”因孙鼎臣与左宗棠均系湖南人，两人有所交往，故左宗棠有此诗作。

全诗分为三段，第一段从写竹人题，“湘山宜竹天下知，小者苍筤尤繁滋。”并将竹子在春天破地而出形象地比喻为“锥倒卓”。此段重点在写景。

接着笔锋一转，进入情景交融的第二段。作者慨叹“频年兵气缠湖湘”，给老百姓带来无穷灾难，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避地愁无好林壑”，哪里还有什么舒适安逸的“世外桃源”呢？真是“桃源之说原荒唐”啊！

诗的第三段，行文气势磅礴，将作者的博大胸襟表现得淋漓尽致。“楚人健斗贼所惮，义与天下同安危”，则充分体现了作者以天下为己任，要与危难中的祖国同生死共命运的爱国主义情怀。据左宗棠自己在本诗稿末尾所写题记，原诗本系“咸丰丁已旧作”，即是1857年左宗棠尚未发迹时所写。而重新将此“旧作”书写出来却是在左宗棠“移节关陇驻军酒泉”之后，因为“己未冬月公符（即孙芝房的儿子）度陇来谒，谈次，余歌此诗……坐客索录一纸，遂书此。”这里的“己未”并非指“己未”年，而是指的己未月。如果是“己

未”年，就是1859年，那和“移节关陇驻军酒泉”显然对不上号。史载左宗棠部湘军攻克西北的最后基地肃州（酒泉），是在1873年11月，1876年初左又率军出征新疆，故“公符度陇来谒”只能是1874年或1875年。笔者以为，应是指1875年（光绪元年）已未冬月。此时的左宗棠虽已年过花甲，但头脑清晰，指挥若定，不可能发生倒转阴阳的差错。同时“已未”与“冬月”是重义词，在罗正钧所著的《左宗棠年谱》中，类似的说法甚多，诸如“光绪二年丙子，公六十五岁。正月，庚申……二月，庚午……，三月，乙巳”等等。

左宗棠“移节关陇驻军酒泉”的前后，适逢新疆动乱，中亚浩罕汗国侵略分子阿古柏乘机率军入侵，于1867年攻下阿克苏、库东等地之后，宣布成立所谓“哲德沙尔”（七城汗国），自称为汗。随后又占领了南疆全部和北疆部分地区。英国和沙俄也伸出魔爪，与阿古柏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沙俄更于1871年公然派兵侵占北疆军事要地伊犁。面对阿古柏和英俄帝国主义对新疆的侵略，左宗棠赋诗挥毫，发出“公缚湘筠作大帚，一扫区域净氛垢”的豪言壮语，矛头绝非指向农民起义军，而是针对外国侵略者。也就是说，左宗棠这时重歌此诗并书以赠人，意在抒发驱逐侵略者，光复新疆，保全祖国领土“尺寸不可让人”的铿锵意志，以实现“义与天下同安危”的宏愿。在当时清政府内部“海防”与“塞防”的争议中，直隶总督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移饷“海防”，竟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而左宗棠力主“塞防”与“海防”并重，强调新疆安危事关全局，“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清政府采纳了左氏的正确建议，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指挥清军于1876年3月至1878年1月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收复了除伊犁地区外的新疆全部领土，有效地挫败了沙俄、英国攫夺我国大片领土的狂妄计划。左宗棠也经受住了民族危机的严重考验，保持了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民族气节，这也正是他能彪炳史册的主要原因。

最后，作者以“归来共枕湘江眠，卧看寒云还谷口”结束全诗，既表达了作者对胜利的憧憬与“功成不受爵，长楫归田庐”的怀抱，也点了“苍筤谷”的题。

此外，左宗棠的这份诗稿，与岳麓书社1987年12月版《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中收录的该诗，有几处不尽相同。如本稿的“有客长安归未得”，岳麓版为“归不得”，“桃源之说原荒唐”岳麓版为“诚荒唐”。当然它们的含义大体相似，无伤大雅。但诗的最后两句，本稿中是“归来共枕湘江眠，卧看寒云还谷口”，岳麓版则为“归来共枕沧江眠，卧看寒云归谷口”，这“湘江”

与“沧江”相去甚远。笔者以为，左宗棠系湖南湘阴人，孙芝房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湘阴、长沙均在湘江之滨，“归来共枕湘江眠”似更恰当贴切。当然，如果认为诗人此处并非写实，而是采用泛指的手法，说是“沧江”亦未尝不可。

从书法的角度来看，遗墨苍劲有力，一气呵成，小楷结体严谨，以颜氏风格为主，兼采众长，表现了左宗棠在书法方面的深厚根底。无怪乎日本学者大村西岩在其《中国美术史》一书中，把左宗棠列入清明“硕学大官之书重于世者”。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看到诗稿的人会赞不绝口，爱不释手。这件遗墨证明，左宗棠不愧是晚清三大书法家之一（另二位是何绍基、曾国藩）。

左宗棠这件遗墨的第二位收藏者，曾在伊犁军幕中任职的易鼎元先生认为，左相国“勋勋业载在史宬，而其诗笔之清壮，书法之英伟又复如此”，并非溢美不实之词，乃是很有见地的评价。易氏书写的收藏左诗缘由，着墨清雅淡逸，字字清秀流畅，亦是不俗之作，权当该诗附录，也许与左诗有相得益彰之效用。

还要指出一点，左宗棠在本诗稿题记中，明确无误地指出原诗写于“咸丰丁巳”即1857年，弥补了左宗棠全集版本中该诗均无写作年代的缺陷，为理解原诗的时代背景、内容和意义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亦不可忽略。

《天岳山馆诗存》序

曹典球

清道咸之乱极矣，吾湘儒生抗志功名，思所以拔奇夷难者，肩背相望。平江李次青先生师事曾文正，而德优于才，军事非其所长，恒被疵点，然文正固覆翼之，不使其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也。余少读先生所著《国朝先正事略》，服其叙述之条理，持择亦严。后又读《天岳山馆文集》，则见其义理考据，有左右逢源之致，而词章之功，似尚逊于刘霞仙诸人者。戊寅之冬，避地安化，陈子右钧亦侨寓于此。一日谓余曰："先生自知不精于诗，临终属其子桂岑，遗集勿许以诗羼入之，予以与先生同里闬，景怀先德，辄从其子蠡岑处得遗诗若干首，并益以亲旧间所搜集钞之。颜曰《天岳山馆诗存》。"命以一言志其首。窃维古之人为学之道，虽文如班马，如其自视歉然，恒有所不足也。况明知其不足，而必自以为有兼人之长乎。今天下之乱，甚于洪杨，而士大夫之夸诬自以为是，则比比皆是，乱之不沮，实由于此。兹闻右钧所述先生勿许刊诗遗事，知清季湘人之成功一时，未始非其虚心谦抑之所致也。既念先生翼翼之诚，又敬右钧之笃于故旧也。谨叙其巅末于此，为来者告焉！长沙曹典球敬识。

题陈云章教授所藏《湘绮楼丁未后未刊诗册》

马积高

旧传王氏《湘绮楼诗集》，所收诗止于光绪丁未。此册为湘绮手书，收诗41首，词1首，始丁未（光绪三十三年），至乙卯（民国4年），正与相接。世传《湘绮楼日记》，亦多载此9年所作诗，互有异同，且有《日记》仅载其目而诗见此者。然此册所录，感怀之作为多，又不取七言近体，盖寓有好高之微意；又此9年间，世事多变，光绪、慈禧先后去世，辛亥革命创建民国，袁世凯篡国以至称帝，皆在其中。湘绮此时虽已年老，然在丙辰（民国5年）去世前不久，精力尚健，诗文多关时局。其与袁氏之关系，尤为当时人所瞩目，亦启后人之议论，为湘绮晚年一大公案。此册之诗，于上述诸事，皆可略见其心迹，故尤可珍贵。

按：辛亥、壬子之际，前清士大夫咸与维新者颇多，拥袁者尤众。旧君主立宪派无论矣，革命党人如章太炎、宋教仁等亦曾抱有幻想。湘绮属旧派人物。然其在清，长期仅为一举人，宣统即位，笼络名士，始以湖南巡抚岑春蓂之荐，得挂翰林院检讨衔，后虽加检讨，亦非实职；其在甲寅（民国3年）赴京就任国史馆长，又系袁氏一再礼请，非由趋附。原情而言，盖勿烦多论。世之所以特别关注者，良由湘绮名高，动关视听；亦由其入民国后，常以遗老自居。辛亥、壬子之间，于故旧之改辙从新者颇多微辞，时见言议，此册所存与谭延闿诗，即有所讽，于自注中且目谭为乱贼，而前过一年，已亦北上，故人疑之。然此非知湘绮者也。

盖湘绮平生既以文章、学问高视一世，又自负其经世之才，纵横之计。然所交当世达官名人正多，如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张之洞等，大抵都称其前者，而不以后者为然。今考其文章言论，于国家根本大计，实鲜新见，惟于处变之方，颇怀奇想。如咸同之际，曾上书曾国藩，劝其径自入京，联合恭亲王共同辅政，以遏制那拉氏垂帘；光绪间拟代丁宝桢上疏建联印度、缅甸以抗英法之策；皆确切可考者。世传其早年曾建议曾国藩与太平天国连衡，自树一

帜，见其徒杨度《湖南少年歌》，谅亦非诬。然此等多为危道，或迂缓车难见功，故皆未见用。顾湘绮高自位置，自同治以后，虽未尝干人以求职任，然时遨游于名公贵人之间，陈其政见，冀得见采。其应袁氏之邀至京后有诗云："时难信逼促，政散乃骄盈。奇计实所好，横流殊未宁。聊从庶人谤，知余日暮情。"（见《日记》）则此行之招议，湘绮国自知之，特素志未伸，故一行耳。其此行所抱之计，今不可确知，且置不论，然袁氏札敬湘绮，乃但欲假其名，而非用其计，则于其在京时人景况可知。故湘绮始则一度不告而归，终则呈请辞职，毅然返湘，虽袁氏仍以之遥领，湘绮固已游于羿彀之外矣。故其后于袁氏之帝制自为，湘骑第以游戏处之。据《日记》：杨度曾驰函请其首倡劝进，湘绮回信不允，反劝杨"功成身退"；但又言，倘袁氏即位，以后各长官皆有贺表，国史馆由弟领衔可也；同时复有书与袁氏，亦作游移之辞，既云"古无民主之世"，不应惑于"四国"之言及"广询民意"，又云"但有其实，不必其名"，似劝似规，两边俱到，令人莫测所以。其时在报上刊载者，则为带书入湖南议员陈毓华（仲驭）径自改易者，湘绮所云："陈仲驭代我作符命，证成莽大夫也"，即指此。其始末与原书具载《日记》，可以覆按。顾湘绮于陈氏之为，亦未置辨，此盖当时形势，尚有难言之处，故且默以待变也。要之，湘绮暮年行事，可谓不合时宜，然与漫不识机者有别；与无所操持，苟求名利，随俗浮沉者，尤不可同日而语。杨度谓湘绮"能以逍遥通世法"（挽联语），盖隐指此而言。然处新旧交争之世，务新者固不逍遥，守旧而名高者亦不能逍遥事外，所谓逍遥，特见机远祸耳，其中心实未能逍遥。湘绮此册所录诗，苦闷忧虞之情即时溢于字句之间。其是非如不论，就诗言诗，可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蕴藉含蓄，不作剑目鉥心之语耳。近人评湘绮诗，多袭前人一偏之论，目为模拟一派。岂知湘绮诗者哉？

此卷原为湘绮手书付其孙齐陶者（已故湖南省政府参事），即卷末所云宜孙是也。宜孙之名，屡见《日记》，盖湘绵长嗣代功子。陈云章教授与王氏有世谊，其夫人又齐陶先生之姨也，两家情好甚密，故此卷归于陈家。吾师天倪先生，云章教授之尊翁也，两代收藏文物甚富，湘绮手迹尤多，惜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盗毁殆尽，惟此件岿然独存、云老以予雅好湘绮文辞，举以相示。因略书所感，并志其由来。

蔡锷故乡访逸录

马少侨

1996 年 11 月，纪念蔡锷将军诞生 10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邵阳市召开。会议期间，我深入访问、调查了邵阳市郊区和洞口县山门镇两处蔡锷故居，搜集到许多鲜为人知或与史籍记载颇有出入的口碑和文字资料。现整理成文，以供研究蔡锷和历史的学者们参考。

祖籍邵阳小东路蔡桥头

蔡锷（1882～1916 年），原名艮寅，字松坡，小字虎儿。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日（1882 年 12 月 18 日）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县小东路亲睦乡蒋家冲蔡桥头，今属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距故居约 2 华里的狮子山桃花冲，有其高祖父蔡开元的坟墓；故居下手山上，有其曾祖父蔡登禄和祖父蔡国珍的坟墓。如以 25 年绵延一代计算，至蔡锷出生年，蔡家定居在这里至少已有一百年的历史。民国《邵阳蔡氏三修族谱·开元公世系表》载：蔡登禄，"生卒不详，葬小东路蒋家冲蔡桥头老屋下手。"同上谱《开元公世系辨》亦说："其先世居城外小东路蒋家冲。"这里地名蔡桥头，这屋子又称老屋，可见蔡桥头之名，系蔡氏定居此地并且繁衍生息，而后由四周的居民习惯性地称呼的。从祖宗穴墓之地来看，蔡锷的祖籍在蒋家冲蔡桥头应当是十分可靠的。

蔡母王太夫人是邵阳人

蔡锷的母亲王太夫人是一位很富传奇色彩的人物。蔡锷之子蔡端在《蔡锷集·蔡锷的母亲》一文中说："她原来姓什么，自己也不知道，还只两三岁时家里大人带她逃荒，成了累赘，于是将她捆在树上就离开了；幸有王家老人路过那里，将她救下，抚养成人，也就姓王了。据民间口碑传说，这位王姓老人是洞口县水东乡柑子塘人，但无文字记载可证。"至于她原籍何处？在刘达武编《邵阳蔡母王太夫人荣哀录》中却可以找到线索。如山门张刘柱全体绅耆的挽联说："天下乔凫下降，生邵水，卒星沙，葬仍附山门先兆。缅母仪足式，

聿观人杰地钟灵。”山门粟玉冈等的挽联说：“生顺在昭陵，没宁归武邑，天上嫦娥不再逢。”山门杨济民等的祭文说：“双清六岭，郁郁葱葱，有母曰王，娴气所钟。”挽联、祭文，均出自山门人之手，当有所本，决非臆测。说她原籍邵阳，也并非孤证。

蔡父正陵生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殁于清光绪二十七年间（1901年），终年54岁。蔡母生于清咸丰八年三月十八日（1858年5月11日），殁于民国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1935年5月22日），享年77岁。临终前谢绝湖南省政府附葬岳麓山蔡锷墓侧的建议，遗嘱归葬山门祖坟，与母亲颜氏、丈夫蔡正陵、弟弟蔡正阶葬在一起。蔡端《蔡锷的母亲》一文说她终年75岁，误；谢本书《讨袁名将——蔡锷》据生坑碑文“庚申夏刊”认为“她可能是1920年逝世的”，更误。同书并将祖母颜氏误为蔡正陵妻颜氏，误母为妻，更是笑话！

蔡锷于一周岁时迁徙山门

蔡锷随家由祖籍迁徙山门的时间和年龄问题，诸家著述都以刘达武编《蔡松坡先生遗集·年谱》为据：“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六岁，随家迁居武冈州西三（山）门工（黄）家板桥。”后来蔡端编辑《蔡锷集·年谱》又采取了这一说法，于是蔡锷由出生的第六年即5实岁、6虚岁时由邵阳祖籍迁武冈山门的说法遂成定论。而这个定论很值得考虑！

在现有资料中，较为可靠而又有旁证可据的，是蔡锷于出生后的第二年即一周岁时由邵阳祖籍迁居山门。民间普遍传说，蔡父正陵率妻子，用箩筐挑着一子一女来山门，即挑着蔡锷的姐姐荣闺和蔡锷。证以文字资料，蔡正陵在山门的金兰兄弟、居停主人杨扶云之子杨济民等在祭蔡母文中说：“光绪九年癸未（1883年），湘泉公（正陵）与太夫人携长嫂荣闺、家嗣松坡迁武冈，旅居敝村青山铺，与先考扶云公结兰契。越岁甲申（1884年）迁大坝上。重以主宾，情同昆仲。”口碑传说与文字资料可以互证。又民国《前溪刘氏续修支谱·艺文志》载刘功烈撰《辉阁先生传》：“丙戌（1886年），蔡将军之封翁正陵先生由大坝上挈眷徙洪庙时，将军年甫四龄。”丙戌为光绪十二年，正蔡锷4实岁、5虚岁之年，与杨济民等祭文所说的事实吻合。故刘达武所说6岁迁山门黄家板桥的时间，所指的应当是由洪庙迁黄家板桥的时间，而不是由邵阳迁武冈的时间。故蔡锷由邵阳祖籍迁居山门的时间可以确认为光绪九年癸未（1883年）1周岁时。

蔡锷的家师张益斋和经师杨戊壬

蔡锷读书是在山门“路边刘家”刘辉阁兄弟的家塾里启蒙的，民国《前溪

刘氏续修支谱·事实志》有“即留于家塾”的记载和充分的口碑资料可证。这位启蒙师是谁？刘辉阁之孙、刘肇主之子刘再生在《蔡松坡的童年》（《忆蔡锷》，岳麓书社出版）一文中说叫张介寿；而刘一禾、陈新宪《访蔡锷故居》（同上书）一文则说叫刘绰哉。刘绰哉，今隆回县高平人，作者刘一禾的族叔，口碑外未发现文字资料。张介寿，名益斋，山门人，后来随蔡锷在外地工作。蔡锷由云南调北京，曾派他回山门接王太夫人、刘夫人去北京。决定反袁护国之后，又派他把王太夫人、刘夫人和长子端生、长女铸莲、次女福莲送回山门。此说见蔡端编《蔡锷集·蔡锷的母亲》。蔡锷对张介寿如此信任，说他是蔡锷的启蒙师，应当是比较可靠的。至于蔡端说他祖父在山门自办蒙馆，他父亲就是祖父自己启蒙的。按所发现的文字资料和所听到的口碑传说，蔡父在山门只有从事小本贸易的内容，并无办蒙馆的说法。同时他12岁丧父，即奔走糊口于四方，恐怕也没有自办蒙馆的能力吧！

蔡锷在刘辉阁家读了两年蒙馆，又由刘辉阁负担全部用费送他到角田杨戊壬秀才家读经馆。杨戊壬（1860～1929），州庠生。年25岁，即在家开设经馆。他祖父杨家善，太学生，父杨风薰，廪生，一家世代书香，故杨戊壬开设的经馆颇有名气。说他是蔡锷的经师，有许多文字资料可以印证：

第一，据民国《杨氏四修族谱》载张学乾给杨戊壬写的《赞》说：“振蜂五十年，舌耕砚田。教育英才数满千。唯有禁生先着鞭，中外名宣。好善本性真，诚正修身。宣讲劝戒觉斯民。次第门徒游泮水，道学传薪。门徒州庠生张学乾顿首拜题”。

《赞》中提到的“先着鞭”而“中外名宣”的“蔡生”就是蔡锷。

第二，同上谱还有蔡锷给他的师太公杨家善写的《赞》说：“公性本刚强，恭俭温良。公平正直寿而康。尊师重道轻财帛，品迈寻常。子孙次第列胶庠，也继书香。门晚府廪生蔡艮寅顿首拜题”。

蔡锷“十二岁进学。十三岁补廪贡生”（雷飚《蔡松坡先生事略》）。他自署“门晚”，因为《赞》主是他的师太公。

第三，据杨戊壬之孙山门镇中学杨鲜友老师回忆：蔡锷从日本回国，回山门探亲时，曾来角田拜望老师，赠送了匾、联酬谢师恩。匾长约6尺，宽约3尺，漆底贴金“家风书馨”4字，悬挂于堂屋神龛上方；对联长约8尺，半片瓦形，漆底贴金字：

“秉直育才，功德传万代；
循诱浴泽，师恩铭千秋。”

款书“门生蔡锷顿首拜题”。匾联均毁于大办公共食堂时期。

根据以上资料，杨戊壬是蔡锷入泮的经师无疑是可以肯定的。蔡从樊锥游，是在入泮以后。那时樊锥开馆邵阳，蔡锷僻处山门，如果不是童年入泮，樊锥是无由知道有这么一个神童，纳为免费弟子的。

妹替姐嫁的蔡锷夫人刘侠贞

蔡锷原配夫人刘侠贞，闺字森（新）英，是山门“路边刘家”刘藜阁的次女，刘辉阁的侄女。由于她自小死了母亲张氏，不得继母宁氏的欢心，遂由叔父刘辉阁夫妇抚养，爱如亲生。故有些文章误书为刘辉阁之女。据民国《前溪刘氏续修支谱·世铨公世系》记载：业洲，号藜阁，清太学生。咸丰二年（1852年）生，配张氏，生子四人，女二人，继配宁氏，生子六人。次女“新（森）英，学名侠贞，……幼字蔡松坡将军为嫡室。”同谱《事实志》：业洲，“慷慨好义，善甄藻。宝庆蔡正陵先生挈其子松坡经商沿赦江浒上溯来此，一见而器重之，即留于家塾，并以其子妻之。”刘府的许婚，刘辉阁是极力策划者，同谱《艺文志·辉阁先生传》：辉阁，“班名业沛，……蔡将军松坡之岳叔也。……岁丙戌，蔡将军之封翁正陵先生由大坝上挚眷徙洪庙，时将军年甫四龄。公见而奇之，归与兄业洲公议，谓南客之可妻。”同志载李宝圭撰刘辉阁先生六十双寿序：“时将军在垂鬓，先生见而异之曰：此英物也，天方多难，光我河山者宁异人任哉？乃以兄之子妻将军。”由此可见蔡锷原配刘夫人是对藜阁之女，刘辉阁之侄女，无容多说。但必须说明的，首先许婚的是刘藜阁的长女刘长姑，而不是次女刘新英；后来结婚的却是次女刘新英，而不是长女刘长姑。演出了一幕妹替姐嫁的喜剧，至今山门一带，里巷咸知。

据谱牒资料记载，刘黎阁长子生于光绪三年，次子生于光绪六年，三子生于光绪九年，新英生于光绪十一年，都是隔二年一胎。故长姐可能生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比蔡锷大八岁。故蔡锷四岁与刘长姑订婚时，刘长姑已经是一位十二三岁的姑娘了！由于年龄的悬殊，门户的差距，刘长姑对婚姻一直抱抗拒情绪。而蔡锷从启蒙读经到留学日本，其“学费川资”均由刘辉阁“一力承肩”，仍然信守婚约。光绪三十年（1904年）冬，22岁的蔡锷自日本学成归国，回山门探亲，履行婚约。这时刘长姑已是30岁的人了！一种自尊基础上的自卑感，使她在思想上怎么也转不过弯来，仍誓死抗嫁！这时刘新英已长成了一位20岁的姑娘，她一贯不满意姐姐的门户之见，在花轿临门的吉日良辰，就由她主演了这幕妹替姐嫁的喜剧。蔡锷认为她既侠且贞，给她改名侠贞。前引谱牒资料说刘新英“幼字蔡松坡将军为嫡室”的记载，那不过是既成事实后的曲笔罢了。

张一尊与马　邵一萍与竹

钟以勤

这篇文章不是为两位艺术家作传，只就他们某幅画或论画趣谈寻找他们的作品深邃寓意和不同的艺术观。

张一尊和邵一萍都是我省的著名现代国画家。他们逝去近二十年或更多一点，但他们的艺术及其人品仍然鲜明地留在人们心中。

张一尊是中国美协湖南分会第一任主席，20世纪50年代中我由浙江调来湖南，在一位同事家首次谈到他的水墨写意马。在我这隔山人眼中，马的体态、骨骼比例结构应是纯粹中国血统，画法精到。不久，一次美术界集会上，我认识并听了他的即席讲话，给我总的印象：身不高而挺拔坚实，目光闪灼生辉，谈吐爽朗起落有致，颇具风采。

在运动频繁的年代，频频接触中我对张先生更为了解了。人们告知我，他当过团长，六岁弄丹青（尤喜画马），壮年从军，退役时举行个人画展。我暗想，他从军是带着笔的吧？不然何能解甲未及“归田”就举办个画展？

五六十年代正值他盛年时期，精力旺盛，辅导后进不遗余力。每讲授辄精神饱满，谈笑风生。他曾说：“一次朋友请我作画，笔沾墨大多，呵，一大沱墨滴在纸上了！……略加思索便把一沱浓墨变为一匹黑骏马还看得！”“画画不可闭门造车，画马要以马为师。绘画艺术不是照像，在不悖物象形态结构原则下的‘艺术’，——可以。徐悲鸿先生是画马名家，他有些马吃不到草……脖子短了！”见仁见智可以评说。寥寥妙语却足以窥见艺术家何等爽朗，何等严肃认真。

与之成对比的邵一萍女士（原籍浙江东阳，国民党监委何汉文夫人），少从兄逸轩习画，后师岭南派大师赵少卿。她的画，娴雅秀逸，一如其人。她的一帧“竹梅图”20世纪60年代初省展会上曾引起一场激烈论战，缘于竹的枝不应偶生。一派归咎画家没深入生活，仔细观察；另一派则认为艺术真不等于生物真。为了艺术效果与需要，只要看起来舒服，群众喜爱，专家点头，就是好作品。

自然真与艺术真之辩似乎谁都有理，谁也不服谁。临了，会急着要散，邵女士画仍挂着，被评上一等奖，人民画报还以彩色版发表做封底。

这段论战使我回忆起早年读过的一篇毕加索对非洲土著艺术家的答问，毕氏指着架上几尊非洲木雕，手上拿着自己仿制的木雕向来访者说，有个傻瓜问他："你的大象的牙为什么向下弯？……大象的牙不是这么长的！……"

前两年人们也许见过我国有本刊物上有一帧臂和足趾同向、胸背难辨的（女）人体。不久前又有读者来函问马年邮票的马前腿膝关节，为何向下弯？感到不舒服也不可理解。凡此种种仍未越出"竹枝"的圈圈。

看来马颈脖、竹的枝、（女）人臂和趾（同向）、马的膝乃至毕氏的象牙都是不符生物常态的。然而，匠心各别，艺术效果和价值，当不可同日而语。人们要求艺术多样化，准确精到既忌近乎标本，变形、抽象也怕比天书还难懂。艺术不可过于远悖真实，恐怕仍是真理！作品需要共鸣者，即使一二个（包括作者）真懂！真爱！

白石老人画虾

罗芷生

齐白石，又名齐璜，湖南湘潭杏子坞人，以其金石、绘画、书法、诗词多方面的高超技艺，享誉中外，不愧为一代宗师。他笔下的虾堪称一绝，或两虾相斗，或群虾嬉戏，或清水缓游，或冲波疾进，无不神态活现，妙趣横生。他驾驭笔墨，经营画面的技巧，更是得心应手，炉火纯青，欣赏白石老人画的虾，真是一种难得的艺术享受。

白石老人到底是怎样画虾的呢？从艺友交谈中得知：齐先生画虾，首先用一支粗头羊毫提笔，笔尖部分蘸点淡墨，再用小勺在笔根部滴水少许，先从画头胸入手，以中锋横斜着一笔，上尖下粗顿笔，画出个上尖下圆、上黑下白的圆柱体，在圆柱体下面稍向外斜添中锋一笔，这两笔就构成虾的胸部；再在圆柱尖端的两旁以侧锋各补一笔，形似剪刀叉的薄硬片。头胸部完成后，接着又另蘸墨画腹部，造型应注意屈伸、弹性等特点，以显跳跃姿态；腹部共分五节，前粗后细，前大后小，用中锋每节连续运行不要离纸，至第三节向上弧起，增其动态，绝不平直，第五节连一尖笔尾巴。再以偏锋在尾部两边各画一片薄硬片。画躯干要一次性蘸墨，笔上含水量要适当，运笔要连续贯气。因为群虾之间有相互关系，故须将所要画的虾的躯干统一画完，让其随笔上含墨量的逐步减少，而产生自然的浓淡变化。虾的头部墨色比较重，然后利用笔墨含水量的渗化，表现出虾身每节不同墨色的透明和立体效果。他用笔还注意提、按、疾、涩，所以有笔情墨趣。

虾身画完后，用细长的硬毫，以浓墨在将干未干的胸部淡墨上加一笔，以浓破淡的手法，加重头部分量，增强其透明度，再用中锋横笔添上眼睛，然后，在虾身的每节前端画脚，总共后脚五只，前脚四只，部位在上躯的下半截。笔画灵活果断，墨色浓淡与躯干协调。

虾钳和虾臂是虾的动态和情趣的重要组成部分，下笔前他慎重考虑其开合、张闭、伸曲、动静，才能显示出各具姿态的情趣。以浓墨铁线画出挺拔有力的笔调，硬直，不弯曲，有坚韧的质感。从头胸部二分之一处向外下笔，第

一二节较细，有钳的一节较粗，剪刀状的钳稍向内弯，笔触有抑扬顿挫，显示关节。

最后，该画虾须，短须六七根，长须六根，白石老人画须的技法，也是非常高超的，线条流畅，富于弹性，不仅能表现出来回开合摆动的形式，根据老人对虾的精细观察，还能表现急游时，须向后的弯曲大些，缓游或静止时，须的弯度就小些，使水中的小生命跃然纸上，以其笔情墨趣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家国沅湘总泪流

——陈寅恪诗中的湖湘之情

方授楚

陈寅恪（1890～1969 年）先生是我国史学界的一代宗师。早年在清华国学院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任国学导师，先后又在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校任教授，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他通晓英、法、德、日等十几种文字，学识渊博，著作等身。近来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寅恪诗集》，收集了陈先生自清末至本世纪 20 世纪 60 年代五十多年时间的三百多首诗，皆为呕心沥血、掷地金声之作。由于他经历了巨大的沧桑世变，加上生活坎坷，中年目盲，晚年足膑。诗中情感，大都表现为沉郁苍凉。“家国旧情”“兴亡遗恨”，反复咏叹。而其“家国旧情”中常有对湖湘怀念之情。

陈先生是江西义宁州（今江西修水）人，为什么对湖湘有深厚的感情呢？这就需要了解一下陈先生的身世以及其祖父、父亲在湖南的政绩。

陈先生的祖父陈宝箴，字右铭，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调任湖南巡抚。他思想开明，又得到谭嗣同、唐才常、江标、黄遵宪等人的协助，在湖南积极推行新政，创办《湘学报》和《湘报》，以广见闻；创设时务学堂，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成立南学会，宣传新学，讨论湖南新政。因而使湖南得风气之先，民智大开。同时，着手改革官制，兴办工商事业，故维新运动，湖南居全国各省前列。他又积极推荐人才，辅佐新政、其向光绪推荐的十七人中，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等四人更受光绪重用，各赏四品卿衔，令在军机章京上行走。陈先生的父亲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早年即随侍其父在湖南推行新政。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八月戊戌政变，章京与康广仁、杨深秀等“六君子”被杀于京城菜市口，维新变法失败，陈宝箴父子都被革职，“永不叙用”。

陈先生于光绪十六年（1890 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对于其祖父、父亲在湖南推行新政，在其家庭与社会的环境中，耳濡目染，虽系童年，印象当极为深刻。所以在 1957 年《答王啸苏君》三绝句之一中写道：

望断衡云六十秋，潭州官舍记曾游。
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

“潭州官舍”是他的旧居，在那里他度过了不平凡的童年，亲眼看到了湖南新法的推行与失败，以致在六十年之后尚“望断衡云”，泪流“湘水”，一往情深。诗中“家国”并提，陈先生把个人的身世浮沉、先人事业的成败诸多感慨与对国家命运的关心联系在一起，表现了他拳拳爱国之心。

又如1951年《寄瞿兑之》一诗：

独乐园花入梦秋，诗筒惊喜见公休。
儿郎涑水空文藻，家国沅湘总泪流。
此日人天无上策，旧京宫苑有边愁。
论交三世今馀几，一别沧桑共白头。

此诗第一句下自注：“丁巳秋客长沙寓寿星街雅礼学会，即文慎公旧第也。”文慎公即其祖父陈宝箴。长沙旧宅，经常入梦；沅湘故地，家国萦怀。此两诗中“泪与湘江一样流”，“家国沅湘总泪流”句，极为真挚沉痛，非对湖湘有极深厚感情者莫能道出。

其父陈三立诗中亦常“家国”并提。如《晓抵九江作》：

藏身夜半负之去，摇兀江湖便可怜。
合眼风涛移枕上，抚膺家国逼灯前。
鼾声邻榻添雷吼，曙色孤篷漏日妍。
咫尺琵琶亭畔客，起看啼雁万峰颠。

在江行舟中，亦常为家国，抚膺长叹。再读陈先生在其晚年所作的《乙已冬日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为赋一律》：

昔日曾传班氏贤，如今沧海已桑田。
伤心太液波翻句，回首甘陵党锢年。
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
开元鹤发凋零尽，谁补西京外戚篇。

此诗之颈联与其父诗之颔联，思想感情是相通的，甚至句子的结构和语言也相近。可见陈先生父子都念念不忘家国。

当然陈先生的“家国旧情”“兴亡遗恨”，与其父的家国之思是不尽相同的。因为陈先生经历了戊戌政变以后比其父更多的沧桑世变，忧患坎坷。故其“家国旧情”“兴亡遗恨”的内涵是极其复杂而深广的。但是陈先生的“家国旧情’冲确包含了若祖乃父在湖南推行新政的政绩，他自己的亲身感受，因而产

生的对湖湘眷恋之情。心中郁结，一触即发，常在诗中流露出来。如《夜读简斋集潭州诸诗感赋》：

我行都在简斋诗，今古相望转自疑。
只谓潭州烧小劫，岂知扬獠舞多姿。
还家梦破恹恹病，去国魂销故故迟。
谁挽建炎新世局，昏灯掩卷不胜悲。

这首诗是1942年6月写的。抗战爆发，陈先生挈妻携女，由北京逃难至济南、青岛，以后又转郑州，经长沙至桂林。他的行程与宋代诗人陈与义（号简斋，有《简斋集》）逃难的路线相似，故有诗的第一、二句。靖康元年，金兵大举侵宋。陈与义由陈留南下避难，经襄汉，至湖湘，在岳州、潭州住了一段时期。当时杨幺起义军活跃在洞庭湖区。陈与义害怕起义军，又越岭南，至桂林。他在岳州很想到君山游览，“我爱君山好，万里来南州。青眉横玉镜，色照城中楼。胜日空凭眺，经年未成游。”当时君山是杨幺的据点之一，所以“今朝过山下，贼急不敢留”。（陈与义《过君山不获览》）在潭州有“杨獗舞吾侧”诗句。陈与义诗中的“贼”“杨獠”都是对杨幺起义军的蔑称。而陈先生此诗中的“杨獠”当指“日寇”。1938年11月长沙“文夕大火”，至陈先生写此诗时，日寇已三次进攻长沙，进行了三次湘北会战，故有诗的第三、四句。由于怀念长沙旧地，以致读《简斋集》潭州诸诗时，又勾起了他“还家梦破”、“去国魂销”的眷恋家国之情。

湖南汨罗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怀石自沉之地。屈原的眷顾楚国，怀念故都的爱国之情，亦常引起陈先生思想上的共鸣：

《辛卯广州端午》云：

菖蒲似剑还生绿，艾叶如旗不闪红。
唯有沅湘哀郢泪，弥天梅雨却相同。

《题王观堂人间词话及人间词话新刊》云：

世运如潮又一时，文章得失更能知。
沅湘哀郢都陈迹，剩话人间绝妙词。

陈先生诗集中怀念湖湘之什所表达的眷恋湖湘之情，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的。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爱国主义性质和进步意义”，“对后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发展，也尽了先驱作用。”（林增平．《中国近代史》．第479页）在全国各省中，湖南领导了这次维新变法的潮流，而主持湖南新政的又是陈先生的祖父和父亲。他出生在长沙，亲身在湖南

经历了这一次重大事件，这就很自然地在他的“家国旧情”中交织着对湖南的怀念。所以他在晚年读清史后妃传诗（见前引）中有“伤心太液波翻句，回首甘陵党锢年”句。前一句下作者自注：“玉溪生悼文宗杨贤妃诗：‘金舆不返倾城色，下苑犹翻太液波。’”按，李商隐在《曲江》一诗中此联下句为：“玉殿犹分下苑波。”《曲江》诗反映了一次“天荒地变”的重大政治事件，即发生在唐文宗大和九年的“甘露之变”。宦官仇士良杀了宰相李训、节度使郑注等人，“族诛十保家，死者千馀人。”文宗崩后，杨贵妃赐死。后一句写东汉恒帝时，甘陵人尚书周福与同郡的河南尹房值都“有名当朝”，“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后汉书·党锢列传·序》）陈先生此诗，盛赞珍妃帮助光绪维新变法之贤并哀悼其死，同时谴责以慈禧为首的后党镇压以光绪为首的维新变法的帝党，有似于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这些往事，使他不堪回首，时刻萦怀。

另一方面，湖湘文化对陈先生思想上的熏陶，也是他“家国旧情”中怀念湖湘的一个重要因素。湖湘文化是由清初移民到乾嘉年间逐渐形成的质朴进取的湖湘士气，嘉道年间由曾国藩等人的提倡使船山学说广泛传播，其哲理和反清思想、一定程度的反封建的学说和经世致用的主张，为湖南士人辗转传习，前后师承而形成的（见林增平《论近代湖湘文化》．湖南文史馆《文史拾遗》．1990年创刊号）陈先生在《余季豫先生挽词》中有“公起湖湘抒所见，识超纪阮得其真”句。湖湘人士，识见超群，想来不仅是对余季豫一个人的赞誉之辞，协助他祖父在湖南推行新政的谭嗣同、唐才常与其祖父、父亲在维新变法主张上相契合的郭嵩焘等人都是湖湘人杰。这些人都是陈先生所亲炙的父执和前辈，也正是湖湘文化的杰出代表。说陈先生自幼受到湖湘文化的熏陶，不为无据。陈先生曾自谓：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曾国藩）、张南皮（张之洞）之间”。这是“夫子自道”，不也透露了一点湖湘文化对陈先生思想熏陶的渊源吗？

短序三篇

王石波

向小韩散曲序

1941年，余始交向君小韩，时小韩即以诗词有声大学。越六年，小韩辞教职归里，中经世变，书问亦绝。又越四十年，小韩自芷江至，以所著《又生吟草》示余。缘情感迫，辞旨凄丽，虽更忧患，廉贞不移，伤逝怀生，一往三复。

近复奉书，令序所为散曲，自诗至词与曲，因世递嬗，体制各殊，实同源民间创作。文人袭制，好造瑰词，离源益远。曲以用于杂剧、传奇，雅俗正变，又异于诗词。抒情述事，兼有诗词之长，民间创作特征，犹未尽失。小韩于诗同外，复工为曲，意或在此。

当世为诗者多，为词者少，为曲者尤少。然得风人之绪者，百裁一二。余读小韩所为曲，意境深永，竞体馨逸。山川之改易，社会之昌明，所及时事，悉可征信，必能寿世，匪独以作者少而为世珍也。1990年同学弟王石波序。

刘宗向先生文集

先师骆鸿凯尝语余曰：“今世湘中为古文辞，得桐城义法者惟宁乡刘宗向先生。”又曰：“能制曲、度曲者，亦惟先生。”越数年，刘先生主讲民国大学，余从先生受词曲，亦尝问古文法。先生曰：“文无定法，欧宗韩，欧终为欧，非队也。桐城诸家，取法左、史、韩、欧，桐城终为桐城，非左、史、韩、欧也。执一以求，法亦死法，何足重。多读书，为之既久，神明变化，自合矩矩矱。”

先生之文，希踪经史，文质兼至，纪事之作，好章节义，简严高洁，几欲合左、史、韩、欧、桐城诸家而成一家之言。

然先生于古文辞，犹余事也。早岁事湘阴郭复初治经学，尤专意于史志。宁乡县志之修，先生实主其事。发凡创例，为近世志书体例之最善者。人物志

多先生所作，钩深发微，悉可传信。

然先生治学，尤重经世。中年以后，辞高校教职，创含光中学，以张女权。傅延年夫人终始襄其事。1944 年，日军寇湘，学校几数迁，教学未尝一日废，树人以千计，皆为世用。

先生节清德高，笃于故旧。杨昌济先生之从女开英，罗庶丹先生之女书慎，皆先生教之至于成也。

哲嗣元吉，将选刊先生诗古文辞，因述所知，使世之重先生文者，知先生治学之旨，百世之业，尤当重也。1991 年，弟子王石波拜序。

《恬静诗词》序

白居易《与元九书》谓："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余以为此诗之质，非诗之源。李易安之词，黄仲则之诗，皆感兼身世，其境郁，其辞苦，非善于造哀，实身世之感，形于言也。生易安、仲则之世，而又迎如易安、仲则者，岂可胜计。以言之不文，世无从知。此易安之词，仲则之诗，亦人之所欲言耳，故能令后之读者，哀乐不知所主。

余读《恬静诗词》，尝叹其才丰而遇蹇。集中所收，大都作于婚前。清空婉约，体洁旨永，独抒性灵，不假雕饰，自成馨逸。至伤时怀远，则又辞情凄异，不能终读。集中五言如"别后相思地，长亭更短亭　今宵同皖月，故旧等疏星。乱里书难寄，愁边酒易醒。天涯亲识在，知不叹伶俜。"(《送别静之昆明》)七言如："难将此地年年各，赢得江湖处处家。"(《桂林留别四姑父母》)"忧患不曾随日尽，情怀难得逐时摅。"(《除夕避地海会寺》)幽忧怨排，时溢于清思隽语中。视易安、仲则，虽风格各异，然感兼具世，因其诗而悲其通，则并同也。

君为同光十子之一、先师刘腴深先生之令女，知其诗固有所受也。1992 年王石波叙于湖南师范大学。

三湘院士启示录

杨敬东

作为主编之一，在策划和组织编辑出版《三湘院士风采录》之后，欲罢不能，利用点滴业余时间，广泛收集三湘院士的资料；三湘院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我。现将收集资料过程中的点滴感受记录下来，写下这篇启示录。

92 位三湘院士是我国科学技术界和工程技术界的杰出人才，他们的学术思想、科研成果为世界和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他们热爱祖国，献身科技，敢为人先，甘当人梯的精神，将会哺育一代又一代三湘儿女。

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三湘院士在年轻时大都是抱着"科学救国"的想法，走上科研之路的。不少人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幡然回国。中国西医先驱、医学泰斗张孝骞院士正是其中一例。

1927 年，他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医学院所进行的血容量研究工作告一段落，准备回国。哈罗普教授对他表示挽留，并希望他留在美国与他在肾上腺的研究中继续合作。可是，张孝骞没有忘记他那"医学救国"的初衷，婉言谢绝了老师的挽留。

刚度过十年内乱的中国还在喘息，他去美国考察。短暂逗留后又匆匆赶回属于他的天地——医院一间窄小陈旧的办公室里。

1989 年春天，为探亲和治病又作美国之行。89 岁的老人本可留在爱女身边。他却回来了，恰是离京前向党支部请假半年的期限。

他说过，生命的泉，即使拌和着血和泪，也要在自己的国土上流淌。早年为了贫病的中华和危患中的同胞，立志习医。倘若离开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包括医术、仁慈，又将有什么意义？

在太阳物理研究领域，艾国祥院士这位潇湘热土孕育出来的中国科学家创造了一项世界之最，他的成功在世界同行中引起了极大轰动。艾国祥到日本进行学术访问，日本国立天文台提出，愿以 9 万美元的年薪挽留他，艾国祥婉言

拒绝。他微笑着告诉日本同行："我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科学家，我的一切属于自己的祖国。"不管在哪里，艾国祥总是为自己是一个给祖国争得巨大荣誉的中国人而自豪。艾国祥常对他的学生和工作人员说："我最想看到的是，在科学现代化方面，中国人高高地站起来了；在天文学方面，中国人也能高高地站起来！"

电子计算机专家唐稚松院士在访问斯坦福大学将结束时，曾有位美国记者问他：以你的条件，为什么不争取留在美国？唐院士回答："我爱中国，她是我的祖国，我在美国没有根。"

在三湘院士心目中，祖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院士，为了祖国的"两弹"事业，隐姓埋名19年。材料科学与工程专家陈能宽院士，从1960年6月被中央紧急调动，进行"两弹"研究，默默无闻30年。廖山涛院士有句著名的话在师友中传诵："我们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写篇大论文！"

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激励着三湘院士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而进行科研，并成为他们的不竭动力。

在美国施行霸权主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袭击我驻南使馆的今天，学习三湘院士的精神，首先要学习他们对祖国挚爱的炽热的感情，为祖国舍得献出自己的一切。

二、高尚的追求和高尚的情操

三湘院士都有崇高的理想、高尚的追求和高尚的情操，都孜孜不倦追求崇高理想，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指导自己的学术工作和科研活动。地洼学说创始人陈国达院士体会尤深。

一天，他读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批评英国地质学家赖尔的"地层渐变论"有"静态的缺陷"时，深受启迪。顿时，思想的闪电在他脑海里掠过："地槽—地台"学说认为地壳由活动阶段进入稳定阶段就不再发展的观点，是不是唯心主义留在自然科学上的地盘呢？

回首这段往事，陈国达无限感慨地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作指导，地洼学说就不会如此幸运地降生，我还会像盲人一样地摸索"。

三湘院士都有一种为科学事业献身的精神。他们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不怕艰难困苦，不顾个人的生命安危。中国电离层声重波观测研究创始人之一、电离层物理与电波传播学家李钧院士，经人再三劝说住进医院施行肾囊肿手术。手术一醒来，李钧院士就问"试验怎么样了？"人在病床，满脑子实验数据。病情稍为好转，他就悄悄溜出医院来到实验室。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

士，经常到田间指导，有时胃病发了，满头大汗，不吱一声，继续在田间指导。他的手和农民的手一样厚的茧，一样晒的黑，一位农民问他："袁院士，你咋晒得比我们还黑呢？"

三湘院士正是有这样一种献身精神，才成为世界上某个领域的开拓者和国际领先水平的创造者，才成为国内创第一的开拓者、创始人，才为世界和中国科学技术、工程技术作出重大贡献，才在世界科学史上和中国科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湘院士淡漠名利，视名利如浮云，他们心中只有祖国的科学事业。张孝骞院士，人称他专家、权威、中国西医学的一代宗师。他生前只喜欢用一个普通而又神圣的称呼：医生。他行医65年，直到90岁高龄逝世前还在看门诊、查病房。人说他的人道精神和超凡的医术值得大书特书，他却说：这最不足道。张孝骞院士把学部委员每月100元的车马费攒至万元上交国库。陈国达院士把稿费、奖金攒起来，在中科院武汉分院、长沙大地研究所的支持下，设立"地洼学说奖励基金"，至今已颁奖10多届。1978年，陈国达院士的一本专著出版，他用全部稿费买下300本书，赠送渴求知识的学生们。袁隆平院士也用自己的奖金设立奖励基金。

三湘院士对工作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张孝骞院士80多岁高龄时，一次为取消坚持几十年的大查房制度而失声痛哭。他为一张病历上漏填患者姓名而大怒："病人把身家性命都交了我们，懂吗？"袁隆平连续16天在稻田中寻找雄性不育株，累瘫了，摔倒了，再挣扎起来，终于找到一株雄性不育株。1964年至1965年，连续两年与妻子共检查14 000多个稻穗，才找到6株雄性不育株。

三、要勤奋，还要持之以恒

三湘院士，不管其是否聪明，都很勤奋，而且，能持之以恒，从不间断。他们取得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刻苦勤奋，锲而不舍。三湘院士的学术成就、科研成果，都是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地不断努力的结果。

地层学与古生物学家李星学院士，小学、中学成绩平平，1938年大学联合招考，没考上。他继续发愤图强，1942年考取重庆大学。三湘院士魏荣爵，中学一年级，除国文以外，多科都不及格。由于勤奋，并且持之以恒，后来考取国外博士。正如李星学院士所说："我这个人其实并不聪明，学识也不在一般人之上。之所以大半生还能做些工作，是由于始终铭记着前辈教诲的这样一句话：勤奋的人虽然不一定都会成功，但成功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勤奋的。我深深感到：勤奋是做学问和立身之本。60年代初，所里为研究生开办了一个法

语学习班，我又挤时间参加学习。同班 30 多人中，算我这个老秀才年龄最大，已 40 多岁了，他们都认为我学不长久。可是我除了坚持每周三听课外，还充分利用早晚空闲时间背单词，做练习，从不间断。四个月后，能一直坚持下来的只有七八人，结业时我取得好成绩。后来能看法文专业资料。”廖山涛院士说：“我不聪明，但我很努力。”应用地球物理学家何继善院士，在“文革”中为了研究理论新技术，不惜卖掉自己的衣服去买电子元件。为了实地检测，他带着自制的仪器和学生们一起，跑遍中国各种类型的山区和不同矿种的矿山，有时一出去就是几个月。

陈国达院士为了弄清世界著名风景区武陵源砂岩峰林形成的原因，不顾古稀高龄，三次到张家界，在一些游人望而却步的陡崖险处考察。近年来，还用惊人的毅力学习电脑写作。1999 年春节，他还阅读知识经济的有关书籍。

四、既要善于向权威学习，又要敢于向权威挑战

“名师出高徒”，这是一条至理名言。美国有项统计，一半以上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曾经跟随高明的老师学习过，而且，跟随高明的老师学习比跟一般老师学习的获奖时间平均提前 7 年。

三湘院士大多从名师，读名校，善于向权威学习，为他们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和根底。发现了权威在学术上的缺陷和不足时，又敢于向权威挑战，便成了他们成功的突破口。

陈国达院士敢于向国外 100 多年来的权威理论“地槽—地台”学说挑战，创造了“地洼学说”。

袁隆平院士向传统的水稻自身没有杂交优势的权威理论挑战，成为“杂交水稻之父”。

艾国祥院士引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先生的一句名言：“在科学中没有禁区，没有绝对权威，也没有千古不变的定论和所谓的终极真理。”艾国祥说：“作为一个有志献身科学的人，应该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不畏惧权威，向现有的成就挑战，创造新的成就。”

艾国祥大学学习阶段在撰写毕业论文时，他的观点和当时的一位很有影响的教师专家相左。老师要求艾国祥按照他的意见修改论文，否则不予毕业。面对老师这种压力，他毫不胆怯，明确表示不放弃自己的观点。后来实际证明艾国祥的见解没有错，那位老师在 1964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向他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周光召院士 60 年代初，曾因挑战权威而“威震杜布纳”。有一天，各国物理学家们聚集在一起开学术讨论会。会上，有一位苏联教授报告了他对相对粒

子自旋问题的研究成果。静静的会场上，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周光召站起来，用俄语谈了相反的意见。那位苏联教授用不以为然的目光瞥了他一眼，随即恼怒地说道：“你的意见没有道理！”年轻的周光召面对这无理的训斥。没有辩驳，他心想：要使别人瞧得起自己，必须拿出更进一步的根据来。他脚踏实地工作了整整三个月时间，一步步地严格证明了自己的意见。然后，把研究结果写成了题目为《相对性粒子在反应过程中应旋的表示》的论文，在《理论和实验物理》杂志上发表了。过了些日子，美国科学家在研究中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这就是著名的“相对性粒子螺旋态”理论问世的过程。

五、攀登科学高峰，需要团队精神

攀登科学高峰，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完成，而是要一个学术团体来完成的。有的甚至是花费几代人的心血，靠学术梯队的人来完成的。

作为一个学术团队或科研、生产机构，要有一个团结和谐的环境，有平等的气氛，能够展开学术争论的学术氛围。

作为学术团队或科研、生产机构的负责人，要有广阔的胸怀，要能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正如既是院士，又是总裁的三湘院士李国杰说的：“人的心胸有多宽广，就能办多大的事情。”他还说：“写一篇文章或者开发一个小软件，个人的才干和知识很重要，但要真正做成大事，则不取决于个人有多少才干，多少知识，而在于他的德行，在于他是否有能力聚集更多的人在一起干事情，包括聚集比自己本事更大的人，谁有这个本事，谁就能把事情搞大。”

原子弹爆炸后，周光召讲过一段著名的话：“制造原子弹，好比写一篇惊心动魄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工人、解放军战士、工程师和科学技术人员不下十万人谱写的！我不过是十万分之一。”

作为科技人员，也要有团队精神，善于团结人，能够融入这个集体，能与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友好相处。

六、既实事求是，又善于幻想

中国科学院前任院长郭沫若临终前，在 1978 年科学大会上所作《科学的春天》的报告中，留下了珍贵遗言：“科学是讲求实际的，……同时，科学也需要创造，需要幻想。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

唐稚松院士说：“我一直要求学生做聪明的老实人。我更经常强调，作为科学家，首先应具备科学家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其最基本的一条即应做到实事

求是。科学研究是探索真知，来不得半点虚假与投机取巧。科学是尊严的，在这崇高的事业面前，把心力花在卑微的事上是可耻的。我从来不装腔作势，强不知以为知，能勇于在学生面前承认自己的无知或错误，并以此教育学生。"

幻想，才能激发创造灵感！幻想，是成功前的"心想图像"！袁隆平院士说："我做过一个梦，梦见杂交水稻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样大，稻谷像葡萄一样结得一串串，我和我的助手们一起在稻田里散步，在水稻下面乘凉……"没有幻想，没有这奇迹发生，杂交水稻从何而来？

湖南之谚语与歌谣

王啸苏

一、谚 语

湘省谚语歌谣，素为流行。兹举其关于气候与农事者：如"但得立春晴一日，农夫不用力耕田。""三月清明齐下种，二月清明早种秧。""清明要明，谷雨要雨。""立夏不下雨，高田不下耙。""四月八，滴一滴，洞庭湖里开大坼"。"滴"读如"爹"之入声，"坼"读如监察之"察"。"三月三，九月九，无事莫到江边走。""秋前北风秋后雨。""秋发北，田开坼。""坼"读如家宅之"宅"。"天上起了鲤鱼鳞，河里有鱼回人寻。"此说是要起大风。"霜降不扮禾，一日去一箩。""秋前三天扮不跌，秋后三天扮不彻。"此说是秋天到了，就要扮禾，扮不彻就是扮不赢的意思。"冬水淹滩，春水淹山。"此说是冬天涨水，来年春天有大水。"腊前三白是丰年"，腊月是农历十二月，如在十二月内落雪三次，来年是好年成。"十月初一晴，皮匠生意冷冰冰"。此说是初一放晴，冬天就不要雨具。"重阳无雨看十三，十三无雨一冬干。""冬至洋洋无日色，来年齐唱太平歌。"等。

其关于人事者：如"早起三朝当一工。""八十岁公公砍藜蒿，一日不死要柴烧。""惜衣得衣穿，惜饭得饭吃。""积家犹如针挑土，败家犹如水推沙。""贼偷懒散，火烧邋遢。"俗谓不洁曰"邋遢"。"三勤夹一懒，懒人也会勤。""男帮女衬，一家兴盛。""山高遮不得太阳，势大压不得乡党。""三代做官，不要轻师谩匠。""三个蛮人，抬不过一个理字。""人要忠心，火要空心。"

其语句中带有抵抗性者：如"舍得一身剐，皇帝老子拉下马。"此人民对统治者之言。"三场人命两场火，看你像我不像我"。此穷人对富人之言。"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抄家典史，灭门知县。""饿死莫做贼，气死莫告状。""一代做官，三代叫化。"此人民愤恨官吏之言。

以上所录诸条，虽其中语句，不能悉合于今日之观点，而在当日，实具有人民性者。

二、歌　谣

吃完饭，下田来，脚踏田边把歌开。不怕天干不怕雨，不怕洪水淹天虫又来，只怕日上三竿不起来。（长沙）

丝瓜藤上开黄花，最苦不过作田家，作田人家辛又苦，扁担挑饭手提茶，六月炎天夜里还要踩水车。（湘潭）

一夜打霜屋顶上白，兄弟姐妹都在田里收荞麦，腰又浸得痛，嘴又总不说，只有那样收得快，早些回去歇。（湘阴）

走出门来三声歌，有人骂我穷快活，穷人穷了晓得做，地方穷了晓得饿。（溆浦）

四月天气暖洋洋，割了麦子好插秧，有水陇田栽糯米，高冈干地种豆粮。（宁乡）

高山高，砍柴烧，一天砍得三五把，三天砍得八九挑，落得三天毛毛雨，弄得家里没柴烧。（安仁）

赤脚双双来插田，低头看见水中天，行行插得齐齐整，退步原来是向前。（古丈）

八月日头如火红，交完租谷双手空，辛苦一年冒得剩，九个耕田十个穷。（江永）

太阳快落斜在西，蛮多事情提起心酸的，断砖破锅没米煮。稿铺烂蓆盖蓑衣。（资兴）

单身苦来单身苦，衣服破了无人补，青线补来红线补，补成山中花老虎。（常德）

杉木搭桥搭过溪，冒喂花蚕穿绸衣，冒种良田吃白米，穿衣吃饭哪里的。（黔阳）

烘糕荞麦粑，一树两个杈，富人家的孩子哈哈笑，冒钱的孩子莫想它，若要烘糕不要荞麦粑，千年古树再开花。（安化）

养了儿子是老蒋的，喂了猪牛是队长的，有乖婆娘是乡长的，积了钱是保长的。（辰溪）

乡干事，保干事，干事干的什么事，要谷子，要票子，还要红粉小妹子。（衡阳）

爹娘做事大不该，不要女儿要钱财，把妹“八字”交出了，好比抬妹去活埋。（道县）

从前社会迷信，以年月日时推算吉凶，叫做算“八字”，女子与人订婚，应将“八字”交出。

可怜可怜真可怜，童养媳妇不值钱，脑壳当作木鱼打，庵堂起在背心边。（木鱼系僧人念经时所敲之物，庵堂即寺庙一类。）

各县谚语、歌谣民间流行极为丰富，兹仅略录一二，然于旧社会农家疾苦，亦可窥见一斑矣。

汨罗的一首民歌

周秉钧

汨罗县流传着一首民歌，叫做《月亮光光》。歌词是这样的：

月亮光光，照到平江。
平江大水，一片茫茫。

茫茫大水，淹死怀王。
猫狸戴孝，老鼠擎香。

茫茫大水，来自平江。
淹死昏王，莫淹忠良。

月亮光光，照我过江。
救出忠良，地久天长。

汨罗江发源于平江，平江涨水，汨罗江就一片汪洋。这首民歌抒写茫茫大水时汨罗人民怀念屈原的深情厚爱。第一章写月下见到的大水茫茫的情况。第二章写大水淹死了楚怀王；这位怀王遭到人民的唾弃，死了之后，只有猫儿和老鼠替他办理丧事。第三章写汨罗人民的爱憎分明，希望大水淹死危害忠良的怀王，莫淹死屈原这样的忠良之人。爱憎何等鲜明！第四章写汨罗人民盼望救出屈原，屈原得救，国家的命运就地久天长了。

这首民歌，抒写了汨罗人民对屈原的热爱，也抒写了汨罗人民对危害忠良的人的痛恨，正义感十分鲜明。它是湖南民歌的一颗明珠！

湘山草堂读史随笔

韩长耕

《湖南文史》1992年第一期（总第45辑）载有旷光辉《“文革”浩劫中的南岳文物》一文。旷君以文管所当事人目见耳闻的事件和经过，对南岳被毁文物作出介绍，这是值得欢迎的，而且是会受到今人或后人深信其说不疑并据以引用立论的。但由于作者对若干史事不甚了了，特别是对佛教文化、文献和佛典、佛学比较生疏，乃至举述混乱、疏舛严重。以南岳祝圣寺、南台寺两处最重要的和藏经最富的释藏概付一炬为例，所述被烧藏经及其来源和版本与数量都有问题。兹不揣固陋，略加控说，以证其误。

一、祝圣寺烧经证误

旷文述说此寺藏经被烧情状说：“一伙人冲上藏经楼，将门锁撬开，又把藏经柜子一一打开，将一卷卷布壳包装的经书一束束从窗口门口丢出，有的将布壳解开，把经书拆烂，放在藏经楼东边天井投火焚烧，一时烟火冲天。”“经书不断往下丢，火势越烧越旺，可惜清高宗乾隆颁发的频伽藏和明版藏经被烧毁，原放在楼门口的一套梨木雕刻的李元度光绪十二年《南岳志》印版，足有三千块，全部化为乌有。”

耕按：第一，经查《清实录》《东华录》《清史稿》及有关文献，从未见清高宗向全国各寺院或某一寺院颁发过什么明版藏经。按明修大藏经总共是五种，即《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武林藏》和始刊于明（万历十七年）续成于清（康熙十七年）的《径山正藏》。其后又有《径山藏》的续藏、又续藏，后者补刻在清初，已非明版。前三种明刻中，《南藏》二种，刻于南京蒋山（今紫金山）者，已世所罕见，据民国二十五年（ 936）叶恭绰调查，除济南图书馆一家独有四部外，全国各寺院多只存零种。“济图”的四部，估计其中即有《永乐南藏》。《北藏》存世多些，除南通狼山广教寺、镇江超岸寺、定慧寺都有全藏外，他寺亦间有藏者，唯祝圣寺无与其列。《武林藏》约始刊于明嘉靖间，未久遂废，未成全藏，流通至少，世人从未见过此藏所收

书，徒知文献上有此记述而已。明《径山藏》在北京嘉兴寺、洞庭西山显庆寺、山西宁武城内明寺有正续全藏，南北各寺院虽存者尚多，惟据解放前夕调查，祝圣寺亦复闭如。故可断言，祝圣寺除零种明刻经书之外，乾隆并未给该寺颁发明版《大藏经》。

第二，旷说有“清高宗乾隆颁发的《频伽藏》”云云，这更是北辙南辕，风马牛不相关，扯不拢来的几码事。按：“频伽藏经”本名《频伽精舍校勘大藏经》，也简称频伽藏，系民国二年（1913）由上海“频伽精舍”（据说曾得住在上海的犹太豪富哈同资助）采用日本弘教书院编印的《缩刷藏经》为底本，改以四号铅活字印刷。它是民国以来印刷的第一部大藏经，也是我国自有佛教大藏经印刷以来头一部铅印的小本《大藏经》。前此十六种（北宋到清代）概以木板刻印，清乾隆虽已有武英殿用木活字（所谓聚珍版）刊书，却从未用以印刷佛经，佛经仍依传统习惯用版片雕印。

“频伽”是个带西天“洋味”十足的词，它本是印度梵文 KalaVinka 汉字省译，字音全译可作“迦陵频伽”或“迦罗频伽”，据说是一种声音妙好的五色鸟，相传此鸟常住“极乐净土”，佛经上常见此名（如《楞严经》等人）。中国古今汇印的二十一种佛教丛书（大藏经）中，《频伽藏》是唯一的在大藏经上冠上“频伽”这个梵名的，余皆不冠梵名。

由于《频伽藏》改用铅字排印，又印在民国，其部帙份量较前大减，全藏仅四十函，分装四百一十四册，外有总目一册。在总目每个题目之上，编有清、明、元、宋和高丽五版藏经的帙函编号，殊为可贵。近八十年来，《频伽藏》是我国常用常见的一种《大藏经》版本。

由上得见，说祝圣寺僧曾在民国年间购进过一部《频伽藏》，或有哪个社团、施主捐赠过一部《频伽藏》入藏于祝圣寺藏经楼，容或有之。若谓“高宗乾隆颁发的《频伽藏》”，则是毫无根据的，并会造成今人后人思想上的混乱。民国二年（1912 年）才出版问世的《频伽藏》，岂能早此一百数十年前就由清乾隆皇帝（1736～1795 年在位）颁送于南岳祝圣寺？

第三，旷文描述两寺焚经经过时，每有“一卷卷布壳包装的经书”“一束束投出窗口”之类的话，这些形容，多有疵病，易滋误解。因为在历代佛教大藏经的装帧上，只有卷轴装（也称卷子装）才被称为“一卷卷”“一束束”。而卷子（或卷轴）装的藏经，只有北宋开宝年间刻于益州（成都）的《开宝藏》（中国的第一部木板雕印藏经）和金代刻于解州（今山西解县）的《赵城藏》两种。这两种卷轴装的藏经，前者全藏久佚，仅有残叶残卷收藏于中国的叶恭绰及日本中村不折诸家手中，南岳未曾有过。除明末“武林”“径山”二藏是方册装（如今见之古籍线装书）之外，其余各代各种藏经概是梵夹装（也称经

折装，即长幅经文折叠成册）。方册和梵夹都是若干册一函（或一帙），外加布壳（布面纸里）函套保护，祝圣寺所焚者，应属此类。

然则，南岳祝圣寺被烧者究为何种藏经呢？1982 年因《参考消息》转载日本报刊文章，调在抗日战争南岳沦于寇手期间，南岳石头和尚希迁的肉身，已在日本军方的保护和掩护下，由一日本牙医负责从南岳偷运到日本横滨，现由日本禅宗（曹洞宗）僧众弟子供养于横滨总持寺。我闻讯为之大惊，数十年来中国人何故一无所知？适《年轻人》杂志筹备人之一、电视剧本作家谭冬梅君来访，亟力邀我同往考察。1982 年秋我到南岳，顺道看望当时南岳佛教协会会长、祝圣寺主持、现已谢世的我的方外朋友曼慈和尚（俗姓周，湘潭人氏），促膝谈经论史二日夜，当我问及此寺藏经楼在文革中被毁情状，曼慈说：“经书焚烧一空。”我问是何种经书？曼慈明确答我：“整部《清藏》，还有少数零种经书。”临别告辞之日，和尚情深，坚持送我到庙外桥头，先此经过寺内藏经楼下，谭君命我与曼慈和尚仁立天井北头烧经处拍下合照。二人痛感“罗刹一帮无恶不作”，这是历史的耻辱与悲剧。

结合史实，曼慈和尚所述是可信的，被烧毁的不是《频伽藏》，不是“明版藏经”，而是清初纂修和雕版刻印的《清藏》。

按：《清藏》刊于北京，始刻于雍正十三年（1735 年），至乾隆三年（1738 年）全部蒇工，全用梵夹装（经折装），世称《大清乾隆版大藏经》。因系先后奉雍正、乾隆二帝之敕刊行，故又称《龙藏》。这部《清藏》，就卷数部帙而言，是中国封建社会历代十六种木板大藏中仅次于元代《弘法藏》的一部巨制，全藏 718 函，7 168 卷，1 662 部，每半页 5 行，每版五个半页共 25 行，行 17 字，仍依传统习惯以南梁周兴嗣《千字文》天、地、玄、黄……顺序编次函轶号，始天字函，终机字函。总计雕版片七万八千二百三十块。因为《清藏》是以明《北藏》（明永乐初奉敕修）为底本酌有增减而成，故费时最少，成书最速，仅费四年。书成后，乾隆尝向全国各省名山古刹颁赐《清藏》全藏。

“文革”中祝圣寺烧去此《藏》佛教经费七千余卷，对中国文化是一种破坏，无疑是至可痛惜的。不幸中的万幸是：全国各寺院尚分别存有《清藏》数十部，特别是《清藏》原版片经历 258 年多次磨难而至今犹完整无损。七万多块印版，先是保存在北京东城区东北角著名古刹柏林寺（庙建于元至正七年，前北京图书馆尝利用该寺为善本古籍部），不久前北京师友来信，又得知此《清藏》经板已概移去北京市东城区禄米仓智化寺（明建）原度“藏经”的如来殿。真个“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第四，旷君又说光绪十二年李元度修的《南岳志》书板与祝圣寺佛经同被

焚烧，这是确切事实。但旷君谓此《志》书版“足有三千块一同化为乌有”，这却是过分夸大之词。夫平江李元度（次青）《南岳志》原书具在，流布甚广，全《志》总不过千页左右，何来书版“足有三千块”？任此不加订正而贻之方来，自必引起后人对此《志》之无端争议，以为李元度之《南岳志》竟有两个不同板本，盖一种千页左右，一种达三千页以上，实则出自旷君夸饰数据之误。前修告诫吾人治学亟应严谨者在此。

二、南台寺烧经甄误

南台、福严二寺，皆南岳著名的六朝古刹。南台寺本名南寺，在南岳大庙东侧登山约十华里处，始建于南朝梁武帝（萧衍）天监元年至三年（502～504年）。至唐天宝年间，乃有禅宗南宗六祖慧能再传弟子希迁禅师（700～790年），至止其处，寺东有石，其状如台，结庵其上，时称石头和尚。希迁属禅宗青原行思一系，门庭广大，徒众甚多，下至唐末宋初，已渐衍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其后曹洞又踵临济宗之后从中国传入日本。曹洞宗尊石头希迁为开山祖，南台寺为此家之祖庭。然南台寺久历年所，迭经废兴，下至清初，古刹已多用败，求有一部《清藏》（龙藏）而不可得。迨清末光绪癸卯（光绪二十九年至1903年）重修此寺，适有石头四十二代孙日僧梅晓六休西来虔礼祖塔，闻讯乃发宏愿、许东归后募化檀施，共致《大藏》送寺。丁未（光绪三十三年至1907年）寺成，六休上人一行果践前言，送来南台寺法藏一部计五千七百余卷。有关赠藏缘由，湘潭王闿运（湘绮）为此撰有《南台寺日本僧赠藏经记》一文，叙此事甚为详确，后又经《湖南历史资料》1979年第一期据民国三年八月出刊的《佛学丛报》第十期全文转载。

1966年“文革”一起，南台寺文物亦“在劫难逃”，继山麓祝圣寺、大庙及其他寺观之后，于是年8月29日大遭抢砸，且并日僧所赠释藏化为灰烬。可旷文所述南台寺所烧日僧佛教大藏，却因错误理解文意，乃至转述出来竟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旷君云：

“南台寺一帮群氓打砸佛像、法器之后再冲上经楼，将石碑砸碎，再将经书丢出焚烧。经书数量多，火势大，一连烧了三天三夜。南台寺于光绪二十九年（190年）重建，日本高僧六休梅晓（耕案：应作梅晓六休）于这年来寺，许寺建成后送藏经来，光绪丁未南台寺建成，日本六休和（大坂）一些知名人士遂送来藏经六藏，计5 700卷，其中尤以铁眼板本最为珍贵，可惜均毁于一旦。”

而王闿运《南台寺日本僧赠藏经记》原文却是：

“然本寺甫议修葺，物力尤艰，大藏繁多，理无易致。因缘所会，法宝自

来。则有六休上人，石头四十二代孙也，生在东瀛，幼归净域。以光绪癸卯来游湘土，虔礼祖塔（耕案：指希迁墓），如久客得归，见兹胜因，遂发助力。许于寺成日，赠藏全部。

日本旧有宋版本、高丽本、明北藏本；其国自刻则有铁眼和尚仿明本、岛田本根缩高丽本，又新刻合校三本，更辑续后贤语录为续藏本。合此六藏，以铁眼本为日本最。初，水陆阻深，信为艰贵，五年之后，祖迹重新，竟践前言，躬奉法藏凡全部五千七百余卷施于本寺（南台）。盛矣哉，不胜自致，有愿必酬，非夫大雄之力，易由臻此。”

细读上述文字，已见：王文所说：“合此六藏”，是略举日本社会及寺庙当时拥有的有两种汉刻汉文大藏经，一种高丽刻汉文大藏经和三种“和刻”汉文大藏经的版本。在此六种藏经版本中，以仿明本的铁眼本为日本“和刻汉文本”中最好的一种。施赠南台寺者即是这种铁眼仿明本的和刻本，所举卷数亦正相合。所赠的只此一部全藏，而非日本旧有的汉刻藏经、高丽本藏经和自刻的汉文藏经全部送来，盖既无此理，更无此可能。

第一，如果所赠南台寺者为六部藏经，其部帙就应有三、四万卷之多而非5 700余卷。因为古代（清季以前）中国、高丽、日本所刻、所印的任何一部大藏经，每一部都在5 000多卷—7 000多卷左右，例如所述六藏中的《高丽藏》，仅此一种就达六千五百八十九卷，而另一种《明北藏》也是六千七百余卷。总之没有仅止数百卷一部的《大藏经》。

第二，日本视其旧有的宋本藏经、高丽本藏经为国家瑰宝，为稀世之珍，遑论赠与，连外人手检目验都不易得。据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严绍汤说，他通过日本学术界朋友们的大力帮助与推介，始于1985年8月在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过去叫做“图书寮”）的汉籍特藏中见到一部宋版《一切经》凡六千二百六十三帖。书陵部的汉文汉籍特藏，都是难于为外人所见所用的皇家御用藏书，严氏应是见到宫内厅此一宋版藏经的第一位中国学者。皇室以外的宋版藏经亦复如此，也是难于轻易接触查阅的。

《高丽藏》学术价值很高，说来话长，此处不赘。它在清末至民国初期，简直是举世孤珍。《遐庵先生年谱》“民国十五年（1926）条”记云：“五月，调查《高丽藏经》版片。（得知）其原版藏于（朝鲜）海印寺。该寺只印存一部，他无流传。后（日人统治的）朝鲜总督府曾印刷三部，一部献于日本皇室，一部存于（朝鲜）总督府内书库，一部则分赠日本名刹。（遗庵）先生以中士并无一部，拟发起流通，经托人向朝鲜总督府接洽。结果须印五部以上，方可启行，计工料每部日币十万（银）元以上，遂未果印。”（见原书第297页）遐庵即叶恭绰先生，字玉虎，又作王甫，广东番禺人。由此可见，清末日

本只有两部《高丽藏》刻本，都由朝鲜总督府献来，一部是明治天皇的御藏。一部存放日本增上寺由几处名刹共同典守（1880～1885，日本所出的《弘教藏》即以此寺此藏为底本）。梅晓六休、大谷光瑞诸家（十二人领衔赠书），岂能有《高丽藏》可供赠送南岳南台寺？何况下至1926年中国仍然连一部《高丽藏》都没有，中国人还在托人联系朝鲜总督府想印得一部而不可得。

《明北藏》在中国尚有多部全藏，也属善本，日本更视为国家的“重要文化财产”，如此善本也不会赠予中国。

综合以上考察结果表明，祝圣寺所焚者为《清藏》一部。如果民国以后还入藏过《频伽藏》一部（此点无可信证据），那就是被烧毁大藏经二部。南台寺由日僧所赠者，是仿明本藏经一部（也可称一藏），而非六部（或六藏），被烧毁者应即此一藏。两寺总起来确已被烧毁的佛经除若干零种（无从查证和统计）外，被烧的《大藏经》是两部，存疑的一部（《频伽》）。而旷君在《浩劫》一文之末总结两寺共烧《藏经》八部（祝圣寺二部、南台寺六部）是没有根据的。

长沙土夫子

吴铭生

“土夫子”，本来是长沙对卖黄泥为生者的俗称，后来以此戏称盗墓者。

盗掘古墓的历史，始于何时，文献似难查考，以长沙而言，汉代就有之。笔者从事考古工作几十年，所发掘的战国墓葬多有盗坑，在盗坑内往往发现汉代的陶质生活用器残片，显然是盗墓者当时所遗弃下来的。民国时期长沙盗墓之风尤盛，并形成了一批以盗墓为职业的“土夫子”，这些人在建国后被省文物工作队采聘为发掘工人，我与他们同事多年，对他们过去的盗墓生涯了解甚多，兹略述之。

一、“土夫子”的由来

长沙的“土夫子”人数不多，50年代初集中在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做临时工的约20余人，他们出身贫贱，没有文化，平日靠卖黄泥为生，每天拖着一部破旧铁轮板车，带着一把短锄头和一只篾畚箕，到附近的山上去挖黄泥，卖给居民或酒楼作为煤块、煤球的粘合剂。和煤用的黄泥要求粘性强、泥质纯净（此种黄泥俗称糯米泥），一般的红土（俗称老土、朱甲土）不适用。这种糯米泥往往是长沙唐宋土坑墓葬里的回填土，而唐宋墓葬大都葬在山的下坡。最初由于偶然的机会，在山的下坡挖取黄泥，无意挖到一些唐宋墓葬随葬的黄釉碗、罐或青白瓷碗、碟等。用它们到收荒货、古董者那里换得几升米钱，挖到一只古器就能赚几块光洋，真是费力不赚钱，赚钱不费力。此后，他们便不以卖黄泥来谋生，而以盗掘古墓的文物为职业。这样就在长沙出现了一批全国闻名的“土夫子”，并且在东、南、北区形成了盗墓团伙。

由于“土夫子”经常盗掘古墓，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墓葬封土和填土结构的特征，逐渐有了很强的识别能力，只要用锄头透过地表浮土取出样土来观察，就能识别是否古墓，并能鉴别是哪个时代的墓葬，然后开口挖成竖井式盗洞，从墓中取出一些值钱的文物，因此百挖百中，从不落空。此时，不仅是收古玩珠宝的小商贩与他们常来常往，而且一些有名的古董商，也成了“土夫子”的

大主顾；生意越做越大，成交一次，少则光洋几十，多则数百元。由于古董商大肆收买文物。并对他们传授一些古文物的知识，更加助长了盗掘古墓之歪风。两者相互勾结，一方面“土夫子”有利可图，另方面古董商就地低价收进，在上海高价卖给洋人，致使建国前长沙的古墓遭受严重盗掘破坏，所流失的文物也不知多少，其中一件国宝——战国帛书，就是“土夫子”在长沙市南区一座楚墓中所盗，为古董商所得，后被原雅礼中学的美籍教师柯克斯所骗走，现仍流落在美国。

二、盗墓生涯

盗墓首先要能够识别古墓，古墓一般以土葬为多，葬法先在老土（原生土）内挖成长方形墓坑，将葬具放进去，然后以土回填或夯筑，上面再筑封土堆。“土夫子”识别古墓就是根据古墓的封土和墓坑的回填土的成色、夯层、含水湿度来判断，概括来说是“一看二挖”：“看”就是看封土堆是人工堆积而成的或是自然堆积形成的；“挖”就是用锄头透过地表取出样土，用手挖碎来看，是否有夯筑层次现象或湿度。如果细致观察有把握，有经验的“土夫子”师傅就在古墓适当的部位开成竖井式的盗洞。为了节省工时，盗洞长宽大小以容纳两个畚箕为限，然后叫徒弟去挖。他们一般在太阳西斜时，三五个人上山，背着锄头和各箕，还带一副纸牌；找中了“洞子”（古墓），先由徒弟挖土，其他的人就在附近玩牌作掩护。他们挖洞子的功夫很不错，既挖得快又挖得笔直，当挖到一人高的深度时，就在盗洞的两壁挖成两个马蹄形的足穴来踏足，双手将洞内的装土的畚箕举上来，再往下挖深时就搭人梯，不管古墓埋得多深都能挖到底。有些用木炭或白膏泥封闭的木椁墓（如马土堆西汉墓），就为盗墓增加一些难度，他们并不知难而退，一定挖到底。原因是这些被封闭的墓葬，墓主生前身份地位高，随葬的珍品较多，因此拚命也要搞到手。当盗坑挖到接近棺椁部位时，师傅就下去探索，如果棺椁还完好，就用斧头砍，凿子凿，爬进棺室去摸文物。由于他们了解各个历史时期墓葬随葬的文物类别及放置的部位，所以心中有数，那些值钱的铜兵器、铜镜及玉器、琉璃器等，每次都能搞到手。如果棺椁腐烂无遗的墓葬，师傅就用竹签子在泥土中去仔细探查，就是很小的印章也能找到。“竹签子”这个小巧的工具，很起作用，既坚固又不易损伤文物，至今我们发掘古墓清理文物时，还沿用这个原始工具。据说有个别师傅下洞子取“货”（土夫子称文物为“货”）时，贪财忘义，见到值钱的小玉器，偷偷地埋在土里，等洞子清完之后，又下洞去取。有时见到零碎金箔（漆器上镶嵌的金箔），就冒着生命危险吞进肚里，第二天又从自己的大便里找出，他们盗墓每次虽说不是满载而归，但不是空手而归，总能赚点钱。

盗出的文物，一般质地差的或卖价不高的就卖给收古玩的小商贩或旧货店，好的就送古董商挑选。他们卖买的方式有时按件卖，有时按“洞子”全部的“货”一起卖。最初“土夫子”没有经验怕将铜器、漆器上的泥土清洗，会损坏原物，因此纹饰、铭文及制造工艺都看不明白，卖出的价钱吃了亏。后来，学会了古董商那套用棉花蘸水清洗泥土的办法，于是将盗出的文物在成交之前，逐件清洗干净，然后按“质”论价，这样价钱就大不相同，如楚镜的纹饰多种多样，有地纹和主纹，主纹就有龙纹，凤纹、龙凤纹、四山字纹、五山字纹等，不同的纹饰卖不同的价，汉镜有圜行铭文，“土夫子”虽然不懂铭文的内容，无法以研究价值来论价，他们就以字的多少来出价，多一个字多一份价。陶瓷器卖价很低，尤其是无釉的陶器往往相送。丝织品对他们来说更是门外汉，都当作废品来处理。如著名的国宝——战国帛书就是“土夫子”当作废品送给古董商的。据“土夫子”说，卖出的“货”，按钱的多少彼此分成，当师傅的得大头，徒弟得小头。他们记不起卖了多少文物，得了多少钱，只晓得每次少则几十，多则几百块光洋。

长沙的“土夫子”在东、南、北三区各自形成团伙。他们虽然没有成文的帮规，但无形之间占有各自的地盘，具体来说，各自只能在本区挖“洞子”，不得在别人的区域内去盗宝，彼此井水不犯河水，否则就会伤和气。但一方在自己的地盘挖“洞子”，另一方偶然碰到，则客礼相待，装烟喝茶，如果卖“货”的钱较多的话，还给对方送点酒钱，但决不容许对方干扰，更不得在夜深人静时来偷挖。按“土夫子”的话来说，挖别人现成的“洞子”是很不道义的。

“土夫子”盗墓，一般人认为很不安全，一怕塌方，二怕中毒。其实不然，从来没压死人也没中过毒，原因是古墓的回填土都经过夯筑，而且夯得很结实，加之盗洞开口不大，不会引起崩塌。墓内的遗体因年代久远大都腐烂无遗，变成了泥土，不会产生致命的毒气。“土夫子”因盗墓被火烧伤的却确有其事。他们有次盗掘一座保存完好的木椁墓，由于葬具周围用白膏泥封闭严实，里面产生一种自燃气体——沼气（马王堆一号汉墓就是如此），当他们在盗洞内用火柴点灯照明时，引起大火，烧伤了两个师傅，后来用泥土扑灭的。自此之后，“土夫子”就称这种保存完好的木椁墓为“火洞子”，由此“火洞子”闻名国内外。

三、“土夫子”与古董商的关系

民国年间，长沙做古董生意的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做“本庄”生意的，即本地买进，就地卖出，赚些转手钱。这些小古董商本钱少，赚钱也不多，他们

大多在例城桥、车站路、藩城堤一带摆摊设店；另一类是做“洋庄”生意的，即长沙买进，去上海卖给巨商或洋人，获利丰厚。当时在长沙做“洋庄”生意的大古董商就是颇有名气的蔡××。蔡早年房产多，颇有钱财，酷爱文物，考古知识丰富，他善于与“土夫子”交往，当“土夫子”家里缺米少油时，他慷慨接济，借贷毋须归还。他这种“急人之所急”的做法，深得“土夫子”的好评，每当盗有珍贵文物时，主动送给蔡××挑选。蔡做生意时，很有心计，首先不与“土夫子”谈价，先请他们到南门口的石三胜酒楼或东茅街的潇湘酒家大吃大喝，待如上宾，待酒醉饭饱时，再与“土夫子”讨价还价，由于这餐招待酒饭的作用，当卖五百元的“货”，三四百元就能得手。蔡还对“土夫子”的当家师傅背后给予好处钱，使他在成交时不从中抬价，这种做法很起作用。蔡善于仿造古董，而且可以乱真，难以识别。有次，“土夫子”将一件他仿制的战国铜器埋入盗洞内，次日约某大学著名教授上山看“货”，某教授亲眼看到他们从盗坑内取出一件“精美”的铜器，其纹饰和铜锈都非常“逼真”。某教授因酷爱收藏文物，便花巨款收买。此事，在建国后文博界传为趣闻。昔日做古董生意的人，一旦买进了赝品，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如果张扬出去，今后就会无人与你打交道，因为你不识“货”。某教授虽不是做古董买卖的，但吃了这次亏，以后不再提这件事了。

关于被美国柯克斯骗走战国帛书之事，其经过情况如何？目前传说不一。笔者在60年代曾问过蔡，蔡将详情告我。具体情况是：这件帛书是由南门“土夫子”盗出来的，当作“破烂”送给古董商唐鉴泉（又称唐裁缝），后为他所得。蔡在家中细心整理拼接，意外地发现是一幅帛书，上面既有文字又有图像，由于丝织品变色，对文字和图像难以看得十分清楚。蔡想用先进技术摄影来恢复“庐山真面目”。当时长沙缺乏这种设备，经雅礼中学语文教师钱无咎的介绍，于是认识了该校的美籍教师柯克斯。柯克斯答应可以满足蔡的愿望，带到美国驻沪领事馆拍照，并保证文字与图像都清晰。蔡当时心里有些矛盾，一方面相信美国的先进摄影技术，另方面与柯交往不深，有些不放心。后来蔡亲自将帛书带到上海，找古董商金财记老板磋商，打定主意委托柯去照像。蔡住在上海等待，最初柯谎称领事馆的摄影设备出了毛病，正在修理，后来柯又说设备无法修好，为了不使蔡先生失望，来不及通知你就托好友乘飞机去华盛顿拍照，等几天就可以带回来，不必担心。蔡听了这番话大吃一惊，意识到这是一场骗局，后悔莫及。当时蔡与柯争吵不已，柯克斯为了缓和这个局面，提出拿几千美金作为抵押，蔡拒不同意，相持不下，形成僵局。最后柯逃往美国，帛书无法追回，使蔡财物两空。此件国宝就是这样被柯骗走，至今仍存美国博物馆，使我国丧失了一幅研究古代宗教思想、天体意识、书画艺术等珍贵

的实物史料。

建国初，蔡因盗卖国家文物罪被拘留，由于他认罪态度较好，并将所藏的文物全部交出，免予起诉。蔡所交出的文物不乏精品，如战国人物龙凤帛画、彩绘漆言奁属国家一级藏品，当时政府为了利用他一技之长，予以立功赎罪的机会，安排他在省文物委员会下属的文物工作队服务；蔡对古墓出土的漆木器保养有一定经验，而且工作认真负责，为我省抢救了不少珍贵文物。如1953年我等在南大十字路附近左家公山基建工地发掘的一座战国楚墓，出土一支完好的兔毫毛笔，此笔在现场清理时并没有发现，而是他在室内整理出土文物时，在一根竹管内意外地发现这件国宝。这支毛笔的研究价值很高，纠正了秦蒙恬开始造笔的记载。蔡工作细致，严于律己，与大家相处甚好，受到同事的尊重和好评。在他离开人世后，省博物馆举行了追悼会，对他在建国后的政治态度和工作业绩都给予了应有的评价。

四、昔日的“土夫子”，今日的“土”专家

建国后，政府对“土夫子”采取了宽大和利用的政策，将部分人员收留在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做临时工，有的安排在长沙市涂家冲、株洲市废铜仓库拣选文物，有的安排在河西天伦造纸厂协助回收旧书。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长沙发掘古墓时，他们充当发掘工人，后来又参加了中南文化部组织六省考古干部在长沙抢救清理古墓的工作。1953年省文物工作队成立后，部分人转为正式工。由于“土夫子”有这种辨认土质勘查古墓的特殊本领，对我们的考古发掘工作带来很大的方便。每到一处工地，只要他们用锄头透过地表浮土取出样土来看，就能准确无误地判断是否古墓，并能从填土的特征识别古墓的深浅及时代，这种预测令人难以置信，古墓清理的结果，也与他们事先所估计的情况，没有多少出入，使围观者十分惊奇。群众对他们的评论纷纭：有的说他们的眼睛比“翻山镇”还灵，有的说他们的眼睛有“神”，能入土三尺，尊称为“土”专家。

古墓清理是项艰苦而细致的工作，在清理墓坑回填土时，劳动强度大，但他们能吃大苦耐大劳，功效又高，挖土只要两三锄头就能装满一畚箕，四米深的墓坑取土，无需用绳子拉，而是将装满土的畚箕往上一抛，站在墓坑上面的人双手接住，配合默契，操作熟练。在墓底清理随葬物时，他们非常细心，用竹签轻轻别掉泥土，寻找细小的文物，哪怕是极小的琉璃珠，也会从泥土中剔出，不会遗失。他们熟悉“铜路”，所谓“铜路”就是由于墓坑内铜器氧化，使周围的土质形成松软的黑色。看到这种“铜路”及其位置，就能胸有成竹地找到某种铜器，并能成型地清理出来，使一些出土的铜兵器剑、矛、戈等的锋

刃完整无损。他们还熟悉铜器氧化后的性能，那种“黑漆古”（氧化呈黑色）、“西瓜绿”（氧化呈绿色），质地很好，可以用手托得，不会损坏，而那种氧化呈黄色或灰白色的铜器，质地最差，用手触之就会破碎。由于他们掌握了性能，在清理铜器时避免了损伤，保全了很多珍贵文物。

“土”专家几十年的辛勤劳动，为湖南文物考古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清理了数以千计的古墓，抢救了不少的珍贵文物。尤其是在发掘马王堆西汉轪侯家族墓的过程中他们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在清理随葬物时，由于四个放置随葬物的“箱”太深，伸手拿不出，只好腰上系着绳带，上面用人拉住，侧着头从里面一件一件谨慎地捧上来，弄得头昏腰胀，其艰苦可想而知。但他们从不叫苦，也从不额外索取报酬，这种工作态度令人敬佩。他们不仅能吃大苦耐大劳，而且还有些土办法解决清理工作中的难题。据说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女尸在棺内难以取出时，他们出主意用五夹板斜插进去，将内棺侧起谨慎地将女尸移出，因此得以完好的保存，这可说是一大功劳。在此次发掘过程中，他们充当了主力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博得国家文物局和地方领导的赞扬。据他们告知：当时的省军区负责同志还送给每人一瓶好酒和一条好烟，表示嘉奖。

几十年来，他们不仅为我省的文物考古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还支援了湖北、贵州两省的古墓发掘和调查工作，兄弟省对他们发掘技术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些同志有的多次被省博物馆评为先进工作者，有的荣获省文化厅先进工作者的称号。

岁月催人老，而且不饶人，这些“土”专家大都先后离开了人间，健在的仅有三人，年纪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在家安度晚年。但他们那种看土质找古墓的本领，有的得到了继承，有的却没有，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徒弟”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我与“土”专家共事多年，尤其是在错划为右派当作发掘工人监督劳动时，他们对我不歧视，并传授看土质探古墓的技能，使我也略知一二。为了抢救他们这种特殊本领的知识，我作了较为系统的整理，从感性知识到理性知识，从地层学到考古学的角度加以阐述，题为《古墓勘查知识浅谈》（刊《四川文物》1984 年 3 期），该文问世之后，被认为填补了南方田野考古技术的缺口。其实，这应归功于那些“土”专家，因为这也是他们毕生经验的结晶。

湖湘旧闻录

李行之

我在四十年前，即留心地方掌故，因留恋旧事，不为时人所乐；在苒中年，复多忧患，偷活草间者二十年。及除“四害”，始得重亲笔砚，桑榆已迫，结习难除，辄为笔记，以备遗忘。凡所甄录，祐多出近世名人未刊手稿，外间既罕流传，而又事皆亲历。即异闻轶事，皆有来历，诚非道听途说者所可同日而语。

虽然，往事如烟，无由质证，襄阳耆旧传，尚有疑词；元佑党人碑，从无定本，所见异词，容或难免。至于笔者，虽亦有所综合剪裁，却未敢妄生羽毛。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仅有抄篡之劳，终惭发挥之义。

江建霞事略

江标，字建霞，江苏元和人。少敏慧好学，稍长，游学上海，就制造局聘，与外国人士翻译诸格物致用之书，是为考求实业、周知时事之始。及戊子（888 年）举于乡，已丑成进士，授庶吉士，甲午（189 年）以翰林院编修，督学湖南。

湘中为中原奥区，与沿海各商埠相距遥远，耳目所及，不逾故常，风气闭塞，人民群众，皆恶西人、西学及西政等。当时郭传郎筠仙奉使海外归来，每于客坐必谈西国政教之美，时人大哗，目为汉奸，至欲焚烧其住宅。

及建霞来湘，认为：“湘人风俗坚悍，百折不回，民气可用。惟民智未开，非所以自强之道。”因以外侮荐臻，中外贫弱之势，于发落生童时耳提面命，又编辑《湘学报》，举凡中西史志、舆地、算学，化学等，莫不登载，以风示学者。又改“校经堂”曰“求实书院”。从此，湘中人士，始知考求实学及中外大势。一时风起云涌，争自奋发，一洗其守旧之积习。其后，又开设时务学堂，一时愿隶子弟笈者甚多，咸以被选入学为荣。于湘中风气的转移，厥功颇大。时，两湖总督张之洞，虽平日讲学旨趣与建霞不同，而竟服其能，推为天下学使第一。

丁酉（1897年）冬，任满还京，戊戌秋，朝廷博求人材，俯采时望，授四品京堂候补。时，建霞尚留居上海未及到京。会政变，奉旨革职，永不叙用。建霞见时事日非，国家多难，终日忧伤，重感肺疾。冬，邻舍不戒于火，殃及池鱼，平生所蓄书籍，半遭回禄。旋归元和，病益深重，以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己亥十月十九日早晨病殁于家。身后萧然，无以为殓。

当时论者，咸谓自顷年以来，有志之士，其散处四方，绝口不谈时事甚多，而中夜以兴仰天号泣，要犹不无余望也。如先生者，虽侧身田野，听命县官，而其心一日未尝忘国家。所不幸的是降年不永，赍志以殁，一棺长盖，逝者如斯。“人之云亡，邦国殄瘁”。

其子孟聪，曾毕业于日本高等工业学堂，归国后，因为革命党人制作炸弹，失慎不幸殒命。

《知过轩笔记》

萍乡人文廷式，曾作《知过轩笔记》，其稿本于民国中犹存长沙马天驷家，今已不知散落何所，予曾见其传钞本，其中所述当时事状，颇多异闻，兹录数则如下：

“一、内苑过年所用东洋烟火，价值四十余万金，其中最大一盒，其直径至于数丈。火树银花，不得专美于前矣！又恭邸所进烟花，价值二万金。李鸿章所进东洋烟花，价值六万金。

二、戊戌七月十三日申时，有大星陨于南方，光晕五色，湘中居人见之者甚众。

三、壬午（1882年）春，有琉璃厂卖古者，姓白，由李莲英引入大内，遂得西后宠爱，在宫中居月余始出。不久，西后有疾，安后密察之，乃知有孕。遂召礼邸入宫，问以废后之礼，礼邸对曰，此事不可为，愿我太后明哲保身，礼邸遂辞出。是夕，安后崩。遗体长仅三尺。

安后之崩，乃禧后知其事泄，以缩筋药酒饮之，此事，宗室某公为予言之甚详。故予宫祠中有“春风不解伤心事，一夕齐开百禁花”之句。

四、时尚鼻烟壶，故由粤入都者，必以鼻烟壶为介。贵官中潘文勤（祖荫）、李文正尤嗜之。终日不离手，以近世所谓上品者为家常便饭。其尤上者，则贮之年久，“大金花”之类，不轻用也。”

余按：乾隆中万寿庆典，以鼻烟壶赏王公大臣，兼及福晋命妇，则闺阃中亦可用之，特妇人重脂粉，闻烟终有碍于容泽，故不甚通行。

道光以前，所用鼻烟壶，或以玉，或以翡翠，或以碧玡玜，其贫者或水晶，或以竹根。而今日之所重者，则尤在套料。若为乾隆时之五彩套料者，价

值千金，尤不易得。因此，至有破人家而谋夺其烟壶者，余不欲记其事。

善化张晋东著《达观诗话》，其中有《都门竹枝词》云：

“烧料烟壶气运通，水晶玛瑙命何穷，第须藕粉雕工巧，就是当年老套红。”

然则咸丰以来，风气使然。

潘文恭公晚年典乡会试，苦于校阅试卷，以房考官所荐数十卷，环铺于案，取鼻烟壶丢之，壶止，即将壶咀所向之卷取中，余皆弃置不看。故一时有鼻烟壶老师之称。

长江厘卡、盐关之质于英人，英使至译署会议。旧例，凡译署大臣毕集，发言者不过一二人而已。是时，敬信、崇礼等在座，方各出鼻烟壶以品高下。英使乃厉声曰：今日所议之事，中国之有人心者，皆当泪下，非玩烟壶之时也，愿诸位暂辍玩物，听公事如何！舌人转译，两人乃惊愧而止。至于两广总督吉庆，闻劾惊惧，在舆中吞烟壶自尽，至署已气绝，岂不悲哉。

祈晴与求雨

祈晴

从前，由于科学不发达，人们对许多自然现象的发生，无法解释，认为都是神在主宰，因此，遇到什么困难时，便只有去求神、许愿，每遇久雨成灾，便要迎神祈晴，反之，久晴不雨，因而闹旱灾时，也要迎神求雨。下面，将民国十三年的祈晴和十四年、二十三年的求雨情况，略述于下，以为笑料。

民国十三年（1924），长沙大水灾，比清朝同治八年（1869）的水位高出三尺多，原因是洞庭湖围垦日益增多，无蓄洪之力，只好“以邻为壑”，藉资挹注。长沙市大西门、小西门、潮宗门等近城各街，都可行船，灾民或登楼以居，或全家迁往古寺庙中；入城之水，都呈深黑色，腥臭难闻；又因各碓坊遭淹停业，一时米价飞涨。

当时省长赵恒惕，因亲往北门外祭江，跪拜如仪，祭毕，忽焉雨止，大放晴光，于是，群众纷纷传说：“天老爷也爱戴高帽子”！不料，一到晚间，雷电交作，大雨倾盆。明日，赵省长又往南门外猴子石祭江，所用祭品，为一猪一羊，溅血以祀，兹将祭文节录如下：

“……恒惕忝长斯土，职在安民，思障狂澜，当资神力。惕果不德，请降罚于藐躬，民之无辜，乃胥溺霪潦，用申祭告，敢仗英灵，令湘沅兮无波，遭洞庭而复路……”。

致祭时，赵省长俯伏在地，状至恭谨。陪祭的大小官员十余人，有内务司司长吴景鸣，警察厅长刘武，长沙县知事曹献享，也都同时匍伏泥中，默诚祈

祷。祭毕，赵省长又迳赴玉泉寺，拜祭陶、李二真人。

按：玉泉山本祀观音大士，香火之盛，为湖南第一。今以陶、李两真人由乡间远道入城，下榻此间，不能不待以宾客之礼，因而请大士退居别室。全城群众往拜二真人者，男女老幼，络绎不绝，户限为穿，殿内香气氤氲，烛光燎亮。及赵省长入庙。即将一般香客驱逐出庙，警卫森严。天忽略放晴光，人们莫不高兴，都说："至诚可以格天"。

早在清代，也曾因久雨不晴，天容如墨，有提督某，以祈晴无效，勃然大怒，命以土炮向天轰击，果然天忽放晴。当时，人们咸认为："软的不行，不如硬要"。自此之后，相沿成习，因此赵省长命军械局及警察厅将所存之大炮移置岳麓山顶，以便向天轰击，后以湘江水流湍急，难于过渡，改在猴子石山上，一时炮声如雷，城中隐约可闻，然而云气愈积愈厚，一到晚间，仍复倾盆大雨。于是，群众啧有烦言，认为不应以大炮向天轰击，致触天怒。

求雨

民国十四年（1925年）夏天，天久不雨，长沙大旱，当时求雨情状，颇多怪异，略述于下：

七月初，开始禁屠，全城素食。并迎接陶、李两真人进城，日夕祈求，至十五日之后，虽偶降小雨，而旱象犹严。因此，又派人赴黑麋峰迎接周真人及鼍龙将军入城，一并供之玉泉山观音庙中。所谓鼍龙将军者，实即长约二三寸之四脚蛇数头，以瓦盆贮水养之，置庙中戏台上，禁人观看。

接着又派人去湘乡，把易孝子也接来长沙。易孝子为湘乡县十三里乡人，年约五十余，以其曾割股肉以疗母病，母死，庐墓三年，以后历数十年，犹孺慕不衰，故人们咸以孝子称之。省长赵恒惕闻其求雨数次，皆有灵验，因此，特派专使奉迎。孝子初来，即就原善化城隍庙前坪搭一露台，孝子身着麻衣，头戴前清时的行装凉帽，惟无缨须，辫发犹存，日夕登台喃喃祈祷，间或穿一破烂女棉衣，或手持一破芭蕉扇，据云：此皆为其母亲遗物，求雨时用之，每多灵验。后来，人们认为城隍庙坪，尘嚣嘈杂，不能诚心，又移往河西麓山寺内。

又在玉泉山戏台上，用纸扎成一个面目狰狞的大鬼，说是"旱魃"，因天久不雨，遂鸣锣击鼓，将"旱魃"斩之台下。

长沙县长周某，认为龙潜藏于深潭之中，见虎必斗，"风从虎，云从龙"，龙虎既斗，必有大风雨。于是，派人尽购全市各中药店中的虎骨，投于长沙附近各处深潭中。

浏阳县长唐某，特下令封闭县城南门，认为南方丙丁属火，封闭南门以杀其势。偶有何恰兴店主私开南门汲水，事为唐县长所知，因之大怒，即令将何

某缚之置烈日中，数日不解，人将垂死，一时舆论大哗，始得释放。

民国二十三年夏，又以天旱迎陶公真人进城求雨，仍驻节玉泉山观音庙中。至七月初七日，恭送陶真人还槊梨临湘山老家，先期分团按户派款，装演鱼龙灯火鼓吹旗伞之属。穿长衣的人手持盘香或往香于炉，低头瞑目，先到玉泉山行宫磕头致敬，然后杂行仪仗队中，步行到槊梨陶公庙上香。自午后三四点钟起行，络绎道路，沿途爆竹声、鼓角声不绝，由长沙至仅槊绵亘三十华里，走在前面的人已经回城，后面的人还在行宫磕头。

神像出城时，保卫者皆手持刀枪或竹板，夹道而行。所过之处，居民皆陈设水果糕点，燃放鞭炮，向神轿跪拜。即使站在路边看热闹的人，也莫不鞠躬长揖。

当时很多较具识见的人，见到这种情况，莫不叹惋，认为变法四十年，风气仍然如此，不知何时才得扫除这种迷信观念。

常德人斗蟋蟀

常德人黄小嵩，好斗蟋蟀。民国初，小嵩入谭延闿幕，随谭居郴州，暇日多谈其斗蟋蟀情事，兹将曹孟其当日所记，转录如下：

"二字虫"，小嵩物也。据虫者蓄虫千百头，皆于盆面标一字目，以资识别，即以其字名之，俗则然也。（二字虫者，因其得自二讶于，故云）。出奇制胜，数败诸名虫，渐老，不能人，卒为它尾所杀，于是，常德斗蟋蟀者皆震悼，谋为礼葬。名伶春燕，手制锦棺，跪拜如孝子。春燕故尝寄名二字虫为养子者也。（春燕好搏，每负，则纵二字虫斗，辄胜，目为衣食父母，故当窘时，必哀告小嵩，谓二字虫爷爷不出，儿子不能生活。好事者乃令春燕拜二字虫为父，逐俨然父子。）临葬，诸名伎皆来，整衣结队，拜于墓下，小嵩会诸宾客，为文冢之，状其战绩，或垂首感叹，有泣下者。是日男女宾客到者，约百数十人，车马塞路，行人啧啧，虽数百里皆相与叹惜，以为如二字虫，庶几足矣。

"西字虫"，亦小嵩物，顾躯体渺小，不中程式，卖虫者初持数虫来，小嵩皆受之，其人以西字虫赠小嵩，曰：此物不能值钱，可备打虫之数。（蓄虫者必以已所有之虫互斗，其最健者乃出场角彩。斗于家者，谓之打虫。）小嵩信之，试与他虫角，辄败之，然犹未之奇也。秦和老者（清代拔贡，曾任知县），能相虫者也。一日小嵩携西字虫过其家，使相之。和老曰，此英物也。时和老有三名虫，小嵩问，能与之角否？和老曰，似亦可，但恐尚非吾敌耳。小嵩固请一角，且备小彩，和老不能却，乃出其一，甫交，即为西字虫所败。和老大惊，固请易虫再战（一虫战后，必饲养数日，始能复斗，恐其再斗力疲故也）。小嵩私念，吾虫本不足贵，倘不胜，亦无所谓，遂允之。和老又去一虫，则又

败之，西字虫以一日败两名虫，于是威望暴著。小嵩日携西字虫登场，皆无敢与角者。某公蓄一青虫，大虫也，已经十余圈（斗胜一次，谓之打过一圈），为一时领袖，亦无敢与角；两虫既闲甚，某公戏谓小嵩，西字虫英物也，小虫谁敢与斗，今惟吾青虫，不知肯相匹否？（《蟋蟀经》："小不斗大，大不斗名，名不斗异"，西字虫小虫，故某公以之相难）闻者皆鼓掌，以为能斗西字虫者惟有大虫，能与青虫斗者谁有西字耳。小嵩初从事，亦即信之，竟败青虫至死。于是群奉西字虫为将军（斗虫收场时，推最强者为"将军"，主人亦以为至荣）。小嵩云：西字虫事暗主，乃所以成功名，诚不幸之大幸矣。

"一碟菜"，某外委物，外委既得虫，即以菜一碟谢其人，故以名虫。既携至场，斗数圈，即不复斗，将收场，有人以一名虫至，虫名青金翅，当时号为无敌者也。叠胜之将，败之如靡，于是得彩最多，而其主人气益豪，人益不敢当也。外委携一碟菜至，就问此虫何如青金翅，主人睨之而笑，假与青金翅角，只索半彩，外委问信乎！则应曰，安得不信，君二百串，我四百串。斗彩至二百串，其数已为至巨，外委遍征搭彩，无一应者，乃独具资（两虫互，胜甲者以钱从甲；胜乙者以钱从乙，谓之搭彩。斗虫者二，搭彩者又数倍其人），卒败青金翅。当时皆惊异，尽问其故，外委笑回，诸君坐不读书耳，青金翅固无故，唯茄皮足以胜之，吾虫真茄皮耳。

"青虫"，常德茶肆主人陈平燕物。初有人持青虫至，修伟异常，平燕大喜，以钱四百买之，试与他虫角，不胜，则弃去。后数日，其人复持青虫至，故短其尾，平燕复以钱四百买之，试与他虫斗，不胜，则又弃去。又数日，其人复持青虫至，故短其须，平燕复以钱四百买之，方欣赏，忽悟为其人所给，恐弃去复为其人所得，遂置之打缸（虫经数战，为他虫所败者，并置之打缸中）。顷之，打缸中振振有声。似报已捷，启视，则青虫驱杀打缸中虫甚烈，平燕乃出一健虫与斗，意将杀其威也，而皆不能与敌，则取从前胜彼者与之斗，亦如是矣。平燕复取出谛视，则虫色渐红，或曰，此冬发霞耳，至冬乃能斗也。至是青虫数日必出，出必得巨彩，而名亦甚张，无敢近者。

